

傳播政治經濟學

——再思考與再更新

Vincent Mosco 著
馮建三、程宗明 譯



傳播政治經濟學

——再思考與再更新

本書詳細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然後用以解析當今走向日愈全球化與科技化的資訊社會：

「最近十年來，有關傳播研究及其走向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包容廣泛有如百科全書--具有學術水準，又能平易近人，對本行深具同理心，又能坦然反省。文生·莫斯科教授關於政治經濟學的這本驚世之作，對於這個領域的貢獻，不但前無古人，亦將成為本領域的重要柱石之一。」（美國伊利諾大學傳播學院 Thomas Guback教授）

「以政治經濟學取向研究大眾媒體與傳播現象，是最近幾年來最具有生產力，也最為具有創見的學術領域之一。文生·莫斯科教授已為本領域的知識史與制度史，釐定圖譜，英雄行徑，成就非凡。但本書又豈僅是圓熟的綜合敘述？本書亦有創見，對於學子與學者而言，必然亦是援引參考與激勵鼓舞之作。」（英國 Loughborough大學社會科學系 Peter Golding教授）



五南文化事業

ISBN 957-11-1544-4 [541]
0 0 5 8 0



9 789571 115443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傳播政治經濟學

再思考與再更新

馮建三·程宗明 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Vincent Mosco

原作；馮建三，程宗明譯。-- 初版。--

臺北市：五南，民87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ISBN 957-11-1544-4(平裝)

1. 溝通 - 經濟方面

2. 溝通 - 社會方面

3. 社會關係

541.6

87003660

1729

傳播政治經濟學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Rethinking
and Renewal

原作者 Vincent Mosco

譯者 馮建三 程宗明

責任編輯 陳秋華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106

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郵政劃撥：0106895-3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顧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刷 1998年 4月 初版一刷

2005年 9月 初版三刷

定價 580元

版權所有·請予尊重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Vincent Mosco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Wu Nan Book Company,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GE Publica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原作者中文版序

若說政治經濟學有恆可守，若說有一概念，可將亞當·斯密與卡爾·馬克思等多元歧異之思想家，齊聚一堂，那麼，這個恆常的概念，可以說是社會變動無所不在。任何社會及其典章制度與價值觀念，無一不處於經常騷動的過程。就在我方當尋思，可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漢文譯本說些什麼時，這股意念油然而浮現，因為，從本書完成以來，舉世各地，很有可能再沒有任何地區如同亞洲這般，歷經了如此生猛強烈的社會變動。

本書在一九九六年問世，當時筆者提及崛起的經濟新星，包括了中國及其他所謂的亞洲之虎，除了日本長久以來就是經濟強權，南韓、泰國、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與臺灣，如今都已在列。由於在經濟上有可觀的進展，這些國家的模式，也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取向的成功。我們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尚難找到類似的成功故事，但這些亞洲國家卻在政府大舉介入的情況下，有其成功，雖然外界將她們的模式，說成是市場才是走向發展的正確道路。這個模式固然付出了可觀的社會成本，但本書仍籲請政治經濟學家承認其成就，是有可觀之處，並且，更重要的，本書籲請我們應將此成功，視為一種動力，敦促我們重新思考並更新政治經濟學。

但，須臾之間，變化如此巨大！勢隨物轉，聞之令人氣喪的震盪，波波相連，衝擊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亞洲奇蹟如今已成亞洲危機。各地分析手莫不愁容滿面，擔心這終將對世界貿易造成衝擊，類如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全球機構，於是被迫進場救援，企圖挽救許多已在衰微的國家經濟，代價卻是這些國家必須拱手讓渡國家主權，並須採取嚴峻的財政政策。眼見昨日猛虎，今天空有咆哮，卻已被全球經濟的主宰，拔其爪牙。誠然，有人會說這起經濟衰退終將過去，屆時本區域的經濟榮景，當可再有期望；但是，即便真有如此時日，早先那些樂觀不可名狀之士，恐怕再

不能揮去這段記憶，這麼多銀行束手無策、這麼多企業行號倒閉破產、接二連三的政府遭到選民唾棄，被迫向國際資本的需索棄子投降，或是被迫對先前羽翼其權勢的同一批資本家，惡言相向。社會變動無所不在，這也就督促我們以更為細膩精緻的政治經濟學，探索、解釋社會變動的多重方向。

傳播政治經濟學所要特別檢視的對象是，在媒體中介之傳播的生產、分配與交換中，權力扮演了什麼角色。本書取經於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豐富歷史內涵，它將社會關係與社會現狀，放在更完整的脈絡裡，然後加以研究，考察其在歷史過程的演進，依據社會正義的標準加以評估，最後出以行動，冀望更為正義的、民主的世界，能夠透過行動而到來。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旨趣，包括了強化傳播研究的理論根基，途徑則是要在此理論架構中，納進對於權力結構的運作之理解，以及理解這些權力結構，究竟如何將傳播過程，轉化為商品化的社會關係。這也就是說，我們特別要研究全球的政治經濟運作，它根本就是依賴傳播器物才得以成長，這也就是說，我們特別要研究跨國媒體公司，因為它們對於傳播體系的控制，日日加深。政治經濟學也要檢視，各個國家的企業財團、國家機器及超國家組織（比如，世界貿易組織）究竟如何構成這個全球政治經濟體，我們同時也要檢視中介於全球及在地強權的各國階級形構。

再者，特定人從控制傳播資源之中得到利益，而後產生的衝突，亦包括在研究旨趣之內。就此而言，政治經濟學見證、記錄了勞動者的介入干預，特別是見證了日愈精密的傳播勞動之國際分工所形成的局面，以及婦女及少數民族起而行動，企圖糾正全球傳播權力之不對等所激發的局面。到了晚近，這股研究流向已經擴展到了傳播領域的社會運動，擴展到了在日愈私有化的影視空間之下，公共領域的當前處境，擴展到了舉世傾向以人為消費者，而不是將人當作公民看待的處境。

對於實踐，對於研究成果與社會介入的統合，政治經濟學有其歷史承諾。這也就是為什麼政治經濟學對於執守於社會變動的學者，散發了無窮的吸引力。過去許多年來，這股信念也讓許多學者涉足於推動「新世界資

訊與傳播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也就是目前以麥克布萊德圓桌會(the MacBride Roundtable)作為主軸的運動。再者，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於傳播產業勞動者的權益，對於公民有權在最完整範圍內使用傳播媒體的權益，支持之、信守之。

最近這些年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拓展到了性別／種族／氏族及文化研究等課題，這正顯示了政治經濟學對於全方位研究的歷史承諾。自有政治經濟學以來，社會階級一直就是政治經濟學圖譜的核心座標，政治經濟學者也體認階級、性別、種族與國民性的關聯，是必要的研究課題。同時，他們亦承諾於檢視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領域，如何產生聯繫，尤其是要檢視政治經濟學所理解的權力，也就是著床於市場及機構制度的權力，如何與文化研究的關係產生聯繫，特別是要集中於研究文本意義的社會建構，以及在社會生活中運作的微觀權力關係。

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在於針對與時俱變，日愈為跨國傳播、娛樂與資訊公司強權所塑造的全球政治經濟情勢之多重面貌，展開學術研究與社會介入，但政治經濟學仍體認面對這些新挑戰，實屬必要。

加拿大·渥太華 Carleton 大學

一九九八年元月

Vicent Mosco



本書乃有關變動的政治經濟情勢之作，合當它的寫作緣由，起於當時的南斯拉夫 (Yugoslavia)，也就是現在的斯洛伐尼亞 (Slovenia)。一九九〇年八月，「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雙年會在 Lake Bled 舉行，筆者與倫敦 Westminster 大學的 Colin Sparks 與 Sage 出版公司的 Stephen Barr 數次非正式晤談，因有本書撰寫的動機。對於兩位當時給予的支持，以及這段寫作期間的耐心，筆者在此致意。

若是沒有得到許多人的時間、諮詢與批評，本書無法寫就。首先，在一系列的正式訪問時，許多人慷慨地對著我的麥克風，侃侃談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前景，我要申以謝忱。按照我的訪問順序，這些人士包括了晚近辭世、鼓舞了三個世代的傳播學者 Dallas Symthe；Oregon 大學的 Janet Wasko；加州大學 San Diego 校區名譽退休教授 Herbert Schiller；Leicester 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前主任、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前會長 James Halloran；Loughborough 大學的 Peter Golding 與 Graham Murdock；Illinois 大學傳播學院的 Thomas Guback；以及 Westminster 大學的 Nicholas Garnham。敬謝諸位的時間，以開放的胸懷您的自述生涯與生活，以及坦然說明您對傳播研究現狀的觀察。

此外，在本書寫作期間的不同階段，許多人也提出了頗有助益的建議、想法與批評。他們是 Jeanne Allen、Robert Babe、Jack Banks、Ronald Bettig、Oliver Boyd-Barrett、Peter Bruck、William Buxton、Andrew Calabrese、Levon Chorbajian、Andrew Clement、Wallace Clement、Thomas Cooper、Arthur Cordell、Gerald Coulter、James Curran、Susan Davis、Marjorie Ferguson、Oscar Gandy、George

2 傳播政治經濟學

Gerbner、Jill Hills、Sue Curry Jansen、John Lent、Eileen Mahoney、Michèle Martin、Robert McChesney、Stephen McDowell、Catherine McKercher、Eileen Meehan、James Miller、Anthony Oettinger、Manjunath Pendakur、Colleen Roach、Eileen Saunders、Dan Schiller、Sid Shniad、Fred Sperounis、Gerald Sussman 與 Dwane Winseck。

Carleton 大學的許多研究助理與研究生亦提供了卓越的協助與諮詢。他們是 Carla Brown、Anthony Ferrare、Lewis Kaye、Patricia Mazepa、Roger Perritt、Andrew Reddick、Vanda Rideout、Aurora Wallace，以及 Wendy Zatylny。Carleton 大學圖書館的 Nancy Peden 為我檢索追蹤許多參考資料，並交寄許多她猜想或對本書寫作有所裨益的材料。能夠得人為你找到你所需要的材料，並預期你所可能需要的資料，然後為你找齊，天下之樂事。

筆者亦對我的學生致謝，特別是筆者指導，而論文與政治經濟學有關的學生，以及選修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學生。您們的所思所見、批評與支持，助益非常之大。

本書得到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會的資助，筆者因此得以旅行訪問、購用研究材料，並得到一整年休假的寫作時間。筆者感謝 Carleton 大學研究學院辦公室，尤其是 Anne Burgess 的協助，使我得以申請到這筆資助，我也要感謝筆者獎助金承辦執事 Gail Mutton。Carleton 大學另以研究獎助金，資助筆者第二年的休假研究。我要感謝當時人文學院的主任 Janice Yalden，她的繼任主任 G. Stuart Adam，以及新聞暨傳播學研究所主任 Peter Johansen 的支持。

我的想法與研究策略得到了許多機構的慷慨支持，包括 Toronto 大學，該校的圖書館與資訊研究所的年度 Sharpe 講座，讓我首次得到機會，反省政治經濟學的奠基始祖，對於傳播與資訊研究的當代思路，可能會有什麼貢獻；Harvard 大學的資訊資源政策計畫，慷慨地提供住校學者的身分。此外，許多組織提供機會，讓我就此主題發表演講與主持座

談，包括加拿大資訊研究協會、加拿大圖書館協會、倫敦市立大學、George Washington 大學、Harvard 大學、Illinois 大學、Massachusetts 大學 Lowell 校區、Muehlenberg 學院、Northwestern 大學、Ottawa 大學、紐約市 Queen's 學院、加州大學 San Diego 校區，以及 Westminster 大學。

特別感謝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許多容貌各異的傳播學者，包括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在此如魚得水。筆者有幸，曾經擔任這個協會政治經濟學研究小組的主席，本書在本協會多次會議中，得到與同儕緊密切磋的機會，獲益良多。

筆者謹向許多人致以深忱謝意，但本書的最後成果，責任由我一人承擔。



譯者說明

本書共七章，中文譯本由程宗明負責翻譯第三章，其餘部分以及譯附錄由馮建三負責。

譯事匪易，謬失之處，尚請指正。

馮建三·程宗明

一九九七、十二月

目錄

原作者中文版序

謝辭

譯者說明

1 導論 ————— 1

理論的理論：實存的、兼容並蓄的與批判的認識論 / 4

傳播政治經濟學：三個起點 / 16

變化中的全球政治經濟情勢 / 19

第一部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圖譜 27

2 政治經濟學是什麼？ ————— 35

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 39

最重要的一些特徵 / 45

古典典範 / 62

激進分子的批判 / 67

保守主義的批判 / 73

從政治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 / 74

政治經濟學或異端經濟學的流派 / 83

新保守主義 83

制度經濟學 85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88

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 93

環境生態政治經濟學 97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 /98

結 論 /106

3 傳播的政治經濟學————— 109

傳播 /111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114

北美洲 /126

英國與歐洲 /146

「第三世界」與傳播的政治經濟學 /175

本體與挑戰 /191

第二部 再思考與再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 195

認識論 /199

本體論 /201

理論母數 /202

4 商品化————— 205

傳播的商品形式 /213

內容的商品化 215

閱聽人商品 218

模控的商品：真正的商品化 222

模控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 226

勞動的商品化 232

私人與公共生活過程中不同於商品化過程的部分 /238

私人生活中的社會過程 240

公共生活中的社會過程 247

5 空間化————— 255

傳播與集中：空間是制度的延伸 /260

國家 /295

全球化 /302

民族主義·地方主義與社會主義 /304	
6 結構化 —————	313
社會階級 /321	
性 別 /340	
種 族 /346	
社會運動 /351	
霸 權 /356	
結 論 /360	
7 挑戰邊疆：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 —————	363
引言：界線 /366	
向邊界學習：文化研究 /372	
向邊界學習：政策研究 /376	
政治經濟學的回應 /381	
結論：重返階級強權 /401	
譯附錄：補記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文獻 ————	405
參考書目	415
索 引	445

1

導 論

透過溝通、傳播，我們所能夠完成的，並不是實質爭議的解決，但有些時候，我們或許能夠因而得到格外銳利的意識。(Williams, 1976: 21)

政 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一個主要取向。過去五十年來，世界各地已經有許多機構的學者，均在這個旗幟下，著書立說。為數甚夥的期刊論文，已然為此領域的內涵與發展路徑的梗概，提供了重要的闡述^❶。《傳播政治經濟學》這本書的目標，在於填補空隙，運用整本書的篇幅，綜合敘述這個取向的內容、它的成就、辯論，以及它與傳播研究的其他取向的關係。我先從歷史角度著手，將政治經濟學當作是社會分析的一種概括工具，既描述又加以總合性地批判，接著，我分析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傳播現象的取向，評估它現有的成就，提出它應該有的新起點，並檢討政治經濟學與政策研究及文化研究的關係。

本書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總合各家之成，介紹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貢獻，但筆者不以此自滿，切望本書不只是標示這個領域的筋脈。除了檢視主要的論述以外，本書企圖重新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学的核心要旨，賦予它們新的生命。最近，傳播陣營中已經有人從事了這些方面的工作（比如，Curran, 1990; Hardt, 1992;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筆者的重新思考與添加活力，起始點的認知，主要將在第二章與第三章詳細說明，它體認了政治經濟學在許多課題所取得的成就，但重點尤其放在政治經濟學對傳播領域的貢獻。經由這道功夫，默頓 (Merton, 1968) 與貝爾 (Bell, 1973) 所說的知識典

❶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了 Gandy (1992)，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及 Wasko (1989)。

另參見 'Colloquy' (1995)。

碼化或學科的地圖化，已經完成。但本書還要從這些意義上，再作出發，因為在筆者看來，知識的典碼化是在特定社會與歷史的脈絡情境中進行的，這就是威廉士的諄諄告誡 (Williams, 1976: 21-22)：

我們並不是要學習傳統的原來面貌，我們並不是接受一成不變的共識，並不是因為它是「我們的語言」，就使其有自然天成的權威，致而我們就將這一套意義加以承襲。我們是要在真實繁複的環境中，我們是要在天南地北的差異觀點中，把它當作正在形成與重新形成的過程：符號語彙是要由我們來運用的，我們用它來找出我們的出路，如果察覺有改變的必要，我們就加以改變，這就是我們創造我們自己的語言與歷史的過程。

- 2 秉持這個觀點，認定社會變遷的過程與時俱行，第四至第六章就從以下三個動態概念，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空間化 (spatialization) 與結構化 (structuration)。這三個概念是進入社會場域的入口，或說是起點。最後，重新思考與添加活力的內涵，是要檢討政治經濟學取向與鄰近取向的關係，這裡指的是政策研究與文化研究 (第七章)。

理論的理論：

實存的、兼容並蓄的與批判的認識論

本書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基礎是一種實存的、兼容並蓄的，以及批判的理論之理論，它所提供者，也就是史馬尼 (Shimony, 1993) 所說的「整合的認識論」²。實存論 (realism) 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由一組以上的名義類目組成，這些類目則由主體主觀地加以決定；或者說，實體由許多觀念類目組成，而這些類目則有具體的物質對應 (Garnham, 1990: 3)。但是實存論者認為名義論者與觀念論者，均

有不足，實存論者認為，感官上的觀察，以及隨後的各種詮釋，二者相互建構而有現實的存在。根據實存論的觀點，實體 (reality) 由兩者構成，一個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是我們解釋我們所看到的，缺一不可。這個觀點衍生自兩個來源，一個是巴赫丁 (Bakhtin, 1981) 的建構語言學，另一個是威廉士 (Williams, 1977) 所採取的立場，以社會—歷史取向來鑽研文學理論。放在實際運用層次，如同梅鐸 (Murdock, 1989b: 226-227) 所說，實存論者總是戒慎小心，避免完全依賴抽象的理論，也避免完全依賴經驗上的與詮釋上的描述；反之，實存論者總是賦予理論上的推演與經驗上的證據，同等分量。

孔恩提出了一個人們廣為接受的想法 (Kuhn, 1970)。他說，各種概念、它們在所有概念體系的排列，以及各種理論典範，都具有實存意義，它們對於人們提出解釋的過程，都產生了影響。經驗材料經過綜合以後，就是各種類目的安排，但理論不只是這些。理論協助我們將描述性的與解釋性的材料，建構成形，理論指出這些材料的各種元件之聯繫。此外，理論也指出了另一種聯繫，一方面是這些材料的各種元件，另一方面是經驗描述與解釋在進行時所涉及的過程與實況 (Resnick and Wolff, 1987)。實證主義者 (positivists) 所說的「俱在的事實」，那些特異的本質，說這些事實與本質完全不受概念沾染，絕對無法解決環繞理論而起的爭議，因為像這樣的事實，並不存在。另一方面，又有人說理論是沒有生命的，說理論就是常識所說的「隨興所至的冥想」，說理論欠缺經驗的與解釋的基礎。若是按照這個說法，事實遠非理論可及，事實就變成了實用哲學家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所說的「無可置疑、非得接受的事實」，它把概念類型矮化、動搖了，使之成為自我的想像、省思，這樣一來，若是有

② 史馬尼的取向，則部分源自侃博 (Donald Campbell) 的「描述性的、視情況而定的、綜合性的知識論」，本書採用的取向也受到了侃博的影響。

人提出特定的概念，他或她就必須先加以證明，要不就改變這個概念。但是，純粹的理論或純粹的事實，從來就不會存在——理論與事實相互沾染，彼此接觸。理論上的以及經驗上的 / 解釋上的過程，
 3 兩相影響對方，「同時」二者也都受到它們所寓居的更大的社會環境之運作所影響。因此，在本書看來，理論與經驗上的 / 解釋上的過程，其關係應該視為「相互決定」與「相互建構」^③。

筆者素來知道，政治經濟學者與傳播學者的研究取向，繁複眾多，本書採取的是一種「兼容並蓄的」、開放的，不化約的立場。這麼說的意思，最重要者有兩層。第一，它體認理論不能含納所有的社會生活。任何分析都標誌了衝突，它一方面知道社會生活是些什麼，另一方面，它又知道社會生活本身又內含了某些東西，致使我們無法完整得到所有的相關知識。但是，即便體認完整的知識，非我們能力所及，這個觀點仍然堅持我們有能力理解社會經驗。馬克思領悟到了這個矛盾，於是他超越理論而向實踐 (praxis) 推進，弗洛伊德超越解釋的心理分析而向治療撩撥 (therapeutic provocation) 推進等等。第二，它體認傳播政治經濟學之中，並沒有任何取向可以獨尊而聲稱自己才是正確的。筆者認為，政治經濟學與傳播研究是檢視整個社會生活範疇的通道。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是進入其他許多領域的起點或入口，如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這兩個主要的取向與政治經濟學比鄰而

③ 阿馬德 (Ahmad, 1992: 287) 為理論說項，他論稱，若要理論自我修正，那就必須「『同時』援引過去的事實，以及援引理論本身以前的及當前的構成」。若是僅以事實就要修正理論，結果將會「僅只是壓制，這種壓力將持續糾纏並瓦解理論與歷史本身」。然而，我們也必須說，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另一個方向，也就是若要以理論來修正事實，相同情況亦將存在。幾百年來，托立米 (Clausius Ptolemy，西元二世紀左右的希臘數學天文學家) 以降的知識傳承，一直都在「修正」事實，他們以數學上的詭辯來修正他們自己的觀察，而不願重新思考其他天體在完美的軌道上繞地球而運轉的理論。

居。

筆者採取兼容並蓄的立場，這對本書結構的兩個重要面向，具有核心意義。第一，它不只是將所有不同取向標誌在學術族譜，它也不只是防衛特定取向，它的企圖是要領會兩者的價值。本書所嘗試的是，將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視野，廣泛納進，並交代這些政治經濟學者如何看待傳播，於此過程，筆者也體認本書所採取的百科全書式的或「教科書的」取向，必然存在許多侷限，尤其是容易流於將學術族譜的各個要件，點畫勾懸，但卻沒有將這些要件的結構、形成過程、彼此關係或互動後的結果，合理呈現。針對這個缺憾，筆者亦想指出，和盤托出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整套主題或論旨，固然幅度失之於廣，但自有價值，因為它能夠將比較與對照多種課題的不同方式，清楚展示。第二，這個取向不只是重新陳述政治經濟學的成就，也並不只是企圖加以轉換。筆者這裡要再次表明，本書執守兼容並蓄的立場，目標是兩者並取。本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用來探討引導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承，然後探討政治經濟學在傳播研究的運用。雖然這個部分是要將政治經濟學所已經完成的成績，歸架入譜，但筆者已加以比較與批評。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是考量，有哪些特定方法可以重新思考與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筆者從兩方面著手，一個是站在不同的起點，檢討之省思之，另一個是回應鄰近政治經濟學之學科，也就是政策研究與文化研究對政治經濟學的挑戰。

採取兼容並蓄的立場，當然會擔帶風險。最根本的一個是，這等於是要在一本書之內，放入超過一本書可以容納的材料。單是這個風險，就已經使得許多書的作者，採取兩種策略應對之，一個是將這個領域的學術族譜，限定在教科書的形式，再一個是提出新的取向，重新編造它的學術族譜。這些作法很清楚地說明了本身的限制，這雖然有其價值，但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來挑戰它們。教科書取向的作法，預設了在這個領域的人，已經有了彼此接受的立場，或一整套的立場，或至少存在一整套辯論可供援引、陳述。但大多數學科，特別是

人文學科，而社會、生物與物理亦復如此，它們對於各自學科的權威歸屬，經常處於爭論的狀態。今烈於昔，各方人馬都在重劃學術族譜。在此狀態下，若是畫地自限，說是要複製族譜，則無異於是在嘗試論稱前蘇聯的地圖，或是嘗試論稱牛頓的宇宙運動說，價值仍然匪淺。在學科方當騷動的年代，若是能夠深入反省基本的認識論及理論上的立場，省思這些立場如何推動學科的建構過程，將會有更大的價值。這層工作要由批判地省思過程來加以完成，一方面掌握現今所成就者，另一方面則要構想現有業績，如何而能夠重新建構，也就是如何才能夠重新陳述、重新綜合、重新思考，以及經此而更新。

這個風險值得擔待，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或可因此而得到更好的成績。若我們對此有所自覺，自行反省認識論、理論、學科屬性，與政治實況，我們也就能夠打開窄門，不再打轉於「學科之內的學科」的定義工作，從而鼓勵在此專研的人，能夠展開交流，與關於傳播研究的寬廣辯論，以及更重要的，與關於當今知識生活狀態的辯論，彼此對話，產生關聯。所以，本書的兼容並蓄，對內表現於對本學科狀態的反省，往外則對在此領域鑽研的人所關注的衆生萬象，同樣反省。

本書所採取的實存認識論，加上兼容並蓄的立場，應該可以克服雙元主義 (dualism) 的問題，雙元論斷的存在，雖然可以理解，但並不怎麼有益。本書在這方面所擷取的觀點，源自女性主義對傳統認識論的批評 (Harding and Hintikka, 1983; Massey, 1992)。這個批評認為，雙元的想法，「已將我們社會中的性別做了斬釘截鐵的區分，它將不同性別的特徵屬性，以及這些性別的權力關係，固定了下來」 (Massey, 1992: 72)。表面上，二分的說法是要以差異，或以客體的關係作為基礎，並以此求取形式上的平等；實際上，它卻是以「A 或非 A」的存在與否，或是以「A 或非 A」的區分作為基礎，並由此顯現了它的偏好。還有，雙元主義不但鼓勵了這樣的思維，它還拒絕反省是否存在第三種可能性，拒絕反省在雙元主義所形成的疆界之外，

5 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如此一來，雙元之外的唯一可能性，實際上只剩下混亂，因為這裡的雙元，其實是單一屬性的^①。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雙元主義式的區分，實例很多，比如主體與客體，比如具體與抽象，比如基礎與上層結構，比如經驗的與理論的，比如政治的與經濟的。同樣地，後人也將特定政治經濟學家的作品，做了類似的區分，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俗稱的早期的馬克思與晚期的馬克思，相對於這個我們相當熟悉的區分，後人對亞當·斯密也做了我們比較不熟悉的區分，也就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斯密與《道德情感理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斯密。本書的取向是兼容並蓄，因此對於某個特定的理論家或某種思想，並不執著認定某種特定的解讀，才屬「真實」，本書目標是要將差異納入相同架構，強調政治經濟分析的多元思考。當然，作者仍然有自己的選擇，但這些選擇所側身的認識論架構，可以說是開放的、兼容並蓄的，不是化約主義的。

特別要再次表明的是，本書刻意採取了非化約主義的、汎層決定(over-determined)或多重決定(multiply determined)^②的研究取向。本書擷取晚近關於認識論的批判研究(Outhwaite, 1987; Resnick

① 這裡要再次引用瑪西(Massey, 1992: 75)的話，也就是我們並不是要引進女性本質主義(feminist essentialism)來取代其他性質的本質主義。她是這麼說的：

反之，我的論點是，空間與時間的雙元特色，以及稍前已提及的其他許多雙元主義的說法與它們的內含連結關係，在在都反映了，同時也都構成了我們所生活的男性至上社會之中的男子氣與女子氣，以及其他許多特性。

② 汎層決定這個概念的缺點，一般論者已多所指稱，除此之外，對於這個概念的前置詞「汎層」(over)，我也覺得不妥，合當在此記上一筆，因為它帶有過度的意味。因此，我傾向於使用多重決定這個術語，它容或比汎層決定來得樸拙，但卻是比較精確的。

and Wolff, 1987; Shimony, 1993)，拒絕將一個人身上、一個關係或歷史事件所展現的明顯複雜性，化約成一個核心本質或單一原因，比如，本書拒絕將經濟或文化因素，供奉成歷史變遷的主要因果動力，而將其他因素視為非關本旨。再者，本書擷取葛蘭西、盧卡奇、阿圖舍與威廉士的著作，主張理論與社會的各種定義，均在汎層或多重狀態中決定。這個意思是說，任何個人、社會機構與理念的存在，均是由彼此與其他各個構成元素所決定。筆者尤其是採取威廉士的詮釋，他說決定論是設定限制及施加壓力。若是套用阿馬德 (Ahmad, 1992: 6) 的話，則決定論不是「自投羅網無法動彈」的意思，而是指「已經如此存在的環境，人們居間『進行』選擇、『創造』生活與『創造』歷史」。採取這個汎層決定的取向，或是我比較偏好的多重決定的取向，也就比較容易避免賦予任何因素完全自主的謬失，它同時能夠強調相對自主與互動交錯的性質。在避免了這種雙元對立的傳統以後，我們也就取得了較佳的立場，能夠檢視歐卡納 (O'Connor, 1987: 11) 提出的命題：「現代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與文化的危機，如何彼此滲透，終至於造成自深的徹底轉換，展現為相同歷史過程的不同面向——現代世界的解體與重新整合」。採取這個立場的分析，雖然認定相互建構的重要，但它仍然必須明確標示在這些過程中，任何特定關係的性質、強度、方向與存續期間。相互作用並不同於各個作用力具有同等影響力。在這相互建構的過程中，特殊作用力如何確定，取決於我們的理論上的建構及經驗上的探索。

多重決定又與特定的因果觀有關。史蕾克 (Slack, 1984) 擷取阿圖舍等人的觀點，以結構因果觀取代線形因果觀，這樣一來，她也就更為能夠貼切地探究汎層決定及科技的社會脈絡等問題。筆者再跨出另一步來看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因果關係」這個概念，因為，即使從線形或表述 (expressive) 再到結構因果關係，它們都還是在牛頓物理模型的機械性質裡打轉。這些模式取得的實質分析與實際成就，堪稱匪淺。再者，若說這個所謂的化約論典範（起自

2500 年前的希臘，牛頓物理學是其中一部分）刻正臻至頂點，企圖要統合威信是根本力的重力、電磁與強弱核能等，則亦有相當證據足以支持這個觀點，並非子虛（Weinberg, 1993）^⑥。然而，再怎麼說，這些模式的弱點仍然很多，為數衆多而遍布各學門的人，已經就此有很多指陳（Gleick, 1987; Kuhn, 1970）。這些模式的主要弱點之一，在於古典物理學逕行認定，在其產生關係之前，各種客體已經存在了。這樣一來，觀察者就等於是置身在各種客體所存在場域之外，因此同時能夠將各種客體及其隨後產生的關係，「整體」觀察。但當代物理學則已大多轉而論稱，「實體或各種東西的位置，是從它們的彼此關係中，建構出來的，而觀察者也是這個關係場域的一部分」。確實如此，以前認為空間與時間是根本的單位，彼此各包括了不同面向，但現代的觀點則是，它們存在於互有關聯的四個面向，而這些面向則總和為「空間—時間」。這裡並不是說古典物理學模式，一無是處。事實上，這些模式放在實際用途時，管用得很，比如，將波音七四七飛機從洛杉磯導航至多倫多。不過我們總應該知道，即便這些古典模式持續指導實際活動，將各種客體及其觀察者完全分開，但這些模式總歸遭遇到了最根本的挑戰，也就是現在最受人矚目的觀點是，各種客體的關係、它們產生關係的過程，以及觀察者應該是觀察場域的一部分。

筆者從這個具有批判意義的文獻，以及從當前有關非線形模式的著作中，如渾沌理論（Gleick, 1987），吸收觀點，因此本書也就從「相互建構」的角度，探討各種變數的關係。於是，因果關係的意思

⑥不過，即便是支持這個觀點的人也知道所謂的最終理論，並不是指萬事萬物均已可解，因此不是指科學的終結。數學物理學家大衛斯（Paul Davies, 1993: 11）說，「沒有人認為，在次原子過程之脈絡下形成的這個理論，對於增加我們對流體亂流或雪花類型等等的瞭解，會有什麼幫助；它對於解答生命與意識之迷，更是不會有什麼幫助」。

7 是，一件東西的質素（以其專屬的概念總合之），影響了其他具有類似質素的東西。根據相互建構的觀點，我們也就不再會讓人以為，一件東西（通常是指已經完全形成的結構）對其他完整成形的結構，施加作用力。反之，現在我們會將過程當成主要的分析單位，這個過程也就是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它是分析的起點（或說是門檻），它提供了分析的架構，並與其他或許會將它改變的過程（如公共領域的創造）產生辯證的關係。這些過程對彼此的不同部分，發生作用，雖然作用的方式並不一定都能夠清楚界定，但總是有跡可尋。因此，我們強調的是，對於社會學的與政治經濟學的某些素習，我們有必要重新加以思考，這些素習傾向於將各種社會結構視為一成不變；然而，我們現在所應該檢驗的是，這些結構如何被複製、再生產，我們要強調另一個視野，強調各種社會過程的建構。

相互建構是什麼意思呢？理解它的困難之一，在於它既是非線形的，又是線形的。線形關係會是什麼光景，輕易可知；我們只需在圖表上，將這些關係劃成一條直線；我們可以拆解這些關係，然後加以重構；最重要的是，學習基本物理學的人都知道，線形關係是可解的。另一方面，非線形系統的定義正在於它的不可解。基於這層道理，科學家在創造微分公式的系統，藉此解釋他們所觀察的現象之前，都會把他們認為導致非線形性質的東西（如磨擦），先行去掉。如果非線形性質純屬支微末節，如果僅需短期預測，那麼，存而不論的作法，是可以成功；比如，除了預測大風暴，大多數氣候預報並不需要考量潮汐的非線形要件，此時我們只需要知道短期內（明天或下個月）（高／低）潮汐的大略資料。但誠如氣象學家都知道、都會束手無策的，即便借用當前最先進的電腦系統，他還是沒有辦法預測你所居住地區未來一個月的天氣變化。諸如此類的系統難題，一般總是半開玩笑地說，這是受到「蝴蝶效果」(Butterfly Effect) 的影響：今天有蝴蝶在北京攪動空氣，下個月紐約的氣候就要為之改變。更具有特殊意義的是，現在一般稱之為渾沌或複合理論者，它的核心主張

是，由於最早形成的一些情況都會造成敏銳的作用，最後結果會是什麼，無法預料。

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渾沌理論對科學的基礎產生了莫大挑戰，以致於現在它已經與相對論與量子物理，相提並論。有位物理學家是這麼說的：

相對論興起，牛頓式的絕對空間與時間，為之幻滅；量子理論興起，牛頓式的完全掌控測量過程，成為夢想；渾沌理論興起，拉普雷斯式的分毫不差的預測，化為幻想。（引自 Gleick, 1987: 6）^⑦

一九六一年，數學家及氣象學家勞倫茲 (Konrad Lorenz) 在設計簡單的電腦模式以便預測長程的氣候變化時，相當戲劇化地展示了最初形成的一些情況，對於日後發展所造成的敏銳作用。他從相同起點，兩度操作相同的基本氣候模式。兩次運行的唯一差別，在於其中的一次，包括了進位至小數點千分位的資料，似乎是很微不足道的差別，而他當時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差別的存在。有如一縷清風的這個細微差異，在經過短暫時間以後，卻足以讓兩個模式完全向急遽不同的方向發展。剎那之間，他明白了，如果不重新定位他的思考，他就無法瞭解為什麼長程的氣象預報會是這樣，因此也就不可能進行長程的氣象預報。若只是想透過另立次學門（如非線性分析）來瞭解其中緣

⑦ 量子理論告訴我們，海森堡 (Heisenberg) 定理的大意是說，我們無法完全預測一個系統的狀態，因為我們在檢視的過程，就已經加以改變。這其實就是透過另一種方式，說明科學是多重決定與相互建構的過程：科學建構了被檢視的客體，同時也被被檢視的客體建構。拉普雷斯 (Laplace) 是一位十八世紀的數學家，他由於受到牛頓與啟蒙時代的成就之鼓舞，認為科學終將創造整個對等公式的體系，足以包括所有的過程，因此也就開啟了貫穿時間與時間的完整知識。

由，並不足夠。數學家烏藍 (Stanislaw Ulam) 說，這個方式就像是把動物學稱爲「非象類動物的研究」(Gleick, 1987: 68)。或者，我們還可以加上我們自己的比喻，這就像是將社會學稱作是兩人關係的研究，或是把政治經濟學稱作是理性的與最佳行爲之研究，或是把傳播稱爲是訊號與噪音比例的研究。若是想要刻劃任何一個學科的系譜，並進而提示我們如何能夠重新思考及更新這個學科，那麼就必須善加考量二十世紀以來，科學思想的轉變，就此而言，我們社會科學才剛起步而已。就如同第五章將會展示的，我們對於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已經有了變化，而社會科學家亦已開始嘗試就此思考。還有，熟悉社會學及心理學的人，都曾聽聞豪松 (Hawthorne) 效應與比哥馬利恩 (Pygmalion) 效應，這兩個效應其實與海森堡定理相當，都提示我們要將研究者對於研究客體的影響，合併考察。這些嘗試，已屬不足，但更欠缺的是，很少看到有人出以實際研究，檢討渾沌理論及複合理論，是否改變了我們對於社會科學的看法。在自然科學建制界本身，長久以來都在質疑的情況下，社會科學家還在一直呼籲建立模型，以求從中找出因果的、決定性的模式，這實在還不只是很反諷而已。長期以來，許多人紛紛對決定論（全部的、局部的、最先的、最終的）展開辯論，各方都信心飽滿，自認力足以確認決定性的關係，或在此情況下，我們應該更爲準確地辯論到底全部的、局部的、最先的與最終的決定性，究竟是什麼意思^⑧；有此意圖或傾向的人，又豈只是政治經濟學家呢。

是以，本書參酌非線形科學的進展，主要是它們能夠就教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思維方式，讓我們領會後者的侷限。完成這個意圖的方式

⑧ 比如，柯列地 (Coletti, 1979) 就論稱，受到馬克思主義主義的分析，傾向於將「時間上的最先」(first in time) 或分析的歷史起點，誤認爲「分析的最先」(first in analysis) 或分析的真正基礎。

之一，就是找出哪些人已對這些傳統取向，提出了根本的、典範的問題，然後檢視其著作。確認這些侷限之外，若是我們再能另外擷取養分，參考受到非線形思維鼓舞的知識論及實質分析，必然會有裨益。非線形的知識論讓我們更為正視社會變遷的普遍存在、多重決定、相互建構及非化約論。最好的非線形的實質分析則引領我們來到一系列的門檻，我們循此可以登堂入室，思考政治經濟學；它也引領我們運用合適的概念，思考傳播現象。非線形的路徑有哪些呢？這很難明確指認，但是，與其投身線形模式，單是體認我們有必要參酌非線形模式的需要，已經是一大進步，雖然線形模式容易理解，它使得各變項的關係混淆不清的程度，經常多過於描述或解釋這些關係。因此，這可以算是一個初步的努力，它引進了一些理念，剛開始要建構一座橋，連結物理世界與社會科學⁹。馬特拉與馬特拉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論及了傳播政治經濟學從非線形視野擷取養分的必要，這是已經出版的著作中，少數就此議論的一本（雖然史麥塞 (Smythe) 在沒有出版的著作中，亦曾提及）。他們說，我們必須參酌新的典範，

我們理當呼籲截線思考 (transversality)。這些新的典範將使單一關係之說，為之頓挫，線形思考在變項間建立了簡單的因果、來源與接收者，以及中心與邊陲的關係。對於歷史與進步的特定觀點，實乃脫胎自排他的決定論，而新的典範則挑戰這種觀點。(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 91)

另外，華勒斯坦 (Wallerstein, 1991: 14) 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

⁹ 注意，我這裡是說兩個世界之間的「橋」(bridge)。我並沒有籲請不加批判地統合兩者於一爐，若是如此，那就是彼此沒有對話，對於當前物理科學的思維，未加思索。

子，我們可以透過非線形的渾沌理論，觀察世界體系的經濟：

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體系，因此也就有其歷史生命：它有一個起源；它的特色是週期循環與交替的趨勢；它的各種內部矛盾最後會導致自己的興替。這裡的論點是，中程的方案解決了短期的矛盾，但卻使之轉而成為長程的線形曲線，向漸近線逼近。在這些長程線形曲線逼近漸近線的過程，回復均衡的壓力愈變愈小，於是造成了更大的震盪以及分岔。可見，小幅波動也會導致大幅度的改變，取代了大幅而偶發的變動所造成的曲線的小幅變化。（亦見 Peters, 1991）

本書的取向亦是「臨界的」（critical）。就此而言，臨界指的是一整套的關係：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所設定的標準與其研究記錄之間的關係；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更大範圍的政治經濟學的關係；爲了重新思考與更新政治經濟學而提出的一整套標準，又與前述兩種關係，有些什麼關係——重新思考與更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旨趣，是釐清侷限所在的過程，由此而界定政治經濟學的取向可以如何做，才能得到最好的成果，而又有什麼工作，則可以委由其他取向來做，才能得到更好的成果；政治經濟學亦探討研究取向與實際作爲的關係，這個概念認爲知識上的工作是一種社會介入（也就是「實踐」）的一個形式。最後這一種關係有一個根本的觀念，亦即它所認定的專業活動，訴求對象較廣，超過一般學者所願意接受的範圍。這個觀點也就對於書寫的文本，另有額外要求：作者專業以外的人，亦要能夠自如讀懂讀通¹⁰。

¹⁰
傳播政治經濟學：
三個起點

除了這個特定的知識論定向，知喻筆者對於認知過程 (knowing)

的態度以外，本書也採取了一個「目的論的」立場，根據這個取向，筆者將社會變遷及社會過程放在最醒目的地方。筆者做此強調的用意，在於克服由來已久的一種習慣，這個習慣雖然可堪理解，但它只是描述制度、價值或人等等可供定義的屬性之特性及關係，它對社會生活的檢視，亦盡於此。根據這個傳統觀點，社會變遷的典型定義，也就只是時間系列的一連串的驚鴻一瞥，我們目不暇給，由此到彼；或者，我們也可援用古典物理學的例子，想一下我們都很熟悉的撞球，社會變遷就宛如是在單一撞球撞擊後，對整個關係所產生的變化。但本書並不如此想，筆者的分析起點是，「社會變遷無所不在」，它強調變遷過程的特性，包括在整個變遷範圍之內及跨越整個變遷範圍，不均衡發展的性質，相互建構，以及社會場域之中的行動者，相互建構。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行動者、社會關係或社會制度具有本來就是如此的性質。每一個行動者、每一種社會關係與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涉及了相互建構的多種、無所不在與多重的決定過程。我們的目標是要瞭解這些使傳播政治經濟學具體化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本身，又是進入傳播過程的一個起點，由此而有整個社會領域的完成。

本書逼近這項工作的方法，在於環繞三個特定的起點（或說過程），進行實質分析：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每個起點都接合於社會場域，提供了實質的焦點，讓我們更能思考實質的社會特徵，而不會讓人誤以為它是掌握社會場域整體性的本質屬性。這三個起點的性質，錯落在海德格 (Heidegger) 的觀點與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的觀點之間，海德格說概念就是武器，而維根斯坦則說，概念只是工

-
- ⑩ 當前批判取向的學術陣營，行文高度技術化，筆者反對這個傾向，本書贊同批評家卡新 (Alfred Kazin) (轉引自 Sutherland, 1993: 23) 的建言，他說，「批評的專業性質，不能只讓專業人士能夠讀懂批評」。或者，就如奧斯汀 (J.L. Austin) 所說 (轉引自 Phillips, 1993: vii)：「若是要讓人知道我們很聰明，我們也犯不著把所有東西攪得艱澀難懂。」

具。再者，阿馬德 (Ahmad, 1992: 122) 的用語，亦可借用，他說有一種情況是「最後決定性的問題意識」，另有一種情況則是「完全取決於歷史的多重的、相互滲透的決定性」，而本書取向較特別的是，它所要論稱的是，知識的相互建構起自這兩者的關係。筆者認為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辯證觀點，具有兩個面向，筆者所要論稱者，在於我們應該從兩者創造性的緊張關係，找到出路，面向之一認定物質勞動決定了理念、觀念上的內涵，面向之二則強調歷史的發展取決於特定時間與空間力量及行動者的多重性。

筆者決定以這些實質概念進入，並據以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關於什麼應該強調的選擇。然而，這也只是說，如果我們從一個開放的、兼容並蓄的及非化約的知識論來看，這樣的選擇只是反映了這些起點，是相當能夠幫助我們瞭解社會的策略，但並不是說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均可化約成為這些屬性。它們三者構成了檢視全球政治經濟脈絡的理論架構，這個架構則又知道三者所採取的特定形式，取決於特定的時間—空間或歷史／地理位置等因素，而這些因素都在具體的社會形構當中運作。政治經濟學是瞭解傳播的一個起點，與此相同，商品化也是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起點。還有，這些用語指涉者都是過程，不是存在狀態的定著，它們向我們展示，若是思考一個社會抗爭的過程，可能可以如何思考。最後，這三個用語都是多重決定的，也就是說，它們的屬性均由彼此建構，並由在社會運作的其他過程所建構。

這本書同時也與兩個鄰近取向或學科展開對話：「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文化研究從許多學科汲取養料，尤其是文學批評、詮釋學的社會科學，以及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當中的不同流派，這些學科提供了另一些研究方式，而集中於文本 (textual) 及論述 (discourse) 的分析。對於傳統科學及它賴以存在的知識論、語言與社會學基礎，文化研究長期以來均大加批判。反之，文化研究也常被批評，被指責是採取了相對主義、觀念論與反啓蒙的立場。政策研究則

植根於政治學、經濟學與制度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它的目標是評估傳播之不同行動路線，尤其是政府或政府採取的行動，雖然並不以此為限。政策研究取向當中的一個主導派別是公共選擇理論，它明顯是企圖要套用新古典的經濟模式於政治學，目標則是建立政策學。完全與文化研究相對立，公共選擇理論非常倚重理性行動模式來建構它的理論。這個取向對傳播研究的影響，主要是一種想像出來的、一種精神聯盟的（保守關係），若用較不嚴謹的標準來看，它對傳播研究倒是另有影響。傳播政治經濟與這兩個學科的對話，貫穿本書（比如有關認識論與實踐的問題），但將在最後章節特別討論之，特別集中於討論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所提出的挑戰，以及更新的傳播政治經濟，將如何應對。

變化中的全球政治經濟情勢

寫作這本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書，固然自有知識上的與學術上的動機，除此之外，過去幾年來，極具意義的變化已動搖了全球政治經濟情勢，這個發展也使寫作本書益發必要。這些變化包括了共產主義的潰敗、資本主義的經濟停滯與轉型、以前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分化更顯尖銳，以及社會運動崛起，貫穿了傳統階級的界線。

政治經濟學起源於十八世紀，部分原因就是解釋資本主義的加速進展，並主張這是合理的進展而後支持之。當時，它認為重商主義者的政策是在國家強力支持下推動的，因此註定沒有效率而且也不能產生好的結果。對這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自許多運動（比如，歐文式的烏托邦社群）及知識上的潮流，主要以馬克思的著作作為根基，但也包括範圍極為廣泛的民主的、社群的與社會主義的思想。

12

二十世紀的媒體工業崛起，各方商業集團莫不對傳播的經濟情勢，賦以密切注意。於是，各色各樣的研究應運而生，舉凡生產及行銷收音機與電視接收器，一直到其他產品與閱聽受眾的販賣技術，通

通在其研究之列。批判的傳播政治學的成長，部分因素就是要以批判的視野，瞭解這個過程；換句話說，將大量行銷的產生，連結在更大的經濟與社會過程中觀察，然後採取一系列相關的人文價值，批判這些過程。這個層次的許多研究成果，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架構的引領，而大多數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者，也都從它擷取知識上的泉源。除了少數國家以外，這些運動如今已經覆亡，如前蘇聯與東歐的情況。那些還在運行的少數國家，有些陷入嚴重的困境，如古巴。另有些則不脫極權手段，並且也採取了市場原則（某種「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型），如中國。另有些則在不很情願情況下，自我調整而進入了主流的政治結構，如許多西歐社會的民主政黨。葛蘭西、盧卡其、布萊希特、巴藍與史威濟，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確實都能顯示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治經濟學，擁有冷靜沈著的能力，足以自我反省與更新。然而，許多實存社會主義政權的覆亡，對於這個理論架構，仍然構成了空前的挑戰。

這個情況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來說，也並不稍減其真實，因為它也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吸取經驗、啓發，以及有別於市場模式的傳播體系。這些包括了前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她的藝術與文化運動，如一九二〇年代蘇俄的前衛藝術，不但帶給人們政治革命，而且代表了文化上的革命(Lunn, 1982)。稍後，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也從蘇俄與東歐異議分子及地下(samizdat)媒體的經驗，提煉論點(Downing, 1984)。文化革命時期由毛澤東主導的中國，亦曾是重要的鼓舞力量(Smythe, 1981)。但振奮這類研究的最主要來源，實乃後殖民的未開發國家所可能帶來的民主社會主義之前景，如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等地的進展(Mattelart and Siegelau, 1983; Schiller, 1976)。深沈的執著與精力，盡數投入創建「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引領在前的是低度開發世界的啓蒙開發、民主、平等與使用媒體與資訊體系(Preston et al., 1989; UNESCO, 1979)。到如今，這個希望幾乎已經完全幻滅無蹤。

共產主義傾覆以後，已經有許多人從社會層面及知識層面，檢視它的後果；雖然如此，已有長足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自己也沒有什麼好慶賀的，因為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地方，長期以來也陷入了經濟停滯與轉型。打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以來，這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持續遭遇了經濟危機，沿襲已久的一些解釋與拯救方案，如今不再奏效，經濟學家與政策制定者兩相束手。生產力與經濟成長率下降不已、實質薪資停滯不前、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愈來愈大，這些都使政策分析家迷惘不已，側身最高決策階層的人，同樣愁眉不展 (Bartlett and Steele, 1992; Bowles et al., 1990; Harvey, 1989) ⑩。美國、加拿大與西歐國家，再也無法滿足一九六〇年代的經濟表現（日本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始也掉進了戰後最嚴重的衰退期），這些情勢使得許多分析家倍感困惑，於是一系列具有批判意識的經濟評估展開了，下一章將再檢討其中的一部分 (Block, 1990; Bowles et al., 1990; Lane, 1991)。

結構層面與空間層面的轉換，同樣深遠，尤其是工商企業界與政府。本國或本地擁有的公司成為跨國企業的過程，雖然一直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力量，但這些企業通常都還保有實質的本國基礎。如今這個基礎的重要性減低了。「時代·華納」(Time Warner)、「三菱」(Matsushita)、「新聞集團」(News Corp.)、「新力」(Sony)、

⑩如今，再要聽到美國政府金融體系及美國貨幣政策的建構者（美國聯邦準備局的首腦）公開說，標準的經濟分析與貨幣工具，似乎再也不管用了，已經不再讓人吃驚（最近一次這麼說的時候，是在一九九二年他與日本高層經濟官員於東京會晤）。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說，「我們刻正體驗的類型，沒有任何模式能夠解釋」（轉引自 Stern-gold, 1992）。與葛林斯潘呼應，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金 (Lawrence King) 在回答生產力為何以遲滯不進，而平均小時工資在過去二十五年來維持不變的問題時，他說：「到底要怎麼做呢？我們實在沒有什麼主意。」（轉引自 Passell, 1992）。

「哈謝特」(Hachette)、「芬寧維斯」(Fininvest)與「貝鐵曼」(Bertelsmann)等媒體鉅子，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據點。還有，整體經濟的重新結構，也使傳統的工業分工界線為之模糊，媒體產業自不例外。出版、廣電、電信與資訊勞務，愈來愈難區分。「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AT&T)等等集團，在政府規範愈來愈少的空檔下，趁虛而入，利用各種媒體能夠通用的數位電碼愈來愈普及的優勢，幾乎在傳統各媒體產業都已涉足。傳統上與媒體無關的行業，如金融銀行、保險與零售業，也都進軍傳播與資訊行業；在這些情況下，以前用來分辨不同媒體的界線，益發不足了。再者，各種工商行業的營運範圍都已明顯增加，部分原因又是拜賜傳播與資訊科技的長足發展。

以上提及的發展，其意義為何？歷來都有重大的辯論。這麼樣的一個新組織形式，哈維(Harvey, 1989: 147)稱之為「取決於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消費產品與類型的彈性」，它導致了「整個嶄新的生產部門、嶄新的金融服務方式、新市場，以及更重要地，更為密集的商業、科技與組織的創新速率」。但這個新組織形式究竟如何理解，歷來又有相當不同的看法。這個分析線索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許多極具挑戰意義的意義。「時間—空間的壓縮」(哈維的用語)或「時間—空間的模糊」(季定思的用語 Giddens, 1990: 10-21)，這些類似的概念都是要捕捉決策時間已在縮小的特徵，表示人們在決策時，由於能夠利用運輸與傳播成本的下降，因此可以將此過程散播至更大更廣的空間；但這些具有轉變意涵的概念，重要性又是什麼呢？有人論稱，這反映了一個根本的轉變，是資本主義的疆域重新劃分，是因為勞動力與資本等資源在空間上流通的根本移轉所造成的(Castells, 1989)？或者，這其實只是早就在運行的商業資本主義，最為晚近的一些類型？

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停滯與轉型，另一方面，我們每天又目睹著許多的動盪場面，這些動盪來自在相對承平時期的世界，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地方(即便當年的這個稱呼，已有不足)。當年只能說可能是如

此，但現在當然已經確定的是，第三世界已經分裂為好幾個世界。其中的一個部分所取得的整體成長率，頗為可觀，超過了西方與日本。許多亞洲南部的國家已經在她們自己與其他未開發世界之間，闖出了相當明顯的經濟距離，她們結合了最新的科技與老舊的威權控制手段。世界其他國家都以這些「新興工業國」作為發展楷模。然而，這類光鮮言論避而不談的是，南韓、新加坡、臺灣、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印尼等國家，都從她們的勞動者身上，大肆壓榨。英國文人布雷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 筆下的「黑暗的惡魔磨坊」(dark Satanic mills) 的當代版本，以及更糟的一些境遇，孵化了這些發展成功的故事，我們有太多的證據，顯示這些國家之成功，莫不支付如此代價。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強權的支持與武器販售下，印尼對近鄰東帝文 (East Timor) 的溫和民族起義，大肆鎮壓，其情況的淒慘，許多觀察家的結論是，若不稱之為種族屠殺，又如何能夠正確描述。還有，生產成本的上升（包括了勞工起而要求薪資的增加），已然使得某些經濟成功的光環，因而失色 (Bello and Rosenfeld, 1992)。論者已經慢慢承認這些新興工業國家的情況，與西方工業化過程自有相近之處，是有成功，但恐怖之事如影隨形；雖說如此，但我們的認知，仍得將她們的總體經濟表現與許多未開發世界的經濟表現，放在不同的類別，這點認知是很重要的。

在另一個極端，許多未開發國家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全球政治經濟圖譜之外。我們稱之為依附發展的學派，以前很能合理地論稱，西方強權國家設定了條件，使得世界上較貧窮的一些國家，處於依附的狀態而沒有足夠的發展。現在則如同依附學派主要論將之一所說，這個取向必須修正，不能適用於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Cardoso, 1993)。理由是這些最貧窮的國家，對於全球政治經濟的進展來說，毫不相關，因此也就不能說她們依附於已開發國家。由於她們已經不相干，稱之為被排除的國家，更為妥當，除了微量的財貨、勞務與人們在全球流動以外，她們與世界已經一刀兩切，互無瓜葛。新興工業國家與

被排除的國家，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仍在擴大。比如，南韓與索馬利亞 (Somalia) 之間的經濟裂隙，如此巨大，再要將她們放入相同位階而都稱為第三世界¹⁰，意義減淡了。這些動盪造成共產主義覆亡、資本主義的停滯與轉型，以及世界上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之間的明顯分裂，至此，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就受到了挑戰，而也就更加迫切了。更切題的是，既然在這些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動盪中，傳播扮演了一個核心角色，我們也就有必要將此分析，持續而有系統地應用在傳播政治經濟學身上。

牽涉層面廣泛的社會變遷也催生了全球的社會運動，同時也因社會運動而加速。婦女運動對於全球政治經濟的衝擊，非常之大，我們再怎麼說，也沒有高估的可能，因為在我們所身處的歷史格局，應可論稱它對於全世界性的父權層級，提出了最具有意義的挑戰。幾百年來，由男性支配所發展出來的所有社會禮儀、習慣與信仰，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如今全已動搖。政治經濟學既然是其社會環境的有機構成，與其他成分相互建構，自然也就領受了女性主義的衝擊。古典政治經濟學崛起，核心理念是將牛頓式的物理模式，應用在經濟生產、分配與交換等問題上，以此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加。如同羅賓森所說 (Joan Robinson, 1962)，雖然經濟學聲稱是具有一般效力的科學，但它實際上與民族國家 (the nation state) 更有關係。批判的政治經

¹⁰ 蘇聯崩潰以後，似乎支持了世界體系取向的論點，它向來都主張，共產世界對這個世界所包含的唯一經濟體系，也就是資本主義那種組織方式所帶動的單一分工關係，很少提出挑戰 (Wallerstein, 1991)。不過，卡多索所說的是，被排除在外的國家愈來愈多，我們很難說它們參加了這個單一的經濟體系。對於卡多索而言，問題不只是全球的不平等關係，透過不平等交換與依附而維持。反之，這些被排除在外的國家已經被這個體系排擠出去，體系不再需要這些國家，即便它們要依附，這個體系也不再需要它們。

濟學對此聲稱自有反應，無論是脫胎於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或是受到烏托邦社會主義影響的，都致力於揭穿古典經濟學分析的階級屬性，並揭穿它其實是在為絕對不平等的狀態，披上合理化的外裝。批判的分析對父權的存在並非沒有述及，但卻少有持久而連貫的分析。當代的女性主義挖掘了這個分析盲點、裂隙，它並已經透過女性主義經濟分析的建構，彌補這個缺陷，套用華羚 (Waring, 1988) 的話，這個分析對世界的思考，正是「要把女人算進去的」。這個取向面對巨大挑戰，畢竟，儘管當前有如此多的動盪，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還是「國家把男人武裝了起來，卻解除了女人的武裝」(Connell, 1987)。更新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認定，瞭解並克服社會階級分裂，是其職責，但應更上層樓，迎接挑戰，正視這個現實。

16

以全世界為範圍的社會運動，對於環境保育及生態和平也有深刻的領悟，它們已經愈來愈體認到全球的政治經濟發展，正在摧毀地球的生命。這些與其他社會運動都有共通的地方，它們的做法與信仰，包容萬象，從接受到完全拒斥資本主義，通通都有。這些政治運作是相當複雜的，其結果將會如何，亦無法確認。但不容否認的是，這些運動挑戰了政治經濟學家，讓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習以為常的觀點，他們總認為土地的性質，首先也是最重要地，是一種生產要素，也總認為武器這種產品就像硬紙板，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其邊際生產力。這些運動對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同樣也構成挑戰，他們雖然瞭解階級剝削的存在，但卻傾向認定對物質資源的剝削，是克服階級剝削的主要手段。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挑戰，來自於回應這些議題，但卻不致掉入新馬爾薩斯論的陷阱，不致於使用環境保育的主張來作為防護優勢權利的藉口。第二章開始回應這些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造成廣泛效應的議題，我們首先就回答一個根本的問題：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第一部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圖譜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要提供導引，介紹傳播研究引用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方式，並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與鄰近社會科學與文化研究的關係。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就開始進入政治經濟學這個領域的豐富文獻，內含繁複不一的取向。筆者先行評估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對立定義，有些提供了具體的問題，關注的是資源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另有些則提出了比較一般性的問題，關注的是社會生活之中，控制與存活的過程。我們從這麼多界定這個領域的不等方式，就可知道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性質之辯論，實在頗大。我們是否應該選擇一個狹窄的定義，因此它的一些根本屬性的概念，相對來說，也就比較能夠付諸經驗研究之用？或者，政治經濟學應該提供一個基礎的學科，作為所有其他研究社會生活的知識之出發點？後面這個選擇較為可取，因為，雖然它或許不能讓我們研究全部的有機活動，它至少讓我們能夠以最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研究人類活動的基本過程。

在討論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界定問題以後，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討論十八世紀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道德哲學家之著作，他們的著作是當代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我們關注的是，他們最為熱衷的主要議題是哪些。打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的著作，我們都能察覺到其間蘊藏著對於歷史分析的信守，蘊藏著對於道德哲學、對於社會價值、對於好的社會秩序之分析，以及，終極來說，對於社會介入或實踐的分析，均甚信守。以上四個特徵拓展了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它們並可作為交流地帶，讓我們與其他的社會與文化分析，短兵交接。

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另一個特徵，在於它內含許多思想流派，這就確保了這個取向蘊藏著重要的多樣觀點，並有活潑嚴格的內部辯論。我們大可論稱，最重要的分際，出自對於斯密及其追隨者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回應。回應的一個類型擷取了古典學派的一部分，卻將另一部分忽略了。古典學派強調個人是主要的分析單位、強調市場機能

(market) 是主要的結構，個人與市場機能則相遇於市場 (marketplace) 這個核心過程，個人在市場表達了他的欲求或需求。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這類型的回應卻把古典學派對於歷史、社會整體、道德哲學與實踐等關懷，拋諸腦後，它現在只是汲汲忙忙將政治經濟學轉型為經濟科學，一切以市場行為的經驗調查為準則，並且以數學語言加以表達、概念化。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取向泛稱為新古典經濟學；或者，既然我們知道它已經取得了正統的霸權地位，我們也可以直接稱之為經濟學，它將人類的勞動化減為許多生產要素的一個，勞動與土地及資本，人的勞動若有價值可言，則必須以生產力作為衡量，也就是它必須能夠增加終端產品的市場價值。

第二個回應類型對前者大表反對，它留存了古典學派對於歷史、社會整體、道德哲學與實踐的關懷，即便這個關懷意味著創造實證科學的意圖，必須放棄。這類回應就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的多樣取向。在這類回應之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保守派，他們以集體的傳統威權，取代了市場個人主義，然後我們也看到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他們接受古典學派所主張的社會介入，但呼籲時人應該將社群放在市場機能之前，我們接著再看到了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思潮，它將勞動放回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根據後者，人類這個製造器物者，界定了我們的物種屬性，尤其是他具有獨特的整合概念與執行之能力，若是使用馬克思的例子，則我們可以說這個特點使得人這個會思考的建築師，與只憑直覺行事的蜜蜂，有了區別。

其後，對於古典學派的各種回應，大抵就是脫胎於保守派、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潮，我們於是看到了當代的不等學派，範圍頗廣。放在知識光譜來看，正統經濟學占據了中間及中間偏右的位置；想要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與類目，分析所有社會行為，企圖以此擴大個人自由的陣營中，保守派的政治經濟學享有重要地位。制度學派政治經濟學則約略是中間偏左的觀點，比如，它論稱制度上的及科技上的侷限，使得市場機能的塑造，有利於企業財團與政府，因

爲它們才有權力控制這些制度與科技。新馬克思主義的取向包括了法國的「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世界體系理論，以及其他加入關於福特主義辯論的人，這個取向堅持將勞動放在分析的核心，當今關於壟斷資本主義、技術的剝離(deskilling)，以及新國際分工關係的擴張等等辯論，主要是因爲他們的論述而受到注意。最後則是不同的社會運動也孕育了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派，其中主要有二者，一個是女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它針對父權制的持續不變及家庭勞動的乏人研究，發爲議論；另一個是環境生態政治經濟學，它針對社會行爲與更大的有機環境之關係，發爲議論。

19

在嘗試回答「什麼是政治經濟學」以後，本書進而檢視不同的傳播研究如何取用流派有別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就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現階段的發展來說，我們選取地域作爲強調的基礎，以此劃定其圖譜，應有助益。雖然它們彼此有些共通的地方，北美、歐洲與第三世界的取向，是各有足夠的特色，我們因此可以分開處理。再者，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畢竟還沒有長足的理論發展，我們還不適合以單一圖譜來加以分析。

以北美洲的研究來說，史麥塞(Dallas Smythe)與許樂(Herbert Schiller)是兩位奠基者，他們的論述對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廣泛深遠。史麥塞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時，開授了第一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這個研究傳承至今已有了四個世代，他是第一人。許樂與史麥塞在伊利諾共事了一些時候，同樣也對日後幾個世代的政治經濟學者，產生了類似的影響。他們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從制度的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汲取養分。不過，他們又與(比如說，)歐洲學者不同，他們沒有那麼想要爲傳播領域提供理論上的視野。反之，他們的著作，以及受其影響而創作的衆多北美的研究，其動力明顯來自一股義憤之情，他們眼見傳播產業已經成爲財團統合秩序的一部分，既有剝削性質又不民主，於是義憤而作。雖然史麥塞與許樂各自關注這種情勢對其國家(譯按：加拿大與美國)的衝擊，他們倒也

同時引領了一個研究典範，針對跨國媒體公司在全世界的成長及影響，賦予密切注意。部分原因是受到他們的影響，北美的研究成果包括了許多以特定媒體產業為對象，或是以階級議題為對象，曝露了跨國財團與國家機器的權力之著作，它們的特色是研究者對持續不已的抗爭（包括了勞資對抗的問題），保持關注，因此，北美的研究不乏指向如何改變強權媒體的訊息，它們也很注重如何創造另一些可能性。這類研究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向政府的規範與政策制定機關，提出公共利益的題旨。這個目標包括了支持積極運動者，使其在參與國際論壇（如聯合國）時，能夠大力支持新的國際經濟、資訊與傳播秩序。

歐洲的研究則沒有那麼清楚的特定奠基者，雖然它也與特定的社會運動有所關聯，尤其是與為了捍衛公共服務的媒體系統有關，但這個地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說更注意將自己的傳播研究，整合於各種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承。歐洲兩個主要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取向之一，最著名的代表是崗恩 (Nicholas Garnham) 的著作及高丁與梅鐸的著作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他們強調的是「階級強權」(class power)。這個取向承繼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承，以及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mas) 的著作，它闡述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如何整編（主要是商業與國家政策威權之產物的）傳播體系，它也闡述了次級階級與運動的抵抗，也就是對新保守政權所推動的傳播產業自由化、商業化與私有化的反抗。另一股歐洲傳播政治經濟學則突出了「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 的過程，最著名的代表當屬馬特拉的著作 (Armand Mattelart)，他所擷取的理論傳承範圍極廣，包括了依附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民族解放運動所彰顯的世界性經驗，他將傳播領域視為許多抵抗強權的主要來源之一。

第三世界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涵蓋了廣泛的旨趣，其中一個主要指向則是針對西方，尤其是針對美國的現代化或唯發展取向的典範而來，因為這個典範企圖整編傳播研究，使其與其主流知識與政治利

益，能夠意氣相投。根據這個典範，媒體與都市化、教育與其他社會力量，都是刺激進步的資源，使得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得以發動。因此，媒體的成長可以視為是發展的指標。第三世界政治經濟學家的視野，來自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及種種國際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他們對現代化理論提出了根本的挑戰，他們尤其質疑它的科技決定論，並指出它避開了特定利益關係而不談，他們認為，正是這些強權關係所代表的利益，塑造了第一與第三世界，根據哪些條件從事經濟及社會交換，正也是這些利益塑造了第一與第三世界本身之內及二者之間的多重階級關係。

但是，雖然媒體的投資被整編作為其中的一部分，這些發展模式並沒有帶來它們所允諾的果實，於是，主張現代化理論的人開始修正他們的模式，結果是把電信與新電腦科技放到他們所說的媒體之列。對於這個修正模式，政治經濟學家的主要反應是指出這些新科技的能量，其實是用在整合全球的分工。這些反應的第一波研究大抵從地理空間的分工來檢視全球分工：非技術勞動力集中在最貧窮的國家、半技術勞動力與較複雜的裝配勞動力集中在半邊陲社會，研究、發展與策略計畫則專屬於第一世界，這裡也是企業財團總部的所在與大量利潤的最後歸屬所。更為晚近的研究則體認階級的分立，不分國界，它也體認目前仍在演化的國際分工，有賴企業財團能夠控制傳播與資訊科技，依此這些公司才能克服由來已久的時間與空間限制，彈性操作。

本書第一部分在刻劃這個實質圖譜的同時，也將展示傳播政治經濟學所涵蓋的廣泛知識觸角，筆者將展示它包括了多樣的立場、強調重點與研究旨趣，歷來不乏有人指控政治經濟學，其中最極端者甚至指控它是經濟化約論，顯然是誤解了。國際上有許多學者聚合於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其說他們有了單一的理論視野，或說他們有了一種學術社群的意念，不如說這個取向對於知識活動的認識性質，有些想法能夠彼此分享：

21 他們對學術想像、論述與社會介入、干預的關係，有些共通的想法。再者，本書將提示，由於全球社會與文化轉型，又由於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近鄰（尤其是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的進展，政治經濟學其實面對了很多挑戰。認定了這些挑戰的存在，本書第二部分將重新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念，以此更新這個學科，目標則是強化它的知識定向，並強化它對學術想像、論述與社會干預、介入的信守。

2

政治經濟學是什麼？

若是要瞭解我們的文化，瞭解我們文化的生產、消費與再生產，以及大眾媒體在這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必須在更為一般性的層次，理解政治經濟學的若干核心問題。（Garnham, 1979: 129）

本章將鳥瞰政治經濟學的若干核心問題。我們將先檢視在不同定義之下，這個領域的疆界範圍。筆者知道政治經濟學史的建構，歷來有不同觀點，因此本章就簡短地回顧這個學科的發展及其主要取向，由此我們將釐清有哪些定義的存在。本章先介紹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 (David Ricardo) 及其他人，然後進入保守分子及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到了十九世紀晚期，許多知識分子紛紛想要模仿物理學及生物學的模式來創造社會的科學，受到這些驅力的影響，傑凡斯 (William Jevons) 與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 等人也就締造了新古典的典範，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主流經濟學的模式。他們的選擇是，集中在描寫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與資本）的不同組合所導致的各種結果，他們偏好使用一整個系統的微分方程式來作為討論的工具，這個學派將大多數的政治因素排除在政治經濟的分析之外^❶。

到了二十世紀，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可以說取得了孔恩 (Kuhn, 1970) 稱之為「規範科學」的地位，它欽定了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內涵。新古典取向於是成為經濟學的代名詞，這與牛頓式的機械論成為物理學的代名詞，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新古典學派躍居經濟學規

❶ 這並不是說這個新的經濟科學欠缺政治理論。刻意選擇將「政治」(political) 排除在外，本身已經反映了很重要的權力觀與政府觀，在新古典經濟學家之內，以及在維護與批判這個典範之間，都引發了不絕的辯論。

範的過程，持續充滿了知識上的與政治上的爭論，這本身就值得另立專書，就經濟學的政治經濟論，大書特書（比如，Slaughter, 1984）。新古典學派當中，所謂奧地利與劍橋兩個流派則就市場的核心地位及國家的角色，大動干戈。在新古典之外，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統合論者等取向則就更為根本的一些問題，大加鞭撻，他們對新古典典範的前提假設、概念、結論與它對政治與生活的態度，均有質疑。

23 新古典經濟學這個規範地位所引發的爭論，持續至今。一方面看來，新古典經濟學在學院中及在政治生活中，似乎意氣風發，已經得勝。各大經濟期刊的論文，大致都是處理新古典典範之內，尚待解決的各種難題，或是將各種關係演化成爲數學典碼。政府的文官部門或智囊，還有企業財團的政策分析家與政策制定者，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新古典經濟學那些聰明出眾、機靈敏捷的人，出沒其間。另一方面，對於這種經濟學的侷限，也大有人就其根本提出批判。這個學門出身的人認爲，即使將問題縮小到有限的領域，只就經濟學的正統範圍何以見得一定如此，它是否有能力解釋，都有疑問 (McCloskey, 1985)。負責制定決策的人都在抱怨，他們嘮叨這些傳統藥方治不了病，或者，更糟糕的是，藥到病更重 (Reich, 1991)。哪些方案能夠用來取代新古典的正統呢？很多，就政治光譜來看，或是就實質議題來看，足以提出與新古典藥方不同的來源，實在太多了。以言前者，我們可以從柏克 (Edmund Burke) 保守傳統的繼承人，如歐卡雪特 (Michael Oakeshott)，一路數到制度學派與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健將；以言後者，我們可以舉出的例子，至少就有女性主義、生態、道德經濟學，以及家庭與性慾等「實證」政治經濟學。總之，有意取而代之的角逐者，並不缺乏。這些想要取而代之的各路人馬，似乎都認定將這個相因承襲的經濟學，舉凡概念、方法論或處理的實質議題，均失之於狹隘，應予擴充。若是要將當代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大小小辯論，適如其分地還原，那可必須使用遠超出這區區一章的篇幅，方始稱得上恰當。因此，本章僅能設定在爲此領土劃定圖譜，並

針對主流經濟學及多種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差異，提出分析。

或許有人會問，這麼一本以傳播為討論焦點的書，擲出一章從一般層次來討論政治經濟，是否恰當。筆者如此做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我們概括瞭解了政治經濟學以後，可望以此作為基礎，思考傳播政治經濟的強調重點可以是些什麼，也幫助我們察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不足之處。然而，心中懷有疑問的人，可能還是會覺得，若要達成這個目標，那麼在傳播政治經濟這個專章裡，簡短討論一下政治經濟學，不也就可以了嘛。但本章的用意，還並不只是設定基礎以便我們能夠評估傳播政治經濟學，筆者還在本章放進了傳播學者對政治經濟學這個領域的思考所得。這樣一來，我們就知道，對此曾有思索的傳播學者，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介入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而論稱他們合當有份。最後，若是要重新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反省這個更廣之學科的根本假設，而若是要呼應前面這個呼籲，則我們勢必要評估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領域的紛爭，具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雷蒙·威廉士認為，我們在思考定義問題時，應該從基本的社會實際表現入手，而不是完全投入概念的營造。他呼籲我們的語源學，應該同時以社會史及知識史為基礎 (Williams, 1977: 11)：

剎那間，我們察覺大多數的基本概念……並不是概念，而是問題，並且不只是分析上的問題，而是迄今還沒有解決的歷史動態起伏，那麼，我們又何必理會這些概念的堂皇召喚，我們又何須搭理它們的叮嚀作響。若是做得到，我們只需復原這些概念形式的實質內涵²⁴。

24

《新佩格瑞》(The New Palgrave) (譯按：這套經濟學大辭

書)告訴我們說,「政治經濟學是財富的科學」,它「所處理的面向,是人們(原文有誤照引)爲了供應欲求(want)與滿足慾望(desire)所作的努力」(Eatwell et al., 1987: 907)。但是,如果我們取用威廉士的社會語源學的說法,我們也就察知,在政治經濟學成爲一個科學以前,在它成爲一種知識上的稱呼,用以描寫整個系統的生產、分配與交換之前,它所指涉的是社會風俗習慣、實際行爲與知識,首先是有關家戶(household)的操持,然後是有關整個社區的營生。更具有特殊意義的是,「經濟學」的語源是古希臘文的 oikos,意思是「房舍」,以及 nomos,意思是「法律」,因此,經濟學起初所指涉的是家政的操持管理,這個觀點一直持續到締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人身上,如蘇格蘭的啓蒙人物哈其森(Francis Hutcheson),以及更重要的斯密^①。「政治」則起源於希臘文 polis,意思是城邦國家(city-state),古典時代政治組織的基本單位。因此,政治經濟學的起源是家務的操持與政治的經營。在斯密的《國富論》出版前十

②還有,威廉士在另一本書中,提醒我們。既然我們不再認爲意義是自然而然形成,那麼,我們也就不會認爲正宗性(authenticity)的營造,是單純的中性工作。畢竟:這裡並不是在中性地評估意義的問題。

這裡所探討的是很重要的社會與文化議題,我們從特定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中,承繼了這些議題,讓這些議題得以存活、積極發酵的是這些百千萬的人群,若是要讓這些人群積極看待這些議題,那麼,我們總必須意識到這些議題承襲自特定時空條件,然後以批判的態度探討之——這些議題可能會改變,也可能持續不已。
(Williams, 1976: 21-22)

③走筆至此,不禁讓人駐足評論。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的演化已經有兩千年,它當初正是環繞家政操持與管理的問題而生,但如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猶然必須大聲疾呼,呼籲將家戶勞動的價值,算入經濟產值(Waring, 1988)。

五年，史都華 (Steuart, 1967，原出版於 1761: 1:2) 就將二者做了連結，他說，「經濟屬於家庭，政治經濟屬於國家」。

同時，我們應該知道，從最初開始，政治經濟學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也就是它結合了實然面的描述與應然面的規範。這就是傳播學者史麥塞所說，驅動政治經濟學的力量，或說是「後設 (meta) 政治經濟學」，它是「整體的理論與實務，它在多個時刻與多種地方，向複雜程度不等的社會組織之領導階層，提出提案與建議」 (Smythe 寫給作者的信，1991 年 12 月 4 日)。這個說法與《經濟術語辭典》的定義吻合，這本辭書說政治經濟最初的用意是要作為「治世經國之術」，但現在則只被「當成是一種研究，它對特定一些議題有些道德上的判斷」 (Gilpin, 1977)。

其他的定義集中在闡述經濟學由最初的寬闊領域，終至窄化的發展過程。早在一九一三年，當最早的《佩格瑞》辭書出版時，它就已經這麼說，「儘管政治經濟這個名稱仍然留存，但依據現行的瞭解，這個科學並不限定在『政治』：換句話說，它並不是侷限在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關係，反之，它處理的主要是個人的營生、工業活動」 (Palgrave, 1913: 741)。與此相似，一九四八年的《現代經濟學辭典》對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經濟事務的理論與實務」，它又如此寫著：

原初的時候，這個術語指涉的是實際成本、剩餘與分配等範圍廣大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是社會事務，也是個人所關心的事務……到了十九世紀晚期，在效用 (utility) 概念引進以後，整個重點移向了強調市場價值，與強調個別公司的均衡問題。這些問題也就不再需要範圍較為寬闊的社會架構，也就不再需要強調政治。(Horton, 1948: 110)

這個過程本身，並非沒有緊張，也並不是沒有激起外界的反彈。同樣是這本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辭典也說，從更為寬闊的視野來界定政

治經濟學的作法，已再度引發了興趣。它察覺到「強調的重點再度回到了政治經濟學」，因為「國家對公共福祉的關切，最近崛起了」。《新珮格瑞》(Eatwell et al., 1987: 906) 也承認是有此一傾向。根據這本辭書的考察，「從來未曾放棄政治經濟學這個舊有術語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一九六〇年代那些主張徹底放任自由的芝加哥學派，再加上維基尼亞技藝學院的公共選擇研究中心」，都讓這股老舊的學科，有了新的生命。

以上的說明展示了我們看待政治經濟學的多重角度，下一節的討論，將集中於討論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產生影響的定義及特徵。我們因此可以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視為「各種社會關係，特別是權力關係，如何相互構成，以致影響了資源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從這個觀點來看，傳播產品，如報紙、書籍、錄影帶、電影與閱聽人是主要的資源。對於研習傳播的人來說，這個觀察現象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啓發價值，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注意到了市場運作的根本力量與過程。它所強調的是傳播產品的制度性循環，比如，這個循環就使得主要生產者、大型分銷業者、零售業者與消費者產生了關聯，而消費者的購買、租賃與使用，就回饋到生產而形成新的過程。這個定義提示了一整套的基本類目，讓我們區辨了不同的功能，比如，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 是一家主要的電影製片公司，奧迪益多廳院(Cineplex-Odeon) 是一家重要的發行片商，在它們之外，消費者與消費類型又有各種不同的形態，如到電影院看電影及在家收看電視。更需注意的是，政治經濟學更主張集中力量去分析特別的一些社會關係，亦即使得某些人有了權力或能力控制其他人、過程及資源的關係，即便受制者會有反抗，這樣的關係仍然存在。有此認識以後，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就密切注意控制形式，如何沿著生產、分配與消費循環圈而轉換與移動。比如，馬特拉(Mattelat, 1991) 提供了良多資料，論證跨國行銷公司透過成為消費者資訊的主要製造者，透過生產這些極具價值的資訊而強化了他們在媒體行業中

的權力。

這個定義有個主要盲點，也就是它假設我們能夠以相對輕易的方式，區辨生產者、發行者與消費者。但這個假設並不一定能夠成立，尤其是某些更值得注意的例子，格外難以成立。比如，就電影產業來說，若是將電影生產者（也就是將創造到完成一部影片的所有步驟，組織起來並執行的單位）以及發行片商（也就是找出市場映演場所的單位）分開，是有意義。這些發行片商對於製片商來說，通常相當緊要，因為他們能夠確保製片所需要的財務及行銷支援。以這種實務運作來看，電影的發行片商可以說就是製片商或製片—發行商嗎？與此類同，雖然將閱聽人當成媒體產品的消費者，不無啓發作用，但在某個意義上，他們也是生產者。我們或許也能論稱，而事實上馬克思在《大綱》裡是這麼說的，他說消費者在消費過程裡，製造了他們自己。換個方式，我們也可以說，消費者在消費媒體產品（或說文本）的時候，他們生產了形象價值（或說意義）。我們還可以一路繼續下去，就說生產者在生產過程消費了資源。若是聲名卓越，生產者也可能因此而具有發行功能。從以上反省，我們當可知道，雖然稍前所說的定義可以是相當有用的起點，但我們若是太過僵化或機械式地加以運用，不免會有侷限，我們不免會有所失。

更為具有概括性質，同時企圖心也更大的定義是，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活的控制與存活」。控制特別指涉了個別及團體成員的內部組織，而存活則指涉這些成員運用手段來生產他們再生產自己所需的東西。大大小小的控制過程大致是政治屬性的，因為它們涉及了一個社群之內，各種關係的社會組織。大大小小的存活過程則根本上是經濟屬性的，因為它們涉及了生產與再生產。這個定義的長處是，它讓政治經濟學至少寬廣到足以包括所有人類活動，我們甚至可以論稱，它已經包括全部的有機體的運作過程。這樣一來，它也就與所有環境生態及多變生物研究等等，擁有了相當的分析類型，它們的目標都是要確認生命的所有形式及評估這些形式的分化及相互關係

(Benton, 1989; Lovelock, 1987; E.O. Wilson, 1992)。在傳播與資訊研究中，明確持有這種觀點的例子不多。貝尼格 (James Beniger, 1986: 107-109) 引用資訊系統理論，希望以此決定生命系統的根本過程：組織、新陳代謝、成長、反映、適應、再生產與演化。爲了要探討控制與存活的複雜問題及社會論爭，史麥塞 (Smythe, 1991) 引用了渾沌理論，目的就是要瞭解所有生命體系中，傳播與資訊的交互關係。

27 這個定義對於政治經濟學及傳播研究的狹隘，有所質疑，但這種定義本身，另有很多地方，可供批評。若說這些學科的根基，都是在於研究當前的人類（主要是男性的）行爲，我們合當承認。但結果一來，這些學科就忽略了人類如何與其他生命產生關係，同時也忽略了除了當前這種資本主義以外，人類秩序所展現的社會（特別是傳播）行爲與實務，還有哪些可能性存在^①。並且，這種定義的缺陷是，它會讓我們忽略了控制及存活的一般過程，事實上是與人類政治經濟學有所分別的。這些缺陷包括了人類畢竟是有自覺的，人類有能力意識到有個目標在作爲他的導引，人類能夠躬身反省，而且自己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它也可能讓我們低估了當前資本主義，從頭到尾發生轉型，亦即形同是歷史的斷裂的可能性。由於這種定義想要找尋的是超越自然與歷史差異的共同過程，我們也就可能忽略了特定的一些過程，而在當前世界裡，這些過程的轉換已經到了造成這個轉換的物種，擁有力量消滅所有物種的自然狀態與歷史。不過，雖說有以上這些缺陷，這種較爲寬廣的政治經濟學總還是提醒我們，無論我們選擇以哪個特定起點或分析焦點，它們必然是與更長的一段歷史及更大的

—————

① 傳播研究有個認定，它以為歷史幾乎全部是由西方推動的，而傳播史則起於電報的發行，這個預設的問題頗深。這個偏見的造成，雖屬可以理解，但它錯誤地將科技形式等同於傳播領域（廣播、電信與出版活動）及其歷史。

有機整體，有所關聯。以下在評述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特徵時，筆者將繼續就這個觀點有所發揮。

最重要的一些特徵

描述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方式，在於將描述的焦點，放在能夠突顯這個取向的若干最重要的性質。若是採取這個作法，則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與內涵，可望擴大，不再受到一般定義方式的限制。這一節採取了高丁與梅鐸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的著作 (譯按：該文已由莊麗莉中譯，刊於《當代》月刊，1995年10月)，並兼及其他學者，它的焦點是政治經濟學的四個基石：社會變遷與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以及實踐。

依其傳承，政治經濟所要優先瞭解的就是「社會變遷與歷史轉型」。斯密、李嘉圖與密爾 (John Stuart Mill) 等古典理論家所要理解的是資本主義的大革命，也就是以農業勞動為主的社會，歷經動盪而轉型至以商務與製造業，而最後是工業社會的過程。對於馬克思等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來說，他們想要理解的是資本主義有哪些動力，以致它能夠成長與發生變遷；他們的目標是要確認短期擴張與收縮的週期循環類型，同時也要確認標誌了整個體系形將發生變遷的長程轉型起伏。比如，對於政治經濟學家心中所認定的歷史之核心角色，英葛藍 (Ingram, 1923: xviii) 是如此解釋的：

現在，一般已經公認，所有社會都會歷經發展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本身並不是雜亂無章，反之，它有跡可尋；若不從其歷史著手，我們就無法真正瞭解任何一個社會事實。因此，較為古老的學派所採取的「現成公式」，它們宣稱能夠適合所有的史例，解決所有的問題，已經失去了它們一度享有的榮光，而「經濟學」也在方法取向上變成「歷史的」，經濟學於是體認了社會演化的許多階段，各自有不同的特徵，從

此階段到彼階段，各自必須修正介入的方式。

撫今追昔，經濟學的發展顯示英葛藍的樂觀（認為歷史終將在這個學科上取得勝利），顯然誤植了。歷史仍然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但獲取了規範地位的經濟學，盡是新古典學派的天下，它把歷史掃除了，最多是把它放作背景。主要原因是歷史將使得經濟學更難成為科學^⑤。英葛藍的樂觀，恰可與巴藍與史威濟 (Baran and Sweezy, 1965: 29) 做個對比，他們禮敬斯密及其追隨者對歷史的敏感度以後，攻擊當代的經濟學：

反歷史到了家，當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對於任何想要探查變遷質性的努力，嗤之以鼻，對於這些刻正發生的變遷，他們一無興趣，也不知道這些變遷將會如何衍展。

貝爾則認為 (Bell, 1981: 79)，欠缺一絲時間與歷史的意識，是

⑤我之閱讀英葛藍的著作，拜賜於史麥塞的引介，史麥塞自己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先鋒。史麥塞 (Smythe, 信件 1991.12.4) 說他在一九三二年還是博士班學生時，讀了英葛藍的書，這本書對他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影響很大。雖然英葛藍書寫歷史思考將取得勝利，但當時經濟學這個領域對歷史的強調，已經在褪色減淡。雖說如此，對史麥塞當時這位年輕的經濟學研究生來說，這本書還是在其學程占據了核心地位。羅爾 (Eric Roll) 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經濟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當年似乎也對另一位傳播政治經濟學核心人物許樂的智識發展，產生了類似的影響。到了現在，誠如麥勞斯基 (McCloskey, 1985) 所說，經濟史是一個邊緣化的次學科，經濟學把更多更多的力氣，花在營造各種嚴格的數學模式，眼中只有現在。巴克 (Parker, 1986) 也對經濟學對歷史的（錯誤）處理，提出了批判，是近年來這方面著作較好者之一。

經濟理論總體危機的一部分：

最後，就邏輯義理來說，經濟學理論必須回歸時間，就經驗事實來說，則需回歸歷史，唯其如此，經濟學才能在面對複雜的種種新的社會排比，有所因應，畢竟在經濟與社會行動的規模與新領域愈來愈擴大以後，這些新的排比是必然出現的。

重新思考政治經濟學的動力，來源之一是我們現在亟需瞭解，當前我們是否亦身處劃時代的轉型期，就如同當年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物所曾面臨的時代一般。人們現在體驗者，似乎是非常深刻的社會變遷，人們不免自忖，他們是否正在見證社會結構與過程的根本性重組，而這也就反映在一種後工業、後現代、後福特的狀態，或是反映在這些的混合狀態？或者，他們所見證的，其實只是資本主義崛起時，就已經在運作的一些根本趨勢，到了現在，這些趨勢只是更加深化與擴大？我們如何認定社會變遷的性質，取決於我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再者，這個問題本身也顯示了歷史思考的復甦，正是這樣的思考推動了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發展^⑥。這個歷史定向已經在「新的加拿大政治經濟學」站穩了腳步，而加拿大兩位主要倡導者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經濟、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等力量的運動，在歷

29

⑥ 拋棄歷史的關懷，並不只是主流的經濟學。誠如詹明信 (Jameson, 1985) 所說，亞他力 (Jacques Attali) 的《噪音》(Noise) (譯按，本書有宋素鳳·翁桂堂中文譯本，1995年臺北時報公司出版)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本不比尋常的、有趣的音樂政治經濟學之作，而且也是因為在「歷史主義」長期普遍被詆毀以後 (阿圖舍 Althusser)、是因為歷史與歷史的解釋經常被汗名為只是「語言系統在某時期的變化」(diachronic) 以後 (索緒爾 Saussure)、是因為歷史被當成只是神話的敘述以後 (李維史陀 Lévi-Strauss)，這本書代表了歷史學旨趣復甦的局部更新 (Attali, 1985: vii)。

史互動時所帶動的社會變遷過程，而其動力則根源於社會—經濟的衝突」(Clement and Williams, 1989: 7)。無論是就其傳統或是就其更新的旨趣而言，政治經濟學的特色之一均是歷史分析，政治經濟學好整以暇，準備回答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不過，若是要長足地提出答案，那麼，歷來政治經濟學對於社會結構及社會再生產的看法，是否流於僵化，這些看法究竟應該如何將歷史的變因納入考察，還得更為密切地分析。政治經濟學傾向於集中分析生產與再生產（複製）結構的不動如山。這種傾向的產生，其來有自，畢竟時代·華納、新力、貝鐵曼、三菱、新聞集團、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以及國際商務公司等跨國媒體財團，確實擁有太大的結構強權。然而，這個傾向卻使得我們很難在分析架構中，納進歷史過程的理解，因為，誠如康乃爾 (Connell, 1987: 44) 所說，「在結構之再生產的基本循環圈裡，歷史以某種『添加』之姿，進入了理論」。體認結構之再生產的力量，但又要重視歷史，在此兩難中的一個解決方案，是要把分析焦點放在建構中的過程，至少要遠多於放在分析結構的再生產。在此，我們值得再引述康乃爾 (Connell, 1987: 44) 的一段話：

若是要將歷史視為理論的有機構成部分，我們就必須將社會結構當成是處於經常「建構」的過程，而不是將它當成是經常被再生產（複製）。這個看法若要產生意義，那麼理論就必須體認結構是經常有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建構。掌握強權的集團總是會企圖再生產當下的結構，藉此維持他們的優勢。但究竟他們是否能夠成功，以什麼方式成功，總是尚在未定之天。

早從奠基時代，政治經濟學就主張這個學科的根基，必須深植於分析更大的「社會整體」。這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跨越了當今錯落在許多學院領域的學科，當今的常態是，對社會階級感到興趣的人投效在社會學門下，對政府管理感到興趣的人投效在政治學門下，對市

場行銷感到興趣的人投效在經濟學門下等等。打從斯密開始，政治經濟學就將社會生活的相互建構及多重決定，當作是它的研究課題，斯密的《國富論》，筆之所到，不見學科界限的侷限。在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初期，米爾就曾如此描述，說明從寬闊取向來研究社會生活，自有必要，他說（轉引自 Stone and Harpham, 1982: 12）：

由於實際上的需要，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哲學的許多其他部門，無法分離而必定相互交錯。除了一些僅屬細節事項以外，或許沒有任何實際問題只需要參酌經濟前提即可作成決定。

如同許多的其他政治經濟學家，米爾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是把它當成瞭解社會整體的一個手段，他甚至體認到，他的取向，與他稱之為「社會哲學」的其他部門，相互交錯。從這個視野來看，政治經濟學就不只是一個取向而已；它同時也是導引，幫助我們瞭解無數取向之錯綜關係。政治經濟學固然從社會生活的一些特定面向出發，但它同時是導引，幫助我們瞭解社會生活之許多面向的錯綜關係。這就是海布萊納 (Heilbroner, 1986: 15) 所說的，「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從來不會停留在知識上的營營苟苟。他們以整個世界作為主題，以勇邁繁複的態度描述這個世界：憤怒、渴望、希望」（譯按：這本書的早期版本有蔡仲章中譯本，臺北志文出版社）。

這樣的觀點在相當時間裡，一直發揮著影響力，人們認定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即便它的名稱被改成了經濟學以後，通行的教科書還是支持這個寬闊的政治觀。容許筆者再次引述英葛藍 (Ingram, 1923: xvii)：

至於經濟學在整體科學體系的位置，我們必須主張，除了短暫與假想的一些情況，我們不能將有關財富的研究，分離於其他社會現象的研究；人類生活的許多面向都是互有關聯並且一起互動的，我們應當將這

個觀點，謹記在心^⑦。

另外有一些政治經濟學，除了對社會整體有相同的關照以外，其根本取向與這裡所說的政治經濟學，完全不同。這些一般稱之為公共選擇理論，或是更為一般地稱之為實證或構成政治經濟學，內有許多不同視野，但都是從經濟理論的保守流派擷取養分。我們暫時不管它的基本假設，也不用分析哪些理念在推動他們的觀點，現在只需要知道，這個流派的政治經濟學認定，它可以而且也應該適用在所有的社會行為形式。根據布瑞南與布坎南 (Brennan and Buchanan, 1985: x) 的界定，構成政治經濟學標誌了回歸古典傳統，也就是將經濟學視為「市場如何運作」的研究，而這裡的市場需以廣義視之，它包括了「經由制度性結構而協調個別行為」。對於提倡這個觀點的人來說，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就是要研究是哪些規則在管理個人與制度之間的聯繫。這些規則是怎麼構成的呢？他們論稱，是由「經濟人，這個理性的、自我取向的，在最充分地運用當代經濟理論之後」(p.65)，所作出的決定所構成的。是以，整個社會領域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領域。這些創造規則的選擇統理了所有的市場，舉凡傳統私人市場的財貨與勞務，一直到選票、配偶、孩童、性等等的市場，都是這些規則所適用的對象^⑧。

另一方面，我們又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制度論者取向所倡導的政治經濟學。這些流派與公共選擇理論完全不同，只有一點合

⑦很有趣的是，英葛藍 (Ingram, 1923: xvii) 當時還將經濟學視為社會學的一部分：「其實，正確說來，應該只有一種大的「社會學科學」，而經濟學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篇章，它必然要與其他篇章緊密扣連。」對於日後那些將晚近的學科等第奉為金科玉律的人來說，這段話不啻是暮鼓晨鐘了。

致：無論這些理論家有多麼不同，他們都認為政治經濟學是要用來瞭解社會的整體。無論是馬克思的著作，或是費邊社會主義者、西方馬克思主義、矮化發展理論者、後凱因斯劍橋政治經濟學家如羅賓森 (Joan Robinson)，以及卡門 (Commons)、韋伯倫 (Veblen) 與高不來世 (Galbraith) 等系譜的制度論者，通通都堅定地展示了社會整體觀。這些許多視野與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大多數核心論點，都有衝突，但彼此都體認，也企圖透過自己的獨特方式，解釋經濟與政治的關係，解釋政治經濟與外圍更大的社會—文化機構及實務等領域的關係。

首先而也是最重要的，認定社會整體性的存在與運作，就是領悟政治的與經濟的之間，是有關聯。一九七〇及一九八〇年代，大量的著作應運而出，由於它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之中，存在一些經濟化約論及工具論，這些著作可以說是對這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反動，它們企圖糾正這種傾向，論稱相對於經濟體而言，國家自有「相對的自主性」(Jessop, 1990)。這個情勢的發展，激生了鮮活的辯論，復甦了對於國家理論的興趣，對於國家與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等關係的興趣，這些辯論並促使學人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中，政治的與經濟的動態關係。這些辯論引發的騷動，持續了一些時候 (Wood, 1986) ^⑧。不過，這場辯論總是集中在「相對」自主。雖然「相對自主」這個術

⑧ 實證政治經濟學彌賽亞式的熱情，讓人瞠目結舌。他們所作所為豈只是創建一個學科而已，若是套用布瑞南與諾貝爾獎桂冠得主布坎南的話 (Brennan and Buchanan)，他們以創造「市民宗教」為己任，這個宗教終將「局部地回返十八世紀的懷疑精神，對政治與政府操持狐疑的眼光」。他們的精力要「集中在找出「節制政府的規則」，而不是要尋覓巧計連環，不是要為不斷擴張而侵犯市民生活的政治說項。身為社會哲學家，我們的規範角色就是要塑造這個市民宗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當然已經是相當的挑戰。」他們檢視社會整體的原因非他，是要捍衛他們稱之為個人主義的道德律令。

語相當滑溜，也會阻礙了更具意義的意見交流之進行，但辯論的各方，並沒有人當真會以為政治的分析可以與經濟的分析，一刀兩分。大多數人都體認現存的學術分工，其實反映了許許多多的影響力，包括當代資本主義在形式上將政治與經濟做了分離，包括經濟學為了模仿物理學而帶給自己的壓力，包括經濟學自認為在解消其政治內容以後就可以免除意識形態的偏見等等。雖然大多數論者承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形式上已經分開，但他們亦論道，經濟學家避開了許多饒富意義的問題，想要以此購買科學的特許狀，經濟學家想要將政治排除在經濟之外，其實都是相當濃厚的意識形態包袱。

來自制度學派、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家，同樣努力想要確認社會的政治經濟情勢，與更大的社會與文化領域，有些什麼關係。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取經自韋伯倫 (Veblen, 1934) 的著作，他們感到興趣的是，韋伯倫稱之為「顯耀性消費」，也就是追求權力與地位的驅力，究竟與攫取欲望 (acquisitiveness)，有些什麼關係。制度學派認為，追求權力與地位的驅力，來源並不是主流經濟學所說的理性，而是深藏於非理性。

在馬克思主義的引領下，法國調節學派的企圖，在於確認積累政制與相應的社會及政治調節、規範模式，有些什麼關係，在他們看來，社會與政治的調節、規範固然包括國家，但又超越了國家的範圍 (Aglietta, 1979; Boyer, 1986; Lipietz, 1988)。與此類同，在《荒原之後》(After the Wasteland) (Bowles et al., 1990) 這本書，「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⑨ 伍德的看法是，政治與經濟是密切關聯的。她認為 (Wood, 1986: 150)，兩者可以分開的唯一重要情況是，這個分離僅屬形式，並且，在資本主義中的這個分離，「使得純粹司法的與政治的自由與平等，有可能得到最大的發展，但卻對經濟的剝削，沒有構成根本的挑戰」。

展示了美國版本的調節、規範取向，他們的分析焦點是積累的社會結構，也就是塑造特定時期的積累過程，其社會—經濟制度與實務運作是些什麼。還有，皮我與薩八 (Piore and Sabel, 1984) 認為，由於大型本國企業組織起來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已經衰退，他們進而認為，這個情況表徵了政治經濟秩序的大轉型，他們於是努力探討其緣由，論稱這很可能是在很大範圍內，已經出現了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轉移，也就是出現了由福特模式到後福特模式的轉移，而後者的特徵是彈性專殊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最後，我們又有華勒斯坦主導的世界體系的理論 (Wallerstein, 1991)。他認為，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流派雖然很多，但大致可以歸為兩大類，一類他們稱之為主觀論者 (subjectivist)，是一種意義理解之學 (idiographic)，另一類他們稱之為唯經驗主義者 (empiricist)，是一種法則定律之學 (譯名取字趙剛) (nomothetic)。在他看來，這兩類研究都鑽入了特殊性的胡同，它們「將我們推向了個人層次的分析 (或者其組織形式的個別層次分析，如公司、家庭、國家等等)，認為這才是適格的分析單位」，而我們應該扭轉這個傾向，應該走向「整體的與系統的實體之分析」 (p.129)。

雖然有這麼多陣營的人努力要以社會整體作為分析對象，但並不是所有知識陣營都支持這個努力。比如，與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流派結盟的人，對社會整體這個概念，公開排斥，有些時候，他們更是信誓旦旦地排斥。這些人的立論與觀點容或有許多差異，但他們的共同點是認為「社會」這個術語，根本就是強不同以為同，是要將一致的論述，用在本來就是分裂、不相連屬，因此也就無法定義的東西。它們大致都傾向於論稱，毫無社會整體可言、毫無個人的整體可言，毫無論述的整體可言。根據這個觀點，二十世紀生活的內爆，部分原因是因為新傳播與資訊科技的能量導致的，它打散了整體結構，原本還讓人們猶可以有些整體感覺的時間與空間，如今也與這些科技一起失散了 (Lyotard, 1984)。我們現在的職責，是要瞭解在地

(local)、片斷與局部，以前我們認為這些是更大整體的元素，但現在發現它們其實不相連屬，或者只是鬆垮垮地綁在一起而已。社會整體這個概念，只是意識形態的黏膠，一旦不再受其拘束，我們就能夠領悟這些片斷的真正價值，最終，我們將會慶賀它們對所有的整體概念，發揮了抵抗的作用——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以及所有生產大敘述的人，都是整體的概念。

第七章將檢視這個陣營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我們現在只需集中在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別的反應即可：它體認後現代觀點有其分量，但同時又堅守社會整體觀的立場。它對社會整體的瞭解，起於斯密與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及《大綱》），這些著作與古典結構論者，如涂爾幹，以及更為晚近的結構論者，如派森思與阿圖舍，剛好對峙。斯密與馬克思有相當根本的歧異，但他們都拒斥本質主義者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各種現象均可化約為社會整體，所有的分析都可以化約為後來涂爾幹稱之為「社會事實」者 (social fact)。斯密與馬克思重視歷史，體認社會生活具有隨機的性質，他們因此也就排除了本質主義者的想法。其實，援用社會整體的概念，並不同於本質主義或化約思考。這就是馬克思、葛蘭西與盧卡其對我們的提醒，他們指出，辯證思考讓我們體認實體是由部分及全部所組成，二者組織為「具體的整體」，既有整合又有矛盾，而這才是社會生活的構成。各個部分的關係，從鬆到緊，「全部」本身可能包括了無數的分裂、突發與扭曲。然而，若以這個整體觀來看，只處理部分或全部，均屬不足。它拒絕系統思維的觀念論，它也拒絕流俗科學的實證論，後者主張社會領域的每一種聯繫，均可直接從感官觀察得知。本質論者所主張的分析優先步驟，若非起於全球 (global)，則只能是起於在地 (local)，它也同樣拒絕。

哈維 (Harvey, 1989) 正是主張這個觀點的健將，他體認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關係，是在分散、流動、彈性及重新組合。這些發展標誌了認同的轉移及在地的抗拒。但這些情勢同樣也標誌了資本主義的組

織，更加緊密，資本主義這個時候反而更加能夠控制科技與專業技能的使用，於是資本主義就更有彈性，能夠容受、拒斥、吸收、商品化，或對這些抗拒置之不理。確實，我們現在目睹的徵象，是當前知識典範所顯示的熙攘紛爭，這些典範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對古典的、分析的科學之批判，提出了回應。

後現代主義的傾向，是以在地、「他者」、局部作為回應方式。科學思考的傾向則是回應以較強烈的整體意識：

相對論與量子論都認為整體是密不可分的，雖然二者以不同方式達到這個結論。但我們已在前面章節解釋，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秩序觀，這種概念要能夠涵納多種類的不可分整體，這個概念可以讓我們走向新的物理學內涵，既包括相對論，又包括量子論，但卻有潛能超出二者。
(Bohm and Hiley, 1993: 353) ^⑩

34

研究結果可以讓我們知道抗拒與控制、強與弱等等的質性及程度。儘管主張文學評論這個領域必須要有整體觀，但阿馬德 (Ahmad, 1992: 121) 還是很謹慎，他指出我們必須弄清楚，任何既定領域的構成，是在什麼特定及歷史情境中被決定的。總之，「擁有了該領域的足夠知識以後，在正常情況下，『是』有可能確認主要的意識形態構

⑩ 李文思與李晚廷 (Levins and Lewontin, 1985: 3) 也從當代生物學的角度，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們指出，局部與整體的結合關係，無法擺脫。因為局部是從它們的關係得到其質性：

它們帶給整體新的質性，這些質性反映在局部的變化等等，這些就是我們稱之為辯證的質性：若是沒有另一件東西的存在，這一件東西同樣也不能存在，這兩件東西的質性，在彼此詮釋的過程中衍展。

成及其敘述形式」^①。政治經濟學奠定這類研究的基礎，憑藉的是隨機、非本質化約主義的社會整體觀。

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第三個特點是「道德哲學」。我們這裡所說的道德哲學，指的是社會價值（有關欲求的欲求），以及什麼是允當、合適的社會實務之判斷。這個特別的分析形式，目標是要廓清、明白指認分析者所採取的經濟及政治經濟視野之道德立場，特別是在有些政經分析經常掩飾其道德觀點的情況下，這個明白指認的工作就更為必要了。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 (Jeffrey Sachs) 是前共產世界經濟重整的主要負責人，當被詢以他在這個區域的工作時，薩克斯一開始就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道德挑戰」（轉引自 Rusk, 1991）。本傑明·傅立曼 (Benjamin Friedman, 1988) 是薩克斯的同事，他在攻擊雷根經濟學的胡作非為的專書裡，在書中每一章的開頭，都摘引聖經上的正文。高丁與梅鐸在評論傳播政治經濟學時，指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之特色，「最重要的或許是，它超越了效率的技術性議題，它進入了正義、平等與公共財等基本道德問題的討論」（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18-19）。以上的例子，來自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的不等立論，對於分離科學與道德考量的因襲作法，他們都表示不安。他們對道德哲學的關懷，反映了政治經濟學奠基始祖的某些核心題旨。

斯密是道德哲學教授，不是經濟學教授，他所提供的觀點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不透過私益而增進社會福祉，他後來在《國富論》提出

① 阿馬德 (Ahmad, 1992: 121) 固然主張，也維護他稱之為「整體」(Totality) 的概念，但他卻以更長的論述，攻擊誤用整體觀的人，認為這些人之所以會說「第三世界文學」具有一種單一的傾向（如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只分析了「少數翻譯為國際語言的著作而已」。

的作法是，透過具有系統意義的社會仁愛：

35

因此，構成人類質性，使其完美的是多為他人著想，少為我們自己盤算，是克制我們的自私而浸淫我們的仁愛之情；若能如此，人類的情操與熱情就得以產生，人類的整體和諧與繁榮，也就可期。(Smith, 1976: Pt. 1, Sec. 1, Chap. 5, p.71)

相同地，父親是牧師的湯馬士·亞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對未加節制的人口成長，也從道德層面提出了警語；而卡爾·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則是要創造一個以滿足人類需要，而不是以階級權力作為基礎的社會。無論我們回應自己的特殊觀點與價值，我們都很難否認這些觀點與價值在我們的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德領域與我們的研究、著作，息息相關。誠如知名的政治經濟學家羅賓森所說(Robinson, 1962)，摘下「倫理的部門」，將它轉成「企圖成為科學」的學科，還是留給後人去作分析罷。

這就交代了兩個重點。第一，道德、文化或精神的層面，其本身是分析的核心主題。在著手分析市場的分工之前，斯密選擇先寫就了《道德情操的理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因為瞭解十八世紀後半葉，方當上升的英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非常重要。斯密覺得這本著作比《國富論》來得可取，因此在晚年又回到了這本書的主題，據盧士(Lux, 1990: 98)說，這是因為「未受節度的商業動機，勢將帶來更為嚴重的問題，但稍早他失察了」。馬克思開始著書立說也是以道德哲學的論題呈現，但後人只是將它開脫為「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但若要瞭解正在長成的工業社會之價值核心，非得從這些文字挖掘不可。就另外一個意思來說，這些人都是具有道德夢想的人。身為社會哲學家，他們油然而起一股責任感，認為應該確認合適的道德生活方式。他們認為，道德眼光是區辨理性與非理性的特徵。這麼說可能很難讓人理解，畢竟西方文化的走向，是要區分科

學與道德。西方文化的一個聲音，操持著理性、邏輯與實證主義的語言；西方文化的另一個聲音，操持著規範語言，雖然它大可反駁前一種聲音，但它並沒有科學的權威。若是我們想要兼取兩者，通常我們最多也只能夠達到韋伯 (Weber, 1946) 的境界，韋伯認為出於道德關懷，無可非議，但是科學的信條，容不得分析時夾雜道德關懷。捍衛這個立場的人提出的理由是，道德關懷阻擋了科學的進展，最後也就阻止了科學，反而使科學無法開發手段、工具來解決道德家所提出的問題。道德人士則說，許許多多的問題，從核子擴散到環境破壞，正就是科學不具備反省能力所配合製造的。

36 由政治經濟學移轉到經濟學的最重要斷裂點之一，就是韋伯式的觀點已被接受，價值中立自此界定了經濟學與道德哲學的關係之界限。經濟學可以研究價值，但實際上這等於是將價值等同於市場選擇的偏好。道德上的評論，在經濟學家的解釋或評估，若不是沒有地位，就是算不了什麼。有人會就此論稱，分離道德哲學與經濟學，只等於是讓前者潛入地下，然後迂迴繞行又進入了經濟學家的假設，以及理念、概念及變項的選擇。比如，決定將勞動與土地及資本，共列為生產要素，也許有其分析意義，但無論再怎麼意在言外，這其實都反映了一種道德觀點，也就是它已經將人與資本變為可以相互交換。經濟學家會說，這樣的觀點僅限於經濟領域，並且也反映了經濟實務。批評這個說法的人則指出，此觀點已溢波至社會生活的其他形式，因此，為了經濟學家的目標而被視為工具的工人，在更多的場合也如此被看待，然後也就如此被對待^①。既然已經將特殊的經濟實務，化為普遍自然的現象，則活生生勞動的人也就變成一個生產要素，經濟學家於是廣開後門，揖請一種強有力的道德觀點進駐。

① Rabinach (1990) 論稱，現代主義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正是唯生產導向的風潮，人等同於機器。

關於事實與價值的分離，分析與規範的分離，經濟學與道德哲學的分離，辯論繼續不已。但風向已有轉變的徵兆。誠如本節稍前所說，當今主流經濟學界的健將，他們在論述經濟時，已經沒有那麼反對使用道德語言；雖然這等「道德挑戰」更常出現在公開演講，而不是學術期刊的論文。如今主流經濟學家也更為可能使用特定的道德哲學之著作，特別是羅思 (John Rawls) 的正義理論，它使得道德思考與福利經濟學有了聯繫 (Amsden, 1992)。這部著作鼓舞人們明白地從道德哲學的角度，重新思考主流經濟學 (Etzioni, 1988; Lane, 1991)。雖然來自主流者已有這些反省，但真正思考道德關懷的人，主要還是來自異端，也就是政治經濟學。「實證」或構成的政治經濟學這派保守分子，企圖將經濟分析的工具，延伸至道德選擇，並且使用經濟學的手段，想建構布瑞南與布坎南 (Brennan and Buchanan, 1985) 所說的「市民宗教」(參見註 8)。馬克思主義與制度政治經濟學者亦熱衷於辯論道德哲學之位置。最近一些年來，這些辯論的主要形式之一，是阿圖舍結構主義對馬克思主義人道思想的挑戰。阿圖舍企圖要將《資本論》的邏輯，應用在思想與行動的一般形式，他因此呼籲將馬克思主義的所有道德哲學面向，排除在外。這個攻擊持續至今，雖然做此主張的人如今移轉至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他們從尼采的傳承汲取觀點，肆意攻擊道德哲學的價值。然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道德面向仍然堅實，因為它提供了強大護牆，捍衛民主、平等，以及在強權私利侵蝕下的公共領域。雖然分析哲學及解構論者猛烈襲擊，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終究能夠站穩立場，堅持道德哲學立場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提供的護牆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Schiller, 1993)。

37

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第四個特徵是「實踐」，這個概念深植於哲學史，我們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最直接的通路，讓我們將實踐的概念，引進傳播研究。就最一般層次的意義來說，實踐指的是人類活動；就特殊的意義來說，實踐指的是人類的自由與創造活

動，人類以此生產及改變世界與他們自己。這個字源自古希臘文，指的是自由人（以及較不為人知的神話女神的名字）的政治及商業活動¹¹。這個字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了突出的指涉，他認為實務知識的經濟的、政治的與倫理的研究形式，應該與理論及 *poiesis* 區分開來。理論追求的是真理，*poiesis* 追求的是某種東西的生產，而實踐的目標則是行動。在中古時代及早期現代哲學，關於知識分工的辯論，這個術語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

到了康德、黑格爾及馬克思的著作裡，實踐就登居核心的地位了。對於康德而言，實踐 (*praxis*) 或實踐理性 (*practical reason*) 最重要的就是要與理論統一，而理論包含了完整的理性。康德甚至還把道德定義為「絕對的實踐」(*absolutely practical*)。黑格爾也認定實踐優先於理論，但他要在更高的統一層次裡，找尋真理，認為唯有在絕對精神實現自己於哲學、藝術與宗教時，才有自由，也才能孕育真理。馬克思從他最早的著作開始就很關注實踐的問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處理希臘哲學，而它認定哲學必須實踐、務實 (*practical*)。馬克思對於這個術語的興趣，是因為他想創造足以取代異化勞動的東西。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使勞動免於匱乏的異化，卻同時另以新的異化形式加以取代——將勞動力化約為可供行銷的商品。革命的目標，是要徹底轉化異化勞動，使它成為實踐，也就是成為一種自由的、普遍的自我活動。

《資本論》及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再解讀，是一種更為具有命定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葛蘭西與盧卡其援用實踐這個概念來加以攻擊。在法蘭克福學派，而又尤其是馬庫色與哈伯瑪斯的著作中，實踐這個概念進入了傳播理論的辯論，他們讓實踐得到更多的重視，並將實踐

¹¹ 這顯然鼓舞作家威爾頓 (Fay Weldon) 所創作的小說，以名叫「普瑞西思」(*Praxis*) 的女性為主角，「指的是轉捩點、高潮、行動；興奮莫名」。

界定為行動的一般形式，而勞動只是其中一種。在傳統意義上，勞動總是占據了經濟思想的核心位置，因為人類歷史必然是由匱乏的領域開始。在生產力有了長足開發，人類第一次有了歷史契機，克服了匱乏，此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健將，有了轉折，他們開拓其他的實踐形式，期望找出自由的領域，由什麼構成。在批評馬克思時，哈伯瑪斯 (Habermas, 1973) 論稱工作（或說是具有目的的理性行動）必須與互動（或說是傳播、溝通行動）有所區別。馬克思當年投入於分析工作，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資本主義催生的巨變，正是以勞動作為中心。但哈伯瑪斯認為，社會實踐既包括工作，卻也包括傳播行動。後者以共識規範及具有建構能力的符號作為基礎，提供另一種社會生活的模式，但前提是傳播、溝通行動必須要能免於被扭曲，因為有了扭曲，也就等於是限制了民主的、公開的傳播。

實踐不僅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論前提，甚為重要，實踐對其實質內涵，亦很重要。簡而言之，實踐所導引的知識論，認為認知的過程，是理論與實務交錯影響的產物。若說有人認定真理只能經由冥想獲致，那麼，這樣子的認識論是片面偏頗的。知識不僅是擦亮與淨化概念，知識的完成，有待概念與執行的相互構成^①。在政治經濟學的實質發展過程，實踐同時也占據了重要位置。畢竟，政治經濟學的起始，是家戶的操持及城邦國家的控制。亞里士多德則將實踐列入實務學科之中，認為學習其智慧可望對統治者的行為舉止有所裨益。古典

—————

① 馬克思主義認為，概念與執行的分離，是走向異化過程的重要一步。布列夫曼 (Braverman, 1974) 根據這個區分，獨樹一幟地完成了關於當代勞動過程的專書。實踐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外，自有共鳴。特別明顯的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中（即便沒有這麼名稱，但其著作的實質，都透露了這個問題），包括皮耶思 (Peirce)、詹姆士 (James) 與杜威 (Dewey)。哈特 (Hardt, 1992) 在研究傳播史的著作裡，就說馬克思主義與實用思想之間，可以用實踐作為橋樑。

政治經濟學內蘊一股堪稱明顯的緊張關係，一方面它亟望瞭解財富與生產力的根源，他方面則必須向精英進言，合適的勞動、貿易與社會福利政策，是些什麼。發源自馬克思主義的傳承，明確地要統一政治經濟學家與活躍分子的雙重角色，比如，葛蘭西有關「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可以說就是來自這個傳承。葛蘭西因為領導共產黨反對義大利法西斯而下獄，他在監獄仍然寫作不輟，他所彰顯的知識分子模式，既有分析所需的理論工具，又有實際政治鬥爭與抵抗的常識。在知識版圖遙遠對立的另一方，當代主流經濟學家也面臨了這個緊張關係，他們掙扎著，既想要以數學的嚴格來淨化經濟學，又想要將他們的建言，兜售給工商業界與政界。這裡並不是說實踐所曝露的問題，對於範圍廣及政治經濟學及經濟學的兩極思考，性質相同。更為重要的意義是，不論再怎麼努力嘗試，在這些領域工作、研究的人，根本就無法免脫實踐的問題。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它與政策研究密不可分，傳播政治經濟學必須坦然應對這個關係所創造出來的力量與誘惑。第七章將以更長的篇幅衡量這些論點。本章以下轉入評述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結論則將評估主流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並指認當代經濟思潮的危機。

古典典範

許多人在論及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的源頭時，總愛以古希臘或是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啓蒙時代的道德哲學家，作為開始，前者方便政治經濟學這個語源的探討，後者則到了亞當·斯密而達到頂峰¹⁵。無論是選擇哪一個，我們在回顧它的主要歷史時，不可能不體認到大部分的政治經濟學論述，都是以大敘述作為根基，而這個敘述將認定本學科的源頭，實在是來自於西方白人知識活動的特種類型。然而，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不妨舉個相當明顯的例子，比如，這些歷史忽略了幾百年來，我們這些西方人稱之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科學，在阿拉伯

世界所發展的情況，特別是卡東 (Ibn Khaldun) 的著作¹⁶。本書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鳥瞰，由於篇幅很短，但卻要將各家典範的立場平衡評述，既要評述大多數人所承襲者，又要交代修正並轉化它們的異端觀點，不免相當困難¹⁷。筆者已將這些目標放在腦中，但主要還只是要概述傳承，以求能夠清楚掌握大多數的政治經濟分析，並以此為下一章鋪路，也就是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討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大支柱，是啓蒙時代的笛卡爾的理性，以及培根的經驗論。大致說來，它所尋求的推廣十七世紀物理學的革命，將加利略及牛頓的機械力學應用到十八及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誠如貝爾的提醒 (Bell, 1981)，這個科學鴻圖的最主要重點，就是捨棄具體目標的研究，轉而集中在研究它們的抽象屬性，如質量 (mass)、

-
- 16 即便從現代起始，學者亦無共識。大多數當代的教科書都以斯密的著作開頭，另有些則又往前推到更早的一些學者，如培第 (Sir William Petty)，他在一六九〇年出版的《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 就討論了生產時鐘的分工問題，書中已經蘊涵勞動是所有財富的根源。
- 17 筆者很感謝三個人。馬拉那 (Hamid Mowlana) 提醒筆者忽略了這一點，我初次學習經濟學的教授歐威斯 (Ibrahim Oweiss)，以及教導我知識分子歷史的教授薩拉必 (Hisham Sharabi)，他一直努力，想要拓寬在喬治城大學占據支配地位的傳承之視野。關於西方政治經濟學與伊斯蘭思想的當代關係，請見葛藍 (Gran, 1990) 的討論。
- 18 《新佩格瑞》這套辭書出版以後，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梭羅 (Robert Solow) 在《紐約時報書評》裡，大聲加以批評，它的編輯群應該最能領略平衡功夫的困難了。梭羅認為該套辭書太過醉心於批判的觀點，讓人無法接受，他因此棄子投降，認定經濟學註定「要受意識形態污染」。梭羅以馬克思主義為例（「最是始終如一」），但兼及於奧地利、後凱因斯主義與新李嘉圖典範，他攻擊《新佩格瑞》，指其「未能均勻引介各個「典範」」。對此批評，在經過計算以後，編輯群的答覆是，總共大約有百分之十五的條目，落在「當前專業共識」之外 (Amsden, 1992: 795-797)。

40 加速度 (acceleration) 與速率 (velocity)。對於蘇格蘭啓蒙之子斯密，以及英格蘭啓蒙諸子李嘉圖、馬爾薩斯與密爾等人來說，這就意味著必須確定是哪些經濟常數，才能讓正在歷經巨大轉變的世界，得到穩定的、構成的實體。我們應該可以很有信心地指出，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找出的這些常數中，最重要的是「生產勞動的價值」這個概念，這與當時流行的觀點，也就是重農學派所說，經濟財富來自土地的論點，顯然是迥然有別。

由於他們將分析焦點集中在價值、價格與成本等變數，他們也就提出抽象法則來描述它們的相互關係，並以數學形式加以典碼化。此外，先前重商主義者重視的是貴金屬，而重農學派重視的是土地，兩者均失於狹隘，如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以抽象的方式，將價值這個特定概念分離出來，於是他們也就開啓了大門，可以將其概念，運用於工商貿易的所有形式。古典大家的立場，雖然並不是經濟思潮的第一個學派，但它們可能是第一個認為自己整套的抽象變項，可以適用在所有的經濟活動¹⁸。

羅爾 (Roll, 1942) 認為，這個古典觀點，來自三個當下的傳承。首先是洛克的政治哲學的傳統，從中古典政治經濟學取用了自私、私有財產權，以及勞動價值論等概念。重商學派對它的貢獻則是交換價值的概念，雖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其後在勞動價值論中，將會加以修改。最後，雖然這形同是推翻了土地是價值最後來源的觀點，但古典理論卻取用法國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觀念，捨棄了與之對立的重商主義者的干預觀點。

跟隨啓蒙傳統，古典理論家亦論稱，個人有能力運用理性，使自己的利益達到最大，推而廣之，整體社會亦將因而蒙利。古典理論將

¹⁸ 斯密與其他人都認為，抽象法具有普遍效力，不限於分析經濟活動。這個論點引起評論者說，斯密將市場比作宗教，簡直就是「第一個經濟帝國主義者」(Anderson, 1988)。

社會化減為個人總加起來的集合，社會本身並不「獨立」存在，社會本身也無目的可言。機構制度的存在，是人類互動的自然結果，但應以懷疑眼光對待之，因為這些機構制度會限制個人的自由選擇及社會的來往，包括意見的自由流通、商務及勞動均將受到限制。政府這個制度則更是需要特別注意，因為主權的傳統使得政府有了自保的權力，但政府很容易就會用此權力來創造特權，包括限制了工商貿易。

在這古典取向之內，另有堪稱多種的變化，這就使得其後的政治經濟學家，有了許多主張與對抗的空間。在這些變化中，占據支配地位的觀點是斯密的著作（1937: Book I, Chap. 2, p.14），他一再主張私益勝過慈善：

- 41 我們得以用餐，並不是肉商、酒商或麵包師父的仁慈，而是他們必須照料自己的利益¹⁹。

若是把這個觀點推至極點，馬爾薩斯就必須主張汗水與穢物應該在街道自由流動與擺放，因為這樣才能確保人口控制及適者生存。根據這個說法，政府不應插手控制疾病的擴散，因為如此做所造成的長期後果，會是更多的苦難，因為人口不加節制而資源轉給最弱者使用，將破壞社會的健康²⁰。不過，雖然斯密擔心政府控制，但他並不認為政府的角色只限於國防。斯密領會勞動與文化的關係，因此他雖然主張即使是製作大頭針這樣的東西都應分工，但他也說，「若是有

¹⁹ 斯密關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師父的敘述，廣為引用。同樣寫在《國富論》的另一個段落，則顯示他對私益的如此強調，並不完全坦然 (Book III, Chap. 4, para. 10)：

一切為我們，旁人全無份，在任何時代任何世界，這似乎都會是人類的卑鄙箴言。

人一輩子都在執行少數幾項簡單的操作……通常他也就變得既笨又無知，說多笨就有多笨，說多無知就有多無知，除非政府花些功夫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1937: 734-735)。還有，在寫於一七五九年的《道德情操的理論》，也就是早於《國富論》十七年，斯密攻擊霍布斯的自私概念，他代之以仁慈的呼喚：

因此，讓人趨近完美的是多為他人著想，少為自己盤算，克制我們的私慾，推廣我們的仁愛。(Smith, 1976: 71)

我們並不是要在這裡論稱哪一種說法才是真正的斯密，而只是要說，批評斯密的人，都把他過度簡化了，尤其是將斯密的立場視為市場應該毫不受節制的人，實在過度簡化他了。

在許多人印象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簡直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老巢，但李嘉圖(1819)與密爾(1848)距離這個形象，那更是又遠了好幾步。他們已經注意到了自由市場機能，將造成分配的後果，會是不平等與剝削的鬼影幢幢。李嘉圖對地主利益的抨擊更是猛烈，他痛擊地主控制了重要的資源，以此取得高額地租，這對工人與資本家都是損害。密爾在骨子裡是實用主義者，他退得老遠，不與社會主義發生糾葛，他呼籲透過教育的擴張來控制人口，因此也就可以減少欲求。這樣一來，在知識議程上，提出具有系統性的方案，以此取代毫不受限制之市場機能的責任，也就落到李嘉圖及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身上，當然，更也落到馬克思及馬克思追隨者的身上。

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重要，有許多理由。這個學派的人，儘管

④ 雖然馬爾薩斯對政府干預持續攻擊，但他卻支持《穀物法》(Corn Laws)。英國政府以這個法律抽取高額關稅，保護英國的地主。馬爾薩斯說，政治經濟學更像是「道德與政治」，而不是數學，並不能適用於《穀物法》(Lux, 1990: 41)。

有許多差異，但他們成功地將知識上的注意力，從當時對金塊銀塊及土地的強調，移轉到了具有生產力的勞動。他們領悟到了市場的分工，將帶來財富的創造。他們也理解，這個作法擴張以後，將轉化他們所知世界的面貌，他們與當時的許多人也都相同，對於他們方當開始體驗的變化，整體來說究竟是福是禍，內心存在很深的曖昧不明。

古典學派招徠保守主義者與馬克思社會主義者的雙重批判。這些批判提供了另一些看法，在就此再作討論之前，我們在這裡可以先指出，古典學派的立場，在一個很根本的地方，違反了它自己的根本原則。儘管自由與個體的價值不離口，古典政治經濟學卻將經濟民族主義視為理所當然。比如，斯密的主要著作，目的是要解釋以及增進「民族」(nations)的財富，而斯密口中的民族財富其實就是不列顛(Britain)的財富。貿易可望提高這個或那個「民族」的生產力。在她的《經濟哲學》這本書中，羅賓森(Robinson, 1962: 125)就指出，雖然他們的立場「宗旨是要符應全球普同的仁愛，但他們卻只是不由自主地以『民族收入』來衡情論理……單只是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就已經耗盡了他們的精神」。古典政治經濟學固然成功地使許多觀念失去神話的色彩，比如，以前重農學派所說的土地是財富的根源，已被其戳破，但民族主義的霸權力量如此強大，造成民族及人類一般的普遍福祉之衝突，根本也就無法得到他們的青睞。

激進分子的批判

烏托邦與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從許多理由，強力批判古典學派的立場，舉凡以古典之名而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人文災難，或是古典學派信誓旦旦於啓蒙理性，卻在理論上有所缺失，都是批判對象。他們的激進反應，得到了許多社會，特別是工人運動的支持，因而得以持續，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批判也就擴大，超越了知識分子的圈限，包括了更大範圍的民主力量，激盪而向工業革命反彈。

烏托邦的批判，基礎來自於它們與反對建制的社會運動結合，如結合於平權運動者 (Levellers) (英國)，或結合於法國革命的激進分子。對於政府不再干預貧窮與飢饉的情況，將本來已經為數很少的保護措施，盡數撤銷，致而引發剝削的增長，高溫 (Godwin) 與潘恩 (Paine) 等人也都詳細記錄。尤其是，他們認為，古典學派未能以啓蒙的理性精神，批判新經濟基石 (也就是私有產權)，必須大加鞭撻。居然會有一套系統知識，是要用來將人民排除在其苦汗勞動果實之外，那還有什麼系統 (或者，套用卡萊爾 (Carlyle) 的話，又還有什麼「讓人喪氣的科學」) 會更顯得不理性呢？他們的強烈道德呼聲與政治信守，使他們無法接受古典學派的回嘴，無法接受饑饉與苦難是人口成長與土地不足的必然後果。稍後的一些烏托邦主義者，最知名的是歐文、傅立葉與聖一西門，明白表示將致力於營造計畫性質的、社群的社會，取代他們稱之為無政府狀態的市場。

43 馬克思同意烏托邦者的部分立場，認為我們是該關懷平等與社群，但亦有保留。馬克思認為，儘管烏托邦者道德上的憤怒，理由充分，但這並不能說，抽象的、觀念上的人文精神理念，可以取代實質而持續的物質分析。馬克思的物質分析的力量，招致了大量的批評，但也得到了尊敬，有些出於勉強，但有些可一點都不勉強^④。這裡的烏瞰，並不是要合情合理地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也不是要引介日後對此傳承的無數詮釋。反之，這裡的目標，僅只是在於描述馬克思與古典學派論對以後，以批判的立場解讀政治經濟學的若干主要面向。

馬克思的分析，建立在古典理論的許多觀點。他接受古典論者將勞動當作價值的主要來源，雖然他又很有系統地另作分析，將勞動的使用與交換價值區分開來，因此也就發展出了剝削理論。這個理論區分了勞動的價值與價格，或說，它確認了「剩餘價值」的存在，這個價值可能經由延長工作日而由資本取得 (絕對剝削)，也可能經由工作日的工作過程之強度增加而由資本取得 (相對剝削)。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展開批判，最後卻發展成一種企圖，想要將這整個取向納進歷史考察，特別是考察政治經濟學對勞動的觀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旨趣，在於理解由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歷史轉型過程，但卻自我設限，在檢視資本主義本身時，除了辯論特定議題，如資本主義是否必然內含貧窮化等問題時，傾向於不再運用其歷史想像力。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動態體系，不斷以新科技及組織勞動過程的新形式，革命性地改變了生產過程。雖然資本主義面臨不斷的衝突與鬥爭漩渦，以致於它必須改變自己的實務及形式，但最終一來，沒有任何風俗習慣或價值能夠阻擋市場的發展，商品的生產（包括勞動力商品）及剩餘價值的發展，不受阻攔。資本主義體系持續革命的傾向，也就是熊彼得 (Schumpeter, 1942) 後來允當地稱之為「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只能由資本主義自己有辦法激生的力量，加以中斷。這些力量也包括了勞動階級，意指必須販賣自己勞動力並放棄控制生產工具的人。古典理論認定了推進資本主義的力量，但很快就認為這些力量如此運作的原因，純屬自然而然



④ 一九四二年，與馬克思略有相同知識高度的敵手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說得很好，這些話放在當今慶賀「後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的終結」的格局中，特別具有意義 (P.3)：

出於知識或出於幻想的一些創作，大多數在彈指間或在一個世代之內，消失無蹤，永遠不再存在。但有些可不是這樣。它們或許衰弱失色，但它們終將捲土重來，而且不是以文化遺產之姿現身，不是只落得一些無法讓人辨認的成分存在，而是以他們個別的裝束及他們個人的傷痕現身，人們可以一眼看清，可以感知。這些就是我們稱之為偉大的人物——這個定義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因為它將偉大與活力，聯繫了起來。若是用這個意義來理解，那麼，毫無疑問，這正是用來形容馬克思之訊息的字眼。

⑳。馬克思則要把資本主義放在歷史的辯證流動過程，詳加考察。更重要的，這會是一個物質的歷史，它將打破建制歷史學的成規，也就是打破以黑格爾著作為縮影的歷史學，那種獨尊觀念、信仰與國家的史學㉑。除了取用黑格爾傳統的許多內涵，尤其是取用黑格爾的《小邏輯》，以及取用黑格爾的實踐哲學（也就是融合理論與實務）之外，馬克思其實還接受了挑戰，將黑格爾傳統整個革了命。馬克思完成這項挑戰工作的手法，是要展示人們創造歷史及自己，雖然他們所承受的情境與條件，並非他們自己所能創造。馬克思認為，歷史最重要的意義是人們透過勞動而創造自己。

除了這個激進的歷史觀，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另有一個同樣是很激進的社會觀點，它觸及了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物質體系，並不是因為它是許多東西（機器、工廠、產品等）的體

㉒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時，尤其強調這一點。他在《資本論》第一卷(1976a: 175)，特別挑出古典學派的理論形構，如此描述：

毫無疑問，這些公式烙印了特定社會形構觀的痕跡，這種觀點認為，生產過程主宰了人，而不是剛好相反，這似乎是政治經濟學家的意識，他們認為這是不證自明，由自然強壓使然，正如同生產勞動本身一樣。

㉓馬克思(Marx, 1976b: 467)在批判那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時，相當尖銳，他認為這些人拒絕正視衝突與變遷的物質根基：

這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居然還會提起社會，那實在讓人難以理解，他們不是與那些哲學家相同，認為所有「真正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所引起的嗎？根據這種哲學信仰，創造或摧毀世界的是概念的力量，果真如此，那麼，他們不也可以想像有個人能夠經由「摧毀」這種或那種的概念，因此也就「摧毀了生活的裂隙」。

系，而是因為它包含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整套「社會關係」。看起來自然而然的現象，掩飾了社會生活的重新組織，基本上實乃以階級作為劃分。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是物質體系，並不僅只是因為它生產商品。商品生產固然很重要，但這還只是說到了商品。馬克思確實大量使用商品這個分析。比如，在《資本論》（1976a）這本我們應該可以說是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裡，他的起始一章，正是「商品」。但這第一章打從開始就很清楚地指出，雖然商品無所不在，它的無所不在只是皮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p.125）剝開層層皮相，我們立刻察覺到了整套社會關係的存在，尤其是「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p.130）（後兩句譯文取自吳家駒《資本論》中文本）。

45

放在更一般層次來看，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包括了大量失去了生產工具的生產者，他們必須出賣勞動力給擁有生產工具的階級，這個階級則由分立的公司組成，在種種不同的商品、勞動、原料與資本市場中，彼此競爭。競爭的驅力逼使這些公司從生產者身上汲取大量的剩餘價值，增加資本積累。但究竟勞資關係是些什麼，又造成了什麼後果，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此有許多辯論。但總的來說，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傾向於認定資本主義的資本／薪資勞動關係，造成了勞動的日愈機械化、資本的集中及積聚（centralization），以及定期危機，就後者而言，最顯著的很可能是「汎層、過度生產的傾向」（over-production）（Mandel in Marx, 1976a: 82）。當然，我們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及其中間偏左的追隨者的政治經濟學裡，已經看到了這個觀點的種子。然而，直到馬克思出現以前，沒有人涉入如此之深，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僅止於皮相，只看到了它的力量，認為它所造成的世界是自然天成，理所當然，馬克思則穿透表層，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行進實務，雖然各個動力彼此搭配成套，但根本上卻也相互矛盾，因此也就不能穩定平衡。

對於這個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歷來已有許多，其中對傳

播研究特別重要的一點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分析，還不夠深入。這並不是說馬克思沒有體認到經理人資本主義的時代及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已然崛起，對於馬克思的這個批評雖然普遍，卻是誤解的。對於具有同理心的批評，如威廉士 (Williams, 1977)、布西亞 (Baudrillard, 1981) 與史麥塞 (Smythe, 1981)，以上誤解所造成的後果，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倒是以本質論或狹隘論來審視勞動的觀點，造成了更大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非常注重勞動這個概念。在他的早期著作，以及《大綱》（與《資本論》的關係密切），馬克思已將勞動視為是具有廣泛內涵的概念，它影響了人們構成自己與歷史的所有社會活動。不過，即便是在這些著作，馬克思強調的是勞動的工具及生產性質，而不是它的表達的或構成的屬性。《資本論》更是透露了更為生產主義者的勞動觀，為馬克思辯護的人說，這大抵是因為這部書的宗旨，在於批判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就是日愈將勞動窄化，使勞動只具有工具—生產者薪資關係的性質。然而，以這個方式來理解勞動，主要只將它當成是物質活動，並且將它窄化為薪資體系，那麼，其他物質行為與實務就被當成是非物質了，傳播、溝通、文化、語言與社會再生產等等，就被當成是從屬於物質基礎，也就是根據勞動而產生的物質基礎，或者，在極端的認定中，它們就變成是一種上層結構，反映了這個物質基礎。哈洛薇 (Haraway, 1991: 132) 認為，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體認勞動是包括了人類生產自己的所有活動，他們最強調的還是維持生活所需的生產工具，因此若就性別／分工等等理論的營建而言，這個觀點最多也只是提供了一個起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點目標之一，若是要藉由批判的眼光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交流，那麼，它就必須展示傳播與文化何以能夠說是物質實務，何以勞動與語言彼此構成，何以傳播與資訊是相同社會活動的不同辯證面向。

保守主義的批判

十八世紀後半葉橫掃歐洲的社會與知識巨變，使得英國保守主義哲學家艾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1910, orig. 1790: 73) 說，「任俠的騎士時代，終究已經一去不返。詭辯家、經濟學家與算計者的時代，繼起降臨，歐洲的光榮永遠消散」。柏克認為，法國革命不但未能達成政治上的鴻圖，它在知識上，也是失敗。對於他或其他保守主義分子（如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來說，法國革命確認了啓蒙時代的觀點完全失敗，所謂宇宙是一個偉大的理性機器，有如時鐘，可供人們理解、安裝並使之趨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已經是失敗的觀點。這場革命假借理性、民主與自由之名，但卻帶來了恐怖與威權。根據這個觀點，社會不是機械，容不得拆解與裝置，社會是一個脆弱的有機體，由傳統與智慧聯繫凝聚。

倡導政治經濟學的人認為，這個研究取向可望改善人的物質或知識生活，但保守主義者這個反現代主義觀點的原型，一點都不這麼以為。事實上，卡萊爾是第一個將政治經濟學冠以「讓人喪氣的科學」之頭銜的人，他又加上一句，它比「豬的哲學」好不了多少。若是加利略與牛頓的大鐘無法服務社會（究其實，它只能添加傲慢，因而鼓動了註定失敗的革命），那麼，受它鼓舞而創造的經濟模式，同樣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義者認為，所謂個人爲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會理性地設法使自己的財富擴充到最大，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的假設，根本不能成立。斯密所說的肉商、酒商或麵包師父爲了自己的利益，也有可能驅使他們自相殘殺，導致毀滅。剛好相反，財富從有機的秩序中產生，人們生活在此秩序中，將對傳統保持敬重，並且能夠清楚認識自己的社會角色，也能夠得到道德基石，驅動人們完成道德使命。保守主義者認為，替代他們方案的其他方式，縱使在短期內能夠收到效果（而法國革命已經足以顯示有效的

期間會有多短），但長期以觀，理性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只會是社會統合的脆弱基礎。

推至一個極端，保守主義者的觀點將會支持所有的階層體系及差異，無論是基於性別、種族或階級所形成的階層或差異。這樣一來，由男人、白人與富有的人領導的秩序，也就形同自然天成。密爾、馬克思或伍氏 (Wollstonecraft) 等人主張以平等作為社群秩序的基礎，也就毫無置喙餘地。另一方面，保守主義者支持勞工階級的人數，卻遠遠超過大多數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人對勞工階級的支持。比如，卡萊爾 (Carlyle, 1984) 就建議將更多權力分配給直接生產者，他說這樣才能創造更多更大的社群共同意識，也才能在工作場所帶來更多的和諧。他並且支持政府介入，支持政府規範工作場所的健康與安全，他也支持政府提供社會資助，協助這個體系所排斥的人。在這些保守主義分子之中，沒有人會像馬爾薩斯那般，沒有人會聽任汗水與穢物在街道自由流動與擺放，沒有人會認為這是控制人口的一個方式。但他們同樣不歡迎社會烏托邦主義者，也不歡迎馬克思主義者。從表面上觀察，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典範，都體認到了勞工階級及窮人的需要，因此彼此似乎有了親合性，然而，若從根本上來看，它們兩相不合。對於保守主義者來說，社會介入有個底線，也就是改善社會變遷所帶動的最壞的後果。他們拒絕接受啓蒙主義的觀點，但社會民主派及馬克思對此深信不疑，並且努力要使其實現；保守主義認為，介入社會生活不可能根本地改變社會生活的安排及秩序，因此不可能帶來更為理性的世界。他們特別反對將介入的力量授與社會大眾，反對由其完成這個社會變革的任務。

從政治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

究竟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什麼時候轉變為經濟學，我們無法精確地找定決斷點。不過，大致是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已經出現了許多發

展徵候，它們聚合在一起，最後就化身成為新古典取向。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折，是邊沁的功利主義越來越為人接受，他肆意攻擊古典學派對自然法及權利的觀點。在《功利主義》這本書裡，邊沁 (Bentham, 1890) 論稱，能夠決定倫理與道德行為的唯一準則，是快樂與痛苦，不是某種莫名的自然規則，無論這種準則再怎麼有道理、再怎麼有根據。在他看來，哲學家的主要職責，是要研發一種「幸福微分術」，也就是以最大的快樂與最少的痛苦為準則，精確測量社會福祉，然後建議必要的社會變遷來達成這個目標。傑文士 (Jevons, 1965: 101) 在原本出版於一八七〇年的書中，刻意引述邊沁的著作，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功利、效用與私人利益的技術」，他這本書正是後來將政治經濟學重新命名的一本著作：

以最少的努力，滿足我們最大的欲求——以最少量的不可欲，生產大量的可欲——換句話說，使快樂極大化，就是經濟學的問題^⑭。

這樣子的經濟學也就與政治經濟學不同了，此時，經濟學已經把人類的需要或權利等等問題，無論是自然權或其他，完全拋到了九霄

⑭雖然邊沁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可以說是直接發生影響力的人，但邊沁 (1748-1832) 自己的著作，又是深植於前人的論述，並且我們大可認定，前人的立場，還要比邊沁來得強烈。不妨讀一下休姆 (David Hume, 1711-1776) 的評論，他說，要怎麼在圖書館篩選值得讀與不值得讀的書籍呢？

如果我們拿起了一本書，就說是關於神學或形上學的書吧，我們應該問，「它的抽象推理，與數量或數字有關嗎？」，無關。「它的實驗推理，與事實或存在有關嗎？」，無關。果真如此，那把書丟到火堆吧：因為這樣的書，空洞無物，只有詭辯，只有幻覺。（轉引自 McCloskey, 1985: 8）

雲外，因為這些需要 (needs) 或權利，根本就不可能決定。反之，構成經濟學實質內涵的東西，一定是要能夠以偏好表達的欲求 (wants)，也就是能夠在資本、勞動與消費財及勞務等市場上決定及測量的選擇。尤有進者，經濟學對於一件財貨的絕對效用，比較沒有那麼大興趣，它對最後一件物品的效用，或說這件物品的「邊際效用」，感到更大的興趣。一八七一年，傑文士在英國，孟格 (Menger) 在奧地利，以及稍後在美國的克拉克 (Clark)，都談到了這樣的概念，亦即任何財貨或勞務的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論的前提下，將會因為它容易取得之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決定所有財貨或勞務價值的標準，就是這個邊際單位的效用，最後也是最不可欲的這個單位。並且，邊際這個概念可以從財貨或勞務的需求，延伸至其供給。李嘉圖 (1772-1823) 就已證實，在農業生產的壓力持續不去之下，地主也就開發較不肥沃的耕地，因此也就增加了生產成本。稍後傑文士與他同時代的人，也在製造業注意到了相同的傾向：當工廠想要從機械及勞動擷取更多產量時，它的成本就會增加。結果是，供給面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邊際報酬率與邊際效用遞減。

許許多多的繼起者都為整合這些洞見而付出心力，其中，一般認為馬歇爾是完成新古典體系的人。若用最簡單的術語，這個體系的重點是，（財貨、勞務、資本與資本的）市場價格是由下滑的需求曲線（下滑的原因是邊際消費的遞減傾向）與上揚的供給曲線（上揚的原因是邊際成本遞增）之交會點所決定。在《經濟原理》這本書裡，馬歇爾將這個概念發揮成爲具有普遍性的論述，日後在新古典世界激起一道裂痕的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就說馬歇爾所創造的是「整個哥白尼的體系，經濟宇宙的所有元素都在其間各安其位，相互平衡與互動」（轉引自 Heilbroner, 1986: 208）。

馬歇爾的《原理》第一版於一八九〇年問世，後來陸續有新版本出現，直到一九二〇年爲止，貫穿其間的是兩個概念，作爲一個學科的經濟學，特徵盡在其中。第一，特別是受到華樂斯 (Walras) 著作

的影響，經濟學家關注的是社會秩序，也就是關注均衡狀態中，各個力量的描述。如同天文學家及物理學家確認了物理世界在本質上是和諧的，經濟學家的工作，也在於確定並描述各經濟單位的屬性，並交代它們的關係如何在財貨世界中，維持平衡。套用華樂斯的術語，整體的社會的運動，大抵就是個別單位回應外在環境的訊號而摸索前進的各種運轉。第二就是《原理》這本書的箴言，簡潔有力地陳述：「自然天成，若有變化，必不快速」。經濟宇宙就與牛頓的宇宙相同，是由小量的、點點滴滴遞增的變化組合而成，根據這個架構的分析，也就會認定外環的各種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有了這些觀念，那麼，達到傑文士那般清楚陳述的結論，也就近在咫尺，無須躍進：「經濟學若要成為科學，必須是數學的科學」（轉引自 Galbraith, 1987: 125）。

49

以趨之若鶩的姿態，經濟學想要成為數學的與求簡的科學，於是它也就把絕大多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特徵，抖落得一乾二淨。既然經濟學的旨趣在於研究均衡的狀態，它就集中在共時分析，它對政治經濟學對歷史的傳統旨趣，從此忽略了。既然認定制度的變遷與結構的轉型，無法以數學般的精準加以測量，經濟學就將自己的研究旨趣，限定在一般的均衡類型中，只有在此模式裡的幅度微小、一點一滴調整的社會變化，經濟學才願意再加以研究。這些經濟分析的方法，可望適用在所有的歷史時期。不過，一般認為，這些方法無法解釋歷史的轉型，特別是出現大落差及動盪的轉型期，經濟學的方法就更加無能為力了。

還有，既然在方法上求簡，經濟學就放棄了系統的關注，不去追求理解更大的社會整體。在這經濟學新科學的殿堂，沒有政治棲身的餘地，因為那個時候並沒有，而很可能也永遠不會有工具可以讓經濟學家以數學般的精準，檢視政治體系²⁵。經濟學家最好也把社會制度、心理動力及文化價值，一併放棄，政治經濟學論稱完整的分析，缺少這些便不成，但經濟學對此無意理解。即便是馬歇爾，這位具有

多方面興趣，與那些政治經濟學前輩及當代同仁都是涉獵廣泛的人，卻也還是呼籲將經濟學嚴格限定在「特定部分的個人及社會行動之研究，並且，這個部分必須要與獲取及使用福利的物質要素，具有最密切的關係」（轉引自 Clark, 1991: 92）。馬歇爾與另一些人不同，他對工作場所及社會的權力分布狀態，很感興趣，也有所評論，他們則將自己的研究，完全限定在瞭解稀有資源的分配，如何達成既定目標。雖然有此不同，但若論及經濟分析必須禁得起嚴格的數學考驗，以及科學客觀性的檢驗，則彼此並無差異。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學扯斷了自己與社會學、政治學及歷史學的聯繫。

這也意味著經濟學與道德哲學的聯繫，一刀兩斷。當時這些新興的經濟學家當中，資質最佳的人，都對他們已擱置一旁的課題，堪稱熟稔。比如，馬歇爾曾經研習倫理學，他的著作顯示，他對康德及黑格爾對道德問題的關切取向，瞭解剔透。因此，馬歇爾對於環境生態問題相當關切（「負面的外部效果」），他對市場機能是否能夠提供應該普遍提供的財貨（如教育），也有保留。雖說如此，馬歇爾與他的新古典學派同儕，還是根深蒂固地相信，經濟學只應該研究透過偏好所表達的欲求（wants），而不是由道德哲學所決定的需要（needs）。當然，他們還是會承認欲求的形成，仍有其道德立場，但這個立場卻與瞭解欲求的經濟重要性，毫不相關。所以，在道德關懷這個層次裡，我們也許會有自己知識上的或更大的人文主張，但若是我們將這些關懷放進分析裡，那麼我們所能因此得到的收穫，不會太多。

50 最後，層層剝離，將自己研究範圍越限越窄的經濟學，也就在這

⑤ 傑文士承認，「說到政治啊，我得承認，我是一頭霧水」（轉引自 Heilbroner, 1986: 184），他的這番坦白，道盡了許多新古典陣營者的心聲。了然於此，我們對他建議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我們這個科學的複詞名稱，實在又老舊又麻煩」的說法（轉引自 Clark, 1991: 32），也就不以為怪了。

過程中，把社會實踐的題旨，束諸高閣了。如同其他學科，經濟學也是一天天地建制化，在大學裡安身立命，同時也受到了學術分工的束縛，必須服從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這一切所造成的結果是，學術生活與社會運動及知識分子的公共生活，也就可能越行越遠了。有些人，如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韋伯倫，抵擋這個趨勢，也多少取得了成功。但更典型的情況是，學院人就在相對舒適的大學環境裡，安渡生活，至於那些可能引發衝突的人與事件，那就隔離得遠一些才好。總之，購買數學及科學正當性證件的代價，非常之高：政治經濟學，盡入塵封；整合歷史、社會整體、道德哲學與實踐，使它們與研究及知識生活的意義，發生關聯，也盡入塵封²⁶。

雖然如此，但很重要地是，我們在評論經濟學的早期歷史時，應該避免將它只當成是今天景象的前期種子，雖然我們知道有人會有這個傾向。並不是因為以前有傑文士、孟格、克拉克、華樂斯與馬歇爾，所以就有現在的山姆森 (Samuelson)、投賓 (Tobin)、傅立曼 (Friedman) 與蘇默思 (Summers)，這並不是必然的結果。從政治經濟學轉型到新古典經濟學的過程，充滿了齟齬與知識上的衝突。新古典思潮中，有一股流派並不願意放棄歷史及道德關懷，儘管它的分析，還是堅持在個人的自我利益、理性行動及自由市場機能的效率。這也就是所謂的新古典典範的奧地利學派，它的立論源發於孟格與賓

²⁶ 海布萊納 (Heilbroner, 1986: 211-212) 認為這是「大大的知識悲劇」，他反芻著它的後果：

假使，假使學院人對下層社會多一些關懷，假使馬歇爾有霍布生 (Hobson) 那種足以動人心弦的眼光，假使艾吉午 (Edgeworth) 能夠如同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那般敏銳察覺社會的弊端，那麼，也許，也許二十世紀這場大災難就不會突如其來，這個世界在面對這場激烈的社會變遷時，也許就不致於完全毫無準備。

一巴維克 (Böhm-Bawerk) 的著作，稍後則是馮·米賽斯 (von Mises) 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的著作。他們對於哈布斯堡 (Habsburg) 王朝長期而緩慢的衰微，保有敏銳的感受，他們對於更為貼近的階級衝突與社會主義的威脅，尤其有道德上的嫌惡，於是這些經濟學家義正辭嚴，堅稱純粹的資本主義自會有其長處。他們的著作擲地有聲，捍衛新古典主義的方法，並且提供自圓其說的理由，使其強求任何代價來達到純粹的市場經濟。確保最有效的資源（包括財貨、勞務、勞動、資本與理性行動所需要的資訊）分配，必須要受到供需的節制，這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提供。

新古典思潮的另一個主要學派，來自英國劍橋大學，它並沒有那麼心甘情願地接受個人主義的、市場為中心的取向。不過，就最根本的層次來說，馬歇爾傳統的繼承者，最有名的是皮古 (A.C. Pigou)、羅賓森 (J. Robinson) 及凱因斯還是信守這些分析單位，他們只是對市場失靈及外部負面效果更加在意，察覺市場失敗的範圍，已經大到讓市場以外的力量，有理由採取矯正的機制，包括政府的介入。皮古有關外部效果的研究，也就廣為引用，作為論稱有些造成淨外部成本或淨外部效益的公司，必須另外課稅或津貼的理由。凱因斯察覺市場無法確保全民就業，於是推定政府應該採取財政介入的手段。內在於新古典典範不同流派的爭論，在在顯示這個典範是有很多困境，一直到現在都還持續激升重要的問題。在本世紀之交，新古典模式的凱旋勝利，並沒有那麼容易看得出來。其實，在本世紀初的幾十年，或說到一九三〇年左右，新古典經濟學不怎麼討人喜歡，因為它似乎太過於學院、太過抽象、非關歷史，它對於大型、垂直整合財團的擴大，以致於幾乎吞噬了所有主要產業的競爭，一點都沒有辦法解釋。新古典模式自救的辦法，就是開發各種新的分析工具，提出新的反應來反擊右派與左派的攻擊。統計分析與經濟模型的成長，讓新古典學派有了堅強的工具，或說，同等重要的是，有了門面很好看的工具，它藉由這些工具對外展現經濟現狀，並藉由這些工具，模擬它的主要特色

在發生變化後，可能產生的衝擊^②。此外，張伯倫 (Chamberlin) 的著作也就壟斷式競爭，提出了看法；凱因斯堅持不均衡的傾向，內含於資本主義體系，又堅持資源的使用不足，這就使得某些新古典主義者不得不在其模式中，納進中間偏左派者的某些批評。再來，貨幣的數量理論有了進展，這就支撐了新古典學派中，貨幣主義者的崛起。這些林林總總的發展，就是貝爾稱之為「經濟學的黃金時期」的背景，大約是一九四七至一九七三年這段期間。這些年代正巧又是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繁榮期，單是這個巧合，就又顯示經濟成長同時也等於是助了新古典主義一臂之力，讓它手握保證狀，既解釋又代表了這段繁榮時光。

放在當今的政治光譜，新古典典範盤踞了中間及中間偏右的位置。站在中間的是凱因斯主義，它認為市場活動不必然產生商業循環，因此也就不一定會提供適當訊號作為商業決策的參考。在凱因斯及他的追隨者看來，經由這個訊號機制（也就是大量失業人口及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再來作決策的代價，實在划不來。根據這個觀點，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當時經濟政策的必然後果，它集中於儲蓄短缺的問題，它假定儲蓄會「自動」轉為具有生產效能的投資。凱因斯 (Keynes, 1964) 展示，這個情況在蕭條時期根本就不可能，而儲蓄無法轉為投資的後果，又會在整個經濟引起連環效應，使得不景氣更加惡化。凱因斯主義的取向因此主張政府採取財稅政策，主要是在蕭條時期，增加政府支出，以此抵銷消費者與民間企業的支出減少，最後這就會刺激投資。在短期的時候，這個政策會拉高政府的預算赤字，但稍後經濟成長將帶來政府收入的增加，也就能夠克服赤字

52

② 這些工具顯得乾淨俐落，手到擒來，姿態優雅，單是這個長處就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可不能忽視這個事實。誠如柏克 (Kenneth Burke) 所說（引自 McCloskey, 1985: 55），「向形式揖讓之後，也就是寓居此形式的內涵，準備登堂之日。」

的問題，並且，等到經濟再度擴張時，政府支出也就可以減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等形式的凱因斯經濟學對經濟學及經濟政策，產生了雙重影響^{②③}。一九五〇年代經濟持續成長，這就使得經濟學家認為，凱因斯的財稅政策是可以解決資本主義長期以來的景氣—破產循環 (Heller, 1967)。諾貝爾獎得主薩姆森 (Paul Samuelson) 所寫的教科書，擁有無與倫比的地位，使得凱因斯經濟學成為宏觀經濟分析的標準。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全球經濟衰退，激起新的震盪，經濟出現不景氣，但物價卻「同時」上漲的「停滯」現象，這個情況讓人不禁想起，何以經濟學會被稱做是「讓人喪氣的科學」，這也點燃了另一個轉向：新古典經濟學的轉向，以及政府經濟策略的轉向^{②④}。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中間偏右的經濟學家，如傅立曼 (Milton Friedman) 等人，不僅在經濟學此一學科，而且在政府經濟政策，就擴大了影響力了。完全與凱因斯主意相反，這些貨幣學派的人認為，闡述經濟榮枯的基石是貨幣政策，他們的政策建言因此集中在控制通貨膨脹，手段就是削減政府支出及提高利率。雖然他們承認緊縮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會造成較高的失業人口，但他們主張這個代價值得付出，因為若不如此，則通貨膨脹對世界貨幣體系帶來的衝擊，將會更為嚴重，傷害會更大。到了一九八〇年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採取了貨幣主義者的政策，並且透過他們所控制的國際組織，如世

②③ 不等凱因斯主義的形式，受到各國國內政治考量很大的影響。美國採取的是軍事凱因斯主義，她的政策將公共支出導引到國防部門。西歐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日本，加拿大與澳洲，則大致將財稅政策環繞民間部門而運轉，她們以此政策優惠本國公司以及本國社會福利政策，如全民醫療保健。

②④ 許多凱因斯主義者辯稱，他們的分析及政策仍屬正確，問題出在政府忽略了他們的處方，沒有在經濟成長期刪減支出。

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將這套政策強行加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的身上⁴⁰。如今，不等凱因斯主義及貨幣經濟學的政策，仍然彼此角逐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桂冠，這就令人思考，這個典範的當前狀態如何，而它對經濟政策的擬定，又有什麼價值。大多數對這些問題的根本思考，來自這個主流以外的思潮。

政治經濟學或異端經濟學的流派

53 當代經濟學展現了這幅矛盾景象：儘管內部有許多齟齬，新古典典範在經濟這個專業領域及公共政策，取得了雙重的勝利；不過，對它批判的人，卻已升高，舊雨新知一起來，加入了攻擊新古典的行列。下一個節次就是要探討這些不等的批評流派，其中有許多流派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基礎，迭有貢獻。以下就先檢討常被指為經濟學一般危機的說法，並檢討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的思考模式的根本差異。這些討論將奠定第三章的架構，也就是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討論。

新保守主義

主流經濟學既然盤踞了政治光譜的中間及右邊，則對它批判的人，似乎不怎麼可能來自於保守主義。批判自由主義的反現代主義者，大抵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右翼 (Oakeshott, 1962, 1975)。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察覺，來自保守主義的批判，仍然有兩股重要的流派，

④貨幣學派的不等形式，也有很多，同時也是受到本國政治考量很大的影響。雷根與布希主政時代的美國，似乎是採取了混和的策略，一方面升高軍事的凱因斯主義，他方面則在民間部門採取貨幣主義。

彼此經常競逐。其中一派的特徵，在於他們論稱主流經濟學過度謹慎而只集中在經濟行為的分析。他們被冠以不同稱號，如公共選擇理論、理性期望學派、新或實證政治經濟學，他們企圖將經濟分析的原理，適用在所有形式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活動 (Stigler, 1988)。比如，史太格勒 (Stigler, 1971) 與威爾森 (Wilson, 1980) 就鋪陳了架構，作為分析政府的規範行為之用，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將規範視為一種組織的市場，政府官員捕捉了這個機會，想要透過更大範圍及更多的規範來增加他們的收益，即使這些作法限制了極有價值的資訊之使用，但只要官員能夠從中使自己的收益極大化，他們在所不惜。解決官員自肥辦法的一個方案，在一九八〇年代相當流行，就是大幅減少規範，於是也就能夠消除國家對競爭活動的箝制。近幾年來，這種想法越發地橫衝直撞，它開始應用在關於家庭、性別與性慾的討論 (Posner, 1992)。這套相同的論點，被用來解釋領養兒童的人所需等候的很長期間及「官僚形式作風」。它提出的解決方案，並沒有什麼不同。根據普私那 (Richard Posner)，這位在雷根總統時代被提昇至美國聯邦法官的經濟學家，我們必須追求效率，因此應該為孩童的領養事務，建立一個市場，他稱之為「父母權的買賣」 (parental-right selling)。根據這個觀點，新古典經濟學實在是太過膽小了：市場行為及邊際效用這些訓示，具有普遍根本的效力，可以適用在所有的人類行為。這樣的說法，更是能夠以更具有體系的方式，與斯密的目標對話哩，安德森 (Anderson, 1988) 稱之為「第一個經濟帝國主義者」的斯密，當年已有預見一般經濟科學的眼光。

來自保守主義者另一翼的批判，可以說是一種「統合者」 (corporatist) 的立場，最主要的代表是尼斯貝 (Nisbet, 1986) 與柯理斯托 (Kristol, 1983)，他們對前面那種批評，在某些方面頗不以為然。雖然這一翼的批判，並不完全協調，不足以自成一派，但它對新古典學派的各種抨擊，有個共同點，它認為新古典典範忽略了政治經濟學之中的「政治」。最緊要的是，他們認為，保守主義者為了它的科學證

書，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使得政治的討論，完全免脫他們的掌握，投入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懷抱。公共選擇理論是已經嘗試重新搶回這塊陣地，但統合者認為，它又過度相信個人主義及契約論。所以，取代個人主義的方案，就是將社會視為一個許多社群組合而成的集合體，這些社群有自己的有機規範秩序，其中經濟活動只不過是一種。社群中的個人並不是以理性期望的方式指導其行動，反之，個人參照社會風俗習慣（包括脫軌行爲的定義），而這些風俗經常又與經濟邏輯不怎麼相同。因此，這種形式的保守主義思想所要建立的政治經濟學，必須確認什麼是傳統社會禮俗與習慣，確認什麼是市民的德性，然後以政治手段介入，支持這個禮俗的道德價值。這個取向的人採取的是統合主義的某種保守版本，它認為合適行爲的最佳導引，是由各個社會制度的精英所設定的標準。公共選擇理論那種醉心於「創造市場機能」的熱勁，在這裡降了溫，並且經常遭到政治保守分子的抵抗，因為在他們眼中，它是對有機的道德秩序的侵擾，而且往往是激烈的侵擾。

這兩股保守陣營各自秉持立場，但卻都認為經濟世界與政治世界，可以涇渭分明。前者一切以效用為馬首是瞻，後者是禮俗與秩序的家園。新的實證政治經濟學的成長，標誌了對此分立的不滿，也標誌了這些立場不但與主流經濟學有所衝突，它們彼此也會相互抵觸。所以，代表這個實證政治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以及他的追隨者，雖然想要創造「市民宗教」，但前頭的王國，可能一點都不平靜哩。

制度經濟學

左派的異端立場，主要是從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取向，汲取論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主義者的不同，在於它主張經濟體的組織的結構，才是主宰生產、分配與交換財貨及勞務的動力，不是市場

機能。分析組織的結構就必須一舉包括：制度史，科層活動的社會學，評估科技的限制與機會，社會風俗習慣、法律及文化對價值的社會建構之影響。制度學派明白表示歷史分析及整體觀點的必要，它企圖取代已經把自己委身於求簡、數學精準及科學正當性的新古典經濟學。就其最鮮明的色彩來說，制度學派的典範還不只是以此標準（制度的限制及禮俗）取代彼標準（市場、價格就是價值），它所提供的是完全不同的認知論，結合了德國史學思考（如韋伯 Max Weber）與英美實用主義（如杜威 John Dewey 論社會價值與實際的行動）。

55 制度學派的論述，早期主要是由韋伯倫 (Thorstein Veblen)、艾瑞斯 (Charles Ayres)、卡門 (John R. Commons)，以及米契爾 (Wesley Mitchell) 完成。他們每一個人（但尤其是韋伯倫）對世界的描述，對於新古典學派的世界來說，簡直就是奇景，但卻是他們的常景。當時正是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期，大型的托拉斯與壟斷企業縱橫天下，似乎正在嘲諷位居新古典宇宙核心的競爭市場模式。韋伯倫的《有閒階級論》（1934，原版 1899）直搗黃龍，論稱消費者選擇的根據，既不是理性，也不屬常識。相反，消費者的決定，根據的是深層入裡的不理性因素，往外表現就是競相模仿，使自己取得某種象徵地位，也就是我們稱之為「顯要性消費」的行為。韋伯倫特別質疑勞工階級及企業領袖，認為前者想要模仿而不是推翻他們的老闆，後者的「功能，不是製造財貨，而是要設法讓川流不息的產出中斷，以便價值發生浮動，讓他得以混水摸魚，從中得利」（轉引自 Heilbroner, 1986: 236）。他的想法可以上溯至聖一西門，論稱機器與工程師最後必定勝利^①。卡門及他的追隨者並不同意這個概念，他們致力於瞭解作為集體行動之工具的制度，究竟與科技有些什麼關

① 韋伯倫對高等教育沒有什麼信心，認為高教既無法瞭解他的分析，也不會參據他的分析而行動。他另外一本書《美國的高等教育》的副標題是，「論徹底的腐敗」。

係。不過，他們多少都同意，新古典典範根本沒有抓準當代經濟最重要的一些特徵：競爭的潰敗與壟斷的成長，欲求與價值均為社會建構，以及科技創新將帶來的轉型後果。

當代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最佳代表，可以說是高不來士 (John Kenneth Galbraith)、果登 (Kenneth Gordon) 與史陀曼 (Walter Strassman) 等人的著作。當然，高不來士的著作擁有最多的讀者，部分原因是他的寫作就是設定在更廣大的公眾，他的行文有味，總像加了胡椒，智慧中帶點辛辣，韋伯倫在世都會欣賞¹²。高不來士也使得歐陸版本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得以更為普及，最佳的例子是熊彼得的著作¹³。高不來士的著作延伸了韋伯倫對消費的分析，新古典學派有個假設，認為市場表現出來的欲求，具體展現了消費者的主權，他猛烈攻擊之。《富裕的社會》(1958) 是檢討廣告工業如何影響欲求，
56 檢討廣告如何從社會面建構欲求的早期著作之一。或許更重要的是，高不來士在《新工業國家》(1967) 這本書再次返回了制度學派的傳統興趣，也就是檢討科技與結構的關係，他稱之為「科技結構」(technostructure)。它的意思是科層組織結合了技術的與組織的力量，使得企業公司能夠利用它們的規模與勢力，控制先前的自由市場。當代的其他制度經濟學家，如包丁 (Kenneth Boulding)，則集中在分析科技結構的一個特定單位，也就是勢力龐大的軍事—工業複

¹² 高不來士的文氣，從以下他對當前經濟學教科書關於個別價格理論的評論，可見一斑：

坦白說，現在的經濟學家，如果太過專注從前被稱為價格理論的東西，他們未來將縮成公共雕像，高度不及凱因斯的牙醫。(Galbraith, 1987: 289)

¹³ 許許多多學派都聲稱，他們繼承了熊彼得的學說。熊彼得留下來的著作非常龐大，並且曖昧得讓想要加以歸類的人，為之束手。他說資本主義之發展，必然的後果是經濟集中及科層形式化，制度經濟學家宣稱承繼了他的這個觀點。

合體的成長，他們也分析有哪些結構設計，可以使經濟勢力不如此集中。然而，總的來說，所有的制度學派者都有個特徵，區隔了他們與新古典主義者及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制度學派認為，好壞不論，但科層組織擴大自己的權力，使之走向極大化，才是推進經濟活動的更大的力量，不是利潤的極大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許多流派，通通批判新古典主義。筆者深知本書屬於鳥瞰性質，無法窮盡，因此這個節次只介紹幾個主要範例，它們都受到不等馬克思主義傳承的啓發與影響。巴藍與史威濟 (Baran and Sweezy)、孟德爾 (Mandel)，以及法蘭克 (Gunder Frank) 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均直接明顯承襲自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們大致都採取了決定論者的知識論，鑽研的範圍包括了勞動價值論、階級剝削與鬥爭、經濟權力的集中、帝國主義及危機。它對新古典主義展開攻擊，批判它無能處理社會變遷的問題，最多只能論及一點加一滴的改變。他們認為，從封建社會轉型至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都代表了經濟體制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而新古典主義對此視而不見。他們也指責新古典主義者，抨擊它專只會創造窄化、技術為本的知識，對於更大的社會整體之研究，完全無力檢查，也就對國家及階級鬥爭等課題，不聞不問。還有，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核心，既可以說是專業性的，也是道德性質的，這就是關於不理性的分析（「分配」給銷售商品的資源，多於分配給教育的資源），以及關於剝削的分析（在第三世界是絕對的剝削，在工業化國家是相對的剝削）。

這些倡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在一九五〇及一九六〇年代的貢獻，相當重要，不僅就其知識本身來說是如此，當我們想到當年所有這些人，都生活在冷戰時代，許多人都認定他們站錯邊，經常

加以攻擊想使他們閉嘴，就更能體會他們的處境。一九六四年巴藍去逝，當時他幾乎是美國學院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④。然而，日後隨越戰、民權運動、女性主義及學生運動所徵示的社會動盪，對於許多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復甦，大起作用。就在巴藍辭世之後四年，也就是喧囂紛鬧的民主黨一九六八年年會以後，一些美國研究生發起了組織，成立了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 (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RPE)。聯盟在整個一九七〇年代都維持成長，在一九八〇年代新保守主義者當道的時候，也都維持大約一千位的會員，聯盟的一位會員說，它已經成為「學院中歷史最久也最大的左派學科團體」(Miller, 1992: 4)^⑤。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承裡，有人繼續深化並擴充《資本論》的適用程度與層次，另有些人企圖在根本上重新思考《資本論》及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巨量論述，至於到底二者如何劃分，並沒有絕對清楚的界線。以美國的情況來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以及它出版的書籍，大致說來反映了前者。雖然它對父權與環境生態的危機等等，同樣也有分析，但《每月評論》偏向於集中在「分析階級」(資本的結構與運作、階級分裂的性質及後果、勞動過程與階級鬥爭等)，以及探索「資本主義與依附的問題」(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軍事議題、階級壓迫與依附國家的鬥爭等)。

這個傳統馬克思主義及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橋樑，是「世

④在巴藍走出人生舞臺那一年，有位朋友如此寫著，「自稱是開放社會，但它的權勢建制，顯然無法容忍學院或其他地方再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自居，巴藍一走，幾乎已把自稱是開放社會的門，完全關閉了起來」(Miller, 1992: 4)。

⑤既然有此普及程度，主流媒體也就注意到了它的進展，但卻偏愛突出激進分子在轉變中的世界所做的調適。《商業週刊》不是這麼問的嗎？「若是在歷史站錯了邊，你會怎麼辦？」(Mandel, 1991: 78)。

界體系論」(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這個立場結合了法國年鑑史學派的物質歷史分析(先驅人物是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1975)及美國華勒斯坦的全球社會學(Wallerstein, 1979, 1991)。支持與對此立場有所批判的人都體認，物質論的歷史觀及廣泛的社會整體觀在世界體系論占有核心地位。這些觀點緊密交織在一起：歷史的進展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則由一個國際階級體系組成，包括了一個核心—邊陲的權力階層、一個國與國的體系，以及一個世界市場(Chase-Dunn, 1989)。大致說來，世界體系的理論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的核心要素，包括一般化的商品生產、主要生產工具的私人攫取，以及薪資體系。由於早期的時候，他們被批評為忽略了階級分析，他們也就逐漸將許多具有核心意義的階級衝突(包括工作場所、國家及核心—邊陲關係)，納進他們的分析架構並加以檢視。雖然這派學者的晚近著作，對於文化、傳播與資訊科技等等概念，有了檢討的意願(Wallerstein, 1991)，但比起其他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他們對這些領域的著墨，仍然少了很多。

新馬克思主義經常憑藉其以批判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所對話以後，發為對於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Cohen, 1978)整合了政治哲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真正是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的精神，它批判新古典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捍衛，不是因為這助長了不平等，而主要是因為，即便資本主義已經可以減少勞動時間，資本主義卻不此之圖，反而執迷地選擇成長。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核心價值遭到他們的攻擊，原因不是其體系沒有提供安全網(它是提供了)，而是這個體系無法確保人們擁有追求自由的自由時間。

另外一種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另有影響來源，它認為市場機能是有其長處，但它仍然排斥資本主義。諾夫(Nove, 1983)與米勒(Miller, 1989)所致力探求的是「市場社會主義」，認定這是一種泯除勞資區分的社會組織形式，由勞工擁有的公司在市場體系中運

作，取代了擁有生產工具的階級雇用失去了生產工具控制權的階級的體系（亦參見 Bowles and Gintis, 1986）。這個陣營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裡，激發了相當的辯論 (McNally, 1993)。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的一位主要學者 (Cohen, 1991) 認為，批判市場機能，指其帶來效率的欠缺及生產的無秩序，對於新古典理論家來說，不是致命的批判，因為他們能夠充分加以回擊。儘管如此，柯亨論稱，更為明顯的是，就過往的歷史來看，市場機能導致了結果的不公不義，市場機能對人們動機的預設，實屬低貶了人的品質³⁶。

相關的辯論也包括了統合結構及勞動過程的重要性，究竟如何。新古典主義者認為統合集中只是亂象，可以解決。制度學派認為這原本就是資本主義的深層結構，但透過國家介入管制（如反托拉斯法及另設獨立機構規範）則可以矯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認為集中現象的出現，只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特定階段以後的必然邏輯，它正就是危機的指標。新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對於經濟集中的意義，究竟如何看待，比較沒有那麼確定，關於「後福特主義」、「彈性專殊化」以及調節學派的調節模式等說法，十足反映了這個狀態。

這些辯論都是其來有自，論者將全球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看在眼裡，有了各自的想法，於是對於生產科技、工業組織及世界市場等等的轉型，也就發為論述。這些論述之一認為，資本主義刻正歷經深刻轉型，從大量生產移轉到工藝生產、「彈性專殊化的生產」，皮我與薩八的著作是最佳的代表 (Piore and Sabel, 1984)。這個轉型所涉及的生產體系，以迅速移轉以及多樣範圍的產品為基礎，產品已經顧

³⁶ 柯亨認為 (Cohen, 1991: 18)，對於任何社會位置的人，市場機能都是一種低貶：在採取市場機能的社會，任何生產活動的立即動機，通常都混雜著貪婪與恐懼，兩者比例的大小，就與一個人的各種市場地位相勻稱。若是貪婪，其他人在我們眼中就是增加我們財富的可能來源；若是恐懼，其他人在我們眼中就是威脅。

客化，分成特定的許多市場區隔，並且使用精密的（「智慧的」）機器，加上可以調整的技術勞動力。克里斯多佛森與史托波 (Christopher and Storper, 1989) 認為彈性生產對於媒體產業亦產生了影響，他們認為這個過程削減了好萊塢主要製片公司的優勢（論證這個看法錯誤的批判，參見 Aksoy and Robins, 1992）。

不同版本的彈性專殊化論點，都已經接受資本運動的發展，結果常是偶然的，與此同時，它們也都企圖掌握資本主義自有系統發展的本質，雖然後者的探討在其文獻中，似乎是消失了。在這些版本中，更為引起注意的是「調節」(regulation) 學派 (Boyer, 1986; Lipietz, 1988)，它檢視了資本主義連續發展的階段，其分析架構結合了積累政制與調節模式。積累政制是穩定的，是可以複製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而產銷雖然以全球經濟為範圍，但各個國家經濟另有自己的特色，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與她在國際分工所占的位置不同。這個學派認定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共有四個主要的政制：外延 (extensive) 積累、泰勒主義 (或內涵 (intensive) 積累而無大眾消費)、福特主義 (或內涵積累並且大眾消費)，以及刻正崛起的後福特主義的政制，其定義尚不明朗。調節模式則由制度的與規範的機關組成，它將確保個別層次及團體層次都能調適於主流的政制。根據這個看法，資本主義目前正歷經從壟斷式調節至彈性調節的過渡階段^⑦。

在彈性專殊化陣營當中，另一些有別於調節學派的人，則更明白認定我們現在已經轉向「後福特主義」時期。這些人的著作受到激進地理學很深的影響，它企圖整合後福特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學術論述，併合二者而提出全球空間流動轉型的分析：物質性的、資訊性的、文化性的 (Castells, 1989; Harvey, 1989; Thrift, 1987)。另

^⑦ 包里士等人 (Bowles et al., 1990) 在分析積累的社會結構時，提出了美國版本的調節理論。布洛克 (Block, 1990) 的論述則是更為社會學的取向。

外，包括熱衷於政治學制度取向之文獻的人也論稱我們現在已經從很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要過渡到「組織解體的資本主義」(Lash and Urry, 1987)。最後，傅理曼與他的同僚(Freeman, 1984)的研究著作則更爲明白地集中在經濟理論，特別是論述熊彼得所說的科技與制度變遷之關係，以及孔卓提夫(Kondratiev)的「創新的長波理論」。依據這個說法，我們現在正在進入第五波的創新，在前主導的是新資訊與傳播科技，如此一來，這個說法也就含有幾分後福特主義的特色了(參見 Hall and Preston, 1988)。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至今仍然持續鼓動了許多不等立場的政治經濟學。雖然它們有很多的差異，但大致說來，他們都同樣信守歷史、社會整體觀、道德哲學，以及實踐。本節次鳥瞰最後所要論及的女性主義及環境生態政治經濟學，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有強烈的親合性，但二者與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差異，又已經大到相當程度，值得我們分開處理。我們應該可以說，二者都成長於當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二者對新古典學派也都提出了實質有料的批判。

⁶⁰ 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

瑪莉·布萊恩(Mary O'Brien, 1981)在《再生產的政治學》這本書中，陳述女性主義的學術，要能與女性主義運動的廣度，能夠匹配。作此陳述時，她也就提出我們已經相當熟悉的判準，以此區別她與主流分析的差異：

女性主義的論述不能應和於當前社會科學所盛行的學科分裂，女性主義學術也不能耽溺在「就是這裡就是現在」的那種經驗主義，致而忘卻了歷史。(p.196)

她的論點還不止於此，她主張要有「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這樣

的統一也就超越了政治經濟學的侷限」。華羚 (Waring, 1988) 對她的回應是，目標可嘉，但無法達成，除非發展已有兩千年的政治經濟學，最後能夠將「家政的操持」(household management) 的科學納入，針對那些主要是家政勞動的議題，加以研究。要緊的是，並不是政治經濟學不夠經濟，而正好相反，是政治經濟學還沒有充分處理經濟議題，沒有將世界大多數女性的工作納入研究。華羚的思考對於型塑自成一格的女性主義經濟學，自有貢獻，但誠如她自己指出的，這當然算不上是新的批評。就在十九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姬爾門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966, 原版 1889: 235-236) 就對新古典主義展開攻擊，她指責「這個不成熟的政治經濟學」，根本就是「幼稚地男性中心」：

他們假設「經濟男人」除非必須，否則什麼都不做；若是做，則只是為了逃避痛苦或得到快樂；並且，這個經濟男人必然能拿什麼就拿什麼，必然使盡心機，能騙就騙，能贏就贏，而如果必要的話，他乾脆就摧毀敵手。他們一點都不懷疑這個假設是否能夠成立。

主流經濟學，以及除了少數例外的異端經濟學，大抵忽略了這些論點。女性主義經濟學從社會參與而來。比如，華羚開始的時候是從事社會運動的工作，後來再因社運而進入紐西蘭國會，負責評估聯合國主計系統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的提案¹⁵。華羚很快就察覺，這個系統根據的是市場及交換價值的原則，它「支持了，並且把婦女勞動、環境價值等等都抹煞了」(Marilyn Waring, 1988: xx)。比如，根據這個算法，若是把幼童送進外面的組織、使用在市場買來的燃料、在工廠處理或製造食品、經過管

¹⁵ 設計這套主計系統的史東爵士 (Sir Richard Stone)，為此獲得了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獎。

線輸送的水源，以及在餐廳用餐或在洗衣店洗滌等等，都可以列入計算產值。但如果尚比亞有位婦女把這些工作都包了下來在家裡作，那可不列入計算。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將男人在工作場所八小時一天的做工，歸類為「活動的勞工」(active labour)，但他的妻子在家裡內外每天花了十一小時打理，那也不列入計算。她變成只是「幫助家長，讓家長能有職業而已」(Waring, 1988: 29-30)。

爲什麼會忽略家政勞動呢？爲此辯解的人的典型答案是，概念上與方法論上，是有些疑難。但女性主義的批判則指出，政府不是把更多的精力，花用在解決概念上與方法論上的疑難，以便能夠計算犯罪、毒品買賣與娼妓等地下經濟活動嗎？怎麼就不用同等精力解決家政與養兒育女的計算困難呢？一九三四年，蕾德 (Margaret Reid) 關於家政勞動的著作，就已經提供了如何計算的準則：任何我們可以購買或花錢請人代勞的勞務或產品生產活動，都是經濟活動，無論是否有財務上的交易發生。然而，世界各國經濟學界的實務及政府政策的計算，反映的仍然是一九六八年《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的定義，它對「勞動力——定義與測量」是這麼說的：

家庭主婦不列入勞動力計算，因為這類工作不屬於工作組織或生產的體系。還有，即便將這些工作列入勞動力計算，對於政策制定者解決重要的美國社會經濟問題，也沒有幫助。

但構成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究竟是些什麼，見解相當歧異。女性主義經濟學旨在發掘男性控制體系之下，所謂經濟的意識形態面向，它將工作視爲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產物⁴⁹。最近這些年來，一個重要的抨擊是針對「家庭薪資」這個概念而來，它表面上是計算了婦女的勞動，也就是男人的薪資顯然有一部分是要用來生產與再生產家人的所需。根據這個概念而推演出來的改革，因此就會主張擴大家庭薪資的

範圍，而不是分開計算家庭中，不同勞動力的所得。巴瑞特與麥因塔許 (Barrett and McIntosh, 1980; 亦見 Seccombe, 1974) 率先開砲，她們指出，這個概念根本就歧視味道十足，因為它計算婦女勞動的方式，是將這部分勞動間接透過婦女的丈夫而來，但除此之外，這個概念也無法在經濟基礎上站穩腳跟。在資本主義之下，婦女一直就是不被給付的勞動力，而男人無論是否有家人，得到的薪資都是相同。到了現在，家庭薪資這個概念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已發現，大多數家庭單靠一份薪水，無法依持。不過，原來的觀念還是繼續存在，雖然婦女薪資應該不只是「零頭小錢」，但她們的薪資還是應該與整個家庭薪資放在一起觀察。這就是為什麼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宗旨，不僅只是要將以前被當成是「不具生產力的勞動」列入價值計算，而且還要將所有形式的婦女勞動，放到適當位置，不再如同先前的權力體系那般，只被化減為小於男性薪資勞動的價值。若能成功，就政治意義來說，女性主義可望完成解體的工作，現在這種環繞父權定義而來，由公共政策獎掖特定的生產勞動，將從此不復可再

62

⑩。

⑨ 女性主義經濟學在這裡又再次指出，雖然部分異端論者體認了工作的父權體系，但也僅止於觀察，再沒有進一步的發揮。比如，恩格斯 (Engels, 1972) 在檢討經濟關係的社會構成要素之時，一併也檢討了性別與經濟分工的關係，但隨即存而不論，因為他與馬克思相同，都是在追求牛頓式的願望，想要探查資本主義的律動規則。

⑩ 這些父權定義下的工作，包括所謂的工作福利政策：單親婦女若是選擇進入外面的工作場所，則可望受到獎掖，但若是選擇在家以母親身分照顧小孩則不算工作，她得不到幫助。

環境生態政治經濟學

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念茲在茲的是，父權制度的分析模式，顯現了相當的不理性，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像如何計算世界上大多數婦女的工作。環境生態政治經濟學同樣也在資本主義的典範裡，察覺了另一些不理性，在此典範裡，大量石油外溢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因為清理外溢的石油，需要大量經費花用在勞動與資本器材。若說生態事務對於經濟分析相當重要，則這個觀點一點都不新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特別是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著作，特別關注於土地的負載能力，因為他們當時對於人口成長的問題，相當敏銳。

如今，我們又再重新目睹這些觀點相率現身。新馬爾薩斯學者再度將人口動力引進經濟分析，他們又再度警告環境生態所能承受的成長極限。主流環境生態者，同樣也是想要防止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傾向，他們採取的手段，不是節制市場機能的過度發展，就是創造另一些市場，使得環境生態的價值，能夠更為淺顯明白；因此，就此而言，他們與主流經濟學家，並沒有什麼不同。信念更為堅強的環境生態者，對新古典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展開相同的韃伐，這由他們的「綠色經濟學」可見一斑：

這兩派都一心一意以工業成長為馬首是瞻，雙方都想擴大生產工具的規模，他們都認定滿足人們需要的最佳手段，是物質取向的倫理，他們也對科技發展寄以無窮信心。(Porritt, 1984: 52)

最後，我們還需介紹社會主義的環境生態學，這個取向大致是不同理論背景的鬆散聯盟，主要是企圖調和馬克思主義及女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個立場透過《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這個期刊而取得知名地位（亦見 Benton, 1989），它信守社會主義，同時也信

守環境生態主義，它論稱，唯有集體取向與決策參與，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特色，才能讓我們的環境生態健康長存。它更進一步論稱，若是要在社會主義者、女性主義者與環境生態者之間建立聯盟關係，那麼馬克思主義者淪於某種化約論的傾向，必須矯正，這種傾向「認定社會因素應徹底支配自然因素，最終將形同鼓動生物盡數滅絕」（Soper 之語，轉引自 J. O'Connor, 1991: 10）。社會主義環境生態者自覺有生物決定論的包袱，同時也在意會被扣上重新激起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帽子，因此他們呼籲政治經濟學應該要與一種新的生物學結合，而雙方攜手共進的基礎，在於從生態學與地理學的重要理念出發，分析焦點放在大自然之內及大自然與社會之間，物質所在地與物質交換的關係。這裡的理念是過程的生物學，若是引進結構，原則上也是著重在各種過程的結構，或者，借用當代地理學的流行用語，著重在流動的空間（the space of flows）。

63 社會主義的環境生態主義，可以說是擴充了政治經濟學對社會整體的理念，因為它納進了有機生活的大自然整體。因此，它也就連環地擴大了政治經濟學道德哲學的關注層次，使其道德眼光能夠從人類生活延伸到所有的生命過程。然而，社會主義環境生態論者，仍然體認只有人類是唯一能夠依據道德關懷而行動的主體，也唯有人類能夠以民主實踐的形式，統一概念與執行。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

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遭受了來自保守主義、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環境生態主義的批判，足見這個學科若還不能說深陷危機之中，至少已經是進入了紛亂騷動的局面。此情此景，與當年經濟學得意洋洋地君臨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的姿態，不可同日而語。本章就以此作結，綜合上述關於經濟學的不等批判，同時也界定政治經濟學當中，哪些差異能夠協助我們找出取代主流經濟學的方向。

我們從以上鳥瞰可以知道，關於什麼是構成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成分，歷來總有知識上的爭辯、鬥爭。這些爭鬥的結果，也就反映了，影響了社會中政治經濟力量的運作狀態。其中一個例子是，凱因斯經濟學回應經濟大蕭條而成長，它的政策提案又對西方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走向，發生了極大影響。我們可以說，相似的情況在一九七〇年代再度出現，當時經濟不景氣但同時通貨膨脹，於是有了貨幣學派的成長。我們的鳥瞰，集中在檢討經濟學面對的實質難題，特別提及了它的社會理論，著實不足，因此也就推動了替代視野的出現，於是政治經濟學的復甦應運而生。

經濟學選取靜態模式而加以描述，認為各種力量交會後，最終均處於平衡。經濟學所處理的變動狀態，均已經假定這些變動都在既定的制度關係中發生，並且都只是逐漸發生。但真實的經濟實務，如同更大的社會與物理世界，並不會因為學科如此認定，就輕易地受到限制。均衡只是可能結局之一，逐漸變動只是可能的形式之一，既定的制度關係也只是許多可能關係的一種。

有許多決定生產力的重要社會經濟因素，通通不在經濟學的考量範圍之內，包括了財團的結構及產權、教育與訓練，以及家庭背景。經濟學偏向忽略了權力與財富的關係，因此也就忽略了結構力量已控制市場的事實。經濟學家抵死認為市場競爭的結果，終將使壟斷力量為之受挫，聽到這些話，讓人宛如再次聽到托立米的追隨者，轟擊哥白尼的地動說，堅持認定不是地球環繞太陽運行。他們始終認為，壟斷與寡占屬於例外情況，有賴托立米式的調整，以便將這些例外情況納入競爭模式之中。批判經濟學的人則堅稱，經濟權力的集中，愈來愈大，終會使得經濟學的模式，瀕臨崩潰。

經濟學又認為，資訊自由流動，消費者藉此資訊而在市場登錄了他們的欲求。它論稱，每個人都有的需要 (needs)，以及獨特的及心理偏向的欲求 (wants)，二者的區分應該加以泯除，唯其如此，才能將所有的需求，視為欲求。批判經濟學的人則指出，經濟學最多只提

供了初級的理論，告訴我們欲求如何被創造出來，但最糟的情況下，它變成只是套套邏輯，只能告訴我們市場的情況，就界定了什麼是欲求，這個說法毫無用處。生產、行銷與慾望 (desire) 之間的複雜動態關係，不在經濟學研究之列。這些關係使得資訊的流動只能在特定結構中進行，使它們進入特定的方向。經濟學低估了行銷力量，足以建構人的慾望，它也低估了人類慾望的複雜程度。經濟學並沒有解釋慾望 (慾望就是慾望的選擇)，或者，它處理了，但只是將慾望化減為理性的選擇。稀少的資源迫使人們進行雖然痛苦，但卻是理性的選擇。對於這派人士對經濟學的批判，貝爾 (Bell, 1981: 71) 的結論說得很清楚，「這個享樂的算計本身，可以說是最為狹隘的文化內涵，定義人類行為，一方面忽略了傳統習慣相當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忽略了人類在道德上的反省能力」^①。這個觀點很重要，因為傳統與道德自有計算的標準，它們雖然與需要及慾望的關係密切，但它們的標準與欲求的計算格格不入，很多時候甚至就拒斥了欲求計算帶來的限制。

經濟學傾向於認定，市場是個人層次的互動所造就的自然產物，而不是將這個的層次的互動，視為只是社會活動的許多面向之一。我們因此可以說，經濟學誇大了布洛克 (Block, 1990) 稱之為社會「市場性」的東西，或者說，並沒有那麼多交易在明確界定的市場環境中進行。根據經濟學家的市場模式，人們的唯一動機論是工具性考量，也就是價格因素，這個特質則在商品市場中最為典型地展現，但實際如此發生的情況，遠比經濟學家所說的要少。連氏 (Lane, 1991: 6)

^① 貝爾 (Bell, 1976: 23) 認為，經濟學因為缺乏社會學取向，因此也就造成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之一，就是無法察覺，所謂的市場經濟，若是更貼切地說，應該是「資產階級的經濟」，意思是它的生產目標是個人而不是集體導向，它攫取財貨的動機是欲求，不是需要。

說，市場行為應該放在更大的行動心理學之中觀察，「市場機能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驅動『人類欲求滿足』的最大機制，但對於許多欲求來說，市場機能實在排不上最重要的舞臺之列」。還有，經濟學在企圖探索非市場行為時，就將它列入市場不完美的架構中，或者，經濟學最多也只是將非市場的活動，等同於組織科層，而我們在這裡再次看到，經濟學家會說正是因為科層因素的影響，造成了我們無法達到最好的結果。引入了這些市場不完美及次佳的概念之後，正統經濟學家也就能夠藉著擴充市場的範圍，化減非市場或組織活動。這就讓經濟學家自圓其說，認定社會福利只是個人福利的產物，而個人是決定他們自己福利的最好依歸。這樣一來，經濟學家也就對事實視而不見，沒有察覺市場機能的偏向之一，正是公共財的提供不足，但卻過度造成負面的外部性，如汙染河川。

65

這個觀點也沾滿了社會關係，造成市場概念的中空，變成非關階級、種族與性別，也非關其他形式的社會分工，雖然正因為存在著這個分工（如低薪勞動的彈性供給、未給付薪資的家政勞動，以及有利市場交易的欲求社會體系，它將欲求與需要的關係，以有利於市場機能運作的方式，組織了起來），市場活動才能得到這麼大量的社會支持體系。這個情況造成的後果，就是市場的成功、市場體系的平滑運作，也就被等同於社會成功，即便它的後果使得階級、種族與性別的分裂，更加嚴重，即便它的後果造成了社會生活的普遍商品化。反對這些後果的人，被當成是不理性動機的產物，而這些人最好也由市場機能加以馴化與矯正。市場機能若是失靈，那也只是反映了有待經濟學加以逆轉的現實。但誠如政治經濟學不斷堅定地主張，塑造行為及推動經濟行進方向的，不是價格系統，而是更大的價值與權力體系，經濟體系只是棲身其中。

異端觀點雖然很多，但它們大抵同意，經濟學的主要弱點，根本上都可以追溯到它對社會的理解，有所欠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我們可以將無法從科學角度理解的現象，全部抹煞，但抹煞之後，又

無妨於我們對經濟的根本理解。與這個主流經濟學對立的觀點則指出，這樣的科學空洞無物，它對複雜的權力、社會結構、組織行為及文化實務，完全不加理會，但卻自以為仍然能夠瞭解經濟行為。經濟學的起始點是個人，認定其觀點無分時間與空間，本來就是如此；政治經濟學的起始點則是個人由社會加以建構，認定其觀點的出現，有特定的社會時空建構因素。

還有人會把這個批判推向更深的層次；誠如貝爾 (Bell, 1981: 47) 所說，「總之，問題還不只是經濟學理論『之內』，是否出現了危機，問題更是經濟學理論本身，已經出現了危機」。根據這個觀點，經濟學理論出現危機的原因，在於它對社會的理論，認識不足，它認為社會只是所有個人的總合，認為人類行為是徹底的理性，認為各種資訊都自由地流通，認為市場機能最為能夠使權力分散、標誌了人類的欲求，也登錄了社會需要。但是，除了這些缺陷以外，經濟學理論「的」危機還要更深，原因出在它的實證主義及現代主義的根源。

麥勞斯基 (McCloskey, 1985) 在《經濟學的修辭》這本書中，詳細地批判了經濟實證主義。他來自於主流經濟學的訓練傳統，但他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形同殘廢」，因為他們所倚賴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用來研究宗教體系更為恰當，麥氏對此情況，深以為憂：

他們的信仰包括了科學主義、行為主義、操作化主義、實證經濟學理論，以及一九三〇年代的其他量化執迷。他們熱情地征伐，這些信仰強化為宗教儀式，到了現在已經號召了許許多多的修女、主教與大主教。(p.4)

實證主義的信仰體系包括了為數甚多的指令：科學的要點，在於預測與控制；理論也許有很多蘊涵，但只有可資觀察的部分，才可能與真實有關；什麼可資觀察而什麼無法觀察，界定標準是客觀的、可

以複製的實驗；判定理論為假的唯一標準，是實驗結果證明其為虛假，而且也只有這樣的實驗才能證明等等。還有，實證主義無比推崇客觀性，它把價值與事實一刀兩分，並且執迷於數學語言。根據麥勞斯基的見解，這種政制使得經濟學家的頭腦，木然枯萎，經濟學家於是「讀到歷史就厭煩，看到其他社會科學家就高傲，對於自己的文明懵懂無知，對於倫理之事絕不省思，對於方法也絕不反省」（p.7）。經濟學家方法論的這種取向，又與現代主義者的觀點，並駕齊驅，後者既無視於歷史，又凡事奉科學為上首，必恭必敬。再者，麥勞斯基論稱，異端學者（包括主流之內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及主流之外的制度學派與馬克思主義者）在檢討主流的實質缺陷時，放過了主流學派在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假設上，存在著更加根本的缺陷。

以物化的態度，信守這種麥勞斯基稱之為框框架架的方法論，奴隸般的伺候這種觀察得到的事實，造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後果：描述與解釋所可能有的豐富內涵，大多消失了。卡爾·巴柏 (Karl Popper) 也以這些理由，把心理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擯斥在大門之外。這樣一來，既然次原子物理學的主要構成無法觀察，豈不也要擯斥？若是恪守這個規則，凱因斯經濟學不也就會出線嗎？畢竟它的「洞見一直要到一九五〇年早期，也就是大量的新生代經濟學家已經信服了它的論述十五年以後才以統計公式表達」。麥勞斯基同意杜威的看法，認為這代表了「追求確定的心，戰勝了追求智慧的心」（p.30），他又同意博藍尼 (Karl Polanyi) 的結論，他說，如果嚴格執行這個方法論，「必定造成大量的低能」（p.17）。

我們可以論稱，麥勞斯基流於沈醉在他自己的修辭陣中了。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旨趣是要透過對其哲學根本缺失之揭發，達到拆解經濟學實證主義的目標，他反而忽略了經濟學這個學科與政治及經濟強權體系之間的種種聯繫。傳統經濟學並不因為經濟學家同意特定的研究及論述規則，就使得它成功。更重要的還在於，主流經濟學所提供的資訊、建言與政策，更能強化資本主義的體制。經濟學正統其實

也就是整套的修辭體系，這麼論斷固然重要，但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我們也必須將此學科放置在整個權力體系之內。

此外，麥勞斯基企圖以對話或溝通的認識論取代實證主義。他明白地論稱，「科學的科學是對話的修辭，不是探索的邏輯」（p.153）。更具有特定意義的是，這也就是說，思想的標準不是由外在的某些實體來決定，而是由彼此對話相互重疊，並且這些對話又符合了文縷縷的論述規則。就此來說，麥勞斯基讓人又想起了柏克（Kenneth Burke）（1969a, 1969b），他們都對修辭力量深信不移，認定這可以導入真理的對話。若是翻轉杜威的提法，我們可以說這樣的修辭，已經將追求智慧之心，拉拔到高過於追求確定的心。

67 這個對話取向的長處，在於它體認了知識形成過程中，社會傳播的價值。這裡的真實、真理觀，不只是以經驗上的方法，觀察可資觀察的現象；因為，根據這個見解，如果人們彼此的對話，達成了有意識的、批判的社會共識，那麼這也是真實與真理。這個取向的主要缺陷是，它淪為給予對話太高的位置，使得對話成為高過其他的社會實務。這樣一來，它也就將非對話的社會實務，挪出了注意的範圍，它所關注的反而是關於這些實務的討論。麥勞斯基急切想要取代實證經濟學的認識本質論，這可理解，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修辭的、對話的或傳播的本質論。還有，麥勞斯基也追隨了羅狄（Richard Rorty）與其他人的作法，他們的對話取向，最後都把對話的對象，僅限定在知識分子的世界。這就是阿馬德說的，對於他們來說，「如今的『理論』……等同於學術專業分子的『對話』」（Ahmad, 1992: 2）。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理論（包括左派的文藝批評）也就把許許多多不同的聲音（包括勞工），置諸腦後了，而原來左派開始對話時，是要以這些人為對象，服務這些人的¹⁰。

其實，描述這個情況的一個相當管用的方式，是取用傳播及資訊領域的隱喻。對話取向從傳播模式汲取養分，強調共享與合作。反觀主流經濟學取用的來源，則是尋找資訊及資訊處理活動的著作，兩者

並不相同。麥勞斯基的論述有個主要的問題，也就是他爲了反對新古典學派的極端信守資訊處理，他卻轉向了另一種本質論地信守於傳播溝通。如此造成的後果，也就是雖然麥勞斯基對經濟學的批判相當可取，但他用來加以取代的認識論也是片面的。確實，任何取向若是只想擷取傳播與資訊這組辯證關係的一邊，都只能說是片面的。這就是史麥塞所說的，傳播與資訊是相同過程的兩邊，以辯證關係相互構成。任何完整的認識論也必須包括傳播與資訊兩個過程，既要對話也要觀察。對話再怎麼有益，也都不能取代嚴格觀察的經驗。類同地，資訊追求與處理的取向，既然只集中在單一的蒐集與組織資料，也有流於忽略實體的社會建構之虞，包括忽略了我們對實體的評估。

他認爲 (p.320)，「美國學院的文化激進主義與任何美國本土的勞工運動，二者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存在過」，證明了文化激進主義完全沒有與布雷夫曼 (Braverman, 1974) 的論點產生任何對話，布雷夫曼論稱，人的工作過程在壟斷資本主義之下，愈來愈喪失體面與尊嚴了。我們在這裡還可以公允地加上一句，在布雷夫曼以後，政治經濟學對勞動的大量分析，對於文化激進主義也沒有絲毫作用。

68 完整的研究必須由資訊處理及傳播活動構成。它所使用的工具，必須要能代表及解釋社會實務，也要能傳達及闡述各發言者之間的對話，「並且」要能傳達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在談論這些社會實務。任何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都是在資訊與傳播的辯證過程中，相

⑫ 察覺了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及文學理論的鴻溝之後，阿馬德 (Ahmad, 1992: 5) 驚訝地說：

就以直到一九七五年為止的四分之一世紀來說——比如，從《每月評論》出版社開始算起——美國馬克思主義本身生產了頗多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與此相較，過去二十年，美國文學理論的驚人特徵，正在於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對它簡直沒有影響。

互構成的。

結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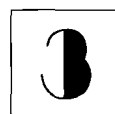
本章指出，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社會分析，視野遼闊而取向繁多，透過這個檢討，本章為下一章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詳細檢視，預先鋪好了場景。本章開始的時候，就已說明，政治經濟學的出發起點，是關於家政操持與社群經營的實務問題。究竟政治經濟學的內涵如何決定，打從開始就充滿了歧異，一方面有人主張它應該包括社會活動的完整範圍，另一方面，又有人寧願縮小它的範圍，只檢視經濟現象，並且只檢視可以使用數學論述形式來否證的命題，他們認為支付這個代價才有可能買到科學的證書。本章也綱要列舉了傳播研究所使用的兩組定義。一個強調的是掌理資源生產、分配與交換的社會關係，特別是權力關係；另一個強調控制與存活。

在陳述並評估這些定義以後，本章檢視了相互構成政治經濟學取向的若干核心特徵。這些特徵包括了社會變遷與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以及社會實踐。早在政治經濟學發源的時候，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啓蒙哲學家就已經以這些特徵作為分析的核心。隨著時間的與世界秩序的移轉，也因為與其對立的知識潮流對它們的挑戰，這些特徵的意義發生了變化。

再下來，本章隨即檢視了政治經濟學主要思想流派的發展，指出當初這個學科的演化，自始存在緊張關係，因為一方面存在著古典學派的取向，以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的著作為其張本，另一方面則有來自於有機保守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雙重挑戰。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這場鬥爭進入了另一些分歧，其中一方愈來愈取得正統經濟學地位，但卻放棄了政治經濟學的寬闊視野而遷就功利原則及實證主義的方法學，一方是許多的異端取向，包括了保守主義者、制度學派，以及馬克思主義。歷來，這些異端又對日後逐漸被冠以新古典取向的學

派，展開了廣泛的批判，不過，所謂新古典，其本身又只是不等特徵的綜合，它又有內在的派別爭鬥。近幾年來，標誌著女性主義與環境生態主義的視野，也已經加入了異端，成為其主要的取向。

69 本章的結論則總結了政治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批判，縮合其主要成分。這些成分包括了對主流經濟學的實質立論基礎，從理論層面及政治經濟層面加以評估。它們也包括了從認識論及方法論的基礎，對該學科提出檢討。後面這兩方面的檢討就使我們進入了傳播研究領域，我們從中指出，資訊—傳播的辯證關係，指引了另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方向。這也就是結合資訊處理模式的分析基礎，以及傳播的修辭或對話基礎。下一章就轉入政治經濟學在傳播研究中的發展。



傳播的政治經濟學

本章專注在探討如何利用種種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來進行傳播研究。首先由傳播的意義著手，進而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如何的社會與知識分子活動的脈絡中崛起。然後從檢索歷史檔案與思考四個世代學者的傳承中，刻劃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其中重要的人物。

經過這樣的歷史評估，本章得到一個主要結論，認定政治經濟的傳統主要衍生自馬克思的學說與制度研究取向 (institutional approach)，他們締造的實際研究成果，遠超出社會體制所給予的支持。雖然幾個世代以來，投注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不斷增加，但是這樣的成長大部分來自個人獨立的努力所致，協同的研究工作只是藉由學者之間興趣的交集而成，頂多有一些微薄的贊助，更不用說時時有公開的反對聲浪環伺在旁，所以實難說政治經濟研究已經有了一個研究的中心。

本章將主要焦點鎖定在政治經濟傳播學，如何由馬克思學說與制度學派的傳統中，發展出多種興趣領域與特色，而從主流經濟學的取向中推展到傳播研究中。本章的結論不但突出政治經濟研究的導向，同時揭示後續章節的重點，包含認識論的問題、商品、空間、結構論的過程、以及來自政策研究 (policy studies) 與文化研究的挑戰，這些正是政治經濟研究領域所面臨的核心挑戰。

傳 播

任何一個學門 (discipline) 都會面臨本質論 (essentialism) 的挑戰，也就是說很多人傾向於將現實化約為學門的中心要素。第二章特就政治經濟學的特徵指出：為避免將現實化約為政治經濟的現象，因此應視政治經濟為建構社會現實的衆多力量之一。無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馬爾薩斯的《原則》(Principles)、或凱因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它們的理論威力都強大無比。因此，若是有人據此而將社會現實化約為政治經濟現象

71

或者甚至是一個經濟邏輯，無足為奇。儘管如此，在第一與第二章中，我仍然強調可憑恃著重要的認識論、理論、及實質的根基來反抗這樣的本質論挑戰。留意於此，所以我認為政治經濟是進入社會分析領域的門檻，也就是開啓研究領域的重要樞紐，而不是將所有取向一統化約的基石。

因此同理，我們也必須「迴避傳播本質論」的陷阱。然而現階段的學術氣候，呈現著強烈本質論的色彩，譬如要將已經通行三百年之久的科學研究分析方法，轉變為修辭學及對論述規則進行分析的一組標準，來作為大範圍傳播研究的取向，以達成認識論的再造 (Burke, 1969a, 1969b; McCloskey, 1985; Rorty, 1979)。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認定言談的修辭如同調查的邏輯，可以作為科學的標準。再者，文化研究的發展也已經提供有組織的分析「傳播內容構成」的工具，比如文本與論述。結果，以解讀文本當作一個學門的認識論與社會分析方式，成為傳播的本體，將求知的行動與知識的對象皆化約到論述的概念內。第二章所談到的 McCloskey 在經濟學方面的分析，就彰顯出這種取向的價值，他能強而有力地揭穿科學與經濟在其他的知識模式中，對比出的普世命題的假面具。然而，即使是十分有經驗的研究者也無法逃離這種本質論的傾向，因此屢屢見到這種認識論的合流與論述分析的大一統。我的評述主要目的在展現這種取向的能力，並警示它將造成一種新的本質論，會使傳播研究走向化約主義者的道路。

此外，政治經濟學還可提出另一個迴避傳播本質論的基礎，雖然這樣的目標將面臨些許挑戰，但是政治經濟學即使在調查媒體的經濟、政治、與物質的結構當下，仍不忘在媒體之外找尋解釋社會現實的原因，也就是不將媒體視為單一的中心。而將媒體地位去中心化，即意指不可將傳播系統視為外於社會基本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過程的建構。政治經濟學由多方的研究路徑來支持如此的定見，比如，從資本主義的組成——資本的積累、勞工的薪資等開始探討，將

媒體的生產與再生產問題置於其下來關照。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可以使媒體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面相，與社會教育、家庭、宗教及其他的體制活動平行對照起來，這些因素都有其個別的解釋力，然而由於他們互相攜手建構了資本主義，因此無論是媒介或是其他體制活動，都無法取得超然獨有的詮釋地位。不過本章無意辯論這些因素的特徵究竟與其獨特色彩，有何差別，而只是要指出，由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將傳播的研究主題置於廣大的社會總體中 (totality)，所以特別關注傳播研究中的本質論傾向。

72

牢記於以上傳播研究的本質論問題後，在此簡短地解釋傳播的意義有助於我們以下的討論。我對於傳播的概念來自一種通則的興趣，欲將社會的過程與社會關係的概念建構於研究的前景知識中，所以傳播的意義是一種交換的社會過程，交換那些由社會關係所標示或賦予形體的產品^①。概括地來講，傳播與社會以互相影響的方式建構而成。政治經濟學與制度性分析研究的趨向是，集中焦點於瞭解傳播如何在社會中建構；並進一步分析被社會勢力型塑出的傳播管道，承載了哪種幅度內的訊息。這樣的探討有助於建構「對於商業、國家與其他結構勢力如何影響傳播實務」的研究主體。再者，也有助於將結構與傳播實務放在廣大的資本主義、貿易、國際分工的領域內進行瞭解。儘管如此，我們仍需認識到，對於社會過程的探討並非終結在執行型塑傳播實務的功能上。傳播不是社會實務的效果展現，也非社會科學的文化地形圖 (cartography) ——所謂僅僅由經濟、政治科學及社會學來解釋的文化景致^②。但正是如此本質論觀點存在於一般的社會科學與政治經濟學，以致它們特別忽略了傳播及其實質變遷的議題。所以我們更需強調，研究傳播實務如何建構社會是同等重要的，

① 這樣的論點來自史麥塞 (Smythe) 詮釋傳播與資訊的辯證關係。

② 我的論證來自 Massey (1992) 的研究，她將如此的思考運用在空間與地理學的領域內。

再者，我們必須知道這樣的研究主旨，並不在設定政治經濟為傳播主宰下的文化、意義，或主體所描繪出的結構、制度、與物質活動，因為傳播與政治經濟兩者，應從共享的社會與文化實務中互相建構出來，以兩者互有差異，又互相決定的地位來完成交換的過程。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73

本章主要談及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體，以檢視一些推動此種研究傳統發展的社會影響為始。這樣的開場不是簡單的，因為政治經濟學所受的影響是廣大的，涵蓋四個世代，而其研究人員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有些人甚至未曾明示其為政治經濟取向的服膺者^④。儘管如此，從這樣的方向來瞭解政治經濟取向的發展仍是有用的，同時我將進一步敘述廣大的社會趨力如何影響研究者的興趣發展。

對政治經濟研究取向發展的主要影響，來自媒體本身的變革，諸如報業、電子媒體、電訊傳播，從樸實的外貌、家族擁有的企業，轉變為二十世紀工業規模下的產業。這樣的轉變並非歷史必然，也非線形的進展，比如一些主要媒體機構——紐約時報公司 (New York Times Corporation)，仍為家族所有。儘管如此，大部分的當代企業都熟練一套工業與公司的管理實務，包含生產、行銷、金融、會計的流程與技術，而這樣的發展已擴展到所有的媒體事業。一些早期的政治經濟研究，展開對大型傳播企業的結構與實務的描述，並關注在如此大規模企業下的權力是如何運作。Danielian (1939) 對美國電報電

④ 這裡提供一個明顯的世代傳承譜系：史麥塞在伊利諾大學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其中的一個學生 Thomas Guback，在這個大學的傳播研究院畢業並獲聘一個教職，於此他指導 Janet Wasko 進行電影政治經濟研究的論文。Wasko 畢業後在奧瑞崗大學任教，她與研究生 Jack Banks 共事，Banks 畢業後或聘為 Hartford 大學的助理教授。

話公司的研究及史麥塞 (Dallas W. Smythe, 1957) 對美國媒體工業結構的分析，即展示了如此研究趨勢。晚近的傳播研究，繼承了這個傳統 (Herman and Chomsky, 1988)，同時將研究鎖定在公司企業如何整合不同的媒體工業部門，進一步跨越大到製造業，甚至涵蓋了服務業 (Mattelart, 1991; Schiller, 1973, 1984)。許多傳播研究追尋著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歷史形式的主題（諸如討論資本主義的轉換與薪資勞工的產生），以及導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議題進行研究，舉例來說，經濟轉型成壟斷資本主義 (monopoly capitalism) 與創造一個分割勞動概念與實踐的過程。這些追溯式的傳播研究，源自媒體工業中技藝傳統的堅持，以及重視工業商品化過程中的問題與挑戰（部分導自抗拒媒介商品化過程及技藝勞工的反抗），外加近來欲用科技創新的成果來更新市場實務的應用。今日，我們可以看見，媒介公司的結構與過程研究，適逢後福特主義 (post-Fordism) 與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的論辯後，產生出迥異的觀點，這是待人思索的。舉例來說，Christopherson and Storper (1989) 建議後福特主義意味著媒介結構的去中央集權化 (deconcentration) 與媒體內容在結構與多樣化上的發展彈性。Aksoy and Robins (1992) 則反對後福特主義的論點，認為其忽視了全球媒體集團 (conglomerates) 的深層集中化趨勢，這使他們已強有力地掌握了資本積累的管道，因此無須掌控管道上總體產業結構，以免擔負過多風險。

政治經濟取向一般以檢視事業的成長與廣大政治經濟現況的關聯，作為探討傳播過程生產面的開始。然而，由於大眾消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政治經濟學家將實現價值的全部過程納入考量，因此研究還需包括社會關係與消費組織。他們以檢視消費的成長作為議題，探討消費如何以一種對應的結構來解決生產過剩的危機；又如何作為一種社會反應來回應政治上的危機，而兩者皆產生在北美與歐洲社會中勞工階級組織大眾化的年代 (Ewen, 1976)。舉凡大眾報紙的發行、國家電信系統的鋪設，更重要的是廣播與電視的發展，皆混合成為大

眾消費形式的核心本質。但是這種混合卻帶給政經取向雙重的期許壓力：由於大眾傳播與大眾消費自一開始就有相當親密的連結，致使傳播政治經濟學必然無法捕捉其早期發展的全貌，只能選擇其一在二十世紀中的關鍵發展，做為研究對象。大眾傳播與消費的聯合概念相當不同於政治經濟學傳統基調——對商業的單方面關照，導致政治經濟學無法掌握環伺在家庭生活中的問題，同等地無法掌握參與購物及聆聽、閱讀、觀賞媒體內容的閱聽眾現象，這些現象正以一種新的語彙記錄參與積累的過程，挑戰現有的研究文獻^①。現今這個議題更由於後福特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辯論產生更混淆的爭議，因為他們提出彈性與特殊性的消費活動意義 (Harvey, 1989)，正面迎擊今日的政治經濟研究。根據組織生產程序的趨勢研究指出，未來生產的重心應在特定市場而非大眾市場。而在消費議題上的應用，後福特主義者以彈性專殊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作為觀點，來組合一種為特殊市場生產特定或消費者需求的商品導向。這個議題對於傳播研究十分重要，因為生產路線上每一環節轉變都牽涉到傳播意義的建構。傳播系統受生產線投合顧客需求的主控、受推銷產品給顧客的主控、以及受將顧客購買情報轉換為生產決策的時間所限。總結，有鑑於對執行傳播與資訊交易的頻道增值能力的要求，未來的生產過程應是製造特殊與顧客需求的媒體商品，來投合越來越分殊化的閱聽眾市場。這樣的進展導引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試圖評估後福特主義的普及度（後福

75

① 我們再一次看到研究家庭勞動中的學術觀點矛盾：以家庭作為生產活動的基礎單位，來看待人類兩千年來如何不斷奮鬥求取新的積累過程，是否已無疑義？結論上，我們應稱這樣的過程只是消費嗎？亦是生產加消費的過程？再者，由於經濟活動的基礎路線不斷重組，因此這個過程的學名也十分難產。究竟分析的基本單位是什麼：階級嗎？家庭的性別嗎？閱聽眾嗎？史麥塞 (1977) 提出的「閱聽人商品」的辯論，正是為瞭解這個難解的企圖。

特主義的生產，建構出新世代的轉變方向嗎？）並詮釋其廣大的意涵（對全球政治經濟體中的權力關係產生什麼意義？）。

而國家透過角色的擴張，成為傳播的管制、生產、行銷、與消費者，也激使政治經濟的研究得到成長。而國家活動的擴張，主要為了管理日益衝突的國內與國際產業，具體的實證是其持續地擴張蒐集情報、資訊的能力，與建構宣傳、廣播與電訊傳播的系統。最為特殊的是，軍事、媒體、電訊、與電腦的結盟關係成為幾個世代政治經濟學者的關注焦點 (Mosco, 1989a; Roach, 1993a; Schiller, 1969/1992; Smythe in Guback, Chapters 7-9, 1993)。此外，國家的傳播部門也以管制設計與政策制定的功能來壯大自身，以進行對商業競爭對手間的斡旋、回應階級、性別、種族、及社會運動的抗爭、及協同資本勢力領導者制定長期計畫。政治經濟學視國家為國有的電訊、廣播、資訊系統的建構者，並評估以公共或市場為根基的經營策略 (Garnham, 1990; D. Schiller, 1982; Smythe, 1957)。早期以政治經濟取向研究傳播的學者，首要目標為支持公共近用權 (public access) 與控制傳播系統的社會運動。隨後興起的全球私有化趨勢，又激起政治經濟學提出對此運動根源的工具性及結構性分析。至今，針對私有化趨勢所造成的市場導向產物，諸如不對等近用權與媒介內容變遷，政治經濟學又重新把興趣投注於開發替代性的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及社區傳播模式 (Murdock, 1990a, 1990b)。

商業與國家勢力的成長，有助於西方核心國家推展他們的權威到世界各地並造成動亂，如此激使政治經濟研究對媒介帝國主義 (media imperialism) 議題進行熱烈辯論。雖然這個議題受到已開發國家學者的廣泛地討論，但是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學者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影響了討論的範圍⁷⁶。而二次大戰後，加速進行的全球反殖民運動，推動了研究的生產，其中一個重要的資助者為「不結盟國家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這個組織由強調「不受冷戰思考影響來制定發展政策」的國家結盟而成，他們從召開的會議中，早

於聯合國呼籲建構國際經濟新秩序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的重要，以矯正全球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接踵而至的是，呼籲建立全球資訊與傳播新秩序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以提醒世人，媒介與資訊系統中的政治經濟資源配置已經失衡。NWICO 的問題聚集了全球活躍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對此他們生產了基本的研究 (Nordenstreng and Varis, 1974)，政策的分析 (Somavia, 1979, 1981)，以及對運動本身的評估，包含了描述西方國家如何意圖阻擾與破壞此項運動 (Preston et al., 1989)。這種致力結合學術研究與政治活動的努力，展現了他們對於葛蘭西主張的「有機知識分子」理想的認同與實踐。然而他們在聯合國所形諸文字的理想 (UNESCO, 1979)，卻被八〇年代由媒體簇擁的新保守主義政府棄置一旁，僅有一些象徵性的施行^⑤。儘管如此，政治經濟學家繼續透過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議 (MacBride Roundtable) 的舉辦，持續地催生 NWICO 的目標，這是一個獻身於掃除媒體殖民現象與建構新傳播與資訊秩序的組織

⑤ 這方面的研究對於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成長提出相當細密的探討，其中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許樂 (1969, 1993) 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研究；Atwood and McAnany (1986), Beltrán and Fox de Cardona (1980), Dorfman and Mattelart (1975), Freire (1974) 對拉丁美洲的研究；史麥塞 (1981) 對加拿大的研究；Ibrahim (1981) 對非洲的研究；及 Tran van Dinh (1987) 對亞洲的研究。由各國學者所共同努力完成的論文集有 Mowlana et al. (1992)，Nordenstreng and 許樂 (1979, 1993) 及 Sussman and Lent (1991)。

⑥ 反對人民的國家主權概念的聲浪是相當有威力的，證諸一些主流的精英報紙在當時提倡回歸殖民主義的言論，就可見其端倪。另舉一例，Paul Johnson (1993) (著名的歷史著作 *Modern Times* 的作者) 在《紐約時報》曾撰文：〈殖民主義的再臨——一個不會太突然的舉動：讓我們共同面對——有些國家並不適合於自治〉指出，他希望文明世界應該恢復殖民者託管的體系，來接管那些不適合自我治理的國家。

(Roach, 1993a; Traber and Nordenstreng, 1992)。

77

雖然以上的社會趨力，並非窮其精力於政治經濟取向的研究，但他們的確推動了研究的發展。此外，另有一知識分子的運動助益其壯大：就每一世代的政治經濟學者而言，他們都深深感受到尋求正統經濟學之外的替代取向 (alternatives) 的重要，而媒介政策正是奠基於此替代之道上來發展。正是支持第二章所提到的主張，政治經濟學家拒斥使用無法匹配的新古典經濟學綜合學說，他們認為這種研究取向是不合於傳播工業的分析，因為傳播工業的大部分特徵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下，都被視為例外的個案。本世紀以來，媒介事業早已高度集中在一個或少數的大型公司手中，他們控制了一個方便生產與行銷的市場。更有甚者，在美國以外，大眾媒介與電訊網路都屬於政府獨占擁有的體制，即使在美國，除了大家都知道郵政系統為官方所有外，其實電信與電視廣播網路，從早期開始就深受政府的管制。再者，有關傳播工業生產的產品本質是什麼，至今仍有歧義，雖然廣播新聞的播送由廣告商資助是一個標準的商品例子，但是新聞本身仍保有一些特徵使正統經濟學取向無法將其定位（舉例而言，人們在收聽或收看廣電新聞後，新聞這個產品並未消失）。另外史麥塞在他所激發的閱聽人商品本質的辯論中，也為文指出，這種工業同時操縱節目與閱聽人的市場，也就是說關於何者是傳播工業的主要商品，從標準的經濟取向來看，實在難以界定，因此需要一個替代性的取向。歸結來說，許多評論指出，西方經濟體中有許多部門不切合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而傳播工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雖然傳播工業的解禁 (deregulate) 與私有化 (privatize) 過程，排除了其產業經濟模式的一些特殊性，但是我確信在導出結論前，應該戒慎地警醒，因為這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相當大，有待探勘確認。

為了尋求替代主流經濟學之道，幾個世代的政治經濟學在正統傳播政策之外開闢替代取向。舉例而言，作為這個領域的開拓者，史麥塞結合工作經驗與學術分析、政策研究、社會運動於一體。他於一九

三七年進入美國農業部擔任經濟政策分析師，接著被指派往勞工部任職，於此他與代表報業、郵政、電報工業勞工利益的工會共事。一九四三年轉任聯邦傳播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第一任的首席經濟學家，在此他提出許多被大戰延後的電視廣播與電信的議題。進入學院之後，史麥塞持續支持公共利益的政策研究，諸如公共廣播、公有的衛星傳播網、發展世界傳播資訊新秩序、與全球傳播網路的非武裝化。同樣的行動也見以下學者的歷練：許樂 (Herbert Schiller) 與 Kaarle Nordenstreng 致力提供「規劃國家傳播政策」的協助給拉丁美洲、亞洲與非洲。史麥塞的學生 Thomas Guback，運用政治經濟取向研究全球電影工業，並在聯合國致力建構民主傳播的巔峰時期，提供有關電影工業的政策建言。史麥塞的親密的戰友，William Melody，從制度政治經濟學出身，長期活躍於推動「批判北美新古典經濟學」的政策研究，並且在英國與澳大利亞成立研究中心，他的學生 Robin Mansell 在法國與英國的研究中心裡推動政策研究。英國媒體工業工會的運動分子 Nicholas Garnham，最近結合了梅鐸、高丁、Kevin Robins，及其他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展開對該國電視廣播與電訊傳播系統的解禁與私有化過程的批判。這些觀點也同樣存在於許多美國與加拿大的政治經濟學者研究中，諸如 Oscar Gandy，Dan Schiller，Janet Wasko，Manjunath Pendakur，Gerald Sussman，及作者本人。而新一代的學者更積極結合政治經濟分析與政策制定、社會運動的經驗，諸如 Jack Banks，Ronald Bettig，Eileen Mahoney，Robert McChesney，Colleen Roach 及 Kevin Wilson。再者，以研究第三世界傳播議題著稱的學者兼政策運動者 Armand Mattelart，在八〇年代後將他的研究焦點轉向歐洲傳播政策的爭議。以上只是一些簡單的案例，有關其所成就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容歇後再詳敘。在此所要呈現的重點是，四個世代的學者都在既定相容的政治經濟觀點導引下，生產出足以介入傳播主要政策探討的研究。

除了致力於尋求正統經濟學之外的替代之道與政策研究，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發展還展現出知識分子的深層考量：第一代的政治經濟學家意欲迎擊遍布在正統經濟學中的行為主義典範，這種典範也存於政治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之中⁷。雖然行為主義仍是當代政治經濟學的關注所在，但如今更多的精力卻投注對文化研究的批判。

79 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對抗科際整合運動為起步，反對將物理科學的認識論與方法移植到社會科學的應用中，比如以實證觀察來建立法則般的理論體系，使其內涵成為可偽證的命題 (falsifiable propositions)。這些命題可以被持續發現的實證資料檢測，使理論不斷地精進。本質上來說，由於科學方法顯示出其優越能力，似乎建構了物理科學；因此同理可推，科學勢必也能創造出社會的科學 (Nagel, 1957)⁸。科學方法在應用到社會科學後，這種以實證 (positivist) 取向進行調查的方法就叫行為主義，所做成的研究範例遍布於心理學 (Pavlov 與 Skinner 的情境取向)、社會學 (Homans 對於群體行為的分析)、及政治科學 (Key 的民意研究)。行為主義採行多種路徑進入傳播研究，著名的成果如 Lazarsfeld 與 Cantril 的研究，他們欲藉檢視媒體訊息所造成的行為反應，來創造出大眾傳播的社會科學，由於這個過

⁷ 這個觀點來自我對史麥塞的專訪所獲 (1991 年 12 月)，史麥塞對於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取向在傳播研究中的緊張關係感到不解，在他早年 (1920 年代) 的學科認知中認為，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曾共盟來批判行為主義。他認為行為主義畫地自限於只進行實證主義方法規範下的事實觀察。於是政治經濟與文化取向開始導引研究質疑學術的意義、辯證及批判。行為主義為早期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對手，也證實於我與許樂 (1992 年 1 月)、James Halloran (1992 年 4 月) 的訪談所獲。

⁸ 我用「似乎」二字，原因在於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開始質疑：在經過科學方法嚴格定義的檢視後，究竟人們對物理科學就是科學的信心，還能留存多少。(Feyerabend, 1988; Lakatos, 1978; Latour, 1987)

程已得到不少研究的關注 (Buxton, 1994; Gitlin, 1979; Morrison, 1978)，我不在此重複敘說其歷史，我的重點只在展示，第一代政治經濟研究所迎擊的主要知識階層，其風貌為何。

不過早期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從未反對進行經驗的調查⁹，而是堅持與經驗主義劃清界限，或者反對將知識活動化約為「將觀察到的行為轉化為簡潔與可偽證的命題」。他們以辯證關係為根基（介於理論與觀察到的行為之間，我稱其為交互的構成）的廣角分析法，來取代經驗主義。再者，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在於將大眾媒體如何中介社會活動的理論，放置於廣泛的政治經濟架構，特別是馬克思的理論中進行理解。政治經濟學也爭取一種批判取向的建立，從批判的目的中來檢視經驗的上的發現，如呼籲建立公共電視系統來提昇民主傳播的研究。經驗的結果既非來自黑箱作業，也不是來自定於一尊的解釋，而是來自與理論構成間的辯證關係，及對廣大政治利益意涵的回應。最後，政治經濟學認定，研究為透過調查方法來積極介入社會過程，找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而拒絕作為一種自由無羈絆的知識分子生產活動。這種觀點正符合史麥塞指出（1991年12月訪談時），將政治經濟學置於人文詮釋學 (hermeneutic) 的取向內，正如同人類學已經全然發展出的架構，或者特別像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所成就的批判文化研究。究其本質來說，第一與第二代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特別容忍研究上的大幅變動，以取得與文化取向的結盟，共同對抗由行為主義提出的本質論挑戰。

第三與第四代的政治經濟學持續區別他們與行為主義的不同，但是過去曾一度因對抗經驗主義而與文化取向結盟的關係如今反目成

80

⁹ 史麥塞就曾完成第一個對商業電視節目的內容分析研究，來支持公共電視網的建立，他的成果得到《時代》雜誌的關注，刊載在一篇報導中。他也涉入策劃對大眾電視節目「米老鼠俱樂部」內容進行分析，並向福特基金會申請補助（1991年12月的訪談獲知）。

仇。我們發現，的確過去兩學派為對抗知識正統所進行的傳播研究的結盟，如今卻被拆解、互自劃清界線 (Colloquy, 1995)。第七章會詳細談及這點，儘管如此，我仍在此略述一下，因為欲瞭解當今政治經濟研究的發展的最好方法，就是將其放置在一個轉變的脈絡中，看待它如何從迥異於行為主義的立場上（現今仍是如此），轉向與文化研究分道揚鑣。

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家如梅鐸 (Graham Murdock) 認為，文化研究的計畫始自一種緊要的學術反思，欲藉揚棄過去視文化為精英的行為及賦予其普世美學的思考，來重新刻劃文化的意涵。進一步來說，文化應與人民通俗的生活實務相結合，依循著一定的美學與社會原則來發展，比如反抗既得利益的文化與被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 (Murdock, 1989a, 1989b; 1992 年 4 月的訪談)。梅鐸等人頗為質疑當代文化研究的趨勢，雖然文化研究完全對立於行為主義。文化研究者的這些趨勢包括：立基在貼近主體 (subjective)、地方、特殊性等本質的正當性；給與言論、概念性行動或命名 (naming) 活動一種特殊的解釋權，其效力凌駕其他社會活動模式的解釋；並且規避研擬一種具有統合社會活動意義的解釋基模。這種趨勢正吸引著各種文化研究學派高低不一的興趣，使政治經濟學家察覺出過去行為主義者為建構實證社會科學的後設敘事體 (metanarrative) 的企圖，訝然發現此企圖正包藏在文化研究的計畫中，十分諷刺的是，這正違反了它們的初衷：反對總體形式的思想。根據 Garnham (1990: 1-2) 的看法，這樣的趨勢來自文學與電影的研究，推展到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思想中。他對這個發展中的現象歸結指論：

它們的浪漫情懷，如影隨形，它們渴望逃脫人類世界的社會關係與物質的枷鎖，它們要走出它們視之為人類本質的疏離狀態，迎向一個無錨、無意涵指涉的世界，將慾望全然解放與嬉戲。

政治經濟學派也不能免於被強烈批判。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同樣地拒斥政治經濟取向，視其為經濟學究的、總體化的取向、甚至只是衍生自過時的馬克思資本論調(Baudrillard, 1975)。再者，這樣的辯論熱潮也不只存在於傳播與文化研究上，正如同任何學科都會盤據在自己所關注的焦點上，將看法投射到另一方身上^⑩。除了加入這種互相批判的混戰外，我們也見到部分學者努力破解這種分化，由自己語言來理解，並肯定另一方的論點(McIntyre, 1992; Resnick and Wolff, 1987)，在傳播研究中可見文化研究在這方面的努力(Berland, 1992; Hall, 1993)；另外近來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也致力開發可連結(continuities)兩者的興趣的主題(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 Murdock, 1989a, 1989b)。

以上簡短的回顧主要指出，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也藉著迎擊其他知識分子的挑戰，來定義自己。在這波挑戰中，新古典經濟學與政策研究，向來就是激烈反對政治經濟研究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們持續堅守這樣的立場。但是政治經濟學所提出的替代取向，早已超越了他們規條下的立場本質與理論觀點，也超越了行為與實證主義作為哲學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正統社會科學。傳播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與這根基劃清界線，如今，文化研究取代了行為主義，成為當代的政經研究的主要知識對照點^⑪。這樣的學術浪潮轉變，顯示出這裡有一個充滿動力的論域，許多觀點浮沈於變遷中的政治經濟現象，並且受替代性學術潮

⑩ 歷史文獻中也出現如此對語言學的分析：社會史學家 Bryan Palmer(1990: 5) 認為語言學的發展並非完全絕望、無可救藥，他歸結說：

我之所質疑、拒斥、有別於現今語言學的傾向，主要在於它物化了語言，將其客體化為無法中介的論述，並視其為超脫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的物體，進入一個取代人類基礎結構與構造、使語言成為歷史準繩的過程。

流所衝激。政治經濟觀點目前應有的作為是，儘管當前的要務是更新自己的哲學根基，但也應確認己身擁有的堅固傳統，如此才能看清挑戰觀點的幅度。

82 本章接續的部分將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進行回顧，而行文的脈絡是根據我在一九八九年寫作北美批判研究的回顧 (Mosco, 1989a)，所深化延續發展出來的。而我對政治經濟學的回顧，以區域為發展綱領，我曉得執行這樣的引介，永難盡如人意。另外一種角度是以主題來區分，雖然這可以回顧實際事件的發展，但是這樣一來卻忽視區域分隔的意義，而區域分法對於這個領域的發展，意義深遠¹¹。為了避免區域劃分成為一種單調的分法，我也會回顧在專業學會與政府機構中組織起來的國際性研究觀點，他們實踐了跨區域的學術交流。同時也顯示出政治經濟學派的世代發展，本身就是超越區域進行的，比如說許多北美的年輕學者就承認，他們的研究曾受到歐洲與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著作的影響。

這種探討同時也提醒我們應該深思 Mills (1959: 6) 的告誡：所

①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包含了不同世代的學者與研究方向，兩個不同世代有時可用時間脈絡來區分，有時不可。所以如何區分兩者關係十分重要，特別是當時間脈絡對兩者沒有相關時就獨具意義。舉例來說，許樂就屬於前兩世代的政經學家，但他近期的作品 (1993) 還正面迎擊文化研究，顯示出他的治學能力是可以隨時面對學術風貌的變動而加以更新。

② 舉例而言，梅鐸 (1978) 在回應史麥塞的文章〈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時表示，有關將閱聽眾當作勞工加以行銷的概念，比較適用於北美的環境，因為北美以商業廣播電視體制為主。然而他人看來，這樣的對立的確顯示在傳播實務的組織與理論的交互構成中，一直因著不同區域而產生不同的看法。儘管如此，隨著美式的商業模式的推廣，這種區別的界限也逐漸泯滅了，證諸最近高丁與梅鐸 (1991: 20) 的論證中也將閱聽人商品的概念列入考量。

謂「社會學的想像力」的達成，需要靠賴我們的敏感度，「捕捉歷史與個人傳記的個別發展，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的互相關聯。」爲了達成上項目標，我的回顧是透過與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中的主要人物的訪談及討論，將他們個人的生涯、著作及工作的領域放置在四個世代的學者所形構出的廣闊歷史脈絡中來瞭解。此外另有原因使我在回顧中以個人生涯作爲描述根基——政治經濟取向的發展沒有受到研究中心般的體制支助，因此無法將一或二人以上的研究焦點加以整合，以致造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法則，那就是政治經濟研究者必是以個人身分進行研究，若要尋求共識時，必須透過會面與研討會形式進行面對面的意見交換才能達成¹³。

北美洲

北美洲的政治經濟取向的研究始自史麥塞與許樂的努力，這兩位學者在此領域中發揮了最具意義的影響力，並擴及世界各地¹⁴。

史麥塞在美國展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開授了第一門此類的

¹³ 不過也有些例外情形發生：譬如 Temple 大學曾經短暫地聚集了史麥塞，Wasko, Dan Schiller, Mosco 於一處，並生產出許多重要著作 (Mosco, 1982; Mosco and Wasko, 1983; D. Schiller, 1982; Smythe, 1981; Wasko, 1982)。也同在此時，特別由 Wasko 的引領下，一個聚集批判學者、媒介運動者與從業人的組織——「民主傳播聯盟」(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UDC) 誕生了。此外早期在伊利諾大學任教的 Thomas Guback 也匯集了一批研究生，導引他們走向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的路子，他們包括 Wasko, Eileen Meehan, Jennifer Slack, 及 Fred Fejes, 他們創辦了新聞信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一個 UDC 理念的前導者。

¹⁴ 除非另有註明，本節中的資料來源皆取自與史麥塞(1991年12月)及許樂(1992年1月)的訪談所獲。

課程，導引了年輕同仁與研究生進行這方面的重要研究。正如同其他人在政治經濟領域內的工作經驗一樣，史麥塞因接觸到核心的政治與社會勢力、及相關議題而受到實質的影響。對他而言，這種影響來自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史麥塞指出，有三個關鍵事件，特別使他的政治傾向從1928年投票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胡佛，轉變成為一個對激進理念與政治行動開放心靈的人士。這些事件包括：對國家警衛隊與碼頭罷工工人之間衝突的觀察、訪問貧窮的農場移民工人與促成一個屬於研究生的農業推廣教育計畫，以及於西班牙內戰期間與支持或打擊反法西斯主義人士的會面¹⁵。於是他自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茁壯，首先應來自實際的階級抗爭經驗，之後才是學術研究的際遇。

史麥塞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得到經濟學的訓練，他領略了廣泛的各家學說觀點後，獲得入學許可進入經濟學門中學習。雖然一九三〇年代新古典經濟學觀點已經作出一些定論，然而由於經濟景況惡化到驚人的地步，所以馬克思學說與制度經濟學不僅受到支持，並且是當時研究所教育的主要課程。史麥塞師從的學者 M. M. Knight，特別專精於經濟史與理論，Knight 將制度經濟學家韋伯倫（Veblen）學說與美國的馬克思理論詮釋收入經濟學教材。再者，史麥塞也浸淫在政府的報告與檔案中，從此得到了確實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知識，這些包含了政府針對一八九〇年代經濟崩潰所舉辦的大型公聽會記錄，以及交通建設的文獻，後來型塑了他的博士論文的根基。

如果經濟大恐慌造就了史麥塞的思想，那麼新政（New Deal）著實地導引了他的生涯選擇。史麥塞於一九三七年獲得了博士學位後，進入聯邦政府農業部，後來轉到勞工部任職，在此他與政治思想進步

¹⁵ 由於他支持反佛朗哥政權的勢力，使美國政府視他為「貿然的反法西斯分子」，如此紀錄成為他在一九五〇年代生涯發展上的障礙。

的公務人員及工會分子親善，進一步強化了他的批判思考。史麥塞對媒體的研究始自於在勞工部的時期，在此他的部分權責是巡視媒體與電信工業，瞭解他們的勞動實務與工會活動。他觀察到第一手的勞工抗爭實況，當時爲了爭取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與西方聯盟電報公司(Western Union)的勞工支持，導致公司工會與激進工會之間的對抗。這些工作經驗使他密切接觸到傳播工業中勞動過程的變遷，比如廣播與電話公司中的接線生，逐漸感受到他們的技術，在高科技的威脅下，已經漸被剝離(deskilling)。

84 一九四三年史麥塞離開了勞工部，前往聯邦傳播委員會成爲首任的經濟學家。在委員會中他提出了勞工關係的議題，並出席費率公聽會提供政策諮詢；他也參與史上最繁忙的無線電波頻譜的分配工作，因爲此時委員會應廣大的業界要求，急於核發無線電波執照，諸如調頻(FM)頻道，及至爲重要的電視頻道。史麥塞的這些經驗，無法抹滅地烙印在他未來的研究思考中，那就是官方管制機構被商業利益所動員，用來羽翼廣播與電視的私有模式¹⁶。

一九四八年史麥塞離開了聯邦傳播委員會，加入了由施蘭姆(Wilbur Schramm)創辦的伊利諾大學傳播研究所，展開了他的學術生涯。這個研究所開辦了第一個傳播博士班的課程，使許多學者在此交會並對傳播研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紀錄。他們包括了傳播心理學家 Charles Osgood、接續著是 George Gerbner，短期訪問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及許樂。這時社會正籠罩在冷戰的氣候中，而日益壯大的大眾媒體對傳播研究的發現也至爲敏感，史麥塞於是小心

¹⁶ 在偏好市場決定論的委員影響下，聯邦傳播委員會投票通過保障調幅廣播電台業者（他們發射狀態良好的頻道可以在夜間時段涵蓋半個全美的聽衆）的利益，來對抗調頻與公共廣播事業倡議者的改革。委員會也指定第一個電視頻道必須分配給商業利益，而商業利益擁有者也是現有廣播工業的掌權者。

戒慎地提出一門傳播經濟學的課程，之後才規劃推出全備的首門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目。在這段期間裡，史麥塞也完成了幾樣重要的工作，包含支持公共廣播電視建立的研究、出版第一本電子媒體的政治經濟學專書(1957)，及展開他對閱聽人商品的先期研究¹⁷。

但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並未隨著參議員麥卡錫失勢而消逝，反而進一步壓迫美國大學內的自由風氣。於是史麥塞決定返回他的故鄉——加拿大的薩克其萬省(Saskatchewan)，在此他加入雷吉納(Regina)大學並成立傳播研究的課程。就在史麥塞離開伊利諾大學後，許樂透過與史麥塞的相識，從經濟系進入傳播研究所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史麥塞的大弟子 Thomas Guback 在此完成國際電影工業的政治經濟研究的論文，拿到博士學位，受到研究所的聘用繼續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史麥塞在雷吉納大學待了十年，發展出「閱聽人為大眾媒介的主要商品」的理論，同時與 William Livant 共事。史麥塞於一九七四年離職加入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的西蒙菲莎(Simon Fraser)大學，在此他與制度政治經濟學者 William Melody 共事，將其精力投注在電訊傳播政策研究(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反托拉斯法案為主)、閱聽人商品的論文、及撰寫他主要的學術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1981)，這本書主要用辯證的分析法揭示加拿大依附發展問題中的壟斷資本現象。在此時期，史麥塞也展開旅遊訪問，他研究智利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聯合陣線(Popular Unity)政府的改革、及英國、日本、中國的傳播政策與實務。在西蒙菲莎大學，史麥塞的政治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影響了許多當今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領導分子，除了 Melody 之外，還有 Robert Babe, Manjunath Pendakur, William Leiss, Sut Jhally, Robin Mansell,

85

¹⁷ 史麥塞記得第一次發表如此思想，是在 Vassar 學院的消費者聯盟聚會的談話中，時值一九五一年。

及 Rohan Samarajiwa 。

史麥塞於一九八〇年暫時離開西蒙菲莎大學，遠赴天普 (Temple) 大學任教，在此他與 Janet Wasko (伊利諾大學 Guback 教授的學生)、Dan Schiller、及 Vicent Mosco 共事，同時所上有三位學生 Eileen Mahoney, Sylvia Sholar, Rosalind Bresnehan 加入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又歷經一系列的訪問學人身份後，史麥塞最後回到了西蒙菲莎大學並在那裡過世 (1992 年)。我們編輯了一本紀念文集 (Wasko et al., 1993)，書中見證了史麥塞對於全世界四個世代的政治經濟學家的影響。

正如同史麥塞一樣，許樂也將其知識與政治態度的成就歸因於他對美國與全球政治經濟轉變的體驗。許樂晚於史麥塞半個世代加入學界，也就是許樂在大蕭條時期下進入高中與大學就讀，在二次大戰期間從軍。接下來他到紐約市立學院任教，開設免費課程給紐約市的勞工階級，課中瀰漫著高度的政治討論氣氛。雖然他的興趣在文學，但大蕭條時期的經驗指引出一個新選擇，使他決定研讀經濟學，更把其視為一項工作。由於相當多的人必須忍耐渡過這個經濟大動亂，許樂深深地察覺到西方政治經濟體中必有根本錯誤的存在。

另外，從軍與戰後的駐德軍事託管經驗也對許樂產生了實質影響。後者尤其重要，因為那讓他觀察到第一手的資料，有關如何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將一國的政治經濟狀況轉變⁸⁶。許樂認為他知識上的主要影響來源為美國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代對該國經濟結構與大蕭條成因所作的研究。對他而言，這些細密的政經研究，讓他十分明確與有系統地看到商業勢力的干政能力與堅固結構。

86

大戰、生活需求、與他本身對於選擇學術作為志業的徬徨，延緩了許樂學術生涯的展開⁸⁷。在他以戰後救濟政策的政治經濟研究為題，拿到紐約大學博士學位 (1960 年) 前，許樂以十年時間歷練了作為一個學期制為基礎的講師的辛勞。接下來，他應聘到伊利諾大學的經濟與商業研究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做

訪問學人，在此他將興趣投注到經濟資源的分配上，最後引領他研究無線電波頻譜做為一種自然資源應如何分配。雖然在該校期間，許樂一直隸屬於這個研究局，但他的作為受到傳播研究所的注意，在與史麥塞相識後，即於史麥塞返加後接下他的政治經濟學課程。一九六九年許樂出版了《大眾傳播與美帝》(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這本書得到廣大的注意，也引發了該校保守勢力的反撲，因為他們不喜歡許樂在此書中的立論及他個人反對越戰的立場。由於這個原因，外加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提出一個動人的替代性學院方案，於是許樂在一九七〇年離開了伊利諾。

在聖地牙哥時期，許樂生產了一系列的著作來定義美國傳播的政治經濟結構，並使批判觀點在全球滋長起來。許樂的著作一直將傳播研究置入廣泛的政治經濟脈絡中思考，他的第二本書《思想管理者》

—————

⑯ 這裡值得一提他的回憶：

我在德國見證了如何從反共政策中副產出經濟力的復甦，我看到那些本是要清除納粹勢力的措施最後全然失敗，我看到德國工業的卡特爾 (cartel) 組織的重新建立，我看到每一項行政障礙都是針對左派政黨及其政策的圍堵攻勢，感到印象深刻，我發現分割東西德政策的目的就在抑制西方世界社會變遷的機會發生，凡此種種政策都是相當有技巧地與手腕細緻地施行。我相當瞭解執政者的心態，這彰顯出這些事情不是隨機發生，而是由層峰內的階級意識所指導的。

⑰ 雖然他對商業有所敵意，然而一九四一年他仍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但他責難該校的學術精英作風：

在這裡我得到啟發，因為我瞭解到此地的研究所教育是如何地不適合我，當時的教科書離譜得令人訝異，好像是保守心態捏造出來的，使內容呈現出脫水過及抽離自社會的真空事實，更別談他們的理論。

(The Mind Managers) (1973) (譯按，本書有王怡紅遠流中譯本)，提出了首宗對資訊社會理想的實質批判，他詳載了如蓋洛普民意調查機構、讀者文摘、國家地理雜誌這般以廣大的政治與文化勢力，來經營資訊與文化工業的玩家，如何日復一日地進行企業整合與海外擴張的行動²⁰。接著，他的著作《傳播與文化宰制》(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問題，以及對智利阿葉德政府努力建立替代性傳播體制的觀察。他與 Kaarle Nordenstreng 合編《國家主權與國際傳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87 (1979)，生產了一個論文集專論世界傳播資訊新秩序的中心議題²¹。

後來，許樂又回到了資訊控制的主題，於是寫了《天曉得——幸福雜誌五百家企業所控制的資訊時代》(Who Knows)(1981)與《資訊與經濟危機》(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1984)這兩本書，他檢視了資訊與傳播系統對跨國資本運作的必要性，後者更指出這套系統能夠使發狂的資本主義解除資本積累上的危機，而得以繼續運作。

在《文化公司》(Culture, Inc.)(1989)一書中，許樂用過去的觀點重新檢視文化工業，提出學術規範的新趨勢，特別是轉向思考文化研究取向²²。在《希望與愚論》(Hope and Folly)(1989)一書中，他與 William Preston 二世、Edward Herman 合作，將資訊新秩序的

²⁰ 這本書出版的同年，Daniel Bell 也發行了《後工業社會的來臨》，這是一本提供辯論資訊社會議題的書。《當代心理學》雜誌調查發現，許樂的著作得到讀者的重視，該刊編輯下了一個許樂認為相當聳動的標題：「民意調查是為支持現狀而工作的娼妓」。

²¹ 這本書相當值得紀念，因為它是 Ablex 出版公司在 Melvin Voigt 編輯下所編印的第一本傳播專書，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這個出版社已經發行許多有關政治經濟研究的重要成果。

倡導與殞落過程記錄下來。另外他與 Nordenstreng 二次合作所編著的《超越國家主權》(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1993)，又再顯示出許樂回到他長久以來對國際傳播轉變的關心。許樂也與 Hamid Mowlana 及 George Gerbner 合作，邀集國際上研究媒體的學者，提出對波斯灣戰爭全球觀點的專書⁸⁸。

許樂彰顯了運動學者的典型，除了眾多的研究貢獻與著作改版、翻譯發行外，他並巡迴於各種地方、全國與國際性組織中，發表文化與資訊議題的演說。他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靈感給世界資訊新秩序的全球推廣運動，他曾是「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譯按：這個組織於 1997 年改名為「國際媒介與傳播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的領導人物，這個組織的成員大部分都強烈認同國際與政治經濟的研究。雖

88

② 許樂對這本書有以下說明：「這本書的主題並非只是學術界裡的小風暴」，因為他對文化工業的解析正是要批駁那些持以下觀點的人：認為文化的機制已不再存在；或認為以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反撲與超越，就可馴服文化的機制。

③ 《希望與愚論》記載了美國的保守勢力成功地動員起來反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本書起初由教科文組織資助出版，當時該組織頗支持 NWICO 的理想。但是當手稿完成時，教科文組織正想說服美英兩國重返該組織，因此拒絕發行此書，最後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發行，並且聲明該書內容與教科文組織的資助毫不相干。

根據 Nordenstreng (1993: 253) 表示，這並不是教科文組織第一次進行反知識分子的壓迫行動，早在一九七三年該組織就將史麥塞排除在一個建構傳播研究計畫的專家小組名單上，原因是他撰寫了兩篇分別批判主流國際傳播政策與醉心新科技態度的文章。教科文組織也在一九八二年的一本文集中，拒絕刊載一篇原本委託許樂撰寫的文章。最後，Nordenstreng 指出教科文組織連對能強化其革新的大會決議：「大眾媒介宣言」(Mass Media Declaration)，也未能堅守承諾加以推行。

然聖地牙哥分校的替代性學院遠景，被新保守主義分子所摧毀，但許樂仍能傳達他的思想給那裡的學生，以及同儕或接續世代中的傳播研究社群²⁴。

在史麥塞與許樂提供給後代的政治經濟學家，相當多的知識與政治立場上的靈感後，本節接下來要提出一些建構政治經濟研究的主題。政治經濟學家的一般學術訓練的興趣奠基在歷史的研究，這型塑了一個中心議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如何增殖傳播、資訊、與文化間價值的問題。Jhally (1990) 提出一個對廣告、閱聽人及文化的重要批判評價，使史麥塞 (1977) 對閱聽人商品的主要立論得以申揚與延續。Dan Schiller (1988) 從事對資訊不同思想的整合，同時包含了價值增殖 (valorization) 的過程。專注於歷史的研究首推 Stuart Ewen 的著作《意識的指導者》(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1976)，書中詳載大眾消費的社會建構如何透過廣告工業的發展而達成，此書外加他的近作《所有正在被消費的影像》(All Consuming Image) (1988)，可被視為一個等同於 Braverman (1974) 對二十世紀勞動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著作地位。總體來說，他們提出了一種存在於先進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大量生產與大眾消費的相互構成體。另外相關的著作有 Dan Schiller (1981) 與 Elizabeth Eisenstein (1979) 的研究，他們刻劃出一個報業社會關係的演變史，尤其關注從先建構商業用戶市場再轉變為大眾消費市場的過程，如此解除了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生產過剩所造成的經濟衰退與不景氣的危機。

史麥塞的學生對於國際電影工業的發展研究貢獻卓著，Thomas Guback 在此領域內的占有領導的地位。他的一九六九年著作檢視該工業自一九四〇年代以來的歷史，接續著又研究影片的商品化過程、

²⁴ 這種實質的影響可見諸獻給許樂的文集 (Becker et al., 1986)。但是這本書也未能全盤看清許樂的影響力，因為當此書出版後，許樂仍然持續其多產的研究寫作生涯。

電影事業資金配置的變遷、資金對勞工的影響、以及電影事業在廣泛的資本主義服務業經濟體中的角色(1987, 1989, 1991 ; 以及 1992 年 10 月的訪談)²⁵。Guback 的學生 Janet Wasko (1982) 接續他的興趣繼續研究, 她記載了提供營運資金的金融機構與電影工業變遷的關係。最近她開始關注新傳播科技對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影響, 以及其與國際視聽工業的互相整合(Wasko, 1994)。史麥塞另一位學生 Manjunath Pendakur (1990a), 也記載美國電影工業霸權控制加拿大電影的歷史。他們的電影工業歷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在於, 對生產與行銷體系之間的辯證關係給予細心的關照。雖然所有工業都重視這兩個部門, 但這對於媒體工業尤其重要, 因為媒體產品再製十分簡單, 並且成功的電影事業幾乎都有賴於有效地控制此兩部門中的資金流動。

電訊傳播與廣播電視的政治經濟歷史研究, 皆投焦於政治經濟中心與媒體權力中心的關係, 這樣的觀點見諸許樂(1969/1992, 1981) 對軍事化的全球電子媒體系統發展的研究、與史麥塞(1981) 對廣布於加拿大出版業、廣播電事業、電訊事業的依附現象演變的研究。後續世代的學者將這個重要的議題加以深化並重新檢視, 他們特別強調應注意存在於政府與公司集團權力間的關係, 這樣的研究見諸美國廣播電視制度的著作(Kellner, 1990; Winston, 1986)、電訊傳播的研究(McChesney, 1993; Mosco, 1982; Dan Schiller, 1982)、及雷同的歷史發生在加拿大廣電體制中(Raboy, 1990) 與電訊傳播歷史中(Babe, 1990; Martin, 1991)。Dan Schiller 的著作也相當重要, 因為他指出電訊傳播工業中有一股新權勢即將誕生, 他們結合組織健全的大型企業, 吹起鼓動工業權力結構改造的號角。Raboy 的著作對

²⁵ Guback(1993) 近來的編著, 回頭整理史麥塞的生前學術文章並予以出版, 有些甚至為其未出版文章。(譯按: 本書簡介, 請見《當代》1995年10月)

公共廣播制度必然有利於政治民主的論點提出挑戰，他見證出，在國家控制下的公共系統如何壓抑了社區與市民社會團體的聲音。新一代的學者持續記載美國 (McChesney, 1993) 與加拿大 (Coulter, 1992) 的傳播系統，如何被國家與公司集團勢力所侵占。另一個近來有趣的研究趨勢是，運用草根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傳播的權力構成，這樣的觀點可以彰顯勞工與社會運動組織的地位。舉例而言，Montgomery (1989) 以近代美國橫跨政治光譜的媒體改革運動為歷史個案；McChesney (1992a) 則提供建立勞工廣播電臺的奮鬥史；Winseck (1993) 關注先進工業社會，特別是加拿大，其勞工介入電信政策發展過程的歷史。

北美的政治經濟研究將所有權的集中化問題 (ownership concentration)，當作一項實質的主題，成為普遍的研究關注。其子題有：公司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 的趨勢使事業在特有的工業部門中控制越來越多的生產線；及傳播工業內在與外在的跨業別水平整合 (horizontal integration) 的趨勢。將印刷工業中的所有權議題，加以系統的研究當推 Herman 與 Chomsky 的著作《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1988)⁹⁰。他們以有利於政治經濟勢力的利益觀點與組織過濾的功能，來檢視美國報業對國際新聞的篩選編排方式，並從規模、所有權、營利額來區別媒體的位階 (p.3)。更明確來說，他們提供了大型美國媒體公司的財務資料、控制這些公司的集團的財產狀

⁹⁰ 這本書相當重要，因為該書鉅細靡遺地定義政治經濟的模式。他們生產衆多有關媒體的書籍，而且 Chomsky 為國際知名的知識分子與運動家。蒙特婁的加拿大國家電影委員會 (National Film Board)，以 Chomsky 本人廣闊的生涯為題材，將這本書的理念拍攝成一部紀錄片，並以書名為題。Herman 除了寫作有關媒體的書籍外，同時也廣泛地發表有關公司集團所有權集中化的評論文章，屢在其所創辦的刊物《Z》及《時代的謊言》(Lies of Our Times) 中刊出。

況、及連結媒體公司董事與非媒體公司董事的同盟關係；在組織過濾功能部分，涵蓋了媒體與廣告工業的關係、官方與公司集團自我動員作為新聞來源的優勢能力（提供近似官方的權威）、以及對媒體負面報導的反制砲火。另一個對新聞事業的研究為 Bagdikian (1992)（譯按：1996 年訪台，發表論文見《90 年代臺灣媒介發展與批判》，風雲論壇出版）的著作，他提出類似於前者的媒體所有權集中的分析，發現由於新聞事業與娛樂事業互相不斷地整合，已使資訊與廣告內容的界限漸漸泯滅²⁷。雖然加拿大的研究常以美國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勢力如何宰制加拿大媒體為題，但 Clement (1977) 卻以加拿大國內媒體為目標，指出其全國性媒體的所有權集中問題，而 Hannigan (1991) 更進一步將研究觸角延伸至國內與國際媒體勢力之間的整合問題²⁸。

北美電訊傳播的政治經濟研究，特別將焦距投注在事業所有權集中化的問題上。DuBoff (1984) 記述早期的電報事業是一種國家特許下的獨占勢力，而這種問題接續發生在電話事業的崛起上 (Babe, 1990; Danielian, 1939)、電磁頻譜的分配上 (Smythe and Melody, 1985)、及新傳播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上 (Mosco, 1982; Mosco and Wasko, 1988; Dan Schiller, 1982)。

電訊傳播研究如今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在開放獨占的服務供應者——美國的電報電話公司及加拿大的貝爾公司 (Bell Canada) ——的市場後，研究者應該如何思考未來可能的變遷呢？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有三種不同的路徑：一是檢視工業結構的變遷，特別查驗其特徵

²⁷ Bagdikian 的作品相當重要，因為他代表了以記者為職志的專業立場，提供商業化侵害專業規範的親身體驗，如今這類書籍也不斷地出版。Squires(1993) 則提供另一個更親身觀點的相關著作。

²⁸ 同樣的研究也見 Magder (1989)。

91 與早年北美的電訊傳播的企業聯盟 (cartel) 體制是否相同；再者，轉而關注商業與政府用戶的利益，強調前兩者勢力的結合意味著無論存在著如何的競爭，電訊事業的管理原則都會優先照顧他們的利益，助其達成效率與符合成本效益的經營；最後，政治經濟學家開始檢視伴隨著結構變遷而出現的政策論述，特別致力揭開主宰論述的根基，是如何由管制下的獨占事業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轉換到以市場競爭者角色提供成本為根基的服務的模式 (Mosco, 1989a; K. Wilson, 1992)。

媒介所有權集中的研究，現在正面臨一個日益艱難的課題，那就是如何能描繪出橫跨於舊有工業與高科技專業之中的媒體事業合流風貌。當我們研究的對象是較為分立的實體如報業、廣播電視、電影與電訊事業，那麼集中的情形較容易分辨出來；然而現今這種案例已不再存在了，譬如時代·華納公司 (Time Warner) 就介入了以上的每一項事業的經營，因此現今國際電子媒體的政經研究 (Downing, 1990; Pendakur, 1990a; Schiller, 1989; Wasko, 1994) 皆觀察到，電影與錄像公司都在使用新科技來推動彼此整合的趨勢，而他們的經營遠景不再衷情於單一的工業生產，而是矢志邁入媒介商品多元生產的時代。這種整合正是一種結構轉變過程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下的實例，政治經濟學家目前正加緊密切注意它的走向，如新力 (Sony) 與貝鐵士曼 (Bertelsmann) 透過整合來延伸他們的直接控制權，隨後拍賣掉他們的某一部門，給小公司承接，以填補這種隨時變動的媒體生態的空缺。後者的結構轉換，受到了支持後福特主義經濟學者的重視，他們認為公司集團的權力運作，現正需要小公司來分擔，以致能使集團創新與變革，降低官僚體制在大公司中的位階。雖然以上的立論已得到部分證實，但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反駁這種說法，他們認為大公司其實可以因推行去中央化的運作而獲利，因為運作的風險可以轉嫁給小公司，所謂減低集中化的趨勢反而強化了首要公司的地位 (Mosco, 1992)。Wasko (1984) 是第一位提出這種思考的學者，詮釋這對我們研究及測度傳播市場與媒體集中化程度時應有

的意涵。面對 IBM 與 Sears 等長期壟斷市場的大公司的激烈再造，政治經濟學將會進行激辯，來釐清究竟這種現象是昭告了資本主義本質的變革（後福特主義）？或只是反映出资本主義體系另一輪迴的發展，由系統本身的動力與自我轉換功能推動？最後 McChesney (1992b) 指出，也許研究媒介控制與所有權的政治經濟學家還會面臨一個更實際的挑戰：如何把此議題放在美國的政治文化脈絡中來思辯。McChesney 認為集中化研究正缺少如此的觀點，因此他推論此議題被邊陲化了，因為它的研究觀點幾乎無法掌握媒體的實際作為。

92

北美政經研究傳統下的另一個中心目標是：瞭解國家或政府與傳播事業的關係。研究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解釋國家定位時，不致偏向兩極觀點，也就是一邊認為國家是多元社會的壓力團體所認同的超然仲裁者，另一方認為國家是資本可依附的膀臂及喚使的工具。延續著 Danielian (1939) 對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研究主題，史麥塞早期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彰顯出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他認識到國家的定位一直處在一種天人交戰的緊張狀態中：一方面國家原則上意欲作為公司集團領袖間的調停者，但另一方面卻同時成為提供公用服務的公司集團的馬前卒²⁴。

許樂的著作《大眾傳播與美帝》(1969/1992) 指出，國家是傳播服務的主要使用者，這個說法使這本書別具意義，因為許多傳播文獻都只將國家當作傳播的管制者與政策制定者。政治傳播的文獻將傳播的議題限制在選舉活動與宣傳之中探討，但是 Herman 與 Chomsky 的著作獨創地視宣傳功能為政府日復一日的常務，而政治傳播研究卻忽視這樣分析的價值，因為它認為宣傳是一種事件型的議題（舉例而言，選舉期的競選活動），或忽視宣傳是由社會機制交互構成的修辭。許樂奠基在經濟學的背景上，開始視傳播為資源的一項，以這樣

²⁴ 這樣的緊張關係特別見史麥塞為支持公共廣播制度與國有衛星通訊系統時所作的研究。

的洞見，他開發了一個傳播研究忽略的分析領域：一九二〇年以來，美國政府（特別是軍事部門），獲得從軍事採購合同中獲利的主要公司集團首腦的支助，開始開發她所掌控的豐厚無線電波頻譜，這些頻譜正是執行電子傳播的中心管道。政府非僅是幫助主要商業利益分子取得傳播資源的仲裁者，同時也是資源分配過程的制定者，以確保政府擁有半數的頻譜，另外半數分給軍事與情報體系。許樂透過對頻譜與通信衛星公司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Corporation) 的分析，歸結出國家作為一個結構間的連結組織，浸沒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中，以致使它不僅是國家，更是資本家的國家。後代的學者分別從軍事面向 (Mosco, 1982: 第二章；1989a: 第六章；1993a) 及公司產業面向 (Dan Schiller, 1982) 來論證國家的這種角色。

政治經濟學認為，國家與資本間的整合與延伸關係，是個重要的辯論話題，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謂國家相對自主性 (relative autonomy) 論點 (Jessop, 1990)。這個議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指出先進資本主義體系下政府所面臨的基本困境是：即使國家欲以廣大社會或公共利益的仲裁者自居，仍必須多多關注資本家的利益。由於資本家之間對利益的看法互有爭議，外加反對這種不受抑制的資本積累的聲浪仍然頗具實力，因此國家無法輕易地將資本積累等同於公共利益³⁰。從這

93

³⁰ 主流的社會近來加緊關注國家利益的代表性問題，Robert Reich(1991) 提出一個煽動的問題「我們指的是誰？」獲得廣泛的重視，他的看法如下：政府與企業間的互相交流，使今日國家政策定義的問題更為棘手。舉例而言，美國政府是否仍要支持袒護好萊塢的電影政策？因為這政策所覆蓋的國內產業正包含了新力公司及梅鐸的傳播帝國。這個問題相當有趣，不過讓我們反問：這有什麼新鮮的？階級劃分的社會早就不斷爆發出這樣的質疑：我們指的是誰？這不只是認同的問題，同時也是物資的獲得與喪失的問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面對的責難仍是人民可以共享國家的認同，但卻不可共享社會的財富與權力。

個角度來看，Mahon 的研究相當有意義，因為她提出一個罕見的議題，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旨，來透視國家理論在管制上的應用，其眾多的研究對象之一就是傳播的管制。她認為瞭解國家的起步在於思考政策偏頗 (bias) 的生產機制，而這種公認的繁複政策過程是：

透過國家內部利益不均等的代表而產生，我們可以發現其結構有著意味深長的權力關係，由階級內與階級間的權力構成。透過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使各種社會勢力的結合循著一種特殊的方式——也就是以主宰階級寡頭霸權的長期政治利益為中心組合而成。(Mahon, 1980: 154)

Mahon (1980: 160) 以加拿大廣播電視與電訊傳播委員會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為例指出，我們可將國家管制機構視為不均衡代表的結構案例：

由於國家政治與行政機器的一般功能，無法輕易地壓制對霸權結構的挑戰威脅，因此設立了管制機構。國家的目的在於以政治中立的行政架構來持續推動協商工作，逼使挑戰勢力向霸權妥協。

儘管如此，她在結論中提到，這種妥協只隱藏在現實的背後，因為在現實環境中，挑戰勢力所屈從的對象常被說成是「國家的利益」，此一說詞正可掩蓋相對的霸權結構的存在，而這樣形式的妥協更投合於國家機器的運作。

北美的傳播學者刻正開始以如此的政治經濟觀點進行研究，舉例來說，Kellner (1990) 檢視美國的電視體制，證實從電視新聞與娛樂節目內容，及國家的管制與政策形成過程來看，電視實為一個惹人爭議的霸權結構。他認為，新保守派成功地以統治正當性與資本積累危機為由，重新定義了國家在傳播事務上的角色。為了達成以上目的，他們取消了支撐公共視聽空間的全套複雜政策過程，改用支持國

家以管理市場競爭為務的政策。雖然這種巧妙的政治成就已經達成，但他們無法高枕無憂，因為這種轉變無法除去根本的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所面對的自我矛盾，在電訊傳播政策的研究中 (Calabrese and Jung, 1992; Mosco, 1993b)、智慧財產權中 (Bettig, 1992)、傳播資訊新科技發展中 (Gandy, 1993) 都一再地被發現。Calabrese 與 Jung 以市場基礎的政策影響，作為瞭解鄉村住宅與農場生活的依據，又評估以鄉村權益為名所召集的社會運動對策，如此為電訊傳播的政經研究開創新頁，因為這種研究取向十分有意思地將議題放入一種重建鄉村烏托邦的迷思中，由「電子茅屋」(electronic cottage) 的理想予以重生。Gandy 的研究從 Giddens 的觀點取材，以結合全面社會控制過程的概念，指出政治經濟學中有「生產領域研究的偏倚」(productivist bias) 存在。論證的過程中，Gandy 認為那些掌握新科技的人士，可以將個人資訊與個身分資料加以商品化、控制、與再製，結果 Gandy 用政治性觀點檢討了包含 Beniger (1986) 著作在內的研究。

北美的政經研究素來有意，把對國家與企業的分析放置在國際關係領域內來看。史麥塞與許樂為這類研究立下了強韌的根基，雖然歐洲與拉丁美洲的學者也同樣贊助這方面研究，但我們將在下一節才介紹。這類的研究大部分致力於瞭解全球權力結構如何進駐媒體與電訊傳播工業，以及這對全球貧窮社會的影響。其文獻顯示，學者對不同的傳播發展 (developmentalist) 策略彼此爭辯，同時也給學術界一個明證，證實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假藉協助制定發展政策的呼籲，擴張他們媒介與資訊機構的實力。不過他們也對存在於媒體製作人、生產出的訊息及閱聽眾之間的關係為何，展開辯論 (Fejes, 1981; Schiller, 1993)。這些辯論形成一些議題供人研究：媒介帝國主義的構成、其與霸權總體過程的關係、訊息控制的延伸效果與意義、及閱聽眾的權力與活動。

現今一個更意味深長的議題開始浮現在國際研究中，那就是由美

國主導的霸權結構，刻正轉移成由各國的跨國企業與其國家機器，在其區域或全球中快速地聯合，成為新的全球傳播秩序的主宰者^①。這樣的關注使研究指向瞭解跨國媒體 (Wasko, 1994) 與資訊事業 (Dan Schiller, 1994) 的特徵、貿易協定的需求 (Mosco, 1990b; Samara-jiwa, 1993)、及國際組織特質的轉變 (Mahoney, 1988)，凡此變化皆可提供國家與企業一個解決「衍生自結構轉變的矛盾」的利器（也見 Comor, 1994）。Mahoney 指出，當今的國家與跨國企業的管理者，在致力協調出全球的策略與市場時，卻無法創造出一個為廣大世界公民所信賴的政治結構，於是面臨到一個難題：也就是在沒有全球政府的條件下，如何經營全球政策？

另一個重要的國際議題，是如何透過研究，支持世界傳播資訊新秩序的建構，曾經是 Armand Mattelart 的學生並曾任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Colleen Roach (1993a)，應用批判的歷史取向，結合階級、民族、性別的議題，來更新並開拓 NWICO 辯論的視野。她指出 NWICO 運動的挫敗原因，實來自教科文組織屈服於西方國家的壓力所致。McPhail (1987) 從加拿大政府的觀點，來回顧整個事件的政治經濟過程，他發現英美兩國企圖將聯合國拆解成更保守的組織。而 Mowlana (1993) 在中東、Lent (1985, 1990) 在亞洲、Atwood 與 McAnany (1986) 在拉丁美洲的研究，也都展示了透過結合北美研究的智庫與區域研究的經驗，可以提出更犀利的觀點。

北美政治經濟研究也重視如何以變遷中的國際分工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情勢來看待全球傳播的體制。Sussman 與 Lent (1991) 領導了這個領域的開展，他們聚集國際上關心此議題的學者，以批判態度檢視傳統的傳播發展模式——引領著媒體事業成長達

① 許樂 (1992) 在《大眾傳播與美帝》的修訂版中，特別回顧國際傳播的變遷，將此議題視為該書的中心主旨。

到國家發展的目標——作為起始。他們認識到傳統模式與其後修正模式 (Rogers, 1976) 的錯謬所在：不質疑現有的政治經濟權力體系，導致持續以滿足西方媒體與資訊企業、其強大的國家機器、與發展程度較低之國家 (less developed nations) 中的一小撮階級的需求來定義發展的意義，一旦發展政策施行，前者就可獲得超額的暴利。為了有效地達成前項目標，於是打造出一個勞動的國際分工，以支持跨國企業的彈性運作與控制力，極大化勞工、原料、資本的成本效益。執行這個過程的中心利器就是傳播與資訊科技，因為它們提供了克服時空障礙的手段，使得控制「變動中的市場需求與條件」的全球運轉與對策的管理，可以暢行。再者，科技提供製成品（傳播資訊的內容與工具）與手段，使企業所有的終極產出都享有附加價值（特別參見 Clement, 1990）。除此之外，Lent 與 Sussman 發現，為加速傳播工具建構國際分工，勢必會造成國家與周遭勢力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以致受到其他階級與社會運動團體的正面迎擊，因為他們為「發展」而付出社經代價。

96 雖然政治經濟研究的一般主題，皆投注研究傳播如何在權力體系內運作，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思考應如何抵抗、反對與動員，來建立反霸權的替代基礎。這方面大部分的研究，必須考慮到階級、性別與種族的社會關係，來瞭解抵抗的動力與反抗，如何與廣大的政治經濟氣候相連結。有的研究以社會階級關係作為背景知識，投注瞭解媒體與資訊工業內的工會如何反抗，及其行動如何扣連到廣大勞工的需求與理想 (Douglas, 1986; Lonidier, 1992; Mosco and Wasko, 1983; Waterman, 1992; Winseck, 1993)。

這種研究路線十分重要，因為他們釐清了傳播研究中的盲點。一般傳播研究的趨勢傾向於視其主體為消費者，行動為休閒活動，以區別於勞工與勞動的世界。除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外，傳播研究甚少投注焦點於：誰是大眾媒體與電訊傳播工業中的勞工、媒介勞工的描繪、及勞動議題的報導⁹⁶。這造成研究上的問題，因為他們失去理解

勞工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¹²，同時這樣的偏頗觀點，導致學者放棄進行以勞工與勞動階級為主的反抗動員，因為他們誤以為，此種訴求為時空倒錯下的夢想¹³。

政治經濟研究，也從性別著手研究社會關係：仔細地觀察女性，如何回應父權式的傳播與資訊結構。Martin (1991) 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個案，刻劃出女性的聲音如何被電信事業社會化。她描述女性在被導入電話接線生的工作行列及電話網路的使用者後，如何改變了她們社會的關係。Martin 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顯示女性聲音的建構，歷經了複雜的過程，牽扯了分別存在於工業生產部門與家庭消費生活中的權力、抗爭與反抗（另見 Moyal, 1989; Steeves, 1987）。

除了階級與性別，北美政治經濟學家在傳播研究中，也提出了意味深長的種族問題。近來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研究，是以史上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為例，探索有關種族內容所彰顯的社會階級關係。Jhally 與 Lewis 在《啓蒙的種族主義》（Enlightened Racism）(1992) 一書中，回顧了電視娛樂節目表達種族問題的研究文獻，評估各種對「天才老爹」節目的反應意見，然後他們歸結出這個全部由黑人飾演的喜劇，因為其情節都在談論有關「安逸與富裕」階級的故事，所以很成功地得到白人的接受。雖然 Jhally 與 Lewis 花了不少時間在探討此節目的文化根源，但他們並沒有忘記分析這類節目的生產與市場模式，此模式如何限制了弱勢族群在節

97

¹² 請見 Puette (1992) 對資訊與娛樂媒體事業內勞工的回顧寫照。

¹³ Schor (1992) 發現，除了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以外，先進工業社會中的工時一直在增加。

¹⁴ 請見 Luke (1989) 提出一個宣告勞工運動死亡的代表性個案。事實上分辨前述觀察的真偽十分重要：1980年代勞工運動的勢力逐漸衰退是不容爭辯的事實（遭到新保守主義的政府慘烈地攻擊），但這不等於宣示了勞動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永遠地消退下去。

目中質與量的曝光。

社會運動的研究，帶來了瞭解媒體／傳播事業與反對運動實務關係的契機。Gitlin (1980) 的研究具有典範的地位，因為他用反越戰運動作為個案，展現出在一個主要的政治抗爭運動中，媒體與社會勢力如何進行互相建構的過程。雖然大眾媒體開闢了空間給反對團體登台，然而十分矛盾的是，也讓反對團體陷入了由宰制團體所張羅的社會與論述機制中。簡要來說，當反對運動的領導者出現在鏡頭前，他同時也冒著失去特有草根性的風險。Bruck (1992) 以檢視加拿大反對運動的報導內容，來作為這類研究的延伸。他發現媒體運用再處理、重新組裝、重新配置的技巧，來再現運動的社會事實與論述事實，於是將社會運動重新建構在論述的活動中。而 Roach (1993b) 特別以 Eisler 與 Collins 的女性和平研究為例，解析她們如何影響了當代的社會抗爭。

最後，在歷經一段時間的醞釀下，政治經濟學家開始檢視因媒體變遷問題，所興起的社會運動，瞭解它們是如何自我組織的 (Wasko and Mosco, 1992)。Haight 與 Weinstein (1981) 奠基在一個調查議題上，提出一個重要的質疑：組織反對運動，來抵抗「以市場機制為根基的廣電政策」所產出的電視節目意識形態，這樣的行動有什麼矛盾性。Haight 與 Weinstein，及其他研究改革媒體運動的學者，無法預見八〇年代的這類運動，更加入了聲勢壯大的新保守主義分子及基本教義派分子，這些團體矢志以批評媒體節目與政策為標的，凡此過程與趨勢，Montgomery (1989) 在她的著作《黃金時段成為衆矢之的》(Target: Prime Time) 中，都有翔實的記載。

英國與歐洲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描繪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發展要比歐洲來得容易。原因之一在於，所謂北美的學派，吾人可以清楚地指認

出史麥塞與許樂為領域的開拓者，並可以看到他們的研究與影響力，烙印在二至三代遍布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學者。然而，雖然許多歐洲學者為此取向生產知識、提供政策與運動研究，帶來相當的影響，但是卻無法發現歐洲有如北美般的世代傳承關係。

98 James Halloran 為英國傳播研究發展的領導人物。過去二十年來，在其主持的李思特大學 (Leicester University) 大眾傳播研究中心裡，聘用高丁 (Peter Golding) 與梅鐸兩位學者做政經研究，立下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再者，Halloran 以任職「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這是一個專業的組織，標榜致力推動先進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主席近二十年的資歷^⑤，影響了全世界的傳播研究發展。儘管如此，Halloran 不願被歸類為政治經濟學者，強調其研究中心是以批判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傳統自居（1992 年 4 月訪談）。他解釋：該中心成立的宗旨在於回應一九六一年內政部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憂心，以及協助評估電視對此問題的影響。雖然他認同政治經濟研究的重要，但其主要的學術與研究興趣仍在發展批判社會學的取向^⑥。Halloran 將自己的取向與 Lazarsfeld, Klapper, Wright, Katz 等人區別，他認為這些人的實證主義取向，視蒐集必要資料比「問對問題」還來得重要^⑦。

在 Halloran 的任內，該中心持續地出版研究報告，其中梅鐸與高丁的著作給予傳播政治經濟學相當重要的貢獻。儘管如此，前三人

⑤ 請見 Hamelink 與 Linné (1992) 在獻給 Halloran 文集敘述。

⑥ 該中心 1984 年的計畫書，聲明以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為發展導向：自創辦此中心以來，我們就認為大眾傳播為一個研究興趣的領域，而非一個學門的規範，因此可以用數種取向來建構此領域的研究興趣幅度。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尤其是前者，為本中心最顯著的取向，但這不意味著其他學門：如歷史、經濟、政治科學、法律、語言學的研究貢獻不被認可 (Centre, 1984: 8)。

都同意，絕大部分有關社會問題的研究都是採用社會或社會心理學的觀點進行，雖然問題十分廣泛，但是主要焦點都在於年輕人、家庭與社區所面臨的問題，包括對少數民族的社會與傳播需求的關心。事實上，梅鐸發現該中心只獲得相當少的資助給政治經濟研究，這些資助撥給了 Philip Harris 的新聞通訊社研究、Peter Hartmann 的世界傳播資訊新秩序研究、與梅鐸的廣告工業研究，然而他們也結合了其他的取向一併進行研究，而且這些工作都完成於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從一九八四年以後，該中心的研究報告就都以社會與社會心理學研究為主（Centre, 1991; 1992 年 4 月訪問 Halloran，梅鐸，高丁），幾乎所有曾在該中心任職的研究者，所出版的政治經濟研究報告，都未受到資助。據此高丁歸結說：比起 Richard Hoggart 與 Stuart Hall 所領導的伯明罕 (Birmingham) 文化研究學派，這裡實在說不上有所謂李思特的政治經濟學派，甚至比不上 Jay Blumler，Dennis McQuail 在里茲 (Leeds) 大學所形成的政治傳播研究學派。事實上所謂第一個類同於政治經濟研究的計畫，是結合一群個人努力的成果，由梅鐸，高丁，外加 Philip Elliott 及其他零星加入的學者，為尋找政治經濟研究的模型而努力⁹⁹。他們的共識是發展批判的社會學，而不是發展政治經濟學。

99 他在一九八一年的文章中直接批判實證主義：

我可以無疑地批判該主義的要旨，所謂科學的定義完全依據方法來認定，幾乎從未對理論、概念、相關事務的本質、主題的實質內容以及與廣大社會的關係，進行任何思考。(Halloran, 1981: 23; 也見 1963, 1978, 1983)

100 高丁，梅鐸，Schlesinger 曾出版一本紀念 Philip Elliott 的文集 (1986)。Elliott 為人類學家，對於政治傳播研究有實質的貢獻，也與高丁合作出版一本最早對媒介作唯物分析的著作 (Elliott and Golding, 1972)。

Halloran 並非同輩歐洲學者中唯一支持（間接地）政治經濟研究取向的學者。舉例來說，Dieter Prokop 的媒介政治經濟學，以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進行傳播事業的研究（1973, 1974, 1983）。Enzensberger 的文章〈媒介理論的構成〉（1983），早就提出呼籲，以階級關係、衝突、矛盾、及顛覆性的媒介理論，來填補馬克思理論對媒介論述的空白。雖然就歐洲平行於許樂的時代而言，我發現已有政治經濟傳播研究的出現，但是卻沒有如史麥塞與許樂般的世代傳承。接下來，我轉向介紹一些實質尚可稱為「衍生自政治經濟學觀點的研究」。

長年以來，Kaarle Nordenstreng 在芬蘭領導著國際傳播的研究與發展，並推動關於 NWICO 政治議題的辯論。從一九六〇年代起，他在西方傳播研究中，致力批判實證主義與科技烏托邦思想（1968），最為著稱的是有關全球傳播動態的研究，特別是他努力矯正大眾媒介中的失衡現象或推動媒介民主化的工作（Nordenstreng, 1984; Traber and Nordenstreng, 1992）。他的研究素養深厚，兼具政治運動者的不屈不撓精神，將大部分精力投入 NWICO 運動。Nordenstreng 擅長於組織世界各地的學者，包含政治經濟學家與政策工作者，至今只有極少數地區未曾被他的敏銳組織能力影響到。

Nordenstreng 與許樂（1979, 1993）合編國際傳播研究的論文，強有力地影響政治經濟學。然而，Nordenstreng 與史麥塞、許樂不同，我們不能輕易地說他是政治經濟取向的研究者，但不是因他對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不感興趣，他曾使用類同於許樂與史麥塞的研究架構，舉例而言，他近來的一篇宣言（1993），致力於建構 NWICO 相關研究典範的形貌，以實存主義的認識論、全觀的社會理論、社會平等價值為中心的規範作為主幹；也開始憂心諸如「詮釋學的解決路徑」、「一些後現代的流派」等議題，提到它們是否走得太遠以致成為政治經濟學典範上的敵對勢力（1993: 271），而這正是政經學派的顯要考量。儘管如此地投緣於政經觀點的評估與價值，他並未對傳播

與大眾媒體的經濟面研究感到興趣。我們可以說，Halloran 以批判社會學為興趣焦點，Nordenstreng 則是以傳播的政治批判為焦點，特別在其國際政治宣言中可見，這正是他治學的根基，使其長時間投注心力於政策研究與政治介入。他的行事風格已影響了不少傳播學者與運動分子，也包含了政治經濟學家，但是，對於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力，Nordenstreng 無法等同於史麥塞與許樂，因為他對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中的經濟思考，沒有實質興趣，又選擇了顯著的政治議題進行研究，因此無意著墨於傳播與文化的商品化、媒介事業等議題。

介於一九七四到一九八二年間，一些零星的理論與研究計畫，有助於實質地將政治經濟學推上歐洲學術知識的水平，使其有了成長。歐洲與北美的政治經濟研究，彼此的主題與方法是平行發展的，雖然有不同之處，但只是重點強調的不一，而非基礎立場的不同。儘管如此，我仍確信，歐洲的政治經濟學採納了更多自覺的論點，關鍵的著作有梅鐸與高丁的〈論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研究〉(1974)，以及〈資本主義、傳播與階級關係〉(1979)；Garnham 的〈論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1979)；以及 Armand Mattelart 為兩本書（與 Siegelau 合編）：《傳播與階級抗爭卷一：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1979) 及《卷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1983) 所寫的導論。這些著作受人矚目，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足以影響政治經濟研究的計畫綱要³⁹。再者，奠基在前兩本書的延伸研究，也從未偏離原來的計畫立場⁴⁰。

101

³⁹ 這是歐洲發展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時刻。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著作將政治經濟、馬克思理論，以及傳播實務問題結合於一體 (de la Haye, 1980; Hund and Kirchoff-Hund, 1985; Prokop, 198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義大利的政治經濟研究群，包含 Giovanni Cesareo, Roberto Grandi, Giuseppe Richeri 等人，他們的著作 *IKON* 對北美與歐洲有相當影響。而在西班牙，一個包含馬德里的學者 Enrique Bustamente 在內的群體，出版《Telos》期刊，也探討了傳播與新科技的政治經濟與政治分析的議題。

而且，這些後進的研究也沒有沾染到一般人諷刺政治經濟研究的息氣：如經濟化約主義 (economism)、獨尊生產領域的分析 (productivism)。

梅鐸在接受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訓練後，開始以這樣的背景知識來研究文化生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六〇年代末期於 Sussex 撰寫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紐約與巴黎精英藝術市場的興衰。他對通俗 (popular culture) 與青年文化的興趣，引領他進入李思特大學，在此二十年進行了文化與傳播的社會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近來他離開李思特大學，加入高丁在羅芙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任教的學院，而高丁也是在李思特大學付出大半生精力後離開至此。高丁雖然受社會學的訓練，但他卻投注興趣於傳播的社會政策面向研究。Garnham 以電影工業的經驗進入傳播研究，他創辦了《媒介、文化與社會》期刊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並在在倫敦中央工技學院 (Central London Polytechnic)，一九九二年後改名為西敏寺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任教^⑩。

比利時出生的 Armand Mattelart，在魯汶 (Louvain) 大學得到法律與政治經濟的博士學位，並在 Sorbonne 大學得到社會學研究學位，於一九六二年起在智利大學任教，致力推動民主的傳播系統建構。一九七三年，美國暗中支持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的社會主義阿

⑩ 這樣的看法顯然不同於 Curran (1990) 的觀點，他認為近來的政治經濟學家，特別是梅鐸與高丁的論文，改採一種「新修正主義」(new revisionism) 的立場進行傳播研究，詳見本節後半部的探討。

⑪ Garnham 強調兩個重要事件影響他的發展方向：首先是 Hoggart，Leavis，Thompson，Williams 所開創出的英國文化研究與社會歷史研究的傳統，導引他進入文化工業，自己並在一九六〇年代製作紀錄片，包含了與 Williams 合作的一個電視節目；其次是介入對英國電視節目方針與英國廣電協會 (BBC) 定位的論辯。

葉德政府，使 Mattelart 在智利的學術生涯為之終結。住在拉丁美洲時期，他受當地區域研究課題的發展影響，並協助進行當地的研究。這樣的環境也使他有機會與史麥塞、許樂聯繫，因為他們正在該區域進行美國媒體影響的研究（見 Schiller, 1976）。Mattelart 也領略了法國社會學家 Edgar Morin 的「文化工業」研究取向。自從他離開智利後，就在法國的 Rennes 大學任教。

這些早期學者的著作，雖然彼此的意見有些出入，但都一致彰顯他們批判地應用馬克思理論的興趣，對傳播、大眾媒介及文化實務展開迥異尋常的閱讀。梅鐸與高丁的一九七四年文章是一個打下根基的實作，因為他們勾勒出媒介政治經濟分析的概念藍圖，使工作得以續行，同時這樣的文獻在英國也算是首次出土¹⁰。他們以英國的媒體作為個案，探討存在於出版業、報業、廣播電視、電影與錄音唱片事業中的業界結盟與所有權集中現象。除了提出業已被接受的媒介集中化趨勢——整合與多角化經營，他們也指出當時的新發展——英國媒體的國際化。最後他們轉而關注議題背後的意涵，包含資訊與娛樂選擇幅度的萎縮。雖然他們提出對大眾媒體商業力量的系統分析的先見，但為了使結論經得起考驗，他們把議題拉到更高層次來思考：

描述與解釋媒介的商業利益，不是要提出一種決定性的關係，而是要畫出生產媒介文化內容過程上的界限，但是文化生產也保有實質的自主，這來自傳統、職業的意識形態、及從自由主義共識衍生出的真誠包容文化。（1974: 226-227）¹¹。

¹⁰他們認為（1974: 205）媒介「完全沒有被重視」，無法與教育的研究相比。他們指出一九七二年英國出版一本文集叫《權力在英國》（由 Urry 與 Wakeford 編著），書中不但沒有談論媒體的章節，甚至在索引中連媒介的關鍵詞都沒有。

梅鐸與高丁的一九七九年著作，提供一個更明確的理論藍圖，欲將政治經濟取向放入廣大的批判理論架構下。這顯示，他們認為，過去對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取向的批判導讀，提供了傳播政經研究與馬克思理論遺產間一個橋樑。舉例而言，梅鐸與高丁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與馬孤哲（Marcuse）在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貢獻，特別是阿多諾的音樂工業研究，作為回顧馬克思文化分析取向的開始。他們在結論說到：

阿多諾堅持文化宰制的過程根源於文化工業的經濟動力，這是採行馬克思理論分析的必要起點。（1979: 18）

103

儘管如此，他們強調這僅是一個開始，並批評如果想以分析文化工業資本得出「文化生產形式投合宰制資本的意識形態」的結論，這樣的想法未免太過簡單，難以成立（p.18）^⑩。Garnham 在同一年的文章中，也談到法蘭克福學派對上下層結構關係的基本看法，在與後阿圖舍主義（post-Althusserian）的傾向對比後，更值得稱許。為彰顯法蘭克福學派在學術上的成就，他說：「在壟斷資本主義下，上層結構逐漸明顯地被工業化，受到下層結構的侵蝕，以致原本上下層結構的區分就崩塌至下層結構而消失。」他將這個看法，與一種替代性的觀點相抗衡——其結論反過來說：「下層結構轉變成另一種自主論述

—————

⑩ 看到如此的警醒，出現於試圖將媒介經濟學置入廣大理論架構的早期著作中，感到十分有趣。這正顯示，他們的取向，從一開始就將「經濟化約主義」排除在外，同樣的警覺也出現在近來的著作中。可見他們不是所謂「新修正主義」（Curran, 1990），近來的發展只是他們二十年來一貫的研究立場的再次強調。

⑪ 梅鐸在與我的訪談中（1992年4月）表示，與法蘭克福學派傳統更直接的聯繫是 Dieter Prokop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著作。

式的上層結構」(1979: 130)——如今正被文化研究所採納。儘管如此，等同於梅鐸與高丁的看法，他對法蘭克福學派在這議題上的立場提出以下評論：

法蘭克福學派初始立場的真正弱點，不在他們無法瞭解下層結構與經濟的重要性，而是未仔細檢視他們所說的經濟過程中的矛盾本質，以致得出文化的工業化是無法阻擋、沒有問題意識的結論。(p.131)

Mattelart 從立場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馬克思思想出發，未扣連於法蘭克福學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Western Marxism) 取向，無疑地，他相當瞭解這樣的分離展現了法國傳播研究的部分核心問題。法國的媒體研究，幾乎未曾吸收「影響霍爾的伯明罕學派」的阿圖舍與巴特 (Barthes) 等知識分子的理論，而 1980 年代以前，法國也未曾翻譯過哈伯馬斯 (Habermas) 的著作，以致缺乏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交流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儘管如此，如同他的英國同志，Mattelart 撇去一切有關視權力為單一構成的看法，認定權力當中有根本的矛盾存在，因此自始就放棄採用阿圖舍的意識形態研究取向¹⁵。

104 這種將傳播研究根植於馬克思傳統上的興趣，引領著以上的學者與志同道合人士，堅決地不再以媒體中心的概念進行理解¹⁶。馬克思

¹⁵ 他如此說到：

阿圖舍意識形態理論的極大誤導之一是，那種理解宰制意識形態機器功能的一統與垂直進行的概念，以致未曾思考機器本身受制於階級矛盾的本質。這種取向最明顯的效果是，忽視掉被宰制階級對宰制意識形態的反抗、及意識形態機器運作時的內部失和特性。(Mattelart and Siegelau, 1979: 29)。

政治經濟學的真義，在於以生產的關係與權力的發展、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商品化、社會階級的分化與抗爭、反對運動與矛盾的本質等種種觀點，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立場。事實上，將媒體去中心化反而大幅提升媒介研究的身量，因為他們把其從孤立的、邊陲的、全然未理論化的研究位置上抽出，放到廣大資本主義體系脈絡下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基石上。梅鐸與高丁（1979）特以「雙重真空」的觀點來形容媒介中心化觀點在媒體與社會研究上所造成的缺憾：這類研究趨向以標準的方式來構連社會的情境，有如購物清單般地陳列出來——媒體與階級、媒體與青年、媒體與女性等等——形成了一種鬆散連結的多元主義（pluralism），使媒體在社會性的理論研究中消失。

Garnham（1979: 123）認同將傳播置於廣大理論架構下的作法，因此他強調將文化的政治經濟研究，放置在對資本主義的全盤分析中進行，以「大眾傳播的政經研究為輔，對廣泛的文化生產與再生產過程進行歷史特定模式的分析。」許多 Garnham 的研究興趣都來自閱讀及參與政策辯論的經驗，這些興趣主要在思考英國大眾媒體與電訊傳播未來的走向¹⁶。他的理想也來自與 Raymond Williams 的共事，期望為通俗文化設定一個民主、反抗與替代性的發言位置，以有別於市場導引下，意欲將大眾附掛於大眾消費的過程（1993年11月的

-
- ¹⁶ 這裡無法一一敘述他們的同志。儘管如此，有一人不得不提，那就是 Seth Siegelau，他與 Mattelart 在幾個計畫上合作無間，包括合編兩本《傳播與階級抗爭》論文集，及數本《馬克思主義與大眾媒體》書目摘要文獻。他也創辦了大眾媒體國際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及掌管 International General 出版社業務，這個出版社正是負責出版以上媒體批判研究的著作。Siegelau 的政經知識主要來自他的政治運動及勞工生涯。
- ¹⁷ 他在一九七三年的專題論文中（1978年修訂出版），以英國電視公共政策議題的政治經濟分析，來彰顯出自己的走向。

訪談)¹⁸。同樣的，Mattelart 也指出(1979: 36)：

「傳播機器的運作功能，將決定訊息的交換與精緻化程度，進一步聯繫到交換與生產的機制，此兩者限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人類活動發生的條件。」

這種將媒體去中心化的過程，受到學者不同程度的支持，具體例證見諸於種種對資本、階級、矛盾、衝突、與反對勢力抗爭的研究。資本的分析對梅鐸與高丁而言(1974)，是「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明確的開始。」特別是，這意味著「以大眾媒體作為生產與行銷商品的工商業組織為研究的首要知識」(pp. 205-206)。Garnham 在面對阿圖舍/ 培蘭札斯(Poulantzas) 的理論挑戰——所謂將社會形構，化在相對自主的等級上理解——提出以下論點(1979)：他強調，應首先視大眾媒體為經濟的實體，並賦與兩種特質：一為透過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取得「剩餘價值直接生產者」的經濟角色；二為透過廣告，在眾多商品生產中取得「間接創造剩餘價值」的角色(p.132)。所以從這個立論看來，他遠超過了相對自主的定位，並指陳：「存在於具體的社會體制與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賦居的商品特有形式之間，是一種緊密相互纏繞的關係」(p.132)。Garnham 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卓見，在此彰顯出來，因為社會的形構好比一種通則的、抽象的趨力，將所有事物都化約為交換價值，他認為《資本論》就是提出這樣看法的成熟著作。Mattelart 則描繪出傳播生產模式的特有面向，它包含：首先是生產的工具（傳播資訊的機器）；次來，工作的方法（特殊類別的實務、規範等）；最後，生產的關係（財產

¹⁸他也立即強調，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通俗文化活動的部分過程，換句話說，它是知識分子與通俗的民主運動的學術黨羽。

關係、發訊與收訊者關係、分工、組織模式與實務)。

在歐洲的政治經濟學家眼中，接合 (articulation) 階級的關係是一組複雜與矛盾的過程，然而卻是政治經濟分析中的重心所在。一般說來，這種關係存在於傳播企業家與廣大的資本家階級之間、媒體工業的領導者與實際產製媒介商品 (屬於勞動過程的特有形式)¹⁹ 的勞工之間、及接收 (或是採納、重組) 與抵抗文化商品被賦予的意義的行動之間。

儘管資本具有權力，但是資本價值增殖的每一步行動都會產生矛盾，因此，雖然政治經濟學家承認資本的力量在吸納社會，使包含傳播在內的實務融入交換價值的邏輯，但是他們也認為，文化生產並不直接衍生自交換價值的邏輯。這個邏輯並非沒有矛盾，Garnham 在結論中說 (1979: 136)：

學者應於一開始就否定這樣看法，因為資本雖控制了文化生產的工具……但這不意味著，文化商品必然會在它的明顯內容中，或在文化專有的模式內，支持宰制的意識形態。

106

不只如此，套用 Garnham 的說法：文化的商品還有「巨大的顛覆力量」。文化商品應該被視為抗爭的產物，存在於資本家與非資本家的社會構成之間、各自構成中的不同階級之間、及不同的社會構成之間。舉例來說，如書籍與電影可用藝術工匠的手法來製造，也可用資本的邏輯來生產，只要資本家控制了大量的再生產與行銷管道；而藝術工匠的生產方式也提供資本家多樣的選擇，且吸收了資本家生產的風險。儘管如此，這種生產模式還是可以捍衛公共領域與公民身

¹⁹雖然梅鐸與高丁 (1979: 18) 盛讚阿多諾的著作，詳載了資本主義對音樂工業的影響，但也指出他忽視了實際生產這個文化商品的人們的具體生活。

分、對抗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下的公司集團與消費主義。

Mattelart 將矛盾與衝突議題放在國際的脈絡來看，使研究更為周延。他早年作品的理念，廣為既存的傳播學者與政治經濟學家所採納。他提出廣角的文化帝國主義觀點，除了瞭解傳播權力的進行，還考慮有關「次帝國」(secondary imperialism)的複雜形態，在墨西哥、印度、埃及與義大利等地的發展；檢視文化帝國主義的多樣社會實務，如體育與觀光等；從大眾(mass)、通俗(popular)、與國家文化的概念，來理解生產與接收關係的矛盾與衝突⁵⁰。

本節剩餘的部分，將進一步介紹英國與歐洲政治經濟傳統下的主要研究。我的目的不在窮盡瞭解這個領域，而是標示出與以上所提出的多種理論見解相關的重要研究流派。

許多作品都顯示對歷史分析的強烈興趣：立基在深厚的英國報業史傳統上，柯蘭(Curran, 1979, 1991)與 Sparks (1985; Sparks and Dahlgren, 1991)從政治經濟架構下的階級分析來檢視這個研究領域⁵¹。柯蘭的著作，對於階級衝突歷史的發現與激進勞工階級報紙的興衰研究貢獻卓著，這些都是英國工黨(Labour Party)發展史上的核心議題⁵²。Jacques Attali (1985)採取不同尋常的政經觀點，發展出對音樂的歷史解釋，將其視為一種文化形式，作為社會結構變遷的預

⁵⁰ 這些理念出現在一九七九年的文集，並在一九八三年的著作中得到更周延的展現。Mattelart 認為 (Mattelart and Siegelau, 1979: 56)，他的妻子 Michèle Mattelart (1977) 對大眾與通俗文化之間差異提出更清楚的界定：後者無法等同於大眾文化的形式，而是「一種相當不同的社會實務，是史前時代的目標，如馬克思所言，由其他社會行動者實踐出來。」特別是，通俗文化是人民的經驗，「從追求自由的謀畫中，使自己轉變為文化經驗中積極的主體。」

⁵¹ 正如 E.P. Thompson 的著作展現 (1963)，分析資訊與通俗媒體是英國社會史中極具意義的題材。

示者與反映者。Attali 的音樂解釋為一種深厚的總論瞭解，而非細節的探究，他標示出四種音樂發展的網絡（牲祭的——工業發展前；再現的——音樂廳時代；反覆的——個人化的錄音；創作的——自我傳播），具體賦形並寄望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出現。採用相同的整合取向，但是更為強調政治經濟面向，Flichy (1991) 寫作的傳播通俗史，將北美與歐洲的發展關係展現出來。

也許由於歐洲總體的電訊傳播系統發展得相當穩定，因此比起北美來說，既沒有明確的政治經濟觀點研究，也沒有太多值得記載的歷史事件。所謂穩定，指的是一個由國家壟斷、控制所有電訊傳播器材與服務的生產與行銷的系統。如今正如北美的發展，歐洲的電訊傳播事業，目前也投注更多的努力進行改革，這些議題與資訊特別由 Becker (1989, 1990) 編輯出版。

歐洲對特殊媒體的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派在內，發展得十分緩慢。而在鼓勵傳播學、新聞學、及相同領域內的教學與研究上，歐洲大學的意願都較北美來得冷淡。所以當個人執業的印刷、廣播與電訊傳播事業，已發展成爲一種工業部門的時候，無論從哪個學科角度來看，歐洲的研究數量都比不上北美的成果。雖然歐洲目前日復一日地有更多的研究中心成立，改變了過去冷漠的態度，但是他們現在所面對的正是一種迥然不同的媒體工業。也就一種打破傳統媒體分界的新整合，逼使著現今研究特定媒介部門的政治經濟學，都不忘小心翼翼地觀察其整合與全球化的趨勢。Mattelart (1991) 的著作《廣告事業的國際化》(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就是一個最佳例子，他取材廣告事業在歐洲的政治經濟發展現況，以致證實他一向的觀點，認爲廣告工業目前業已被整合入其他的媒體部門，同時廣告已從傳播訊息

⑫ Herman 與 Chomsky (1988) 在一本全然探討美國媒體的書中，卻引用了柯蘭對激進報業的歷史研究，實在很有意思。

流動中的商業插播角色，轉變成傳播的基本手段，及公共空間中的基本發言人⁵³。

108 爲了發展他的主題，Mattelart 記載了成長中的歐洲、日本與澳洲的廣告公司，如何向美國的霸權挑戰。許多這般作爲，是由 WPP（購買包括 J. Walter Thompson 在內的許多公司）與 Saatchi & Saatchi 公司（買下 Ogilvy & Mather）帶頭領軍進攻，扭轉了自一八九九年以來的趨勢，那時美國公司 J. Walter Thompson 在倫敦設下第一個海外分公司，從此衍生出四十個海外子公司。然而這項研究的政治經濟意涵，非僅僅在於分析廣告公司如何進行橫跨大西洋的商業探險，更重要的是，看到廣告公司如何依尋著他們在商業運轉上的連結關係來擴張。廣告工業除了買下刊登廣告的空間外，他們也是市場研究、意見調查、收視率測量、諮詢顧問、設計、繪圖、促銷、直接行銷（包括以新科技進行的電傳行銷）、視聽製作、錄像傳播、贊助商、與公共關係的產業。廣告公司與媒體攜手進行合併、聯營、合夥、策略聯盟及其他方式來擴張它的商業連結網，這也造成其工業動力結構的轉變。這些轉變都靠賴著科技的合流（convergences），來維持其工業在管理組織形式及部門變遷上的能力，也幫助公司持續地、鉅細靡遺地追蹤消費者、供應商、競爭者與產品的動態。除了例外的個案，政府政策必然以下列手段支持如此發展：解除存在於各工業部門及業別間的市場門檻限制、解除限制企業合併的規定、稽核會計部門以抑制可疑的給付，諸如隱藏的折扣、高額的佣金、禮物、回扣等。

在其多產的學術生涯裡，Mattelart 總是小心翼翼地研究政治經濟之發展與當代文化變遷的關係。對他而言，這些連結的複雜性遠超

⁵³一九八七年在比利時一本商業出版品中有人撰文提到 (Mattelart, 1991: 29)，一種廣告的新時代已被商業界認同：「廣告不再存活，而是永遠長存的傳播！」

過國家與企業財團結構的理論，它們與人類、公共的空間被改造成私有商品的過程，密切相關——正如同 Omnicom 公司經理宣稱：「私有商品是首要策略的物資」(Mattelart, 1991: 17)——可供傳播工業盡情地利用。儘管 Mattelart 所引用的家塔理 (Guattari) 之資本社會主體性的說法⁵⁴，強化了這個有力的結論，但是他仍然無法全然滿意這種看法。他同意寶笛 (Bourdieu) 的說法，認為文化是「自我防衛」的形式：

這是自由思想的手段，如同軍事的技藝應用在其他領域內，可以容許公民對抗符號權勢加諸於他們身上的濫用，無論這些權勢是廣告的，宣傳的，或政治的、或宗教的廣告濫用。(p.217)

由於 Mattelart 並未將對抗資本主義主體的社會文化實務作為研究的興趣，因此無法全然清楚掌握反抗的程序。所以，現今學術界需要對複雜與動盪的工業，進行強有力的政經分析，但是也無法在短期內，確定反抗實務的全面影響是什麼。

Mattelart 在廣告研究上的成就，使他重新思考不同形構的政治經濟學的多元與動力論 (variety and dynamism) 問題。有些研究者，只圖以公司的規模與所有權集中程度，來看待傳播工業權力，他企圖打破這個瓶頸。雖然並未在著作中明確表示，但至為明顯的，Matte-

⁵⁴ 根據家塔理所言：

經過了不同形態與規模的專業階級的中介後，資本主義的主體性已經成為一種形式，它可攻占任何意圖侵擾與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事物本體中。無論任何具有特異風格的事件都必須消除，都必須臣服於它的設計，及它指涉的專業與特有的基模 (轉自 Mattelart, 1991: 217)。

lart 意圖發展對體制結構及彼此間的連結關係、與資本主義傳播工業的權力動態的研究⁵⁵，這樣的觀點近來持續為歐洲媒體工業的政治經濟研究者接受，並加以推廣（特別見 Mignot-Lefèbvre, 1993）。

Aksoy 與 Robins (1992) 站在更理論性的觀點，對電影與錄影工業的結構轉變進行政治經濟解讀。他們質疑，所謂後福特主義理論的主張 (Christopherson and Storper, 1989; Piore and Sabel, 1984)，觀察到如 Mattelart 敘述的結構變遷形式，並未得出一個大家信服的結果，反而分裂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看法。分裂的一端是福特主義 (Fordism)，它認為由大型、整合公司所領導的，為達成大量消費的大量生產體系，其市場宰制地位因國家的支持而穩定，而體系以維持經濟繁榮，進一步使政治穩定來作為回報；分裂的另外一端是後福特主義，他們認為，面對高度分化市場需求特殊產品的壓力，產業必須進行去中央化的改造，轉變成一種存在於生產者、供應商、及投資者之間的靈活網路，在此國家的角色也由對社會契約的保證履行，轉變到對推動市場的承諾。Christopherson 與 Storper 以後福特主義觀點，來研究電影與錄像工業，發現好萊塢過往在福特主義認定下的垂直整合攝影棚系統，如今被公司策略、新的傳播科技與變化的政府政策所轉換，成為後福特主義的組合：所謂大小公司結合起來，依據人口變項與地區差異十字交叉出的廣闊市場範疇，生產多樣性的產品。他們認為，獨立製片者由於具備著靈活的專才，所以可以保證品質的創新，在指日可見的全球視聽市場中，具有日復一日的舉足輕重地位。

Aksoy 與 Robins 贊同 Mattelart 及其他學者的見解，他們承認傳播工業中的結構轉變，是很重要，但他們認為幾乎沒有任何證據顯

⁵⁵ 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 的著作對此反思有更廣泛的關照，而這樣思考的前兆出現在 Mattelart 等人早期的著作 (1984)。

示，所謂後福特主義的建構，可以成為工業轉變的新主張。他們發現，雖然不是所有大公司都能透過協商達成結構轉變，但是一旦成功後，大公司都更加地孔武有力。現今的公司策略、科技變遷、及政府政策都支持公司能更輕易地橫跨媒體與國界來擴張勢力，如好萊塢工業的主角：時代·華納、新力、新聞公司集團 (News Corp.)，已轉換成為垂直整合的全球媒體與資訊的公司集團。引證 Wasko 與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認為，雖然獨立製片的數量增加了，但那只是分攤了大公司的產品風險與人工成本，反而使大公司能繼續控制關鍵性的資金與行銷管道。Aksoy 與 Robins 對好萊塢的變遷作出以下結論：好萊塢如今分化得更為成功，雖然其產權不是全為美國掌握，但是好萊塢的主要玩家，比起過去全盛期來說，更能取得更多的資源、市場與歲收。Aksoy 與 Robins 進一步對只應用工業模式來研究媒體的作法提出警告，因為媒體領域內，包含了由多種形式的文化商品及生產定義出的特有邏輯，再交由行銷過程來執行，這不是單單工業模式的思考可掌握的。

許多這方面的研究在 Miège (1987, 1989) 與 Grenoble 大學同僚們的著作中皆可看見。Miège 從許樂與 Mattelart 的巨觀政治經濟學出發，他的研究興趣，在於瞭解不同文化工業的差異¹⁶。Miège 認定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始自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的研究，但認為他們的著作受限於僵化的文化工業藝術創作概念，以及忽略了其工業結構中的反抗意識。Miège 圖以檢視傳播如何作為一種多樣式的商品生產過程，來提出他們研究上的瑕疵，特別針對前者——所謂藝術創作的概

¹⁶ Miège 的著作顯示他立足於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制度傳播研究之間，他從後者的觀點出發，描述建構傳播成為制度活動的特定組織實務。儘管如此，他將興趣充分地分配在研究傳播作為一種商品生產制度、與組織實務對廣大社會的總體關係，這使其著作有妥當的根基，屹立在兩種政治經濟學交會的邊界上。

Miège 集中研究精力在三種生產的類型上：(1)非資本主義式的，以雇用藝術工匠從事技能生產的事業；(2)資本主義式的，以雇用薪資勞工生產剩餘價值；(3)間接生產性的文化勞工，將文化活動整合入價值實現的過程，比如，購物中心的音樂演出。雖然 Miège 同意傳播與其他生產形式一同面對價值增殖的問題，但傳播於再生產過程中還有其他問題。後者的發現為文化工業的核心要素，因為許多文化工業的產品，簡化了再生產的步驟，以致將邊際成本降為零。儘管如此，許多文化工業產品，仍要依附於與原著的關係，比如音樂或繪畫，因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價值氛圍 (aura)，所謂班雅明 (Benjamin) 的用語。

為了增進瞭解傳播工業科技標準的分類，比如區別何者是印刷、廣播電視、電話等，Miège (1987) 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的瞭解基礎，稱為工業事務中的「社會邏輯」，包含了：(1)文化商品的編務，如書籍；(2)流程製作，如廣播電視；及書寫訊息；實況轉播的娛樂節目；電子訊息的生產。這些邏輯整合成三種模式：編輯的、流程的、書寫的資訊，作為組織工業生產資料的方法。Miège 的主要立論認為，流程的模式將成為西方的主流形式，因為現有的經濟形式有利於它的運作。由於勞工成本低廉、執行一定幅度的再生產與再包裝的可行，使得經營者可以多量複製初次的閱聽眾市場，所以一筆鉅額的開業資金的投資可以迅速回收。

111

這樣的分析當然可以深化我們對「建構傳播工業的過程」的認知，超越一般廣泛使用的敘述性研究觀點。同時，他將生產與行銷的技術過程，聯繫轉合到其中的勞動、工作過程，產生十分有價值的分析。而他指出的邏輯是社會性的、非僅技術性的觀點。儘管如此，Miège (1989: 44-45) 也自知，無論他的研究如何地細緻，政治經濟學家終究會質問這種分析的終極獲得是什麼？舉例而言，許樂就批評，Miège 過度揚舉資本主義下，文化工業與其他產業的差異；Flichy 則說，在價值增殖過程，文化工業面臨的不確定性是比較

高，但隨著標準商業實務的施行，其不確定性也就減低了。這種不確定性並非與生俱來，因我們觀察到，歷史上資本主義現實中的失衡發展過程，如今已延伸至文化工業中。Miège 卻認為文化工業的創作危機是與生俱來的，而文化也有自我定義的本能，所以反抗經驗比較容易在文化工業中發生，而不是在其他工業中，這是他的結辯。

雖然 Miège 研究反抗的個案，但他對反抗的特殊形式卻沒有太大興趣。儘管如此，從政治經濟觀點來檢視反對與替代性媒體的研究，仍是歐洲重要研究傳統中的一支。Mattelart 與 Siegelart(1983) 將媒體對社會反抗的關係的研究，整理出書，內容包含了主要理論的檢視與世界各國的案例。過去英國學界，對研究勞工階級的異議報紙的成長有強烈的興趣 (Curran, 1979; Sparks, 1985)，但如今的趨勢轉而研究地方與社區為基礎的電子媒體發展 (Jankowski et al., 1992)。後者的成長，不只來自歐洲廣播電視系統明顯的革新所致，更重要的是，原本以全國文化為公共節目的主要內容（只有少量的地方觀點）的國有廣播電視事業，如今漸漸開始解體。正因壟斷的經營轉變為商業選擇——主要興趣在販賣商品，同樣的開放空間也給予國家與社會運動者，進行廣播電視、有線電視的替代性建構，以有別於蔓延四處的商營化演變¹⁷。

北美的傳承已積累了可觀的性別與文化工業關係的研究，歐洲的政治經濟學中卻很少見，Gallagher (1980, 1984, 1985, 1992) 是其中一位。她對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取向，提出了總體批判，並圖解大眾媒體政治經濟學中的性別研究派別，使之得到應有的重視。她的取向內涵，包含了女性在文化生產流程上的歷史定位。雖然自報業發明以來，針對具教養的、中產階級女性的閱讀市場十分蓬勃，但這個市場卻以十分特殊的方式打壓了女性的地位。舉例而言，她發現女性的地

112

¹⁷ 對中歐與東歐媒體而言，這樣發展的兆頭的政經分析，請見 Szecsko(1986)。

位，在十九世紀有關社會關係的小說中，四度地被置於從屬的地位。女性小說家可被容忍當成藝術工匠，以不妨礙家事的主要職責為前提，進行她們的工作。再者，女人的從屬地位也證實於印刷貿易中，女人與童工同列為無技藝勞工的體制。而家庭事務對女性的剝削，也造就了中產階級女性的閱讀經驗，甚至偶有寫作的自由。最後，小說所充斥的內容，皆在導引女性作為一個消費者，對浪漫、女性化、家庭與母親的情境產生共鳴。Gallagher 的分析，連結了女性在文化工業中的結構地位（除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外，大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及各種文化工業描繪女性的問題，來建立她的歷史批判。這樣整合歷史、社會結構與文化的分析於性別、階級的觀點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模式，使文化工業的政治經濟研究取向產生反思。雖然 van Dijk (1991) 在分析報業與種族的議題中，提到了社會結構勢力的問題，但不幸的，歐洲對於性別的研究仍然不若種族與階級研究的那般受到重視。Dijk 所強調的社會結構勢力研究，性別只是其中一個建議納入的因素，重點終究在進行新聞論述的系統分析。

除了重新思考文化工業的概念外，歐洲政治經濟研究，近年來特別積極地檢視電訊傳播與電腦傳播新科技的發展。這樣的發展，部分源自微電子與航太科技的快速進步，發明出一系列更精小、迅速與廉價的生產、行銷、展示傳播資訊的設備。歐洲政治經濟研究對此領域的重大貢獻之一是，將科技的變遷置入電訊傳播與新科技的權力關係的廣大轉變脈絡中思考，特別是過去十年來，歐洲政府與商業根本本地變革他們在這領域內的經營。歐洲各國過去的電訊傳播事業都是由國家以壟斷的地位來經營，擺平了各種價格的競爭與服務需求的呼聲。自英國首先發難以來，歐洲的電訊傳播系統如今都歷經了不同的國家公產私有化的過程，開放設備與服務市場給國內的競爭者，進一步緩慢地給國際的競爭者，並且設立管制的機制來管理以上的轉變。這種走向的轉變發生在歐洲會比北美還要深具意義，因為北美早就將競爭與管制的變數納入設計國家系統的考量中，使系統由私人所有、政府

管制。再者，歐洲電訊傳播轉變的發生，是以邁向跨國經濟整合的方向來進行。

政治經濟研究提出對技術專家論點的批判，同時也未忘卻分析科技中的真實變遷，及批判極端的非理論敘述性研究與抽象思考的經濟模式，以致能提出有關此項議題的社會結構組成與影響的研究。Hamelink (1983) 就證實金融、銀行與資訊新工業的發展關係，為此早早提出一個基礎研究。更近期的是，Hills (1986) 執行一個比較性的分析，挑選出三個各自擁有不同歷史經驗的先進國家，研究其電訊傳播的政治制度變遷，牽連出一個存在於國家、資本與勞工關係間的變動政策環境。她保有一個歐洲特有的立論，就是在新電訊傳播體制中提出勞工地位變遷的問題（也見 Costello et al., 1989; Humphreys, 1986）。Hills 在這個研究之後，又將電訊傳播政策放入橫跨歐洲與北美的傳播科技政策的變革脈絡中來觀察 (Hills with Papathanassopoulos, 1991)，她持續發現這種變化有礙於民主的建構。在此 Hills 所提出的「民主的鴻溝」概念，正是許多政治經濟文獻中的基礎主題。立基於對公共領域理論的批判閱讀，特別是哈柏馬斯的著作，Garnham (1990) 檢視電訊傳播事業的重組，發現其政策是依循著嚴格的市場路線來滿足消費者在市場上的需求，而不是公民的欲求，這正足以為害公眾的生活利益（也見 Becker, 1989; Mansell, 1993）⁵⁹。

雖然許多政治經濟研究文獻，以批判的觀點來看待科技，但是也有人就開發科技的使用來推廣民主利益，進行可行性的研究。舉例來說，Mulgan (1991) 立基於對英國「新時代」(New Times) 運動的基本信念，支持運用新科技來推翻權威的中心地位，並在國家機器之

⁵⁹ 雖然 Garnham 以公共領域理念，作為批判研究的重要類目，但對哈柏馬斯沒有質疑地將這個名詞的歷史意義應用在個人主義、父權與市場機能的研究上，也提出警告與批判。

外建立公共的替代制度。事實上，對傳播與資訊科技的基本分析是歐洲政治經濟研究中的主要議題，這其中許多研究都圍繞在使用科技的爭議上討論。不幸地，這類研究相當容易成為人們諷刺的對象，其中之一是，因他們拒斥新科技使用而被封上蔑視的標記：「路得派」(Luddite)⁵⁹；另一類學者則認為，傳播與資訊新科技是實現民主的關鍵。若從包含歐洲在內的傳播與資訊新科技的政治經濟學來看，這兩種觀點都無法站立得穩。雖然 Enzensberger (1974) 的著作早已建立了科技民主的傳統，導引他支持科技在公共控制下必定帶來利益的看法，但是 Mulgan 也瞭解到跨國公司網絡的反民主優勢，同等需要科技的協助才可彰顯出來，因此有的學者在著作中明顯地提出，科技所帶來的利益終歸要分給商業與特權分子來享用 (Jöuet, 1987)⁶⁰。

對於傳播與資訊科技的研究，採行更批判的觀點是 Webster 與 Robins，他們生產出令人無法忽視的研究成果，直指陳科技向來就被用來擴張跨國企業的控制力與惡化階級與性別的劃分。他們的名著 (Webster and Robins, 1986) 用了一個聳動的副標：「一個路得派的解析」(A Luddite Analysis)，來強烈批判後福特主義，過於贊同科技自身解釋的立論。在此，他們建議採行一種新福特主義的分析，來記載企業與國家如何使用新電腦傳播科技，並反映出當代資本主義

⁵⁹ 「路得主義」這個字眼已被誤導。事實上，歷史學家認為，它不是一種阻礙科技的反智掠奪主張，而是一般知識勞工分子用「毀壞機器」為手段的，以防止工資削減或要求提高待遇。在缺乏勞工管理程序的制度下，路得主義的作法是勞工們少數可使用的防身術。

⁶⁰ 相當有趣的是，特別在法國，這方面的研究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比一九七〇年代來得更為支持科技的使用。我們可以推測其原因不脫與法國從保守黨轉換成社會黨執政有關，而且後者承諾要發展廣為公眾使用的科技（也就是，更新電話系統，發展電傳視訊 Minitel 等）。

的積累與控制危機。基本來說，新科技的最大利益之一是，幫助企業與政府維持己身霸權，而無須承諾履行社會契約，這原本是他們在福特主義時期所需付出的代價。儘管如此，Webster 與 Robins 並不讓這個強有力的攻擊論點發展到極端宰制的地步，他們瞭解在轉變到新福特主義時期的當下，會帶出反抗的形式，也會帶來反抗中的矛盾。他們的路得主義 (Luddism) 論點，緊密跟隨著史實，認定作為代表階級與運動分子利益的主要機制，在抵抗科技變遷上，應以保衛階級運動的利益、勞工階級的技藝（包含他們的技術）使用、及創造一個替代性的社會體制為主要目標。這樣的論證，也出現在其他對新科技的政治經濟批判研究中 (Becker, 1988; Cesareo, 1992)。

115

在結束對歐洲政治經濟研究的回顧前，有兩項議題必須提出。其一是本節所討論的制度研究與政治經濟研究傳統間的關係；其二是一種「新修正主義」(new revisionism) 的問題。高丁與梅鐸 (1991: 15) 在最近的一篇探討政治經濟取向的文章中，區別他們的批判政經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不同：文化研究關注的是「媒體意義的消費與建構」；他們也區分了批判政經研究與「媒體工業的經濟組織研究」之差別：高丁與梅鐸的研究與「媒體工業之經濟組織」研究的差別，在於他們關注符號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致力對籠罩在傳播與文化現象上的社會秩序，進行批判，並以具有理論視野的基礎，加以瞭解 (1991: 15-16)。雖然在北美文獻中，可以發現些許此類研究案例 (Turow, 1984)，但研究媒體工業的制度圖解或經濟組織之學術著作，歐洲的數量相對地多了許多。

研究媒體工業的政治經濟學與組織研究之間，沒有絕對清楚的分界，所有位居交界地帶的研究之特徵，都具有這個曖昧的情況，值得所有評論者警惕^①。儘管如此，梅鐸與高丁的論點仍是重要的：政治經濟研究的定義遠非媒體工業的制度圖解可涵蓋，意欲更全備地瞭解政治經濟學寬廣的面向，與組織研究做比較是可行的方式。組織研究對於瞭解工業運行的地圖與重整的方式，貢獻卓著。雖然大部分的著

作都屬於歐洲國內與汎歐的觀點 (Blumler and Nossiter, 1991; Vedel and Luven, 1993)，但仍有代表性的國際發展著作出土 (Negrine and Papathanassopoulos, 1990; Tunstall and Palmer, 1991)。我們可以清楚地分別這些作品與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區別，因為前者的興趣只在描述工業的構成與發展的趨勢，他們對政策與管制發展的關心，也就是，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從正統經濟學的處理態度出發；而他們對權力組合做隱性地批判是另一個從主流經濟學出發的例證。此外，組織與制度的取向並非對媒體工業發展的理論有實質的興趣——也就是將議題放入寬廣的資本主義總體內思考，包含階級與其他社會關係。他們也非專注於以道德評價的立場，提出能獲得社會支持的批判。反之，高丁與梅鐸 (1991: 18) 則認定：以正義、平等與公益為根基。雖然組織與制度研究，開展了原些由一般人狹隘觀點定義出的經濟行為的測度，然而它們正在「缺乏政治經濟學素養上」停滯不前。這樣的分別有助於瞭解 Miège 研究的政治經濟本質，這本質專注在文化工業的內在區分上，的確是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始點。而且 Miège 還明確地對兩個議題感到興趣：一是瞭解這個本質區分與資本主義基礎過程——商品生產的關係；二是此區分代表出社會反抗的機率有多少。

116

近些年來，有些人曾評估傳播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傳統在內的現況 (Curran, 1990; Curran and Gurevitch, 1991)，他們提出了一個「新修正主義」的問題。雖然柯蘭已經關注到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形，而且也經過小心翼翼的求證，但是他還是認為，在傳播研究這個概括學科裡，「如海浪波濤般的轉變正在發生」：

⑩ 要明確區分兩者的差異並無多大意義，唯一較為實質展現組織分析的著作是「傳播媒介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Dyson and Humphreys, 1990)。

這其中最為重要與意義深長的轉變，當推激進傳統中正在持續地進行多元主義議題的建構：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解釋架構的否定、重新認識閱聽眾創造與主動的地位、及從政治的美學轉變為通俗的美學。(Curran, 1990: 157-158)

雖然以上所言，對政治經濟學來說都很重要，但是柯蘭認為對媒體組織解釋的修正，更為直接地挑戰政經學派的看法。柯蘭指控，傅科(Foucault)學說的廣泛影響，造成社會階級衝突模式失去魅力，使政治經濟學從先前立場退卻下來。雖然這個發展全面地影響激進的大眾傳播研究立場，「但是政治經濟取向……是第一個被拿來開刀的」(Curran, 1990: 142)。柯蘭特別指出在一九八〇年代，高丁、梅鐸、與他自己「皆開始後退。」高丁以強調意識形態的控制與記者個人價值取向，非用報業所有權，來解釋小報對福利津貼領受者的攻擊，彰顯了他的走向；梅鐸在解釋一九八一年英國種族動亂事件的報導上，採用新聞來源與論述的分析，而不是所有權與管理壓力的解析，說明了他的走向。

除了對政治經濟觀點提出批評外，柯蘭還企圖提出一個合流的傾向。他指出多元論的學者，也從記者個人自主性的焦點，轉到重視結構侷限與權力的議題，同時他們也離開了傳統上捍衛市場中立的角色，轉向注重市場的缺陷與市場機能的失控。他認為兩方互為轉變的結果，並非全然地合流在一起，因為多元主義學者與政治經濟學家，雙方對解釋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理論還有差異。儘管如此，「介乎兩者之間的中間觀點似乎正以優勢的姿態出現」(Curran, 1990)。

高丁、梅鐸、與 Halloran 在討論柯蘭的詮釋時，三人都同意(1992年4月訪談)柯蘭的看法失去了準頭，竟將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視為李思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的母腹所出，將其對比於伯明罕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發展出一個替代性、激進的文化主義取向

(Curran, 1990: 139)。正如前述，他們堅持李思特大學研究中心，從未標榜政治經濟取向為其發展方向，因此是不能與伯明罕大學對文化研究的推廣相提並論。根據他們的看法，政治經濟學是高丁與梅鐸的主要興趣，但卻與中心的研究無涉，研究中心原則上以社會的、社會文化的、及社會問題導向的研究為主。這樣的澄清相當重要，因為柯蘭指涉該中心發展出屬於「新修正主義」理論涵蓋下的新研究，就該中心成員觀點來看根本不存在。

Halloran 堅持，柯蘭研究的認定可以自中心長期地承諾致力推動批判社會學研究的行動中得到證實，但絕非包含政治經濟學，那只是高丁與梅鐸的焦點及其他人的次要興趣，自從他們離開後就結束了。高丁與梅鐸根本不同意柯蘭對包含政治經濟學在內的傳播研究的詮釋，梅鐸簡短歸納出自己的觀點並且斷言「我寓居的領域，從來不是柯蘭所畫的地圖那般。」特別的是，兩人都指出柯蘭所謂的「新修正主義」的建議，無論是得自他努力的研究，或得自於追溯歷史的軌跡，都沒有考量到他們研究的範疇，事實上他們向來以馬克思理論的廣泛觀點自居，結合意識形態批判、記號學、社會政策分析，以及關心傳播活動的總體流程，包括生產、行銷與接收，只要從他們早期定義政治經濟學的文獻中就可知。他們一直從事大範圍的問題研究，高丁特別投注興趣於社會政策，梅鐸則在記號學及論述分析上。他們堅持柯蘭錯誤地將他們早期為設定政治經濟議題的文章觀點，取其一作為焦點，然後對比現今研究所強調的廣泛問題，於是得到他們正在走回頭路的結論。高丁與梅鐸歸結說，雖然現在的研究，反映著新的政治與知識分子問題，但其觀點一直符合他們寬廣的興趣幅度。因此，即或研究轉到關心柴契爾政府的社會福利意識形態與閱聽眾的收訊，最後仍會歸結到政治經濟取向的基礎原則來討論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¹⁰。簡要來說，柯蘭對於他們現今研究的詮釋，是追索李思特大學取向後的獲得，然而他卻錯讀了李思特大學走向、他們的研究、及政治經濟學。

雖然對李思特大學、高丁與梅鐸的研究、及對「新修正主義」廣泛興趣的辯論是重要的，但是這項辯論中顯得最有趣的地方，應是對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認知概念^⑩。高丁與梅鐸在傳統的社會階級、商品流程、公司結構與國家的興趣之外，已經持續地採取更廣博觀點的取向，進行一種對寬廣社會總體的批判與道德哲學式地瞭解。就後者的觀點來論，他們認為政治經濟的研究「應投注焦點在公共傳播的符號與經濟面向間的互動」（1991: 15）。他們對政治經濟視野的認定是如此地廣博，以致一些包括柯蘭在內的學者，認為他們的研究成爲一

- ⑩ 柯蘭對於高丁與梅鐸的現今研究領域地圖有兩個看法：一方面他只認為領域圖是政治經濟觀點的再現；另一方面認為，他們致力從簡化的工具論 (instrumentalist) 與馬克思政經的結構觀中掙脫出來，並且將「經濟決定論」視爲首要的研究限制與局限 (Curran and Gurevitch, 1991: 10-11)。高丁與梅鐸堅稱，他們一直反對政治經濟學簡化的判斷，並且已經將經濟決定論視爲「第一原因」而已，在他們的觀點認為，柯蘭的詮釋只是一種印象，依循著對「早期僵化的馬克思論者的滑稽面貌，現今已轉變成爲更靈活、修正的學術風貌」的認識來立論，但他的印象卻與現今事實不符。
- ⑪ 本文無法對柯蘭的理論做延伸的評論，因為那需要對政治經濟與自由多元主義觀點的演變作仔細的分析，也就是他所說的兩者雖然沒有全然合流，但已經互相靠攏了。儘管如此，我們仍可推論，自由多元主義可以與高丁、梅鐸的關注取得交集，舉例來說，柯蘭 (1990: 144) 宣稱，從 Tunstall (1981) 的著作中顯示，多元主義的焦點已從注重記者的個人自主轉變到關心「媒體組織與權力中心」。雖然這只是表面上的心投意合，但是柯蘭的觀點更可從 Tunstall 個人的其他著作中得到進一步證實，如果柯蘭取樣的範圍是起始於一九七七年而非一九八一年，他將發現 Tunstall 的著作《媒介是美國》(The Media are American) 當中，採用了更結構性的看法而不是媒介工作者個人自主的觀點，這遠勝於他後來的任何著作。檢驗修正主義的理論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他需要對修正觀的構成有清楚的認識，以及瞭解什麼是原始觀點或概念立場，以及存在於原始觀念與修正假設間的進展過程。

般性的傳播研究。雖然柯蘭未對政治經濟學提出明確的定義，但從他對這領域的評價可發現，他認定的政經研究為一種狹隘的視野，主要包含著對經濟所有權與管理控制的分析、以及前兩者對媒體內容的影響。從他對梅鐸的批評中可見，他不認為分析媒體資訊來源是一個政經分析取向中的主要面向 (Curran, 1990: 143)。然而對媒體內容來源的分析，卻是大部分媒體政經研究的主要項目，包含了強烈政經訴求的讀物⁶⁰。如何應用修正主義的辯論到政治經濟學的探討上，我想最好的方式為導引其到一個重大的問題上去思考：這個學門的主要面向由什麼構成？問題所在不是我們是否可從追溯或努力研究中找到答案，而是，我們是否可從柯蘭批判的重要意涵中，反思出政治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以及這個取向與那構成一般傳播研究領域的取向有何不同。

不管我們對柯蘭批判的反應為何，他所講的都是重要的，因為這開啓了一個嚴肅辯論的機會，是政治經濟分析未曾享有的。我們甚少對政治經濟研究的中心議題進行實質的、公開的意見交換。唯獨 Nicholas Garnham (1981) 回應《螢幕》(Screen) 期刊編委會對生產與再現關係的意見是一例；對史麥塞提出的傳播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盲點」而進行的辯論又是一例；雖然柯蘭的研究所提到的問題不只是政治經濟取向而已，但他的確言中該取向的核心問題，這包含了討論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的關係、與馬克思理論的關係、以及與傳播研究廣泛取向的關係。

119

⁶⁰舉例來說，新聞來源的分析就是 Herman 與 Chomsky(1988) 的政經宣傳模式中的主要研究項目。

「第三世界」與傳播的政治經濟學

無論就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題，還是研究的起源來說，第三世界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章結論的部分以第三世界的主題作為起始，來進一步揭示第三世界學者及研究中心對此取向的貢獻。在此特別以第三世界作為主題的原因，在於它的爭議性本質，這正是瞭解第三世界研究文獻的核心所在。

「第三世界」作為一個類目，其指涉實際地球景象的能力是備受質疑的^⑩。這個名詞是一種描述性的字眼，沒有包含理論上的主張，只是意指那些開發程度較低與開發中國家，區分緊密依附前蘇聯的第二世界。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使這個名詞作為區分的功能消失了，但繼續使用這個字眼的好處之一在於，標示出非屬核心國家的領域。但是這個名詞的外延意義仍然無法清楚定義所指涉對象，比如說原屬發展中國家——南韓、或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已經得到相當不錯的發展；或是索馬利亞與海地，經歷了絕對的貧窮與邊陲化，連一點點偏遠的發展意義都沒有分。儘管如此，「第三世界」仍能有效地指涉那些不屬於高度發展的核心國家，如北美、西歐、日本、澳洲與紐西蘭之外的地區。

Ahmad (1992) 指出，「第三世界」作為具有理論意義的名詞，來定義全球政治經濟體中的某類政治定位時，會產生特殊的問題性(problematic)。這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名詞以民族主義(nationalism)作為判準，卻彰顯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作為

⑩ Reeves(1993) 將此研究領域做了一個回顧，他認為這個概念是有問題、有爭議的，儘管如此它的使用價值仍然存在，足以支持他使用以下的書名：《傳播媒介與第三世界》(Communic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一個術語，第三世界的特色是它與民族主義有關，指認了反抗的來源與真正替代性的可能。這個術語尤其是指涉民族認同在於實存的國家機器，並非認同於特定的生產模式。結果，第三世界也意味著與一種現有階級結構作認同，接受其定義中的一切缺陷與扭曲。第三世界必然地包含了寬廣變化面貌下的國家組合，一種只以國家精英所領導的國家權力作為認定根據。而它低度和諧的內在解釋力，不是來自抵抗主導生產模式的信念，而是來自以民族作為一個區分的選擇，遭逢了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思考的挑戰與後結構主義的文學批判。但是民族主義的運用，從好的一面來說，成為整合不同目標抵禦外侮的基礎；從壞的一面來說，成為國族中買辦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當民族主義（包含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代替社會主義成為反抗的根源，來對抗正勝利在望的資本主義時，只會使自己輕易地成為現階段必然蓬勃的全球化與後現代主義的標靶。這個議題在後續的章節中會討論，主要在探討主體領域內的爭議本質，包含了民族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關係上的問題性。在此我們先只討論第三世界對政治經濟研究的主要貢獻。

第三世界的研究從已開發國家的反對勢力上出發，因為它是從一系列的社會抗爭中淬鍊出來的。而這個經驗屢屢發生在世界各地，比如所謂反殖民、國家解放、或社會主義者的抗爭運動。這些在二次大戰後爆發的運動，有助於學者的誕生與研究議題的生產。事實上，那些領導革命運動的人士，如毛澤東、胡志明、Amilcar Cabral、格瓦拉 (Che Guevara) (譯按：其生平與主張見南方朔，《新新聞週報》，555期，頁76-81) 本身也是知識分子。人民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同時明確地瞭解到控制傳播工具，如廣播與其他電子媒體，來支持革命的重要性；知識分子中如阿爾及利亞的 Frantz Fanon (1965) 與巴西的 Paulo Freire (1974) 及整個拉丁美洲學界，都特別提到用大眾媒體與識字率作為革命的工具。雖然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分子與其他批判學派對傳播、民意、及意識形態的看法是歧義的，但第三世界

的研究，的確是以經濟分析為肇始。歷經了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論戰，第三世界研究從兩個方向振翼而起。首先，他們批判保守與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認為發展策略是前者殖民勢力，有鑑於反帝國主義者在軍事與政治的抗爭成功後，所興起的另一波攻勢。其次，第三世界提出光譜性的研究觀點，也就是世人熟知的依賴理論，建構了瞭解全球政治經濟轉變的架構。

所謂發展主義與現代化理論的取向，也在抗爭中得到淬鍊，特別是美國為主的西方發展國家，感受到法西斯主義戰敗後，並沒有留下持久的勝利凱旋時光，因為共產主義與其同路人的社會主義與國家解放運動，正開始阻擋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為了克服障礙，贏得第三世界，也就是打敗共產主義與平息第三世界的紛擾，西方國家湧出了史無前例的全球軍事、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活動。發展主義，正是西方知識領導分子的靈感，結合了一個奠基在頂尖大學與研究中心的學術精英軍團，決定了如何以資本主義贏取第三世界的策略。在遭到第三世界學者與其在第一與第二世界中的同志批判下，現代化理論很快地被視為只是維繫資本主義霸權的藉口，但它恐怕不僅是如此簡單而已。無疑地，使用現代化的觀點正是捍衛美國形象的工具。美國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世界權勢，想幫助在疆域之外的國家，包含那些被她軍事占領的屬地，使其邁向現代化的世界。除此之外，現代化理論還可作為一種傳播理論，以一組複雜的工具，針對變遷中的軍事、政治與知識情境來建構一個霸權。

現代化理論是由美國與其西方盟國，在二次大戰後面臨到一些基本問題下所提出來的對策。西方國家面對著非洲與亞洲的去殖民化運動，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動盪下，發現只有美國能控管這些發展，將新的獨立國家一一置入正在演化的戰後資本主義的流動階層中。許多現代化理論的構成為一種蛻變自古典社會學的發展模式，特別明顯地來自 Tönnies 的著作《禮俗社會與禮法社會》(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中區別傳統與現代、都市與鄉村的看法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 171-172)。這個觀點的問題在於，它使現代化學者成爲一種心智單純，運用簡化、教科書式的社會學來作研究，如 Lerner, Pool 與其他的現代化理論者，不只讀了類同 Tönnies 的著作，也從他們世代交換的觀點來瞭解現代化概念的轉變。

現代化理論意味著一種國際分工的再造，將非西方國家納入一個發展中的國際階層結構。再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家打造」(nation-building)，一個創造國家精英的過程，以民族主義有效地取代由蘇聯或大戰後的中國，所提出的替代模式：社會主義。在國家認同的旗幟下，這些精英的組合必須要結合其他社會勢力，來抵禦那超越民族差異的階級與階層聯合，也就是來自社會主義與革命的挑戰。雖然美國反覆地努力推動此項發展，但也無法單用軍事手段達成，更無法在國內反對聲浪下再推行一個馬歇爾計畫給低度發展國家⁶⁶。隨著軍事與經濟的攻勢外，美國利用了傳播與情報的工具，也就是她的媒體與資訊工業，它們在大戰前就開始磨刀霍霍地發展，並從戰爭的對立中得到豐厚的紅利⁶⁷。從早期來說，正如同 Samarajiwa (1985) 及其他人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 Sussman and Lent, 1991) 指出，傳播策略意味著應用心戰的方法，如領導的學者 Harold Laswell 所說，執行「釐清真正的朋友或敵人」的工作，以對抗蘇

122

⁶⁶類同於馬歇爾計畫的第三世界援助政策，從來沒有被嚴肅考慮過，即使如甘迺迪總統對拉丁美洲的進步聯盟 (Alliance for Progress) 提案，其實際的金額也與政策的承諾相距甚遠。我們必須瞭解到，馬歇爾計畫之所以可以成爲一個實現的經濟承諾，主要在於美國企業無懼於社會與共產主義的威脅，急欲進攻歐洲市場所致。

⁶⁷有關戰爭時期的情報活動與美國發展主義的策略關係已有研究出土 (Samarajiwa, 1985; Sussman and Lent, 1991)。但是傳播策略不只是從敵對行動中發展出來，事實上，在測量與情報研究上的顯著進步，實來自美國史上最實際的「擄掠聽衆」(captive audience) 的研究經驗，並由軍方負責執行 (見 Stouffer, 1949)。

聯。Daniel Lerner 大戰時期的研究《精神作戰》(Sykewar) (1949) 成爲他後來經典之作《傳統社會的消逝》的導引模式，後者使用了相當多的訪談，來刻劃出支持或反對現代化的一系列態度與價值觀，特別是那些會支持由國家與國際勢力推動市場經濟的態度。接著特別是施角姆 (1964) 的著作，將大眾媒體視爲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工具，事實上，媒介發展的水平已成爲測度社會總體發展的主要指標之一。遵循這個前提，Rogers (Rogers with Shoemaker, 1971) 開始檢視社會對創新與變遷的傾向，包含引進現代的傳播工具。這是個決定性的發展，因爲它改善了對媒體科技與訊息的接受態度，對於廣泛地發展包括改變家庭以上結構的社會需求、創造市場經濟的經濟需求、以及建構國家與地方領袖成爲上層階級的政治需求，都有重要的幫助。研究創新傳播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在找尋一個可以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包括大眾媒介在內的對象。

由現代化理論所指導的傳播研究計畫，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他們提供了衆多的第三世界人民行爲、態度、與價值觀資訊，協助成立大學的傳播科系與研究中心。就拉丁美洲而言，McAnany (1986: 29) 指出這裡第一與第二代的本土傳播學者，都受過美國功能主義傳統的訓練，這同時也是現代化理論的系出所在。作爲一個缺乏資源的地區，這意味著舉凡該區的學校、期刊、與教科書都是由支持現代化理論的美國政府所援助、創設與組織的。

儘管現代化理論的權力影響到所有的社會層面，但是對於改善第三世界人們實際的經濟景況，能作的卻十分有限。現代化的處方逐漸拉大理想與成果間的鴻溝，填在其中的是更多的批判。部分的批評者因著與現代化理論的決裂，鍛鍊了他們研究大眾媒體政治經濟學的技巧。這樣的事實的確發生在拉丁美洲，部分導因於此處爲發展主義計畫施行的主要所在。自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後，對美國而言，存在於貧窮與動盪國家間的共通問題變得更複雜了。批判學術在拉丁美洲的發展較早，諸如智利的 Mattelart、巴西的 Freire、委瑞內拉的

Pasquali (1967) 及阿根廷的 Veron (1987)^⑩，其部分原因來自現代化計畫造成當地付出一定的代價所致。他們的作品是第一批檢視媒介發展計畫成果的研究，從研究文化素養 (literacy)、大眾文化、新聞學、電視當中，他們發現了現代化計畫的主要獲利者是西方媒體公司。對拉丁美洲人民而言，現代化不是浪費他們的錢，就是惡化他們不平等與依附的現狀。

自一九六〇年末期到整個一九七〇年代，批判研究發展出一種橫跨大眾媒體、與蓬勃的依附理論的基礎研究 (Beltrán, 1976)。1976年當地的政治經濟研究，因著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 (the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 Estudios, ILET) 成立，而得到重要的支助。ILET 由 Fernando Reyes Matta、Rafael Roncagliolo、Herbert Schmucler、及 Dieog Portales 所領導的一批學者組成，他們主要的興趣持續在研究跨國企業，特別是媒體企業的影響力。ILET 的影響特別展現在國際政策議題的辯論上，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麥克布萊德委員會 (MacBride Commission) 的委員 Juan Somavia 的著作中表達出來 (Marques de Melo, 1991: 59-73)。根據 Roncagliolo 的說法 (1986: 79)，在 ILET 的媒體研究議題中有三個中心問題：

1. 跨國運作過程中的文化，與在文化過程的傳播，其地位是什麼？

⑩ Antonio Pasquali 與 Eliseo Veron 的作品在北美較不著名，前者運用存在主義的哲學來批判現代化理論的機械化，他自稱對於傳播毫無興趣，而是思考如何用資訊與科技作為工具，為拉丁美洲建構一個大眾社會。Veron 是一個受 Lévi-Strauss 與 Barthes 結構主義思想影響下的馬克思主義分子，他的主要興趣在於，批判包括西方現代化理論意識形態機器在內的意識形態。如想回顧拉丁美洲文化研究的發展史，請見 Alan O'Connor (1991)。

2. 除了在國際層次上將需求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之外，跨國消費還包含了什麼意義？

3. 跨國的文化是否真實存在，還是只是行為的國際化形式？

這個概念基模將媒體放入文化生產與消費中來看，同時將消費放入跨國運作的一般過程來看。再者，它將研究的問題性放置在跨國化、國際化與同質化關係的核心之中^⑭。除了記載媒體現代化計畫對拉丁美洲的負面影響外，對於一個替代性的理論架構的發展，也就是般人所說的依附理論 (dependency theory)，ILET 與其他學者不但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

在一些傳播研究中心裡，當舉一九八三年創設於祕魯首都利馬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para America Latina, IPAL)，最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來源。在創辦人 Rafael Roncagliolo 的指導下，IPAL 以兩個方向進行政治經濟研究，如今證明他們的努力對此取向有越來越重要的分量。超越原本對印刷與電子媒體的研究，IPAL 將興趣專注於傳播與資訊新科技的社會關係，這使他們站立在一個中心位置，對下一個現代化理論——發展以市場導向為主、橫跨第三世界的電訊傳播與電訊系統——進行辯論。此外，IPAL 更對圍繞在通俗文化與傳播之外，組織成的社會反抗與替代性社會實務的文化，感到興趣。

因著哈瓦那大學的 Enrique Manet 的領導，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在古巴得到顯著的地位。Manet (1988) 特別積極地提出政治經濟的

⑭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取向，因為它使拉丁美洲研究媒介的學者，早早地瞭解到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不只是重要的，也是有問題意識的，也就是跨國化、國際化、與同質化之間的關係。他們的政治經濟取向既非簡化的，也非機械化的。

基礎研究，以全面分析橫跨拉丁美洲的媒體系統研究，贏得他在推廣社會主義式的世界傳播資訊新秩序議題上的領導地位。

雖然依附理論植基在明確的理論思考上 (Amin, 1976; Baran, 1957;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Dos Santos, 1970; Emmanuel, 1972; Gunder Frank, 1969)，但是對於依附的定義，爭議頗大，所以我們在簡介其觀點上務要小心。這個理論對跨國公司運作的看法最得到大家的認同：跨國企業奠基在核心國家上，由他們個別國家的支持，設定對資源、生產與勞工市場的交易條件，來控制核心之外的國家。跨國的資本，以控制交易條件與市場結構的方式，建立了所屬腹地的經濟活動條件，包含該地的延伸發展。就好的一面來說，造就了依附發展 (dependent development)；就壞的一面來說，成了矮化發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但批評該理論者點出：依附取向似乎只關心外來勢力爲了他們想要的社經發展形式，設定了如何的條件；而對於由地方勢力與當地生產關係，包含本土的階級結構，所貢獻出的努力則一知半解。

另一種依附取向則轉離這樣的辯論，投注興趣於文化的宰制，也就是那些主要興趣爲媒介與文化的學者。他們檢視由跨國媒體與國家所控制的生產、行銷與收訊的流程中的依附問題，這樣的研究不僅實際評估現代化理論實現了多少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提出一個替代性的解釋，將現代化理論家所描繪的策略，收入廣大的跨國權力與依附脈絡中瞭解，產生一個公認的功能性觀察結論：現代化是發展矮化發展的工具。

依附理論享有廣泛地肯定，相對的也被廣泛地批判。它被批判爲只重視跨國企業在發展上的影響力，而忽視對內部階級與權力關係的寫照。而依附理論，以檢視當地社會中買辦精英的地位，及特殊領域內富裕的半邊陲國家的角色作爲回應，因爲此二者在中心—腹地網絡上扮演著實質重要的角色。批判的評論還指出，此理論存有著經濟決定論的傾向，特別是，依附理論似乎以跨國資本的邏輯爲基礎，推論

資本控制了國家，將其轉變為管理積累過程的工具。對此回應，有的研究結合了更為動態的閱讀方式來理解國家，正視現今研究，需要發展跨國政府結構的思考，諸如瞭解如何在歐洲聯盟與七大工業國等架構下，來調和經濟、政治與社會政策上的衝突，同時處理社會的階級、運動與利益需求上的衝突，以拓展依附取向的範疇。再者，依附理論也提供更多的空間給文化分析，這是長久以來第三世界批判傳播研究的興趣，不過，這個研究旨趣與依附取向的總體經濟批判，頗有不合之處。總體來說，對依附理論的批判至少可以提供空間給文化帝國主義的研究，使之專注在進一步檢視總體政經流程，及牽涉到收訊、文化內涵構成的過程與抗爭 (Mattelart, 1986)；但是，對依附理論的批判，也呼應了不同門派的後結構主義對政經分析的攻擊。後結構主義認為，談論資本的流程、政治經濟過程與文化實務關係，毫無價值；它堅稱政經的分析是錯誤的，因為政經分析至多不過是從鬆散接合的具象與在地實務中，推演出社會的總體；後結構主義指稱，依附理論只是在說大話、只是一種總體化的論述，根本禁不起社會與文化實務的考驗 (Featherstone, 1990; Tomlinson, 1991)。

拉丁美洲的學者向來就有相當強烈的興趣，以政治經濟取向進行媒體結構與實務的具體研究。這些研究包含了廣告 (Janus, 1986)、國際新聞體制 (Reyes Matta, 1979)、電視的政治經濟學 (Beltrán and Fox de Cardona, 1980)，以及拉丁美洲政治轉變下的媒體一般角色研究 (Fox, 1988)。除了這些明顯地以霸權發展為議題的研究外，另外還有檢視社會反抗與通俗文化建構的深厚基礎研究 (Mattelart, 1986; Reyes Matta, 1983; Simpson Grinberg, 1981) ¹⁰。

拉丁美洲學者近來的政治經濟分析，專注於瞭解如何抗爭附隨著使用新電腦傳播科技而來的延伸依附。這些研究相當重要，因為他們展現了新科技是商業活動進行半球整合與商業文化生產的核心，正如同 Oliveira (1992) 指出，存在於南北美洲之間、及南北美洲內個別國家之間的貿易協定，都以一致化 (harmonization) 作為中心目標，

而整合電訊傳播體系正是第一步驟，因為電訊傳播提供企業一個整合他們內外運作的基礎工具。再者，電訊傳播的發展強化了媒體的依附現象。Oliveira (1991: 211) 對宣稱：「國家精英與其媒體運作已經壯大到可以挑戰依附理論的說法」，他的回應是，依附理論「仍然活著，而且活得很好」：

矮化發展如同一種融合過程，滲透入依附的工業化、大眾媒體、全球廣告事業、輸入的消費習慣及收入的集中化現象。媒體與廣告……推廣一種消費的氣候，使少數人收入的增加，以壓低大多數人的所得為代價。

Oliveira 奠基在對巴西的研究，提出國家媒體系統研究的結論：該系統被與西方資本家有親密關係的國家精英所控制，國家為了取得科技而依附在西方資本上，以製作推動消費價值的節目來堅固這種親密關係，而這生活價值卻是全國多數人口無法企及的。雖然對巴西的電訊傳播與媒體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導引了 Fadul 與 Straubhaar (1991) 認定民族主義是一個進步驅力的表徵，但他們也同意 Oliveira 的觀點，認為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仍然是拉丁美洲發展上的威脅，因為他們限定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協定與結盟，有必要在拉丁美洲國家之間訂定，而非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之間簽訂。

雖然拉丁美洲在發展與應用政治經濟觀點上居於領導的地位，但

127

⑩ 如同 Siegelau(1983: 11) 提到：一個最普遍的錯覺是對通俗文化的通俗認知。Siegelau 認為通俗的定義應該是：一種為了滿足社會自身的需求，由社會群體自己所建造出來的文化。而不是由公司企業雇用薪資勞工，生產為迎合市場的文化（如某本辭典定義通俗歌曲說到：是一種專為立即的商業賣點而寫作的歌曲）。

一些取向上的重要典範，仍根植在非洲與亞洲的特殊領域觀點中。正如同拉丁美洲一樣，此兩洲的政治經濟觀點也針對極端的社會貧乏、現代化理論與發展計畫的失敗進行批判。而這些情形正發生在非洲，一個 Lerner 早期工作的地方，也是持續用發展取向來建構傳播的區域 (Head, 1974; Wedell, 1986)。採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黑色大陸領導人物 S. T. Kwame Boafo，描述了這般的現狀 (1991: 103)：

面對不足夠的食物、飲水、居所、及衣物的供應，解放的抗爭看起來十分棘手；出生率持續成長；壽命數低；高嬰兒死亡率；以及持續地政治與經濟的衝突，造成數以萬計的政治與經濟難民……

非洲在世界傳播資訊新秩序的運動中，居於領導的地位。雖然西方政府與媒體擁有強大火力，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秘書長默博 (Amadou Mahtar M'Bow)，憑恃著第三世界會員國壓倒性地支持，持續推動此運動。儘管如此，Boafo 建議，運動的結果不只是看到了西方國家推翻這項改革的強大權勢，更看到了第三世界全然以國家主權 (national sovereignty) 思考進行改革上的侷限。隨著 Boafo 的研究，Ugboajah 與 Uche 也從眾人中脫穎而出，成為在非洲應用政治經濟取向研究傳播的領導人物。他們的研究範圍廣布於通俗文化 (Uche, 1986)、新科技 (Ugboajah, 1986) 以及瞭解媒介工業的傳統問題 (Boafo and George, 1992)。他們對殖民的統治與新殖民媒介體系所造成的後果展開犀利批判，同時提出發展反抗的通俗形式及介入政策領域的需求。儘管如此，他們的研究與早期的傳統仍可區分，他們採取了更明確的社會主義立場，研究媒體與發展的問題 (Ng'wanakilala, 1981)。今日，這個立場顯現在南非的非洲國家議會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所採用的「媒體憲章」中 (Media Charter)(1992: 41)。憲章包含了推動現代化的承諾，但是必須以民主為前提，同時需要全體公民充分與平等地參與，這是每一個國家策略所

需採用的核心價值。即使迴避階級的語言，改採公民的觀點，憲章仍然呼籲發展強大的公共媒體系統，由社區與勞工階級控制，提供生產、行銷、交換傳播與資訊上參與的可能。

128

雖然亞洲的政治經濟研究曾採行依附的模式 (Tang and Chan, 1990)，但主要的研究焦點是在傳播與資訊的新科技上。關於此項發展有兩大原因可以解釋：一為日本在這項科技發展上有壓倒性的進步；二是許多亞洲國家利用這套科技重新建構了勞動的分工過程。前者使日本投注研究電腦傳播的社會關係，並生產了相當多的文獻，這樣的研究主要奠基於「資訊社會」(joho shakai) 與「資訊化」(johoka) 的想法上 (Ito, 1989)。這領域內許多研究衍生自 Machlup、Porat、Bell 的早期著作。但很明顯的，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以來，Umesao(1963) 就以日文開始獨立地研究日本的資訊工業發展，雖然松田米次 (Masuda, 1970, 1981) 的著作由英文出版，很快地聞名於西方，但 Umesao 對日本社會科學研究主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對於西方的讀者來說，他的著作十分重要，因為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有機進化論立場投合 (Ito (1989: 206) 指出：「Umesao 理論使我們想起了史賓賽」)，而這樣的觀點與最近 Beniger(1986) 的著作相呼應。然而 Beniger 馴化了有機的隱喻，持續地反映出正統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理論觀點。在日本學界中，一個重要的例外是 Morris-Suzuki 的著作 (1986, 1988, 1989)，他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電腦化的政治經濟學、日本經濟的發展、以及運用電腦傳播作為社會活動再造的實驗後果。Morris-Suzuki 的研究，對於我們瞭解第三世界傳播研究相當重要，因為她提供了橋樑，使我們循此可探討影響亞洲研究產出的第二大勢力：以電腦傳播來整編亞洲貧窮國家，將其納入國際分工的新秩序。

一般公認，發展傳播與研究雖集中於討論拉丁美洲事務，但他們也未忘記亞洲的重要性。事實上，一個最重要的現代理論要塞就是夏威夷的東西文化研究中心 (East-West Center)，它主要在推動美國

與亞洲合作進行傳播發展計畫。過去十年以來，中心與一群不同立場的發展學者，共同慶賀他們的發展計畫成果，已成功地在新興工業國家中實現，如新加坡、南韓、臺灣與香港 (Jussawalla, 1986)。這些人的觀點，主要在迎合經濟發展的水平與高科技部門（主要為傳播與資訊）的成長所需，因此認為這些國家是發展主義下的重要成功故事。Morris-Suzuki 與其他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包含 John Lent、Lenny Siegal、Michael Traber、及 Gerald Sussman，都批判這個觀點，在此批判的過程中也將許多亞洲的批判研究，引進了西方學術界，這類亞洲的研究，在過去很少被發行^①。Lent (1985, 1990) 持續地著述有關亞洲的媒體問題，並且編纂此領域內的研究文獻，標明了批判學術的構成。Siegal 透過他的「太平洋研究中心」(Pacific Studies Center) 的館藏與出版《全球電子工業的資訊新聞信》(Globa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Newsletter)，記載了亞洲微電子工業的進步與美國的關係。Traber 立基在倫敦的「世界基督教傳播學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以出版《媒體發展》季刊(Media Development) 來支持亞洲的批判研究。Sussman (1984, 1991) 廣泛地寫作有關傳播、資訊、與發展的問題。立基在亞洲批判研究的文獻上（包含了地方期刊、雜誌、報告、研究工作報告），這批學者開始投注焦點於幾項議題上。亞洲國家的經濟有實質的成長但也同時是脆弱的，因為他們經濟的表現依賴在核心國家，特別是日本與美國的一般經濟景況，也就是他們對先進科技產品需求的起伏。再者，即使有高度的市場需求，但要維持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存在仍是困難的，因為那必須要隨時對勞工進行廣泛地控制，以致可以強迫壓低工資水平、要求延長工時、只提供簡陋的工作環境、進行鉅細靡遺的監控、及限制工會的成立。正

① 對亞洲新興工業國家批判研究的回顧，見 Bello 與 Rosenfeld (1992)。

如 Lee(1988) 及其他研究者 (也見 Heyzer, 1986) 所記載, 亞洲女性正面臨最嚴厲的控制手段。除此之外, 評論者 (Bello and Rosenfeld, 1992: 92-112) 指出, 在農業、製造業與微電子業上的發展計畫, 已造成了毀滅性的經濟後果, 因為這些快速的發展, 完全忽視了生態保育。如今, 早期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進步的凱旋之聲, 已逐漸消退下來, 因為核心國家的經濟蕭條減緩了高科技部門需求的成長, 再者, 勞工的動亂, 包含工會的成立、工資調高、更好的工作環境要求, 皆促使核心跨國企業找尋新的低成本生產地點, 以及透過製造與裝配程序的自動化來取代過去廉價的勞工。

雖然亞洲的政治經濟研究專注在傳播與資訊科技上, 但同時也有證據顯示, 政治經濟學的传统亦影響了大眾媒體的研究, 印度尤其是如此: 印度的電影與錄影工業是世界上最具規模者之一, 促使著大眾傳播研究的傳統, 主要取材自英美國家研究中的主流看法, 附加一些印度自身的研究影響, 生產出正統傳播的印度觀點, 其大致可說是支持發展主義的理論 (Kumar, 1989)。不過幾位政治經濟學家, 已開始挑戰這個主流導向的思考。來自印度的 P. Sainath (1992a, 1992b) 應用了階級分析, 來檢視新聞生產與傳布如何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及地方精英的曲解, 又發展一套對西方意圖將印度整編入服務業貿易實體的批判分析。而印度的移民 Manjunath Pendakur (1990a, 1990b, 1991, 1993) 利用他多重的國籍經驗 (美國、加拿大與印度), 生產出對電影與錄影工業的政經分析, 提出擬似「依附形式重組」的主題。他認為在新殖民時期下, 文化工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加拿大與印度的精英分子所掌控的工業, 它們如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這些精英曾經爲了創造他們在全球發展階層中的有利位置, 不惜自我扭曲, 犧牲了實質的國家自主。如今他們面對國際資本的挑戰, 那資本是不需要侍從的外國勢力; 另外, 因爲生活素質開始降低, 國家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自主開始喪失, 本土勞工階級與社會運動, 亦對他們展開攻擊。

由於發展策略推行已多年了，卻鮮有成就，再加上政治經濟學對第三世界的批判言之成理，因此發展主義的捍衛者已經修正了他們先前的觀點。首先，發展觀的修正版，將對大眾媒體的熱衷轉到對傳播與資訊新科技的肯定，同時承認批判觀點的普及度，於是吸納他們部分的理想成為新發展主義觀。過去發展主義將都市化與大眾媒體發展等同為進步，因此早期的現代化文獻關注於建立大眾媒介基礎建設的需求，包含了報紙、廣播、電視與電影。因著外界批判前列的發展計畫與建議，所以他們將重心轉移到新科技作為回應，主張真實的發展需求應是建造一個電訊傳播與電腦傳播的基礎建設。這種修正主義持續強調由企業領導現代化過程，雖然沒有一項發展項目是可以忽視的，但是如今建構先進的電訊傳播與電腦的基礎遠比大眾傳播系統來得更重要。這個新版本的發展呼聲，要求建立標準典範的數位傳播系統，使企業可以運行在發展中的世界，全然地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UN, ITU, 1985）。

修正主義中的第二個要素是承認批判觀點，包括本土研究在內，的確得到普及的成功。由調查拉丁美洲與美國學者的報告結果，與對拉丁美洲傳播期刊的引述分析，Chaffee 等人（1990）提出一個結論表示，北美學者對於批判學者的影響力沒有充分地理解，特別是 Armand Mattelart 在拉丁美洲的研究成果。根據這項結果顯示，美國認為拉丁美洲的學者持續地、大部分地、立基在實證主義的學派思想上，執行如同精進的發展主義觀點的研究。但是反對此發現的看法卻認為，拉丁美洲的學者與學術期刊反映出他們壓倒性地接受政治經濟與記號學思想的影響⁷⁰。雖然 Chaffee 等人（1990: 1023）將這個情況主要歸諸於文化因素的使然（葡西在此地的文化遺緒，與北美所承繼的北歐傳統，相當不同），但他們也同意用批判取向來解釋拉丁美洲的現實，更為有用：

131

社會學理論源自於一種高度階層分化的社經秩序，如同馬克思主義

的觀點，這是如今拉丁美洲的流行看法，這種觀點對此地區現實的吻合度，要比解釋富裕的美國來的更高。(1990: 1024)⁷⁶

承認了批判學派的普及性，現代化理論做了一些調整，修正一些正統觀，以奪回那些曾是它主要聽眾的第三世界學者。Rogers 以非常的先見之明，在一九七六年就立下了需要修正的基礎研究，他承認發展主義中的科技決定論取向失敗了，因此現在必須要結合地方文化事務到現代化的綜合理論中。然而這樣的修正與苟合，只是在擴充其觀點，而非做根本的變革，擴充後的理論本質，持續地包含西方科技的輸出，並將重點轉在電訊傳播上；雖非輸出西方的節目，但持續地結合西方的媒體模式，惟有的修正只是要求大幅倚恃著地方社會結構與文化事務來完成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要求使用地方文化與批判取向來達成先前的策略，使第三世界人民在工業化以前先認同於西方的價值觀。基本來說，現代化理論可以使用 Paulo Freire 的方法來行銷西方的政治經濟觀點。

近年來，有一種支持修正的發展主義觀點，在受到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後，開始反對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看法：資本、階級與國家，是動員人們行動的核心力量，足以「對社會與文化生活」產生深遠的影

-
- ◎前項調查的缺陷在於 Rogers 採用了違反常態的概念基模，來分辨「實證」與「批判」研究。因為許多批判研究採用的方法，從社會科學的哲學觀來看，會被分類到經驗方法的陣營，因此這個基模是無效的。一般來說，實證的類目中，應包含那些捍衛發展主義取向的領導分子；而批判學派中應包含那些反對者。
- ◎透過這樣觀察的結論，承認了實證取向沒有做到它該做的事，那就是描述事實。批判取向，不採取實證的定義，反而做到實證方法的功能所在。在判斷一個研究取向有否價值時，有哪項標準比「更吻合於現實生活」來得更重要？

響。修正主義的極端觀點否定政治經濟力量，對人民如何統御他們生活的議題上，能產生任何關聯的意涵。後結構主義聯合現代化理論學派，強調政治經濟權勢的力量已經式微，因為一個鬆散接合、多重主體性、及加速隨機解讀的世界，使得政治經濟勢力無法再產生出顯著的意義。基本上，時代·華納公司或松下企業已找不到路徑，無法影響祕魯或印尼的村莊。他們認定企業經理與村莊長老的腦海中，自有多重的認知地圖。接著總結，認為那些強調一個認知地圖的人，常常是受到了歷史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總體論述、與其他自啓蒙時代以來的罪惡所毒害。

這樣的取向協同發展主義，齊力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特別是它強調核心資本的相對權力觀及權力使用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儘管如此，現代化理論與後結構主義接近，形同玩火，只會使自己的方法論與政治立場瀕臨危險。後結構主義從來沒有想過：是否可以用一般科學的方法來瞭解發展與現代化的意義；及為什麼主張需要現代化？後結構主義者在談及這樣的議題上 (Tomlinson, 1991) 喜歡採用 Marshall Berman(1988) 提出「所有固定不移者，都消融在氣塵中」的觀點：現代性(modernity)無他，只在消除結構、固定不移者、本質、與意義本身。他們的立場呼應了韋伯的「鐵籠」社會學說法(譯按：參見吳瓊恩，1992：《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五南圖書公司，頁367)，認為連結時代·華納公司與村莊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權力系統，而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將此兩者之間的磨擦碰撞聲音，送入不知也無法可知的境界。

本體與挑戰

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涵蓋了廣泛的知識分子，面臨了無數的挑戰。如果它不是一個社群的話，至少是一種結合國際學者於一堂的取向，而結合並不依賴著單一的理論觀點或問題意識，亦不依賴單一取向的

學術活動。

133 由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成就是由個人，藉著非正式的聯繫，或在學會中的會面，如「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此種組織⁷⁴，將彼此的成果整合在一起，所以學術社群的說法無法成立。政治經濟學家設定了無數的主題興趣，使自己投注於跨領域與領域內的研究開發，這些主題包含了傳播事業的經營、國家的角色、企業與國家部門間的聯繫、以及傳播與廣大的全球、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這些關注都是以權力的語彙來描述，對某些人而言是體制的權力，對其他人而言是階級的權力。如此一些新的主題也在浮現：生產、論述與收訊間的關聯；階級權力與性別、種族的關係；傳播工業內在與跨傳播工業間的結構變遷的意義；對勞工與勞動過程的影響；私有、國家與公共傳播之間的關係。

這些實質的關注與其他看法都十分重要，有助於我們瞭解「政治經濟取向的共識與辯論」被什麼樣的內容架構出來。撇去這個問題不談，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的確共享一個相同的學術態度，使這個取向或多或少地得到重視。即或被批為歷史主義、後設的、迷思的與簡化的敘事體，政治經濟學家仍持續堅持以研究歷史事件為要務，強調

⁷⁴ IAMCR 的許多研究分支都支持政治經濟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經濟分部。根據丹麥教授 Robin Cheesman 的說法（書信，1993 年 7 月），這個分部成立於一九七六年在李思特大學召開的 IAMCR 年會中，由「唯物理論小組」負責，參加這個小組的學者有 25 到 30 名，包含了 Robin Cheesman、Nicholas Garnham、Fernando Perrone、Roque Faraone、Herbert Schiller、Graham Murdock、Peter Golding、及 Janet Wasko。這個分部於一九八〇年在 Robin Cheesman 與匈牙利的 Tamas Szecsko 教授主持下召開會議，之後政治經濟分部的成員就固定於每年的 IAMCR 年會中碰面。一九八七年選出匈牙利的 Zoltan Jakab 作主席，筆者於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四年任職主席，而現任主席是一九九四年選出的 Manjunath Pendakur（譯按：Mosco 於 1997 年起再任主席一職）。

分析必須兼採歷史的與立時的方法。雖然，特別從非歷史的與抽離的功能主義的考究態度來看，系統的思考有其侷限，但政治經濟學家都普遍地同意社會總體，的確在眾多其他趨力中存在，而傳播工具只會使總體更為強化與複雜，所以政治經濟學需要將傳播放入廣闊的社會總體中思考，而這總體正是由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淬鍊出來的。政治經濟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掌握、理解社會總體，但又不至於落入修正主義者的對稱論 (correspondence theory)，不致於直接從社會中讀出文化是什麼，亦不致於直接從文化中讀出社會是什麼。

政治經濟學家也一致認為，雖然道德化是一種對特定價值立場不加思索的支持，所以應該迴避，但是研究者仍須結合道德哲學的面向來考量，也就是從社會行動中瞭解道德的定位，同時認定知識不是一種抽離現實的智慧，而是一種會做道德判斷的社會存有。作為一個知識的社會行動派，他們質疑不同的道德立場，並將這樣的態度融入研究分析之中。最後，政治經濟學家也傾向視自己非僅是一個學術社群的成員而已，遵循著葛蘭西所謂有機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們的行動被實踐的精神所鼓動，被一種由行動來解釋世界的需求所鼓動。儘管如此，依據對研究活動的信守情操，政治經濟學家認定，解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動的形式，雖然它只是眾多中的一種。他們反對所謂一種將思想與行動、學術與政治分離的二分法，因此不是只以學術研究為務，而是視研究為一種執行社會轉變的工具或形式。

這些學術自我定位的要素，團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們。在後續章節中，將會強調更多不同的研究領域，解釋每一個領域選擇何項要素作為其立基所在。舉例來說，每一個研究採用不同的價值立場：如有人致力於研究民主的傳播、有人專心地描繪現有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而認識這些差異所在是相當重要的，其差異導源於每一領域對什麼重點應該明示，有不同的強調與考量所致。所以，我們不能輕意地忽視這樣的差異所造成的研究結果。此外，政治經濟學中有另一項廣為接受的觀點，為了致力處理一項待解決的爭議，此觀點確實地探究

應該選擇哪一種取向作為分析的基礎。舉例而言，有兩種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一為專注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的研究，提出跨國傳播公司的權勢的典範；一為觀察由媒體公司的內部運作產生不同的資本邏輯，比如在生產上。另一個重大的差異來自一者堅持以社會階級為分析的核心，一者以性別與種族作為全盤政經分析的背景。再者，我們也發現對於體制結構、文本的相對位置、及其觀點中收訊的社會關係，有著許多不同看法在討論。

這一系列的差異，顯示出這個學門包含了一幅度不同的立場、興趣、強調、與爭議。有人進一步預測，在多樣的政治經濟學之下，隱藏著一種化約的企圖，意圖建構一種本質論，當發展到極致時，經濟決定論就取代了這個取向。這樣的指控有兩大問題：第一，他們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的深度與廣度，至少已展示出我們的重點，必然遠遠超越正統經濟論的限制；第二，他們未曾瞭解到，經濟力容或不具有決定性或本質的影響，但經濟力在社會生活中，的確是真實的力量。當今天全世界大部分人們都在面對一個經濟剝削的慘淡現實時，這樣的權力正顯得特別的真實。



第二部

再思考與再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雖然擁有堅實的多元內涵，但如同其他知識立場，它也面對了許多挑戰，以下各章就要加以檢視。既然這些章節是要「再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我們倒也可以界定一下這個術語的內涵，特別是世界上的政治與知識在歷經動盪以後，已經使得這個術語「蒙上了一層陰影」，對於我們的瞭解，不怎麼有利。

「再思考」(rethinking)與「修正」(revision)及「不承認」(repudiation)，並不相同。修正主義者的觀點提供的是某些小幅度的修改，比如使用時下更為流行的語言或者接納敵對立場的邊陲觀點，如此也就給予原來的視野新的外觀，但又並沒有實質的修改。比如，現代化的修正主義觀點，可能使用的語言就包括了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或地方分權、去中心化，但不去挑戰它自己的根本假設(如將資本主義等同於現代化、認為私人控制傳播工具理所當然)。另一方面，不承認就表示已經拒絕了特定視野的基本前提，目的是另以截然不同的觀點加以替代，或是以根本方式加以轉變。功能主義者對行為主義的批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前一種情況。一九五〇年代開始，所有的社會科學界都展開了肅清行為主義傳統^①的風潮，也都有不等程度的成功，尤其是派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會學藉以目標取向行動的理論，企圖取代英美心理學的臨床實驗模式，派森斯引進的理論考量了主體性與意識的問題。阿圖舍的論述則

—————

① 這在派森斯的著作表現得特別明顯(Parsons, 1966; Parsons and Shils, 1951)，他提出了行動的一般理論，並提出了模控學取向來研究社會結構。後者反映在賽門(Herbert Simon, 1957)的主要著作，它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都發生了影響，包括傳播與資訊研究亦受其影響(Beniger, 1986)。一般認為，派森斯與其他功能主義者的論述代表了保守主義者的選擇，對立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其主要的結構替代取向。雖然片面，但這個觀點大致正確，它也反映了史金納(Skinner)的功能主義與行為主義心理學，以及賀蒙斯(Homans)的功能主義與行為主義社會學的失和。

是另一種例子，他將歷史、人文思維以及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排除在其分析之外，雖然他仍將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要件保留，但他對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轉換，已經更接近於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傳承，而不僅止於修改。

再思考可以說介於以上二者情況之間，既不是修正主義，也不是隨著「事實」上的不承認而形同轉換。再思考的起點，是要以批判的態度，認識這個取向的核心原則以及對這些原則的多元詮釋。所謂批判，我指的是更為深入的瞭解這個取向以及它的許多流派，方式是將它們之內的異同彼此對照，並將它們與另一些理論取向，再作對照。第二，任何取向若是要再思考，那就必須具有自我意識與自我反省的能力，檢視自己根本的認識論與概念基礎，是否具有價值。這點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特別的重要，因為它很少從事這樣的活動，雖然這個情況不難理解，畢竟它所處理的課題，如媒體產權日形集中，是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意義。受到現實產權問題的驅力而加以論述，固然表示政治經濟學陣營的人格守了實踐的目標，但由於這個向外望的世界觀占滿了前景，也就使得政治經濟學很少往內檢視，很少思考它在傳播研究所占據的核心位置，憑藉的是些什麼，很少思考它足以作為理解全球政經情勢的重要工具，憑藉的又是些什麼。就此而言，再思考的意義是珍惜既有成就，但也批判地反省這些成就與本取向的基本特徵，有些什麼關係。最後，再思考也意味著直接的對話，也就是與那些在若干程度內，或是根本就不同於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思潮，展開對話。我們的再思考，並不是舊瓶裝新酒，這是修正主義者的作法，我們也不是拒斥原有立場的核心題旨。反之，再思考的目標是要協助自我反省的過程，是要讓我們認識本取向有哪些最為根本的信守，也要影響與本取向辯論的另一些取向，至少提醒主張另一些取向的人，政治經濟學的所思所作，具有重要意義。

傳播政治經濟學習慣於向外望，因此也就對自己的理論之理論，或說自己的認識論，未加注意。在檢討這個再思考的實質要件以前，我們或可先簡要概述第一章已經討論過的認識論要件。這裡採用的取向，以「實存主義者」的認識論作為開始，認為實體是由感官觀察及解釋的行為、實務相互構成。實存論既沒有主觀論的極端，也沒有觀念論的極端，它總是認定，透過經驗及理論方法的結合，我們有可能瞭解現實。此外，這個認識論的觀點採取了「兼容並蓄」及「不可化減」的取向。換句話說，它並未論稱知識的多元理論，因為多元論認為任何詮釋模式均屬有效，但它仍然對許多詮釋取向採取開放的態度，它並不認為所有的現實均可化約為一個特定的因果力量。

我們的目標是要在兩個漩渦之間航行，一邊是相對論，一邊是本質論，前者如羅狄 (Rorty, 1979) 的對話認識論，認為決定「真正的代表、再現」的標準，就是「任何能夠協助我們想要做的任何事」，後者則想把社會與文化實務化約為某種或屬於經濟、或屬於政治、或屬於社會，或屬於文化的本質主義。我們特意迴避使用因果的用語，因為說到因果，就對我們的社會分析產生了限制^②。使用「因果」這個術語，立刻就把我們的思考導入特定方向，我們想到了一件東西（單數實體，或複數東西但被視為一套實體）直接對另一件東西或另一些東西（單一的整體或許多整體）發生作用，並且轉換了其狀態。這個術語造成了很大困難，讓我們無法思考各種東西如何使其某些組

②我們很快還要加上一句按語，這個結論並不限於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成員及哲學家 (Resnick and Wolff, 1987) 也認為，對於需要非線性、過程取向的思考，因果概念會箝制了解釋的形式。

成的成分，彼此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這個術語產生了抗拒作用，以致我們的思考還是凝固在東西，而不是過程，凝固在各種東西的直線關係，而不是它們的非線性關係。我也很不情願使用決定論的語言，因為若是採取這些語言較強烈的意涵，也就會變成有些不變的東西，改變了另一個東西。若是將決定論當成是設定限制 (Williams, 1975)，倒是較為可以接受，但仍在我們的心智上，留下了傳統物理學的印記，我們還是會想到有些整體不變，但透過因果關係或透過設定限制，改變了另一些整體。汎層或過度決定這個概念來自於佛洛依德，到了阿圖舍的著作後，這個概念取得了最高的顯要地位，它標誌了一種語言，能夠將社會理解為，每一個社會行動、過程與結構都彼此決定彼此。每一個都是一個社會場域的部分，不是單獨的存在，這個場域包含了許多矛盾與衝突，也包含了許多統一體，每個場域都包含了許多矛盾與衝突的力量，彼此交互作用。結果是這個動態的社會場域，已經無法化約為任何特定的質素，它包含了許多層面的接合、連結與分裂。

這個解讀認識論的角度，拓展了知識過程，它不再是單一的決定關係，而是多重的、動態的互動。不過，採取這個角度的代價，也可以說是特定性的移轉，若是使用決定論這樣的術語，我們的負擔是要精確地決定某些關係的連結與分裂，為什麼比起其他相對的連結與分裂，來得容易出現，我們現在不再如此使用，但我們的負擔還是存在，我們還是要知道概念上與經驗上的實體，其特定連結與分裂是什麼。

汎層、過度決定這類語言在這方面會有幫助，推進了我們的知識理論，傳統上對決定論取向的批評，都是說它太過簡化，原本動態、複雜，並且通常是非線性關係的社會整體，被決定論簡化了；如今，若是援用汎層決定的概念，我們也就不再受到這類批評之苦，同時也沒有完全消除決定性的可能。雖然這鐵定是有用的概念，但我們還是會問，是否真有必要保留決定論這樣的概念。是否真有需要，確實很

可質疑，我們會想，將決定論的語言束諸高閣，代之以其他提法，是否會更加值得。其他提法之中，「相互構成」(mutual constitution)有許多長處。「構成」這個術語蘊涵的是各種要件，除了其本身處於形成與定義的過程以外，這些要件也彼此互動，因此「構成」所顯示的是，社會場域的所有要件之內的「形成過程」。沒有任何東西已經完整形成或已經完全清楚界定，但我們還是可以找出，在這些東西之內及在東西之間，有哪些特定的過程在運轉，決定了構成過程及各要件關係的性質。「相互」這個術語也比「汎層」(over)來得可取，因為它保存了多個層面的意思，但沒有過度的意涵。

在這觀點看來，社會場域由「許多過程」組成，這些過程的各要件相互建構著關係。各要件則包括了結構（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可供社會科學分析的制度）、這些結構之內與之間的接合與分裂關係，以及研究者爲了要瞭解這些結構與關係而做的思考、心智圖譜、概念架構及探查提供。我們稱之爲研究成果者，其實是我們研究過程的客體與研究過程的主體相互建構而成，特別是我們的社會構成過程，包括了研究本身的積極活躍之過程。

我們又將這個認識論界定爲「批判的」，因爲知識的產生，必須透過比較的過程，在不同或相互對峙的理論形構之間比較，在一個特定的理論形構的次構成之間比較，在相互構成知識分子之實踐的兩種成分之間比較。這兩種成分是執意瞭解這個世界，以及執意要改變這個世界。

本體論

與這個認識論接合的是特別突顯社會變遷、社會過程與社會關係的本體論，它與社會研究的一般（但特別是政治經濟學）趨向恰成對比，後者集中於結構及制度。這也就是說，採取這個本體論的研究，已將社會變遷視爲無所不在，而結構與制度則經常變化中，因此，找

出過程的特徵，比起將制度冠上特定名稱，還要來得可取。我遵守這個原則，提出具有實質內涵的政治經濟學圖譜，並找定三種過程來入圖探索，作為起步的過程是「商品化」，將使用價值轉換成爲交換價值的過程。然後從這裡轉入，分析「空間化」，空間與時間的轉換，或說制度的延伸過程，最後我們就進入了「結構化」，建構結構與社會動能 (social agency) 的過程。透過這些過程來強調社會變遷並不是捨棄了結構或制度，這麼做等於是以此種形式的本質主義，替換彼種形式的本質主義。反之，這些起點是要建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實質理論，筆者認爲，在衆多理解社會場域的可能性之間，這個選擇比較可取。

139

理論母數

我們說這些過程是「起點」，因爲它們打開了分析之門，協助我們將政治經濟學納入架構，但我們並不是說它們具有任何本質的獨特性，以致於所有其他社會過程，或者所有其他結構，均可如此化減，它們也不是所有可能的起點，將政治經濟學取向應用在傳播領域，還有其他可能。事實上，每個起點不僅都有自己的接合與連結，而且也有自己的分裂與脫鏈，同時也有對立與另類的過程。最後，它們彼此相互構成，也與社會其他每個運作中的過程，相互構成。雖然我們有許多過程可供考慮，但筆者選定這三者，認爲若要發展得到寬闊的、兼容並蓄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它們應該最爲可取，它們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提出的問題，不僅能夠處理，而且它們也能夠回應鄰近學科（也就是政策研究及文化研究）提出的挑戰。

「商品化」指的是將使用價值轉換成爲交換價值的過程，這個過程以許多面向的方式，延伸進入了傳播產品（如閱聽人，如勞動）的社會場域，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卻很少加以注意，雖然我們會如此期望。第四章所處理的過程，剛好與奧非 (Offe) 所用的術語相反，奧

非的說法會招徠誤解的危險，但他著重的是公私生活中，抗拒商品化的各種形式，他稱之為「去商品化」。「空間化」的過程，就是馬克思與因尼斯 (Harold Innis) 等人稱之為空間與時間的轉換，它包含了全球化，或說是傳播產業以全世界為範圍，凝聚成堆，也包括了產業的重新組合以及它們在多個層面的整合。造成空間化分裂或與之對立的力量，來自於民族建構、民族性與公民身分的形成過程。最後，「結構化」是指結構與社會動能相互構成的過程，或者，我們也可以更加特定地說，即便結構正就是構成過程所必須依賴的中介，我們還是可以說結構由動能建構而成。彼此呼應，但彼此又可能抵銷階級、性別、種族及社會運動等議題，它們形成了整個社會關係及權力過程，而這正是結構化最後沈澱出來的結果。

我們將先大致掃描、討論一般的政治經濟學文獻，然後向內轉進，重新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最後，本書再度向外移動，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邊界學科，也就是「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以此結束本書。筆者的目標是要深化政治經濟學的內涵，並在此過程中，評估這些不同於政治經濟學的取向，長處與短處各是些什麼，筆者達成這個目標的作法，則是評估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的若干重要意見交流，並探查它們各自的邊界，如何底定。



商品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Marx, 1976a: 126，吳家駟譯文)

路易斯·馬林 (Louis Marin) 說，從經濟論述中選取一段平凡陳腐的敘述，然後使「市場」、「資本」或「利潤」與「語言學的」、「形象符號的」或「獨特不同的」等限定語句產生聯繫，以便使其具有意義，這不是隱喻，而是拙劣的模仿——換句話說，這個描述與分析的策略，形同是術語與概念脫離了它們的成長領域，形同是術語與概念游離了讓它們產生意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形同是將術語與概念放在不同的舞臺上使用。(Cot and Lautier，轉引自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 16-17)

本章描述再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內涵，起頭是商品與商品化，原因有多層。商品化的過程描述了資本主義執行積累資本的目標，或說轉換使用價值為交換價值以實現價值的目標，究竟是透過什麼手段。再者，本章追隨馬克思的前例，他在《資本論》的開始，也是討論商品形式，也就是資本主義展示自己的方式，大致就是經由「龐大的商品堆積」，這是它最平凡的具體展現。最後，從這個概念著手，也表示我們必須調整分析的順序，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重點經常未能平衡。如同本章將展示的，我們在這裡當然是會討論商品與商品化的過程。不過，政治經濟學偏向將大量注意力，放在生產及分配商品的商業機構與商業結構，以及放在規範生產及分配商品

過程的政府機關。部分原因，是因為傳播研究傾向於分析內容及分析瞭解內容的不等方式，而不是分析生產這些內容的種種結構是什麼，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這種分析，也就能夠產生矯正的作用。這個矯正之功是有價值，但集中在結構的缺陷，將使內容的分析，全部讓渡給對政治經濟學毫無或少有興趣的人。政治經濟學或許不是要論稱它無須注意內容的分析，而是論稱它將以更多力氣投入文本，但會將文本的分析，放在一個徹底的政治經濟學架構中。

141 亞當·斯密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區分了兩種產品的價值，一種是滿足特定人類欲求或需要的價值，也就是使用價值，以及能夠用來進行交換的價值，也就是交換價值。如果產品的生產主要是透過交換過程而進行，那麼這個產品就有了特定形式，也就是商品。「商品化是將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的過程」。

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商品分析開始，因為他察覺，商品是最容易看到的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為明白展現的形式。資本主義「表面上」是「龐大的商品堆積」。雖然這個表象並沒有逃脫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注意範圍，但他們卻偏向認定這個表象的形成，自然天成而無所改變，馬克思的批判起點，就從這裡開始。古典學派認為「不證自明、自然天成而必然如此」，馬克思則指出，這是「生產過程主宰了人，而不是人主宰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構之產物」（Marx, 1976a: 75）。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關鍵之一，也是影響及於所有後來政治經濟分析的傳承，正就是對詰商品，以此斷定表象究竟代表了什麼，也以此揭發商品形式所凝聚的社會關係。誠如加力在傳播研究之中，少數對商品形式持續有致的分析之著作《廣告的符碼》（中譯本遠流公司出版）所作的展示（Jhally, 1990），馬克思對商品及使用價值，採取了寬闊的觀點。馬克思認為（Marx, 1976a: 125）商品的產生，可以源自許多不同的需要，生理上的或文化的需要（「來自肚子或來自想像，並無不同」），商品的使用則「有種種的方式」可以界定。商品可以源自許多不同的社會需要——滿足生理上的飢餓，以及

符合或違背特定社會團體的地位符碼。再者，馬克思的認定與某些人的詮釋剛好相反，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不限於維持生活需要的滿足，他指出，許多使用價值是由社會所建構。

有些人對此說法不滿，他們論稱區分使用與交換價值，使得道理更加模糊，不是更加清楚。比如，薩林 (Sahlins, 1976: 15) 論稱，馬克思知道所有的價值均有社會屬性，但偏向「將使用價值視為自然天成」，「由於強調它們滿足了『人類欲求』的生物因素，卻使得使用價值由社會決定的事實，消失了」。布希亞 (Baudrillard, 1981) 延伸了這個批評，他說，最後決定使用價值的因素，不是構成特定交換價值的各套結構與符碼。這個批評提醒我們，由於馬克思的主要目標在於詁難資本，在這個旨趣如此強大的前提下，使用價值的內涵及社會主義社會前景等重要概念，雖然足以具體並根本地否認資本主義，也就沒有得到他的詳細分析。不過，這個文化批評也圈定了一個政治經濟學難以同意的疆界，因為這個批評的目標，不僅只是要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空隙：它還代之以觀念論者的相對說，它認為符碼可以任意界定價值，而如同人類的文化實務作為，變化繁多，這也等於是說什麼都成。政治經濟學知道是有這些變化，但認為使用價值的疆界，受到商品結構屬性的制約（馬克思的用語）或是限制（威廉士的用語），使用價值從這些結構屬性取得其存在的性質。取用魯賓 (Rubin) 的概念，加力 (Jhally, 1990) 認為不妨運用「局部必然性」這個說法，以此說明馬克思體認到了「使用價值並非在空中晃來晃去」。我們也可以說，各種使用價值是多重決定與相互構成的，我們可以保留區分，一邊是社會建構的使用價值，另一邊是起自特定社會安排的價值，也就是受到市場機能影響而產生的交換價值。

如果我們把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的「蔥皮」表象逐層剝離，我們也就看到了整個生產體系。商品化與傳播的關係，具有兩個一般層次的意義。第一，「傳播過程及傳播科技對於經濟整體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作用」。比如，傳播通道有了改變以後，特別是全球流通的

電腦及電信科技引進以後，關於成衣業整個生產、分配與銷售的資訊就擴充了，從而改進了庫存控制方式，使得商家可以節省空間，並且愈來愈可能只儲存顧客欲求的貨品。第二，「社會層次的整體商品化過程，滲透到了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使得社會的商品化過程所出現的深化及矛盾，也對傳播這個社會實務運作，產生了影響」。比如，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國際間蔚為風潮的自由化與私有化趨勢，對整個世界的公營及國營媒體及電信機構，都造成了衝擊。

既然將傳播置放在一般層次的政治經濟分析，有其旨趣，我們也就不妨從商品化的一般過程，開始檢討，探查它與傳播的關係。以資本的觀點來看，生產過程起自資本家購買「勞動力」與「生產工具」這兩種商品。最後產出的銷售價值，超過資本家原來的投資，我們將超過的部分稱作「剩餘價值」，它可能被投資於擴大資本的積累。就其本質來說，資本是透過生產與交換過程而擴張的價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這個分析再推進了一步，它的結論是這些過程具有「剝削」的性質，因為資本家控制的規模擴張以後，將會使其他生產及勞動力體系，銷融為一種只具有商品地位的社會關係，或說使得勞動力與土地及原料並列，成為只是生產要素之一，此時勞動力也被迫放棄了對生產工具的控制。於是勞動者不得不出賣其勞動力換取薪資，但其所得又不完全等同於付出的勞動力。然後，在絕對（延長勞動時間）的過程及相對（增強勞動密度）的過程，剩餘價值的抽取被強化了，而商品勞動也被複製了。剝削是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產品」，但剝削的深淺則取決於階級抗爭的情況。因此，商品充盈於資本主義的形象空間，商品同時也是整套社會關係的凝聚，資本與商品勞動在此關係中分居兩端，彼此頡抗，想要控制生產與交換所得出的價值^①。

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商品使得剝削的社會關係變成客觀無欺，商品將這些關係以一種凝聚的形式呈現，使之成為自然而然。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一部電腦也就是帶有一套使用價值及特定交換價

值的商品，而這些價值則由價格表達。這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存在，也就迷惑了我們的瞭解能力，我們所看的電腦，不再是國際分工的具體產物，不再是階級、性別、民族與空間等面向所構成的層級生產關係。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 則揭發了更深一層的神祕化，根據這個概念，商品不僅蒙蔽，它還有了自己的生命，商品不僅凝聚了社會關係並且包含了使用與交換價值的鬥爭，它還產生了自己的力量，凌駕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上，馬克思認為，這種情況原本只認為存在於宗教領域 (Marx, 1976a: 65)：

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裡，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係並同人發生關係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裡，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吳家駟譯文)

事實上，馬克思認為，商品拜物教比起宗教還要來得有力，因為商品是一種物質的具體展現，它對感官的訴求，比起宗教信仰來得容易多了^①。若是這樣來看，商品就包含了雙重的神祕化。第一，它將勞資關係視為自然天成，本來就是這樣。展現在我們前面的是電腦，不是集結在生產點展現的抗爭。第二，商品成為神祇了，商品有了自己的生命，對立並抗擯社會領域然後加以控制。第一點將商品視為生

-
- ① 我的認識論容不得本質論的存在，因為本質論會將表象化減為社會關係的本質。筆者立意迴避本質說的語言，因此將商品視為兩者的相互構成，一邊是表象（汽車、情境喜劇或新聞廣播），另一邊是使表象得以展現的社會關係。
- ② 或許有人對此會有爭議，認為這麼說已經不當地将實體與物質膨脹了。不過，論稱商品拜物教的存在，並不需要依賴商品比宗教信仰真實的說法。

產過程的自然產物，而不是視之為社會抗爭後的社會產物；第二點則完全砍斷了商品與生產過程的聯繫，並將商品置落於它自己專屬的社會領域，控制了社會生活。電腦變成了比人還大的力量，電腦變成了塑造、決定、拿捏或者控制了社會發展的力量。這個雙重神祕化的結果，就是社會過程的產品，反而有了自己的存在地位，並且有了力量來塑造社會生活。

144

商品化指的是使用價值轉換成交換價值的過程，決定價值的標準，由產品所能服務的個人與社會之需要，轉換到了由市場所能帶來的結果。政治經濟學很少解析這個概念，部分原因是它歷來著重於結構與客體的分析，而不是過程與關係。不過，政治經濟學在論及資本主義的擴張的時候，還是隱然涉及了商品拜物教的說法，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某些重要著作 (Ewen, 1988; H. Schiller, 1981, 1989) 都論及了市場機能在全球的擴張，以及公共空間的私有化，以及交換價值在人際生活中的擴充等現象。

這裡的分析必須區分商品化與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 及客體化 (objectification) 的差別，後二個過程經常被與前者相提並論。商業化過程比較狹窄，它特別指在閱聽人與廣告客戶之間，創造一種關係。比如，電波商業化的意思，就是廣電廣告有了成長，而節目的製作及節目流程的安排，則是為了將閱聽人賣給廣告客戶。由於市場的內涵比商業化來得廣，比如，它還包括了勞動的商品化，我們因此也就將商品化視為較廣義的過程。客體化的內涵則還要更廣一些，它也常與商品化併合。比如，盧卡其 (Lukács, 1971) 在論述物化 (reification) 的著作中，就說物化的過程就是人與人的關係「披上了物的性質，於是就取得了『鬼影子客觀性』」。商品化則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形式，此時取得「鬼影子客觀性」的「物」就是商品，也就是這個客體的價值在市場中才能顯現。雖然盧卡其小心翼翼，但他也偏向於膨脹了這些過程，就如同當今被稱之為後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那些人，也有這樣的偏向 (Luke, 1989)。「認為商品化已經支配了文化

的每一個領域的人」(Luke, 1989: 10)，其立場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此論稱，將會使得我們幾乎無法迂迴，我們會變成不是舉旗投降，臣服於商品化之下（因為商品化的過程已經包山包海），要不，我們就會把這個概念連根拔起，它就會脫離原來的意義，不再限定在市場交換關係中，而是包涵了非人化及客體化的所有過程。我們或許可以說，後者這種反應讓我們可以分析抗拒的形式，這雖有可能，但代價卻是商品化這個概念會變得太有彈性，以致於它喪失了指出某特定意涵的精確性。在仔細區辨宗教與商品拜物教之後，馬克思說，後者是特定的歷史發展所造成的結果，而不僅只是反人文精神力量的最近展現。我們也不能一方面同意馬克思的這個論點，但另一方面又論稱，在馬克思的著作出版以後，生產力的發展又已經到了另一個層次，以致於商品化已經等同於客體化。我們這裡要再次指出，若是認定這樣的立場，我們就很難掌握商品化的原初意義，若我們還真能兩者兼顧，那一定是採取了某種強烈的化約論者的立場，或採取了某種包山包海的分析。若是放棄了商品化的原初意義，我們就無法辨別市場與非市場機能及過程的差別。

145

傳播的商品形式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長處，在於它向來強調結構形式的重要性，它向來致力於描述並分析影響生產、分配與交換傳播商品的結構形式，並檢視（主要是國家）如何規範這些結果。雖然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忽略商品本身，也沒有忽略商品化的過程，但它是偏向於突出企業財團與國家結構及機構。等到政治經濟學開始分析商品了，它所分析的具體商品形式，卻又偏向於集中在媒體內容，對於媒體的閱聽人則較少分析，對於傳播產業的勞動過程的分析，數量之少則讓人咋舌。強調前二者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全球媒體公司實在很重要，而媒體內容的產值，增加也很快。像時代·華納這種緊密整合的跨國公司，享有的

擴幅效果非同小可，比如，它創造的媒體產品具體實現在許多層次，比如，最先開始的可能是在美國及海外戲院推出某部電影，然後在大約六個月之後，將這部電影改以錄影帶發行，過後不久則安排它進入按片付費、付費有線電視，或者，最後還可能在無線電視頻道中播出（參見表 4-1）。這些機構固然重要，但由於強調它們的活動，也

表 4-1 商業化的過程，一九八三與一九九〇

一九八三年的商業化階段

- 起步電影開始在美國戲院上映
- 起步之後數週電影開始在全世界戲院上映
- 起步之後數四個月錄影帶開始在美國銷售
- 起步之後一年電影進入美國付費電視頻道
- 起步之後一年（大約）電影在美國戲院重新上映
- 起步之後二年電影在地表無線電視頻道播放
- 起步之後二至三年電影在美國以外的電視頻道播放

一九九〇年的商業化階段

- 起步電影開始在美國戲院上映（但很多不是大製片商的電影，已經無法有這個機會）
- 起步之後數週電影開始在世界上其他戲院上映（但很多不是大製片商的電影，已經無法有這個機會）
- 起步之後三至六個月錄影帶開始在美國銷售
- 起步之後三至六個月電影進入美國按片付費電視頻道（十二個月播放十五至十八次權力）
- 起步之後六至十二個月錄影帶開始在全世界銷售
- 起步之後九至十五個月電影進入美國付費電視頻道
- 起步之後一年電影進入美國以外地區的有線及地表電波電視頻道
- 起步之後三十個月電影進入美國電視網播放（三年內播放兩次或四年內三次）
- 起步之後三十六至四十二個月進入美國電視節目供應公司
- 起步之後三十六或四十二個月電影在付費電視頻道重播

就意味我們對大眾媒體的傳播形式，分析不足，特別是對閱聽人及勞動的商品化，分析不足。

146

內容的商品化

政治經濟學家開始思考傳播的商品形式時，他們偏向以媒體內容作為起點。若從這個觀點來檢討，傳播商品化的過程特別涉及了訊息（從一筆筆的資料到具有體系的思想）被轉化為可在市場買賣的產品。比如，我們就以報紙記者為例，他們的工作就是運用專業技能，生產具有使用價值的新聞，雖然其實用性的程度高低有別。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聞史有許多的過程，其中包括了商品化，也就是撰寫新聞的人成為薪資勞動者，他們賣出其勞動力（撰稿能力）以換取薪資。資本則將這個勞動力轉呈新聞稿或專欄，這些新聞與專欄就與其他文稿及廣告，組合成為整套的產品。資本就把這套產品放到市場中兜售，如果成功，它就賺取了剩餘價值（利潤），然後資本可以將剩餘價值投資於擴充報紙的規模，或者投資在任何其他可望帶來更多資本的事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這整個過程就實現了剩餘價值，因為資本控制了生產工具（印刷廠房、編輯室等），使得資本能夠從勞動者身上得到比付出者還多的東西。

實現的剩餘價值會有多大，取決於勞動、消費者與資本市場等許多因素。就勞動這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檢視了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的創造過程。前者指相同的工資，但延長了工作時間；後者指工資相同，但勞動過程的密度由於勞動時間受到更嚴格控制而增強，方式包括工作測量標準的改變，以及監控系統的調整以提高每單位工作時間的產出。至於資方這些策略是否成功，則需視勞方抵抗的能力而定，而勞方是否能夠抵抗，又取決於勞方組織的力量、當下社會的一般條件（如資方是否有能力使用新的工人及新科技來取代原來的勞動力）。

資本也企圖控制消費者，手段是採取成串的策略，最終形同取得了「自然」的地位，資本理所當然以唯一的產品提供者自居。這些手段包括營造市場的壟斷地位、控制寡占的協議、使用廣告創造產品認同，以及多角化經營，彈性生產商品，以便因應特定產品的市場需求發生變動等等。如同與勞方的關係，資方若是要實現剩餘價值，它也必須取決於消費者的抵抗能力，而消費者是否抵抗，同樣又取決於消費者組織的歷史，以及一般的社會情境是否能夠提供替代的產品及勞務。最後，實現剩餘價值又取決於當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取決於資本的成本（譯按：作者指的應該是資本家向金融機構借貸資金的利息，一九九〇年，「新聞國際」集團積欠銀行團達美金四百億，行將破產，但未久西方國家經濟政策改變，利率大幅下降，是助成該集團否極泰來的因素之一），因為有了資本才能（譯按：購買新科技）替換勞動者並擴張商品形式（比如，從報紙形態擴張到付費的有線新聞專業頻道）。

147

以上系統地勾勒了從傳播內容抽取交換價值的過程，我們從中知道，它涉及了整個複雜的社會關係，包括勞動者、消費者與資本都捲進了商品化的軌道。傳播研究偏向於集中在內容已成商品的問題，然後延伸至辨認內容的商品性質及其意義的關聯。因此，傳播也就是一個相當特別並且非常強大的商品，因為媒體商品除了能夠生產剩餘價值以外（就這點來說，它與任何其他商品都相同），它還包含了形象符號，具有特定意義能夠塑造人們的意識。許多研究已經展示了這個取向的價值，它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媒體擴張了商品生產的過程，無論這個過程如何迂迴、矛盾，也無論這個過程是怎麼充滿了抗爭，這個訊息的生產過程都反映整體資方及特定階級的利益（Herman and Chomsky, 1988; Schiller, 1973, 1984, 1989, 1969/1992）。雖然政治經濟學家都能大致同意這個概念，有些人則再提出另一些說法，尤其是崗恩與史麥塞。他們兩人都認為，傳播研究偏向於強調媒體生產的意義或意識形態。崗恩從開始學術生涯以來，就一

直以最為猛烈的砲火，轟擊放棄經濟分析而津津有味於「自主的論述」之人^④。不過，對於政治經濟學陣營之內，偏向於處理訊息之意義及意識形態的人，他也同樣不假辭色，他認為他們所採取的是加力稱之為「傳播消費者模式」的東西，但卻沒有充分將大眾媒體「當成經濟實體來研究，媒體不僅具有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經濟角色，而且也具有間接創造剩餘價值的經濟角色，前者是媒體本身就是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後者則透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運作」（Garnham, 1979: 132）。若是以這種方式解讀，那麼，大眾媒體的經濟重要性是雙重的，首先是它們就是商品生產的立即場所，「並且」，若說是間接，則仍然很是重要，此即媒體透過廣告在整個商品化過程起了作用。這並不是說媒體的意識形態作用比較不重要，而是意識形態的作

④ 崗恩在一九七九年出版了一篇論文〈論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極有影響力，他如此寫著：

因此，經濟主義 (economism) 對決定社會存有的因素，提出了立即而又理性的回應，它關注的是在占統治地位的交換關係之內，當下的立即存活與再生產問題。湯普森 (E. P. Thompson) 最近稱之為「湊在一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很快就忘掉了這麼一回事，原因是雙重的，一個是他們存在的物質條件，通常不能發生立即的決定作用，再來就是他們有罪惡感，意識到在剝削的主體關係裡，他們與物質生產勞動者，處於對立地位。(p.126)

崗恩在較近的論文集《資本主義與傳播》裡，他首先攻擊的就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優先處理文本的傾向」，因為這種傾向根本就是浪漫不知所以（「細菌」一個），這種觀點「剛好作來用為知識分子或文化工作者的意識形態，因為它使得他們專熟的能力能夠發揮，文人搞形象符碼的能力，得到了尊厚；這種文本研究所要求的證據，往往只是個別分析家的觀點，至於是否有實質內涵，在所不論，因此，文本分析也就提供了廉價的研究機會」（Garnham, 1990: 1-2）。

148 用，徹頭徹尾都是整合在生產過程之中，而某些政治經濟學論者，卻經常只是將生產過程視為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者，另有些結構主義及後結構主義論者，則又認為意識形態是自主而不受生產過程影響。

閱聽人商品

是以，崗恩為媒體商品化提供了兩個主要的面向：直接生產媒體產品，以及使用媒體廣告促使整體經濟走向全面的商品化。史麥塞(Smythe, 1977) 論稱媒體助長全面商品化的方向，與此不同，他提出的說法是，閱聽人才是大眾媒體的主要商品。根據他的論點，大眾媒體的構成過程，就是媒體公司生產閱聽人，然後將他們販售給廣告客戶的過程。媒體節目及流程的安排，目的是要吸引閱聽人；這個類比與往年酒館為了吸引顧客飲酒而提供「免費午餐」，沒有太大的差別。根據這個觀察角度，閱聽人的勞動或是閱聽人的勞動力是大眾媒體的主要產品。

史麥塞的分析激發了政治經濟學文獻中，一場相當有意義的意見交流，檢視者頗多(Livant, 1979; Murdock, 1978; Symthe, 1978；譯按 Smythe, 1977 及 Murdock, 1978 的中譯刊載於《島嶼邊緣》第四期，1992年)。關於閱聽人是否是商品、是否是勞動的辯論，相關的意見交換及辯論已經有學者多次加以詳細記錄(Jhally, 1990)，此處不再引述，我們在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史麥塞論點在更大層面的意義⁴。閱聽人是否作工、閱聽人是否是唯一的媒體商品，形成了辯論的雲霧，我們可以說，原本史麥塞的論點可以增進我們對媒體商品化過程的瞭解，反而被忽略了。對他來說，這個過程造成了三邊連結，媒體、閱聽人與廣告客戶彼此簇擁，相互連鎖。大眾媒體的節目用來建構閱聽人；廣告客戶付錢給媒體公司來使用這些閱聽人；閱聽人於是被接生給廣告客戶。透過這個論點，我們所看到的過程，不再是眼前這種媒體公司編採報紙、製作播放收音機與電視節目、製作電

④ 閱聽人商品的辯論已經局部失去了銳利觸角，部分原因是反擊這個論點的一個重要批評，如今重要性已先折損。梅鐸等人論稱，史麥塞的主張更為適用於北美洲的情況，相比於西歐，北美的大眾媒體絕大部分都是由廣告資助。但並不是所有的歐洲政治經濟學者都贊成這個批評。比如，米格 (Miège, 1989: 30) 就說，要在文化工業中的私人營利部門與公營部門做個區分，並無可能，因為「公營部門在文化市場的創造與成長過程，不但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直接資助了文化商品的生產條件」。此外，全球的私營化浪潮與廣告業的擴張，也使得北美洲的情況，不怎麼例外。最後，高丁與梅鐸最近的論文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在沒有提及這場辯論的情況下，也說大眾媒體生產了閱聽人商品。此外，史麥塞的論點既可說是太強，也可以說太弱。史麥塞從物質論者的基礎出發，迴避了內容問題，卻只論稱唯一的商品是閱聽人的勞動。不過，誠如李文特 (William Livant, 1979) 所說，史麥塞向來都堅持媒體訊息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必須大談特談。

譯按：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閱聽人商品辯論萌芽的時候，西歐的廣電機構幾乎全部是公共產權（但播放一小部分廣告），除英國以外（一九五四年起即有私營電視公司），唯一有私人產權廣電活動的義大利，從一九七六年才開始容許商業廣電公司的存在，但只限於地方。在這個情況下，從西歐的現實觀點，以及從反對廣告作為贊助廣電活動的觀點來看，強調北美（廣電資本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的例外，除了符合現實以外，也可以說是提供出路而必須做的強調；但這並不是說當時批評史麥塞那篇論文 (1977) 的人（如梅鐸），認為大眾媒體沒有生產閱聽人商品，當時的批評如同作者在這裡所說，在於突出史麥塞的論點太過強烈，除了於當時實際略有出入，也會造成分析及政治策略的偏差，畢竟，提出批評的人（如高丁與梅鐸一九七九年的論文《意識形態與大眾媒體：關於決定論的問題》，中譯收於《資訊·錢·權》，一九九二年，臺北時報出版公司），其論點之一，就是強調英國等西歐國家的媒體傳播活動，大部分都是私人產權與利潤掛帥，他們以此抨擊自由主義者的論點，指出後者將箝制大眾媒體的力量，幾乎完全歸入國家，因此這樣的批評，也就不可能是否認閱聽人商品的存在。到了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前引米格寫作的時候，德法等國的廣電活動是已經有了很可觀部分的私人產權（及廣

影，我們所看到的是媒體商品化的整個圖像，在這塊空間裡，我們也看到了廣告客戶或整體資本的動態。商品化的過程徹底地整編了媒體產業，使之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但主要並不是因為媒體打造了充滿了意識形態的產品，而是因為媒體生產了閱聽人，「並且」是符合廣告客戶需要的特定人口學特徵的閱聽人。因此，史麥塞展示了商品化過程的最重要關鍵，在於媒體為總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生產了閱聽人，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生產，史麥塞於是馳援了物質論者的分析。

到底閱聽人是否能夠構成我們一般理解下的勞動？這個論點具有建設性，但頗有爭議也讓人懷疑。我們先且繞過這個爭論，如此也就看出，史麥塞使用勞動過程這個概念，作為一個隱喻或類比，倒是頗為可取，因為它指向了一個可能，讓我們思考前舉的三邊關係，但不至於掉入這種結構論述常會帶來招致的機械式思考。閱聽人是否在傳統意指下的狀態下作工（包括所有勞動價值論的內涵），姑且不論，但將閱聽人活動比做勞動過程，頗為可取，因為勞動過程就是指勞資雙方爭奪勞動過程及勞動產品控制權的共謀與對抗。以這個概念來探討關於閱聽人的問題，價值更大，相比於所謂的大眾社會理論（如 Ortega y Gasset, 1957；譯按：本書中譯本由遠流公司出版）所說

（續前頁）

告活動），也就是史麥塞當年的分析，如今更是可以不受限於北美，雖然這也代表了他所關懷的道德承諾（反對廣告），其力量不敵資本邏輯的運轉（史麥塞一九七八年在答覆批評者時，表示他是希望他的預言不會實現）。然而，米格的論點並非沒有問題，除了他的理論流於作者所說的「本質化約主義」之外，在政治上，這個說法也會造成行動上的進退失據（若公營私營都相同，那資本化又有什麼可以反對呢？），事實上，直到一九九四年，歐洲聯盟的十五個國家，大部分的公共廣電機構都還維持33%至50%的收視率或收聽率，可以說持續具有重要性，而主張公共廣電必須維持以回應私營化壓力所造成的不民主趨勢，在學界與社會運動界都還在繼續推進其主張。

的被動無依之麻思大眾，或相比於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爲了回應大眾社會理論對社會大眾所作之批判，以致提出媒體產品由生產者與使用者共同創造之活躍閱聽人的說法（如 John Fiske, 1989 與 Ien Ang, 1991），閱聽人商品所類比的勞動過程，可取了許多。閱聽人活躍說指出了媒體產品是共創或互創，固然正確，「但」它忽略了這個創造是在資方手中的決策結構之內進行的，雖然不是全部，但資方控制了生產、分配與交換等決策過程的每個環節。

資本有如八爪章魚，雖然遭受挑戰而有不等面貌，但它必須積極建構其閱聽人，就如同它必須建構其勞工，資本在推動這些運轉時，固然設定了社會場域的條件，閱聽人與勞工在其間操作，但他們還是會決定如何運用其閱聽人及勞動的力量。對於閱聽人來說，這也就是他們是否遵照資方所想要的方式，注意或收看節目，他們是會以對立方式，或只是不同於主流的方式解釋節目，或是他們根本連看都不看。關於勞動過程的研究顯示，在生產點上，人的工作反應有許多不同方式，可能是完全順從，也可能是完全不工作，與一般勞動相同，閱聽人也會行使其力量，但又與一般勞動相同，閱聽人的力量的行使，雖然不是全部，但大抵是在資本利益所設定的框架內進行。我們若是延伸這個類比，就會發現，由於閱聽人在使用媒體內容時的反應，如同閱聽人與資方的衝突，這就推動了商業廣電的擴張、廣告影片的重新結構、新科技的使用、測量及監控閱聽人活動等過程的擴大、引進按片與按頻道付費的電視，與之相反，閱聽人就開始使用不符合資本主義法條規範的衛星接收器、解碼器、錄放影機，以及使用遙控器跳過廣告影片等等。我們在此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與方誌學 (ethnographic) 兩者的合作空間，相當大而且可望大有斬獲^⑥。政治經濟學對此領域的研究已經開始，也有了相當重要的成果 (Jhally, 1990; Meehan, 1984)，但它在這裡有點進退維谷，無法決定究竟閱聽人活動，是否不僅只是像在勞動，而且「就是」勞動。這個懸疑狀態造成的結果之一，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由於急切想要捍衛物

質主義及勞動價值論，也就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動了攻擊，這個反應固然可以理解，但傳統馬克思主義論者卻在不經意之下，全盤排斥了媒體領域的分析 (Lebowitz, 1986)。加力 (Jually, 1990) 則認定，這具有正面意義的意見交流，值得討論，比如，他重新思考等差地租的概念。不過，正反總加起來推敲，這場辯詰對於史麥塞原來那篇論文提出的主要題旨，應屬肯定——媒體問題構成了馬克思理論的盲點。即便就只是從媒體產業的成長規模及範圍，從傳統的出版到電子資訊業，莫不如此，我們就很難理解，何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仍然只將媒體的物質分析，擺放至邊緣。是以，這對傳播政治經濟學來說，仍然是最為重要的挑戰之一。

模控的商品：真正的商品化

米罕 (Meehan, 1984) 以另一個角度思考閱聽人商品的問題，她的分析焦點是閱聽人收視率的調查。既然「交換的不是訊息，也不是閱聽人，而是收視率」，她也就論稱 (p.223)，關於閱聽人多寡、組成及媒體使用類型等資料的報告，才是媒體系統的主要商品。米罕的研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許多分析面向，都很有價值，包括了物質論者筆下的產業史（由尼爾森公司 A.C. Nielsen 主導），以及收視率這類統計數字的社會建構問題，其交換價值與它在真實世界所代表的閱

- ⑤ 總有人會質疑，在收看像電視這樣的東西時，哪能有什麼抗爭？畢竟收看電視大多被拿來與休閒與娛樂相提並論，而作工卻是為了營生。不過，媒體工業確實投入了可觀的經費與技術開發監控系統，它們能夠精確測量誰在收看、看多久；媒體工業也投入可觀經費與技術，開發可以不受轉台影響的廣告，以及將廣告與節目同時播出。閱聽人購買接收盤、解碼器，以及精密的遙控器材，在在顯示雙方的較勁鬥爭，是在進行 (Larson, 1992)。

聽人特徵，很少有什麼關聯。就本書這裡所要做的分析而言，她的研究顯得特別具有價值，因為結合了其他領域的研究以後，它指向了商品化過程日趨「模控的」(cybernetic)性質。自有閱聽人商品的辯論以來，論者對媒體—廣告客戶—閱聽人的三角關係中，何者是能夠領受「真正的」商品聖杯，投注了較大心力，相形之下，論者對於「收視率才是商品」這個論點的興趣，遜色了許多。所有的注意力，聚集在閱聽人、閱聽人勞動、閱聽人注意力、閱聽人購買力、閱聽人時間，或者收視率才是商品，結果一來，論者對商品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元件，反而不怎麼搭理了。

151

商品化必然要運用手段，測量商品的生產，並且要運用監控技術來追蹤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的過程。測量的例子之一是，生產來賣給廣告客戶的廣告片長度及廣告時間的總量，要能精確。監控的實際例子更是包容廣泛，包括傳統的商業會計、行銷研究、資本成本評估、薪資與福利研究、顧客調查，以及晚近的創新手法，如資料庫的配對系統，它們記錄每一筆簽帳卡的使用，從中分析人口學及態度方面的資料。這些作法都是商品化過程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所生產的資訊是要用來生產商品的，也就是報紙或電視情境喜劇等商品，這些作法也都具有模控的性質，因為資訊生產過程的結果，又是另一個新商品的生產。就此來說，收視率不折不扣是模控的商品，因為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它們早一步已經被建構成爲一種商品。特定地說，這些收視率是電視節目商品化的重要元件，但收視率本身也是收視產業的核心商品。收視率調查公司是很重要，但並不是因爲收視率「是唯一的」媒體商品，而是因爲它們代表了媒體商品化過程的進階，也就是模控的商品之演化。它們是這類商品家族的一部分，其共同特徵是這類商品都起源於總體化的監控及監看程序，其間也都使用了精密的傳播及資訊科技^⑥。

若是這麼看，比起商家從消費者購買行爲直接自動蒐集的資料，閱聽人收視率重要多了，但並非其本質就更加重要，畢竟前者也是許

多商品的生產及行銷依據。兩者都是模控的商品，包括了第二輪的交換價值（取決於第一輪交換價值）。有家行銷這類模控商品的重要公司，其總裁雖然錯把第一輪交換價值當作使用價值，但他對模控商品的意義，卻深有體認（DeSimone, 1992）。模控商品造成了商品化過程：

152

從「內在於」產品的價值，移轉到了誰需要而誰又提供這個產品，以及這個產品有什麼用等知識的價值。你用信用卡購買雜誌，就只是一個簡單的交易？不是這麼簡單。就在你購買的時候，你是誰、你偏好什麼雜誌等「資訊」已經由電腦記錄了起來，這些資訊的價值與賣這本雜誌的利潤，不相上下。加工組裝這類資訊的方式有很多，可以賣給別人。更重要的，所有的內部過程均因你的決定而改變——從行銷到購買到財務設計，均受影響。如今，所有組織都在從事資訊買賣。

來自資訊工業中心的說法，都有誇張成分，我們固然必須減成採

⑥毫無疑問，季定思的著作是很有價值的，它呼籲我們注意制度性監控體系的發展。然而，他卻只將各種制度所進行的監視，放在「資訊及社會監督的控制」之脈絡，而使之與資本主義分離，則已經有了失誤。季定思將資本主義界定為，主要是在「競爭勞動與產品市場的脈絡下進行積累」，但他卻沒有認識到積累過程，大大刺激了監視體系的發展，而這些體系也正對資本積累的擴張，大有作用。季定思謹慎地談及了交互滲透的現象，但仍論稱它們是分離的部門，而就在季定思將「監控與民族國家的崛起，等同看待」時，積累與監控的界線更是壁壘分明了。民族國家的崛起當然建構了監控，但季定思將監控放在國家建構的過程觀察，他卻放過了一個事實，此即用來促進生產、分配與消費理性化的監控形式，歷來就是商品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也在商品化推動下，更見發展（以上關於季定思的觀點，尤其請參見Giddens, 1990: 55-63）。甘地（Gandy, 1993）已對企業財團及國家等不等測量及監控交易的形式，提出了徹底的分析。

信，但我們卻有了警覺，也就是必須超越「只從」媒體找尋商品的念頭。更加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強調商品化的過程，已經將一連串的實務作為，連結成螺旋狀的交換價值，擴張不已，這就是前引文的總裁所說，所有組織行號都進入了資訊買賣的軌道。正是在此總體商品化架構裡，我們才更能掌握新測量方式與監控科技的意義，它們在在使得媒體商品的生產，為之擴張，它們包括了按片付費的節目、「測人機器」(people meters)、房間掃描器(用來監看人們選擇的特定節目及收視時的注意情況)，以及所謂的智慧卡(用來讓收看電視的人購買產品)等等。總合地運用，這些就生產了新的產品，其形式是各種收視及購物的報告，包括了許多人口學的細部特徵(取自範圍廣泛的資料庫)。但這些新的產品並非彼此獨立，它們並非彼此不相連屬。它們是商品化過程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將它們放到了結構井然的層級體系當中。

我們可以說，模控的商品是「密集」商品化的主要過程之一部分，因為它們是特定部門在精煉其生產過程之後的直接產物。有線電視、付費頻道及按片付費電視，都密集化了節目的套裝，相比於早先的廣播形式，它們日愈能夠針對特定顧客而來，先前的廣播畢竟大抵訴求大量的觀眾，設定在特殊觀眾的可能性很低。它們將愈來愈特定的節目類型，聯繫於愈來愈清楚界定的觀眾，因此也就密集化了商品化的過程。比如，囊括美國消費雜誌所有廣告百分之二十的時代·華納公司的雜誌部門，創造了「目標設定」(Target Select)，這個系統將所有的廣告都設計成符合特定顧客群或個別化的訴求，它利用電腦控制的分裝及噴墨印刷方式，製作符合個別訂戶口味的刊物(Wasko, 1994)。蓮花行銷公司(Lotus Marketplace)使用取自一家重要信用卡機構的資訊，已經準備兜售、行銷所有美國八千萬戶的各色資訊。花旗銀行已經宣布計畫，打算將它擁有的二千二百萬信用卡客戶的資料，賣給各家行銷公司。即便是傳統取向的報紙，也已開始學習銷售其顧客他的價值。報業觀察家瓊斯(Alex S. Jones, 1991)

說，「美國人才正開始恍然大悟，每當他們打電話到報社體育專線表示意見，或者寄信換取免費維修汽車的紙券時，他們很有可能也把自己放入了資料庫，也許高爾夫俱樂部或服飾公司將會拿來作為廣告之用」。擁有最精密系統之一的《亞特蘭大期刊與構成》(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廣告部門副總裁說，「這就是報業未來的一部分」。無論是為了記帳或是為了閱聽人調查，這些監視系統都是在利用觀眾各種選擇所組合成的資訊，然後再生產出可供行銷的產品，它們在在密集化了商品化過程。

有些電話公司的計價方式也做了改變，以前是所有通話均列入相同類目計價，每月給付定額而可以無限制使用，現在則是採取特定類目或特定時段的計價，後者稱作按地測量而提供服務，類似地，這個轉變也等於是密集化了商品化過程，方法是精煉訊息商品的構成及套裝組合，以及使用科技，一方面提供傳播通路，另一方面則在有人使用這個通路時，同時蒐集、編纂使用者的資訊以供市場行銷之用。同理，我們也可以說信用卡與直接扣抵 (debit) 卡的一般給付體系，同樣也密集化了交換過程，並創造了、行銷了使用者的資訊 (Gandy, 1993)。

模控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

我們也觀察到了擴張的過程，商品化延伸到了以前還很少或還沒被觸及的領域。這些包括了為數甚夥的資訊及文化領域，對此已有很好的著作，有來自傳播研究者 (Garnham, 1990; Schiller, 1989)，有來自地理學者 (Harvey, 1989)，有來自都市研究者 (Davis, 1990)，也有來自文化研究者 (Davis, 1986)。這類著作描述了商品化過程，以哪些方式，延伸進入了許多制度領域，如公共教育、政府資訊、媒體、文化與電信，這些領域能夠維持相對較低商業化程度，原因當然是各方勢力與動機交叉抗爭的結果，但它們大抵還能維持普遍原則，

任何人無論其市場購買力，每個人都能使用。延伸的商品化以許多形式顯現，雖然我們無法在這裡逐一詳細討論。經濟成長的衰退及政治權力向右傾斜，造成了公共資訊機構的財源頓減，如圖書館、公立學校等都遭遇到這個困境，這就造成了以前人們想都想不到的結果，如美國很多教室都廣泛引進了強制性的商業電視。再者，我們也都目睹了公共資訊、郵政、廣電與電信系統的私有化與商品化浪潮，以及新古典經濟邏輯的「成本」計價或形同為市場利益說項的現象。延伸的商品化也包括了共同空間的轉變，從公園到私人所有的購物中心莫不如此，博物館、體育運動及節慶活動也都愈來愈依賴商業贊助。越來越多的人，穿著某些產品的廣告服飾及裝飾，使得身體及認同也被商業化了。這些發展在在顯示，以前根據不同社會邏輯、根據普遍原則、平等、社會參與及公民身分而組織的空間及實務作為，已經都被延伸的商品化入侵了，以前種種，固然缺失歷歷可數，但它們卻能擴大社會行動的基礎，如今這些都已化約為市場邏輯，它把權利 (right) 等同於市場能力。

政治經濟學取向的一個重要貢獻，在於它對國家機器及財團強權延伸商品化的過程，提供了許多例證。這個取向應該更為扎實地探討，但至今尚有不足的部分，在於我們還沒有認清商品化在延伸的時候，這個過程有些什麼連結。以政治力及經濟力作為解釋商品化得以成功的原因，很有價值，也能增進我們的瞭解。商品化席捲了決大部分的資源、時間與空間，使得另類方案難以現身，因此也就使得商品化彷彿是自然天成的秩序，是常識、是理所當然，彷彿社會生活的實體就是如此，商品化變成宛如非關權力。這個論點很重要，它檢討了「霸權」的運作過程，但這個論證卻跳過了重要的一步，使得我們未能靠近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邊界。制度權力總是提振某種邏輯而消除其他可能性，建構霸權必須以此權力作為核心。但是，制度權力，以及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之間多重關係的權力運作，二者如何相連，又是另一個問題。因為，交換價值的擴張，不僅只是破壞了使

用或非商品價值，而且還以這些被它破壞的價值，提高自己的吸引力，並在此過程中，轉換使用價值為交換價值。

汲取史內特 (Sennett, 1976) 的著作，克萊芙 (Crawford, 1992) 就以購物中心為例，描寫了這個過程的運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展示了運輸交通、土地使用、投資及其他結構政策在制度權力的衝擊下，都做了改變，人們的購物類型於是跟著重新調整，若就更為一般層次的情況來說，則人們在購物中心的社會互動方式，也產生了變化。克萊芙對這類文獻點到為止，她集中在展示商品化過程在購物中心「裡面」的運作。她使用的例子是，商店的展示櫥窗布置了一間摩洛哥式的內房，裡面放著一具普通的盆子。她論稱，這些擺設使得盆子失去了固定意涵，轉而披上了某種出人意表的、舶來風味的，因此也就撩撥遐思的色彩。誠如她所說，

這個比附聯想的邏輯，使得非商品化的價值，能夠提昇商品價值，但它同時也使這個過程逆轉運行——以前非商品化的東西，如今成為市場機能的一部分。商品與需要之間的關係，原本就是不斷地交換而無終止，一旦二者質性的交換進入了這個關係，比附聯想所能發揮的共鳴作用，也就更加無有止境。(Crawford, 1992: 15)

克萊芙說共鳴會無有止境，其實是誇張了，她的這個說法，必然會使得根本就是一種模控的過程，變成了脫韁野馬，其反饋方向變成無從理解。但許多的過程，包括我們想起自身與盆子的現世經驗，都可以中斷這個共鳴。還有，克萊芙將這個過程描寫成一種「零售的魔術」，又實在是太過觀念論的說法，她所說的過程，應該是物質使用及比附聯想的形象相互構成的。雖然有這些疑問，但筆者認為，克萊芙的描寫還是賦予商品化的過程，更多的細膩及肌理。政治經濟學家對於這個過程的總體結構，則已經有了很好的描述，克萊芙向我們展示，深化這個過程的分析，可以如何著手。

若是說克萊芙提示了很管用的例子，讓政治經濟學及文化研究的邊界能夠擴充，則另兩個偏向就沒有那麼具有建設性了。由於這兩點於商品化的過程有直接關係，因此筆者在這裡加以討論，而不是留到第七章，雖然第七章還會就來自政治經濟學邊界的挑戰，總體論述。第一個不管用的偏向，流於將商品化誇張為普遍性質的社會互惠來往。社會互惠是一種概括的社會性，人們因此而形成交換關係。主張這派見解的人 (Davis, 1992; Schudson, 1984) 通常引用人類學文獻，舉證禮物交換儀式的文獻，包括了北太平洋沿岸印地安人在冬節時分的互換禮物，因此這種見解也就認為，市場的建構及交換價值的發展，深植於社會團體形成的總體過程中。根據這樣的觀點，商品化也就根本不是理解社會場域的一個重要入口點，社會必然要有交換，而商品化只是許多表達形式之一。這個觀點促使我們注意層層的儀式都與社會過程須臾相連，並且這些儀式對社會過程均有構成之功，就此來說，它有其價值 (Davis, 1992)。在政治經濟學界，韋伯倫 (Veblen, 1934) 也運用了這個取向，這位專研休閒與工商階級的方誌學者，實在有其人類學的洞見。但韋伯倫知道一般性質的儀式交換，以及它特殊地展現於商品化的過程，兩者並不相同，他也未受誘惑而將兩者膨脹等同。他知道前者是觀念論者的陷阱，觀念論者所認定的普遍原則實在至為抽象，據其看法，催生資本主義的社會轉換的動態過程，重要性反而不如部落、封建與資本主義社會都有的一般屬性。對於以下這個強有力的反諷，韋伯倫必然心有戚戚：時下的學術界企圖使交換價值的產生，失去特定的歷史意義，也就是將轉向資本主義的具體意義，能減就減，而在學界這麼論稱的人，竟然是舉證部落交換儀式來支持他們的論點，殊不知資本主義已經將這些部落社會幾乎消滅了一乾二淨。政治經濟學知道商品化的過程涉及了儀式行爲，社會連帶可能因此儀式而加強或鬆弛。事實上，政治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一個主要批評，就是後者偏向泯除了風俗習慣及道德在經濟生活所能發生的力量。然而，政治經濟學也不想掉進觀念論者的陷阱，因

勞動的商品化

勞動商品化的過程，存在兩股相關的現象與傳播研究有關。第一，傳播系統與科技被用來擴張所有勞動過程的商品化，包括擴張了傳播產業的勞動過程，原因是雇主有了這些傳播科技以後，可以更加裕如而彈性地控制勞方。第二，政治經濟學已經描述了一個雙重過程，勞動在生產財貨及勞務商品的過程中被商品化了。

我們在檢視財貨的商品化時，忽略了在生產點上所存在的勞動商品及其發生的過程。布雷夫曼 (Braverman, 1974) 的著作直接處理資本主義之下，勞動過程的轉變，他催生了一股探究的動力，終結了生產點上勞動研究的邊緣地位^⑨。布雷夫曼指出，勞動是由「構思」這個單位（預視、想像與設計的能力）及「執行」這個單位（執行概念的能力）所構成^⑩。在勞動商品化的過程，資本將構思與執行「拆了開來」，資本將技術與執行職能的原始能力分了開來，資方將構思能力、權力「集中」在經營管理階級身上，這個階級可能是資方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資方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資方再「重新構成」勞動過程，使之相應於生產點上技術與力量的分布狀態。若是發揮到極端，我們也就發現，所謂的科學經營管理實務也應用到了勞動過程，其先驅是泰勒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⑪。布雷夫曼詳細舉證了

⑨ 布雷夫曼的著作，當年出版的時機，正是時候，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濟景氣（也就是福特主義時代的繁榮高峰），到了當時開始出現經濟衰退。當時的工廠與辦公室應用整合電腦傳播體系的速度，亦剛好加快了。關於布雷夫曼著作以及它與當代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對照，Hillard(1991) 提出了評估。

⑩ 構思與執行的區別，呼應了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說，人與蜜蜂的差異，就在人統合了二者。

大規模產業興起之後，勞動轉變的過程，但他特別為人稱道的部分，在於他寫出了第一本持續有秩的分析，檢視這個過程延伸進入了服務及資訊部門的情況。布雷夫曼的著作激生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及理論辯難，後者的論辯焦點，主要是我們必須對此過程所發生的抗爭性質，多作檢述，也必須針對工會運動及勞工活躍分子對此過程的反應，多作研究 (Burawoy, 1979; Edwards, 1979)。大多數這類著作構成了孔恩稱之為「規範科學」的研究，也就是在布雷夫曼的原初論述所已蘊涵的問題意識，再作擴充及闡述。這些研究包括了勾畫生產點抗爭的圖譜、抗爭的歷史，以及不同產業、職業、階級、性別及種族的人，如何體驗了勞動過程的轉變。最近的研究，包括了學術論述及媒體對相關產業的報告，在其文字中，都縮合了一個旨趣，也就是探討傳播工具在技術效率穩定改進的前提下，以何等方式提高了總體勞動勞動的商品化 (Ansberry, 1993; Berberoglu, 1993; Ehrbar, 1993; Zachary and Ortega, 1993)。

傳播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取向）對媒體工業勞動過程變化的分析，比應有的比率，來得要少，原因有許多個。雖然政治經濟學傳統由來已久，經濟學家及政策制定者對文化產業亦大致有其關注，研究卻仍偏向將其研究對象擺放在消費領域，這也就造成傳播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閱聽人與文本之關係的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對組織機構對於媒體生產的控制，以及這些機構對閱聽人的影響層次（包括閱聽人勞動的概念），投注了可觀的注意力。但我們應該可以說，這些注意力，只是在分析閱聽人的勞動，而不是傳統意義之下的媒體工業之勞動過程。另一個原因是，媒體工業的勞動過程，即便是被轉變

- ①到了吉爾布芮蘇 (Lilian Gilbreth) 手中（她的丈夫是泰勒的追隨者，開發了測量工作時間的單位，「什力」therblig），泰勒化的過程應用到了家庭，家事經營於是也就「科學化」了。

了，它仍然帶有強烈的學徒制、專業及藝文色彩。

媒體的生產具有個人的創造面向，這也使得媒體部門與許多同樣具有工業生產特徵的職業部門，產生了差異，因此，若是有人偏向強調這個差異，我們可以理解。作家撰寫書籍，導演能夠率性地按照自己的意思拍攝電影，明星造就了電影或電視節目等等。強調這些現象是有相當顯要的理由，主要是因為媒體工業需索的構思層次，相對較高。印務工人與他們的工會，歷來在工作場所占據了較有地位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在這裡。但強調個人的創造力，卻只會混淆了一個趨勢，也就是媒體生產過程無論再怎麼複雜，無論其內各部門再怎麼不均勻發展，它都愈來愈像一般經濟部門的勞動過程了。

就此而言，組織傳播及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某些頗佳的洞視，讓我們瞭解媒體產業的科層結構及生產過程。塔克曼 (Tuchman, 1978)、費雪曼 (Fishman, 1980) 與甘斯 (Gans, 1979) 等人就檢視了科層控制體系，如何經營管理複雜的（主要是）新聞生產過程。他們的研究指明了特定路線新聞的例行採寫工作，其實相當平易單純，他們也勾勒了新聞工業的詳細分工，而原本可能是開放性生產過程的部分，也在定期特寫或專欄的設計下，建立了一定的韻律。這整個研究文獻顯示，新聞機構使用大量的組織計畫與預先處理，將新聞及資訊的蒐集、組合及分配，納入了例行的作業基礎。如果政治經濟學有意探討勞動過程的問題，這類研究就相當重要，因為它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細節的描述，我們從中得知社會—技術層面的過程（也就是構成了部分的生產過程）。然而，這類研究雖然也述及了政治的與經濟的因素對新聞編採過程的影響，但只是淺嘗即止，這類研究並未將這些因素納入理論中檢討，而只是將它們放到科層及組織架構之中，求取說明，這樣一來，它強調的是，新聞之所以是我們所看到的面貌，原因出在某種高縹的行政上的需要及職能。這個取向放過權力及利潤，讓它們擦身而過，然而，它已集中展示了科層體系對新聞編採的結構壓力，它汲取了原生自韋伯及米契爾 (Robert Michaels) 的著作及相

關文獻，顯示這些結構壓力對文化工業生產所發揮的理性化作用，如同繁複的科層組織對所有經濟部門的影響，都是相同的。

若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些組織學的文獻極盡其能事，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細節資料，但卻是一種觀念論的說法，它以一種行政本質主義，代替了它稱之為市場的經濟本質主義。誠如韋伯自己說的，他認為「行政工具」的影響力，還要大過生產工具。傳播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將組織科層視為主要問題，因為它歷來都把心力，集中在制度層次，分析企業財團、國家機器及二者的關聯。但這些組織學的文獻對於政治經濟學，是構成了挑戰，政治經濟學的回應，應該是加緊確立並倡議一種立場，檢視生產過程，但以政治力及經濟力作為最主要的檢視對象，尤其是必須分析勞動的商品化問題。若能如此，則政治經濟學取向在保有物質論者的長處之餘，也就能夠在制度分析及文本分析之間，構成重要的聯繫。（譯按：直到晚近，組織論者的）本質主義進占了政治經濟學（譯按：未能開發的）陣地，但我們無須聲稱要用另一種本質主義（譯按：經濟本質主義）再取回陣地，我們所要致力者，應該是將媒體生產過程的勞動商品化，予以理論化。

政治經濟學文獻是已經朝著這個方向走了幾步，特別是透過對新傳播及資訊科技之引進的檢視。這方面的研究檢視了工作的轉變，包括就業類型及媒體及電信工業的勞動性質之變化。哈特 (Hardt, 1990) 對於新聞史的研究欠缺勞工視野，大表不滿，他整合了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取向及新聞室的文化史觀，分析重點則是新科技引進以後，如何被用來完成布雷夫曼所形容的過程。這方面的研究，也見諸傳播研究以外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它研究了新聞室的勞動過程 (Zimbalist, 1979) ¹⁰。更為晚近的研究特別探討了新聞室勞動商品化的現象，它檢視新科技引進以後的失業問題，檢視了新聞室引進印電子組版或全頁組版以後，編輯工作的重新結構，而電子新聞採集器 (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ENG) 引進後，電視記者工作的變化，雖然較少，亦有探討 (Russial, 1989)。引進新傳播及資訊科技以後，構思階段

的活動，權力關係也改變了，就此來說，專業新聞工作者對其傳播工具尚有部分控制權，另有些則控制科技系統的權力，已經是經理階層所有，這部分的問題，也有人運用了勞動過程的觀點，特地加以探討。類似的研究也開始探討勞動過程的轉變問題，如電影產業 (Nielson, 1990)、廣電產業 (Wasko, 1983)、電信產業 (Mosco and Zureik, 1987)，以及資訊產業 (Kraft and Dubnoff, 1986)。

米格 (Miège, 1989) 的分析與此議題亦有關聯，他指出，媒體產品的類型、企業控制結構，以及勞動過程的性質，會有相關。他稱之為甲類型的產品，主要就是電視接收器材及錄放影機等硬體，特徵就是單純的勞動過程，很少涉及任何創造力的或藝文的勞動者之介入。米格認為，這些媒體產品勢必走向產業集中，而且其勞動過程分作許多細項，包括透過國際分工，利用絕大部分沒有工會組織的地區之低薪勞工，這些勞工同時也受制於專制政權。對立於這個類型，藝文及他稱之為「影視作品」的乙類型產品則很難複製，相對來說也比較不需要資本的投入。這個部門由小型企業支配，大致由生產者或勞方控制。米格又指出另有一個丙類型，這個最後類型的產品，其生產過程充滿了鬥爭與衝突，因為它雖然容易複製，但也必須投入某種程度的藝文技藝。這個部門的資本壟斷控制，是在增加，但距離完全控制還很遙遠，這個部門也混合了勞方之內、資本之內，以及勞資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米格的分析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更為詳細地解釋了媒體工業的

—————

- ⑫ 哈特 (Hardt, 1990: 355) 把當前關於電子新聞生產科技使用所引起的衝突，放在一百年來的鬥爭過程，哈特指出，「新聞室如同工廠，一直都是科技更新的實驗場，也是經濟與社會利益的戰場」，他又以政治經濟學的取向，解釋勞方飽受忽略的原因：由於占了上風的歷史情境，尊厚主流報業的觀點，新聞史也就忽略了勞工階級的議題，也忽略了勞動實務的問題（反映了出版人敵視勞方的態度）。

勞動商品化，這既是一般的政治經濟過程，但這個過程也取決於產品、工業結構與技術 / 非技術勞動力需求三者之間的關係。不過，他的分析仍然受到三個類型之概念架構的侷限，三個類型中，丙類型的變異範圍最大。但我們亦需注意，由於工業集中及勞動過程的理性化，高度標準化的甲類型產品，也慢慢變成了三類產品的共同特徵。還有，米格的概念架構中，不同產品類型的結構需求，占有決定勞動過程的力量，它排除了許多影響勞動過程的重要變項，如工會化程度與工會是否勇於捍衛本身權益的程度，以及國家規範或國家擁有、控制媒體部門的程度。雖然有這些缺點，我們必須說，米格的概念架構已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們對於媒體工業的勞動過程，開始有了系統的分析。

161 關於國際分工及國際勞工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有了起步。前者的出現，既是對於理性化生產的壓力之回應，也是因為科技提供（特別是電腦與電信科技）了機會，克服了空間與時間對資本移動的約制。下一章將再論述全球化的問題，但這裡倒還是可以談一下全球化對勞工的後果。全球勞動市場更見發展是後果之一：資本現在可以利用薪資、技術與其他重要因素的等差，以國際為舞臺，取得對它最有利的組合。早期這方面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硬體及資料輸入等工作，移轉至第三世界國家（前者是東南亞，後者是加勒比海）的過程，原因是這些地方的工資較低，也都有專制政權（Mosco, 1989b; Sussman, 1984）。最近的研究則擴大了範圍，指出資本流向相對低薪，但需要技術勞動的工作，如軟體開發等（Vijayan, 1996），資本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流動，主要的一個例子是美國電影及影帶製作業在加拿大的投資，持續成長¹³。

—————

¹³ 接受投資國家的政府，也採取了政策來迎合這些發展。不過，以加拿大的例子來看，加國政府的政策似乎對於本地生產的成長，沒有明顯的正面影響（Salutin, 1993）。

資本國際分工的增長，激發了國際勞工主義的興起。更特殊的是，這涉及了傳播工具（包括新科技）的使用，以此形成勞工階級與工會跨越國界的密切聯繫（Waterman, 1990）。但我們也再次看到，如同傳播領域的勞動商品化研究，落後於其他領域的勞動商品化研究，傳播國際勞工主義的研究也只是剛剛開始，而其他領域中，政治經濟學將勞工國際主義納入分析核心，已有多時。

私人與公共生活過程中 不同於商品化過程的部分

批評政治經濟學的人，包括那些抗拒在傳播研究中引進這個取向的人，持續地提出傳播經濟學有所謂的本質主義之偏向。他們的論點以許多方式出現，但若就傳播研究來說，他們認為有人主張將所有的傳播與文化實務化減為一個根本的政治經濟實體，涵蓋了所有的商品化過程，他們指出，這種觀點必須拒斥。第二章與第三章已經提出證據，論述這個批評已嫌過度。無論是一般層次的政治經濟學，或是它在傳播領域的運用，都已包括了豐富的、多元的、廣泛的研究文獻，這些文獻一點都沒有簡化分類或幼稚指控等傾向。不過，這些批評也有它的價值，對於傳播研究來說，其中之一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開始努力地反思它的某些基本知識論及本體論原則。

這本書就是這個自我反思過程的部分工作，它採取了實存論者的、兼容並蓄的、非本質主義的，以及批判的知識論與本體論立場，企圖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本書強調的是社會過程及社會變遷。後者的具體作法就是選定入口，探究社會場域，同時也構成了另類與對立的社會過程（譯按：依照作者所依循的威廉士之概念，另類指不同於主流，但未必挑戰之；對立則不僅不同，而且取而代之的企圖，躍然字面）。因此，商品化指的不是一種本質觀點，而是一個入口，尋此可以檢視傳播現象中，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關係。商品化轉變了媒

體內容，但並沒有能夠將內容化減為單一的再現，我們並無法從商品化的過程，直接解釋媒體內容。雖然體認了所有過程的多重決定及相互構成，本章選定以商品化作為分析起點，也就構築了一個理論參照架構。接著，本章就要再進而指證其他過程的存在，以及相伴這些過程的結構，總合起來，它們構成了另類與對立的傳播實務。

在這方面，一個很有價值的理論議題是國家角色的性質，奧非(Offe, 1984)稱之為「行政的再商品化」(administrative recommodification)過程。根據他的說法，這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最為晚近的特徵。奧非認為，緊隨經濟徹底放任之後，是政治經濟生活的「去商品化」或「社會化」，這是因為徹底依賴市場機能導致了失敗，不穩定與衝突也相率產生，國家於是有了此回應。去商品化是指國家制定了社會政策與綱領，保障社會行動者（勞資雙方）的經濟存在，包括那些大抵無法參與商品化或沒有能力依此生活的人，均在保障之列。不過，為了阻止這些人免於被這個過程「放棄」，國家必須移轉給付及移轉其他收入，但這個作法無法持久。再者，奧非又指出(Offe, 1984: 35-64)，政治手段根本就不可能繼續維持這個政策，因為想要用政治途徑規範私人產權的經濟體，卻又想避免以政治手段統攝經濟體，根本作不到。奧非認為，這就引動了資本的回應，也就是「再商品化」：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策略，愈來愈專注於或完全集中於解決商品形式的問題，手段就是創造政治條件，使法律及經濟主體能夠如同商品那般運行。(Offe, 1984: 124)

這個目標所採取的整套特定綱領，就是要提高勞動的市場價值，整編並集中跨國資本，以及聽任無法接受市場測試的人，被排除在外。然而，奧非認為，這些手段只發生了局部作用，因為國家陷入了一個局面，必須使用非市場手段來提振市場機能，並且，無論再怎麼

間接，都因為有這些人被排除在外，而必須支付代價，如控制犯罪與監獄擴建。再者，如同批判科層化趨勢的人所說（最早可追溯至韋伯），這些原來只是手段的非市場機能，最後成爲了目的本身，如此也就使得再商品化的過程，不可能竟功。於是政府不得不另作回應了，這也就是一九九〇年代特別明顯的現象，國家開始將市場原則用在自己身上，期待自己更爲像是一家市場企業，以此提振市場原則。這就造成了奧非再三論及的主題：雖然國家可以搞成「像是」一家市場企業，但國家是否能夠如此「行動」，卻有些根本上的限制，主要是因爲國家無法從事直接積累的工作。

奧非的論點另有其他人呼應（參見 O'Connor, 1987），他們跨出了一步，糾正了本質論，糾正了簡單的、命定論過程的說法。不過，奧非等人採取的是負面定義，他們所說的只是非商品化，或者是財政限制、科層化及政治化等約制，他們走得還不夠遠，沒有能夠更爲清楚地正面討論商品化以外的其他可能¹⁴。

私人生活中的社會過程

本章所餘篇幅就是要在這方面補足，當代的社會思潮及傳播研究，均有人指出了商品化的出路，雖然他們的理由及理論立場，各有不同。他們的看法是，商品化儘管強大有力而普遍存在，但商品化並不是單一整體。他們提出的出路，雖有例外，但大致都與使用價值有關，或說特別與我們稱之爲私人及公共生活者有關。私人生活只的是

¹⁴ 奧非 (Offe, 1984) 也察覺了這個限制，他的說法頗有啟發性。奧非說，我們必須擴充危機這個概念的內涵，不再只是從經濟角度來理解危機的存在，而是應該將危機納入三個社會組織原則（家庭的規範原則、商業的算計原則，以及國家的強制原則）的關係中，予以考量。

面對面的互動，哈伯瑪斯 (Habermas, 1989) 則稱之為生活—世界的領域，若是使用現象社會學的術語，則這指的是交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以私人為主的生活過程，特徵是感性 (affective)，涉及了認同形成、友誼及親情。在這塊私人空間，人們在意的是人與物 (物質的與形象的) 之所以有價值，是它們本身就有價值，不是它們可以產生市場價值。來自於公共生活的價值則與市民過程有關，人們在此交換觀念，管理自己，支持、抵抗、反對與創造，企圖創造一些東西，使之有別於哈伯瑪斯 (Habermas, 1989) 稱之為「體系」世界中的權錢組織。私人領域中，有別於商品化過程者之一是友誼的構成，在公共領域中，有別於商品化過程者之一是公民權、公民身分 (citizenship) 的構成。

就在我們處理商品化及公私領域社會過程的關係時，我們也必須接受挑戰，克服機械化思考的傾向。第一，有人可能傾向於將公私領域截然二分。這個傾向的主要困境之一，在於「私人」這個詞頗為惱人，它既可以指稱人類經驗最為私密的部分，卻又指稱跨公司體系的市場行爲¹⁵。這個詞既然如此惱人，有如此不可承受之重，那它也就很容易就會崩盤。更糟糕的是，如此一來，這個詞嚴重地限制了我們，使我們無法充分掌握商品化的更大內涵。若是將私人這個概念建構為某種非關國家活動的東西，比如季定思就說 (Giddens, 1991:

164

¹⁵ 這類討論所面對的概念困境之一，實乃私人領域的意義，已經混淆不清。其中一種看法認為，在國家領域以外的所有活動，都是私人活動。根據這個看法 (關於市民社會的種種討論，常加以引用)，(在私人生活中的)「人際生活」及(在私人部門的)「事業」(business) 都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我則另有不同的看法，我在這裡處理的主題是人際私人生活，它完全不同於私人部門，因為私人部門構成了不同領域的生活，依賴著市場機能與商品化。我們若能不使用「私人部門」這個詞，或許，代之以「商業的」、「市場」或「閱聽人部門」將會更為合適些。

153) , 「私人就是國家滲透的『另一面向』」, 那麼, 我們也就無法參透商品化與監視之間的緊密關係, 我們也就無法參透私領域是市場滲透的另一面向。退一步說, 即使我們擴大架構, 使之包括市場, 我們還是很容易就會將這三個領域的活動, 當作截然分立, 彼此各有界限清明的運作範圍: 私人生活是在家庭、公共生活是在國家, 商品化則是在市場。誠如孫內特 (Sennett, 1976) 所展示, 這個觀點歷來都有漏洞, 它並不真正能夠反映社會生活, 到了現在, 情況更是如此, 如今我們已經無法清楚掌握構成公共、私人與市場的界限, 如何劃定, 它們已經如此模糊, 形同消除了領域及客體區分的價值。於是, 我們不免日漸懷疑, 將他們當作「東西、物」(things) 來理解, 認為他們具有零合關係, 一方之多, 則為他方之少, 是否尚有價值。反之, 若是採用我自己比較偏好的本體論策略, 那麼更可取的作法, 是把他們當成是相互構成的社會過程。這些過程所形成的關係, 會根據特定歷史情境而發生變化。我們再次要注意, 機械式想法會造成我們的刻板區分, 比如, 友誼一定在私人生活構成, 而公民權一定在公共生活中構成。還有, 我們也可能將它們視為直接與商品化敵對, 將它們視為完全奔向不同方向的力量。但以這個方式思考過程也應該避免, 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 遠遠更為複雜與廣泛。這些不等過程的衆多關係當中, 完全的敵對只是許多可能組合關係之一。

傳播研究的結構反映了社會科學的分工, 使得我們尤其難以構思私人過程、商品化, 以及公共生活之間的關係, 因為傳播研究偏向區分不等層次的社會複雜性, 將自己劃分為人際傳播、組織及制度等等面向。雖然有些例外的情況, 但人際傳播就如同微觀社會學, 通常只檢視感性與親密性等現象, 而每當我們離開人際層次的分析, 我們也就逐漸不再探觸感性與親密性的問題。等到我們到達了政治經濟學, 也就是從較高層次的社會複雜性來定位傳播學科時, 微觀或人際層次的關懷, 幾乎不見了。對於最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使命來說, 這個情況深具意義, 因為它侷限了理論上的理解, 也侷限了社會實踐。若是未

能直接處理人際層面的現象，政治經濟學也就對親身經驗、感性的領域，無法置語。人們在兩個層次的體驗，經常存在巨大落差，一方面他們察覺到了運作在制度層次的力量（這部分是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核心），另一方面他們的日常經驗，由一連串在小團體之間的遭遇（由文字及影像中介，也由他們自己中介）構成，若是政治經濟學對後者不加研究，則對人們在體驗這兩方面的落差後之行動，無法置喙。

許多年來，對於制度的與親身的中介，學者頗多關注，並已在理論層面有所反省，而社會科學論述認同（包括政治政治與自我認同）的著作，年來頗見增加，我們由此體察，當前有一波一波的努力，奔赴開拓新陣地的前景（Giddens, 1991; Hall, 1989b; Meyrowitz, 1985; Sichterman, 1986; Turkel, 1984）。造成這個情景的原因有多個，特別包括了一股霍爾所觀察到的趨勢（Hall, 1989b: 12），「以前讓我們得有穩定認同的社會大集體——階級、種族、性別與民族等穩定的大集體——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因為社會及政治的發展而遭到嚴重侵蝕」。社會思想當中，存在很明顯的現象，它在父權意識下將「個人的」與「政治的」領域，分得清清楚楚，但女性主義崛起以後，特別是來自於政治及知識上的驅力，破除這個區分的動力已經增加不知凡幾，它們促成這些認同議題持續得到注意，在重構這些議題的可能性與過程，這些力量也扮演了主導角色。

關於這類文獻提出的議題，我們大可再作辯論。比如，一方面我們可以理解霍爾，也贊成他要我們注意主體認同已經不再穩定的呼籲，但另一方面，情況卻也還是如同政治經濟學所展示者，「資本主義一直鬆動認同」，並且，教育、收入、權力、一般的生活機會、階級、種族，以及性別的重要性，比起以前都還要來得顯著。霍爾的批評，讓我們想起費洛斯（Pêcheux）的警語，也就是我們應該避免耽溺、沈迷在主體，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再分析私人生活，也不是說我們在探討私人生活時，可以不援引商品性質的一些論述。季定思最近的著作，分析了他稱之為個人化及商品化經驗的關係，特別對此

有些啓發作用 (Giddens, 1991: 196-201)。然而，季定思察覺到了自己分析的缺失：「我並沒有細膩地解析資本主義生產對現代社會生活造成的衝擊」。季定思的這個缺失不論，他倒是清晰指陳了商品化的力量，延伸到了個人生活。季定思在這裡明白地取用了包曼 (Bauman, 1989) 的著作，而我們則想起了傳播學者許樂及史麥塞。季定思對商品化過程的簡短析論，讓我們想到了這個過程「持續塑造日常生活情境」的主要途徑。它延伸到了大眾媒體，包括提倡自我療法的媒體產品，簡直就成了小型工業，相關的書籍、錄影帶等等，原意是要對抗商品化，「但它們卻又以早就套裝成型的說法，一種如何生活得『更好』的手冊等等形式，進行行銷，這樣一來，它們也就掉進了它們原本反對的過程，它們的反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Giddens, 1991: 198-199)。不過，季定思也提及了從私人生活汲取抵抗的可能空間，包括根植於某種道德及美學意識的自我認同，及根植於社會認同的創造過程，儘管這些意識也許不能持久，也許會有衝突而難以連結接合（相對於中介文字及影像所顯現的自然而又肯定的狀態，更是顯得如此）。

但政治經濟學更強調私人經驗與商品化經驗的分別，於此，政治經濟學與季定思分道揚鑣。在論述認同（「自我四大考驗」的最後一個）的一本書之尾聲，季定思把這個分別打入冷宮，立論有力，但卻已將論點邊緣化。季定思這麼做，殆可理解，因為他一直企圖創造一種自我及認同的語言，論稱自我就能完整地參與知識「以及」實存的生活：解釋私人生活的情境，並「提供道德資源，使完整而圓滿的生活，得有成長的基礎」（1991: 9）。我們是需要這樣的語言，但這個語言對政治經濟學家來說，卻又構成另一個問題。拉許 (Christopher Lasch) 與貝爾的保守色彩的論點，季定思重複之，差別只在他的自由主義的版本。在重重社會及制度壓力下，自我飽受鞭笞，自我並沒有資源足以成功地反攻。保守派的主張是要我們從傳統中找尋力量，強化自我，自由主義者則是要賦予自我的現代語言某種正當性，

然後用此語言創造更為開放性的道德及美學生活——就其性質來說，這又是哈伯瑪斯所說的，有著更為溝通、傳播的屬性。若是套用歐卡那 (O'Connor, 1987: 175) 的尖銳批評，則政治經濟學家會說，這些理論根本就是「意識形態掛帥」：

它們既是向後望，又是將一切看成自然天成。它們忽略的問題是，「在薪資與商品形式成為普遍現象的時代，特殊的資本主義人格危機是什麼？」（本書筆者的強調）

這並不是季定思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因為他選擇將私人生活置放在他稱之為「晚期現代時代」之中，而不是放在資本主義考察。雖然有此缺陷，季定思所提供的概念架構，我們倒是可以借用來思索私人生活的問題，而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思考架構中，並沒有這個架構¹⁶。

167 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目標之一，正是要批判地運用這些工具，好好思考資本主義之中，私人生活與商品化之特別體驗的關係，以及私人生活與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關係。若能如此，政治經濟學所說的就是一種抗爭領域，私人生活中的道德、性本能及美學過程在此領域中運作，另外，危機會再三出現的另一個抗爭領域則有商品化的運作，於是，兩股運作力量相遇了——這樣一來，正就是這個私人混亂的商品化，在私人生活中，更加添了另一個危機。再者，我們不僅是把危機的圖譜畫了出來，我們還要釐訂抵抗的施力點，歐卡那 (O'Connor, 1987: 181-182) 是這麼說的：

¹⁶ 馬庫色在《愛慾與文明》這本書中，是提出了這個架構，但卡內爾 (Connell, 1987: 201) 及其他學者指出，這個提法的立論，還是根據一種自然所導引出來的危機傾向，認定在社會危機之前，性慾 (sexuality) 的本能傾向就會達到壓力的上限。

正就是危機的這個瞬間，社會的個人性 (social individuality) 才有可能浮現……在這瞬間，我們的內部掙扎向外突顯，或者，我們知道也感覺到自己的掙扎，同時也是別人正在掙扎的時刻，我們感同身受，把掙扎當作社會過程，經由社會的與政治的抗爭，個人的掙扎就能向外突顯。

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在思考這個抵抗時，面對了兩個問題。這個抵抗怎麼組織起來的？這個抵抗怎麼傳達自己的？第六章將會討論這些問題，它討論了認同與結構的不同交叉點：社會階級 (Aronowitz, 1992)、種族 (Sivanandan, 1990)、性別 (Connell, 1987)，以及許多對立建制的社會運動 (Bruck, 1992; Luke, 1989)，這些社會運動貫穿了以上提及的類目，總體突顯了核心的社會議題，以及這些議題展現在對立與另類媒體的具體情況。有些媒體分析家已經大談特談閱聽人的抵抗 (Ang, 1991; Fiske, 1989)。這類著作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敦促我們將媒體訊息的衝擊，分作不等程度，並要將這些訊息所導致的反應，亦作劃分。但是，誠如批評者所說 (Schiller, 1989) 這類著作所說的社會及政治抵抗，其實也只是閱聽人對於某個電視節目內容或價值的意見，如此而已。同樣重要的是，這個說法讓閱聽人的社會結構地位，不當地與階級、種族與性別，相提並論。這個情況的造成，部分原因是社會階級的概念，被化減為功能主義者階層理論的一系列地位屬性，這在費斯克 (John Fiske) 的著作尤其明顯。傳統社會類目的色彩減淡，閱聽人的分析位置隨即高升。誠如前已說明，傳播研究長久以來就有研究消費的偏倚，這就難怪閱聽人得到這麼多注意。不過，等到我們想把刺激思考的修辭，轉換為重要的社會類目時，難題就浮現了。如同閱聽人勞動，閱聽人抗拒也將自己與具有核心社會意義的概念，相提並論，以此膨脹了閱聽人的位階，但如此一來，抗拒與勞動的特定內涵及有力的意義，也就折損了。

公共生活中的社會過程

168

社會理論及傳播研究都將公共生活當作一種抗拒商品化的形式，也視之為不同於商品化的另一些社會實務¹⁷。哈伯瑪斯 (Habermas, 1989) 論述公共領域的著作，特別重要，因為它以批判的態度，詰難了這個理念，並且提供了概念工具，有助於重建公共生活及公民權的歷史辯論。他的著作引起了傳播學者的注意，部分原因是他的結論是，傳播（或「理想的言論情境」）是公共領域成功的基礎。他的結論也說，當前的商品化大眾媒體，以及消費至上主義與科層國家體制的擴張，是造成公共領域式微的根源。在許多批評哈伯瑪斯公共領域觀的微詞當中，最適合在此轉述的是，他的公共領域徹底是男性、資產階級與白人所有，因此也就很難說是民主，也不怎麼公共¹⁸。

回應哈伯瑪斯公共領域觀的人，轉了好幾圈。有些人根本就完全揚棄了這個概念，認為它的內涵減少了太多、太過妥協，讓人絕望，德希達 (Derrida) (見 Keenan, 1993) 就說民意、公共意見是「鬼影幢幢」。另有些人則亟望馳援這個概念，並為它注入新的生命，添加了女性的公共領域 (Peiss, 1991) 或無產階級的公共領域 (Negt and Kluge, 1972)。另一種反應則是企圖批判地提昇這個概念，他們強

¹⁷ 開因 (Keane, 1984) 寧取「公共生活」(public life) 這個術語，而不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我贊成這個選擇，因為，誠如下文將述及者，公共生活的說法，不會讓我們將公共視為一種特殊的空間。我傾向於將公共生活當成一整套的過程，能夠提昇民主的根本特徵，也就是平等與參與。

¹⁸ 這些批評者之中，有些出於較為寬容的態度，他們說哈伯瑪斯所要描述的，是公共領域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展現，他的書有個副標題，已經透露了這樣的意思：「探索一個資產階級社會的類目」(Fraser, 1993; 亦見 Peters, 1993)。

調公共領域可以是整套原則（民主、平等、參與、公民權）的發揮，它引領我們走向不同於商品化實務的路途。從事傳播研究的人，推崇後面這種反應的人最多，尤其是來自於政治經濟學取向者（Garnham, 1986; Murdock, 1990a; Sparks and Dahlgren, 1991）¹⁶⁹。這類著作專研了如何運用報業、電信與電子媒體，以及規範與政策，以求創造對立的空間，讓公共領域能夠在此發展。傳播研究也很強調「公共利益」這個概念，而這個術語則來自規範傳播工業的法律¹⁷⁰。這個概念也得到了廣泛的注意，其中包括有人批評它太過含糊，尤其是與市場機能這個似乎較為能夠檢測的說法比較，更是如此。但公共利益之說，仍在法律條文繼續存在，雖然商品化的過程已經削弱了它的色彩¹⁷¹。再者，有些研究則主張，公共領域的概念，超越了商業獲利動機，也超越了消費至上主義的風尚（Melody, 1990）。

若說關於公共領域的辯論，已經是當前社會思潮的一股頗重要的知識流向，當無疑問（Peters, 1993）。部分原因是，這場辯論構成了壯闊的運動，立意要開拓社會生活的實質新面向，使之有別於市場及商品化過程的生活。但它也是惱人的辯論，因為公共領域是一個有如大傘的概念，底下涵蓋的定義與立場，說有多分歧就有多分歧。有人

¹⁶⁹ 毛拉馬（Mowlana, 1990）以伊斯蘭教的觀點，批評西方市民社會的概念，他的批評也可以用來批評公共領域的概念。

¹⁷⁰ 比如，規範廣電及電信《美國傳播法》，就說規範「應該符合公共利益、便利與需要」。

¹⁷¹ 比如，斯密認為（Anthony Smith, 1989: 12），「關於消費至上主義的談話、論述，已經一個領域接著一個，取代了公共利益的論述」。他判斷，這個過程將會導致公共財的定義，全然翻新：新的公共財會是經濟性質：生活在競爭的、與時更新的經濟，我們都能蒙受利益，政府介入若是用來解放市場機能，則我們獲得的利益，還要大過福利主義的持續。事實上，這樣的說法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新奇觀點。另一個斯密（亞當）就認為市場機能的擴張，會使公共財等於公共福利。

認為，它既反市場，又反國家；又有人認為，公共領域要與其中之一聯盟^②。公共領域變成了可以是包含了市民社會、可以是被市民社會包含，也可以完全與它無關，不同理論背景的人，各有說法。公共領域可以是占有了實質的物理空間，可以是制度空間，或者，也可以是網路 (cyber) 空間。它所能夠涵納的社會行爲，也是包羅萬象，可以是重要公共議題的辯論，也可以是逛街購物與音樂影帶等。公共領域幾乎成爲無所不包，具有許多的意義與立場，這就讓人很想同意最近提出的說法 (Robbins, 1993)，它稱公共領域跟「鬼影」差不了多少，或者，用個較好的術語來比擬，「幽靈的集會所」(phantasmagoria)。雖然對公共領域這個概念的批評，有其價值，但若就此放棄之，那會讓人更難以接受。誠如羅賓士 (Robbins, 1993: X) 所說，公共領域是一個強大的「論述武器」，若是少了它，我們等於在「武裝不足下」從事社會鬥爭：

如果「鬼影公眾」還能讓人瞠舌與茫然，如果我們是有些不甘願眼睜睜看著公眾消融在煙塵中，原因也許不是我們留存信仰，而是我們心生恐懼，害怕就此失去了它而無法動彈。

問題是，不管公共領域是什麼，我們如何探討？或者，既然流行的說法是把它當成領域，那麼它在「哪裡」？我認爲，後面這個疑難提出了公共領域這個概念的關鍵問題。因爲，這樣一來，我們就傾向將它當成一個客體，占有一塊我們可以指出的空間，無論是實存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電子空間，或只是幽靈的集會所。捍衛公共領域

② 比如，許樂 (Schiller, 1989) 強有力地批判了國家，但又指出，政府經營的公共機構，如公共圖書館及公共教育體系，自有其價值，可免受到商業主義的攻擊。另一方面，羅士 (Andrew Ross, 1993) 則論稱市場可以是對立的力量，鬆綁國家規範所導致的箝制枷鎖。

的人，彷彿是在保護一塊土地，抵禦一心一意想要征服的外來強權、侵略者。這個類比幫助我們瞭解市場與公共領域的嚴正對立，但也有弱點，它誘使我們將市場與公共領域當成占有特定空間的客體看待，但我們卻難以，或說根本就不可能指出這樣的客體在哪裡。由於有這層困難，關於什麼是在公共領域之內與之外的立場，就有了變化。「公共」這個術語，並非全無含混模糊，但相比於它的後面加了「領域」這個詞，單是它所引發的疑問，還算是少一些，儘管我們會想用各種方法，確立領域的特定意思。

170 我們是很不適合將公共領域當作是一塊領地，但由此轉進而說公共領域只是幽靈，又未免大可不必，雖然這樣的跳躍，殆可理解。若是我們重新「界定公共的意涵，將公共當成是實行民主的整套社會過程，也就是在完整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決策範圍，提振平等與最大可能的參與」，那麼，我們應該就可以避免兩極的危險，不會重蹈將公共領域具體化的覆轍，也不會失身於將公共領域比附為幽靈的觀念論。這些過程與私人生活的核心過程，截然不同，也與市場過程完全不同，前者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私密，後者促成剩餘價值的創造及交換。透過過程來思考，極有價值，雖然我們可以認為某些制度形式及空間，可望帶來較大的平等與參與，但我們的過程觀卻不會就此排除任何結構的具體安排，也不會排除任何結構的所在。我們最好將後者視為抗爭的地帶，無論是國家、市場，或是其他企圖遠離國家與市場的結構（如社會運動），都是抗爭地帶，商品化及社會平等及參與的過程，在這裡進行抗爭。所有這些地帶都是抗爭的力場，比如，我們的消費者身分與認同，以及我們的公民與公民權的認同，二者之間的拉鋸戰，誠如梅鐸（Murdock, 1993: 527）所說，它構成了「當代經驗之中，最為重要的交戰緊張關係之一」。

將公共當成過程來思考，會有困難，因為我們還是習慣於具體的意識，對立於過程的是清楚可資辨認的制度與結構，具體而符合我們的習慣，相比之下，公共是一種過程的思維，就顯得是觀念論者的抽

象義理了。更何況，具體的結構與制度形同提供了道路地圖，儘管需要經常修訂，但仍然是導引，讓我們知道從此站到彼站，必須經過哪些路途，哪些必須遵守，而哪些最好躲過。雖有這些吸引人的地方，但制度與結構也可能讓我們產生安全的錯覺。如今一個已經相當時尚的論點，正是指出了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社會的國家，如果不是無可救藥地妥協，就是完全投身於市場及官僚科層，最多除了形式民主以外，簡直就一無可取，雖然人們一度將國家當作是商品化之救贖的根源。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此即有別於或對立於商品化的形式（包括媒體與文化），必須在外尋找，也就是與國家及市場均維持若干距離的地方。抨擊國家的理由，是很充分，關於找尋不受汙染的空間，也有很多事情可待談論，而奧德海得 (Aufderheide, 1992: 53) 則稱之為「在『自由空間』的一個活生生的實體，人們在此討論，得到結論並據而行動」。就傳播所能指稱的自由空間，它包括了傳統形式（如另類報紙、對立於國家控制的公共服務廣電機構）及新的形式（如公共近用線纜電視頻道，以及開放的電腦網路），當然，這也取決於我們怎麼定義自由，也就是我們容許這塊空間存在多少汙染，在超過了多少汙染以後，我們會稱之為是市場或國家的空間。畢竟，若要一塵不染，是會有些問題的，因為這些自由空間的具體展現，在相當意義上，既不能說是自由，也稱不上是空間。另類報紙也許是最自由的，但依不同國家的實際作法，它或是使用政府的郵寄津貼，或直接從政府手中取得資助，這些報紙也運用了市場機能的支持，包括訂費、廣告、商品化的勞動過程與發行網路。再者，依據不同國家的作法，公共服務廣電機構的財源，可能來自執照費、政府預算、商業廣告，這些機構的主要經營管理人員，也都由政府任命，他們通常也都有能力，能夠滿足政治或市場的成功標準。公共近用線纜電視頻道，是可能提供更多元的內容，但它們自有限制，也就是付得起訂費的人，才能使用（一九九六年，美國大約有三分之二家庭是線纜電視的訂戶），並且，它的內容也會因為各國各地方的不同規定，必須接受線纜經營

者與國家規範者的監督。至於具有互動性質的電腦網路，那就更是受到市場機能與階級因素的箝制。要使用電腦網路，就必須要使用電腦及電信設備，使用的人若不是要有支付通訊費用的能力，就是要如同大學教授那般，得到優待，他們的使用成本均由國家承擔，或是由大學承擔（而大學又從國家得到可觀的資助），或是由想要打開新形式傳播市場的公司承擔。

強調這些媒體提供了另類與對立的傳播形式，自然很重要。但若是將它們當成自由空間，我們也就容易忽略了一個相當有意義的事實，此即在這些不等媒體形式之中，容或自有特殊的差異，但再現及科層的不平等結構，仍然根據階級、性別與種族而複製^④。此外，這個看法也使得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抗爭，抵抗國家與市場之內的商品化，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正是在這裡，我們就益發能夠察覺許樂 (Schiller, 1989)、高丁與米德騰 (Golding and Middleton, 1982) 及艾文 (Ewen, 1988) 等人的論述，格外具有意義。許樂與高丁檢視的是國家活動的核心地帶，他們探討了在這些抗爭場域中所發生的媒體、傳播與資訊議題，包括了公共教育、公共圖書館、政府資訊，以及社會福利體系。還有，許樂對廣告言辭的研究，艾文對風格時尚的研究，都顯示了在市場最核心的地帶，商品化的過程仍有抗爭狀態。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研究從人們的生活體驗著手，人們在學校、購物中心、社會服務機構及在工作場合，每天都在遭遇對立過程的撞擊，遠遠超過他們接觸另類媒體及電腦網路的機會。還有，這些研究所揭示的一個核心課題，乃是國家、市場與公共，真正在每個地方都可看

④ 這個概念上的失誤，在討論新社會運動的文獻裡，表現得最為明顯。我們在這些文獻中，察覺論者傾向認定它們就是自由空間的一部分，既不受國家汙染，而且言下之意，它們也不受市場機能汙染。這些類別的分析通常談及，或實質地指向市民社會，認為市民社會是這些運動的自由空間。伍德 (Wood, 1990) 已就這類說法，提出批判的分析。

到，它們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這個情況應該足以讓人想到，我們要找尋的，不是自由空間，不是要在特權階級之中，或是要在新社會運動中，找尋無瑕的理想社會形式，雖然這些形式或許展現了特別有力或較為純粹的社會對立能量。

172

有了這層領悟，我們也就更願意從社會過程的角度來思索，社會行動的這些向量，也就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中，形成了不同關係。構思公共領域的更為有用的方式，是把公共領域當成社會行動者構築出來的整套過程，這些行動者以公民的身分構築這些過程，他們要提振的是平等與參與，也就是民主的核心要素。這些過程只能相應於社會場域而存在，進入這個場域的主要切入點，也就是商品化，使得場域有了特定類型及最初的外形，但過程與場域的關係仍然持續被不斷地重新建構，在公共與私人生活中，商品化與社會過程持續互動而建構這個關係。從商品化的觀點來看，它是一個社會場域，然而，這個觀點由私人與公共生活相互建構而成。我們稱之為公共媒體者，並不是它在市場機能之外，相對地免受其影響，占據了完全與之分離的空間，而是公共媒體已由特別的類型化過程建構了出來，這個過程尊重民主價值，遠勝過遷就商品化的要求。若是不能如此彰顯，「公共媒體」這個說法的價值，也就遞減。

本章已經論稱，開始重新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商品化。商品化將社會場域設定了框架，但惟有在與私人及公共生活的運作過程相互建構以後，才能設定這樣的框架。下一章討論第二個切入點，由空間化引領，探討克服空間與時間約制的過程。



空間化

馬克思論稱，資本主義關係的進展，勢必能夠清除所有的空間障礙；這也就是「用時間謀殺空間」。現在的情況是，雖然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標」，馬克思（以及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卻忽略了，若要完成這檔謀殺的工作，必然要得先製造新的、固定的及相對無法流動的空間組合。誠如哈維所說，「清除空間必先組織空間」。(Lash and Urry, 1987: 85)

新的領土動力……似乎根據以下二者矛盾而組織，不受國界限制、無所不在的權力 (placeless power) 以及一無所有、毫無權力的特定地方 (powerless place)，前者的運作依賴傳播的流通，後者站在特定的歷史領土上，製造自己的傳播符碼。(Castells and Henderson, 1987: 7)

商 品化是傳播政治經濟的起點或入口點。是以，商品化就開啓了一個分析的場域，它包括了源生自私人與公共生活的許多過程，這些不等過程彼此相關，又與商品化產生關係。商品化是一個起點，並不是所有其他起點均可化減至此。本章就討論空間化這個入口點，這個術語由亨利·列夫羅 (Henri Lefebvre, 1979) 引進，這位社會理論家說它指的是，「清除社會生活中空間與時間約制的過程」。空間化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具有特殊意義，原因有兩個。第一，貫穿所有的政治經濟現象，傳播過程及科技在空間化過程占有核心角色。第二，部分起於前述原因，空間化對於傳播工業尤其具有特別的意義。

關於空間化的研究興趣，雖然已經日漸增加，不過，社會科學家

(包括政治經濟學者)對此注意更是已有些時候。土地價值怎麼測量,勞動時間的價值怎麼測量,市場及分工的空間延展,對於斯密、李嘉圖及其他古典理論家來說,這些都是重要課題。在馬克思著作中,我們則發現了他提出一個很接近空間化的概念,在《大綱》裡,他就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要以「時間謀殺空間」。他這裡說的是,資本利用運輸與傳播工具並改進之,資本在兩地之間移動財貨、人們及訊息的時間,因此縮短了,於是空間距離對資本擴張的約制,重要性也就降低了。在對這個主題有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家當中,因尼斯(Harold Innis, 1972)可以說是最為突出的,他一直努力,企圖在媒體形式、時間與空間,以及權力結構之間,建立連結。最近的政治經濟學著作(Lash and Urry, 1987)則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提出修正,他們說,資本並非謀殺空間,而是轉變了空間,資本把人們、財貨與訊息的空間關係,重新加以結構,並且也就在此過程轉變了自己^①。

「空間化」術語所援用的概念與論點,對於許多對政治經濟學產生興趣的地理學家及社會學家來說,也是愈來愈重要。比如,季定思(Giddens, 1990)使用了「時間—空間差距化」(time-space distancing)這個詞,他探討的是時間—空間依賴關係的減輕,並提議我們集中於分析時間與空間的增長,認為我們可以將二者當作互可融通的

①我們可不應該苛求馬克思所說的「謀殺」空間。馬克思其實是說,實際上,這代表了資本投注的心力,平衡點開始有了移轉,資本已在注意不同的地方,特別是新興的市場:

運輸及傳播設備的進展,創造了許多機會,而反過來說,資本也就因此必須注意愈來愈遠的市場——簡短一句,注意整個世界的市場。

(《大綱》,轉引自 de la Haye, 1980: 156)學者最近的評論(Lash and Urry, 1987),描述了空間效應的轉移以及一層又一層的性質,延續了馬克思所開始的描述。

資源。哈維 (Harvey, 1989) 所說的「時間—空間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與此極為神似，雖然他更為強調的是這個情況所具有的政治經濟意義，如國際金融體系每天經由電子高速通路，完成相當一兆美元資金流動的交易，因此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等於是被超越了。卡思提爾 (Castells, 1989: 348) 則提請我們注意，相對於他稱之為「流動的空間」(the space of flows)，物理空間的重要性已經減少：

(流動的空間指的是，) 掌握權能的組織為布署其職能而必有的作法，這些組織運作在交換關係並不對等的網路之中，它們在完成其根本的目標時，並不依賴任何特定地理位置的特色。

卡斯提爾著作中的空間，充滿了一種積極、活躍的意涵。誠如馬賽 (Massey, 1992) 所說，歷來的空間觀其實充斥著性別意識，它指涉的就是一種沒有時間的狀態，「割下時間的切片，大地之母的變遷能力，依賴時間的動力」，然而，卡斯提爾的空間觀已經超越了這個說法。再者，卡斯提爾 (Castells, 1989: 348) 把傳播因素放在空間化過程的核心，因為傳播維持了分化與重新整合的動態平衡關係：

新的工業空間及新的服務型經濟，它們的運作環繞著它們的資訊蒐集動態而進行，它們將其不同的職能，分配到許多分立的空間，使其各自執行，然後又串連它們；因此，整個過程是透過傳播體系而發揮重新整合的功能。

最後，他的空間觀另有很重要的一點，因為它保留了不等權力的意涵，不像某些全球化的概念，偏向將權力關係解消在相互依賴的網路中。馬賽將這個差別說得更清楚，他用相對關係來解說空間 (Massey, 1992)，他說空間包含了許多套的動態社會關係，合成一

個「權力—幾何學」。他們的著作指出，傳播政治經濟學若要從中取得有用的概念，就應當將空間化視為一種手段，藉以瞭解權力—幾何學與空間（尤其是傳播所經過的空間）的構成過程二者有何關係。

傳播與集中：

空間是制度的延伸

若是以一般話來界定，我們就說空間化研究的對象，是組織活動的地理及制度延伸。傳播政治經濟學所論述的空間化，特別是要探討「傳播企業財團統合力量的制度延伸」。這個延伸的展示，只需看媒體公司規模的增長就可知道，無論是以資產、營業收入、利潤、僱員人數或股票價值來計算，都可明白這些公司的規模，確實很快地在擴大。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要檢視「企業財團集中」的不等形式之增長。雖然財團的增長與集中是當前傳播圖譜的核心特徵，但關切這些發展的後果，由來已久，並不新奇。比如，早在一百多年前，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就批評哈瓦斯 (Charles Havas) 壟斷了法國線纜通訊的業務，因為壟斷造成了資訊來源的減少。

若是一家媒體公司購買另一家同行公司的控制股權，我們就說控制的最簡單形式已經存在^②。《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購買《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就是這個基本形式的最佳例子。傳統上，我們以「水平」及「垂直」兩個形式來檢視集中的不等類型。不過，我們也應注意，雖然相關術語很多，但對於這些概念的內涵、定義與在傳播工業的應用，並沒有一致的見解。形成這個情況的

② 控制或主要股權的定義，差距很大，有人認為在股權很分散的公司，只要得到百分之二股權，就算是擁有了主要股份，另有認為要超過百分之五十一以上才算，後者可以讓一個公司掌握了多數股票，並因此能夠控制董事會。

部分原因，是因為媒體集中的研究，質量均不足，而這又有部分因素是爲了媒體工業具有影響研究課題的能耐，造成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市場行銷的研究，但相比之下，關於媒體集中的可能意涵及性質，卻較少看到。概念上還沒有共識，另有一些原因是爲了這是快速變遷的產業。產業結構、科技及勞務的變化，以及國家政策與規範（通常落後這些變化甚多）的變化，都是原因，我們因此很難得到一般都能接受的語彙，無法提出大家都接受的媒體集中圖譜。

176

人們僅能在有限度之內同意這類術語的使用，接下來，我們就來評估論及媒體集中的若干主要方法。水平集中指的是，一家媒體公司購買了另一家媒體公司的主要股份，後者可能並不直接與前者的行業有關，或是可能就完全與媒體產業無關^④。第一種情況，或說是「交叉媒體」集中的例子，可以是較爲傳統的媒體（比如，報紙），購買了較爲現代的媒體（如收音機或電視電臺）。透過這種方式，某個產業（如報紙）在新媒體形式出現以後，仍然可以維持獲利的原因，最好的例子是梅鐸的「新聞集團」購買了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水平集中的另一種形式，是媒體公司購買完全與媒體產業無關的公司，或非媒體公司購買了媒體公司。前者如「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美國全國電視網」NBC 的母公司，購買了赫茲 (Hertz) 租車公司。與媒體無關的公司進入媒體工業的例子，則如通用電子公司 (the General Electric Co., GEC) 這家電器及承攬國防業務的公司購買了 RCA（雖然 GEC 在一九二〇年

—————

④ 「不直接有關」這句話很重要，這還不只是定義問題，因為若是購買一家相關的公司，則將減少某一個市場（若是涉及買賣的兩家公司在相同市場經營）或一個以上的市場（若兩家公司在不同市場經營）的競爭程度。與此說法相反，我們也可能會論稱，購買了一家相關的公司以後，更有可能提高市場效率，因為購買的公司將可使其經營更加理性化。

代的時候，其實就是最初 RCA 的擁有者）。另外，義大利芬寧維斯集團的首腦貝魯斯卡尼 (Silvio Berlusconi) 在一九九四年初，利用他所控制的媒體，協助他成為右翼聯盟的主席，並進而贏得義大利普選（譯按：未滿一年，貝氏被迫下野），這又是由非媒體產業進而締建媒體王國的明顯例子之一。這家集團出身營造業與房地產業 (Cantieri Riuniti Milanesi)，它另外在大眾媒體與金融服務業衍生了七個部門^④。這個水平集中的形式，產生了「聚合」(conglomerate) 產權的出現或擴張，結合了不同產業公司的資源。

垂直整合指的是在相同產業之內，各種公司的集中，使得一家公

④ 在一九八〇年代頂峰的時候，芬寧維斯帝國的觸爪包括了房地產、出版業、旅遊休閒、金融服務、零售與廣電，這些事業積累迅速，資金大都依賴借貸。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義大利經濟景氣減緩，該集團陷入困境。一九九四年，芬寧維斯賣掉十三億美元的資產來償還債務。一九九四年元月，貝魯斯卡尼先生辭去芬寧維斯的總裁職務，以便參與右翼政黨的聯盟，爭取當時即將到臨的全國普選選票。

由於他在直接涉足義大利政局時，其實仍然掌有媒體大權，貝氏廣受批評。一九九五年五月，梅鐸的「新聞集團」斥資二十八億美元，想要購買芬寧維斯擁有的義大利三家電視網的百分之五十一股權，這實在是媒體產業起起落落浪潮的最佳例子之一。

（譯按，梅鐸的集團在一九九〇年時，舉債已達美金四十億，後因利率下降、英國柴契爾政府的衛星政策有利梅鐸等因素，短暫兩三年之間，梅鐸已否極泰來，最生動的對照是，Richard Belfield, Christopher Hird and Sharon Kelly 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梅鐸：帝國的衰微》，到了一九九四年再版時，必須增加一章說明它沒有衰微的原因，而副標題也改成了「大開溜」。梅鐸擅於利用各國的賦稅漏洞逃稅，納稅額度常只及於競爭對手的 1/3 ~ 2/3，英、美、澳等國政府有鑑於此，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時，表示將組成團隊，就此調查。梅鐸為保護他在中國的投資，在一九九四年時，要求他的香港衛視公司，將屢次開罪中共的 BBC 頻道排出。一九九八年二月，他要求集團所屬的出版公司，不能出版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Chris Pattern 的回憶錄，以免得罪中共。）

司能夠控制整個生產過程。MCA 這家好萊塢主要製片商之一購買了奧迪盎多廳院以後，就控制了一家主要的發行片商。這種形態的整合也稱作是向前連鎖的整合，因為它使得一家公司在兌現價值的通路上，又攻下了一城。向後連鎖的整合則讓相關公司向下紮根，也是強化了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如《紐約時報》購買了魁北克的製紙廠。一家公司若是能夠善用機會，垂直整合能夠使其營運理性化，取得比較利益，這當然也得取決於這家公司的能力，是否能夠有效管理生產階段的流程。擁有電視網的公司，若是也能擁有節目製作公司，則必然能夠以比較便宜的價格，取得節目。與此相同，擁有電話線路的公司，若是也兼賣電話器材設備，或是電影製片公司也控制了掌握電影播放場所的發行片商，那可就是都是利多。

這些整合形式的產生，主要是任何公司若需依賴外部市場來完成生產循環，必然會有不可預期的情況，於是有了這些手段來加以控制。研究產業史的史學家早就明白，這個過程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深刻意義，對於這個發展，史學家提出了不等詮釋，將此資本主義稱作統合的、經理人的、組織化的或壟斷的資本主義。比如，張得樂 (Chandler, 1977) 詳細展示了許多整合成功的公司之經營策略，如杜邦、通用汽車與洗耳 (Sears) 都各自在它們的產業屹立了數十年。他論稱，這些公司的成功因素，在於它們所採行的經營策略，能夠讓本公司不受許多外部市場不確定性的左右，如在生產循環中，存在許多強力競爭者所導致的不確定。與此同等重要的是，它們在此受到保護的環境中，創造了許多市場，使相同生產線上的分工，有所競爭。通用汽車公司成功而其他公司失敗，部分原因是它的水平與垂直整合使自己免受競爭的威脅，「同時」，又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內部市場，使得旗下的奧斯摩比 (Oldsmobile)、龐蒂克 (Pontiac)、雪佛蘭 (Chevrolet) 與凱迪拉克 (Cadillac) 等不同的車廠，各自以獨立生產線，負責達成個別的成長目標。對於通用這家擁有許多個分立公司的財團來說，其執行董事會可以說是經理兼銀行，負責評比各公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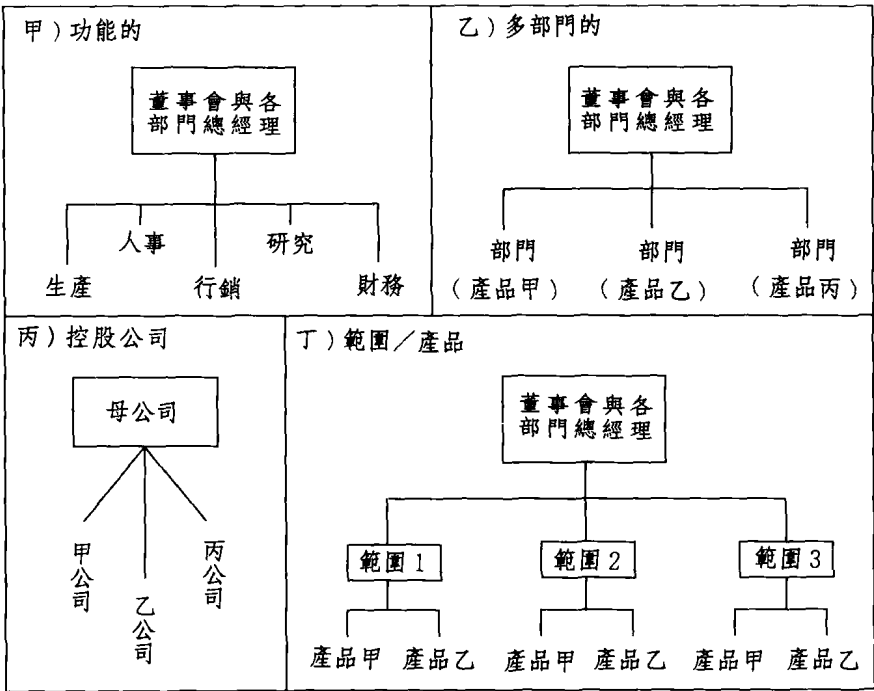


圖 5-1 統合企業結構形態 (Chapman and Walker, 1987: 115)

否成功，並以評估結果調度資源（參見圖 5-1）^⑤。根據張得樂的說法，置身這個結構之內的公司，即便沒有外在企業與它們敵對競爭，因此能夠降低其不確定性，但它們仍然可望得到內部市場競爭的許多

⑤ 張得樂對照了兩類公司，一類是成功的公司，運用了多公司多部門的準市場機能，一類是比較沒有那麼成功的公司（如福特），雖然後者的整合程度也很高。張得樂認為，後者忽略了內部市場的機能，它仍然保留了功能導向的統合結構，這些功能則根據傳統的財務、行銷、生產與會計等分類，這個作法排除了財團旗下各公司的競爭，或說使內部競爭很難產生。

好處。張得樂與其他產業史學家（參見 Brunn and Leinbach, 1991; Pred, 1996; Yates, 1989）也都指出，傳播與資訊科技，以及運輸系統，很可能一直都是這些過程的核心，因為它們提供了工具，讓經營管理階層能夠控制整合的速度與形式。這麼一個整合的、多層次的統合財團，其成功取決於即時評估各個部分的相對績效（比如，哪個部門的投資報酬率最高、為什麼，Chandler, 1977，尤其是第六章；亦請參見 Malone and Rockart, 1991），因此其內部之內必然流通著各種多重的情報，它也就需要借助快速有效的傳播體系來襄理其營運。

178

媒體產業當中，時代·華納是多部門多公司的翹楚，我們從它運用最暢銷小說，華樂 (Robert James Waller) 的《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手法，就可窺知這種組織形式的價值。華納圖書公司先出版該部小說，到了一九九三年七月，銷售了二百五十萬本，時代·華納的亞特蘭大有聲出版公司接著推出了由該小說衍生的歌曲，並由作者演唱，同時也製作了音樂影帶。時代·華納公司所屬的許多雜誌則報導、評析這本小說與有聲出版品（亞特蘭大公司一共簽下了五張），並刊登廣告，然後公司又製作了一支短

⑥雖然並不是主要考量，但美國主要的電視購物頻道 QVC，積極以高價併購派拉蒙傳播公司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的理由之一，是因為 QVC 已經證實自己幾乎有辦法銷售任何消費財，包括書籍。在三十分鐘之內，QVC 透過電視購物頻道賣出了一萬五千本小說。一九九三年，派拉蒙從垂死的麥斯威爾媒體帝國，買下了麥克米蘭出版公司，花了五億五千三百萬美元，於是也就控制了十二家左右的出版商，包括 Simon and Schuster、Prentice Hall、Touchstone、Scribner's，以及 Pocket Books (Mehegan, 1994)。但在購併完成之前，公司先行重組。一九九四年初，派拉蒙出版公司宣布，購併之後，公司將從原有的一萬位員工，裁減一千一百人，若干特殊部門也將裁撤，如已有三十五年的 Atheneum 部門 (Cox, 1994)。

片，在時代·華納公司的許多線纜系統播放，短片中這位轉為民謠歌手的作家，正在促銷他的作品，片中並提供免費電話訂購專線 (Cox, 1993)^⑥。到了一九九六年，華納兄弟已經把它轉呈賣座的電影與暢銷的錄影帶。

179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加速演化的「多國」企業，是媒體工業的另一個成長形式，傳播學者對此現象也日益關注。誠如斯密 (Smith, 1991) 與坦士多 (Tunstall, 1977) 所展示，跨國媒體公司的歷史，與大眾媒體本身一樣悠久。十九世紀的時候，三家國際通訊巨人——英國的路透社、法國的哈瓦斯社與德國的吳爾夫社——控制了新聞的生產與發行，它們將世界市場劃分成為若干壟斷區間，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競爭^⑦。最近幾十年來，由於傳播公司尋求產品的新市場、低薪勞工及政府最少監督最少規範的部門，這個趨勢又告擴張了。媒體工業對於跨國化的一般過程，特別地重要，因為除了促銷特定的媒體產品以外，媒體經由廣告，直接地讓人們注意到了一般商品，並且又間接地以媒體的各種形式，也向人們呈現了一般商品。再者，傳播工具（包括傳播衛星及高負載量的線纜等新科技）讓各公司行號能夠以更符合成本效益，也更容易的方式，同時跨越許多國界而有效營運。一些最大的跨國媒體公司，是仍然在某特定的國家保有基地。然而，這些公司愈來愈能夠利用其產品、行銷、勞力與財務的多國面向，超越、規避其母國基地的法律、規範、文化及財務約制。

一個很明顯的效應，就是斯密 (Smith, 1991) 稱之為「巨獸」的崛起：時代·華納、三菱、新聞集團、新力、哈謝特、芬寧維斯與貝

⑦ 許樂 (Schiller, 1976: 26-29) 點醒了我們，當年在這種世界性的報業壟斷結構下，最為焦躁憤怒的正是美國，彼時美國強烈要求，規模與資產本身不應該決定誰可以控制資訊的生產與發行（參見 Cooper, 1942），這就如同許多世界上比較貧窮的國家，日後如出一轍，亦對美國提出這個強烈要求。

鐵曼等等。這些媒體鉅子都有垂直整合的能耐，控制了生產、發行與映演展示；水平來說，它們各有包容廣泛的媒體產品，硬體與軟體都有；它們又走向全球，利用了國際分工，取得了彈性又符合其成本效益的勞動、資金、研究與發展成果。它們齊聚了巨量的經濟集中權力。雖然如此，類如這種超級統合財團的形式，並不是財團回應全球重組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有效的方式，麥斯威爾崩垮帝國之後，猛然發覺自己的退休金已被盜用的員工、日夜禱祝每元股票能有些許進帳的小股東，或是汲汲惶惶不知道時代·華納是否能夠從龐大債務抽身的投資人，當然對此非常了然，如冬日飲水。但我們哪裡需要具有這些身分，才能知道呢。時代·華納的合併案，造成了一百億美元以上的債務。梅鐸的新聞集團帝國，基礎建立在八十億的短期貸款。聚合形式的龐大財團企業，是有可能取得靈活調度資源的便利，但它也可能衍生科層官僚作風，阻礙了創新部門的生機，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ITT) 在一九七〇年代及國際商務機器 (IBM) 在一九八〇年代，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值此母國總公司的重要性下降，有些人不免懷疑，這是否意味著跨國公司將從中得利，而國家主權所能控制跨國公司的能力，為此折損。賴西 (Reich, 1991: 8) 問道，

那我們成了什麼？……本國公司的獲利率，或者這些公司投資者的成功，都未必能改善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水準。這些公司與它們的母國，斷絕了關係^⑤。

然而，另有人非議這個觀點，他們發現，跨國公司的經濟強權幾何學，更為有利於跨國公司母國的工作者與消費者 (Thurow, 1992)。還有些人則認為，所有的國家在其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仍然手握大權，足以規範所有的公司，不管這些公司掛著是哪個國家的旗幟，因此，這個世界同時存在著力量仍然強大的主權國家，以及強大的跨國

公司，二者並存 (Strange, 1988)。賴西的論點固然可再計較，但他倒也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到底目標在於保障「本國」公司的政策，服務了誰？幾近半數好萊塢的主要影業公司，拱手售予外人，這讓制定美國政策的人擔心不已，但他們卻對剩下來的部分，何以稱得上是美國的，卻不聞不問。或者，為什麼美國幾十年來，一直容許「我們的」影片輸出協會 (Motion Picture Export Association) 進入外國市場營業時，不必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監督？^⑧還有，美國電信決策制定者為什麼會在意自己的電信製造業市場，淪入北方電信 (Northern Telecom) 之手？畢竟，這雖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總部卻設在

⑧ 賴西 (Reich, 1991: 166) 接著轉向了媒體工業，反駁時代·華納的說法，後者宣稱聚合形式大企業財團的創造，「將有利美國迎戰外國媒體公司」：

相對於梅鐸的新聞集團（包括了二十世紀福斯公司、福斯電視網、《電視週刊》[TV Guide] 與 Harper & Row 出版公司）、西德的貝鐵曼媒體王國（包括了 RCA 有聲出版公司、Bantam、Doubleday 與 Dell）、法國的哈謝特（包括了 Women's Day 及 Grolier's 百科全書），以及新力（CBS 有聲出版公司及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何以見得這樁合併案對於美國會特別有利，仍然不可理解。美國的與外國的作家、編輯、導演、音樂家及電影放映師、攝影師，都同樣通通投身在這全球媒體公司工作。

⑨ 華思寇 (Wasko, 1994) 指出，好萊塢是一個「三層級的社會」。頂端是最大的製片廠：派拉蒙、二十世紀福斯、華納、環球、迪士尼與哥倫比亞。其中，三家的產權不是美國人所有。梅鐸的新聞集團擁有福斯（譯按：但梅鐸為了規避美國對外籍公司的特別規範，已入籍美國），日本的電器巨人三菱擁有環球，新力擁有哥倫比亞。第二級包括了華思寇稱之為「小/大之間」，包括了米高梅/聯合 (MGM/UA)、奧立翁 (Orion)、卡羅科 (Carolco) 與新院線 (New Line Cinema)。最小的公司則組成了第三層，一般稱之為獨立片商，但這麼稱呼很有疑問，並不準確。

表 5-1 世界二十大影視公司，以銷售額分

等第	公司	美國	1991 年影視銷售總額 (百萬美金)
1	Time Warner	美國	7,391
2	Sony	日本	5,702.6
3	Capital Cities/ABC	美國	4,329.7
4	NHK	日本	4,039.8
5	Matsushita(1)	日本	3,951
6	ARD	德國	3,730.4
7	PolyGram	荷蘭	3,379.7
8	Fininvest	義大利	3,331
9	Fujisankei	日本	3,259
10	BBC	英國	3,237.6
11	Bertelsmann	德國	3,159
12	RAI	義大利	3,125
13	General Electric/NBC	美國	3,121
14	CBS	美國	3,035
15	News Corp.	澳大利亞	2,750.6
16	Walt Disney	美國	2,593.7
17	Thorn EMI	英國	2,497.5
18	Paramount	美國	2,380.2
19	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日本	1,581
20	Ashai National Broadcasting	日本	1,570
21	Nippon Television Network	日本	1,544
22	TBS	美國	1,433.9
23	Viacom	美國	1,370
24	PBS	美國	1,320
25	CLT	盧森堡	1,305

(1) Matsushita 1990 (估算) = MCA 1990 + JVC Entertainment 1990/1

Matsushita 1991 : 25% + MCA 的 80%。

資料來源：IDATE, 1992: 6

美國，也在美國雇用更多勞動力的公司？美國政府也絕少質疑，半數以上營收得自美國以外的 IBM，究竟國家民族認同有沒有問題，它也絕不質疑，美國科技 (Ameritech) 這家利用它在美國特定地域的壟

181 斷地位，購買了半數的紐西蘭電話系統及德國電話商業資訊 (Yellow Pages) 的出版公司，到底有那些地方可以算做是美國？雖然如此，許多公司「是」不願意放棄本國的根基，因為它畢竟提供了相當的支持，它經由優惠的法律、規範及投資等政策的形式，作為這些公司在敵對的國際環境中的堅實後盾。由於本國政府的優惠政策，日本的三菱、美國的時代·華納，與加拿大的北方電信才能在向國際市場擴張的過程，減少大量的風險。這時我們又再想起，賴西提出的問題「我們是誰？」，重點並不在於這些公司是否在本國留有根基，因為若是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問題不在於根基在哪裡，而是這些公司是否創造就業機會、生產社會有用的產品及勞務，以及它們的商業行為是否能夠符合公共利益的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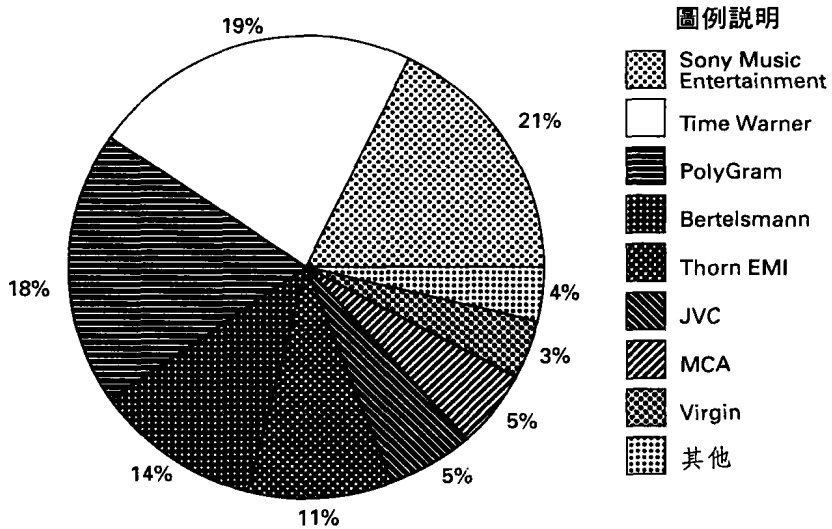
政治經濟學家對於許多的集中形式，都很注意。但總的來說，以「產權」角度作為檢視媒體集中的最主要標準，對於政治經濟研究者更是有無上的吸引力。這主要是因為產權的集中，將限制了生產者與發行者的多元程度，因此也就侷限了傳播與資訊的流通。所以，歷來就垂直、水平與跨國形式的集中之研究，也就傾向於辯論產權集中之後果。不過，究竟怎麼測量集中度，卻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孔潘等人 (Compaine et al., 1982) 認為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傳統的反托拉斯定義，以市場占有率為準，另一種是較周延的概念，以公司的規模及市場產品的多元性為準。前者通常見於規範與法律文獻，據此原則，已經有許多方式可以用來測量市場競爭的程度¹⁰。這個標準以市場為焦點，決定這個市場在多大程度內，具有產品（如報紙或電視節目）的開放性。不過，我們應該注意，這裡的分析單位是公司，列入分析的公司，其產權必須與市場中其他公司的產權，有所差別。比如，若是就報紙市場來說，梅鐸的新聞集團擁有的報紙，可以說是與甘耐特 (Gannett) 集團的報紙，相互競爭；但若是兩家報紙都是甘耐特集團所有，則不能算是競爭。雖然這裡強調的是市場，但測量集中度的單位仍然是公司。

182

183

表 5-2 國際有聲出版品業的市場集中度，1990-1

公 司	營業額 (百萬美元)	市場占有率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3,274	20.60
Time Warner	2,931	18.50
PolyGram	2,884	18.20
Bertelsmann	2,219	14.00
Thorn EMI (1)	1,814	11.40
JVC (2)	815	5.10
MCA	764	4.80
Virgin	567	3.60
Other (估計)	600	3.80
總計	15,868	100.00



(1) Thorn EMI 1991 年購併了 Virgin。

(2) JVC 與 MCA 的營業額數字為 1989 年。

資料來源：IDATE, 1992: 31。

表 5-3 世界十大娛樂公司，1992

公司	國家	營業額（百萬美元）
Time Warner	美國	7,957
Sony	日本	5,775
Matsushita(1)	日本	4,709
Philips	荷蘭	3,700
Walt Disney	美國	3,115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美國	2,657
Thorn EMI	英國	2,463
Bertelsmann	德國	2,219
News Corp.	澳大利亞	1,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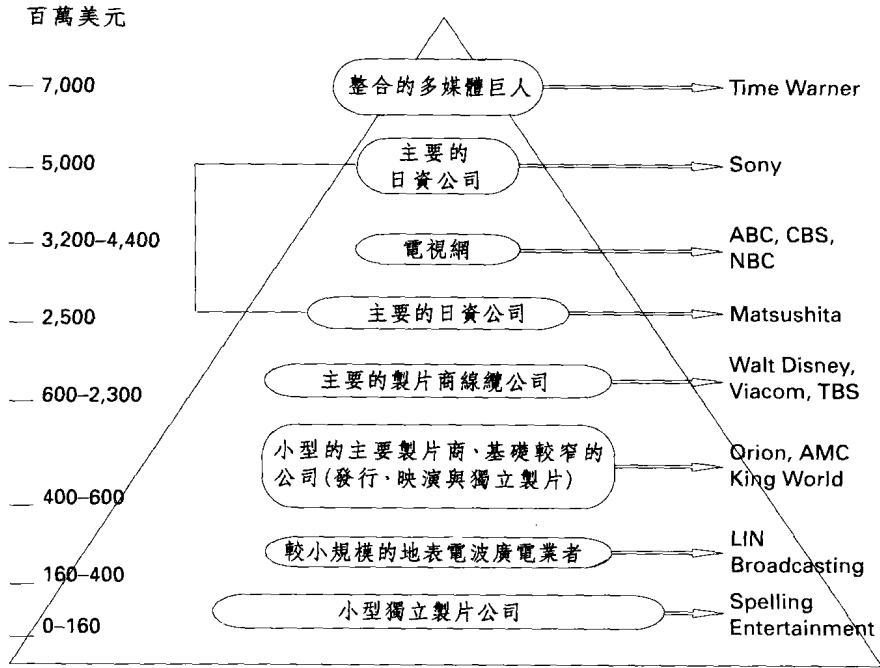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6, 1993, p. R16.

⑩ 美國政府使用集中指標來決定市場的寡占控制程度。比如，賀分達—賀許曼指標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指的是同一市場中，所有公司市場占有率的平方和。若是一個市場中有兩家規模相同的公司，則 HHI 值是 5000。美國政府將 HHI 值低於 1000 者界定為不集中，1000-1800 則是「灰色地帶」，超過 1800 則是高度集中（參見 Levy and Setzer, 1984: 209）。（譯按：在已高度集中的市場，若再有兼併案產生，使 HHI 增加 100，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或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門幾乎一定會就此調查是否違反公共利益，再決定是否核可。另外，媒體市場的界定又比其他產品困難，原因是報紙、廣電等媒體在雙重市場運作，一個是廣告市場，另一個是讀者、聽眾或觀眾市場，二者差距很大，而後者又至少可以分作閱聽人的媒體使用時間及媒體的普及率兩種來計算。於是，關於媒體市場的集中測量，最少就有三種標準（但不是只有三種），以梅鐸在英國旗下的報紙與廣電媒體為例，這三個標準將產生數倍的市場集中度差異，造成梅鐸是否寡占了英國媒體市場的判斷，有了爭論。）

表 5-4 美國五十大使用傳播資源的公司，1994

1994 等第	1993 等第	公司	1993 年營業額 (百萬美元)
1	1	General Motors Corp.	135,696
2	3	Ford Motor Co.	108,448
3	2	Exxon Corp.	97,825
4	8	Wal-Mart Stores Inc.	67,345
5	4	AT&T	67,156
6	5	IBM	62,716
7	7	General Electric Co.	59,827
8	6	Mobil Corp.	56,576
9	9	Sears Roebuck & Co.	50,838
10	10	Philip Morris Co. Inc.	50,621
11	15	Chrysler Corp.	42,260
12	11	KMart Corp.	34,353
13	14	Texaco	33,245
14	13	EI DuPont de Nemours & Co.	32,732
15	12	Chevron Corp.	32,123
16	18	Procter & Gamble Corp.	30,433
17	16	Citicorp.	28,868
18	17	Boeing Co.	25,438
19	20	Amoco Corp.	25,336
20	22	Pepsico Inc.	25,021
21	23	ITT Corp.	22,762
22	21	Kroger Co.	22,384
23	25	Conagra Inc.	21,519
24	28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21,155
25	24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21,081
26	39	Hewlett-Packard Co.	20,317
27	NR	Allstate Corp.	20,228
28	27	GTE Corp.	19,748
29	29	JC Penney Co.	19,578
30	33	Dayton Hudson Corp.	19,233
31	30	American Stores Corp.	18,763
32	32	Cigna Corp.	18,402
33	31	Dow Chemical Co.	18,060
34	38	United Parcel Service of America Inc.	17,782
35	NR	Atlantic Richfield Co.	17,189
36	35	Aetna Life & Casualty Co.	17,118
37	41	Salomon Bros. Inc.	17,107
38	53	Motorola Inc.	16,963
39	51	Merrill Lynch & Co. Inc.	16,588
40	26	Eastman Kodak Co.	16,364
41	37	Xerox Corp.	16,193
42	196	USX Corp.	16,137
43	45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n.	16,053
44	62	Super Value Stores Inc.	15,937
45	44	Bellsouth Corp.	15,880
46	46	AMR Corp.	15,701
47	128	Price/Costco Co.	15,476
48	43	Safeway Inc.	15,215
49	40	RJR Nabisco Inc.	15,104
50	54	Sara Lee Corp.	14,580

資料來源：Information Week, October 10, 1994: 38.



(資料來源：IDATE, 1992: 44)

圖 5-2 美國傳播工業的結構圖

另外一種測量集中度的標準，採用比較周延的概念 (Wasko, 1984, 1994)，它仍然將市場納入考量，但將注意力延伸至產權集中之後，可讓相關公司利用它們在「一系列市場」的營運資源。再者，這個概念的分析對象，也從純粹的多量移轉到「多元」。比如，若是根據這個測量，則時代·華納的子公司曼哈頓線纜系統 (Manhattan Cable) 在市場上的力量，其實遠比它表面上的占有率還要高，這家公司是紐約市部分地區的有線電視供應者，它有辦法取用母公司各種不同的資源，從產品、財務到政治遊說力量，均可利用。因此，曼哈頓線纜公司與完全沒有這些背景的公司，根本就站在不同的基礎。但若是只專門就特定市場來作分析，它就與其他未有任何母公司聯繫的

譯註 1: 這家公司在一九九六年秋季, 又成為注目焦點。該年九月底, 基於競爭考量, 它違背口頭承諾, 表示即將在十月七日開播的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福斯新聞頻道」, 不可在其系統播放。主要考量就是它的母公司時代·華納剛好與福斯的競爭對手 CNN 完成金額達七十五億美元的購併案。顯然, 擁有紐約一五〇萬有線電視訂戶中一一〇萬戶的這家公司, 若是真這麼做, 將使福斯無法與 CNN 在紐約競爭。於是, 福斯的董事長梅鐸展開了報復行動, 手段包括在旗下報紙《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大力抨擊, 甚至以第二版整版嘲諷 CNN 的創辦人, 目前已是時代·華納副總裁的「Ted Turner 是不是又瘋又危險?」, Turner 也以辱罵回敬, 「這個狗娘養的 (son of a bitch) 梅鐸集團 ... 妄想控制整個世界 ... 這是正義與邪惡之戰 ... 以後我不要再提這個渾身找不出一塊好料的雜種」。梅鐸又威脅華納, 要將其節目與影片從福斯擁有的電視頻道中撤走。此外, 紐約市長已經提供稅賦減免, 促成福斯新聞頻道將總部設於紐約, 提供了紐約市一四七五個工作機會, 因此梅鐸告訴市長 Rudolph Giuliani, 若不能在紐約播放其頻道, 則這些工作不能保證, 市長於是轉而要求時代·華納以原來用在播放非商業之教育節目的頻道, 播放福斯新聞, 華納以此舉違反它與該市之契約而拒絕。市長則表示, 他將使該市審核線纜公司執照的委員會, 重新評量是否再給華納續約。與市長同屬共和黨的紐約州長 George Pataki 也加入, 呼籲華納收回成命, 共和黨籍的紐約州檢查長 Dennis Vacco 則對此展開反托拉斯調查, 準備向法院控告華納與 CNN 的董事長 Ted Turner 聯手阻止福斯新聞網的播放, 違反了反托拉斯法, 但在十月十三日, 市長要求華納播放福斯新聞前幾小時, 聯邦法院裁決, 華納仍暫時仍可播放福斯新聞, 理由是市長此舉違反聯邦法律, 形同要控制有線頻道的內容, 它說, 紐約市政府擁有的五個頻道「極為珍貴」, 應為公眾使用, 不是市長支配。華納與梅鐸兩造的訴訟, 有人認為會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但亦有人指出, 即便如此, 雙方最後還是會「共謀而不是抵觸」(colluding rather than colliding), 因為華納需要梅鐸的衛星傳輸系統, 而梅鐸需要華納廣大的片源(以上說明, 參考 Economist, 1996.10.12: 99; Guardian 1996.10.10: 20/ 10.14: 14; Independent on Sunday, 1996.11.24:15)。

分殊公司，完全一樣（譯註 1）。再者，這個較周延的概念對集中的分析，也能夠讓我們不再只就純粹的數量打轉，而能夠注意到這些數量再怎麼多的頻道，是否提供了多元內容的問題。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會察覺，在一個特定市場裡，儘管只有一家公司壟斷線纜電視的產權，但它同時卻在其許多不同的頻道中，提供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那麼，它所構成的集中度，應該小於以下情況：特定的一個市場，雖然擁有不同產權的多家報紙，但其觀點大致雷同。主張採取較周延觀點的人承認，測量這些集中形式是有困難，但他們也論稱，較為狹隘的觀點，只集中在市場占有率指標的建立，只能提供一種機械式的、不足夠的集中度溫度計^①。尤有進者，他們又論稱，若是採取較為狹隘的觀點，那就無法達到擴大使用最大範圍之資訊與意見的目標，而這正是分析市場集中度的政策目標。

麥勞林與安托諾夫 (McLaughlin and Antonoff, 1986) 把傳播科技及勞務的變遷，放在整個經濟體的變遷脈絡之內，然後加以檢視，重新提出了一份傳播產業的空間圖譜。他們創造了一系列圖譜，以產

① 正統經濟學家認為，由於較周延的多元性觀點，容或甚有價值，但因為這個觀點無法實證地測量，因此他們也就不願意採用。他們偏向將競爭者的數量及節目的多元等同看待，又將生產的品質與節目預算的大小，等同看待 (Owen and Wildman, 1992: 146)。

〔譯按，將多量等同於多元的正統經濟學看法，雖然歷經旁人抨擊，但他們無動於衷，這在以下這段話，表現得簡潔淋漓，

「沒有什麼證據顯示英國的媒介缺少多元觀點 六百多家報紙，將近八千家雜誌 代表了我們所可以想見的各種利益與觀點」 (Shew, William B. and Stelzer, Irwin M., 1996, 'A policy framework for the media industries', in Beesley, M. E. (ed.), *Markets and the Media: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p.112 in pp.109-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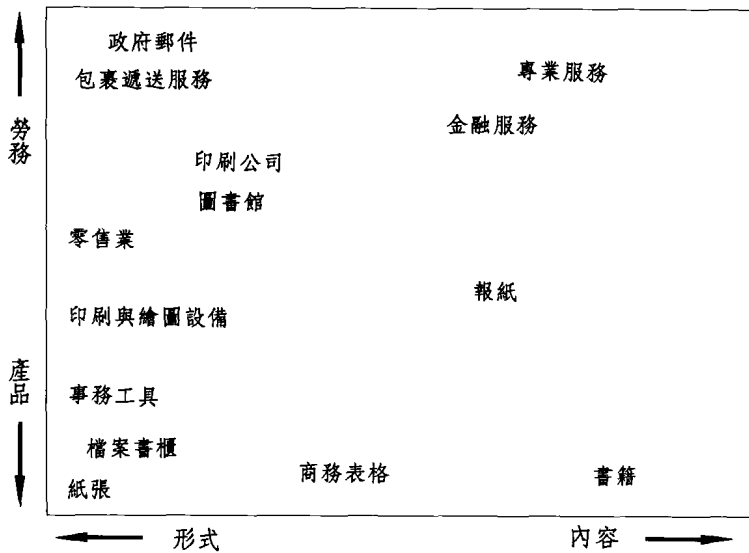


圖 5-3 一七九〇年的資訊產業 (McLaughlin and Antonoff, 1986 :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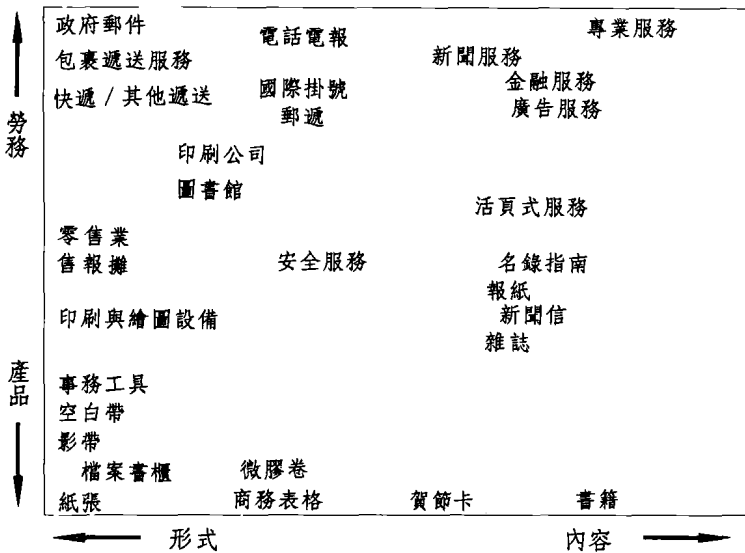


圖 5-4 一八八〇年的資訊產業 (McLaughlin and Antonoff, 1986: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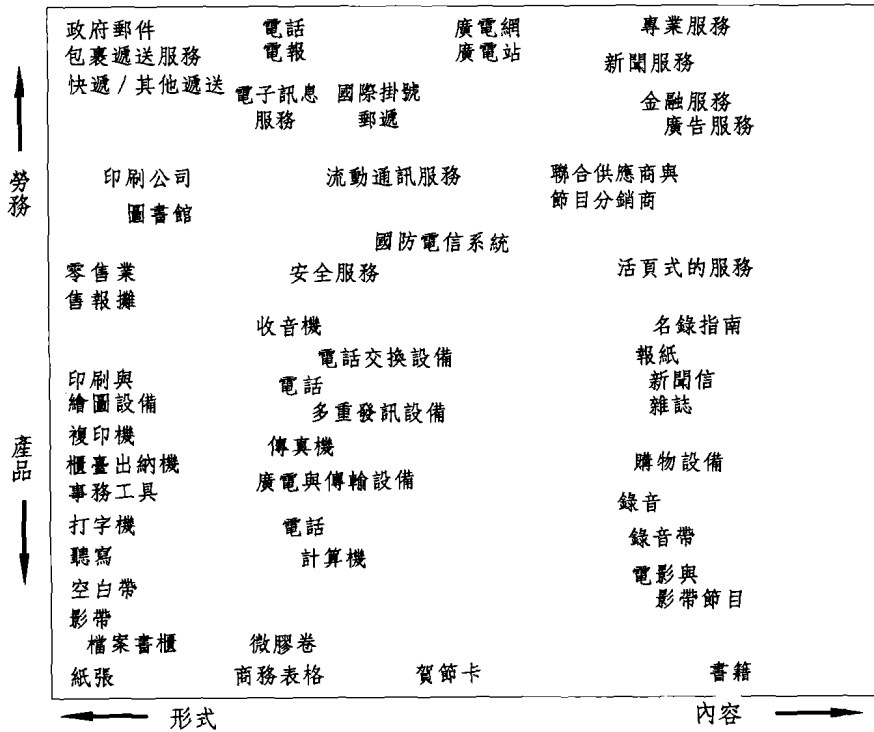


圖 5-5 一九三〇年的資訊產業 (McLaughlin and Antonoff, 1986: 20)

品與勞務作為一個軸線，另以形式（通路）與實料（內容）作為一個軸線（參見圖 5-3 ~ 5-6），並以此區分為本，譜出資訊產業的多種變化。誠如他們的歷史鳥瞰所示，成長的主要來源是在圖譜的中心，此際的產品與勞務，通路與內容聚合了。博特更為野心勃勃，他擷取了社會網路的分析取向 (Burt, 1992)，擬出了美國經濟體的類型圖譜，想要決定商務活動的群集類型，他的區辨原則，主要是強調產品的有機與非有機成分，以及強調該活動所使用的科技是新或是舊（參見圖 5-7）。相當有意思的是，博特的主要結論之一 (p.88) 是，使用《美國當前商務調查》(the U.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輸入一輸出表格而製作完成的這份圖譜，一九六〇年以來，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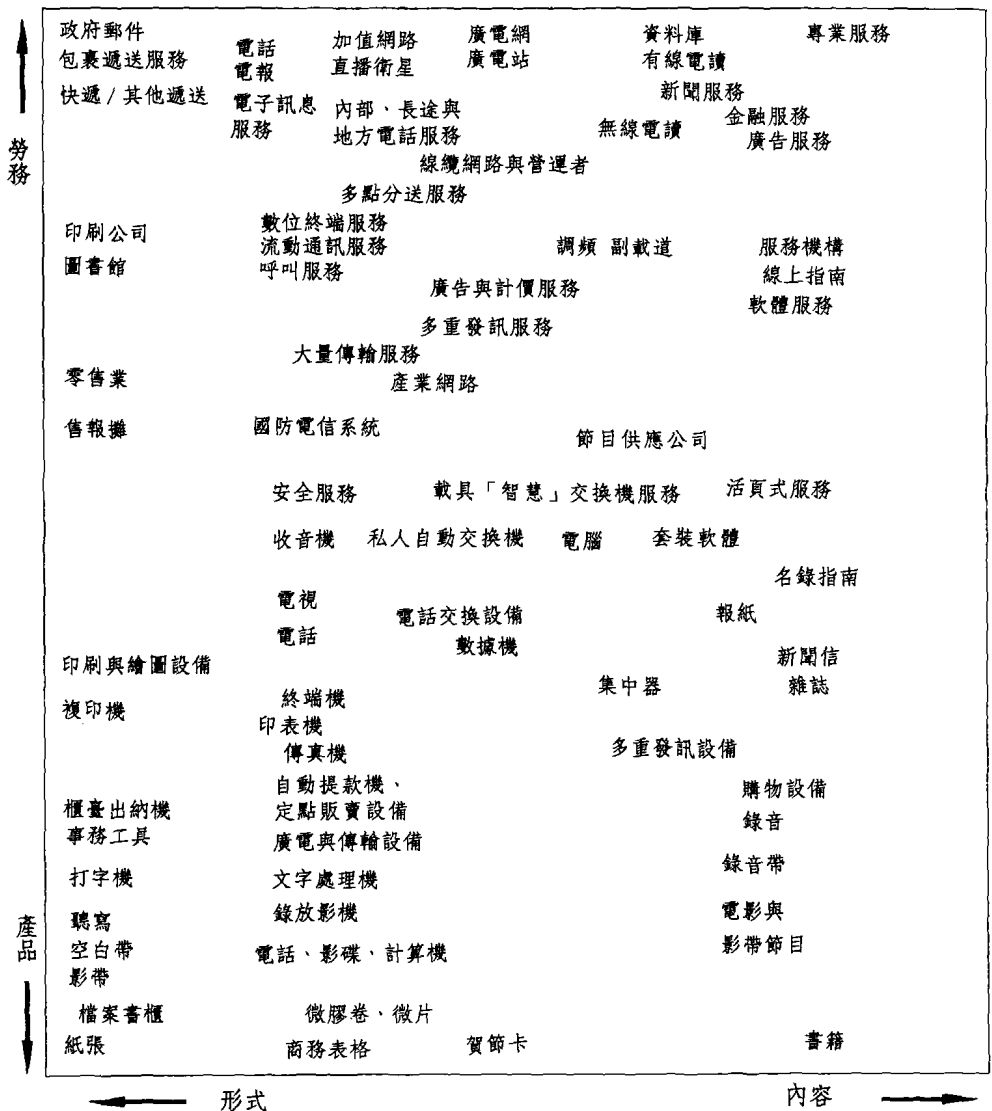


圖 5-6 當前的資訊產業 (McLaughlin and Antonoff, 1986: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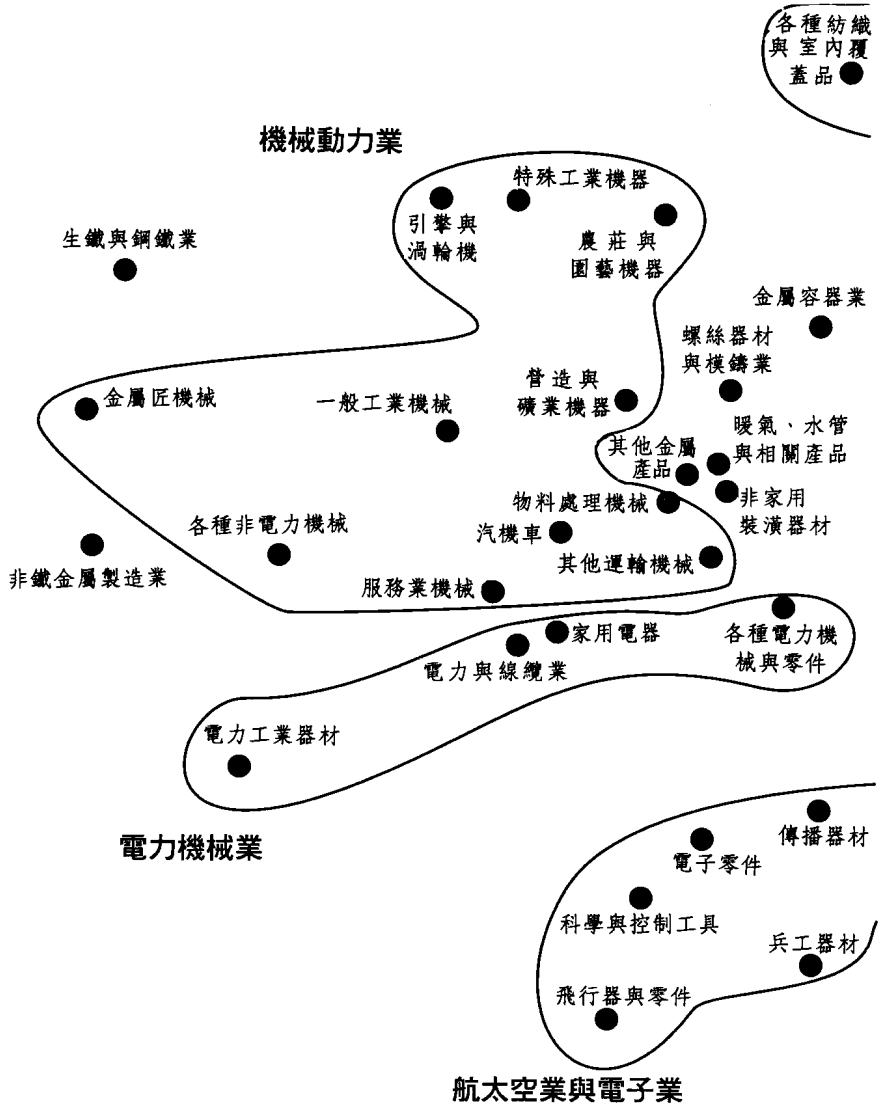


圖 5-7 美國經濟的拓模圖 (Burt, 1992: 8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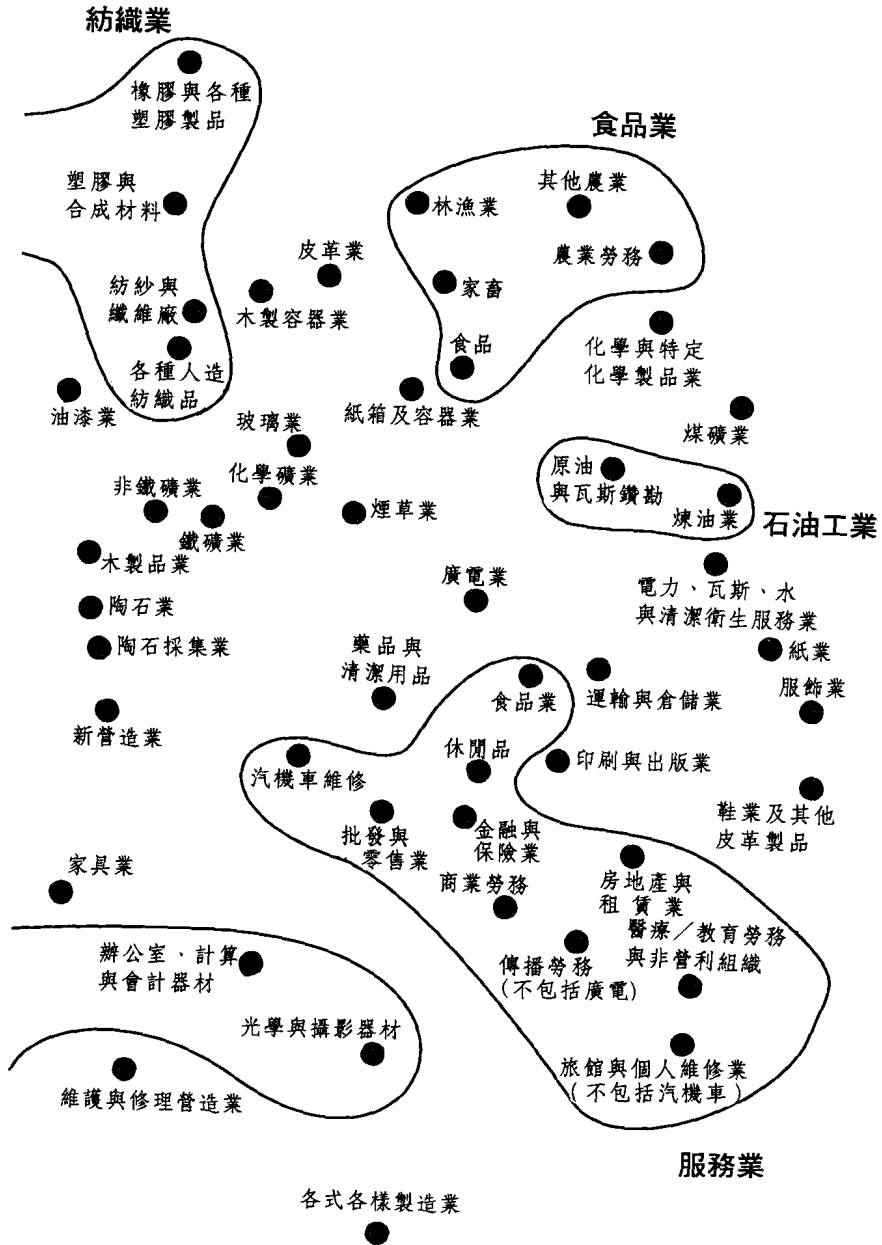


圖 5-7 (續)

相當地穩定，唯一的例外是「圖譜底端出現了不穩定的袋口，原因是過去二十年來，有關政府丈量、電腦及傳播設備市場的各種報告文書，有了改變」。

不過，這些取向雖然不同，但以上周延或狹隘的集中觀，主要的焦點都在產權，它們都把產權當作最主要的測量基準。主要的一個例外是較周延的觀點，亦對「企業集團的董事會」(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進行分析。這個取向檢視的不是誰擁有媒體，而是將負責經營這些公司的主要人士關係，納入其圖譜考察。雖然各公司規範董事會運作的內規，因地而異，但大多數公司所執行者，都是透過選任最高的管理階層，包括選任最高執行主管與決定主要的預算分配（如資本支出與樽節，包括了蓋新廠或關舊廠、辦公室等）。理論上董事會由股東大會選任，但實際上，董事會本身通常都能自行決定本身的組成。董事會的大小與公司的規模及經營多角化的程度有關，通常介於十五至四十位。在董事會之內，主要的分別是「內」董事（通常就是本公司經營管理階層的部分）與「外」董事（通常是其他公司的執行主管，但也可能有部分由市民團體象徵地代表）。比如，以一九九一年為例，時代·華納共有三十五位董事，其中二十三位是公司主管。外董事主要是金融與其他產業公司的主管，包括全錄的董事長以及 IBM 的執行委員會主席 (Dun's Marketing Services, 1991) ⑩。

企業集團董事會的研究，想要檢視的就是董事所具有的共通信託關係，如何串連成形。分析家區分了兩種串連形態，一種是「直接串連」，兩家公司經由相同一人產生聯繫，此人既是此公司的主管，又是彼公司的董事；另一種是「間接串連」，兩家公司的聯繫，是因為

⑩除了各公司年度報告以及《鄧氏指南》(Dun's Directory) 以外，《標準暨普耳公司名錄》(Standard & Poor's Register Of Corporations) 也是絕佳的公司董事資料的來源。

雙方都有人是第三家公司的董事。IBM 與全錄均直接與時代·華納串連，他們均有代表出席董事會，直接分擔時代·華納的績效責任。IBM 與全錄彼此也間接串連，因為二者都有人擔任時代·華納的董事。這樣看來，媒體集中度是增加了，因為在相同市場競爭的公司，共同為績效負責。分析董事會運作的人，研擬了若干嚴格的標準，運用了共通的統計手段、網路分析與矩陣代數 (Burt, 1992; Scott, 1991)。這類分析的核心論點是，董事會結構的重疊，使得相關公司的代表，得到了既是密切合作的機會，也是密切合作的責任，而這些公司又有些原本應該是互為競爭者 (Coulter, 1992)。

此外，社會科學家也結結實實指認，並提出了證據，說明精英集團互動與計畫的機會，更會在董事會以外的地方進行 (Clement, 1975, 1977; Domhoff, 1978, 1990; Useem, 1984)。這些地方包括私人俱樂部、協會與專業組織，它們都是階級權力的交叉集結力點。不過，在所有這些精英權力輻輳的地方，董事會仍然最為重要，因為在現有法律體制下，信託關係已經責成相關成員彼此負擔責任。時代·華納董事會提供給 IBM 的歐配爾 (John Opel) 與全錄的肯斯 (David Kearns) 的機會，並不只是碰面討論共同關切的議題。他們與同為董事會成員的其他所有人，都負有法律責任，代表時代·華納而行事；其次，若是我們強調間接串連的重要性，我們亦會發現，這些董事也為彼此行事。正就是透過這樣的過程，集中具有了更為細膩的肌理，相關公司此時的合作與計畫，是機會，也是義務，各自的歧異於是化減了，競爭也紓緩了。這樣的肌理包括了許多日常接觸與互動，於是就授予集中一種「霸權」的性質，運用這個權力的人，就認定這是自己天經地義的權利 (right) 了。

最近另有些研究在分析集中的問題時，儘管仍然深刻瞭解產權的重要性，但已將觸角延伸至企業集團的互動形式，探討它們在並沒有真正合併的情況下，如何構築強大的關係。這些形式包括一系列的「團隊協議」，如為了特定計畫而採取「集團合資」或「策略聯盟」，

192 這個計畫可能是媒體合資製片或共同開發新科技¹⁸。它們也可以是「重商協定」(merchandising arrangements)，媒體公司透過這個手段與行銷及配售公司產生串連¹⁹。這些實務行為並不是企業集團的新作風，也不是媒體公司的新玩意，但近幾年來，它們是愈來愈普遍了。更為頻繁的部分原因，是爲了空間化的過程，讓公司在一個特定時期（如某項計畫進行的期間），能夠重新結構內部營運程序，並重新結構其外部關係，但又不虞本身會發生組織的解體，而以前則會發生這種情況，會使這些協定無法推動。不管這些合作計畫是否成功，相關公司還是能夠再作構成，繼續執行它們的主要商務活動。還有，它們能夠同時既合作又競爭。

不過，我們在這裡倒要指出，用來瞭解這些發展趨勢的用語（比如，「融合」 synergy），不僅只是有其分析用途，同等重要的是，

¹⁸ 剖歌瑞 (Pogorel, 1991: 104) 認為開發新資訊與傳播科技 (NICT) 時，採取策略聯盟具有很大價值，他如此辯護，（譯按：下段括弧內文字為譯者所加）：

（開發）NICT（的公司）偏愛（將其風險）「外部化」，最佳的例子是晚近幾年來「策略聯盟」的風行。這就顯示了市場機能與（中央）科層（計畫）之間，另有其他形式的存在；這也顯示了 NICT 的作用力，可以提供快速的、立即的，同時也是很有想像力的答案。一方是科層體制（只會擴大不會縮小，並且永久長存），另一方是急速變動的市場（無從預測、交易發生在瞬間），但在二者之間，存在著各種可能的結合方式。

賴西 (Reich, 1991: 91-94) 討論了許多策略聯盟的類型，包括了獨立利潤中心、spin-off 合資、spin-in 合資、授權與純捐客功能。

¹⁹ 誠如華思寇 (Wasko, 1994) 所說，重商行銷 (merchandising) 是根據取得版權的產品，然後以機械方式加以製造與銷售產品。授權 (licensing) 則是法律過程，擁有商標權的人或公司，從使用該商標、仿效或形象的人或公司，取得權利金。

它也被拿來當作公共關係之用。因此，就像策略聯盟或融合等字眼，固然有其修辭上的分量，卻也同時指示了不同的意涵¹⁵。若是按照字面上的純粹意涵，策略聯盟是指兩個以上的公司，或是這些公司之內的特定單位，在沒有產權變化也沒有相互投資的情況下，共同執行一個以上的計畫。聯盟可能採取聯手創造一家新公司，雖然這並不很必要。媒體合資製片協定就是純粹形式的一個絕佳例子。在經濟壓力驅使，並有較低生產成本的誘導下，這個形式的聯盟大有成長，支配了歐洲影帶及電影的攝製¹⁶。國際聯盟的流風，同時也影響了先前自成王國的美國製片業。比如，一九九一年，時代·華納的電影部門華納與歐洲最大的私人廣電業者之一，Canal+（譯按：一九八四年在法國政府主導下成立），簽訂合約合製二十部電影，第一部作品就是票房滿貫的《JFK》（甘迺迪）。以這個例子來說，華納與Canal+簽約聯合製作一項特頂產品（二十部電影），但彼此並沒有股權交換，也沒有在此之外，再附帶任何協定。這類活動也在新傳播科技的領域進行，比如，兩家競爭激烈的廠商，IBM與Apple電腦公司也已經形成策略聯盟，聯手開發新世代的組件，如「超強個人電腦」系統。

有些時候，這些有限的契約協定會以新公司的形態出現，若是如此，這個聯盟就更具實質意味了。最近幾年來，這個形態的最重要例子，乃是時代·華納（全世界最大的育樂公司，同時也擁有全世界最

¹⁵ 許樂認為 (Schiller, 1993)，「融合」是一個光鮮的字眼，表示企業集團控制了整個消費形像與產品。華思蔻 (Wasko, 1994) 則擷取米罕 (Meehan) 的「文化基金」的概念，她說文化融合就是這些公司所產製的各種文化形象，多所重疊。

¹⁶ 史駝佛 (Strover, 1993) 說，一九九一年英國製作的五十四部電影當中，二十一部是跨國合製，另有七部完全是外資。法國與四十五個國家簽有合製協定，一九九一年幾近一半法國電影是合製。

大線纜電視系統之一）、電信傳播公司（Tele-Communications, Inc.，世界上最大的線纜電視公司）及微軟公司（世界最大的電腦軟體公司）的聯盟，它們企圖設定新世代互動節目的標準，大抵經由線纜電視系統來完成。最後這個聯盟創設了聯合控股公司「軟線纜」（Cablessoft），負責經營管理聯盟事宜，並負責系統的統籌。另一個例子是兩家最大的電信公司，美國的 AT&T 及日本的 NTT，加上三家消費電子廠商新力、三菱與飛利浦，然後再加上蘋果電腦及摩托洛拉（Motorola），又籌組了「通用魔術」（General Magic）公司，它想創設高級的、互動的產品，結合不同科技，取用電子資訊以進行傳播。再者，高畫質電視系統的開發，也讓原本在全球世界中競爭的廠商，齊聚結盟，報紙稱之為全球廠商的「盛大聯盟」，包括了美國的 AT&T、通用電子、增你智，荷蘭的飛利浦與法國的湯森（Thomson），以及其他廠商等等。以上所舉，就是電信公司、線纜電視公司、娛樂集團，及電腦公司聯手的較為重要之例子，它們企圖利用它們既有的立場位置及技能，在一片憧憬科技聚合的前景聲中，製造特定產品。這些例子值得注意，並不只是因為它們貫穿了不同科技部門，更是因為它們讓先前激烈競爭的廠商，相聚共事。

「策略聯盟」這個字眼有時也另有含意，指的是此公司購買了彼公司的若干股份，但不一定是達到控制比例的股份。最知名的例子有以下數端。一九九二年，AT&T 宣布將購買麥高行動傳播公司（MacCaw Cellular Communications）三分之一股票，金額是三十七億三千萬美元，它的企圖是要重新進入美國地方電話市場。一九九三年，電信公司「美國西部」（U.S. West）同意蒐購時代·華納公司某子公司的四分之一股權，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則購買了美國 MCI 傳播公司百分之二十股票，花了四十三億美元（譯按：這兩家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年末宣布合併，英國、美國與歐洲聯盟主管競爭及反壟斷的機關，至一九九七年四月尚未決定是否核准）。並不是所有兩造或多造都想合併的案件都能如願以償。一九九三年，美國

原貝爾電信巨人分出的地域電信公司貝爾·亞特蘭大 (Bell Atlantic) 宣布計畫將與美國最大的線纜公司「電信傳播公司」(擁有一千三百萬訂戶, 並持有 CNN 的 Turner 廣電集團與線纜購物頻道若干股份) 合併, 涉及的金額是一百二十億美元與九十六億的公司債, 但這樁原本會是美國傳播史上最大的合併案, 並未得到許可。不過, 大的沒有成功, 另一些合併案還是完成了, 包括電話公司耐內斯 (Nynex) 與電視節目製作公司維康 (Viacom) 以十二億美元合併, 南貝爾 (Bell-South) 與電視購物公司 QVC 以十五億美元成交, 西南貝爾 (Southwestern Bell) 與線纜公司寇克思 (Cox Enterprise) 以十六億美元終結。

最近這一波媒體合併與聯盟的浪潮, 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家公司都急於利用硬體與軟體的系統合流, 想要藉此控制整個生產、分配、展示或映演的各個主要環節。更特定的目標則是, 這些廠商都想要在娛樂與資訊網路 (時人婉轉稱之為「資訊高速公路」) 的重新建構過程, 讓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參與者。比如, 一九九五年, 時代·華納同意支付七十五億美元, 蒐購它還未買進的另外百分之八十左右的 Turner 廣電集團。西屋 (Westinghouse) 以五十四億美元買了哥倫比亞公司, 迪士尼則花了一百九十億買下 Capital Cities/ABC 集團。這些與其他兼併案例又將壟斷的幽靈拱了出來, 達到了新的高峰, 以致於最後或許只會有一家或少數幾家整合完成的集團, 可望實質地控制傳播、資訊與娛樂的生產及流通¹⁷。另一方面, 也有人懷疑, 真會有足夠多的家戶願意花錢使用這些設施嗎? 這些動輒涉及數十億美

¹⁷ 擔心這個趨勢的人, 創設了非營利團體的聯盟, 其中的領導之一, 「媒體教育中心」的切斯特 (Jeffrey Chester) 就說, 「除非社會大眾大聲表達憤慨、除非這成為流行話題, 我們無法阻止這些壟斷媒體控制我們通往家園的路」(轉引自 Aufderheide, 1994: 21)。

元的投資，真划得來嗎？這些新合併的公司又真能將不同的部門，完善調整在相同架構，平順運轉經營嗎？(Miller, 1994; Ries, 1993; Tierney, 1993) ¹⁸。

195 企業集團的勢力網路也可能採取重商協定，各家公司透過這個方式結合，一起行銷特定的媒體產品，可能是一齣劇情片，也可能是體育明星。這些協定並不是廣告活動向傳播工業的擴張，比如，並不是在劇情片或影帶內夾帶特定產品的廣告，也不是用與電影無關的產品來搭售特定影片。在重商協定的時候，媒體公司授權另一家公司使用它的媒體產品的名字，然後取得授權的公司再用此名字創造註冊商標的產品。比如，環球影業公司及製片人史匹柏(Stephen Spielberg)就為大賣座的《侏儸紀公園》這部電影，創造了這麼一個網路，結果共有一千種商品附加了這部電影的註冊商標。這些主要的附加商品，計有麥當勞速食店¹⁹、選擇連鎖旅館(Choice Hotels)及任天堂等所簽訂的合同，也有唇膏、泡沫澡、恐龍蛋糖，以及床單等等許多東西²⁰。

體育運動是重商協定當中，發展最快速的一個。透過一系列契約協定，並由主要的廣告／經理顧問公司運作，運動選手在其聯盟同意之下，運用在各種媒體所小心翼翼營造出來的形象，創造了獲利豐厚的行業，一九九二年它的整個產值是一百二十一億美元(Wasko and Philips, 1993)。有十二位運動明星賺了五百萬美元以上，其中

—————

¹⁸ 當時是AT&T貝爾實驗室執行主管的賴其(Robert Lucky)，說出了懷疑者的心聲，他說，「這些商務活動根本不是全球聯網這回事，它是在私人網路上進行的。每家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專用網路，因為這才是通訊最為繁忙的地方。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通話，均在這些小小的孤島之間進行」。若是真要全球聯網使每個人都能使用，「你就必須設置網路，讓千千百萬萬人上線，而這些人才只不過是所有通話量的百分之五」(Wright, 1990: 93)。

前籃球明星喬丹最多，二千五百萬。喬丹背書的公司，包括了耐吉、Quaker Oats、Gatorade、威爾森體育器材、Sara Lee、雪佛蘭、General Mills，麥當勞與許多其他較小的公司。除了這些直接聯繫以外，舉凡播放他的球賽、他的聯盟、全美國籃球聯盟，以及他的屋主芝加哥公牛籃球隊的電視網（主要是全國電視網，以及一家全國衛星「超級電臺」），都有他的身影，也都成了他的寶庫¹⁹。

這個新形式的策略聯盟讓相關公司簽訂契約，協調合作，但卻不涉及全部或部分的股權買賣，可以說是開創了企業集團實務的新天地。但在傳播工業史上，先聯盟而後導致其中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情

19 麥當勞在此過程扮演的角色，牽引出了一些問題：到底重商協定會對媒體產品帶來什麼影響？稍前它簽訂了《蝙蝠俠續集》(Batman Returns) 的促銷協定，但很多人都指出，該片太過血腥，麥當勞拿來搭售它自己的產品，違背它的利益，後來在簽訂《侏儸紀公園》的搭售協定前，麥當勞就要求先瞭解更多一些內容才願意簽約，MCA 也就合作了，於是提供故事劇本讓麥當勞主管過目，麥當勞最後決定只選擇成人套餐作為搭售，放棄了青少年「快樂餐點」的促銷 (King, 1993)。

贊助與媒體之間有些什麼關係，很難論定。不過，我們若是比較小說原作予以改編之後的電影，看看螢幕與小說中，創造侏儸紀公園的億萬富翁的不同，就可以發現相當有意思的改變。原作者克里燈 (Michael Crichton) 筆下，富翁這位讓人渾身不舒服的資本家，遭遇的是暴力的結局，電影裡面，我們看到的是慈祥和藹的老人，領悟了貪婪之心不可有，並沒有遭到他自己創造的恐龍之天誅。

20 每當思及跨越產業的這些聯盟關係，就油然讓人想起，這些錯綜複雜的聯盟，到底生產出了什麼產品。一九九二年，日本的三菱集團參與了一個跨國聯盟，設置了 3DO 公司，這家公司的目的是要生產軟體，也就是新世代家庭互動娛樂節目，而三菱則要是想要開發數位硬體設備以供這些軟體使用。但當時三菱公司已擁有拍攝《侏儸紀公園》的 MCA 片廠，它又替 3DO 系統製作了《侏儸紀公園》軟體。同時，三菱又在全日本掛上它「國際牌」商標的二萬四千家經銷商店面的所有電視機，展示了這部電影的預告片。

況，並不新奇；再者，貫穿不同產業或科技部門的聯盟，也無足為奇。其實，電子媒體史上，最大公司之一，也就是美國無線電集團(RCA)的締造，當初就是先有策略聯盟而後產生的。RCA在一九二〇年代成立，由電子媒體早期發展史上的主要集團，基於聯盟關係而形成：AT&T、西屋、通用電子，以及聯合青果公司(the United Fruit Company，投資大筆資金設置無線電通訊網路，聯絡它在美國及拉丁美洲的營運)。一九六〇年代，AT&T、RCA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三者形成策略聯盟，創置了「美國傳播衛星公司」(the U.S.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Corporation, Comsat)，日後創造了以美國為領導中心的全球衛星體系。以上這些例子絕非例外，它們來自大致相同的或是相當不同的傳播科技部門，但都是傳播工業不同領域的主要角色，它們的聯盟也都締造了成功的案例。

RCA與Comsat的例子很清楚地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動態過程，歷來如此，並無特別殊異之處。誠如維能(Vernon, 1992: 16)所說，當今的聯盟實例，相較於當年彼此競爭的煉油商及行銷商(如沙烏地阿拉伯的ARAMCO、祕魯的南祕魯銅業公司，以及幾內亞的HALCO)聯合擁有油田與礦廠，功能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包括商業界結構轉變的變遷，從來就是不時在進行。不過，當前重新結構的浪潮，是有許多面向顯示，它與既定的結盟類型，有了差別。第一，我們應該可以說，無論是就時間或就空間來說，它都在加速進行。企業集團重新結構、正式與非正式結盟與分裂過程的速度，都在快速運轉，愈來愈不穩定。在維能看來(Vernon, 1992: 16)，這正是當前



- ④ 網路連結的多重性，固然讓許多涉及的單位得到和諧共處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得使用產品(在這裡就是運動員的形象、身影)的權利，可能因此發生更具爆炸性的衝突，比如，喬丹與NBA的球衣爭議，花了一年才平息，NBA保留了控制喬丹形象的權利。

與過去聯盟類型的主要分野：

在科技快速變遷、市場迅速轉換的工業，任何公司賴以結盟的利益，相對來說，也就愈不可能穩定：這些公司因此將會不斷抽身與重新結盟，以此符應快速轉換策略的需要。

再者，這類活動的空間集結，如今面對的限制，少了很多。先前的聯盟很少跨越國界進行，如今跨國聯盟已經稀疏平常，無論是純粹的聯盟形式（如合資製作與簽約協定一起推動某項計畫），或是種種形式的產權聯合（可能是創設新公司、在另一家公司取得重要位置，或是完全的併購）。

除了以上所說的分野以外，國家角色也大幅度地改變了。稍後我們還會以更多篇幅討論這個主題，但這裡需要先強調國家活動的顯著變化。固然因為國家及其歷史情境的不同而有差異，但總體來說，以前的國家在傳播產業的結構轉變之過程，占有的角色與現在，很不相同。這是因為傳播工業與其他許多經濟部門不同，完全由國家擁有，或者，若非如此，則亦與廣泛的國家功能，緊密結合，國家預算的分配過程、政策監督及規範的過程，緊緊地卡住了傳播產業。容許我們再回到 RCA 的例子，它能夠進行策略聯盟，是因為有美國政府的完全參與，這是當時美國在不擁有收音機產權前提下，最低限度地參與，政府與開了董事會及經營管理層次的決策與事務。與此相似，美國政府當時威脅要完全擁有 Comsat，除非前舉公司形成聯盟，結果不僅是這家組織要由政府規範，而且政府也有代表加入董事會。我們還應指出，直到現在，國家擁有傳播設備並提供傳播勞務的情況，還是普遍存在，特別是在電信與廣電部門，雖然國家的角色已在減少。還有，雖然國家在跨國聯盟的過程，還是扮演特定角色，如規範合資協定，但這也已在改變。如今，無論是在本國之內或跨越國界，更典型的情況是相關公司自己直接協商。現在的國家還是會介入，評估是

否有反托拉斯的情形，或評估對貿易的影響，但現在的國家採取的作法，更可能是鼓勵這類協定，不是規範它們或者入股參與。在以前，策略聯盟之所以出現，一度是國家政策的「意定工具」之結果，如今則是企業集團的政策使然，它們以此擴張，找到合夥，一起集結專業技術並分擔風險。

再者，當前明顯的趨勢是，這些聯盟都傾向於將最主要的傳播資源「使用者」，納進其組織。我們得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傳播工業史上，這個形式的聯盟以前就已經存在（聯合青果公司參與 RCA），但最近幾年來各種策略聯盟所涉及的企業集團用戶，尤其是銀行、投資公司與其他大型集團，足以說明以前偶一為之的實務作風，現在已經是常態。業務範圍在傳播產業之外的公司，由於深刻認知傳播與資訊科技對於它們的成長及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也就運用自己的力量，以及大型用戶組織的集體力量，引導傳播工業的發展方向，創建高品質而低成本的網路與服務，以求符合它們的利益。傳播工業的空間化過程，涉及了愈來愈多的大型用戶，這就顯示權力移轉已發生，傳播產業的核心，已有許多新進的參與者，加入傳統的生產及分銷的硬體與服務公司。主導這類新進參與者的主導是金融服務業，但也包括了愈來愈多的傳統工業要角（如通用汽車公司）、零售商（如 Sears），甚至資源公司，如水力及能源整合公司，傳統上它們的業務就是將能源流通的空間納入特定結構，如今則將此專職技能，用來經營傳播流通的空間。除了這個重要的權力移轉以外，這個進展也重構了傳播工業的版圖，以前偏向高度分化的部門，其界線與其餘經濟的產業部門，很容易就可以分得清楚，現在則是愈來愈逆轉分化，或說整合於更大的經濟部門，結果是各部門之間的界線，日漸難以劃分。傳統上消費服務的部門，現今卻變成重要的生產者，我們從私人資料網路、內製影帶服務 (in-house video services)、即時庫存系統控制等等許許多多快速成長的商業活動，就可窺知。最要緊的是，傳統的產品類目，以及相應而生的法律、規範及政策機關，都在解體中。美國與日

本公司的差別何在？電話公司、線纜公司與電腦公司的分野何在？生產者又怎麼與消費者區辨？在我們往全球「電子服務市場」移動時，所有這些分際也正在隨而消失^②。

這些發展是在更大的過程中進行的，企業行號採取了「新的組織結構」，結合了兩種能力，一方面掌控資源，他方面又能彈性地回應市場的變遷。經濟地理學家哈維認為（Harvey, 1989: 147），這個形式的重新結構，「必須要依賴勞動過程、勞動市場、產品及消費類型，都能具有彈性空間」。這也就導致了「完全新穎的生產部門、提供金融服務的新方式、新市場，以及最重要的，商業的、科技的與組織的創新，更是密集地進展」。最後，哈維將這整個變化所造成的情景，稱作是新一回合的「時間—空間壓縮」——決策所需要的時間縮短了，因為運輸與成本的下降，使得公司能夠將決策推向更廣闊更多樣的空間。經濟的重新結構有些時候會創生更大的企業集團，但這並不是成功的主要條件。更重要的是，企業集團若要成功，就必須使自己的結構更有彈性，能夠快速地轉成新的，滿足已經在變化的需求。

總結地說，若要重新思考政治經濟學，就須體認，雖然企業規模與集中均很重要，但這只是瞭解傳播產業轉化的起點。全球性的轉化製造了許多的機會，使得資本的控制，可以由集團聚合體的形式，移轉到具有更大彈性的不等方案。其間，主要的條件是資方要能保有生產、分銷與交換核心點的控制（擁有百分之百的產權只是許多形式之一），但同時要保有彈性，回應市場與科技狀況的轉變。

由於企業集團與空間結構的變化，致使有些分析家就認為，產業所占據的空間，版圖既然已經重劃，則對它的詮釋，亦應不同。策略聯盟與其他形式的產業連結，年來大有增加，它們在不涉及產權改變

②或許，由於媒體公司在新的現實面前迷惘了，因此它們也就傾向於抓緊舊有的類目，這也造成媒體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

的前提下，甚至在不需要有顯要投資的情況下，就能發揮大的作用，這就使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傳統的集中問題之研究了。公司規模與市場控制，依舊是重要的集中指標，但企業集團的重新結構，卻也創造了另一些集中形式，它們的特徵，在於依賴生產者、供應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緊密連結網路。索價 (Soja, 1989: 185) 認為：

企業聚合產權形式的形成，更為依賴科技，唯有這些科技才能整合各種分化的產業、研究與服務活動，使它們類同地重新納入勞資系譜，並發展成為四處擴散的空間生產體系，它們又與決定資本動向的行政權力中心連結，使中心能夠決定資本如何投入各平行的分支、子公司、外包的公司，以及特定的公營或私營勞務部門……這些生產體系的空間範圍已然具有全球屬性，但這些體系卻也具有強大的都會化效應，因為它們也在本地重新將許多新的工業體聚合在一起了……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了似乎很弔詭的地景配對，一方面是解除集中，再方面卻是重新集中。

促成我們重新思考產業集中問題的動力，除了是因為企業集團本身已在重新結構以外，產業活動趨向類型化空間的發展，也是因素。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原先甚囂塵上的說法，預測了電信發達以後，必然促使商務活動分散化；但剛好相反，商務活動其實還是集中在紐約、倫敦、東京及其他國際大都市，這個現象就讓我們思考，空間聚合 (spatial agglomeration) 是商務活動的一個主要形式。晚近人們對地理學的興趣再告復甦，最主要就是注意到了經濟重新結構與空間聚合的浮現。雖然所有社會科學都注意到了這些發展，但它們對地理學的影響，卻最為突出，地理學現今處理的議題，都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包括了空間結構與資本積累、階級、性別與種族的關係（特別參見 Castells, 1989; Harvey, 1989; Massey, 1984; Sassen, 1991; Thrift, 1987）。

透過空間化的研究來分析媒體集中，可以說是新陣地的開拓，有

其價值。空間聚合就如同產權聚合，都是商務集中的重要形式。空間聚合也就是將各種公司齊集，生產者、供應者與消費者透過密集網路相互依靠，地理上既彙集於全球性大都市，但又經由電子形式而分散在全球多個處所，它展現了經濟權力集中化的重要形式，但應注意，這些公司的產權是否互有關聯，都不減損此形式的存在意義。這個發展對於傳播與資訊工業尤其重要，因為它們是生產者勞務部門的核心，當今空間聚合能夠實現，主要端賴這個部門。傳播與資訊過程，以及傳播與資訊工業，可以說是全球政經情勢得以從經濟面，重新結構化的根本要素：經濟權力集中化，崛起於商務的空間聚合。

關於空間聚合的研究，與較為傳統的媒體集中的研究，有個共同點，二者都想在動態經濟體之內，檢視動態產業的方式。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得說，歷來的產權研究，偏向於按圖索驥，想要將某產業之內的集團權力，掛連、映射在對應的社會場域。不過，這兩類研究都對國家投注了心力，二者都認為，國家要不是會對企業集團的權力有所反應，就是會對交叉壓力有所回應 (Mosco, 1995)。

我們有豐富的證據，認定當代的國家機器不僅對企業及產業結構變遷，有所反應，我們還可以指出，當代國家機器亦對科技與勞務的變遷，有所反應。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們也有證據，足以認定國家機器不只是反應，國家還以積極主動的法律、規範及政策導引，促進了這些變遷的發生。事實上，我們是有足夠的證據，大可再據此而有以下結論：政治經濟學若是更加強調「政治的」，必有裨益，我們可望因此注意到國家的「構成的」角色，而不只是注意到國家面對傳播工業的反應角色。這個正確的認知建設，卻很難達成，因為論及國家在傳播工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來自政策制定者的語言，在他們修辭的架構下，國家角色也就只能狹隘了。這個偏向的形成是

可以理解的，因為圓融掌握政策制定者的法律、規範與政策過程，並嫻熟運用他們的語言，是有困難。政治經濟學面對的問題是，爲了要完整解釋國家的角色，將國家—媒體關係安置在較爲寬廣的政治經濟學架構中，政治經濟學必須將政策行動的認知，轉爲政治經濟學的認知。

時下流行一個說法，認爲空間化是由經濟或科技驅動的過程，企業界在電腦傳播體系的協助下，超越了時間與距離的約制，侵蝕了國家機器主導的政治根本過程。另一方面，「民族建構」的過程又被當成是占據了政治空間，若非支持就是抵抗經濟律令。這個觀點是有些可觀之處，比如有些人就論稱，經濟邏輯促成了統一的歐洲之形成。但這個論點流於過度簡化了。空間化與民族建構都是政治經濟的過程。空間化包括了許多內涵，其中一個面向是生產的邏輯，另一個是權力邏輯，前者運轉於當前的全球經濟，後者則讓經濟決策的控制權，集中在某些人或集團身上，他們直接或間接對國家、地域與地方之政治決策握有實質影響力。究其實，強要分別經濟與政治，也只能是分析上的分野，它造成的混淆與難解，多過它給我們的啓發(Wood, 1981)。與此類同，民族的建構也不只是政治過程，不是政府官僚體系、工會或社會運動等等力量所完全塑造，固然他們都想藉此過程保有權力，或贏得權力。民族的建構也是一個經濟過程，它根據某些觀點，認爲要達成這些經濟目標應有哪些合適的政治單位加以配合。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主要可取之處，正就是它力主克服這個偏向，強調我們不應該扭曲複雜的社會過程，不應該將此過程強分作經濟的與政治的。

201 還有，我們必須強調，在空間化過程運作而使這個關係不穩定的力量，不是只有民族的、全國的(national)單位。誠如上述，民族主義之中另有民族主義。再者，如同全球化，民族主義決不是一個單一過程，它一直是充滿了許多的政治實務及意識形態，有些支持而有些則反對民族國家的建構。所有民族主義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認同以

下理念：以「在地」(local)對抗空間化的邏輯。

這個問題，以及議論這個問題的意義，在「規範」這個概念中展示無遺。論述傳播工業規範問題的文獻非常之多，其中雖然有些不同的重點，但我們察覺，這些文獻一直認定規範是政府對市場問題的反應。政府為什麼會有反應呢？歷來有很多解釋，範圍頗大，包括有人說這是自然壟斷狀態的存在，有人說是工商業界對政治機器施加壓力，又有人說是市民壓力團體的推動等等。對這個問題的界定「是」有意義，但每種定義都有偏向，都將規範這個概念，當成政府對其所看到的問題之反應。結果一來，政策制定者與學術分析在檢視產業規範時，也就流於檢討政府實務，以及論稱更多或更少一些規範比較可取。於是，關於國家在傳播產業的角色之辯論，經常就只變成規範與解除規範的選擇。

但政治經濟學取向，特別是充分反省國家之建構角色的政治經濟學，對此議題的看法，相當不同。政治經濟學將整個社會場域（包括工業活動的類型）視為一個規範形式²³。比如，主要受到產業界決策的影響，而不是國家介入的社會場域，可以說其特徵是一種「市場調節」(market regulation)的形式，它與「國家調節」相對立，後者指的是國家扮演了影響社會場域的主要角色²⁴。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

23 所謂的「調節學派」在這方面拔了頭籌，但其他政治經濟學取向也提出了這個論述。調節學派的健將之一李皮茲(Lipietz)說，調節是特定社會場域之內，矛盾傾向的調整。參見本書第二章第92頁。

24 在市場形式之內，市場結構的差別又產生了不等形態的調節。調節形式的兩端，分別是壟斷調節形式與完全競爭調節形式，中間另有寡占調節形式等等。一般稱之為傳播部門的「擴大的競爭」，其實就是指一個以上的新公司加入了社會場域，使得調節形式可能由壟斷轉移到雙元壟斷或寡占。因此，若說這就代表了「擴大的競爭」，未免讓人無法信服，據此說法而認定政策上應該減少政府監督，也就言過其實。

來看，關於是否解除規範的政策辯論，最多只能是不怎麼老實的辯論，因為解除規範、不調節，根本就不是規範或調節的對立選擇。反之，真正的辯論應該要走到實地，在不等的混合形式中，進行選擇，究竟是強調市場機能、國家介入，或是在兩者之外，找尋其他組合。消除政府的規範或調節，並不是解除規範或不再調節，而最可能是市場機能的規範與調節之擴張。政治經濟學沒有陷入語言陷阱，它集中在評估不同調節形式的優缺點，比如，對於不同類型的社會，市場機能與國家介入，效應各是如何。透過對於規範、調節的重新評估，我們才能考量國家的建構角色，解除規範(deregulation)這個概念則無法讓我們得到這層領悟。它提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國家的取向，另有重點，也就是要研究國家如何積極主動地建構規範、調節的形式。不過，我們在這裡必須非常小心，提出警語：關於這些術語及核心概念的內涵是些什麼，至今各方意見並不相同²⁵。

當前的國家一建構活動起自空間化與商品化，我們可以從它具有的四個特徵過程，著手分析。第一個是「商業化」，也就是國家的調節規範形式，捨棄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務與相關標準（如一視同仁），轉而採取標準而建立了市場調節與規範模式²⁶。公共與私人部門組織都會發生商業化現象，雖然發生在前者的情況更加重要，因為它可能

²⁵不同的人對於這些論點的內涵，也許各有看法，但它們在運用於產業績效的經濟模式，非常準確，在用於政治分析時，又非常不準確，兩相對比，讓人詫異。

²⁶這個說法又必須重新定義公共利益的內涵，它必須將市場機能的延伸，等同於公共利益的擴充。比如，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美國政府的法規都認定過度的商業化危及了傳播法所要求的「公共利益」原則，因此也就限制電視所能夠播放的廣告數量。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這些限制鬆綁了。一九九三年七月，聯邦傳播委員會裁決，公共利益的原則「責成」線纜系統經營者，必須在本地頻道播放一日二十四小時的廣告與購物頻道「家庭購物網」，若是因此必須撤走某些線纜電視的原有節目，亦須播放購物頻道。

會是走向私有化的一個步驟。放在傳播部門，這就意味著，即使是國家與公共服務的廣電及電信單位，也都更為強調市場機能與獲利率了。進一步說，這就導向了更為注重閱聽人數量的多寡與廣告的營收，製作節目的時候，就會想到外銷國際市場的可能性，也會想到這個節目與其他能夠創造營收的媒體，可以如何聯繫。放在電信部門來看，商業化就是指電信網路的架設與電信的提供，服務的對象偏向於迎合能夠帶來更多營收的顧客（特別是商業用戶），但這些標準將使網路的建設側重國際大都市之間的連結，而不是在鄉村地區及尚未得到充分服務之地域，連結更多更好的網路。商業化逼使國家傳播管制機關將電信等獲利的活動，與郵政等其他服務，分了開來，雖然郵政幸有憲法或其他法律的要求，使國家必須確保其平等提供。為商業化辯護的人論稱，商業化並不排除公共服務的目標，甚至更有可能提昇公共的目標（如一視同仁的服務）(Noam, 1987)。反對商業化的人則論稱，商業化是轉化傳播流通空間的手段，放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來看，商業化勢力必然會有利於某階級的使用者，不利於其他階級的使用者；最後，主張商業化的人也會乞靈於經濟學的「下滴理論」，辯稱假以時日，商業化仍可泯除階級界線 (Castells, 1989)。

「自由化」則指國家介入以求增加參與市場的廠商家數之過程，典型的作法是引進競爭，或減少引進競爭者的困難，使更多具有競爭力的提供者，進入傳播領域。通常這就等於是在國家或私人壟斷的市場之內，引進一個私營競爭者。自由化與商業化並不相同，商業化一切以商業準則為馬首是瞻，想要徹底使傳播產業服膺商業原則，至於市場是否競爭，則非為所問，自由化的特定目標則在增加市場競爭程度。過去二十年來，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國家，都已經將傳播工業改了頭換了面，各國都在原有的廣播與電視服務中，引進了私營競爭者。支持的人論稱，自由化使價格下降、服務擴張，通常也能加快創新的過程 (Owen and Wildman, 1992)。對此批評的人則指出，這只是由私人寡占的調節規範形式，取代了國家的調節規範，結果它的價

格、服務與創新，都只能提增加寡占卡特爾自己的利益，以及優勢顧客的利益 (Mosco, 1989a)。

第三，「私有化」是國家介入而賣掉國有產業（如公共廣電機構或國營電信公司）的過程。私有化採取了許多形式，出售的國營股份比率、外國產權是否容許、分作多長期間售出，以及國家在私有化以後，是否採取特殊形式繼續介入該產業（典型的作法是設置規範機關）。這個過程的加速進行，有多個理由，包括：意識形態上認定私人控制經濟活動較為優越的政黨，大選獲勝而執掌政權；國營產業賣出後，儘管只能進帳一次，但對國庫仍然是一筆新的收入；以及國際工商業界與國際政府組織的壓力，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支持私有化的人認為，若是只有商業化，最多只是跨出市場控制的第一步，還不足夠。批評私有化的人則說，這將造成完全的市場規範調節模式，不再受到挑戰，因為與其有別的一個主要模式，已經被消滅，售出產業給外國公司以後，國家主權將喪失，以及隨之而來，本國利益不再能夠控制國家政策。

最後，國家本身也在創造自己的團隊協定或策略聯盟，各個國家進入了不等程度的「國際化」。這些包括了區域貿易聯盟（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貿易之外」（如金融、政治與社會連結）的協定（如歐洲聯盟），以及已經制度化的計畫性組織（如美日德法義英加等七大工業國家）。國際化也催生了特別的國家組織，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雖然它們並不是全球政治經濟過程的新角色，但近來的分量迭有增加，尤其是在處理工業化程度最深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或是協調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發展（與低度發展）之條件等事務。

這個過程對傳播領域格外重要，因為跨國傳播網路的連結，有賴國與國之間不等程度的協調。我們再次指出，對於傳播工業來說，這並不是新奇的現象——早在一八六〇年代，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就是許多政府齊聚協商以後的產

物。最近幾年，各國之間的新協定對最富裕的國家更為有利，他們現在對全球傳播政策的控制，更加嚴密了。這些進展帶來了國際政治制定的顯著改變，包括「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WICO)的最主要支持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來影響力已見下降，又包括了國際電信聯盟廣開方便之門，接受了許多私人部門的電信公司參加其組織。這些組織的力量，可能變小了，要不就有了轉變，反映新的權力平衡關係，已經幾乎將世界各國平等代表的原則，消滅殆盡。這個情勢也表示，愈來愈多的政府及企業集團的協定，根本沒有透過正式的傳統機構或機制進行，公眾因此很難對此過程產生影響；反之，這些規範活動已經轉為以特定功能或特定科技為對象，政商聚集，協調科技、服務與定價等事務，有效期間亦較短。代表大商業用戶與政府用戶的協會之崛起，如「國際用戶團體」(the International Users' Group, INTUG)就是這類活動得以進行的一個重要機制。

商業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是一些較重要的例子，說明了國家的構成角色。更重要的是，它們顯示了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價值，因為它的起點正就是產業界與國家，聯手相互構成了時下的調節與規範形式。它們反映了資本的需要與利益，也顯示了特定歷史時期，反對力量的性質。這並不是說產業界與國家具有「同等力量」塑造傳播結構與實務，這就如同我們不會認為不同產業部門的資本力量，彼此相當。反之，證諸史實，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結論是，產業界與國家都是推動傳播器物發展的主要動力，二者的關係相互構成而會有變化。再者，政治經濟學分析也反對只集中在政治或只集中在經濟的分析。對於政治經濟分析來說，產業界與國家都很重要，尤其是規範產業界與社會場域（包括與產業界有關的對立力量）的調節形式，究竟會呈現什麼面貌，更是必須兼及二者。最後，國家儘管有其積極活躍的角色，但這並不能確保其成功。其實，單單就只看傳播領域的參與者數量之增加，以及為了處理此增加而特別設置的彈性機能，就造成了協調與控制等重大問題，在在使得是否成功，根本無從擔

保。這個道理也局部解釋了何以最近幾年來，國家活動雖有擴張，但國家在積累資本的過程，並沒有增加其直接參與，反而是有頗多的減少。這突顯了資本主義長期以來的問題：資本的短期特定利益，項目繁多，國家必須介入經理，但國家卻不能全面參與資本積累本身的過程。其結果就是許多保守主義者長年來的批評，他們抨擊國家很容易就有了自己的科層邏輯，透過組織形式使自己永遠存在，這就像是扯後腿，積累過程因此也就減慢了。他們的解決方案是縮小國家的規模，但如此一來卻又出現了協調的問題。與此有別而主張國家直接參與積累過程的方案，只有在社會主義思維仍在（雖然也許是邊緣化的）政治辯論議程之內的社會，才有可能論爭這個選擇。

205

全球化

對於空間化過程所採取的特殊形式，也就是時人朗朗上口的全球化，以上結論具有重要意涵。誠如費格森 (Ferguson, 1992) 所展示者，全球化不是一個容易檢視的術語，因為它已經披上了神祕化的衣裝，好像變成了文化同質化、地球、全世界的媒體民主，以及新世界秩序²⁷。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應該討論全球化的問題，因為這個術語

27 她也相當動人地論稱，我們需要揚棄全球化迷思，因為它指涉的是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已被克服，而不是指已被轉換：

商務、組織、資訊與人們的流動，「並不」使得時間與空間不再相干，反之，它突顯的事實是，這些領域的經驗已經更加（不是更少）多層次、更加彼此相關與複雜。對於落腳之處不再固定、彷彿不眠不休、恆常在移動的人來說，要能在三個或四個時區「活生生的生活」（家庭、朋友、工作），就必須具備新的技能，才能克服空間不再確定而時間必須重新計算的感官世界，一個「沒有時間的時間」與「沒有空間的空間」的世界。(Ferguson, 1992: 79)

與流行的社會變遷觀點，是已產生了共鳴，我們若能除去其迷思的色彩，它是標誌了更大的空間化運動過程之內的一個面向。尤其是，若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檢視，全球化指的是資本的空間群聚，這個過程由跨國產業與國家機器主導，轉變了資源與商品（包括傳播與資訊）的流通空間。這整個結果就是傳播與資訊地理產生了實質的轉變，其間只有某些空間與關係得到強調。比如，紐約－倫敦－東京是傳播與資訊服務版圖的鐵三角，往外延伸則有第二層次的網路，聯繫了法蘭克福、巴黎與洛杉磯等等，它們共同形成了全球連線的網路。如同任何地圖，我們也無法百分之百正確地畫出這個網路 (Hall, 1992)。在這個全球網路上，紐約的線纜並沒有延伸到整個城市，但包括了金融服務中心曼哈頓下城，以及傳播與娛樂企業集團總部所在的曼哈頓中城，紐約的網路也延伸到了紐澤西、康乃迪革與紐約郊區的部分，因為這些地方是 AT&T、IBM 以及電信設施輻輳地「電港」(Teleport) 等公司的所在。紐約及其鄰近地區或許會從這些活動得到好處，但最多是間接的。全球化是轉換這些空間的過程，並不是神話般地消滅了空間。傳播與資訊科技讓主要軸心能夠擴大它可以聯繫的所在，但在這個過程，軸心的重要性卻強化了，因為位在中心的人，不但能夠使用許多形式的便捷科技，他們也可以與主要的人與組織聯繫，而這些人與組織正就是掌握流通網路的權勢 (Sassen, 1991)。這個概念支持了一九八三年時，雷蒙·威廉士的一段考察，他說，「現在已經狀況大明，就現代工業社會的演化來說，古典歐洲形式的民族國家，既可說是太大，又可說是太小，無法符應真實的社會走向」(p.197)。全球性都會與地域集團崛起，亮如晨星，民族國家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對於全球性都會所需要的個人與資訊權力的集中，國家太大，對於管理大陸集團的需要來說，國家又太小。這些轉換創造了控制的不等科層，若是不加體察，「全球化」這個字眼是會如同神話，為此科層體系披上了光鮮的外裝。

若是有人說這代表了迥然與前有別的新過程，那麼，此人就是為

全球化的神話助威壯聲色了。相信這個神話的人，心理底層都拒絕承認空間是在動態進展，而不是只有時間如此，他們拒絕承認我們所繪製的物理或政治空間之圖譜，或說人文傳播流通的空間，經常處於變化之中，雖然他們表面上並不如此拒絕 (Massey, 1992)。我們選用「空間化」這個術語，正就是想要明辨空間的變遷經常在進行，地理學已經展示了這個過程的多種組合狀態，包括了絕對空間、時間—空間、成本—空間與社會空間等等 (Abler et al., 1991)。時人稱之為全球化的過程，指認的是空間變遷的當前類型。那些大權在握，能夠支用政治經濟資源，將時間與空間當成資源而更為充分運用的人與組織，由於其權能真的在擴張，由於他們能夠轉變空間的流通，使之符應自己的利益，於是他們所看到的就是一幅神話的景象了。季定思 (Giddens, 1990: 53) 說，這是「時間—空間差距化的無限制擴張」，它「提供了重劃時間與空間的精確手段」。政治經濟學家雖然讚賞季定思的分析，畢竟他捕捉到了空間化的精神，但政治經濟學家又與季定思不同，因為政經論者並不認為空間化是「現代性的後果」之一，他們反而是從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之分析入手，時間與空間過程的重劃是在資本主義之內進行的，但又是誰擁有這些重劃的權能呢？資本主義經由階級、種族與性別等線索，局部地將此權能納入階層關係，並使此權能集中。

民族主義・地方主義 與社會主義

全球化神話的流行，另有一個因素，它建立在空間化的化約觀點之基礎上。空間既已轉換，則需重新繪製圖譜來解釋空間的流動，擁抱全球化的人執迷於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理解，但他們卻沒有看到其他的相關過程，包括對立力量的發展。為什麼會這樣呢？主要理由之一，是他們將當代資本主義視為「只是」高度發達社會之內的獨特關

係，他們沒有將資本主義視為存在於所有國家之內、貫穿了所有國家，而又是整套「科層嚴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並且經常處於接合與剝離的狀態。我們可以理解這個傾向，畢竟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國家，占有掌控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巨大權能²³。但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還沒有摧毀階級、帝國主義或不等形式的民族。我們甚至可以論稱，階級、帝國主義與民族等因素，在全球政治經濟體中，更加生猛有力了。再者，雖然「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世界，很難說得上真正存在過，但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就是以民主方式控制生產、分配、交換與使用，在許許多多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運動中，仍然存在。全球化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繼續與「不均衡發展」這個廣為人使用與誤用的術語，共存共進²⁴。

因此，我們眼前的版圖不僅只是因為空間的流動而需重新繪製。這塊版圖也因為民族主義的復甦，使得世界圖籍增加了許多國家而必須轉換。許多這些結果的造成，是因為蘇聯的解體，其本身又是民族的、氏族的與種族的紛擾所致。還有，如同魁北克人、阿渣百強人（Azerbaijani）與波斯尼亞人（Bosnians）點滴銘記在心者，民族主義之內，更有民族主義。我們或許還是可以貼切地稱之為民族建構的過程，仍然相當突顯，雖然空間化的力量已經使得物理上的疆界，對於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實務，似乎已經不再如此重要。在這個民族建構²⁵的過程，媒體毫無疑問是已經捲入其中（Schlesinger, 1991）。新民族的主要鴻圖之一，也就是預見或想要提振民族情操的



²³舉個例子，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UNESCO, 1989: 160-161），在蘇聯解體以前，美國、法國、義大利、英國與德國，供應了百分之八十輸往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影片。

²⁴關於「不均衡發展」的許多不同用法，麥因塔（McIntyre, 1992）已加以檢討，該文頗富興味，他也努力想要以非化約的馬克思主義思維，重構這個術語的內涵。

人之鴻圖之一，就是推動全國性媒體、電信與資訊體系的建設。企圖創設「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的國際運動，大致就是要在缺少權能控制自己傳播體系的國家之間，建立聯盟關係，然後提昇他們自己的地位，進而影響流動空間的轉換，並且也要創設他們自己的全國性傳播政策。若是這個運動充分發揮對抗跨國資本的潛能，那就意味著各國家將發揮自己的槓桿力量，然後各國再行結合，以此創造可望受到大眾支持的民主控制程序，超越西方所控制的市場而營造自己的公民身分。智利的聯合陣線與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權都是對抗跨國資本的民族主義，提供了好的範例，但後來都在美國主導的軍事、經濟與政治的核心強權攻擊下而潰敗。如今，雖然美國的傳播產品享有非常高額的貿易出超，但她還是斤斤計較，任何想要尋求民族的或本地的些許自主（包括擁有版權的人稱之為影帶盜錄者），使自己不受世界傳市場的左右，美國都不肯鬆手。

208

但空間化與民族建構的關係，至為複雜。後者可能會受到商品化與空間化的深刻影響，比如，若是本國與跨國業界察覺，創設能夠反映民族關懷的媒體，具有市場潛能，（譯按：那就等於是民族主義成為商品化的代言人）這個情況可以舉歐洲聯盟的具體作法來說明。歐聯急於想要抵擋美國電視公司的強大力量，於是（譯按：在一九八九年通過了《電視無疆界》指令）想要將整個歐聯塑造成一個大的電視市場，而這也提供了方便之門，讓本國的壟斷廠商，能夠強化自己的市場力量（Papathanassopoulos, 1990）（譯註2）。再者，民族主義本身的政治經濟意義及重要性，並不清楚，誠如阿馬德（Ahmad, 1992: 11）的結論，民族主義並不是「某種統一的實體，並不是一定具有進步意涵，也不是一定就代表反動」：

⑩「民族化」（nationalization）這個字眼較為可取，但一般將它認定為國家接管了某種經濟活動，也就是國有化，所以此處仍然使用「民族建構」。

任何特定的民族主義究竟會扮演什麼角色，總是取決於各國的階級力量與社會政治實務之組合狀態，它讓權力集團得以動員與組織，而在權力集團之內，任何特別的民族主義訴求，總是會發生其特定的歷史效能。（亦請參見 Greenfeld, 199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運動成就了日後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浮現，它的起始通常都是敵對於資本主義，企圖找尋社會主義方案，替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作為。結果，民族主義呼籲世人起而營造新國際經濟秩序，繼而呼籲營造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這股浪潮亟欲對抗市場機能，期望能夠創造符合民族利益的民主方案。然而，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從來就不是如此精確，因為在第三世界之內，總是有其階級分合問題，最典型的是政府公職人員與初生的商業利益，仍然與先前的殖民強權有所聯繫，這就使得他們的民族主義通常較為保守，並且更為具有圖利自己的傾向。就在西方政府、企業界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勢力增長的背景，以及資本的其他羽翼工具之協調下，這些階級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已然取得了更大的發言權，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則已攻占了第三世界。抵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失去了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色彩，他們現在所說的，是要團結民族，在本地創造成功的西方資本主義之版本，這

譯註 2: 作者這裡所說，可以再作補充。歐聯的影視及媒體產權政策，確實很大一部分是借助民族主義的訴求來為市場邏輯鋪路，也就是變相圖利具有壟斷地位的大廠商，但亦應注意，歐聯機關當中，以文化多元訴求來反擊市場經濟邏輯的力量，並非完全落敗，這些機關以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及歐洲聯盟執委會的第十署最為明顯。總之，歐聯假借民族主義來反擊美國影視集團的訴求，同樣是矛盾結合體，固然有假借民族主義而營造市場的企圖，但亦有以此打開多元媒體文化的努力。

個說法也許還在文化層面上，保留了敵對的認同意識，但這些意識卻是服膺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原則。反抗政治的空間愈來愈小，彷彿一邊是成功地建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另一邊是被排擠至邊緣或根本就被除外，而反抗政治好像就只能選擇前者，即便這個選擇等同於任何成功的果實（整個第三世界的發展史已然證明這是必然的後果），勢將集中於站在階級階梯頂端的人身上。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既有成長「又有」土地、產業、傳播與文化的重新分配，渙散地無影無蹤。以前，反帝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政治鴻圖，必須由社會之低層階級的群眾運動加以完成，如今已被重新界定，成爲

209

一種發展主義者的鴻圖，必須由民族資產階級的較為弱勢的國家機器，透過它們的協調合作，與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國家的較為強大的國家機器，展開競爭而後實現。（Ahmad, 1992: 293）

這就等於是使得大量的社會運動，臣服於各國政府，而後者壓制革命活動的能力則又強化了本身的籌碼，使其更能與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社會的權勢中心，展開協商。

這對傳播產業的後果，相當重要。全球性的對抗運動，以創造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的企圖，式微了、不再被廣爲採用了，各國或各區域轉向自行與全球性的媒體強權，協商彼此的關係。特別是有些國家（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則更將資源投入在營造電信與資訊體系基層網路，期望這些設備，至少在短期內能夠讓他們在全球網路上，取得較為優勢的位置。另有些國家，如墨西哥，則放棄了本國對電信產業的控制權，他們轉而依賴外國資本，期望自己能夠扮演區域媒體生產與分配的強權角色（主要是電影與影帶影碟節目）。無論這些國家最後與主要的全球強權以什麼條件取得協商結果，它反映了民族、國家爲中心的策略，社會主義的價值內涵，大抵不見了。

然而，雖然認清這些發展情況非常重要，但也只有頑固的實證主

義者會因為在當前局勢很難找到實際的例子，就完全放棄原則。因此，這裡我們就必須釐清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但這件工作相當困難，並不只是因為資本主義在那裡耀武揚威。雖然當代的學術論述仍然認定民族主義具有複雜的屬性，但大多論述都沒有將心力放在研判民族主義如何會具有進步性，而如何又會流於反動，學術論述更為在意的，似乎在於抨擊民族主義這個概念，質疑民族主義的本體論，是否就註定了它只是一種「起源的迷思」。批判民族主義的主要立足點，不再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在於它具有忽略資本主義的偏向，忽略了階級與性別；然而，「後結構主義」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完全與它對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批判，如出一轍，都只是將它們當作是大敘述來批判。尤其特殊的是，後結構主義企圖消除這類整體性思考的方法，是先宣告文本的幻覺，宣告大敘述的整體性思考，就是依靠這些文本來維持其敘述、迷思與論述的形構。雖然年來後結構主義頗遭物議，論者批評它帶有反動的思考，拒絕承認歷史有其動因，又不經意地使自己免脫於批判之列，彷彿外界對它自己的材料、敘述故事，以及它亦有的政治大業之理念，完全無法批判，然而，後結構主義還是在學術知識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後結構主義對傳播研究也產生了影響，包括對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與評估，以及呼籲微觀研究，檢視閱聽人如何接收媒體文本 (Ang, 1991; Tomlinson, 1991)。史萊辛格對於後結構的思維，頗有讚辭，因為它畢竟提醒政治經濟學，切忌化約，但他又指出，它的代價太大而收穫微薄，因為它並沒有「提供一個格外具有意義的觀測點，我們還是無法檢視大的文化集體，如何構成其認同」 (Schlesinger, 1991: 149)。不過，這裡的問題是，後結構主義的立論哲學基礎，根本就不認為任何託大的文化集體，會與認同的構成什麼關係^①。若是真要成功地討論這個議題，我們就得放開視野，對於被排斥的整體性大敘述及物質實務，以及對於什麼構成了政治經濟分析，均須保留討論餘地。這就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認清民族主

義的歷史崎嶇不平，因此也就讓我們加入阿馬德的行列，一起回絕以下觀點：「唯有民族主義確切是帝國主義的辯證對立面，唯有社會主義具有辯證的能力」（Ahmad, 1992: 11）。

這是不容易辦到，因為社會主義歷來都被與民族國家等同看待，而除了少數例外，再沒有國家認同於社會主義。然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質性差異，並非根據民族國家的空間差異而產生，二者的差異是生產與分配過程的不同，這些差異則在相同空間中競爭。蔡司一敦說得特別有力（Chase-Dunn, 198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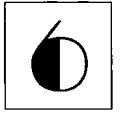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是一種生產模式，它使投資決策與分配，受到集體使用價值的邏輯之節制，因此，社會主義的運動重新將非商品化的關係，注入資本主義關係的裂隙。

相同的一個機構，在相同的空間，可能同時運作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過程。蔡司一敦舉證的例子是工會可能力促機械化，但同時又進行抗爭，企圖使資方對他們的剩餘價值之生產，能夠受到約制。與此類同，我們也可另外舉證，指出推進公共廣電體系的運動，仍有可能接受公共廣電的商業化形式。但我們這裡討論的觀點，亦需對於社會主義有所批判，我們自然不是以此壯大資本主義耀武揚威的聲色，而是要善事體認民主的活潑品質（包括參與及平等、公民權、互

- ④ 從哲學立場反對政治經濟學及宏觀社會學取向，不同於在這個取向中，注入方誌學方法的使用。方誌學研究並沒有任何內在的反政治經濟學性質。事實上，最近已有研究（Pendakur, 1993）企圖整合政治經濟學與方誌學研究。這個結合之作與後結構主義所影響的研究，並不相同：雖然後結構主義也運用方誌學，但卻是用它來崩解社會整體、論稱所有的社會分析之主體性均不可說，而若有人認定社會類目（如階級）確實存在，則必然虛耗心力，因為這些類目最多也只是論述的建構產物。

助合作與集體參與政治企劃），鼓舞了這麼多人，從中南半島到尼加拉瓜，都有這麼多人群起抵抗，抵抗的不僅只是整體性的大論述，而更是帝國主義與階級統治的整體化之軍事、經濟與政治強權。

我們的結論是，民族主義是一種在地抵抗的形式，它的優先性是根據空間認同而抵抗，不是優先地抵抗全球化之資本主義；雖然全球資本主義使得空間的差異，日漸理性化與同質化，因此也就日漸破壞民族主義的空間認同基礎，但民族主義者並未以此為敵，率先迎頭反抗之。雖然這個形式的民族主義可能成功，而事實上它也成功地減緩了全球化的過程，並且也塑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壓迫跨國行動者回應本國的課題，但民族主義仍然不能完成阻擋全球化的目標，因為它忽略了空間與商品的關係，或者，更為嚴正地說，它忽略了商品化與空間化的相互構成。這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民族主義偏向於接受任何在地的控制，至於這是否深化了商品化趨勢，則不去聞問。社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大抵都是指出，雖然商品化也許無法摧毀民族主義、也許無法消滅空間，但商品化卻將民族主義轉變成抗爭的場域，商品化造成不同的資本在其間競爭民族空間的控制權，但民族主義論者對此卻沒有能夠體認。然而，社會主義者則因為未能體認到空間化的建構力量，於是誤認民族主義的力量，只能以在地的控制形式，扶持商品化過程的進展，殊不知民族主義亦有潛能，可以振興非商品化的過程，或提振使用價值實務的機會。是以，商品化與空間化的相互構成，具體展現了政治的以及理論的後果，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結構化過程時，再對其中部分後果，再作檢討。



結構化

「科技評估署」發現，美國傳播基層建設的變化，很可能擴大差距，能夠與不能夠使用傳播設施與策略使用資訊的人，差距將愈來愈大。更嚴重的是，新傳播科技應允改善某些階層的人之境遇，但最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人，卻正是他們——窮人、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阻絕於科技之外的人，以及掙扎著求生存的中小企業。(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0: 243)

過去十年，在商業與軍事設計的推動下，宣稱「資訊時代」或「資訊社會」即將來臨的說法，引發了辯論，這已經是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抗爭的主要場域。這些抗爭繼而提供了理由與動力，促成了政治上有所意圖的批判傳播研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議程……然而，這個兼具理論與經驗評估的文獻，對於資訊時代的一個重要權力——知識面向，大抵靜默無語：資訊時代的性別政治。(Jansen, 1989: 196)

本章討論結構化的過程，季定思對這主體的討論，最有成績 (Giddens, 1984)。季定思的結構化理論，目的是要作為橋樑，聯繫二者的裂隙：有些理論突顯結構，另有些理論強調行動與動能 (agency)。代表裂隙雙方的人，比如，在結構理論方面是涂爾幹、李維史陀、阿圖舍等人的著作，在行動—理論取向方面，則跨越了社會學家的陣營，包括了韋伯以及現象學取向的理論家，如舒茲 (Schutz) 與嘉德瑪 (Gadamer)。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季定思認為我們必須認定結構具有雙元性，

既包括了設定限制的規則，也提供了使人得以行動的資源。結構再也不是僵硬的鋼架，再也不是只控制社會生活或將社會生活套上形式，結構構成了行動，但也透過行動而複製。就此而言，結構與行動相互連結，持續推動著社會生活的類型化。因此，結構化所描寫的是一個「過程，結構在此過程由人類動能加以構成，雖然結構本身正是這個構成的『媒體』」。社會生活由相互構成的結構與動能組合而成。誠如季定思自己所說，對於社會思想來說，結構化並不是新的概念。這個概念當然就是馬克思歷史著作的核心成分，最為酣暢地展現於《路易·波拿巴提的霧月十八》這篇時論，馬克思在這裡闡述了廣為人知的名句，人創造歷史，但並非在他們所能決定的條件中創造。

213

結構化理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在於它賦予社會變遷顯要的角色，這裡所說的社會變遷，是指無所不在的過程，描述了結構如何被人類動能生產與再生產，而人類又如何透過這些結構的中介而行動。功能主義者、制度論者與結構論者的思維，都偏向將結構認定為已經完全形成，在對進入其間的客體發生決定性作用，這些思維歷來迭受批評，結構化的概念可以說是對這些批評的回應。這些取向對於幫助我們瞭解結構的運作，是有助益，但它們對結構的形成過程，瞭解不足，它們對社會行動與人類動能，也瞭解不足。誠如霍布斯班所說（Hobsbawm, 1973: 280）：

結構模式若只能認識到一個體系的維持，那就有所不足了。結構模式應該要能同時反映促進穩定與造成衝突的要件……但這樣一個雙元的（辯證）模式很難為人首肯，亦難以為人運用，因為實際上人們基於品味或時機的考量，傾向於將結構模式當成是穩定的功能運作，或是將它當成是革命性的變遷；但結構模式迷人之處，在於它同時具有這兩種性質。

本章就是要思索結構化理論，可能會如何涉及商品化與空間化的

過程，我們以此提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內涵。進一步說，結構化對政治經濟分析可以產生平衡作用，因為政治經濟學偏向於突顯結構的力量，尤其是商業界與政府機關的力量，而結構化的概念則包含了動能、社會關係、社會過程與社會實踐等理念的檢視。同時，結構化論者，亦贊同崗恩 (Garnham, 1990) 等人的論點，他們認為分析動能而甩開結構，殊不可取，雖然有些極端者會如此認定。這是因為結構提供了動能運作時的中介。因此，拉克勞與牟非 (Laclau and Mouffe) 說「社會性本身並無本質可言」時，政治經濟學固然贊同，但對以下概念，政治經濟學則無法認同：

若是我們自己要穩定地在接合的領域立足，則我們的起步就是要放棄「社會」(society) 的概念，不要再以為社會是其社會性 (its social) 過程的基礎整體。因此，我們必須考量，社會性是否有其開放性？社會性是否代表了存有的構成基礎或代表了存有的負面性質？而多種「社會秩序」的存在，只是因為想要馴服差異場域的企圖，既不可靠且最終註定失敗？……「社會」並沒有特有的縫合空間，因為社會性本身並無本質可言。(Laclau and Mouffe, 1985: 95-96)

結構化理論是一種取向，企圖探討有目標導向、但也會躬身自省的人類行動，與此同時，這個取向也要瞭解權力的「縫合」，如何相互地構成社會行動。

誠如湯普森 (Thompson, 1989) 所論，結構化理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它偏重動能，這樣一來，結構也就僅限於是一整套的「運作規則」及「資源儲存」，個人使用此資源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我們不再細表湯普森的批評，我們只需點出，季定思的結構化之主要概念（批評季定思意見之一，指出他有許多不同的結構化的概念），每每不敢以充分的思維論及「權力」與結構化的關係，經常距離社會分析的批判取向，一步之遙（亦請參見 Berntein, 1989）。運作規則又有

很多，誠如湯普森 (Thompson, 1989: 63) 所誌，包括了「道德規則、交通規則、科層組織的規則、文法規則、禮儀規則、足球規則」。一般公認，季定思是知道他的概念指涉過廣泛，已造成混淆，但他並沒有提出讓人滿意的答覆，我們因此也就無法得知那些規則是具有特別意義的「社會」規則，因為他若是如此清楚地界定他的概念，或許他就很難建立「超越歷史的」理論，缺此他也就無法把持他對立於馬克思的立場 (Giddens, 1981)。我們可以說季定思指稱的資源，無所不包，從福利社工人員得到諮詢服務、在芝加哥商品交換中心買賣商品期貨等等都是。我們再次領悟，若是按照特別的形式排比資源，我們會察覺某種資源（如權力資源）比其他資源來得重要，若是如此，則原來的社會生活一般理論，也就轉為許多解讀方式之中的一個特殊理論，或許它會具有特定歷史的面向。政治經濟學對結構化理論的解讀，更願意接受特定歷史面向的說法。因此，政治經濟學坦然保留季定思一般層次的結構與行動雙元觀，但對「權力」賦予更大重要性，也認為結構化的理論，要更深入地納入社會分析的「批判」取向。

這個焦點深化了政治經濟學中，關於權力研究的實質及方法論內涵。誠如前面幾章所述，政治經濟學透過對商品、制度、各種社會實務與社會效應的不斷分析，解析了權力的生產、分配及使用，因此，政治經濟學可以說對社會研究，貢獻良多，包括長足地解釋了傳播實務。政治經濟學完成這項工作所引用的概念及方法，特別適合大規模或宏觀的權力分析。比如，我們藉此檢視了梅鐸的「新聞集團」如何透過兼併、購買、勞動實務及借貸，擴張自己的媒體與資訊商品的產能，並進而影響政府規範政策。完成這類研究的方法，大大地有賴於這些公司集團的營收、組織結構、雇用等等總和資料，也必須依賴它們提交政府單位（如規範機構）的說明、報告與文件。

結構化理論相當強調的動能，則可以讓政治經濟學延攬此一權力觀，檢視動能如何在構成的、互動的或微觀的權力層次中運作。比

如，時代·華納董事會面對這麼多的宏觀壓力，它最後如何決定優先順序，投入此特定市場，而不是進入彼市場，購買甲公司而不是乙公司，投資於丙新科技而不是丁新科技？這些決定或許好像只是客觀評估的結果，但評估本身其實已經表現了宏觀壓力的平衡結果。客觀評估粉飾了微觀權力鬥爭的過程，它可能只是董事會成員或特定高級主管本身利益的展現。建構評估標準這件工作，本身就是關於控制形象資源的爭鬥。大致只從經濟領域分析的人，只不過是剛走進了這條權力大道 (Tinker, 1985)。完成這個目標，則必須在政治經濟學家所受訓練之外，另外配備不同的研究工具。這些工具包括方誌學、現象學、參與觀察，以及其他觀察社會實務的方法，畢竟對於特定一組的行動者來說，這些實務才真正構成了權力的意義 (Pendakur, 1993)。

這裡所強調的是「社會的」，也是微觀的。當前某些動能概念的問題之一，在於它們奢望將個人引進社會分析。再沒有比這個更遠離結構化內涵的說法了，包括季定思的結構化概念，都未曾如此說。動能根本上是一個社會屬性的概念，它指涉的個人是社會的行動者，其行為由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及位置（包括階級、種族與性別）的組合所構成。然而，儘管結構化認定動能是社會的，而不是個別的行動者，它倒也知道個別化的社會過程，具有重要意義。個別化這個概念主要取自培蘭札斯 (Poulantzas, 1978)，它指涉的是重新界定社會行動者（特別是資方與勞方）的實務過程，社會行動者此時被視為是個別的主體，他們的價值結合於個別的權利、個別的表達、個別的行使政治投票權，以及個別的消费權。這些行動以國家之名行之，但卻與階級統治密切相關，這些行動其實是隔離了個人與個人的關係，隔離了個人與他們的社會認同的關係，隔離了個人與擁有權力完成其個別化的那些人。結構化過程之內的一個主要緊張關係，來自於這些社會的與個別化的傾向。因此，對於政治經濟學來說，結構化便是檢視結構與動能相互構成的一個起點。它是擴充權力概念的起點，此外，它又是一個槓桿，讓我們瞭解社會關係在政治經濟學所採取的形式。

政治經濟學論及動能、過程與社會實踐時，偏向於集中分析「社會階級」。以階級結構化作為瞭解社會生活的核心起點，是很可以理解，畢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研究，是證實了階級分裂的現象，持續不去。不過，結構化過程另有一些面向，既與階級分析互補，但又彼此衝突，這些面向包括了性別、種族與社會運動，它們是因為公共議題而存在（如環境生態主義），連同階級問題而構成了傳播的許多社會關係。

以這個角度來理解、使用結構化理論，我們或許就會對社會另有思考：相互塑造階級、性別、種族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動能者，創生了結構化之中的行動，其總和體就是社會。根據這個觀點，社會若不能說是天衣無縫的整體，則至少是完整縫合的整體，至少社會是多種過程的彼此構成，造就了可茲辨認的社會關係的場域。強調階級、性別、種族與社會運動等關係，並不是說所有其他關係均可化減至這些關係。反之，這裡所說的是，以上這些關係是進行結構化分析的重要入口，純粹只具有名目意義的類目，即便其指涉的主體連綿不斷，亦不能夠構成社會場域。社會階級是真實的，是真實的社會階級，也是分析的「兩者皆是」。結構化的過程造就了「霸權」，它指涉的是日常生活中，充滿著整編企圖與對抗的過程，卻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常識的與天成自然的，從宇宙論、倫理學一直到社會實務，都有這樣的思考方式。霸權是彼此相互構成的意義與價值既存網路，由於這些價值與意義無日不為人體驗，於是也就好像相互起了背書的作用。

216

本章將展示政治經濟研究如何使用階級、性別、種族與霸權等術語，如此也就等於是分析了這些課題，本章目的在於指出，這些類目不僅止於指涉媒體所能產生衝擊的領域，它們可以另具內涵。因此，本章將把它們當作是描述「傳播實務的社會關係」之手段（包括它們如何組織個別行動者的動能，這些個別行動者則生產了它們），然後加以檢視。多重結構化過程之內存，在著許多緊張及衝突關係，媒體

組織展現為完整的主流、對立與另類形式。

社會階級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階級分析是得到較多青睞的課題之一^①。威廉士 (Williams) 開始分析這個概念時，就說這「顯然很困難」，無論是就其意義所指涉的範圍，或是就其實際應用於界定社會的分野，階級都是很難分析的概念。這個詞的拉丁原文是 *classis*，是指根據羅馬人財產的有無，劃分人等，十六世紀時這個詞首次出現在英語，指涉不等形式的虛榮（韋伯倫對此意涵應當會撫掌稱是）。這個詞的難處之一，在於它涉及了非常概括化的意思，既可以指稱植物與動物的群體，也可以用來描述人們的集體身分，它並沒有特定的社會意涵（譯按：但中文的「階級」似乎有了特定意涵，至少我們不會用「階級」來形容動植物的群體，亦不會用以指涉學校的「班級」）。當前我們將社會階級分作低、中、高與勞工類型，起於工業革命，取代了其他分別人等的概念（如等級 *estate*），而我們也逐漸意識到，社會分別不單純是繼承而來，而更是創造出來的。

當前關於這個概念的辯論，大多環繞社會階級的類目的、關係的與形成的面向而展開 (Miliband, 1989)。社會階級是「類目的」，意思是它界定了某個類目的人，以他們所擁有的財富與 / 或收入^②來斷定其經濟地位，進而據此決定他們在社會的位置。社會階級又是「關係的」，意思是它根據人們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主要過程之聯繫，決定了人的性質。若是如此看，階級不是依附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

① 關於階級分析的辯論之綜攬，參見 Giddens and Held (1982)。

② 這個傳統主要由韋伯創造，韋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化約主義擴張了階級這個類目的概念內涵，使階級包括了權力與社會地位（一般人對某人等第的「看法」）。

位置，而是一種存在於（比如，）資本與勞工階級的關係，它的判別標準是生產工具的產權。根據關係的觀點，若無勞工階級則無資產階級，反之亦然。因此，階級就具體展現於連結與分裂二者的移動紐帶中。最後，誠如威廉士所說 (Williams, 1976: 58)，階級也是「一種『形成』，基於歷史因素，知曉這個處境及正視這個處境的組織，已經孕育產生，並已有相當的發展」。根據這個觀點，階級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內存在，取決於人們是否知曉他們的階級位置，並根據此知曉而行動，階級必須具有「自為」的性質，不只是只有「自在」的性質。

我們雖然可以有以上區分，但這些思考階級的方式，仍有可觀的重疊之處。比如，社會歷史學家湯普森 (E. P. Thompson, 1963) 的大部分著作，寫的是關係的與形成的概念之下的社會階級。另外，這些定義的特定面向是哪些，歷來也有很長的辯論。階級類目怎麼決定？是收入、財富、權力、地位，或者這些標準的某種結合？階級關係怎麼決定？是生產工具、再生產工具，或是行政工具？階級意識怎麼決定？是個人的知曉、社會傳播，或已有組織的抵抗？關於這些面向及關於不等立場是否彼此相容，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這就是當前關於社會階級之辯論的狀態。

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積累了一些論述社會階級的文獻，主要是從一種類目的觀點的研究，它探討階級權力的意義。這些文獻展示了媒體精英如何生產及再生產他們對傳播事業的控制，分析了媒體精英的階級成分，以及媒體精英之內的整合與分裂形式。早期的著作包括了米爾士 (Mills, 1956) 所作關於美國媒體與娛樂事業精英的研究，以及克來蒙 (Clement, 1975) 對加拿大媒體精英的評估。較為晚近的著作則對北美以外的媒體精英有了更多的研究 (Tunstall and Palmer, 1991)，晚近的也研究也注意到了階級統治網路的增長，以致大眾媒體與新傳播及資訊科技已串連起來 (Mattelart, 1991)。第二，亦有研究鎖定媒體企業家與其餘精英階級的綿密連結網路，雙方透過董事

會成員、工商協會、市民組織與私人俱樂部等，緊密扣連 (Dreier, 1982;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H. Schiller, 1981)。最後，有些研究則專研階級統治，如何展現於決策制定及規範的過程 (Coulter, 1992; Mosco, 1982：第二章；Rideout, 1993; D. Schiller, 1981)。

218

這些研究增加了我們對精英統治結構與過程的瞭解。政治經濟學對此統治對其餘階級結構造成的後果，亦有置語，比如，它也討論了整個階級結構之內，不同的社會階級，具有何種不同的使用傳播資源的權力。這方面的研究在現在格外重要，有幾個相關的原因。過去十五年來，由於新保守政府採行了嚴峻的政策，壓低高所得階級的稅率，通常也向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促銷預算緊縮的政策（婉轉地稱之為「結構調整」的手段），這就造成了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保健支出的減少。奔向商業化、自由化與私有化公營機構（包括公共服務傳播體系）的壓力，加重了嚴峻政策的分量，因為這些政策強調市場機能的程度，遠遠超過從前的水平，它更加以市場標準決定誰能使用社會勞務（包括傳播資源）。最後，我們也看到了使用者付費服務的進展，愈來愈精煉，這個現象並且席捲了傳播體系，諸如線纜、衛星電視，付費標準可能按月、按頻道，而按片付費的情況也在增加。這些趨勢塑造了傳播階層體系的形成，是否能夠使用傳播資源，愈來愈要看我們的付費能力。

高丁與梅鐸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28-29) 引用歐本海默 (Oppenheim, 1990) 的資料，確認了英國收入差距有增無已，最高所得的五分之一男性人口的薪資，增加幅度比最低五分之一人口多了 42%。依靠社會安全瓣的家戶落差也告擴大，結果是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間，最窮五分之一人口的稅後所得，從 6.4% 降為 5.1%，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則增加，從 40% 至 45%。階級壁壘如此分明，在傳播層面造成的後果之一，可以舉高丁的分析為例，他研究的是收入（傳統上定義階級的最起碼的指標）與電話、電視與家用電腦擁有率

的關係^①。如其資料所示，收入與這些傳播財貨的擁有率，一直相關。

這些資料與美國經驗吻合。根據國會預算署，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九年間，美國最高所得的百分之一家庭，稅前所得增加了 77%，最高的五分之一則增加 29%，第二個五等分家庭增加 9%，第三個五等分增加 4%，而第四個五等分與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卻分別減少 1% 與 9%。根據一九九二年美國普查資料，美國所得分配穩定了五十年以後，最高五分之一的收入在一九七〇年占了全美收入的 40.9%，到了一九九〇年則是 44.3%；中間五分之一的人從 17.6% 下跌至 16.6%，第二窮的五分之一從 12.2% 到 10.8%，最窮的五分之一從 5.5% 到 4.6%。在這段期間，稅後所得的增加，有 60% 進入最高所得的百分之一家庭的口袋，34% 的增加進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家庭，而其餘的百分之八十家庭，則只分配到了剩下來的 6% 的增加。在一九五九年時，美國最高百分之四人口的薪資，與最低百分之三十五人口的薪資相當。到了一九八九年，落差擴大到了最高百分之四人口的薪資總合，與最低百分之五十一工作者的薪資總合相當 (Barlett and Steele, 1992: ix)^②。加拿大的階級分裂同樣在擴大，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國相同類型的牽制，部分原因是加國政府在一九八〇年代也採取與這個南邊鄰邦相同的新保守政策。雖然這些貧窮的境遇，仍可因社會福利體系的存在，掠得紓緩，但企業界與政府恆常地攻擊福利體系^③。這些社會的階級屬性反映在媒體的使用類型。比如，收入與可能擁有家用電腦的機會，呈現明顯關聯^④。

美國傳播政策在一九八〇年代的轉變，也標誌了更多的階級權力

219

③ 收入通常指涉薪資、租金、利息與紅利。財富雖然是更好的階級位置之指標，因為它還將所有的家庭資產（房地產、汽車、股票、證券等）列入計算，但卻很難分析，因為除了會有測量的問題以外，有關財富資料的蒐集，並沒有如同收入那般具有系統。

之橫行。這個事實反映在非商業電子媒體身上，如政府補助公共廣電頻道的經費減少，使得公共媒體必須依賴更多的企業支持，這也就如同引進了可觀的市場力量（包括它已播放第一支廣告），先前，這些公共媒體的節目政策固然經常遭人批評，但大抵還是反映了公眾的關

-
- ④ 最近的資料顯示，美國的貧窮愈來愈普遍，也愈來愈集中在某些地方。美國普查局的報告指出，一九九二年的窮人數目，再次上升，到達了三千六百九十萬人，或是美國人口的 14.5%。再者，住在貧窮集中區（住民有百分之四十是窮人的地區）的人口，在一九九〇年時，上升到了二千四百萬，一九八〇與一九七〇年各是五百六十萬與三百七十萬（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Census, 1993）。譯按：歐洲聯盟統計署（Eurostat）的資料指出，一九九三年，歐聯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兒童，住在貧窮之家，其中丹麥、法國與德國最低，分別是 5%、12% 與 13%，英國則高達 32%（見 the Guardian, April 28, p.1 的報導），原因可能也是與英國一九七九年以來採取的激烈保守經濟政策有關。
- ⑤ 根據《加拿大統計》報告，一九九一年時，只有最高五分之一家庭占全國收入的比率增加，占了百分之四十所有家庭的收入。該年最低五分之一則占了 6.4%，與前一年相同。根據政府的統計調查，一九九一年的窮人數目增加了四十萬，總共是四百二十三萬，占總人口的 16%，而一九八九與一九九〇年分別是 13.6% 與 14.6%（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1993）。
- ⑥ 克魯格（Krueger，轉引自 Nasar, 1992b）研究電腦使用與薪資高低的關係。他的結論是，在工作過程使用電腦的勞動者，他們的所得高過不使用者百分之十到三十，雖然兩類人在其他方面都相同。還有，使用電腦的人偏向是女性、白人以及高教育程度的人。不需在工作中使用電腦的人，則不成比率地是黑人、男性與輟學者。另外，皮樂與魏曼（Piller and Weiman, 1992）認為貧窮學區的電腦使用，與較為富裕學區學童的電腦使用，相當不同。後者使用電腦作為創造性探索（如設計多媒體的展示），前者則集中在練習與例行作業。他們的結論是，「電腦並沒有成為改革的工具，電腦反而強化了貧富的雙元教育體系」。

表 6-1 美國媒體滲透率，以性別、種族、教育與收入分，1989

特 徵	總人口	電視收視率 與普及率	電視全時 段收視率 與普及率	有線電視 收視率 與普及率	收音機收 聽率與普 及率	報紙閱讀率 與普及率
性別						
男	85,035	91.8	75.1	50.7	87.1	85.7
女	93,246	91.6	77.7	45.3	83.6	84.6
種族						
白	154,028	91.2	75.9	50.2	85.4	86.5
黑	19,599	95.5	80.3	32.7	84.5	78.8
其他	4,653	93.2	79.7	34.6	85.0	66.3
西班牙語系	10,301	91.0	74.7	38.9	90.8	76.7
教育						
高中以下	45,389	91.8	75.9	36.7	75.2	71.9
高中	69,392	91.8	77.8	49.7	86.7	86.6
大專肄業	32,228	91.5	74.5	54.8	90.5	91.6
大專畢業	31,271	91.4	76.3	53.0	91.3	94.2
就業						
全職	101,695	90.8	75.8	51.8	91.1	87.7
兼職	11,602	89.9	72.6	50.4	90.3	88.1
失業	64,984	93.4	78.2	41.3	75.2	80.5
家戶收入						
低於 10,000	19,644	91.6	74.4	27.4	70.9	66.6
10,000-19,999	31,564	94.2	79.4	38.0	80.5	79.3
20,000-29,999	32,361	91.7	77.0	47.5	84.2	84.8
30,000-34,999	16,105	93.3	78.6	49.1	89.1	87.1
35,000-39,999	14,391	91.5	77.5	55.7	88.9	89.4
40,000-49,999	24,001	90.6	75.2	54.4	90.8	90.8
50,000 或以上	40,215	89.8	74.2	58.8	90.7	93.1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 550

表 6-2 英國傳播設備擁有率，以收入分，1989

一週收入 (英鎊)	電話擁有率 %	錄放影機擁有率 %	家用電腦擁有率 %
46-60	64.3	13.9	0.8
81-100	73.9	25.9	6.2
126-150	83.9	42.6	6.9
151-175	83.9	55.4	11.2
176-200	87.2	65.5	14.1
226-250	96.2	75.4	25.8
276-325	96.2	80.5	29.4
376-450	98.6	85.2	33.1
超過 450	99.7	77.7	34.3
所有家戶	86.2	56.6	16.6

資料來源：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29

表 6-3 美國人使用媒體的情況，以收入分，1992

家戶收入 (美元)	總人口 (千人)	電視收視 與普及率 (%)	電視黃金 時段收視 與普及率 (%)	有線電視 收視 與普及率 (%)	收音機收聽 與普及率 (%)	報紙閱讀 與普及率 (%)
少於 10,000	20,273	93.7	82.7	41.8	77.4	64.9
10,000-19,999	29,823	95.2	84.2	45.1	79.1	73.8
20,000-29,999	30,266	94.1	81.5	52.6	82.5	82.2
30,000-34,999	14,976	94.8	83.6	58.9	78.9	85.7
35,000-39,999	13,113	92.2	78.3	63.1	89.3	89.8
40,000-49,999	22,008	94.0	81.2	64.0	91.1	90.5
50,000 或以上	54,703	91.7	78.1	69.9	91.6	92.8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561.

懷，人是被當成公民看待，不是被當成是消費者。由於對企業及慈善社團的捐贈有了更多的依賴，公共廣電機構的節目政策，變得必須呼應這些出錢者所代表的階級成分。在商業電子媒體部分，美國政府不再限制廣告時間的上限。結果，有兩家主要家庭購物頻道（QVC，英文「品質、價值與方便」三字的簡寫，以及家庭購物網 Home Shopping Network），在一九九三年就合併成爲最大的傳播網路，成爲電視市場的一大力量，它的成功原因，就是仰仗可以自由地在所有播放時間，不停地播放廣告以販賣產品。美國政府也取消了公平原則，以前，儘管傳播委員會也僅只是虛與委蛇地執行這個規定，但它總還牽制了廣電業者，敦促它們必須力求平衡地呈現公共領域的議題。如今電臺可以愛怎麼播報就怎麼播報，不僅如此，它們不再有義務要報導任何類型的新聞。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也放鬆了產權規範，甚至使得在地方具有壟斷地位的產業（如電話公司與線纜公司），視其市場爲禁巒，在客戶能夠承受的前提下，更加容易地提高價位。

美國政府不再規定無線電視的新聞與資訊節目的比率以後，提供新聞與資訊的責任，形同轉到了有線電視系統的 CNN、C-Span 與其他新聞網身上，而三大電視網也就削減了新聞採訪，類如總統大選等政治事件的轉播也減少，而幾乎所有的公共事務的紀錄片製作，也已停擺。但主要由於高價格，再加上有些線纜公司不怎麼願意在低所得地區鋪設線纜，這就是爲什麼在一九九六年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二家庭是線纜電視的訂戶^⑦。結果很明顯，一大部分美國家庭無法從電視中，知悉電子新聞與資訊。由於政府形同不再規範取得地方特許壟

⑦ 以前，依據共同載具的規定，電話公司必須提供所有顧客使用其設施的權力，並且價格費率必須合理，亦得接受規範。在最為主張公共利益者眼中，這些規範已屬疲弱，但仍比現在線纜公司所需遵守者，強過許多。最近幾年這個情況更是明顯，因為大多數線纜價格的費率規範，已經取消。

斷權的公司，再加上線纜市場日漸集中，主要落入兩家超大集團手中（時代·華納與「電信集團」TCI），於是抗議聲不絕於耳，最後才有一九九二年時，再度重新引進某些監督，規範基本線纜的訂費^⑧。

放在電話業務方面，階級強權等於是重新分配財源，將地方家用訂戶數以十億美元計算的金額，轉到企業集團的荷包裡。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起自一連串的決策，將營運電信體系的成本，移轉到了地方家用訂戶與中小企業 (Ramirez, 1991)^⑨。究其實，這個成本責任的移轉，反映了相關決策等於是要求一般家用訂戶，付錢鋪建基礎建設（也就是所謂的電子資訊高速公路）與新的電信服務，業界論稱其未來發展，缺此不可，但實際上，這種需求根本就很低^⑩。雖然許多政策分析家都宣稱，美國的「既成事實」是家家戶戶有電話，但美國低收入戶有百分之二十（包括大約百分之十五的所有黑人與中南美洲後裔家戶）沒有電話，他們斷斷不會同意這個說法。誠如國會科技評估署一份報告的結論所說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1)，住在鄉村的居民也斷斷不會同意這個說法（英國的情況請參見 Hepworth and Robins, 1988）（譯註 1）。情形確實如此，人民眼見他們的電話帳單步步高升，於是群起施壓，而有趣的是，大約在這個時候，美國又已取得共識，認定了傳統的福利政策，不是服務窮人的最佳方式，但在此背景下，聯邦傳播委員會與州規範機關卻又開始

⑧然而，這些新規則非常寬鬆，以致於大約百分之三十的線纜訂戶，付出了較高的訂費。這使得聯邦傳播委員會必須在一九九四年修改它的線纜費率政策，並壓低基本線纜訂費百分之七。一九九六年的《傳播法》則打算逐漸取消大多數線纜費率的規範。

⑨美國消費者聯盟 (the 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報告指出，壟斷市場的各貝爾公司 (Baby Bells)，自一九八四年 AT&T 解體以來，已經超收顧客三百億美元。

表 6-4 美國電話普及率，以社會、經濟特徵分(1992，%)

特徵	全部種族	白人	黑人	西班牙人後裔
全體	93.9	95.3	83.8	86.6
家長年齡				
16-24	82.0	85.3	63.1	78.0
25-54	93.2	94.7	82.9	85.8
55-59	96.2	97.0	91.2	91.3
60-64	96.6	97.6	90.1	92.2
65-69	95.9	97.1	85.8	90.3
70 以上(含)	97.6	98.3	92.0	95.4
家戶人數				
1	91.9	93.8	80.1	79.6
2-3	95.3	96.5	86.2	88.5
4-5	93.5	95.0	83.3	87.2
6 人以上(含)	90.6	91.8	85.2	86.6
勞動力狀態				
總人口	94.7	95.9	86.5	88.5
就業中	96.0	96.8	89.8	90.2
失業	88.5	90.0	82.8	85.9
未列入勞動力	93.4	95.1	82.8	86.0
收入(美元)				
少於 5,000	71.7	76.0	63.0	66.9
5,000-7,499	83.7	85.9	76.7	72.8
7,500-9,999	88.3	90.4	79.3	78.4
10,000-12,499	90.0	91.0	83.5	81.2
12,500-14,999	91.2	92.3	85.4	84.1
15,000-17,499	93.2	94.3	86.4	87.3
17,500-19,999	95.6	96.4	89.7	91.6
20,000-24,999	97.2	97.8	91.5	96.0
25,000-29,999	98.2	98.4	96.9	96.1
30,000-34,999	98.6	99.2	95.7	96.7
35,000-39,999	99.0	99.3	96.4	96.0
40,000-49,999	99.5	99.5	98.9	99.1
50,000-74,999	99.4	99.4	98.7	100.0
75,000 或以上	99.4	99.5	95.3	99.1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563

介入，發動全美電話福利政策。他們推出婉轉的用語來包裝，如「連線」與「生命線」，實際上是進行州級與聯邦級政策，修修補補，預定補助牽線費與電話月費，只要申請者能夠通過每州自定的標準即可獲得。比如，一九九一年，南卡羅萊納住民只能申請「連線」，且申請者必須是四種福利補助之一的領取戶，同時也要通過電話公司的標

⑩ 認定規範之改變合情合理的人認為，改變只是使價格與成本能夠同步消長。實際上，規範的改變等於是取消了補貼，而一般認為是取消了長途電話用戶對地方電話用戶的補貼。挑戰這個看法的人，來自兩個陣營。第一種 (Oettinger, 1988a) 認為，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確定方法可以決定最好的定價程序，因為界定條件是主觀的認定（什麼才算是地方電話？），而更重要的是，定價程序是「政治」所決定。若是用歐停格的用語，這個觀點會認為以成本來決定價格，根本就與童話故事相去無幾，它只是將產業權力均衡後所定的價格，加以合理化而已。另一個觀點則認為 (Aufderheide, 1987; Denious, 1986; Melody, 1984)，是有補貼，但方向倒反，是地方用戶補貼長途用戶。是有證據支持後面這個觀點，地方用戶支付長途用戶所需要的基礎建設及服務，不成比例地高。（譯按，另據一份一九九四年的資料，美國的長途與國際線路已經是光纖，但地方則不是，這可能也是地方用戶分攤了光纖成本，但並無法享用光纖的收益，亦可說是地方對長途的補貼。若要將光纖鋪設至美國地方層次，需要二十至三十年，以一九九四年的成本估算，需要二千至四千億美元。Nicholas Baran, 1996, 'Privatiz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59-69。）

譯註 1 根據英國「中央統計署」(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調查，一九九三年英國的電話普及率是 89.6%，但每週所得低於六十英鎊的家戶，只有 65.0%，八十至一百英鎊者，78.7%（轉引自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的 1996 年版，p.27）。一九九六～九七年間，若是使用公共電話，英國與美國的起價分別是十便士與二十五分，折合臺幣 4.5-5.0 元與 6.6-7.0 元，是臺灣的四至七倍。一九九六年七月臺灣原本國營的電信局，改制為公司（但政府仍持有相當股權），提高地方通話費的壓力亦已顯現。

準。另外，奧瑞崗住民可以申請「連線」與「生命線」二者，但必須是食物券領取戶，收入也必須在州政府規定以下(U.S., FCC, 1991)。福利國家設定的關卡、通過家計調查才能領取補助的程序、政府其他處處提防的措施，再加上官僚科層的衙門作風，使得實際申請者比符合資格者，少了許多，這個情況顯示，歷來永遠有些必須依賴社會福利維持生活的人，總是在經濟上與在心理上被排除在外，他們永無機會，而實際上也永遠未曾得到社會福利的照料，這個現象在電話的福利政策，亦告重演（至一九九一年三月，「連線」與「生命線」各有3%與32%的人申請）。

225

類同情況也在所有電子服務市場上演。打著「減少紙張使用」的口號，美國聯邦政府縮減了資料蒐集的預算，爲了商業理由，又將原先免費供應社會大眾使用的資料（社會大眾已支付了蒐集這些資料的經費）私有化，然後將很大一部分政府資訊轉移到電子線上資料庫，只有花得起錢，能夠使用電腦科技的人，才有機會使用。根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雙年度報告，《美國政府資訊愈來愈少，愈來愈少人能夠使用》（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8: 序文），眼前的趨勢是，「政府活動祭出了成本效益的分析、在最大範圍內依賴私人部門散布政府資訊，以及向使用者收費來回收成本。這些所可能造成的結果是時下已在進行的商業化與私有化政府資訊的走向，還會加速進行」。該協會又指出，美國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已經進入大蕭條時期以來，最壞的狀況中(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1: A1)。圖書館員與其他人都擔心免費服務的政策，前途艱難，該協會副會長擔心這會「扭曲圖書館未來的服務」。爲了提供特定服務，以便增加它們需求孔急的收入，我們可以理解圖書館的某些作法，但這樣一來，它們也就不再能夠執守原則，館藏的資訊也就不再無分付費能力地提供所有使用者使用(De Witt, 1993)。最後，美國的公立中小學系統，財務已經緊張到如此程度，已有一萬二千所學校，也就是大約一半的全美國十二至十七歲學童，現在「必須要求」他們的學生在學

校收看「第一頻道」的節目，一個由廣告贊助的電視新聞摘要節目。學生收看第一頻道的節目，學校得到的是他們認為他們很需要的影像科技^①。

階級強權也影響了當代工作場合的構造，許多研究都指出，大量服務部門的工作，如今已走向雙元分明的層級。高技術的人得到訓練，使用資訊科技，豐富了或使他們的工作「與資訊為伴」（套用 Zuboff, 1988 的用語）。但更多人只是在旁服侍機器，機器就將其工作自動化了。政治經濟學對工作場所的階級強權之行使，早有長年的研究，辯論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馬克思的論點（在生產點上，構思與執行工作的分離），當代的辯論並由布雷夫曼 (Braverman, 1974) 的著作而添加新的活力。

這類研究讓我們思索，階級強權透過什麼手段在傳播工作場所，先是消滅了勞動力，然後是利用監控手段，控制其餘的工作者。如今，沒有任何職業結構的部門不在經歷重新結構的過程。雖然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製造業部門的失業情形，但現在的情況是，被引為一九八〇年代「繁榮引擎」的服務業部門，如今也只能說是緩慢成長，並且面臨大幅度的轉型。傳播產業正正宗宗是服務業部門的一部分，如今正感受到了工作機會的流失與重新結構的境遇 (Nasar, 1992a; Zachary and Ortega, 1993)。

226

這些年來，印刷與出版業的技術變遷，排山倒海，其中電腦控制的生產方式對藍白領雙方所造成的衝擊，允為史無前例。以藍領勞工遭受的影響來說，電腦化組版之後，排字工人與組版工人全部不再需

① 一頭栽入傳播科技及電腦識字率等概念的人，忘卻了美國一般識字率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根據教育部研究，一九九三年美國一億九千一百萬成人公民當中，有九千萬人連最起碼的英文熟練度，都還稱不上 (US, Congres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1995)。

要了。全頁組版系統將版面構成與設計的責任，大部分轉移到編輯身上，編輯則發現自己花在看稿、移稿等編出好的新聞的時間，少了許多，反而是學習怎麼將稿件組成電腦版面的時間，花得多些。科技變遷也對廣電新聞造成了影響，在有了手提攝影機與自動剪輯等機器之後，布署在編採新聞的人也減少了。特殊效果也在降低員額的過程，參了一腳。比如，BBC 創設了一個自動化的「虛擬實景」攝影棚，以此減少了影棚製作人員的需求，它讓觀眾看到了是實景四倍大的影棚，其最昂貴的道具（帶有 BBC 紋章的精雕水晶品）只存在於使得攝影棚看起來大了好幾倍的影碟中 (Drohan, 1993)。

如同已經在印刷新聞業所發生的，影像新聞記者也必須執行新的工作，以前交由技術人員及繪圖藝術人員完成的工作。現在記者有了能力，可以在單一電腦螢幕前叫出影像及圖片（包括旁邊留有空間作為腳本文字的寫作之用），足以使得製作電視新聞所需的人數，從三減到一。這個行業的刊物現在已經預測，這些「桌上型影像」系統將大幅度改變影像新聞的工作。用這種效率增進法來重新結構，使得相關公司得到許多好處，除了可以將風險外在化，這些公司現在只需要依賴一小組具有高度技能的工作人手，如此也就不必承擔大量工作人力所需的成本（包括員工組織工會）。

自動化也大幅度削減了電信產業的雇用人數，自動化的電信系統，如今處理長途及其他檢索工作等等，所需的電話接線生人力在十年內，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參見表 6-5）。類似的系統也削減了電話維修、工程與一般職工的人數 (Moody, 1993)¹²。尼爾森 (Nielsen, 1990) 與華思寇 (Wasko, 1994) 針對科技變遷對電影業產生的衝擊，提出了檢證資料，顯示許多電影科技實際上已經使得所有的生產工

¹² 根據家林格等人 (Challenger et al., 1994) 的報導，一九九四年元月美國公司宣告的解僱人員，有百分之四十一是電信員工。

表 6-5 美國電信業解僱員工估計數（包括宣告與計畫中，1992-4）

公 司	解僱員工數量
IBM	35,000
AT&T	26,000
GTE	20,000
Nynex	17,000
Ameritech	11,000
Pacific Telesis	10,000
BellSouth	10,000
U.S. West	9,000
Apple	2,500
Southwestern Bell	1,500
AST Research	1,000
Compaq	1,000
總計	144,000

資料來源：Andrews, 1994: D1; Mandel, 1994: 26

作，幾近重新結構化了影片放映師、技術人員、換片人員等等，通通不再需要了。

階級強權也更加嚴密地「控制」了當代的工作場所。比如，既然許多人工作時必須使用電話與電腦終端機，資方也就以此測量人們的工作時間（每分鐘接的電話數、每小時鍵入的次數、當班時掃描的雜貨數量等等），以及人們的績效（休息的次數與長度）（Clement, 1992;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87）。我們在這裡再次領悟，只要科技做得到、可供行銷，可供控制，資方就會很想拿來作為評量與監控之用。雖然談到這個主題時，「老大哥」的鬼影經常在我們面前逡巡，但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倒不能說這是有不理性的驅力，要強行壓制人、支配人。在某些層面裡，倒是有一種新的權力形式，它並不是具體的強制力，而是迂迴婉

轉，幾乎就是傅科 (Michel Foucault, 1982) 所說的身體政治學的毛細管體系。這個意義之下的監控，指的是競爭環境中，正常商業實務的延伸。比如，航空公司 TWA 監控其票位代理商，每週每月都分送報告卡，以電腦測量花用在電話上的時間，並記載主管對通話記錄的評估。一位公司主管說，「我想我們與任何其他工作場合的形態，沒有什麼不同。從生產力的觀點來看，我們相信要讓所有代理商維持起碼的水準，一定可能。顧客的錢賺來不易，我們要讓顧客在花錢時，物合所值」(Kilborn, 1990: 8)。

這些階級分析的形式很重要，因為它們檢證了階級所能解釋的範圍，遍及社會中的傳播生產、分配與消費。然而，這些分析大抵只將社會階級當作是一種「類目」術語。它們的重點旨趣是研判這個類目中，其成員的位置，並描述相關的行為類型，包括再生產階級類目的行為。它們突顯了階級的結構色彩，若是論及階級形構的過程，則大抵將它當作是再生產的問題。這類研究對自由多元主義者的觀點，特加批判，因為自由多元主義者否認或忽略階級結構的存在，他們認為媒體的生產、分配與消費是民主市場法則的自然成果。根據自由多元主義者的看法，市場也許需要一些調整，但由於主要的分析單位是個別的消費者（定義是一個人或一家公司），調整也就是改善市場如何為個人運作的方式，不是改善根本存在的階級分裂。

228

階級的類目觀有力地批判了自由多元主義的觀點，但它的批判若是再注意以下三點，則可望更為有力。第一，傳播的階級分析若多加納用「關係的與形成的」社會階級概念，會大有收穫。第二，若是能夠將社會階級與其他結構化過程的起點，作個連結，特別是在階級、「性別、種族」以及將反抗階級（及其他形式）強權的能量組織起來的「社會運動」之間，作個連結，它的論點可望強化。最後，它還得與「霸權」的建構（或「常識」的社會構成），作個更加緊密的連結。

「類目概念」界定階級的標準，是檢視在一個特定類目之內（也

就是財富或收入），其內涵是些什麼，「關係概念」的方法則尋求找出不同類目之間的連結。根據後面這個觀點，社會階級並不是由一個階級的內涵或欠缺什麼內涵而決定，階級的界定取決於它與其他階級的關係。若是沒有勞工階級，也就沒有統治階級，反之亦然。階級之所以能夠算是階級，是因為不同階級之間存在特定關係，如生產、再生產與傳播工具的產權與控制權等等。我們可以借用不等理念型界定這個關係，包括「和諧」（階級整合，彼此均接受這樣的階級關係）、「分離」（階級彼此相互排除），以及「衝突或抗爭」（不同階級經常處於拉鋸戰的狀態）。

就研究實務來說，類目的與關係的取向會有重疊，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論及此類目而不涉及它與彼類目的關係，反之亦然。因此，即便幾乎完全只研究傳播精英，我們還是會旁及於這群精英對其工作場所與對消費者所造成的衝擊。與此類同，關係的取向必然也要指涉是哪些類目在產生不同的關係連結或分裂。即使實際上，這些不同只是程度問題或重點有別，但這對整個社會階級的分析，還是會有重要意義。對於政治經濟學來說，階級的類目觀的重要效應之一，是它突顯了頂端類目的階級強權，擁有龐大資源，但在底端的階級，卻因此無法擁有這些資源。根據這個觀點的研究發現，很有意義，雖然還不完整。因為人們對資源分配的意義之理解，將會決定階級關係的性質，分配方式是否能夠維持，或是會斷裂，也就會受到影響。

同等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一個階級所欠缺的東西，界定階級。這裡我們就必須再次強調欠缺生產、再生產與分配工具的控制權，欠缺財富、收入，也就欠缺有財富有收入才能得到的機會。以傳播而言，同等重要的是，我們要詳細檢證資料，說明欠缺傳播、大眾媒體與電信工具使用權的後果。但無論再有多重要，這樣的類目觀點也只能限於重複其結論，指出較低階的階級，就是欠缺資源而無法擁有權力。有些社會學家處理這個課題的切入點，是將階級結構視為一個類目的連續體（上上階、下上階等等），愈是往下移動的階級，擁有的

資源也就愈少。傳播領域中，費斯克 (Fiske, 1989) 最知名之處，是他提出了一個類目連續取向，特別地區分了文化等級的文化資源。雖然這個取向對階級結構有了更多的發揮，它也體認在階級類目的許多邊界，存在許多模糊地帶，但它使得真正類目的與關係的階級觀之差異，更加晦澀，遠多於它對它們的澄清。社會關係的取向拒絕呼應類如費斯克的主張，它認為我們無須放棄階級的類目概念，拒絕承認這些類目只是一個真正連續體之上的虛造之物，社會關係的取向堅持我們必須將各類目之間的真正關係，說得一清二楚，它又堅持我們必須處理階級的「形成」。

結構化取向很重視階級形成這個概念，因為它指涉的正是社會動能在階級結構的中介下，創造階級的過程。站在這個角度，我們看到的階級是社會形構的積極過程，它運用當前階級結構中的資源，同時也受其限制。因此階級並不是一個擁有充分或完全沒有資源（包括傳播資源）的類目，將階級視為變化中的整組社會關係，更為恰當一些，這個關係將因社會動能者的行動，如何運用而又受限於這些關係所形成的結構而定。人們在社會行動的過程，構成了自己，也構成了他們的階級。相較於集中在類目、結構與社會再生產，結構化取向並沒有那麼機械化，因為它眼中的社會階級，固然是社會生活的核心物質力量，但同時也是階級關係中，各方人馬的社會行動之產物^⑧。

由於類目觀點如此重要，政治經濟學對社會階級的研究，採取社會關係的與社會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就還不多見。這個情況不難理解，階級強權是深化了人們的疏離感，寶笛 (Pierre Bourdieu) 就曾論稱，疏離感的浮現，是因為「權威在發言」，受支配的階級在此局面下，

⑧ 關於採用形成的取向以研究社會階級的例子，請見 Katz et al.(1982)。

不斷地被要求接受他人對他們自己的評價，然後緊記他人的觀點與評價，他們總是與自己形同陌路，不再是與他們自己有關的評價之主體，不再是他們對自己的觀點的視野核心。（轉引自 Mattelart, 1983: 19)

230

這裡，在馬特拉的傳播研究中，我們看到了形成的階級研究取向。他將這個工作稱作是尋找「失去的典範」，包含了受支配階級構成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與支配階級是一種關係的形成，另一方面，他們自覺了他們自己的需要與利益，這又是另種關係的形成。馬特拉知道超越類目觀點的困難，於是在西方之外，在西方工人的傳統草根傳播之外，討論大眾媒體的使用與流行文化的實務與表現。他的作法是以實際材料說明這些人如何創造他們自己的傳播工具，推演自己的語言，凝煉他們自己的常識與民衆霸權，雖然其霸權的構成與統治階級的霸權，彼此相安無事，並不衝突，但它仍然是社會行動（包括階級抗爭）的獨立基礎。對於這樣的呼籲，也就是透過形成的觀點來研究階級，政治經濟學者是有了初步的反應，尤其是關於勞工階級與勞動的文獻，更開始直接地檢視了這個領域（比如，參見 Bekken, 1990; McChesney, 1992a; Ross, 1991; Waterman, 1990）。這已經是起步，他們認定勞動人民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也不再只是「具有創造力的接受者」（羅思的用語），而是「大眾文化的真實生產者」（Ross, 1991: 336），然後由此展開檢視。我們迫切地需要研究對立與另類的階級運動，拉丁美洲、亞洲、非洲與東歐的革命性鬥爭，創造了大眾媒體作為其革命活動的一部分，而西方的另類媒體則提供了有別於資本家「常識」，來自工會運動者、來自庶民大眾，來自社會主義者。這類研究的要點，並不是沈浸在浪漫與慶賀，而只是在素質良好的研究之照引下，在分析了約制歷史創造活動的條件下，檢證資料而展示階級如何自我構成，如何創造歷史。

性 別

政治經濟學以社會階級作為起點，研究結構化的過程。前一小節認知了從類目觀點來檢討社會階級的價值，並描述了它在傳播研究中的運用狀況。我們也已經指出，如何以這個概念作為基礎，納入關係的與形成的社會階級觀。歷經這個轉向，我們可望強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因為我們已深化了社會階級的內涵，而許多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根基，正是關於階級的研究。雖然從階級入手所取得的這些業績，誠屬重要，但結構化的分析還必須由更多的概念作為參照，相互補齊。

社會階級是政治經濟學所需要的必要起點，雖然如此，單只如此並不足夠，我們若是要更為周詳地討論結構化及它與傳播的關係，至少還必須檢索性別的問題，套用簡森 (Jansen, 1989) 的話，性別問題在「社會結構之下，靜默無語」¹⁴。如第三章所說，政治經濟學與其他取向並不相同，它沒有完全對性別的問題，靜默無語，雖然它典型的作法是把性別課題當作社會階級關係的一個面向來看待。比如，政治經濟在研究資訊科技與國際分工時，就描寫了女性勞工在微電子產業所遭受到的雙重壓迫，她們承受最低的薪資與最粗暴殘忍的工作條件。然而，雖然政治經濟學向性別議題踏出了重要的步伐，但它仍然沒有能夠在政治經濟學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儘可能地涵納性別關係的問題 (Connell, 1987)。有些政治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正視這個缺失。比如，高丁與梅鐸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30) 在評估了這個領域之後，呼籲政治經濟學應研究女性與媒體的關係，並以此作結：

¹⁴ 關於新傳播與資訊科技的研究，性別議題付諸闕如，簡森對此特別在意。對此議題的進一步探討，參見 Friesen(1992)、Rakow(1988) 與 van Zoonen (1992)。

人們在生產體系的位置，與人們的傳播活動有些什麼聯繫，我們必須探索。我們在作此探索時，又應記住，「生產」並不只是薪資工作，它也包括了家政勞動。在「影子工作」（購物、清掃、烹調與養兒育女）主要是由女人承擔的情況下，女人與大眾媒體的關係，也就受到了根本的影響。

雖然關注之心存在，雖然我們也知道整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架構，發展還是有限，但我們還是可以察覺，傳播政治經濟學鮮少有任何努力要將性別納入其理論中。這類研究可說遲到已久，部分原因是關於性別與大眾傳播的一般文獻，年來已有巨量增加。我們以下就開啓一些入口，順著這類研究成果的路徑前行。

我們明顯必須分析的是，當今關於性別的社會研究，它們與政治經濟學的架構，在多大程度內能夠並容。這項分析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之內，為性別（或特定地說，為婦女）找出一席之地。「為婦女覓得一席之地」的想法，正是麻煩的所在。我們不應該如此構想，而是應該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之內，如何理論化性別的議題最稱允當，換句話說，我們要提出彼此能夠呼應的地帶，若是無法做到，至少要在彼此的架構內，確認雙方能夠呼應的條件或交接之道。我們亦須強調，許許多多人的研究（Dervin, 1987; Gallagher, 1992; Jansen, 1989; Martin, 1991; Moyal, 1989; Roach, 1993a），與這些努力具有相同關懷，他們已在搭橋銜接的企圖心之下，為我們先行鋪路。再者，我們也必須認知、欣賞明顯就是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重要貢獻，它們起於對女性主義的特定關切，認為必要先予研究，再談如何與其他理論取向連結（Dervin, 1987; Kramarae, 1989: 157-160; van Zoonen, 1991）。

在眾多性別理論中，強調社會而不是強調生物或心理類目者，最能夠與政治經濟的取向契合共容。還有，在一連串以社會觀點作為出

發點，因此也就能夠與政治經濟學契合的性別取向中，契合程度依序是「起始點是社會階級」的性別取向，比如，檢視社會階級與性別、權力的關係，其次是集中在「社會再生產」的性別取向，最後則是將焦點對在「性別與階級雙元性」（也就是父權與資本主義的相互建構）的性別取向。

以社會階級作為起點的性別理論，突顯了生產體系並將性別放置其中以供考察。它所評量的觀點有許多，比如，國際分工（無論是福特主義、後福特主義或新福特主義的定義）如何創造了勞動科層，而婦女又如何總是在此科層的底部，盤踞了大量的低技術、依附的與彈性的勞動後備軍。與此類同，傳播的階級分析也檢視生產與分配媒體及資訊的行業，存在著那些勞動科層，它將明顯存在的性別分工，放置在整體階級分裂的體系中，加以考察（Gallagher, 1985, 1992; Martin, 1991）。再者，這樣的分析也將考察性別與媒體使用的關聯，畢竟它認為階級已預先使得媒體使用的機會，多寡不等，並將性別關係放在這種傳播體系中觀察。比如，階級分析的研究，檢證了資料，展示窮人使用媒體的機會是在減少，而性別化權力的體系，又將女性不成比例地放入這個類目中，就更使得婦女進入了更為邊緣的地位，她們使用媒體、電信與資訊科技的機會，更見降低。

社會再生產理論使政治經濟學往性別分析的方向，推近了一步，因為我們此時不再聚焦於媒體的生產，或者，就使用媒體來說，不再聚焦於閱聽人的生產，我們轉而注意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就具體意義來說，這就是指我們的注意焦點，從工作場所移轉到了住家、家庭與性慾。雖然這是性別分析的專擅領域，但政治經濟學還是扮演了要角，因為社會再生產的分析敦促我們檢視資本主義再生產與階級結構的功能連結，以及住家與家庭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從這個觀點來看，媒體與住家密切相連，特別是經由婦女的活動，媒體連結了生產與消費體系，媒體修補勞動者的元氣，又將人們連結到消費網路，每有新媒體與資訊科技成品問世，消費網路就更深一層。需要、興趣與慾望

浮現於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娛樂與資訊節目以它們作為訴求，於是它們也就轉為直接或間接促銷消費的轉輪，再生產的循環圈終告完成。

這明顯是以功能主義取向分析社會的再生產，這個取向長存不斷，但大多數人卻體認矛盾傾向與抵抗形式的存在，因此資本主義與性別化權力的紐帶，也就有可能因而鬆綁。比如，斯密、馬克思與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知道，資本主義對於性別（以及種族、氏族）關係的衝擊，來自於不同方向。階級強權是構成了生產的科層體系，擯斥女性，或至少將女性邊緣化，但階級力量同時也侵蝕了許多限制人類潛能的傳統實務作為。所以，雖然資本主義繼續造成女性就業的侷限，它也鬆綁了女性的教育、職業及其他形式之社會活動與社會流動的枷鎖，雖然這部分是在政治抗爭壓力下所完成的。與此類同，緊緊扣住消費的傳播體系，也可以說提供了打破傳統角色、實務與價值的工具。我們還可以指出更多實例，說明資本主義的動態發展，飽含著矛盾。再者，誠如馬克思所歷歷指陳，資本主義在整個社會關係範疇，包括階級與性別，都製造了衝突。資本主義運用階級強權將生產與消費的社會關係，納入特定結構，但它卻不能確保這些關係「必然實現」，因為參與這些結構實務的人，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雖然他們的需要與興趣，或多或少均受到扭曲，並且只是被局部地偏倚塑造，但他們還是可以發揮社會意識，採取行動。人們的反省之一，是他們能夠認識到傳統紐帶被衝破以後，可能孕育的生機，然後就積極地參與重新使之結構化的過程。這樣一來，再生產的過程受到了挑戰，抵抗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源於是擴增，但也分散了開來。於是階級與性別都成為反對與抗拒的障地，時而攜手共進，比如，電話接線生幾乎都是女性的天下，她們就在電信工會中，組織了女性主義幹部會，向資方爭取較好的薪資與工作條件。然而，誠如女性主義運動之內的辯論所顯示，情況並非總是如此。階級與性別之間是存在著緊張關係，其中的一個其實反映了外在社會中，表現得也許更為激烈的性別與階級的團結裂隙，因此我們看到了兩類辯論。第一類觀點相對地

強調我們應該克服階級分裂，比如，要提供資源，讓較窮的人也能夠有較多使用與控制傳播工具的機會，第二類觀點則相對地強調我們要在階級之內，克服性別分裂的問題，比如，媒體公司的主管職務應該有更多位置讓給女性¹⁵。人們抗爭的不僅只是社會再生產，抵抗的形式也是抗爭的對象。

以上見解，或是由階級作為起點，或是強調社會再生產，除此二者之外，另有一類見解認為性別與階級是彼此「獨立的」類目，性別或階級都是社會權力關係的根基。根據這個見解 (Hartmann, 1979)，我們的社會，「既是」父權社會（也就是以性別為分），「也是」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以階級為分）。這些獨立變數並存於社會場域之內，時而互動，時而相互構成。賈蓄格 (Gallagher, 1985, 1992) 與史提芙 (Steeves, 1989) 是傳播研究領域之中，倡議這個立場的健將。史提芙提出了「全球性別課題」的議程，指出父權與資本主義是相互獨立而又相互連結的關係。這些課題包括，跨國公司如何成為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雙重工具，一方面，廣告與編輯及娛樂內容所促成的階級與性別觀與形象，有些什麼關係，另一方面，在媒體生產過程中與媒體組織中，女性是否占有職缺或是鮮見任用。她在結論中並討論了抗拒階級與性別分裂的形式，又討論了新資訊與傳播科技所呈現的問題與機會¹⁶。強調父權與資本主義的雙重性，則其立論優點是它的分析比較寬闊，我們可以集中在特定的一個變數，卻無忽略其他

234

¹⁵ 關於女性在大眾媒體專業的總合檢述，參見 Creedon (1993)。

¹⁶ 史提芙在另一篇論文裡 (Steeves, 1987)，對自由主義的、激進的與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對媒體的論述，批判地提出了評估。她的結論是，自由主義者的偏向，在於它「只向白人、異性戀、中產及上層階級的女性發言」。激進派（包括結構主義者）則傾向集中於文本，忽略了外在的社會架構。社會主義者的女性主義則點燃最大的希望，因為它能夠處理女性的經濟與文化位置之連結關係，也就是能夠處理階級與性別相互構成的問題。

變數之虞，但如果我們只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父權或是父權的資本主義，則也就不免忽略了另一個變數了。然而，任何根據相互構成的架構，都會遭遇到某些相似的問題，比如，它們如何確認此一領域的特徵——究竟是父權的或是資本主義的，何者是形容詞而何者又是名詞——它們又如何確認二者互動的性質。它又必須正視一個額外的問題：處理相互構成的過程之時，究竟是要選取何者作為特定的起點，是階級或是性別。

以上三個取向，指示了在整體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之內，我們可以如何思索性別問題。它們具有所有類目取向的優點：我們可以相對容易地運用，用其研究傳播研究中，特定的結構問題，如近用媒體、媒體組織中的權力，以及決策制定過程等等問題。它們也具有所有類目取向的缺點：它們似乎不怎麼注意社會形成的過程，特別是，它們無法告訴我們，究竟大眾媒體、社會階級，以及性別之內的選擇（如異性戀與同性戀），在人們積極地構成其性別關係時，產生了何種影響。

「形成的」取向則集中在研究過程，檢視性別認同的構成，如何透過社會結構、傳播工具、傳播產品，以及個人的動能（個人是社會關係中的行動者）而相互構成。比如，若是以這個取向來研究性別的構成，我們就會研究媒體機構之間的關係（媒體機構本身又運作於更大的政治經濟情勢中）、電視媒體、電視播放的節目，以及個人瞭解這個節目並對此節目有所反應的方式（個人在曝露於大眾媒體之前，已經具有特定社會角色並有特定的社會關係，雖然這個角色與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動態發展）。這類分析難以尋覓，部分原因是它要求的跨學科能力，從政治經濟學到文化分析，少有人同時兼具。某些最爲接近這類分析的著作，來自社會歷史之研究，它們認真地信守這個取向，開啓我們從社會角度，理解特定時期的能力 (Peiss, 1986) ①。這個取向的概念是，「社會再生產」一詞既太過簡單，又太過模糊，無法好好描寫這個過程，因爲它隱含是一種「拷貝的」社會發展

理論，它認定了文本與社會經驗之間，存在直線的關係。與此相較，文化分析家是往前推進了，他們提醒我們，文本具有多義的性質（這裡的文本需以廣義理解，指所有的媒體產品），但他們又掉進了自己的童稚陷阱，也就是他們一直忽略了媒體產品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與生產及分配媒體產品的制度過程有關，他們也忽略了個別動能的社會面色彩。再者，文化研究忽略了制度的與社會的影響，但這並不是說制度力與社會力僅只是外在於文本與個別動能的脈絡。制力度與社會力完整地參與了文本與個別動能的形成過程。有不少大眾傳播科技的社會史著作，提供了佐證，如道格拉斯 (Douglas, 1987) 以「業餘」收音機與男性陽剛之氣的形成過程為例，研究科技與性別的相互構成關係，史匹格 (Spigel, 1989) 與阿曼 (Altman, 1989) 研究電視與女性質性，馬汀 (Martin, 1991) 則研究電話與性別及社會階級的關係，他們都已開始檢證資料，展示這個複雜的過程。

種 族

傳播政治經濟學原本大抵由階級分析所盤踞，現在我們深入而又從多面向努力，將性別議題納入，這對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工作，大有幫助；我們必須將更多更深的社會經驗納入，不能只從傳統意義

- ⑰ 阿謀特與馬太 (Amott and Matthaei, 1991: 6) 的論點，呼應了這個取向，他們說，「任何時期的性別、種族—氏族與階級層級，都是從過去承繼而來，我們若是欠缺歷史視野，就無法充分掌握之」。不過，他們也體認，歷史或有可能壓縮他們稱之為「解放的知識」之進展：「我們能夠運用這些不同歷史時代之解放的知識，創造出解放的實務嗎？我們能夠因此控制我們自己的共同命運嗎？……我們可以超越歷史，尋求一個更新的、更有可能的聚合嗎？」(p.356)。關於女性主義觀的新聞史學，參見 Nesmith (1991)。

來瞭解傳播政治經濟學。不過，單是階級或單是性別，或者二者併合，還不能完全讓我們瞭解結構化的過程，部分的原因是二者都未能充分瞭解種族的力量。

一九〇三年，美國黑人民族主義者杜保思 (W.E.B. Du Bois) 說，「二十世紀的問題，是膚色界線的問題」¹⁸。他認為，一國之內與跨國之間，以及富裕的強權國家（幾乎全部都是西方的白人）與世界上其餘的依附國家之間，就是膚色界線的所在。我們已經指出，透過檢視媒體的角色與資訊科技的形成，傳播研究早已論及帝國主義的問題，並且論述廣泛，但在它看來，帝國主義主要是階級分裂的問題，或者（在較少數的研究裡）亦將帝國主義視為性別分裂的問題（比如女性在國際分工的位置），但它並沒有從這是一個「種族分裂」的角度來瞭解。然而，當代的全球政治經濟情勢，固然是由多層面的分裂所構成，但種族分裂確實是其中主要的一種，我們不需要以南非為例就可以知道這個事實，種族既是一個類目，也是社會關係的展現，它是一個根本的因素，影響了個人與集體近用本國的與全球的資源（包括傳播媒體與資訊科技）。

如同階級與性別，我們若從類目觀點瞭解種族問題，我們就會探討，為什麼種族因素會導致近用傳播資源的不平等。這包括了擁有及

¹⁸ 席凡那但 (Sivanandan, 1990: 13) 反覆陳述了杜保思的用語，當年的話，如今仍然繼續重要，仍然與社會階級設定的界線，緊密連結：

當今的膚色線，就是貧窮線就是權力線。我們不是白人，我們是窮人，我們是沒有權力的人。使三者發生連結的是資本主義；使這個關係永遠存在的是帝國主義。除了少數黑人精英位居要津，大多數的非白人世界，既沒權力，又與權力脫不了關係。他們在帝國主義之下翻不了身。這就是為什麼你不可能與種族主義戰鬥，但卻放過帝國主義。你不可能為了道理而為黑人戰鬥，卻不為道理而為勞工戰鬥。

控制傳播公司的情況 (Tabor, 1991)、媒體、傳播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職業分配情況 (Honig, 1984; Sivanandan, 1989)、擁有傳播與資訊工具的情況 (比如, 參見 U.S., FCC, 1991, 內載關於近用電信資源的資料), 以及媒體對少數民族的再現情況及少數民族的形象多元程度 (MacDonald, 1983; Silk and Silk, 1990; Staples and Jones, 1985; van Dijk, 1991; Wilson and Gutiérrez, 1985)。塔博 (Tabor, 1991: 612) 檢證了資料, 展示美國廣電機構對於種族歧視, 歷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如規範廣電事務的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 對電視上明顯的種族歧視, 不加聞問的程度: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 有位白人超級種族歧視者傑克森 (Jackson), 他在密斯思比經營一家電視台 WLBT。每當全美電視網的節目出現任何非洲裔美國人, 他就在螢幕打上「線纜故障, 歉甚」(Sorry Cable Trouble) 的字幕。當地的牧師與民衆群集抗議, 挑戰傑克森電臺不播放任何非裔美人的作法。但聯邦傳播委員會打擊了牧師與市民的立場, 仍然有條件地給予該電臺新的執照。

237 稍後, 聯邦法院推翻了委員會的決定, 但它置之不理, 並重新換給該電臺三整年的執照。聯邦上訴法庭最後裁決傳播委員會必須吊銷給予 WLBT 的執照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v. FCC, F.2d 543, 549-50 [D.C. Cir. 1969])。雖然一九六八年時, 傳播委員會就取消了廣電業的就業歧視條款, 但一直要到一九八九年它才支持就業歧視的控訴案, 並以此不核發執照給涉案的電臺。事實上, 我們是有證據, 顯示美國廣電業的專業黑人比例, 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至一九八〇年代之間, 是在下降 (Honig, 1984: 861)。

放在全球視野再作觀照, 種族又是國際分工形成過程的核心力量, 這個日漸環繞著微電子與資訊之生產的分工體系, 其技術與控制的組織, 包括了階級與性別, 但也至為緊要地包括了種族 (Sivanan-

dan, 1989)¹⁹。

種族分裂也持續展現在傳播工具的近用。許多分析家都說，已經有 92% 的美國家戶擁有電話，因此普遍的電信服務幾乎可以說已經達成。但根據聯邦傳播委員會自己的資料，幾乎有百分之二十的黑人與中南美洲後裔的家戶，就連基本的電話服務都還不曾擁有 (U.S., FCC, 1991)。由於美國社會至今都還無法全面普及這個服務，許多貧窮的黑人與中南美洲後裔都沒有這些設施，因此在政治壓力之下，促成了聯邦政府發動第一次全美國性質的電話社會福利綱領（參見本書第 329 ~ 332 頁）。最後，許多研究都檢證了資料，展現美國媒體對於少數民族的形象與角色模式的描述，實在都很狹隘 (Downing, 1988; Jhally and Lewis, 1992; Staples and Jones, 1985; UNESCO, 1983)。

種族分裂對於資源的近用，亦有影響，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了另一些問題。誠如古提瑞 (Gutiérrez, 1990) 所說，如果傳播網路沒有充分收編少數民族，消費市場的擴充機會也就失之交臂了。如同階級與性別的例子，資本利益在建構市場時，總是會遭遇許多難題，其中之一就是在收編新的人群與新的陣營時，必須同時容納新的訊息與新的形象，而這些新的東西具有潛能，也許會對現在占有支配影視

¹⁹除了居於主導地位，分析變化中的國際分工（部分是因新資訊科技而導致）之種族問題以外，席凡那但也強烈地捍衛物質分析 (Sivanandan, 1990: 47)：

但「當今的財貨」的「社會符號」對於「貧窮社會」的窮人，能有什麼意思，除了他們沒有這些財貨？當今的財貨又有什麼「意義」或「能量」可言，除了有的人不給，而沒有的人必須拿？在我們的社會中，誰又是那些人——「無論錢再怎麼少——都能玩其遊戲，使用東西來表徵他們是誰的人」，如果不是那些在滑鐵盧大橋底下，使用紙板紙箱遮衣蔽體的無家可歸之人？

空間的主體，提出挑戰。

238

以類目觀點研究種族與媒體，我們總能檢證資料，展示種族因素，對許多不等媒體的近用形式，都很重要。以社會關係的觀點與形成的觀點，探討種族與媒體關係的研究，數量比較少 (Barlow, 1989; Dates and Barlow, 1993; Silk and Silk, 1990; Wilson and Gutierrez, 1985)。然而，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卻檢證了材料，展示我們若是要瞭解媒體的種族結構化過程，就必須瞭解這個過程，是透過少數民族爭取大眾媒體工作權而進行、是透過創造另類媒體來反映少數民族活生生的經驗而進行，是透過抗議大眾媒體資訊與娛樂節目對少數民族的再現而進行。在種族這個研究領域中，最有意思的作品，就像強調性別的研究，有些也是社會史之作。薩克頓 (Saxton, 1990) 檢證了資料，展現美國的白人種族歧視史，舉凡複製整套種族（與階級）關係的經濟因素（如奴隸貿易、區隔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文化論述（比如，某些學術分析認為某些種族天生就較差勁，又如黑人巡迴劇團等流行娛樂），全部在他的分析之內。這些不僅只是白人種族主義的具體展現，它們是整套的社會實務，經常在種族衝突的脈絡中，以及在更大的政治經濟變遷中，被人檢證、挑戰、修正與重新構成。因此，這些實務就飽含了社會抗爭的印痕，比如，黑人巡迴劇團可以變為社會諷刺的力量，訕笑的對象正是傳統上被它強化的種族偏見，儘管這個訕笑也許只能非常小心地進行。林肯、馬克·吐溫與尤金·戴思 (Eugene Debs) 雖然各有不同，但在薩克頓的評估中 (p.390)，他們「是白人種族政治共謀者的成分，多於異端者的成分……雖然總地來說，他們仍然昭示了人類潛能的前景」。此外，在每個白人種族主義的建構與再生產階段，反對的力量（如非裔美人廢奴論者）也都生產了大量的反種族歧視的作品，抨擊了種族主義者的核心理念。這些就具體構成了席凡那但關於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結論 (Sivanandan, 1990: 3)：

我認為，若是將殖民主義當成是單行道，並不正確，若說殖民主義只是施加東西在你身上，將你收編，是某種你無法抵抗的強權，並不正確。任何東西施加在你自己的文化、語言與資源時，總是會有某種抵抗。這個抵抗的第一個形式，就是一種存在就是為了反抗的意識——抵抗任何違逆你意志的任何東西。

社會運動

階級、性別與種族的相互構成是整體結構化過程的重要面向。若是要完整分析這個過程，必須包括世代的與其他的過程，但這麼分析時，總有危險存在，很容易就會掉入多元組合的陷阱，好像所有的社會類目，都具有同等的影響力。政治經濟學的取向確認結構化是一個社會過程，它起始於階級（是一個類目、是一個關係，是一個形成過程），然後檢查階級如何（主要是與）性別及種族構成關係。雖然這個取向的價值自在，但它也附帶了風險，也就是我們可能會機械式地思索這些術語的實務運作，也會機械地認定如何將它們統合在實踐之中。哈洛薇 (Haraway, 1991: 129)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反省，她指出，我們若要弄清楚階級、性別與種族三者的關係，是很困難，她因此建議我們應該思索社會關係的新幾何學：

239

雖然作者在女性主義論述的序文，都會由衷地指出，我們應該把種族、性／別與階級放在一起分析，但實際上很少人在正文中達成這個目標。此外，女性主義者若是要以種族／性別體系，或者性／別體系作為論述判準，並論稱二者的分析，並不「相同」，那我們是必須承認她們如此論稱，理由充分。但這裡我們又要問了，階級呢？這裡的證據顯示，我們需要營造一個「差異」的理論，它的幾何組成、典範與邏輯，

不再受到任何雙元性、辯證與自然／文化模式的偏限。否則，三個要件終會化減為兩個，而最後會落得壹個孤零零地站在前端。沒有人試著要往前推到四。這些道理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

哈洛薇的論點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有重要意涵，並不只是它質疑了所有形式的本質論（階級、性別或種族的本質論）。並且，她的論點還不只是如此，它對想要規避本質主義的所有取向（比如，本書所採取的立場，從起點來作分析，但承認決定的過程，可能多重），抱持著悲觀的想法。不過，寫就本書的動力，來自於樂觀之情，認為檢視階級、性別與種族的關係，勢將有成。雖說如此，我們將考量一般政治經濟架構之內，此三者之外的要件。我們將集中在「社會運動」與「霸權」的社會關係，續作分析。

以社會運動作為中心的分析，專注在社會動能與社會行動，因此也就能夠超越傳統社會類目的限制。社會運動聚集了許多認同不同的人群，但這些人多少都是為了特定的旨趣而聚集，包括了反對主流權力體系並尋求手段加以轉化。社會運動也可以聚集具有特定階級立場的人（如認同於工會、窮人或商業精英）。它們也可以使人群團結在性別的旗幟之下（如許多流派或有不同的女性主義運動），或是團結在種族之下（比如，美國民權與黑人權力運動）。再者，社會運動也能夠動員認同其他類目（如年齡或國籍）的人。但總地來說，社會運動若要成功，典型的情況是它超越了特定的社會類目，卻以一個特定的利益或宗旨，統合了繁複多元的人群。

最近幾年，社會上廣泛注意到了「認同」（identity）運動的力量，這些運動（其中最強大的可能是女性運動）雖然並沒有忽略對其他社會類目的關懷，卻大多主要是以特殊目標作為訴求。這些「新興社會運動」包括了非常醒目的環境生態保育、和平、健康醫療（特別是反愛滋）、性（同性戀的解放）及其他運動，它們團結號召的人

群，跨越了傳統的類目，它們打下了根基，使人們更加注意非傳統的類目。

傳統的與新興的社會運動之間，界線並非固定不移，但很可惜的是，很多人把精力浪擲在論稱何者具有更優越的政治意義。有些人認為，全球政治經濟情勢已經又使階級作為基礎的運動，較諸以往更為重要，另有些人則攻擊這個觀點，認為後福特主義或後現代的資訊經濟，已然減少這些類目的重要性，他們指出，將多元繁複的人群團結在一個共通的宗旨（如全球生態主張），更為可取。傳統的社會運動取向，傾向於起自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之關懷，而呼籲我們更要注意新興社會運動的人則更為強調文化認同，包括強調各種媒體（電視、搖滾演唱會、各種業餘嗜好雜誌（fanzines）等等）凝聚新的文化連結，並進而推動某些連結為全面運動的力量。相當讓人扼腕的是，雖然新興社會運動的文獻，打開了新陣地，但其中的許多力氣，卻集中在強調新興與傳統社會運動的「斷裂」，兩類運動的共同基礎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彼此政治聯盟的潛力，也就無法發揮。二十世紀末葉，環境生態、和平、性別與性等議題，確實提供了主要社會運動的基礎，這點毫無疑問。然而，誠如已有人指稱（Luke, 1989），這並不是說社會的階級分裂就更為不明顯，這並不是說勞動不再是社會的核心活動、不再是社會組織的力量，這也不是說工會運動在政治上已經大江東去。社會運動取向之所以可取，除了它的分析焦點是政治行動的過程以外，更因為它並不認為傳統的或新興的運動之任何一方，具有斬釘截鐵的先行律令。

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來說，社會運動格外重要，這是因為它們對於傳播內容與傳播工具的發展，具有相當影響。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都因為必然會碰到如何組織內部與對外的傳播，因而必須開發自己的傳播策略與政策。對於社會運動者來說，最重要的議題包括了內部傳播的進行，要在多大程度內符應「民主的」要求，而對外聯絡與傳播時，社會運動者是否應該採取主流機構的形式，而運動者在訴

求媒體的注意時，又應該採取多大的特殊或專家的手段？季特林 (Gitlin, 1980) 的著作在這裡益發重要，因為它已指出，運動者訴求媒體注意的政策，不能與運動的基本目標有所差距。美國學生的反越戰運動失去了民主根基，正就是它的領導階層跟隨媒體邏輯起舞，終至變成媒體人物。大眾媒體的政治經濟學本身，對於社會運動的構成，亦有貢獻，它的訴求點主要與媒體生產及媒體政策有關。全世界都有的另類媒體運動，挑戰了主流的支配媒體形式、科技、形象與訊息。這些包括了勞力密集的識字運動、街頭劇場、另類報紙、影帶與電影製作、卡通漫畫、公共得以近用與製作的線纜節目、另類電腦網路，影帶盜錄、電腦犯罪等等。這些不等形式對既定的媒體形式，具有不等的挑戰能力。有些運動（如古巴與尼加拉瓜的識字運動）在政治哲學及實際需要的考量下，挑戰了傳播與教育的科技密集之形式 (Mattelart, 1986)。另一些作為（如電腦犯罪與影帶盜錄），則挑戰了傳播工具的控制走向集中化 (Balka, 1991; Hafner and Markoff, 1991; Rheingold, 1993;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1991)。另有些運動（如另類報紙與公共近用電臺與線纜電視），則提供了與主流媒體完全不同的訊息與形象 (Goldberg, 1990; Jankowski et al., 1992; Pizzigati and Solowey, 1992; Ryan, 1991)。

241

社會運動在組織人群的力量，挑戰主流媒體政策的過程，亦相當活躍。就國際間來說，「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運動的組織與推進，可以說是最為重要、最具有意義的努力，它直指主流的媒體政策制定形式，特別是西方跨國公司對主要大眾媒體的生產與分配之控制 (Traber and Nordenstreng, 1992)。這個運動現今仍在進行，以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議 (MacBride Roundtable) (譯按：麥氏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One World, Many Voices 報告的委員會主席，該報告於一九八一年出版，是世界傳播新秩序的重要文獻) 為集結，它的目標之一，是要將傳播權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納為國際組織所能接

受的基本人權之一。

另有許多運動聚焦於本國全國與地方的政策制定過程，包括努力要使關於廣電執照配發、電波分配、工業結構與媒體內容等，更為符合民主要求。這些運動在美國特別強大，美國在電報與電話的發展過程，見證了密集的抗爭，許多團體在工會與鄉村政治組織的領導下，要求這些傳播器物要由公共擁有，或至少在電信發展的過程，要有社會控制的機制，採用公共郵政服務的模式 (DuBoff, 1984; Stone, 1991)。收音機與電視的發展也催生了類似的抗爭，新的組織（如工會與教育社團）站了出來，大力倡導公共廣電制度，並要求強力規範商業頻道 (McChesney, 1993)。

民權運動及女性運動的成長，添注了新的能量，活化了廣電興革運動。前者透過司法訴求，為一般公共利益團體，取得了立足之地，在此之前，規範聯邦傳播事務的聯邦傳播委員會認定民權團體與媒體資源的關係，不屬於它的規範權責。女性團體加入了民權團體的行列，亦對既成的雇用實務與蔑視女性的節目，展開攻擊 (Creedon, 1993)。右派從這些中間偏左的運動，習得一技之長，起而效尤，自己也組織了強大的媒體運動，攻擊它認為不符合道德水平的節目 (Montgomery, 1989)。世人當前對互動媒體的發展，興趣正濃，尤其是美國關於開發全國資訊「高速公路」的政策，更是喧囂滿天，它又為公益媒體興革運動，灌注了新的生命。一九九三年，六十個以上非營利的組織（消費者、勞工與民權團體等）發起，合組了「電信政策圓桌會議」(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oundtable)。參與的團體包括美國民權聯盟、美國圖書館協會、美國公共電視台協會、媒體教育中心、美國消費者聯盟、電腦專業人士社會責任協會，以及內達 (Ralph Nader) 的公民社等等 (譯註 2)，他們齊聚發起運動，訴請讓所有人都能普遍使用資訊基層設備、自由傳播，並倡導民主的政策制定過程以保障個人隱私。

常識的建構過程、將社會實體當作本來就是這樣的過程，也就是霸權，是結構化過程的另一個面向。這個術語在西方取得突出地位的原因，主要是經由葛蘭西的著作而來。葛蘭西在知識上的企圖，最主要的特徵就是要瞭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為什麼以「同意」作為社會控制的基礎，遠多於武力強制。霸權的概念錯落在「意識形態」與「價值」之間，前者通常是指刻意扭曲或刻意錯誤再現社會實體，以此來提昇特定一些利益，並維持權力科層結構，後者則通常指稱許多人群共同享有的社會規範，使社會上不同位置及階層的各種人等，因此得以彼此連結。霸權與價值不同，因為它是由政治過程構成，但它也與意識形態不同，因為它並不反映形象與資訊的工具性扭曲。反之，霸權是形象與資訊二者的持續構成，在此過程，常識圖譜被刻劃了出來，足以說服大多數人它可提供社會與文化的調和劑，界定了社會生活的「自然」態度。因此，霸權遠比意識形態具有更大能量，因為它並不單純是階級強權強加在人群身上，而是在權力的動態幾何關係中，「有機地」長了出來，雖然這個權力著床於社會關係網路中，無處不見。

在霸權觀的所有內涵中，我們應可論稱，最動人、最有效的訴求，是說霸權的發生，自然而然，無法追溯來源，因為若是如此，則它等於是說，社會之中存在一套文化與社會實務、觀念與詮釋，人們

譯註 2 這些組織的英文原名，依序是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Public Television Stations、the Centre for Media Education、the 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Computer Professional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及 Public Citizen。

認定它是自然發生的，而不是社會構成的，不是社會生活中「外力給予的」。人們在建構自我認知的時候，人們在建構自我與社會的關係的時候，以及人們在將二者安置於社會一歷史經驗的認知圖譜時，這些實務、觀念與詮釋就在建構與安置的過程，被當成是本來就存在的要件。在建構霸權時，「傳統」是一個強大的工具。爲了企圖將光環驅離，使霸權不再能夠得到其庇蔭，不再具有那種超越歷史的品質，霍布斯班 (Hobsbawm, 1983: 1) 就說環繞英國君主體制的各種禮儀，雖然狀似「亙古常在而相連於太古時代」，但其實全是「杜撰的傳統」。這些禮儀其實是整套的實務，通常由明示或默許的規則掌管，它具有儀式或形象性質，企圖經由反覆重複的演練，教化某些價值與行爲規範，這樣一來，現在的實務也就自動與過去，銜接了起來。

傳統使人根植於過去，成就了神話的地位，傳統無待現實檢證，因此也就取得了超越歷史的品質。創造霸權之核心社會過程的工作之一，就是杜撰傳統，但霸權的另一個面向，卻必須在傳統之外找尋自己的生命，培蘭札斯 (Poulantzas, 1978) 稱之爲「個別化」(individuation)。個別化是指資本主義轉化了集體類目與認同，使之成爲個人的類目與認同，因此也就削減了階級、性別、種族與其他集體能量的社會力量。是以，勞工階級、女性與黑人也就被重新建構爲個別的主體。

243

霸權也具體展現在許多具有實質意涵的概念，如市場機能廣泛被人接受，認定這才是經濟生產力的柱石，又如人們認定，投票是執行民主的主要方式，而新聞的客觀就是指媒體呈現了時事議題的兩種見解 (Goldman and Rajagopal, 1991)。這些與其他的霸權觀（自由市場、自由選舉、自由報業，資訊自由流通等），既不能說是政治中立的價值，也不能說是由上向下的意識形態控制工具。它們可說是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常識潮流，它們從社會關係中，茁壯了起來；雖然這個關係實乃由階級、性別與種族等科層體系構成。

葛蘭西的霸權分析，當然與他的政治鴻圖，大有連結。這個鴻圖

也就是要重新疏濬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重新引導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不再強調革命行動、不再強調軍事攻擊，不再強調先鋒領導階層是政治策略的核心。反之，若是依據這個觀點，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就必須要開發對立與另類的霸權，它們將構成新的常識，一種新的日常生活風潮，在歷經許多抗爭或「陣地戰」以後，它們將取代資本主義霸權的自然化之的態度。葛蘭西提出有別於傳統革命綱領的見解，並沒有要用文化策略「取代」政治策略，它是擴大了革命政治的概念，使之包括爭取文化與語言空間的社會抗爭。

霸權觀的力量如此之大，我們又怎麼可能完成葛蘭西所期許的轉型？每當我們想到具有支配地位的霸權，具有如此活躍的力量，我們更會望此任務而更加太息，因為這個霸權屢屢回應變化中的政治與社會關係，化成新的霸權形式，比如，它由本國而擴大至整個大陸，再擴大至整個世界的霸權集團，它把先前曾經是對立的概念（如形式的性別平等）轉化成爲支配霸權網路的一部分，並把關於社會福利與私人慈善義舉的內涵，重新建構 (Golding et al., 1986)。

具有支配地位的霸權，威力如此之大，以致有人侃侃而談「歷史的終結」(Fukuyama, 1992)；然而，我們另有信而可徵的論點，能夠指出霸權並非無法攻堅的堡壘。霸權威力比意識形態來得大，對，因為霸權基於受治者的同意，而不是使用強制。但若要受制者一直同意，代價非常之高，它必須要持續進行，確保人們願意接受主流觀點，視其爲自然天成。資本的邏輯、主流意識形態的邏輯，或統治者自然有權統治的價值觀之邏輯，完全不同於霸權邏輯，霸權的威力是從社會關係構築而成，必須要有各階級、各性別與各種族，乃至於其他科層的共謀。一旦取得，同意、共識是強有力的控制形式；但「索求」同意的過程，也就蘊涵了抵抗與另類常識的潛能。是以，霸權固然是社會關係得以結構化的核心手段，但它並不能保證這些社會關係的再生產。霸權的爭取意味它在得到人們同意的過程，必須經過抗爭的考驗，霸權雖然錯落在馬紅 (Mahon, 1980) 稱之爲「再現的

不平等結構」之內，但霸權的不穩定程度，總還是容有對立與另類霸權的可能。

政治經濟學的兩大任務，就是要確認支配意識形態的不穩定來源，並評估對立與另類霸權所可能採取的形式，範圍多廣。前者包括了人類稱之為常識與實際體驗的落差。資本主義霸權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它聲稱能夠帶來普遍的物質豐裕，以此作為構成同意的基礎，但現實生活的體驗卻是貧窮觸目可及，即便是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亦屬如此。對於這個結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身必然造成貧窮），另有許多說法提出反駁（包括了「貧窮文化」的說法，它是說，各階級都會生產他們自己的文化與社會實務，然後，它說，若不是貧窮的人有錯誤的價值、錯誤的工作習慣、錯誤的家庭與性習慣，以及對金錢的錯誤態度，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早就有效地生產與平等地分配）。這種貧窮文化之說若是推至極端，其實就是種族主義的學術金衣：只要能夠克服他們自己的社會與文化傾向，黑人、中南美洲後裔與印地安人必定能夠擁有更好的地位。

另一個防衛資本主義的見解是「下滴」觀，偏好這個說法的人指出，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使富裕的人得到好處的經濟體與經濟政策，必然就會往下滴潤，使所有階級雨露均霑。這個見解的基礎是區分短期與長期，若是短期內出現了特定後果（某政策有利於此團體而非彼團體），則它會聲稱，就長期來看，這些效應、後果可望均平。孔潘(Compaine, 1986)就提出了下滴的說法，為目前傳播與資訊資源的分配狀況，進行辯護。他自己對科技史的解讀，讓他認為，長期來看，科技的使用會貫穿階級與其他社會分裂線。

主流霸權為自己辯護的另一個手段，就是束手聳肩，也就是以某種故作優雅的態度，置身事外，表示它早就知道常識與實際生活之間的主要落差，並且知之甚稔。誠如米勒(Miller, 1988)與許多論者都已檢證資料，並加展示者，電視就是這種束手聳肩的最佳能手，螢幕上的犬儒敘事者（或一個敘事線索）與觀眾起了共謀，它對貧富落差

的反應是，是啊，我們是知道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沒有人欺瞞我們啊」。最後還有一種辯護方式，那就是不直接辯護，它只是間接辯護，它提供了與這課題並無關聯的娛樂及資訊，但卻具有吸引力，能夠讓人分神，言下之意，它是說，想些別的比較好，或者，什麼都別想，那就更好。

245 威廉士 (Williams, 1980) 從葛蘭西的霸權觀汲取靈感，提出了「對立的」與「另類的」霸權，均與文化及媒體實務有關。不管是哪一種霸權形式，它都有賴新的知識領導之發展，既不同於建制的，也不同於革命的傳統，它認為分析與政治實踐之間、概念與技術知識之間，以及思考與工作之間，不應該分裂。葛蘭西認為，知識分子有了這些領導品質才能稱作是「有機知識分子」，他們運用這些品質，促進對立的與另類的霸權之發展。對立的霸權運用資訊的、戲劇的、喜劇的與其他的形式，掀開遮掩常識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攻擊主流的霸權，已有很長的傳統 (Buhle, 1987)。這些對立與抵抗的文化實務，不見得一定出於另類霸權，但它們讓另類霸權的創造，容易一些，它們愈是成功，另類霸權的創造也就愈加可能。另類霸權跨越了許多形式，或直接或間接地描述了認識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讓人意識到思索這些差異並採取行動推動其實現，不但值得從事，而且也很切合實際。這樣一來，霸權的概念也就可以說是基礎廣大的組織原則或過程，它提供了思索結構化的另一個方式，它與構成階級、性別、種族與社會運動的過程，有所重疊、互補，也有所差別。

結 論

重新思考與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不同方式，環繞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這三個起點過程而談論，到此就要結論了。我們拓寬了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思考傳播現象的基礎，但它向外交流的程度，還僅止於政治經濟學的近鄰之內。下一章是本書的結論，它走出鄰近地帶，

進入其他學科，它們雖然位在政治經濟學的邊界，但構成了不同的知識領域。下一章特別是要與兩股挑戰能量對話，一股是政策科學，尤其是公共選擇（或說實證政治經濟學），另一股是文化研究。這絕對不是說以下的對話是這些取向的完整總結，它只是企圖辨認有益的交流區域，期望讓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更新與重新思考的工作，能夠得到再多一些的学习。



挑戰邊疆：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

對於人文學、人類科學的既有分裂，我們不是應該有些重組的工作了嗎？不是應該重新界定，重新使之協調合作了嗎？在當前的知識氣候，由於其他因素的影響，已經進入不相往來——甚至應該說是自我緊縮的情況，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能夠，我們也必須澄清，非常公開地澄清重大的優先知識課題是些什麼。(Williams, 1981b: 65-66)

現在，我們或許正在目睹兩股顯然正相反的走向，詭異地聚合，一股是「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Rational Choice Marxism, RCM) 的超級理性主義，另一股是後結構主義的非理性主義。RCM 具有典型分析哲學的抽象玄妙，它們認為自己與歷史過程的不確定流向，乖隔在九重天之外，但非常吊詭地，它們卻與來自相反方向，但同樣要解消歷史的不理性主義者，在此攜手。二者都自命要走向一種政治狀態，完全隔離於歷史定錨，戲局——理論的選擇，加入了後現代的隨機應變，變成了政治上任意作為皆可的矛盾綜合體，它把修辭與論述當作是社會變遷的動能，它又心懷一種犬儒式的失敗宿命觀，認為任何意圖改變的激進政綱、計畫，註定失敗。(Wood, 1989: 88)

引言： 界線

以上三章從內自省，指出重新思考與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可能途徑，它們評估了本學科當前的狀態及其核心問題與概念。重新思考與更新政治經濟學也必須向外查考，檢視它與其邊界學科的關係。劃定各學術學科圖譜的方式，不計其數。政治經濟學可以對立於社會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也可以對立於其他取向。不過，若是從前面章節所談，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定了位，那麼，將它分別定位在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對立面，格外可取。我們深知，無論是物理的、社會的或認知的，邊界並無法確立而無爭議，因此作為全書結論的本章，其實是將政策研究與文化研究當作兩個非常不同的取向，檢視它們在政治經濟研究的邊界上，如何看待傳播現象。若是說本章企圖全面批判這兩個取向，那就未免放肆僭越。兩個領域的文獻，自己包括了絕佳的圖譜、分析與批判。本章不此之圖，只是以政治經濟的角度，開啓與二者逐一對話的空間，主要是藉此功夫，使得政治經濟學的重新思考與更新的過程，更見豐富。除了這個主要目標以外，本章也試著確認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之內與之間的優缺點，它們將會是不斷重新思考這些取向之過程的要件^①。

247

過去這些年來，傳播學者以不同方式確認了本學科的主要分野，包括了行為與規範取向、行政與批判取向等的差別。晚近則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差異，吸引了可觀的注意力。這個最新的發展，我們當可理解，因為文化研究在過去三十年來，發展得頗有可觀之處，對

①筆者同意葛羅斯堡(Grossberg, 1991: 155)的意見：「重要的倒還不是在它們之間有所抉擇（雖然最終不免於必須抉擇），而是界定它們之間聯盟與合作的新形式」。

於傳播研究有了重要的影響，它也對於其他的取向（包括政治經濟學）的假設、方法與結論，提出了一些根本質疑（During, 1993a; Grossberg, 1991; Grossberg et al., 1992; Johnson, 1987）。再者，由於傳播研究偏向設置在大學中的藝術與人文學科，它也就殊可理解地走向與文化研究對話之路。因此，若是要建立健全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那就非得接受文化研究的挑戰不可。

不過，我們一方面必須無所分神地與文化研究展開系統性對話，另一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也必須以批判的態度，評估自己與政策研究的關係，傳播學者對後者的注意，雖然年來大有增加，但卻很少有任何系統性的反省。我們可以用不同方式來界定政策研究，但本章特別要主張，政策研究領域是多元政治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混合體，它們的旨趣，不只是解釋行爲，而且另有規範旨趣，企圖評估並建議政策行動的路徑。多元主義早就盤踞了正統政治學及公共政策研究的領地。晚近幾年來，新古典經濟學家又以其核心假設、類目與理論，移轉了政策研究的引力核心。結果一來，名爲公共選擇理論與實證政治經濟學等等取向，如今在政策研究核心占據了一席重要之地，許多這些學派的人馬，由於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已成舉世聞名的昭彰人物，包括寇斯（Ronald Coase）這位對傳播政策核心議題迭有研究的學者。

文化研究是包含廣泛的知識運動，集中在建構文本的意義，而文本則指涉所有形式的社會傳播^②。文化研究的起源有許多，包括一股基於要反對學術正統的動力，尤其是學院中偏向以學科典籍作爲知識架構的正統（如英語文學）^③。文化研究現在已經包含了爲數甚多的流派與分支，無論是其內在或外在，都已激發相當的紛擾^④。打從一

248

②文化研究對於傳統地理學的核心研究課題，亦產生了影響（Burgess, 1990），這是極具啟發意義的例子，幾乎每個學術科目都重複了這個歷程。

開始，尤其是英國的情況，文化研究就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取向的強烈影響。因此，英國的文化研究認定文化與社會的關係，緊密扣連，特別是扣連於階級、性別與種族，它並且認定這些關係特別的不對稱與敵對。再者，馬克思主義者對權力的分析，特別是界定與實現需要、利益的權力，對於文化研究的發展，亦有影響，比如，我們在湯普森 (Thompson, 1963) 與威力斯 (Willis, 1977) 的著作中，就可找到證據，他們格外強調社會關係的文化建構。馬克思主義的關懷也展現在關於性別的研究，它源出於，但也是回應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 Birming-

③ 文化研究很顯著的一個特徵，就是它對其領域 (field) 被當成是學術學科，退避三舍，部分原因是文化研究對於質疑學科的基礎，興趣滿滿，但特別是它對於知識的教規化傾向，質疑之心，溢於言表。誠如詹森所說 (Johnson, 1987: 38)，「文化研究是一個過程，一種生產有用知識的煉金術；若是將知識教規化，你也就中止了知識的反應」。雷蒙·威廉士 (Williams, 1981b: 53) 更說，文化研究的知識緣起，正是從質疑英語文學的典籍而來：

你看，順序是這樣的，首先是限定在已印出的文本，然後是縮小至稱之為「想像力」之作，最後是慎重為之，收束到精密苛選的少數「典籍」文本。但與這個過程共相左右的是，另一個通常更有勢力的特殊文本：不只是「文學」，並且是「英語文學」。

④ 比如，龍氏 (Long, 1989: 427) 就認為，英國的文化研究的女性主義，其核心意義到了美國，傾向於被折損了。她如此批評：這個國家 (美國) 對英國文化研究的總結或代表性陳述，竟然以這些方式將女性主義的文化研究者邊緣化，我甚感驚訝。這實在是反諷已極，因為文化研究傳統當中，最能被美國女性主義學者吸納而維持批判立場者，當推女性主義，這是因為她們與外在的大社會運動有所連結，又因為這是她們在學院內的實務性質使然。

ham, CCCS Woman's Studies Group, 1978)。最後，在霍爾(Hall, 1980, 1982, 1989b) 與他人的著作中尤其顯耀，他們指出文化既非獨立，也不是外在決定，而最好是視為社會差異、抗爭與對抗的場域。確實，論者已指出，英美文化研究的顯著差異，在於前者採取了更為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立場。美國的文化研究同樣有許多分支，但我們可以如此結論：美國的文化研究有較大偏向從多元社會觀及多元政治觀取得動力，這種多元觀認定權力的分布非常廣泛；美國的文化研究又從功能主義人類學與社會學取得動力，而功能主義則集中在展示文化實務如何維持社會生活中的秩序與和諧；美國的文化研究又從形象互動學派的社會心理學取得動力，它檢視儀式與戲劇的語言，回推至形象社群的生產與再生產(Carey, 1979)。有人將美國的文化研究特地指名道姓，認為它具有「肯定現狀的性格」，主要就是它對於美國文化生態（尤其是其閱聽人）的陳述，超脫了政治而肯定有加(Budd et al., 1990) ⑤。

文化研究對於更新政治經濟學的過程，可以有許多方面的助力。文化研究突顯了知識的主觀與社會構成之屬性，因此在眾多批判實證

⑤ 他們認為美國的文化研究，有五個很根本的缺陷：

第一，過度估計閱聽人在接收時的自由。第二，政治經濟學取向對閱聽人的分析，集中在其商品化，而文化研究使閱聽人商品化的意味，減至最低。第三，它無法區別訴求大眾的廣告及訴求較專門的媒體。第四，它將積極地接收誤認為政治上的積極作為。最後，在對立次文化之內產生的進步解讀方式，實屬例外，卻被當成常模。(Budd et al., 1990: 169)

這些批評是百年來，社會學之內的詮釋學派與歷史政治經濟學之間辯論的延長。卡瑞基(Carragee, 1990) 檢討了這類辯論的晚近展現，如古德諾(Gouldner) 與季定思等人的著作中就可找到，並將其情況運用到傳播研究的辯論。另外，關於閱聽人研究的不同流派，純描述的說明，請見 Lindlof(1991)。

主義的力量之中，它居於領導地位。起自威廉士 (Williams, 1961) 與侯苟 (Hoggart, 1957) 的作品，文化研究促動了文學批評的移轉，從分析典籍文學到分析日常生活^⑥。尤其具有特殊意義的是，這些作者企圖擴大文化分析的實質內涵，他們的立論起點是，文化不只是優勢精英所生產的，文化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產物，由所有社會行動者生產。再者，文化研究一直主張，社會是由性別、國籍與認同所構成，這就如同社會也是社會階級所構成，雖然這個觀點在挑戰之下，重點有了移轉^⑦。

政治經濟學可以從這些論點得到學習，但政治經濟學也能同等地有助於文化研究的重新思考。即便政治經濟的哲學取向接受主體性的存在，也相當兼容並蓄，但它總還堅持實存主義者的知識論，並繼續主張歷史研究、以具體的社會整體作為思考架構、道德信守，以及克服社會研究與社會實踐的區別。是以，就在文化研究出現了費朝詩 (Pêcheux) 稱之為「主體的自戀」傾向時，就在它拒絕以歷史實踐與社會整體作為思考架構時，政治經濟學與它就分道揚鑣了。此外，在文化研究出現以使用特殊語言來表達的傾向時，政治經濟學也與它分手了，因為這辜負了、違反了文化研究的初衷：文化分析的成果應該要能夠為一般人所用，因為一般人才是文化研究成果的社會泉源。最後，在文化研究拒絕勞動及勞動過程，卻轉而檢視消費的社會「生

250

⑥ 威廉士 (Williams, 1981b: 65) 堅決地指出，這個轉向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並不將概括化的文學當成獨立的價值泉源，反之，它堅持將文學的真實變化，扣連於歷史過程，其間至為根本的「衝突」必然早就發生了，並且仍然在發生」。

⑦ 社會學傳統中，歷來都存在著某些學派，認為階級不是根本的社會敵對來源，因此也就主張以一系列類目取代階級，費斯克肯定、贊同此說 (Fiske, 1989)，他提出了一系列的「主體性立場」(subjectivity positions)，包括了自我、性別、年齡團體、家庭、階級、民族與氏族。

產」，以及因此而就傾向於否認勞工在當代社會變遷運動的價值時，政治經濟學也就對文化研究敬謝不敏(Luke, 1989)。

政治經濟學也能從政策科學的發展，習得一課。後者的思考範圍頗廣，但有兩個重力中心，它們所形成的軌道又各自環繞著許多觀點，與此二個中心有關並作反應。一個中心尊厚政治分析，將「國家機器」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另一個中心著重「經濟」論點，企圖延伸新古典為主的理論，使之運用於政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生活(Posner, 1992; Stigler, 1988)。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偏向於想從特定時候占據支配地位的資本形態，「讀出」國家機器與其他「上層結構」的力量。因此，更新政治經濟學時，我們可以從嚴正檢視國家的構成角色之取向，得到助益。再者，政治經濟學與政策科學的共通點，在於二者均分析全部的社會整體，想要以此轉變社會。但政治經濟學與政策科學的根本差異是，後者偏向於多元主義者的政治分析，認為國家是衆多勢均力敵的社會力量之獨立仲裁者，並且這些力量並無任何一個舉足輕重而能影響大局。與此對立，政治經濟學堅持資本是影響大局的主要能量，而社會分析的起點應該是商品化的過程。再者，政治經濟學也拒絕政策研究的偏向，後者固然也是進行社會整體的分析，並且分析轉化社會整體所需有的價值取向，但其分析基礎卻是個人主義與市場理性。與此對立，政治經濟學堅持崗恩(Garnham, 1988: 124)在評論雷蒙·威廉士時所說，它的分析基礎必須是「進行中的社會整體觀」，起點是社會過程(如階級形成)，政治經濟學也堅持，市場必須由社群與公共生活取代，並且必須對複製階級強權的理性，反對到底。

向邊界學習：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拓寬了知識論取向的範圍，遠遠超出了實證論者與本質論的角度，但它包括了社會建構論者的看法，我們在前面數章已經談過這個論點，不再於此細表。我們只需指出，就其最極端的立場來說（後結構論者的著作，當之無愧），社會建構論者將變成相對論者，眼中再也很少承認（如果還承認的話）分析的或經驗的確定性。

若是就其實質觀點來說，文化研究貼近地認定，文化是普通的、是日常生活的產物，文化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均極普遍。因此，文化不限定於精英所創造出來者，不再是多年來被舉為文化正統的東西。這個看法拓寬了批判分析的合理對象，完整地包括了媒體的所有娛樂與資訊內容，舉凡電視情境喜劇、大量發行的小型煽情報紙、羅曼史小說，以及好萊塢的超級賣座大片，都可視為文化而加以分析。比較重要的是，它在兩種文化之間作了區別，一種是「麻思」（mass）生產與分配的材料，另一種是「流行」文化或相對民主的條件下（強調廣泛參與及平等），為了達成民主目標而創造並分布的作品。但很諷刺的是，文化研究通常將自己弄得學究味十足，也就是相對地難以親近（它所使用的語言挖掘了不必要的溝渠），以致他們對文化的分析成果，隔離於可能從這些成果得到助益的文化工作者與消費者。我們並不否認，學術研究通常需要使用精細的概念工具，以及複雜的理論思維及文句，我們當然無須為此歉疚。但是，誠如許多評論者已指出，有些文化研究的著作，難以讓人親近的程度，已經到了只有特定的學術人士才能品讀，這些作品與民主鼓舞或鼓勵的用意，似乎已經不再相干^③。但我們在這裡倒是要說，這是一個邊緣的問題，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經濟學，一般人總是想找出自己生活的意義，即便是他們身處的制度的與形象的世界，不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創造

（事實上，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通常更是一種疏離的異象，他們完全無法控制），而一般人尋求意義的需要、目標，以及他們在找尋過程所遭遇的衝突、失敗與成就，就是文化研究著作的實體、就是它的分析對象。

252 文化研究開拓了批判研究，迭有貢獻，除了階級分析之外，更包括了受到女性主義及新興社會運動（比如，和平與環境保育運動）鼓舞的研究。這類著作正可提醒政治經濟學，雖然社會階級是一個核心分裂線，或說，從本書採取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起點，但構成結構化過程的層級體系，卻是多重且重疊。再者，雖然其極端說法，等於就是在慶賀當代生活，並且認為當代生活所要找尋的特定認同，已使

⑧我們不妨看一下哈佛大學非洲—美洲研究的教授蓋茲（Henry Louis Gates, Jr., 1989: 44-45）的批評。他回想他在嘗試向學生教授正典時，遭遇到的痛苦經驗，他對形式化的文化研究之缺失，也就是文化研究著作的「疏離策略」，值得我們引用較長的一段：

我最初的講演之一，是在學院研討會，前來的人都是自由參加的，我所犯下的錯誤，任何人都不会再犯第二次。當時我剛從研究所畢業，滿腦子都沉浸在當代文學理論，充滿了神祕的、不可解的專門術語，我正準備來一場擲地有聲的結構主義分析，分析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奴隸敘述，追溯其「雙元對立」的細緻作品。我清爽俐落地備妥了一切，按照計畫，中規中矩，進行分析。何其美好，我講完了，當然，我也開放發問。現場一片寂靜，然後，「喂，老兄」，坐在教室最後面的一位年輕人說話了，打破了鴉雀無聲的場面，「我們所想要知道的是，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是像湯姆大叔（Uncle Tom）這樣的人嗎？」

後來，蓋茲這才理解，這實在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比我的講演還要有趣許多的問題」。它提出了風格的政治學問題，到底一個人為他人發言，是什麼意思，我們又怎麼分辨合作與微妙的顛覆？總之，蓋茲醒悟了，「我們的批判論述與他們賴以論述的傳統，裂縫愈張愈大哩」，他領悟了文本與生成文本的經驗，二者之間，存在著差距。

反對政治流於片面零散，但另一些文化研究則知道，社會動能的多重面貌之形式，具有大放能量的潛力，各面貌均有自己的主體性與意識，這對政治實踐具有重要的活絡意義，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卻很少對此著墨^⑨。一方面，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政治經濟學醉心於分析商品化的律令下，文化有些什麼面貌，文化生產如何被納入結構。但另一方面，誠如詹森所說 (Johnson, 1987: 55)，政治經濟學應該納進文化研究的成果，因為「資本主義與其他社會關係對於現存語言與論述規則，造成了它們亦未預見的效果，特別是階級與性別抗爭，對於不同的社會符號與符碼，更是造成了特定的效應」。因此，文化研究隱然指出，若只是依靠資本邏輯的結果，或僅只是以階級分裂作為組織抵抗力量，均將徒勞無功。但讓人扼腕的是，除了少數重要的例外，文化研究卻很快地就完全拒絕了那些存在較久的形式，並且一頭栽進了社會幾何關係與抵抗的新興形式，以階級（特別是薪資勞動）為底的抵抗形式，雖然對於我們瞭解與轉化社會生活的過程，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而且政治經濟學也都非常正確地認識到了這個事實，但文化研究卻已棄之唯恐不及。

政治經濟學集中在權力的宏觀社會組織，並以其方法論討論之。雖然有其例外，但文化研究並沒有同樣注重權力，等到論及了權力，則又傾向於將分析焦點轉移到較小的權力組織，集中在分析權力如何

⑨ 文化研究通常正是以這些術語界定自己的內涵。比如，詹森說 (Johnson, 1987: 43)，「文化研究就是要研究意識或主體性的歷史形式，或者研究與我們生活相伴的主體形式，若是我們冒險地將它壓縮（或許說是化約），我們或者可以說，它研究的是社會關係的主體面向」。詹森繼續闡述，它將這個定義連結於馬克思－恩格斯的傳統，特別是他們早期的著作，如《日耳曼意識形態》。稍後 (p.62)，詹森又說，「文化研究的最終客體，在我看來，並不是文本，而是「主體形式的社會生活」，是這些形式流通的每個時刻，包括它們文本的具體展現」，這個看法與筆者對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非常契合。

相互構成「交互主體性」。再者，雖然有些流派的文化研究幾乎全部是在分析文本，它要從文本「讀出社會」，但還是有文化研究者採取了傳統的方誌學，特別是以此瞭解文本的（包括媒體）的接收與使用（Morley, 1986; Radway, 1988）。不過，我們觀察到的這個轉向並非沒有招徠物議，特別是論者認定它所引用的方誌學技術，有所不足，而從如此有限的證據要提煉概括性結論，更屬不足。比如，依凡士（Evans, 1990: 154）就認為，許多這個類型的研究，「典型來說，根本不是使用傳統的方誌學技術」。反之，他指出，這些文化研究「採取的是一次就作完，以開放方式來訪問受訪者自己所說的經驗，偶爾才會輔佐以系統性的人類學田野考察」。還有，卡瑞基（Carragee, 1990）則批評方誌論，他說方誌論並不是那麼系統化的方法論，更何況它說閱聽人與生產／分配文本的公司，具有相同高度的文本生產能力，簡直就是跳躍思考所得到的結論。以上對文化研究的批評，很有價值，但我們亦應注意，文化研究也提醒政治經濟學：權力亦在小的層次運作，權力具有交互主體的性質，而我們透過觀察技術，可以查知其存在與運作。文化研究豐富了政治經濟學對權力的瞭解¹⁰。再者，有些運用方誌學取向來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顯然也體會到了其侷限，因此也就呼籲要在全球與在地之間，進行連結：

方誌學很適合用來敏銳地研究當代特殊的文化情境，但它必須超越在地邊界所設定的狹隘範疇，它必須要能振興一種意識，讓我們領悟生產／分配與消費、一般與特殊，以及全球與地方之間，總是存在不對等關係。（Ang, 1990: 251）

¹⁰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反省方誌學者，請見Pendakur (1993)。

向邊界學習： 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汲取了多元政治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它分析並評估不等行動路線（包括傳播）的價值。這個取向的主導者「公共選擇理論」（或稱作是「實證政治經濟學」、「理性預期」取向），擺明了要以正統經濟學研究的工具，運用在政治科學，企圖則是創造政策科學（Alt and Shepsle, 1990; Brennan and Buchanan, 1985; Buchanan, 1986; Buchanan and Tollison, 1984; Posner, 1992; Stigler, 1988）。若是特定地說，公共選擇理論的企圖，是要以市場機能、個人選擇與私人自利等原則，構成其科學骨架。市場機能是所有集體活動的結構模式，舉凡商業、政府、志願社團、利益團體與家庭的活動，均須以市場原則加以解釋。規範判斷的準則是這些活動在多大程度內，能夠吻合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理論的理念型）的要求。集體性質被化約成爲個別選擇的總和，不管我們怎麼描述、解釋這些選擇，也無論我們如何說明這些選擇是正當或不正當，它們都反映了私人的自利原則。社會不存在，社會團體也不存在，部分的總和就是整體，沒有整體會大於總和。因此，我們若是研究個人，我們也就能夠提供集體行爲的資料，因爲所謂的結構，其實只是虛構，我們只是爲了描述個人都在追逐相類的利益，因此權且創設了「結構」這個用詞。最後，這個取向認定私人利益遠比公共利益重要，因爲它的論述起點，是認爲人類最重要的內涵，就是私人自利的追逐。根據布坎南（Buchanan, 1986: 6）的評估，「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義理」是：「政治場域的人，如同任何（包括市場）場域的人……他們只是他們自己私人與個別化利益的追逐者……這些動機或許讓人鄙視，但實情如此」。是以，他就主張，社會生活所需遭遇的許多市場，雖然相對不完美，但人們仍需在其間參與選擇，從中個人的效用得以極大

化，這個過程持續進行，於是產生了社會秩序。公共選擇理論促使政策研究必須採取規範或道德立場，以此改進社會生活，使其符合市場原則，因為這才是人們最能夠自利的方式。比如，依照這個觀點，政策研究的職責是要提出策略，減少選擇過程所必須支付的交易、資訊與機會成本 (Alt and Shepsle, 1990) ⑩。

公共選擇理論的疆土遍及許多學科，由於它的主要倡導者得到了經濟學諾貝爾獎，這個取向更是光芒四射，眾所矚目 ⑪。既已如此成功，它的主要倡導者，如奧爾森 (Olson, 1990) 也就呼籲應該我們應該要走向統一的社會科學，將所有傳統學科的界限，悉數打散，合成一個公共選擇理論。大致與保守主義契合，公共選擇理論吸引了許多立場並不不同的學者，包括提倡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人 ⑫。這個取向愈來愈被運用在一般的社會行為，包括家庭與性慾的研究 (Posner, 1992)。這些情況所造成的效應是，雖然公共選擇理論只是思索政策的多種方式之一，但在某些人眼中，它已經即將取得政策研究的領導地位 ⑬。這些年來，這個取向亦對傳播研究產生了影響，關於以下主

⑩ 交易成本是指交換過程所產生的成本，如使買賣雙方聚首成交的成本。資訊成本是指進行最好的選擇，所需要得知的產品、人與市場之知識成本。機會或「內含」(sunk) 成本則是指早先的選擇對現在的選擇所造成的限制。

⑪ 最近幾年得獎的公共選擇理論者，包括 George J. Stigler、James M. Buchanan、Ronald Coase，以及 Robert E. Lucas。

⑫ 以「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之名著稱的主要例子，包括了以下著作：Elster (1985)、Przeworski (1986) 與 Roemer (1982)。對此採取批判態度的鳥瞰，參見 (Kieve, 1986) 與 Wood (1989)。

⑬ 以公共選擇理論為特色的期刊有很多，其中一本主要刊物是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觀其刊名，目標昭然，就是要取代異端政治經濟學，以當代的古典經濟學觀點替換之。

題的政策議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電波頻譜的價值、配用電波的適當政策、規範機構的員額，以及解除管制的成本與後果 (Coase, 1991; Crandall, 1991; Derthick and Quirk, 1985; Stigler, 1971; Wilson, 1980)。

255 政策研究亦有多處值得傳播政治經濟學參考。它的立論源頭是多元政治觀，認為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總是有許多相對平等的參與者，直接與聞其事，因此我們必須處理每個參與者的特定利益與行動，如此才能解悟完整的政策形成過程¹⁵。它傾向於認定，政策的形成並非受到任何單一因素（比如，資本邏輯）的影響，它拒絕接受這類論點，因此，任何特殊利益與行動若是存在，也都已被化減，直至可以納入公共選擇理論的邏輯。政策研究的權力觀，確實傾向於極端多元主義，在它看來，政策形成的過程，完全沒有特定的利益作梗；對於這種看不到利益集團的權力觀，政治經濟學提出了鏗鏘的質疑。不過，最近的政策研究已企圖自行糾正這個錯誤，其部分矯正的作法是拓寬其理論架構，比如，聞名的多元主義者林布蘭 (Charles Lindblom) 就納編了批判理論家（如哈伯瑪斯）的洞見。誠如德·哈凡-斯密所說 (de Haven-Smith, 1988: 120)，它亦質疑政策分析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目標則是要強化政策研究的基礎：

政策分析家在設計政策研究的方法論時，觸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他們誤認政策研究的主題，可以無須確認理論架構。這個方法論的假設，使得政策分析家的目標，可以設定為「政策績效」的評估。它所忽略的是，政策與績效的指標，無法自行證成。

毫克華茲 (Hawkesworth, 1988) 又將這個批評往前推了一步，他

¹⁵ 運用在傳播研究的情況，請參見 Derthick and Quirk(1985) 與 Krasnow et al. (1982)。

呼籲政策研究應該要克服事實—價值的二元迷思，因為這個迷思的存在，等於是將政策研究這個領域化減為「非關政治的科學主義」（p.10），也就是認為「政策分析是政策分析，政策決定是政策決定，兩者涇渭分明」（p.4）。他提出的修正作法是「後實證主義」的分析，以「持續的、批判的態度，檢視政策的前提假設，找出其盲點，明辨其政治意涵」，如此才能創造一個「民主的科學」（p.9）而「多作檢驗，不視之為理所當然」（p.191）。本章的重點不在檢討政策研究如何解決這些議題。比較重要的是，本章必須體認，政策研究鎖定特定的、具體的課題，分析涉及其間的各方利益，對於政治經濟學有珍貴的啓發意義，畢竟，政治經濟學時而直接從資本主義過程的邏輯進展，立刻推演得出了特定的結果，但其實這只能說是思考層次的假設而已¹⁶。

政策研究的政治羽翼則是強烈的多元主義論，認為國家是許多利益競逐的複雜機器，各方均積極地涉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比如，一九七〇年，尼克森政府創設了「電信政策署」（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部分原因是它認為傳播規範機構「聯邦傳播委員會」沒有能夠按照它的保守議程行事，這在政策研究取向看來，倒也是美國白宮的大事一樁哩。尼克森的人馬認為，當時美國的公共廣電表現，存在著自由主義的偏頗，想要加以終結，放在更為一般的層次，他們又想要以技術官僚與市場原則重新界定公共利益的標準。於是政府各機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局部塑造了美國國家機器往後二十年裡，如何處理媒體與電信的轉型問題（這個轉型也使得這些機構的結構與權力，受到影響）。我們在這裡再次看到，政策研究傾向於過度強調國家機器的角色，特別是過度強調處理政策課題的形式上的法

256

¹⁶ 另一類想要拓寬政策研究的領域，特別是使之運用在傳播研究的實例，參見 Brennan (1992)。

律—規範體系。這種偏向形式主義與「終局戲局」的取向，忽略了在法律—規範機構以外的廣大資源與權力的運用，也忽略了在國家採取行動而加以評估前，已經存在著很長的孵育及發展過程，對於這些議題已起了塑造作用。雖然有這些缺陷，但政策研究對於政治經濟學是有啓發的，因為它提醒後者，必須抗拒誘惑，不要一下子就化約地進入了唯經濟主義的立場，不要只從工業結構就讀出政策決定。

政策研究的公共選擇，或是其經濟羽翼，亦對政治經濟學有所啓發，特別是它對範圍甚廣、意義甚重要的許多議題之熱情擁抱，傳統上，這些都只是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專擅的領域而已，由於這些學科以前只重在自己的有限權狀裡追逐，這些重大的議題並沒有得到青睞。但公共選擇理論不再自滿於側身經濟學的傳統界域，它將傳統經濟學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及實證主義，應用到了家庭、國家、宗教組織，以及寬汎的種種議題，包括了性慾、科層組織、家庭結構與預算等等。再者，這個取向一點都不閉塞，毫不自外於規範與道德問題之外，而還在不久之前，規範與道德問題可說是主流社會科學的禁區，但如今它們已經是政策分析的核心地帶，特別是公共選擇學派的人，更是對於這些問題念茲在茲。亞當·斯密與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也都是這些價值關懷的強烈驅使下，將寬廣的社會議題（包括他們時代的核心道德問題）都放到了他們的研究範圍，公共選擇學派的人同樣受這些價值驅動（但多了精準的方法論策略的驅動），他們也以這些先驅的精神，貼近社會而研究之，他們對社會科學現代主義之膽怯，以及隨之而來，這些社會科學無能處理我們時代的許多重要社會與道德議題，大聲挑戰¹⁷。雖然他們探討這些議題的方式，自有必須批判之處（如極端地主張方法論個人主義、將

¹⁷布瑞南與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 1985)的著作中，先驅的精神尤其溢於言表，他們認為自己的道德重建之鴻圖，不亞於是企圖要在美國創造一個新的「市民宗教」。

國家當作是許多競逐利益者的仲裁者），但政策研究亦向傳播政治經濟學示意，因為後者正企圖扭轉研究趨勢，使研究不再喜孜孜地投向日漸狹隘的胡同，也不再於社會科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砌起高牆。

強調普遍原則重於片面相對、共同性重於分殊，具有重要的政治效應。季特林 (Gitlin, 1993) 包括在內的許多人，都已論及那些從事中間偏左的政治運動者，有個傾向，也就是集中在認同政治大作文，也就是偏向強調性別、種族、氏族、年齡或性偏好等等區分。這個企圖可以理解，因為它想要克服因性別等因素所造成的社會地位之差別，因為它想要促使性別等因素不再只占有左派分析的第二等地位，然而，季特林認為，這又造成了「一種政治效應，也就是各團體淪於自我標榜的成分，還要多於創造廣泛聯盟的企圖」。認同政治促進了範圍相當多元的政治的與知識的運動。但它同時也推波助瀾，使得左一右之分的傳統政治，為之逆轉。無論這個原則再有多少缺陷，左派一度堅定地以普遍原則作為論述的基礎，但現在大談認同政治的左派，卻熱衷於提倡許多片面相對的利益。再看右派傳統上對於形同精英標準的提倡，如今卻站在雷根—柴契爾年代裡，打造了堅定基礎，自信滿滿地轉化為保守民粹主義的普遍原則。

257

政治經濟學的回應

政治經濟學針對政策研究與針對文化研究的回應，有異有同，我們不妨從相同的部分開始，也就是先檢討在傳播分析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權力」。政治經濟學賦予權力相當重要的分量，這是它與政策研究及文化研究的許多不同面向當中，特別重要的一部分。這裡的權力有雙重意旨，一方面是指達成目標需用的資源，另一方面是指社會科層之內的控制工具。政策研究的政治核心是多元主義，它認為權力只是資源，並且已在可能範圍內，廣泛分散，所有在政治領域之內運作的利益，或多或少都能擁有 (Derthick and Quirk, 1985)。就特定

例子來看，比如，廣電業者在甲議題、電信公司在乙議題，而消費者團體在丙議題，或許會擁有不同的權力，但整體來說，多元主義認為，並沒有任何結構傾向會使權力集中在特定集團或利益身上。所以，根據此一多元主義的觀點，既然權力已大致分布在整個社會，權力也根本不可能具有核心影響力。

政治經濟學同意，將權力視為一種資源、視為一種控制形式，是很可取的概念，但政治經濟學認為權力的分配，並非多元論者所說。政治經濟學認為，權力是一種資源，但卻是「被納入了結構」，或者，套用馬紅 (Mahon, 1980) 的話，權力根源於「不平等的再現結構」，它已經變成我們的社會體系的一部分，任何團體若在社會層級之內占有優勢的市場地位，則將屢獲獎勵。再者，權力還不只是一種資源——權力也是一種「控制」形式，被用來存續這種優勢地位，痛擊挑戰者。雖然在實務上政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有很多地方重疊，但我們必須在知識上有所澄清，指出這兩個學科對權力的觀點，在知識論上，具有本質的差異。政策研究認為權力分散不集中，是社會場域之中，許多運作力量之一。政治經濟學則認為，權力凝聚而被納入結構，是塑造社會場域的一個核心力量¹⁹。

258

當然，文化研究沒有忽略權力，它並且以許多方式呈現理解權力的方法，特別是強調權力之個人的、在地的與交互主體的面向。然而，文化研究的權力觀，似乎是更為接近於政策研究，而不是政治經濟學。在他們思考社會關係時，文化論者並未將權力放在核心。再者，他們的權力觀似乎是根植於個人的主體性、個人的認同，以及集體行動，但政治經濟學則不同，它認為權力已被納入社會制度的結構

¹⁹ 比如，政治經濟學分析媒體產權與集中的文獻，為數衆多，相比之下，公共選擇理論的文獻，很少談這個主題。我們在無數例子都可觀察得知，權力在前者的地位顯赫，但在後者幾乎不見蹤影 (Demsetz and Lehn, 1985)。

中。文化研究似乎裹足不前，不怎麼願意談論結構，就其極端的例子來說 (Laclau and Mouffe, 1985)，文化研究甚至拒絕承認社會與社會整體的存在，即便有人戒慎小心並附以許多條件才論稱，極端的文化研究仍然不願承認社會與社會整體的存在。

對於文化研究的傾向，政治經濟學則重新肯定社會整體的理論，仍有價值與必要，但這裡的整體並非系統論者的抽象觀念，而是指權力的共同利益與權力結構之具體展現。思索權力的主觀面向，固然有其價值，但政治經濟學仍然主張這些主觀成分必然與權力的客觀概念相互構成，並且權力來自掌控社會結構的基本規則。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很有趣的場景：政策研究與文化研究其實對於媒體內容的多元表現，看法相同。他們各自以獨特方式，將多元與多量融合在一起，並且都傾向於認為，若是有人說多元不易達成，那簡直誇張，他們通常也不承認多元的達成，必須要採取協同的政治行動。政策研究的立場，偏向有許多，其中之一是它將內容的多元性，等同於市場或社群聲音的「數量」。這個立場儘管也反對媒體集中（因為將侷限資訊與娛樂的流通），但它開出的藥方是擴大市場競爭者的數量。比如，歐洲的廣電頻道由國家壟斷分配，對此，典型的政策研究反應，就是核發更多私人執照。它對北美電信由私人壟斷控制，亦有標準反應，那就是支持一家以上的競爭者，加入市場。它測量集中的主要標準，是估算市場中，生產者與分配者的數量有多少，以此決定市場中是否存在著足夠的聲音，是否構成了充分的競爭而讓消費者有所選擇。簡單地說，政策研究將「多元等同於多量」。只有到了政策研究的邊陲地帶，在它遭遇到了關於國家與政治經濟學文獻的批判理論時，我們才能看到有人努力在解套兩邊的連結，一邊是純粹的聲音數量（多量）另一邊是「不同」聲音的數量（多樣），在我們這些異端看來，多量不同於多樣。正統政策研究則論稱，多樣必然在競爭過程中浮現、產生。從這個角度看，達成多樣也就相對容易——只需要增加生產者與分配者的單位數量。對於政治經濟學再三提出

的棘手結論，他們沒有什麼興趣：不管數量再怎麼多，生產者與分配者帶給我們的是相同的訊息——多量不必然帶來多樣。梅鐸的福斯電視網進入了美國，是讓原本由 ABC、CBS 與 NBC 寡占的市場，增加了更多的聲音。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是否福斯網提供的新聞與娛樂，在任何根本意義上，不同於原來的標準電視網？政治經濟學因此接著論稱，若是未能確保多樣性增加，則擴充媒體聲音的數量，一無淨獲，或者淨獲稀少。

雖然就知識論、理論、與實質立場而言，文化研究取向與政策研究對傳播的看法，存在不同，但二者關於媒體多元性的政治觀，結論卻非常相近¹⁰。儘管對閱聽人的認定，起點完全不同，但文化研究取向還是得到了相同結論：媒體多元不是大問題，因為資訊與娛樂是「多義的」，人們是會加以多重解讀與詮釋的，因此，無論有多少形式上的生產者與分配者，資訊與娛樂本身就是會創造自己的多元性。文化研究傾向於將每個接收訊息的人，都當成是一個生產者，賦予訊息不同的意義，這是因為接收者都有自己的獨特「主體性位置」（套用費斯克的用語），而這些位置多所重疊，構成了社會生活。媒體集中並不會侷限多元性的存在，因為正式生產並分配新聞、戲劇或喜劇等等的人，並不能直接影響詮釋的範圍。反之，閱聽人的主體經驗，由於範圍很廣，因此也就使得傳播與資訊產品產生了文本的多元性。於是，經濟主義與生產主義所遭遇的雙重問題，也就是文化研究認為已使政治經濟學大感疲憊的兩大問題，已被文化研究解決。放在文化研究這個偏向的脈絡中，我們可以說，（但有少數值得一提的例外）認為經濟主義就是直接從資本的邏輯、結構與動力，解讀文本。「生產主義」則是經濟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從組成生產過程的資本循

¹⁰ 伍德 (Wood, 1989) 論稱，公共選擇理論與後結構主義的近似之處，遠比大多數評論者所舉證者還要多出許多。

環，讀出了文本²⁰。

政治經濟學同意政策研究的看法，指出增多生產者，可以擴充訊息的數量，政治經濟學者也介入了政策過程，企圖達到這個目標。還有，它也同意文化研究的說法，指出我們不能從新聞或娛樂節目，讀出單一閱聽人的反應。但政治經濟學堅持，透徹瞭解商品化的過程，如何影響生產、分配與消費的循環圈，對於解悟文化十分必要。政策研究從其不等理論立場，對此亦有認知。讓人扼腕的是，文化研究對於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所知有限，讓人苦惱，因此也有所誤解。讀其文獻，我們可以知道文化研究對正統的與異端的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之論點，深度、複雜度與廣度的瞭解，實在都是很少，也就不能掌握政經論述的整個多元程度。這就造成了文化研究所作所為，不是以政經論述的論點作為批評基礎，而是根據形同是對號入座、戴帽子的理由，直接拒斥了經濟主義的論點。經濟論點之被抨擊、拒絕，是因為它們是經濟論點。生產文化的經濟過程也被擱在一旁，因為它們只是生產主義者的關懷。這實在是格外地讓人扼腕，因為如此為了拒絕而拒絕的立場，使文化研究的洞見毫無用武之地，而原本它或有可能另有貢獻，能夠開創有用的地基，與起自政治經濟學立場的人，展開對話。試看以下這段對生產主義的抨擊：

◎霍爾 (Stuart Hall) 的著作在這個課題上，甚為曖昧，可以說反映了一種例外。

在有些著作中，霍爾賦予資本很大的力量，大到捍衛文化研究的人，將會難以區分霍爾的看法與文化研究者抨擊為經濟主義的著作。比如，霍爾 (1986: 11) 曾說，「產權與控制」已經具有充分的重要性，它「賦予了整個再現機器的根本定向，使之進入了財產與利潤的價值體系」。霍爾說，資本的力量如此之大，大到「新的集結方式、新的社會目標，與新的控制形式，無法以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方式，進入文化的生產過程」。在另一些作品（比如，1989a: 50），他又尖銳地批判，他以「粗野與化約主義」指控政治經濟學，並說政治經濟學「不瞭解為了意義而作的抗爭」。

「生產者的文本」與「讀者的文本」是兩碼子事。阿多諾的分析，或者，一般生產主義者的導向亦同，問題在於他們不僅從生產者的文本，推知讀者的文本，而也因為在如此推斷時，他們忽略了其他時刻的生產之元件，他們認定「創造性」，只集中在生產者或批評者身上。或許，這是作者、藝術家、教師、教育者、傳播者與知識分工之內的煽動者，最深最大的偏見！(Johnson, 1987: 58)

生產者與讀者的文本，兩不相同，政治經濟學對此毫無異議。讀者自會生產意義，對此，政治經濟學也無異議。還有，當代媒體的內容、博物館與劇院的傳統藝術，一直到「資訊社會」的新媒體，政治經濟學者都沒有撤守，都還是把它們當作是根本的「文化」力量而加以檢視(Babe, 1994; Schiller, 1989; Webster and Robins, 1989)。再者，政治經濟學者也已認識到了方誌學方法的價值，是有助於我們檢證閱讀、收聽與收看大眾媒體的社會經驗，然後展現之(Pendakur, 1993)。到此為止，一切尚好。但再由這裡而往前推斷，煞有介事地認定政治經濟學混同了讀者與生產者，說這很可能是知識工作者「最深最大的偏見」，那又實在是前所未有的過度指控了^①。「閱聽人不是被動消極，但生產者也不是無所作爲」。誠如梅鐸所說(Murdock, 1989a: 439)，原本是要確認可供彼此辯論的地帶，如今卻成爲斷然的拒絕往來，這個情況在某些文化研究的著作，太過明顯了，殊可扼腕(Carey, 1994; Grossberg, 1991)^②。它忽略了饒富興味的問題，比如，讀者與閱聽人到底有多大力量可以作爲文本的生產者？在多大程度之內，讀者與閱聽人的反應範圍，已經在文本生產者的預期之中，並且據此設計其文本？文本的生產工具與意義的生產工具，二這的控制關係如何？在社會結構的位置，與在意義生產的位置，有些什麼關係^③？在面對巴赫汀(Bakhtin)所說的文化工業之「獨白論述」時，閱聽人要有哪些形態的資源，才能讀出對立的與另

類的意義？若是我們不再只是爲了拒絕而拒絕，以上這些問題將會有益於彼此的交流。「浪漫地慶賀個人能以批判態度與意識，評估媒體內容」（Evans, 1990: 152）²¹，雖然相當具有吸引力，但停留在這個階段，顯然不足。比如，政治經濟學對多義與文本的多重生產之說，並無異議，並且也認爲，分析生產、分配與消費的完整循環圈，很有必要，因爲這些是實現價值與建構社會生活的核心要素²²。然而，政治經濟學也認爲，多元性並不是多家媒體或多量閱聽人所必然衍生的

—————

②① 公平地說，大多數形式主義者的文化分析之讀者觀，也飽受詹森 (Johnson, 1987: 67) 的抨擊：

形式主義者在解說時，特徵是他們看不見讀者的行動。即便是……關注創造導向的、解構的或批判的解讀之理論家，他們也只是將這樣的能力，歸諸某些形態的文本（比如，若是用巴特的術語，那就是「可寫出的」而不是「可解讀的」），而一點都不是真實讀者的經驗……特定的一些解讀行動，最多也只是被瞭解爲人類原初經驗的重新上場。

伊凡士 (Evans, 1990: 152) 對此再作發揮，他說，許多社會科學家聲稱，他們要讀者與閱聽人，有所詮釋地理解，但他們其實只不過是再溫熱一次心理主義而已。

②② 這就是凱納 (Kellner, 1995: 42) 稱之爲文化研究的退化效應：忽略了政治經濟學，慶賀於閱聽人及大眾的快樂，忽略了社會階級與意識形態，無能分析或批判文化文本的政治，這些使得文化研究徒然只是一支學術次分類，對於文化工業本身沒有什麼傷害，最後反倒是對其有利。

②③ 伊凡則如此說 (Evans, 1990: 150)：

除了早期皮下注射模式所說的情況，再沒有任何大眾傳播研究說閱聽人只是被動與消極。因此，真正的差異並不是積極與消極的對立問題，而是我們究竟要認定何種活動較為可取。

結果。媒體家數有許多，但仍然可能生產根本上完全相同的媒體內容與形式。並且，誠如牟德斯姬 (Modleski, 1986) 所說，閱聽人的抵抗已經被刻劃在媒體工業所願承受的限度。再者，焦點集中在閱聽人活動，使之等同於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則實在是膨脹了閱聽人，因為它所能孕育社會行動，實在渺小，超不出合理範圍的意義。比如，在許多文化研究者看來，只要觀眾不是皮相地解讀電視節目，只要觀眾以非正統方式使用廣告材料，觀眾就是在抵抗，或是有了對立的意識，但誠如米勒 (Miller, 1988) 所說，這些行動或意識，其實已經內在於行銷手法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行銷者利用反諷、觀眾的複雜意識，將它納入策略，作為創造相互認同的工具。這種傾向表現在後結構主義的著作中，最為明顯，並已經招徠許多論者的強烈批判 (Ahmad, 1992; Norris, 1992; Palmer, 1990)。

再者，「閱聽人」這個詞不能算是一個分析類目，它與階級、性別與種族不同，它是媒體工業自己的產物，它們用這個詞來確認市場與界定商品。每當我們用到了閱聽人活動這樣的語詞，就等於是讓它

24 閱聽人的力量與愉悅，實在是浪漫化又情緒化的說法，但其證據卻來自薄弱的分析，這不僅只是伊凡士提出的問題。另見 Schiller(1989) 與 Schudson(1987)。梅鐸 (Murdock, 1989a: 437) 也說，就連第一代的文化研究，包括侯苟與威廉士的著作，「都充盈著已快速消逝的鄉愁世界」，它們對「這些即將消失的生活方式，賦予了某種「正宗性」」，它們的分析，也就「沾染了浪漫情懷的評估」。

25 伊凡士說 (Evans, 1990: 148)，文化研究認定自己與傳統取向完全不同，它對「皮下注射模式」的媒體效果 (居然認定媒體內容可以如同藥物一般，打入閱聽人身上而產生意定的效果) 大肆抨擊。但「到底是哪些人在援用皮下注射模式呢？這些人又很少被指名道姓；事實上，有些學者認為，皮下模式從來就不曾是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重要傳統，這個直接效果的模式，大抵是被用來當作挑釁的稻草人，對此展開抨擊，可以輕易地讓抨擊者好像變得非常精緻複雜了」。

有了分析的與經驗上的實存位置，但這並沒有人檢證其存在，因此我們在使用時，小心為妙。最少，若是要說它可以是人口學上的類目，因此能夠有「閱聽人」「活動」(act)的說法，那就未免說得太早，因為我們都還不能確認這個詞具有任何概念上的價值，尤其是它與社會階級、種族、氏族與性別等等的關係，都還不能確知，而後面這些詞彙才更能稱作是人口學的團體用語——它們是人們活生生的體驗。人群以不同階級、性別、種族與其他社會面向作為組織的基礎，成為社會行動者，執行各種活動（包括抵抗媒體的再現），這些活動是否重要是一個經驗上的問題，可以經由一系列的程序加以檢驗。那些握有市場控制大權的人，也就擁有了媒體強權，他們能夠將所有頻道塞滿具體展現其利益的材料，這些材料偏向於將多義的內涵與形式，納入其結構，因此侷限了詮釋的多元程度，這個結構還能確保再三重複的說法，侷限於某些範圍，至於與常模相去甚遠的觀點，只能少量呈現，而且只能邊緣化。政治經濟學從來沒有完全否認閱聽人可能以對立的方式，解讀文本，任何人若是指控政治經濟學是當代變相的皮下注射模式，是經濟主義與生產主義的再版（參見 Grossberg, 1991 及本章註 25），則這個指控是不能成立的。政治經濟學其實是將這些讀法，放在特定的權力—幾何關係中考察，放在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的協力脈絡中考察²⁶。

對於政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特定批評，政治經濟學也有個別的回應。它特別是糾正了政策研究之內工具論、國家論與經濟論的傾向。有些政策研究傾向於採取工具論的解釋，認為政策形成的過程，純然是由特定團體以行動向國家施加壓力，使最後的政策符合他們的

GRATO GRATO GRATO GRATO GRATO GRATO GRATO GRATO GRATO

²⁶ 政治經濟學寧取這個立場，不願採取許多文化研究所突顯的立場，因為後者好像是說，反對意見可以自由流通，若以伊凡士 (Evans, 1990: 149) 的話來說，文化研究「給人一種印象，以為「非」霸權的閱聽人反應，實屬平常」。

利益所致。它論稱，誰能成功使用國家作為工具，誰就能達成其特定目標，這是政策的本質。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會認為，電信的自由化與解禁，是因為大型工商用戶，成功地抓穩了國家政策機器，使之為其工具，完成他們創設低成本、大用戶導向的通訊網路與服務之目標，以此滿足了他們日漸增加的商業需要。與此類似，根據工具論的看法，線纜電視公司的力量與利潤得以成長，是因為這個產業有能力遊說，力量並且超出廣電業者、消費者團體及其他團體的力量，所以有辦法塑造政府政策，使之符應他們的利益。

政治經濟學認知這類工具論分析的價值，但期望更為深入地瞭解，因此起點是將傳播工業放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整體關係之內，續作考察。進一步說，這是指將傳播工業的各部門、國家規範與政策機構，以及市民社會團體，放在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動態中，詳加探討，畢竟傳播工業等力量，是在此動態中，相互構成的。為了要瞭解電信體系的自由化，如何在不同國家、不同區域被執行完成，政治經濟學呼籲我們應該檢視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情勢，何以使得大型商業用戶，能夠而又如何產生瞭解情勢的能力與組織，然後史無前例地大舉介入政策制定過程；政治經濟學呼籲我們分析環繞國家體系各機構內外的力量，比如，國家機構內部活躍分子的發展，如何使得這些機構對變化更有反應，以致打破了國家與壟斷電信機構之間的傳統連結；政治經濟學呼籲我們分析，為什麼市民社會團體的主張會有這些不同，有些擊舉傳統旗幟，要求以公共利益為依歸，規範電信服務，另有些則投入大型用戶的麾下，認為競爭者的進入，才是促進電信產業變化的最佳工具。簡言之，政治經濟學論稱，若是要瞭解「如何」，則必須瞭解「誰誰作了什麼」，但這還不夠。再者，「如何」這個問題的解答，並不代表我們已經解釋了過程。我們還必須知道，「為什麼」這些行動會出現，而這就必須將傳播政策放在總體政治經濟情勢內考察，包括歷史的與當代的政經走向。最後，政治經濟學超越了工具論，它呼籲我們應對政策過程有批判的理解能力，也就是將結構的

與歷史的理解，扣連於價值體系或道德哲學的立場，評估此政策過程是否符合民主、平等、參與、公平與正義的要求。這個評價的立場，亦可促使政策分析走出其狹隘的、分析的、實證的趨向，轉而使政策的分析，能夠與改變政策的政治，扣連在一起。

264

政治經濟學也確認我們必須平衡政策研究的兩股趨向，一個是過度強調政治面向，另一個卻過度強調經濟面向。前者是「國家主義」的取向，這類政策研究的假設是，最後的決策權力仍由國家享有（當然，其強調的程度又各有不等）。享有這個權力的機構，可能是形式上的，它指涉國家對決策過程的法律控制，或／又可能是實質的，指涉國家最後對決策的內容，有權維持或改變。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這類政策研究總是認定權力仍由國家享有，所以，即使它的結論是國家已被某些外部力量（產業界）或內部力量（國家自己的官員）「把持」，以致於國家成了工具，但這類政策研究仍然堅稱，大權在握的是國家，若要完成政策目標，就必須先把持國家。這就造成了分析的時候，國家（包括規範、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幾乎就成了唯一的焦點，國家被當成決策宇宙的核心，結構了產業的結構、塑造了產業能量（包括價格、服務與營收），並設定了消費者與公共介入的條件。總而言之，標準的國家主義取向的政策研究認定國家是權力中樞，決定了政策制定過程的運動法則。

政策研究的公共選擇羽翼則似乎走向了另一個對立的極端，部分原因是對國家主義的反彈，它提供的是政策過程的經濟主義之觀點，它以市場、效用與偏好等經濟語言，取代了政治結構與權力等制度語言。它將政策領域視同市場，「買方」在此註冊，尋找有利的決定，「賣方」也在此註冊，提供政策輸出，因此，公共選擇理論跟隨著新古典經濟模式，其目標是確保均衡點的出現，各政策行動者的偏好應該會在邊際點交會。這個立場的後果之一，就是國家根本就只是被當成倉庫，任何的不完美、不盡意或根本就是競爭行銷體系的毛病，問題通通出在這倉庫裡。對於貝克 (Becker, 1975) 來說，行政與程序

的負擔，使得國家趨向於承擔日漸增加的「死重成本」(dead weight costs)。培茲曼(Peltzman, 1975)則論稱，國家規模的成長，可以追溯至特殊利益團體的崛起，他認為他們依靠西方社會日漸平權而提供給養的現實而生活。最後，史太格勒聲稱(Stigler, 1988)，即便外觀儼然，說是要糾正市場失靈的那些國家機構(如規範單位)，其實也只不過是重新分配收入，但效能不彰的工具，以及為規範單位自己積累權力而已²⁷。

政治經濟學認知國家主義與經濟主義的兩股傾向，各有長處。前者賦予國家獨立的意義與重要性，這點可用來糾正某些政治經濟學，僅只是從資本邏輯就「讀出」政策的制定。它也瞭解公共選擇理論的企圖，在於引進經濟語言，以此沖淡政策研究的國家主義色彩。然而，政治經濟學企圖糾正國家主義與經濟主義的雙重傾向，因為二者都是局部、偏失，犧牲了政治的或經濟的重要元素，它的起點是認定政治的與經濟的，實乃相互構成。二者之一都不能真正解釋政策過程；我們需要二者才能完全理解政策過程。具體地說，我們必須拒絕誘惑，不再因為正式的立法規範機構，權威歸屬國家，就將政策視為政治力的禁臠。正式的權威機構只是權力的形式之一，很多時候，它只是提供合法的背書，追認在規範過程以外就已經達成的決策。比如，不同的產業部門與學術／知識社群，就提供了巨量的動能，使得國家採取某些策略，透過商業化、私有化、自由化與國際化等手段，轉換了電子媒體與電信服務。這些影響深遠的策略，歷經抗爭才能完成，然而，由於這股壓力密度如此之大，以致國家採行的這些策略，

²⁷ 以公共選擇理論家一貫的信心，史太格勒(Stigler, 1988: xiii)，漠視他其實必須檢證材料來展現這種規範觀點，他說，規範角色如今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大家都已知道並接受，也已經有非常多的材料證實展現了這個情況，若是在這裡引述大量支持這個觀點，並且還在增長的研究，那就未免賣弄學問了。

只能漸進爲之。許多的政策研究、另類方案的評比、計畫與辯論，均是在正式的立法及規範評量之前、同時進行的，並且是在正式機關外面進行的。

由於國家主義的政策研究偏向於集中在國家的活動作文章，許多政策研究的文獻，也就忽略了，或至少低估了這些活動的意義。政治經濟學要矯正這種國家主義的趨向，因此擴充政策過程的概念，使正式國家活動領域之外發生的活動，也能包括在內；比如，舉凡政策研究與計畫中心的活動，企業公司、工會運動者、消費者的組織，以及市民社會團體抓緊政策議題而發揮（相關的政策議題什麼時候會排進國家的議程，這些政策決定如何被執行等等），都需納入。總之，政治經濟學對國家主義的回應，就是擴大政策分析的基礎，特別是納入那些相互構成政治過程的社會與經濟行動者及其力量。

與此類似，公共選擇取向加諸於政策研究的特定經濟主義，也是政治經濟學企圖糾正的對象。雖然它體認引進經濟因素的價值，但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要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語言與假設，因為它們低估了或完全忽略了權力的行使、制度行動者的影響力，以及社會關係的形構已使個人的選擇只能在結構中進行。再者，以市場模式爲藍本，普遍用在分析政策問題及促動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否真有價值，政治經濟學甚表懷疑，因此大力批判之。正因為政治經濟學從根質疑公共選擇論的假設，因此它也就對市場是否存在（因為市場只是被假設存在）、其他力量是否能夠創造出市場，而市場又是否禁得起考驗，都表懷疑。政治經濟學進一步質疑市場機能的中立性，質疑市場機能是否真能提供合宜的誘因，以及市場機能是否真正比較符合效率要求（Hula, 1988）。政府的規範是需要付出社會成本，我們不能說公共選擇理論的這個強調沒有價值，但政治經濟學則提醒公共選擇理論家，競爭的代價也必須由社會支付，公共選擇的分析家對這點不是忽略，就是半冷半熱，不怎麼積極企圖去決定與評估競爭所花出的社會成本（譯註1）。若是簡單地說，既然公共選擇理論脫胎於新古典經濟

學，則政治經濟學對後者的總體批判，亦可適用於前者，因此它的結論是，既然新古典經濟學根本就搞錯了，則我們大可自信地說，新古典經濟學用在政策研究時，必定也是謬誤的。政治經濟學對這類型政策研究的糾正，是以基礎更廣的分析，取代公共選擇的經濟主義，它的分析核心包括了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的過程，大致說來，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基礎。更明確地說，它論稱我們應該將政策過程與政策行動者，放在更大的脈絡中考察，而塑造此脈絡的力量則包括了當前商品化的狀態、構成空間化過程的制度圖譜，以及階級、性別與種族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之組合，社會運動與霸權過程所總合構成的結構化等三者。雖然政策研究的經濟面向中，市場、個人偏好與選擇，是扮演了部分角色，但它們只是政治經濟學所論述之更大經濟過程的部分面向。

政治經濟學也直接或間接回應了文化研究的批判。雖然某些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特別是來自英國與拉丁美洲的文化研究），但總體來說，它欠缺政治焦點，絲毫沒有政治企圖與目標，而過去多年以來，這些企圖與目標儘管飽受挑戰、歷經猛烈爭奪，但它們一直是驅動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動力。政治經濟學一直是群力抗爭的場域，

譯註 1 這裡舉德國、法國、義大利與英國四個主要歐洲國家的電視生態為例，它們雖然都是公共電視與私營電視混合，但公私之間的競爭程度不等，相對來說，以英國的規範最嚴格，公私電視頻道的競爭在四個國家中最不激烈，其次不激烈的程度，依序是德國、法國與義大利。以一九九四年資料計算，英國每戶每年支出歐幣 87 元，收視率 43%，德國 101 元（收視率 33%）、法國 118 元（42%），義大利 143 元（35%）。競爭最厲害的義大利，社會成本是明顯最高（政治成本則是私營電視頻道的董事長 Berlusconi 當年當選了總理）。若依這個例子，應可看出，市場機能強調透過競爭來提高產業的營運效率，至少在廣電產業來說，不僅不能成立，而且適得其反；依賴市場機能調節生產，是無秩序的、無邊浪費的。

它運用在傳播領域時，亦復如此，這個事實無庸否認，它與許多不同的政治流向，都想在知識上與政治上，取得上風。然而，政治經濟學也是一支風格獨具的政治學科，換句話說，這個學科模糊了，或者整個消滅了分析與介入的分際，政治經濟學之內的人，或者亦可說之外的人，上自其古典奠基者的時代，很少會否認政治經濟學的這個色彩。這就是爲什麼政治經濟學總是說，唯實踐能夠帶來活力。

就其總體來說，文化研究並沒有那麼清楚地信守任何政治企圖與目標。這個學科當中，並不是沒有人論稱應有政治目標，雖然它與政治經濟學的目標不同，但是有人同等明確地表達。文化研究對政治目標的思考，焦點已從社會階級移開，流動到了性別、種族與其他認同形式，以及流往橫跨階級界線的新興社會運動，如環境生態保育運動、女性主義與世界和平等等的抗爭。根據這類思維，由於集中在分析構成社會認同與分裂的文化實務與價值，文化研究可以協助我們瞭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特徵，如威權民粹主義讓許多勞工階級投入柴契爾—雷根的懷抱中，如此，文化研究也就對大眾反對運動與另類運動的形成，起有促成之功。不過，這個觀點並沒有在文化研究之內普遍被接受。奉行文化研究的某些人，對於其政治的態度，曖昧模糊多了，他們論稱文化研究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政治企圖，或說，它的至要（若不是唯一的）政治活動，其實就是研究本身。詹明信（Jameson, 1989: 43）對文化研究的政治不確定感，有所省思，他說，文化研究自覺最坦蕩舒暢的時候，難道就是確認自己有「一種無政府主義與民粹主義精神」的那一刻？文化研究者以此精神，熱情回應了費樂史東（Featherstone）與其他人稱之爲，「今日世局，各地各處更爲民主的、更爲具有文化涵養的公衆」⁴⁵。最後，另有一種文化研究特別是以後結構主義爲師，他們心中的現實，就只是文本與論述的建構。這些人傾向於認定，研究的過程或實質內涵，與政策場域之間，哪裡會有什麼連結？至此，筆者雖然勾勒了整體文化研究的圖譜，但筆者必須承認，以上所言，儘管正確，但文化研究之內的分野，並沒有辦法

如此明晰地區隔。這裡只需說，文化研究這個範疇，總括來說，並沒有政治經濟學那麼清楚自己的政治連結。

文化研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實質目標，亦表現得非常不確定：對社會整體性的掌握與理解。鐵尺拉夫 (Tetzlaff, 1991: 10) 論稱，文化研究根深蒂固的一般趨向，表現在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身上，最為明顯，它們認為聯合、統一 (unification) 等於社會控制，解放等於「打破統一體，使之片斷化」³⁹。政治經濟學則側重在論稱，與其說社會整體性是依據理論上的抽象推演與依據體系的內在特徵而得知，不如說社會整體性是經驗上可觀察的社會關係（特別是運作於資本主義之內的社會關係）之具體展現⁴⁰。我們這裡所說的資本主義，指的是一個特別的社會整體，它的起點可以由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的社會過程所構成。這些過程的相互關係與組合之本質，並非一成不變，它是動態發展的，因此也就無法絕對地明確指定，但這也正是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在其工具容許的範圍內，盡最大可能描述社會整體的狀態，以及它的主要過程所移動的方向。是以，雖然政治經濟學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在很大特徵範圍內來探討社會整體，願意以開放的態度，評估構成整體的各種社會關係之本質、形式與強度，

³⁹說來有趣，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的經濟羽翼，二者都支持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二者對個人行動均慶賀有加，均將它視為對權力的反抗，尤其是對中央政府與壟斷財團的反抗。我們亦須注意，詹明信自己與這個立場保持距離的方式，相當具有啟發意義：有人批評他的熱心不足，無法慶賀「新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他則說這樣的批評，非常正確。

⁴⁰李歐塔 (Lyotard, 1984) 對後現代主義的定義是，「對大敘述深表懷疑」。

⁴¹即便是捍衛形式主義的人（包括後結構主義）也會以巴特為例子，承認「巴特將『歷史』 (History) 的 H 大寫，讓人懷疑其真誠，因為它實在空洞無物：與馬克思主義不同，語意學無法教授我們實際作法（除非是巴特的小品文），無法讓我們將不同的形式裡，建構還原成複雜的整體」。 (Johnson, 1987: 60)

但最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堅信不渝的是，瞭解社會整體是它最重要的政治企圖。

與此相對，文化研究者不能確定追求社會整體是否具有價值，因為它懷疑這個概念在經驗上是否存在，在理論上是否派得上用場。文化研究寧願集中在文化差異、特定的主體性、在地認同等概念，若是有人說這些類目之間應該連結，它總是小心以待，因為它擔心連結之後，很快就變成了客體化的體系與形式，於是也就湮滅了特別的性質（文化主義論者的知識論，對「特別」的性質，情有獨鍾）。政治經濟學是知道謹慎總有好處。比如，政治經濟學承認女性主義的研究，結論正確：企圖建立系統的階級分析，將使我們比較不能認識到階級之內與跨越各階級類目的強大性別分裂之問題。尋求社會整體，是會帶來一些問題，政治經濟學對此有所認識，但還是認為，社會整體性值得肯定、探求。從事這個探索的風險代價，是可能會變成學究式的系統思考，或是拉克勞 (Laclau, 1977: 12) 稱之為「階級化約主義的柏拉圖式向壁虛構」。但強調差異、主體性與特別，同樣也有風險代價，那就是可能會淪於飄來盪去的個人主義、個人風格、個別事件，他們之間的連結，只能任由機運擺布，若是推至極端，這等於是說歷史純屬隨機（因此歷史也就毫無意義），而政治與意識形態也就沒有必要了 (Wood, 1986)，這已把差異的作用浪漫化，竟至以為差異的存在，就是政治抵抗的保證 (Garnham, 1990) ④。

這樣的觀點也就認為，權力（階級權力）的集中，重要性與意義不是那麼大，雖然證據顯示，現實社會的趨勢，全球階級的分裂在一國之內，在各國之間，正大舉加速惡化。這個觀點又認為，政治抗拒充其量是打理一套合適的符號，對正統來個獨特的觸擊。這類觀點造成的後果之一，是放著眼前的物質分裂，視而不見，最多卻只看到文化的差異。我們現在就來看一段文化研究者對多義 (polysemy) 的分析。在指認了多義這個概念的侷限以後，論者卻仍然說 (During, 1993b: 7)，「再怎麼說，它讓我們有了更為動態的、複雜的理論概

念，這些概念可以幫助我們，讓我們描寫文化產品可能會怎麼樣與新的元件結合，然後在不同情境中，產生不同的效果」。這位論者接著以「混種化」與「協商」來為例，說明不同文化過程如何具體展現在許多廣告影像的運用，如煙草廣告馬爾波羅的模特兒，他的影像可以：

在紐約曼哈頓昂貴的百貨公司裡，成為閃閃發亮、有稜有角的雕像，產生 Jeff Koons 的風格而有了後現代的效果……把他在雜誌封面的照片剪下，可以裝飾拉戈斯（Lagos，譯按：非洲人口最大國家奈及利亞首都）貧民住戶……或者，改頭換面之後，他也可以作為 CD/ 唱片的封面。

269

這段描述儘管正確，但對政治經濟學者來說，卻是離題已遠，因為它知道階級分裂的極端狀況，但似乎不以此極端現象為意，而只是運用其文化的形象，使得曼哈頓的百貨公司遊客與拉戈斯貧民窟的居民，各有特色，並將他們連結在共同的形象社群之內。政治經濟學者所正視的是，更大的社會整體如何將這兩類人連結在權力關係中，以

⑦ 詹明信 (Jameson, 1989: 33) 仍然在文化研究的架構之內著書立說，但他捍衛社會整體性的概念，在文化研究陣營內很不尋常。他幾近致歉的語調，更是突出了他的立場，很不尋常：

任何人都可以注意到，我研究後現代主義的取向，是具有整體觀的後現代。現今我們要提出的有趣問題，並不是我為什麼採取整體觀，而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因為信守整體觀而被視為大逆不道（或發現他們已被視為大逆不道）。在以前，抽象演繹當然是使現象（特別是歷史現象）疏離與去熟悉化 (defamiliarized) 的策略手段之一……

致他們的真實生活，互有不同。文化研究者則認為，只要人們以歧異方式使用文化符號，那麼，這也就是認同政治的成就。文化研究者的說法，說不上不正確，但我們應可論稱，對照天壤之別的權力分裂，致使貧富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為之乖離的情況，他們的說法實在是雞毛蒜皮。

與此觀點對照，政治經濟學堅稱，聚焦於社會整體，具有知識上的（以及與此連結的）政治上的意義。它認為，使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對等或不對等的那些力量，無論是權力、依附、平等或是相互依附，均需加以檢視，政治經濟學認為，這些應該是求知的核心關懷，並為此辯護。政治經濟學也體認，如果我們無法看出各種社會現象或事件的明顯關係（無法展示某種彼此相互作用的形式），這也並不是說彼此欠缺具有意義的連結。誠如社會網路的分析所展示，人與人的連結關係通常非常複雜，其中有些個人與團體之間，雖然具有強大的連結關係，但這些關係並不是直接「連到」彼此身上，而是「透過」他人而產生（Burt, 1992）。

政治經濟學又論稱，就政治意義而言，我們亦需將分析聚焦於社會整體。雖然不同的政治經濟學者對於資本主義的結構、過程與後果，如何加以理論化，見解不盡相同，但他們大致都同意我們必須將資本主義當作一個社會形構來分析，這個社會整體的各部分形成了動態的，但仍可辨認的關係。政治經濟學對如何確定社會關係、支配、霸權與抵抗的特徵，確實仍有歧見，但他們大抵同意我們必須直接注意的是，這些關係的社會或集體性質，亦需注意這些關係有哪些類型。擊舉這些立場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們具體展現了政治抗爭的本質，政治經濟學者向來視此抗爭與其論述密不可分，作為知識分子，他們信守瞭解資本主義而後轉換資本主義的必要，他們也同等信守瞭解社會關係而後推進社會關係之解放的必要。在政治經濟學看來，這就必須批判地檢視社會整體，如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情勢，也必須批判地檢視階級、性別與種族的社會關係。在政治經濟學來看，最主要

的運動是走向統一與社會整體，差異與特別的屬性，必須放在整體的架構內考察。來自文化研究陣營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則指出，這個取向有其缺陷，它過度以為資本主義與階級力量的統一性，因此也就使得社會關係與文化之中的重要差異，沈陷無法浮現。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與這個批判，標誌了二者取向之間，一個較為重要的邊界。

270

總結地說，政治經濟學者與其他批判者集中在三個主要論點，以此回應文化研究中的極端取向者。第一，文化研究的認識論立場，從實存主義轉移到了名目主義，這也就是說，它認為在文本以外，再也沒有可知的行動可言，它的研究觀點，也從提出可資檢證的行動陳述，移轉到只是介入持續不斷的對話，而政治經濟學認為，這個檢證過程必須連結於社會實踐，因此也就對文化研究者的移轉，展開批判。

第二，批判者認為，這種相對主義者的知識取向，勢將在另一個層次，升高成為政治相對主義，於是也就不再信守政治是一個目標確定的社會鴻圖，不再使研究的動力與此鴻圖連結，而只幾乎全部將政治當成是為了個人認同而作的抗爭。文化研究既然具有自滿的屬性，既然失去了對更大範圍之政治鴻圖的關切，則它也就助長聲勢，使知識與外隔離，這樣一來，它所重視的「對話」，也就披上了學院的衣裝，我們從其著作的語言，僅能在少數人（也就是對話所及的小圈圈）之間流通，當可察覺這是事實。對此批判的人，如琶馬 (Palmer, 1990) 就質疑這是「墜入了論述」，而史蕾特 (Slater, 1987) 則質疑說，這是「使用價值衝進了符號的領土」，以前的共識，堅持好的研究要能夠讓更大的社會社群分享，如今這個想法幾乎全部消失了¹²。政治經濟學家在內的批判者呼籲文化研究者追本溯源：文化屬於大眾，文化應該反映社會行動者的需要與熱望，包括政治上的需要與渴望。

結論：

重返階級強權

這本書以階級強權收尾，應屬允當，因為針對階級強權的分析，歷來都在政治經濟學之中，占據了核心地位，同時它也標誌了重要的邊界，分隔了政治經濟學、文化結構與政策研究。本書努力地重新思考與更新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主要是經由批判地評估本質主義與階級強權等概念（這些早就是社會理論的核心辯論題旨），拓寬本學科的認識論的、目的論的與實質論點的範疇。筆者因此提議我們從以下三個面向，建構傳播政治經濟學：

1. 起自實存論的、兼容並蓄的（也就是非本質主義）與批判的認識論；

2. 採取的目的論立場，要能體認社會過程與社會變遷的普遍存在；

271

3. 開拓的實質觀點，要從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等過程作為起點。

在政治經濟學的架構之內，這些是社會行動的同等元素。社會階級是檢視結構化過程的起點。儘管傳播政治經濟學並不採取本質主義的觀點（若是如此，則所有其他要件均將被化約至階級），但階級強權依然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要件。

由於篤信方法論及實質的個人主義，也由於擊舉政策研究的人，

—————

①文化研究企圖創造一個自主的領域，史蕾特(Slater, 1987: 478-479)甚不以為然，她說：

我們說這是商品美學的自主，也就是使用價值衝進了符號的領土，實在並沒有什麼神祕兮兮的：市場關係的工具邏輯，抓住了使用價值。

普遍揚揚自得於資本主義，他們對於社會階級也就少有評述。然而，社會階級及階級強權的分析，並非一直未得到文化研究的青睞。其實，早期這個領域的著作，包括侯苟 (Hoggart, 1957)、威廉士 (Williams, 1958)、湯普森 (Thompson, 1963)、霍爾與傑佛森 (Hall and Jefferson, 1976)，以及衛理斯 (Willis, 1977) 等人，都信守於階級分析，他們的執著讓杜凌 (During, 1993b: 1-2) 有以下結論：「早期的文化研究，目睹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並不是每個人人生來都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機會，並不是每個人人生來就得到相同的經濟收入與醫療保健。然而，他們並不因此退縮。」但過了這些年來，（特別是美國的）文化研究卻從階級退了下來，並且也不再從總體關照面，探討物質不平等與社會權力的關係 (Budd et al., 1990; Evans, 1990; Teltzloff, 1991)。造成這個轉變的原因，不難理解，其中之一是要擴充階級分析，使之包括性別、種族、氏族的分裂；他們要解釋何以明顯有相當比例的勞工階級，支持保守政治，或至少在面對生活水準下降時，何以勞工階級還是無動於衷；最後則是社會運動的興起，穿越了階級的分際，亦有待解釋。但除了注意範圍擴大，因此可說相當可取之外，另一方面的轉移卻是與外隔絕的情況日漸嚴重，等於是完全撤退而收縮至文本，文本變成不假外求的整體，自己就可解釋自己，很少或無須參酌經濟、政治或社會的實務，或者，在極端的文本論者身上，根本就連文化實務也無須參酌。這樣的取向造成了一個比較嚴重的後果，就是幾乎所有對於工作的興趣，以及對傳播勞動過程的興趣，消失得一乾二淨。關於閱聽人是否真正「生產」文本，引發了廣泛的辯論，但關於工作本身的物質或形象屬性，卻幾乎無人聞問¹⁰。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這幅景象讓人困惑，也讓人擔心。我們是需要重新思考階級分析的意義及重要性，但若說要跟階級分析說再見，那就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何況當前世局正是貧富差距加速擴大的年代¹¹。

無論政治經濟學與它的邊界學科再有什麼分裂，研究過程應該拉

譯

附

錄

補記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文獻

在本書翻譯接近尾聲的階段，多位學院人士發起了全國性質的「文化研究」學會，並在相當程度內，得到國科會的支持。相應於英語世界當中，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取向的擯抗，臺灣的這兩股論述力量，還在新興階段，其學術知識的生產，積累仍有限，彼此對話的機會與規模並不多，遑論衝突論點的出現。在此際遇中，作者以傳播政治經濟學人的立場，在本書第七章裡，展開與文化研究者的交談，格外值得我們借鏡：是否從英語學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省卻無謂的爭辯，將力氣放在生產質量均佳的文化研究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作品，或者，兼有二者之長的作品？再退一步，參酌英語人士的經驗，至少是否能夠讓我們在辯詰時，更為直接地指向爭議點，澄清相關知識的重點，協助我們以在地的研究成果，回饋英語世界的論述？

過去二十年來，如同作者所說，文化研究者與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已有多次「過招」，以下是譯者對作者的補充。

一九七七年，英語世界最早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教學及研究的 Smythe^①，指控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探討媒體傳播現象時，有個盲點。他所說的西方馬克思者，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日後我們稱之為「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評則是說，這些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卻研究媒體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而沒有從媒體為資本服務的經濟角色切入，辜負了彰顯馬克思主義特點的機會。次年，Murdock 與 Golding 發表的論文 (Murdock, 1978; Golding and Murdock, 1979)，回應此一指控，他們說，雖然以政治經濟論者自居，但認為 Symthe 的分析，完全抹煞文化研究者（如 Raymond Williams）的價值與貢獻，不僅不明智，並且也不正確，他們對於威廉士、霍爾 (Stuart Hall)^② 等文化研究者的微詞，在於後者在實際分析時，沒有能夠遵照其在理論上的允諾，也就是產權、經濟分析

ORGO ORGO ORGO ORGO ORGO ORGO ORGO ORGO ORGO

① Smythe 的學術及公共生活，參見《當代》月刊，一九九五年，10月，頁12至17。

的必要與優先（另見後文）。

相對於 Murdock and Golding 這個批評，Hill (1979: 113-4) 亦說，梅鐸與高丁不也一樣？他們自己固然首肯其價值，但又什麼時候曾從概念上或經驗分析上，展示經濟動力與媒體再現／文本／想像之間的聯繫？他們亦只口惠實不至，忽略了後者本身的動力與運作過程。Connell (1980, 1983) 更批評，梅鐸、高丁、崗恩 (Nicholas Garnham) 等人過度注重（廣電）媒體產權的抗爭，忽略了在強力規範下，英國私人所有的廣電機構之表現，亦可圈可點，也沒有能夠注意到真正閱聽人何以偏好某種節目，而在策略上，這類批評也將使左派的行動，乃至於論述空間繼續萎縮，他以左翼文化研究者的立場說，「最值得正視的策略目標，首先並不是關於產權與控制的鬥爭，而是關於所謂廣電從業人員之『獨立』與『無私不偏倚』的鬥爭，是關於廣電從業人員之去除專業化 (de-professionalisation) 的鬥爭」。進入一九九〇年代，政治經濟論者柯蘭 (James Curran) 與崗恩先後 (1990 與 1993) 在美國為主的國際傳播協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的都柏林與華盛頓年會，抨擊文化研究者並大聲疾呼政治經濟學取向之重要。有鑑於此，美國傳播學界重要期刊《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就此延續了雙方的對話，相關論文刊登於一九九五年的第一期。該專輯主要論文由崗恩撰寫，然後分別由文化研究者格拉斯堡 (Lary Grossberg) 與卡瑞 (James Carey) 以文化研究論者的立場，以及梅鐸以傳播政經論者的主場，回應崗恩的論點。該專輯最後再由崗恩回應格拉斯堡與卡瑞。以下是譯者對這五篇文章的摘要、重組與解讀。

崗恩一開始就連續引用三位文化研究者的著作，指出他們都誤認了政治經濟論，都將政治經濟論等同於經濟化約決定論（下層基礎、

經濟決定了上層基礎、文化政治等），因為，雖然政治經濟論者在分析時，仍然認定決定論的分析必須堅持，但並不、也從不主張二者之間存在著簡單的直線對應關係。

接著，他認定英國 Williams/Hoggart/Thompson 等文化研究的先鋒，在從事其研究與著述時，都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意圖，也就是要透過對於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強化勞動階級的信心，使其能夠對抗優勢、統治階級的支配文化，再來就是先鋒的文化研究者，與法蘭克福學派與葛蘭西所想要探索者，亦屬一致，都是在於討論勞工階級在受支配、被束縛的背景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解放自己命運的革命意識。簡單而言，早期的文化研究也是努力於找出，究竟是在哪些機制下，致使受支配階級瀰漫於某種意識形態、「虛假意識」，致而不能被動員來支持解放的志業，這裡的虛假意識，不在指責或以精英立場指導大眾，而是在於明確指出受支配階級人數遠多於支配者，卻不能以行動支持解放、推翻資本文明的事實。就此而言，崗恩認定他們的文化研究與他所談的政治經濟論，可以相通，都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支配為終極目標。

崗恩緊接著指出，前述意義之下的「虛假意識」事關重要，但由於引用這個概念會被指摘是精英、是歷史已經證實的先鋒革命政黨之獨裁、是對於大眾的輕視、是不民主、是政治不正確，因此現今許多文化研究者在罪惡感的作祟下，已經放棄、不敢談這個概念。但是，崗恩認定，「唯有這個概念才能使知識分子得到適才適所的角色 (a valid role)」。第一是因為有機知識分子在此前提下，才能說是站在一個必要而有正當性的分工位置，從事著從受支配階級紛亂分裂的經驗中，打造階級意識的工作。第二是因為知識分子就此提供了支配結構及抗爭地形的地圖，從中才能提煉政治策略，「受支配階級體認虛假意識存在的瞬間，也就是自己力量可以成長 (empowerment) 的基礎」，「拒絕承認虛假意識的存在可能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分子地位罪惡感及對精英論的畏懼，使得文化研究在教育體系的（譯按：

解放) 角色，為之受挫」。因此，堅持「真實」(truth) 的存在也就必須，崗恩說，階級、種族與性別的支配現象，雖然都嚴重，但他堅持階級的支配應該得到優先的重視。

對於崗恩的說法，格拉斯堡指出，前者任意選擇批評對象，他不瞭解，甚至是故意忽略文化研究的異質程度，文化研究的較好作品，對於「接合」(articulation) 的問題特別重視，也就是已致力於研究生產、消費、政治與意識形態之間如何扣連等等。大部分文化研究的著作並沒有將愉悅、爽(pleasure) 等同於抵抗，也沒有說愉悅就等於政治上的進步，而是體認了愉悅是會被利用；至少，文化研究者展示了愉悅與現存的不平等結構及權力的不等壓迫形式有關。崗恩的政治經濟學太過於機械化，他不能理解矛盾與接合的關係是非常的複雜，而這一點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立場，文化研究者絕對不認為所有權力形式都可以用資本主義的關係或經濟標準來解釋，雖然文化研究者從來也不否認經濟資源與關係以率先決定的方式，塑造了文化行為、現象的延展空間，但政治經濟論者卻認定每個時候、每個例子，經濟力都在決定，實屬無稽。崗恩只是將資本主義的存在狀況，做一描述，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解釋，這只是馬克思所說的「三尺童子都知道」的事。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論的關係是怎麼樣，並不是關鍵，重要的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如何接合於文化政治的分析，就此來說，文化研究從來也沒有拒絕政治經濟論，只是拒絕某種政治經濟論。

文化研究是左派，政治經濟論者是左派，彼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重點，但左派的陣營需要弄清楚誰是敵方，而不是將對方扣上與右派共舞的帽子。

卡瑞則認為，崗恩等認為文化研究太過於民粹，實在是弄錯了，事實上，文化研究者與政治經濟論者都離開一般民眾太遠，雙方都是以自己所熟悉的術語、利益、技巧與特定的目標在從事分析，兩者都已經進入了越來越學術化的路線。作為對抗形式主義及經濟化約主義，文化研究的真正優勢，應該正是在於它的種族中心論述(ethno-

centricism) ，馬克思主義若是不能自我調整，不能嫻熟地方情境，那就大錯特錯。卡瑞說，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研究必然要能掌握當地的宗教、家庭、美學、政治等等知識。這麼說一點與理論的建構沒有什麼關係，卡瑞說，文化研究不是什麼打倒資本主義的先鋒部隊，它只是一種企圖，想要與我們稱之為「勞工階級」或「一般民眾」的人，展開對話或與其經驗有所交接，而這些一般人所能懂的當地語言，當然也只能是英語、法語、美語、西班牙語或韓語等等。

民主起源於一般人的對話，源起於一般人對自己經驗不同於政治人物或知識分子加諸其身上的說法，有了領悟，並起而反抗。現在的問題是當代的政治體系容不得公民彼此對話，而知識分子的體系也不提供空間讓此對話開展，因此，文化研究就是要在媒體之外，更新民主對話，並從大學開始更新起，然後逐漸向外開展以構成一個更為廣大的市民論述。

梅鐸的立場與崗恩同，但論述用語較溫和。他先引威廉士對文化研究建制化過程的憂心。威廉士一方面表示，文化研究拓展了討論的空間與資源，但他也擔心文化研究「忘記了真正的意圖 (project) 」。梅鐸又提醒文化研究者，指威廉士曾說研究任何文本、作品時，「首先應該注意這些成品的（生產）條件」、「所有的基本運作都來自統合資本主義產權的核心要素」；何況霍爾自己也指出，「意識形態的環境如何被結構」的「必要起點是產權與控制的結構」。接著，梅鐸再次強調，文化研究者畢竟沒有將此認知或承諾付諸實際的分析。為什麼如此呢？梅鐸提出的局部解釋：(1)學術分工之使然，也就是除少數例外，文化研究出於文學、文化人類學、藝術等科系。梅鐸接著說，有些文化研究者（如 John Fisk）明確說，這個分工所造成的方法論及理論架構之差別，實屬必然而不必更動，但梅鐸則認為，這不妥當，因為文化研究的原始企圖之一，正是打破學科的分野；(2)文化研究起飛時期，剛好是經濟與社會政策為新自由主義支配的時期，左派在政治上的挫敗，在社會等政策上無所發言機會，於是轉向而開展

了微觀政治的分析、抵抗，這原本不全是負面的發展。

最後，梅鐸說，批判的政治經濟論者的人甚多，不必將其套入「學派」、「典範」或「陣營」，我們只需注意這些人有其共同出發點，它們是：

1. 若是要瞭解當代文化，我們必須先認知製造意義的核心地帶（媒體與教育），已經越來越捲進了、臣服於資本主義企業、私產權、商品化的結構與邏輯；

2.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是充分瞭解文化生產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的；

3. 堅定地闡述、發覺生產組織與消費實況的關聯；文化研究者的方誌學研究，太多僅止於描述而無解釋；

4. 分析的優先性仍然必須堅持，逛街購物固然可以是愉悅，但在就此研究時，反而無視於商店外的無住屋者於其走廊打地舖、無視於無錢無暇購物者，很難讓人理解；

5. 許多文化研究只集中在消費文化分析，將公民權的問題推到了邊緣，但在政治哲學等辯論，公民權問題卻已移至核心。

崗恩對於格拉斯堡與卡瑞的答覆如下。

各種差異的接合分析是重要，但若分析的目標，在於增進推翻支配的結構之可能，那麼，並不是所有的接合均具有同等值得優先分析之地位。經濟與階級不是描述所有權力結構的充分變數，但它們持續是解釋種族、性別等權力結構的核心因素，而文化研究者及認同政治研究者對此認知不足。政治經濟學不僅只是描述薪資勞動與商品交換，而是研究這些情況對於文化政治的後果，這個情況也許「三尺童子皆知」，惟可惜的是，文化研究者卻不是那麼清楚。

卡瑞的民粹主義之立場「不僅站不住腳，而且政治上很危險」，卡瑞曾重引威廉士，但威廉士自己對「一般人（勞工階級）的經驗」

之揚舉是有問題的，因為一般人經驗的品質如何能夠捍衛與提昇，與政治經濟分析所要面對的問題，不能分開。英國勞工階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品質遭受挑戰、低抑，更多來自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重新結構，不必只將箭頭指向工黨或費邊社。霍爾對柴契爾主義的分析也大有問題。性別、種族政治在英國選舉政治是議題，但稅制、就業與全民醫療保健等問題卻無可免地更是重要課題。

在美國刊物展現的這場「辯論」，論及了若干實質問題（如虛假意識與知識分子等），稍早由莫力（Morley, 1992a）回應柯蘭（Curran, 1990）的文章，以及柯蘭（Curran, 1992）與莫力（Morley, 1992b）的再交換意見，則大致只是「形式」上的交鋒，他們都認為對方沒有讀清楚傳播研究的文獻，或者，對方誤讀了文化研究或政治經濟論的文獻。莫力認為英國的政治經濟論者，根本就是受到英國文化研究論者的挑戰，才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轉稱意義、文化等課題對政治經濟論者很重要，但政治經濟論者卻說自己「向來」就很重視這些課題，未免不實，莫力說，「這些基本教義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論者……少扯淡了」。莫力的指控能夠成立嗎？也許讀者當中，會有人想將所有的文獻都窮盡地閱讀，加以印證或否證？

ORLO ORLO ORLO ORLO ORLO ORLO ORLO ORLO ORLO

譯附錄參考資料：

Connell, Ian

198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oadcasting: some questions', Screen Education (37: 89-100).

1983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and the British left', Screen, 24 (6: 70-80)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5 No.1: 60-100, a debate/exchange of views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cultural studies.

Curran, James, David Morley and Valerie Walkerdine (eds)

1996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also in James Curran et. al. (1996), pp. 256-78.

1992 'Media dialogue: a reply', in James Curran et.al. (1996), pp. 294-99.

Golding, Peter and Murdock, Graham

1979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in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edited by Michele Barrett et al., 中譯收於《資訊、錢、權》(1992: 223-254)，馮建三，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Hill, John

1979 'Ideology, economy and the British cinema', in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edited by Michele Barrett, Philip Corrigan, Annette Kuhn and Janet Wolff, London: Croom Helm, pp. 112-34.

Morley, David

1992a 'Populism, revisionism and the "new" audience research', in James Curran et. al. (1996), pp. 279-93.

1992b 'Media dialogue: reading the readings of the readings...', in James Curran et. al. (1996), pp. 300-05. (在收為本書文章時，只在參考文獻中加入了文化研究論者 Stuart Hall 及 Nicholas Garnham 各一篇文章，內文本身沒有任何變動任何字)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 (2: 109-119) 中譯見《島嶼邊緣》第4期。

Smythe, W.D.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28), 中譯見《島嶼邊緣》第4期。



參考書目

- Abler, Ron, Adam, John S., and Gould, Peter (1971) *Spatial Orga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Adorno, Theodor W. and Horkheimer, Max (1979)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by John Cumming, London: Verso (orig. 1944).
-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hmad, Aijiz (1992)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 Akhavan-Majid, Roya and Wolf, Gary (1991) 'American Mass Media and the Myth of Libertarianism: Toward an "Elite Power Group" The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2, pp. 139–151.
- Aksoy, Asu, and Robins, Kevin (1992) 'Hollywood for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ritical Mass in Image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6, No.1, pp. 1–22.
- Alt, James E. and Shepsle, Kenneth A. (eds) (1990)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tman, Karen E. (1989) 'Television as Gendered Technology: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Set,'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Vol. 17 (Summer), No. 2, pp. 46–56.
-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8) *Less Access to Less Information by and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A 1981–1987 Chronology*. Washington, DC: ALA.
- Amin, Samir (1976)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ott, Theresa and Matthaeci, Julie (1991) *Race, Gender and Work: A Mult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 Amsden, Alice (1992) 'Otiose Economics,' *Social Research*, Vol. 59 (Winter), No. 4, pp. 781–797.
- Anderson, Gary, M. (1988) 'Mr. Smith and the Preachers: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5, pp. 1066–1088.
- Andrews, Edmund L. (1994) 'AT&T Will Cut 15,000 Jobs to Reduce Cos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pp. D1, D14.
- Ang, Ien (1990)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owards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Media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 pp. 239–260.
- Ang, Ien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 Ansberry, Clare (1993) 'Hired Out: Workers are Forced to Take More Jobs with Fewer Benefit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1, pp. A1, A9.
- Aronowitz, Stanley (1992)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Class, Cul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 Attali, Jacques (1985)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twood, Rita and McAnany, Emile G. (eds) (1986) *Communic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Socie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Aufderheide, Patricia (1987) 'Universal Service: Telephone Polic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 (Winter), No. 1, pp. 1, 81–96.
- Aufderheide, Patricia (1991) 'Public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2, pp. 168–183.
- Aufderheide, Patricia (1992) 'Cable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2 (Winter), No. 1, pp. 52–65.
- Aufderheide, Patricia (1994) 'The Media Monopolies Muscle In: Bell Atlantic–T.C.I. Merger,' *The Nation*, January 3/10, pp. 1, 18–21.
- Babe, Robert E. (1990) *Telecommunications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abe, Robert E. (1994) (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 Bagdikian, Ben H. (1992) *The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Press (4th rev. edn).
- Bakhtin, Mikhail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lka, Ellen (1991) 'Womentalk Goes On-line: The Use of Computer Networks in the Context of Feminist Social Chan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 Baran, Paul A.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an, Paul A. and Sweezy, Paul M. (1965) 'Economics of Two Worlds,' in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etrics*. Oxford: Pergamon, pp. 15–29.
- Baran, Paul A. and Sweezy, Paul M.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low, William (1989) *'Looking up at Down': The Emergence of Blues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arrett, Michèle and McIntosh, Mary (1980) 'The Family Wage,' *Capital and Class*, No. 11 (Summer), pp. 51–72.
- Bartlett, Donald L. and Steele, James B. (1992) *America: What Went Wrong?* Kansas City: Andrews and McMeel.
- 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by Mark Poster. St Louis: Telos Press.
-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by Charles Levin. St Louis: Telos Press.
- Bauman, Zygmunt (1989)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Polity.
- Becker, Gary S. (1975) *Human Capital*.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ecker, Jörg (1988) 'Electronic Homework in West Germany,'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8), pp. 247–273.
- Becker, Jörg (ed.) (1989) *Telefonieren*. Marburg: Jonas.
- Becker, Jörg (1990) *Fern-sprechen*. Stuttgart: Institute for Cultural Exchange.
- Becker, Jörg, Hedebro, Goran, and Paldan, Leena (eds) (1986) *Communication and Domination: Essays to Honor Herbert I. Schiller*. Norwood, NJ: Ablex.
- Bekken, Jon (1990) '“This Paper is Owned by Many Thousands of Working Men and Women”: Contradictions of a Socialist Dail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oston, August.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ll, Daniel (1981) 'Models and Reality in Economic Discourse,' in 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eds)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46–80.
- Bello, Walden and Rosenfeld, Stephanie (1992) *Dragons in Distress: Asia's Miracle Economies in Crisis*. New York: Penguin.
- Beltrán, Luis R. (1976) 'Alien Premises, Objects, and Methods in Lati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 No. 2, pp. 107–134.
- Beltrán, Luis R. and Fox de Cardona, Elizabeth (1980) *Comunicación Dominada: Estados Unidos en los Medios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 Estudios Transnacionales/Nueva Imagen.
- Beniger, James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ntham, Jeremy (1890) *Utilitarianism*. London.
- Benton, Ted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No. 178 (Nov/Dec), pp. 51–86.
- Berberoglu, Berch (ed.) (1993) *The Labor Process and Control of Labo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Relation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 Berland, Jody (1992) 'Angels Dancing: 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Grossberg et al. (1992), pp. 38–55.
- Berman, Marshall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Penguin (orig. 1982).
- Bernstein, Richard (1989) 'Social Theory as Critique,' in David Held and John B.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33.
- Bettig, Ronald V. (1992)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Copyright,'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9 (June), No. 2, pp. 131–155.
-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umler, Jay G. and Nossiter, T.J. (eds) (1991) *Broadcasting Finance in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Hand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afo, S.T. Kwame (1991)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103–124.
- Boafo, S.T. Kwame and George, Nancy (eds) (1992)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Afric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Nairobi: African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Bohm, David and Hiley, B.J. (1993)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Bowles, Samuel and Gintis, Herbert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wles, Samuel, Gordon, David M., and Weisskopf, Thomas E. (1990) *After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Armonk, NY: M.E. Sharpe.
- Boyer, Robert (1986)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 Braman, Sandra (1989) 'Defining Information: An Approach for Policymaker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September), pp. 233–242.
- Braudel, Fernand (1975)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 by Miria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rennan, Geoffrey and Buchanan, James M. (1985)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an, Timothy J. (1992) 'Integrat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into Media Policy: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August), pp. 460–474.
- Bruck, Peter (1992) 'Discursive Movements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Active Negotiation of Constraints,'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138–158.

- Brunn, Stanley D. and Leinbach, Thomas R. (eds) (1991) *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London: HarperCollins Academic.
- Buchanan, James (1986)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Brighton: Wheatsheaf.
- Buchanan, James and Tollison, Robert D. (eds) (1984)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 II*.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dd, Mike, Entman, Robert M., and Steinman, Clay (1990)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U.S.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2, pp. 169–184.
- Buhle, Paul (ed.) (1987) *Popular Culture i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gess, Jacquelin (1990)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vironmental Meanings in the Mass Media: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1990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15, pp. 139–161.
- Burke, Edmund (191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orig. 1790).
- Burke, Kenneth (1969a)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 1945).
- Burke, Kenneth (1969b)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 1950).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siness Week* (1994)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June 6, p. 26.
- Buxton, William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e "Radio Wars" and the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in Babe (ed.) (1994), pp. 147–175.
- Calabrese, Andrew and Jung, D. (1992) 'Broadb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Rural America: An Analysis of Emerging Infrastructur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16 (April), No. 3, pp. 225–236.
-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1993) *Selected Income Statistics*. Ottawa: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ada, (1991 Census of Canada), Catalogue # 93–331.
- Cardoso, F. H. (1993) 'Communication for a New World,' in José Marques de Melo (ed.) *Communication for a New World: Brazilian Perspectives*. São Paul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pp. 9–19.
- Cardoso, F.H.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ey, James W. (1979)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American View,' in Curran et al. (eds) (1979), pp. 409–425.
- Carey, James W. (1994) '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s,' in Babe (ed.) (1994), pp. 321–336.
- Carlyle, Thomas (1984) *A Carlyle Reader*. Ed. by G.B. Tenny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ragee, Kevin M. (1990) 'Interpretive Media Study and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2, pp. 81–96.
- 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and Henderson, Jeffrey (1987) 'Techno-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Jeffrey Henderson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Sage.

- CCCS Women's Studies Group (1978) *Women Take Issue*. London: Hutchinson.
-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84) 'Backgrou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e,' Planning 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91) 'Research Programme,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Publications,' March.
- Cesareo, Giovanni (1992) 'Privacy and Secrecy: Social Control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87–97.
- Chaffee, Steven H., Gomez-Palacio, Carlos, and Rogers, Everett M. (1990)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 Views from Here and There,'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67 (Winter), No. 4, pp. 1015–1024.
-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1994) *Harper's Magazine*, April, p. 17.
- Chandler, Alfred 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pman, Keith and Walker, David (1987) *Industrial Location*. Oxford: Blackwell.
- Chase-Dunn, Christopher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 Christopherson, Susan and Storper, Michael (1989) 'The Effects of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on Industrial Politics and the Labour Market: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 42, No. 3, pp. 331–347.
- Clark, Barry (1990)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Praeger.
- Clement, Andrew (1990) 'Computers and Organizations,' in Jacques Berleur, Andrew Clement, Richard Sizer, and Diane Whitehouse (ed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volving Landscapes*.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pp. 305–326.
- Clement, Andrew (1992) 'Electronic Workplace Surveillance: Sweatshops and Fishbowls,'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7 (December), No. 4, pp. 18–45.
- Clement, Wallace (1975) *The Canadian Corporate Elite: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Power*.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 Clement, Wallace (1977) *Continental Corporate Power: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 Clement, Wallace and Williams, Glen (1989) 'Introduction,' in Wallace Clement and Glen Williams (eds) *The New Canadian Political Economy*.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p. 3–15.
- Coase, Ronald H. (1991)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G.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G.A. (1991) 'The Future of a Disillusion,' *New Left Review*, No. 190, (Nov./Dec.), pp. 5–20.
- Coletti, Lucio (1979) *Marxism and Hegel*. Trans. by Lawrence Garn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orig. 1973).
- 'Colloquy' (1995)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2, No. 1, pp. 60–100.
- Comor, Edward A. (ed.) (1994)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Hegemony, 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ompaine, Benjamin M. (1986) 'Information Gaps: Myth or Realit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arch), pp. 5–12.
- Compaine, Benjamin M. et al. (1982) *Who Owns the Media?: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White Plains, NY: Knowledge Industry Publications (2nd rev. edn).
- Connell, Rob (1987) *Power and Gen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Kent (1942) *Barriers Down*. New York: Farrar.
- Costello, Nicholas, Michie, Jonathan, and Milne, Seumas (1989) *Beyond the Casino Economy*. London: Verso.

- Coulter, Bernard G. (1992)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rl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 Cox, Meg (1993) "'Madison County" Author Crosses Bridge to Music,'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6, p. B1.
- Cox, Meg (1994) 'Paramount Unit to Cut Number of Books Published Under the Macmillan Impri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4, p. B5.
- Crandall, Robert W. (1991) *After the Breakup: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 a More Competitive Er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rawford, Margaret (1992) 'The World in a Shopping Mall,' in Sorkin (ed.) (1992), pp. 3-30.
- Creedon, Pamela J. (ed.) (1993) *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2nd edn).
- Curran, James (1979)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Curran et al. (1979), pp. 195-230.
-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 pp. 135-164.
- Curran, James (1991)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4th edn).
- Curran, James and Gurevitch, Michael (1991) 'Introduction,'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7-11.
- Curran, James, Gurevitch, Michael, and Woollacott, Janet (eds) (1979)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Sage.
- Dahl, Robert A. (1982)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hlgren, Peter and Sparks, Colin (eds)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anielian, N.R. (1939) *The AT&T*. New York: Vanguard.
- Dates, Jannette L. and Barlow, William (eds) (1993) *Split Image: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Mass Media*.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 Davies, Paul (1993) 'The Holy Grail of Physic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7, pp. 11-12.
- Davis, John (1992) *Exchan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avis, Mike (1990) *City of Quartz*. New York: Verso.
- Davis, Susan, G. (1986) *Parades and Power: Street Thea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de Haven-Smith, Lance (1988) *Philosophical Critiques of Policy Analysis: Lindblom, Habermas, and the Great Societ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 de la Haye, Yves (ed.) (1980) *Marx and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De Witt, Karen (1993) 'The Nation's Library, for a Fee and a Mode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p. E16.
- Demsetz, Harold and Lehn, Kenneth (1985)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No. 6, pp. 1155-1177.
- Denious, Robert D. (1986) 'The Subsidy Myth: Who Pays for the Local Loop?'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September), pp. 259-267.
- Derthick, Martha and Quirk, Paul J. (1985)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Dervin, Brenda (1987)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to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Autumn), No. 4, pp. 107-120.
- DeSimone, Mark (1992) 'Information is Value,'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3, p. B8.
- Domhoff, G. William (1978) *The Powers That Be: Processes of Ruling Class Domin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 Domhoff, G. William (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 How Policy is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A. de Gruyter.
- Dorfman, Ariel and Mattelart, Armand (1975)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London: International General.
- Dos Santo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pp. 231–236.
- Douglas, Sarah (1986) *Labor's New Voice: Unions and the Mass Media*. Norwood, NJ: Ablex.
- Douglas, Susan J. (1987)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1899–192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wning, John D.H. (1984) *Radical Medi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Downing, John D.H. (1988) '“The Cosby Show” and American Racial Discourse,' in Geneva Smitherman-Donaldson and Teun A. van Dijk (eds),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46–73.
- Downing, John D.H.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Television,' *Monthly Review*, Vol. 42 (May), No. 1, pp. 30–41.
- Dreier, Peter (1982)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s in the US Power Structure,' *Social Problems*, Vol. 29, No. 3, pp. 293–310.
- Drohan, Madelaine (1993) 'BBC Broadcasts Take Reality Out of the Studio,'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21, p. B17.
- DuBoff, Richard (1984) 'The Rise of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The Telegraph Industry, 1844–1880,'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4, No. 3, pp. 52–66.
- DuBoff, Richard (1989) *Accumulation and Pow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 Dun's Marketing Services (1991) *Million Dollar Directory*. Parsippany, NJ: Dun and Bradstreet.
- During, Simon (ed.) (1993a)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During, Simon (1993b) 'Introduction,' in During (ed.) (1993a), pp. 1–25.
- Dyson, Kenneth and Humphreys, Peter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Dimensions*. London: Routledge.
- Eatwell, John, Milgate, Murray, and Newman, Peter (1987)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Ehrbar, Al (1993) 'Price of Progress: “Re-Engineering” Gives Firms New Efficiency, Workers the Pink Sli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6, pp. A1, A11.
- Eisenstein, Elizabeth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liott, Philip and Golding, Peter (197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Paper given to the 1972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Elster, Joh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Trans.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Engels, Friedrich (197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orig. 1889).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74)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Etzioni, Amitai (1988)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Evans, William A. (1990)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 Innovation, Iteration, or Illu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2, pp. 147–168.
-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 Ewen, Stuart (1988) *All Consuming Imag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Fadul, Anamaria and Straubhaar, Joseph (1991)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nformatics in Brazil: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214–233.
- Fanon, Frantz (1965) *A Study in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orig. 1959).
- Featherstone, Mike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Fejes, Fred (1981) 'Media Imperialism: An Assess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 pp. 281–289.
- Ferguson, Marjorie (1992) 'The Mythology About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7, pp. 69–93.
- Feyerabend, Paul K. (1988)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rev. edn).
- Fishman, Mark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iske, John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 Flichy, Patrice (1991) *Une histoire de la communication moderne: Espace public et vie privée*. Paris: La Découverte.
- Foster, John Bellamy (1988) 'The Fetish of Fordism,' *Monthly Review*, Vol. 39 (March), pp. 14–20.
- Foucault, Michel (1982) *Power/Knowledge*. Trans.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 Fox, Elizabeth (ed.) (1988) *Media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Newbury Park, CA: Sage.
- Fraser, Nancy (1993)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Robbins (ed.) (1993), pp. 1–32.
- Freeman, Christopher (1984) *Long Wave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Frances Pinter.
- Freire, Paulo (1974)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Friedman, Benjamin M. (1988) *Day of Recko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Reagan and Af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riesen, Valerie (1992) 'Trapped in Electronic Cag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pp. 31–49.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4th rev. edn).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87)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92)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allagher, Margaret (1980) *Unequal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Women and the Media*. Paris: UNESCO.
- Gallagher, Margaret (1984) *Employment and Positive Action for Women in the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of the EEC Member States*. Brussels: Commission for European Communities.
- Gallagher, Margaret (1985) *Unequal Opportunities: Update*. Paris: UNESCO.
- Gallagher, Margaret (1992) 'Women and Men in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special issue, Vol. 12, No. 1, pp. 1–36.
- Gandy, Oscar, H. Jr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 Critical Challeng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Summer), pp. 23–42.
- Gandy, Oscar H. Jr (1993) *The Panoptic So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ans, Herbert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 123–146.

- Garnham, Nicholas (1981) 'Subjectivity, Ideology, Clas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reen*, Vol. 20, No. 1, pp. 121-133.
- Garnham, Nicholas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olding et al. (eds) (1986), pp. 37-52.
- Garnham, Nicholas (1988) 'In Appreciation: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A Cultural Analyst, A Distinctive Trad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8 (Autumn), No. 4, pp. 123-131.
-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 Gates, Henry Louis, Jr (1989) 'Whose Canon Is It, Anywa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26, pp. 1, 44-45.
- Giddens, Anthony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and Held, David (eds) (1982)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l, Stephen and Law, David (1988)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1966) *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orig. 1889).
- Gilpin, Alan (1977) *Dictionary of Economic Terms*. London: Butterworth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tlin, Todd (1979)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6, No. 2, pp. 205-253.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tlin, Todd (1993) 'From Universality to Difference: Notes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Left,' *Contention: Debates in Society, Culture, and Science*, Vol. 2 (Winter), No. 2, pp. 15-40.
- Gleick, James (1987)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New York: Penguin.
- Goldberg, Kim (1990) *The Barefoot Channel: Community Television as a Tool for Social Change*.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 Golding, Peter and Middleton, Sue (1982) *Images of Welfare: Pres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Povert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Golding, Peter and Murdock, Graham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15-32.
- Golding, Peter, Murdock, Graham, and Schlesinger, Philip (eds) (1986) *Communicating Politic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Goldman, Robert and Rajagopal, Arvind (1991) *Mapping Hegemony: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Industrial Conflict*. Norwood, NJ: Ablex.
- Gomery, Douglas (1989) 'Media Economics: Terms of Analysi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No. 2, pp. 43-60.
- Gorz, Andre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Trans. by Michael Soneenschler. London: Pluto.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by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Gran, Peter (1990) 'Studies of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Democracy, Orientalism, and the Left,' in Hisham Sharabi (ed.),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Arab World: Critic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228–254.
-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ossberg, Lawrence (1991) 'Strategies of Marxis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Robert K. Avery and David Ea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126–159.
- Grossberg, Lawrence, Nelson, Cary, and Treichler, Paula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Guback, Thomas (1969) *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Western Europe and America Since 194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uback, Thomas (1987)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Theater Business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Spring), No. 2, pp. 60–77.
- Guback, Thomas (1989) 'Should a Nation Have Its Own Film Industry?' *Directions*, Vol. 3, No. 1, pp. 489–492.
- Guback, Thomas (1991) 'Capital, Labor Power, and the Identity of Film,' *Current Research in Film*, Vol. 5, pp. 126–134.
- Guback, Thomas (ed.) (1993)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 Dallas Smyth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under Frank, André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utiérrez, Félix (1990) 'Advertising and the Growth of Minority Markets and the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 14 (Winter), No. 1, pp. 6–16.
- Habermas, Jürgen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by Thomas Burger with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 1962).
- Hafner, Katie and Markoff, John (1991) *Cyberpunk: Out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Hagerstrand, Torsten (196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rans. by Allan P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ight, Timothy R., and Weinstein, Laurie R. (1981) 'Changing Ideology on Television by Changing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Notes on a Contradictory Situation,' in Emile G. McAnany, Jorge Schmitman, and Noreene Janus (e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pp. 110–144.
- Hall, Peter and Preston, Paschal (1988) *The Carrier Wav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1846–2003*. London: Unwin and Hyman.
- Hall, Stephen S. (1992) *Mapping the Next Millennium: Discovering the New Geograph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all, Stuart (1973) 'A Reading of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 Hall, Stuart (1980)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 pp. 57–72.
- Hall, Stuart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and Jane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pp. 56–90.
- Hall, Stuart (1986) '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 in James Curran (ed.), *Bending Reality: The State of the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pp. 5–14.

- Hall, Stuart (1989a) '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J.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Paradigm Iss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40–52.
- Hall, Stuart (1989b)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Radical America*, Vol. 23, No. 4, pp. 9–20.
- Hall, Stuart (1993) 'Encoding, Decoding,' in During (ed.) (1993a), pp. 90–103.
- Hall, Stuart and Jefferson, Tony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Halloran, James (1963) *Control or Consent?: A Study of the Challen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 Halloran, James (1978) 'Further Development or Turning the Clock Back?: Social Research on Broadcas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8 (Spring), No. 2, pp. 120–132.
- Halloran, James (1981) 'The Context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mile McAnany, Jorge Schnitman, and Noreene Janus (e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pp. 21–57.
- Halloran, James (1983)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Answer but What is the Ques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7, pp. 158–167.
- Hamelink, Cees (1983)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A Study of Converging Interests*. Norwood, NJ: Ablex.
- Hamelink, Cees and Linné, Olga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or of James D. Halloran*. Norwood, NJ: Ablex.
- Hannigan, John (1991) 'Canadian Media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an Age of Global Megamedia Empires,' in Benjamin Singer (ed.), *Communication and Canadian Society*. Scarborough, Ont.: Nelson, pp. 238–257.
- Haraway, Donna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ng, Sandra and Hintikka, Merrill B. (eds) (1983)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 Hardt, Hanno (1990) 'Newswriters,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7, No. 4, pp. 346–365.
-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Hartmann, Heidi I. (1979)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and Class*, Vol. 8, pp. 1–33.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aug, W.F. (1986) *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Trans. by Robert Boc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wkesworth, M.E. (1988) *Theoretical Issues in Policy Analys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ead, Sidney (1974) *Broadcasting in Af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eilbroner, Robert L. (1986)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6th rev. edn).
- Heller, Walter W. (1967) *New Dimens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
- Hepworth, Mark (1989) *Geography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London: Belhaven Press.
- Hepworth, Mark and Robins, Kevin (1988) 'Whose Information Society?: A View From the Peripher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0, pp. 323–343.
- Herman, Edward S. and Chomsky, Noam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 Heyzer, Noeleen (1986) *Working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Subordination, and Emancipation*.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illard, Michael (1991) 'Domin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Braverman, Marglin, Nobl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Summer), No. 2, pp. 61–78.
- Hills, Jill (1986) *Deregulating Telecoms: Competition a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Britain*. London: Frances Pinter.
- Hills, Jill with Papathanassopoulos, Stylianos (1991) *The Democracy Gap: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New York: Greenwood.
- Hirst, Paul and Zeitlin, Jonathan (1991)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versus Post-Fordism: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0, No. 1 (February), pp. 1–56.
- Hobsbawm, Eric (1973)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onig, David (1984) 'The FCC and its Fluctuating Commitment to Minority Ownership of Broadcast Facilities,' *Howard Law Journal*, Vol. 27, No. 3, pp. 859–877.
- Horkheimer, Max (1947) *The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ton, Byrne J. (1948)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 Horwitz, Robert (1989) *The Irony of Regulatory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la, Richard C. (1988) *Market-Base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umphreys, Peter (1986) 'Legitimizing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Governments, Parties and Trade Un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West Germany,' in Kenneth Dyson and Peter Humphrey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pp. 163–194.
- Hund, Wulf and Kirchoff-Hund, Barbel (1985)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Robert Peck,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5, pp. 83–88.
- Ibrahim, S.M. (1981) *The Flow of News into Suda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Khartoum: El Sahafa Press.
- IDATE (1992) *Industrial Analyses: The World Film and Television Market*, Vol. 1. Montpellier: IDATE.
- Ingram, John Kells (192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C Black.
- Innis, Harold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1968)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Ito, Youichi (1989) 'Major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Information Society Studies,' in *Proceedings: Asia's Experience in Informatization*. Taipei, Taiwan, May 10–12.
- Jameson, Frederic (1989)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76 (July/August), pp. 31–45.
- Jankowski, Nick, Prehn, Ole, and Stappers, James (1992)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London: John Libbey.
- Jansen, Sue Curry (1989) 'Gender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ocially Structured Sil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9 (Summer), No. 3, pp. 196–215.
- Janus, Noreene (1984) 'Advertising and the Creation of Global Markets: The Role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4), pp. 57–70.
- Janus, Noreene (1986) 'Transnational Advertising: Some Consideration on the Impact on Peripheral Societies,' in Atwood and McAnany (eds) (1986), pp. 127–142.
-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1965)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M. Kelley (orig. 1870).
- Jhally, Sut (1990)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Jhally, Sut and Lewis, Justin (1992) *Enlightened Racism: The Cosby Show, Audiences, and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Drea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Johnson, Paul (1993) 'Colonialism's Back – and Not a Moment Too Soo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8, pp. 22, 43.
- Johnson, Richard (1987)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 Vol. 17 (Winter), pp. 38–80.
- Jones, Alex S. (1991) 'Newspapers Try, Carefully, to Investigate Subscrib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 p. 22.
- Jouët, Josiane (1987) *L'Écran apprivoisé: Télématique et informatique à domicile*. Paris: CNET.
- Jussawalla, Meheroo (1986) *The Passing of Remoteness: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Katz, Michael B., Doucet, Michael J., and Stern, Mark J. (198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ane, John (1984)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enan, Thomas (1993) 'Windows of Vulnerability,' in Robbins (ed.) (1993), pp. 121–141.
- Kellner, Douglas (1989)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llner, Douglas (1990)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ellner, Douglas (1995) *Media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Keynes, John Maynard (1964)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Kieve, Ronald A. (1986) 'From Necessary Illusion to Rational Choice? A Critique of Neo-Marxist Rational-Choice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5, No. 4, pp. 557–582.
- Kilborn, Peter T. (1990) 'Workers Using Computers Find a Supervisor 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pp. 1, 8.
- King, Thomas R. (1993) '“Jurassic Park” Offers a High-Stakes Test of Hollywood Synerg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0, p. 1.
- Kraft, Philip and Dubnoff, Steve (1986) 'Job Content, Fragmentation and Control in Computer Software W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25, pp. 184–196.
- Kramarae, Cheris (1989) 'Feminis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7–160.
- Krasnow, Erwin D., Longley, Lawrence D., and Terry, Herbert A. (1982) *The Politics of Broadcast Regul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rd edn).
- Kristol, Irving (1983)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nlarged edn).
- Kumar, Keval J. (1989) *Mass Communication in India*. Bombay: Jaico (2nd rev. edn).
-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Trans. by Winston Moore and Paul Cammack. London: Verso.
-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e, Robert E. (1991) *The Market Exper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rson, Erik (1992) 'Watching Americans Watch TV,'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pp. 66–80.
-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bowitz, Michael (1986) 'Too Many Blindspots on the Media,'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No. 21 (August), pp. 165–173.
- Lee, Jeong-Taik (1988) 'Dynamics of Labor Control and Labor Protest in the Process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2 (Spring–Summer), No. 1., pp. 134–158.
- 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Irvington, pp. 285–295.
- Lent, John A. (1985) *Women and Mass Media in Asi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
- Lent, John A. (ed.) (1990) *The Asian Film Industry*.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 Lent, John A. (1991) *Women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Lerner, Daniel (1949)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 Day*. New York: Stewart.
-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Lervins, Richard and Lewontin, Richard C. (1985)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vy, Jonathan D. and Setzer, Florence O. (1984) 'Market Delineation, Measurement of Concentration, and F.C.C. Ownership Rules,' in Vincent Mosco (ed.), *Policy Research in Telecommunications*. Norwood, NJ: Ablex, pp. 201–212.
-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ndlof, Thomas R. (1991) 'Qualitative Study of Media Audienc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Vol. 35 (Winter), No. 1, pp. 23–42.
- Lipietz, Alain (1988) 'Reflections on a Tale: The Marxist Foundations of the Concepts of Reg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Summer), pp. 7–36.
- Livant, William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3, No. 1, pp. 91–106.
- Long, Elizabeth (1989)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December), No. 4, pp. 427–435.
- Londier, Fred (1992) 'Working with Unions II: A Photo Essay,'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125–137.
- Lovelock, J.E. (1987)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uke, Timothy (1989) *Screens of Power: Ideology,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Informational Societ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unn, Eugene (1982) *Marxism and Modernism: An Historical Study of Lukács, Brecht, Benjamin and Ador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x, Kenneth (1990) *Adam Smith's Mistake*. Boston: Shambhala.
- Lyotard, Jean 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Anany, Emile G. (1986) 'Seminal Ideas in Latin Americ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Agenda for the North,' in Atwood and McAnany (eds) (1986), pp. 28–47.

- McChesney, Robert W. (1992a) 'Labor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WCFL and the Battle for Labor Radio Broadcasting, 1927-1934,'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34 (August).
- McChesney, Robert W. (1992b) 'Off Limits: An Inquiry into the Lack of Debate over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ntrol of the Mass Media in U.S. Political Life,' *Communication*, Vol. 13, pp. 1-19.
- McChesney, Robert W. (1993) *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U.S. Broadcas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Closkey, Donald N.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acDonald, J. Fred (1983) *Blacks and Whites: Afro-Americans in Television Since 1948*. Chicago: Nelson-Hall.
- McIntyre, Richard (1992) 'Theori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5 (Fall), No. 3, pp. 75-105.
- McKibben, Bill (1992) *The Age of Missing In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cLaughlin, John F. (1992) 'Unequ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among Corporation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inth World Communications Forum, Tokyo, draft October 15.
- McLaughlin, John F. with Antonoff, Anne Louise (1986) *Mapping the Information Business*. Publication P-86-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 McNally, David (1993) *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Verso.
- McPhail, Thomas (1987) *Electronic Coloniali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rev. edn).
- Magder, Ted (1989) 'Taking Culture Seriousl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Wallace Clement and Glen Williams (eds), *The New Canadian Political Economy*.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p. 278-296.
- Mahon, Rianne (1980) 'Regulatory Agencies: Captive Agents or Hegemonic Apparatuses,' in J. Paul Grayson (ed.), *Class, State, Ideology, and Change*. Toronto: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p. 154-168.
- Mahoney, Eileen (1988) 'The Intergovernmental Bureau For Informatic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Changing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8), pp. 297-315.
- Malone, Thomas W. and Rockart, John F. (1991) 'Computers, Networks and the Corpo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pp. 128-136.
- Mandel, Michael J. (1991) 'They're Not Eating Crow, But . . . : Radical Economists are Rewriting Their Critique of Capitalism,' *Business Week*, October 14, pp. 78, 81.
- Mandel, Michael J. (1994) 'The Digital Juggernaut,' *Business Week*, June 6, pp. 22-37.
- Manet, Enrique Gonzalez (1988) *The Hidden War of Information*. Trans. by Laurien Alexandre. Norwood, NJ: Ablex.
- Mansell, Robin (1993) *The New Telecommunic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Network Evolution*. Sage: London
- Markovich, Denise E. and Pynn, Ronald E. (1988)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Using Economics with Politic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Marques de Melo, José (ed.) (1991)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Brazilian Perspectives*. São Paulo: ECA/USP.
- Marshall, Alfred (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orig. 1890).
- Martin, Michèle (1991) 'Hello, Central?': *Gende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973) *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orig. 1939).

- Marx, Karl (1976a)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rans. by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orig. 1867).
- Marx, Karl (1976b) *Collected Works*, Vol. V.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ssey, Doreen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London: Methuen.
- Massey, Doreen (1992) 'Politics and Space/Time,' *New Left Review*, No. 196 (Nov./Dec.), pp. 65–84.
- Masuda, Yoneji (1970) 'Social Impact of Compute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uture Research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from the Future*. Tokyo: Kodansha.
- Masuda, Yoneji (198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Future Society.
- Mattelart, Armand (1983) '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d Group Analysi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Mattelart and Siegelau (eds) (1983), pp. 17–67.
- Mattelart, Armand (ed.) (1986) *Communicating in Popular Nicaragu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attelart, Armand (1991)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Space*. Trans. by Michael Chanan. London: Comedia and Routledge.
- Mattelart, Armand and Mattelart, Michèle (1992) *Rethinking Media Theory: Signposts and New Directions*. Trans. by James A. Cohen and Marina Urquid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 1986).
- Mattelart, Armand and Siegelau, Seth (ed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attelart, Armand and Siegelau, Seth (eds) (1983)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2: Liberation, Soc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attelart, Armand, Delcourt, Xavier, and Mattelart, Michèle (1984) *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s: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Comedia (orig. 1983).
- Mattelart, Michèle (1977) 'Création populaire et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medi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lgiers, October 11–15.
- 'The Media Charter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1992) *Media Development*, No. 2, p. 41.
- Meehan, Eileen R. (1984)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 No. 2, pp. 216–225.
- Mehegan, David (1994) 'High Fliers and Bumpy Landings,' *Boston Sunday Globe*, January 2, p. 57.
- Melody, William (1984) 'Direct Testimony to the Pennsylva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Docket No. P-83045, August.
- Melody, William (1990) 'The Information in I.T.: Where Lies the Public Interest,' *Intermedia*, Vol. 18 (June-July), No. 3, pp. 10–18.
-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Meyrowitz, Joshua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ège, Bernard (1987) 'The Logic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Industri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9, pp. 273–289.
- Miège, Bernard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ignot-Lefèbvre, Yvonne (1993) 'Media Control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Fr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93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urope in Turmoil,' Dublin, June.
- Miliband, Ralph (1989) *Divided Societies: Class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 John Stuart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C.C. Little and J.B. Brown.

- Miller, David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Jeff (1994) 'Should Phone Companies Make Film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p. F11.
- Miller, John (1992) 'URPE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Whence We Came,' *URPE Newsletter* (Fall), pp. 4–5.
- Miller, Mark Crispin (1988) *Boxed In: The Culture of TV*.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dleski, Tania (1986) 'Introduction,' in Tania Modleski (ed.),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xi–xix.
- Modleski, Tania (1991) *Feminism without Women: 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 'Postfeminist'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Montgomery, Katherine C. (1989) *Target: Prime Time – Advocacy Groups and the Struggle over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dy, Kim (1993)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How Union Jobs are Being Lost in an Expanding Industry,' *Labor Notes*, December.
- Morley, Davi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 Morris-Suzuki, Tessa (1986) 'The Challenge of Computers,' *New Left Review*, No. 160 (Nov./Dec.), pp. 81–91.
- Morris-Suzuki, Tessa (1988) *Beyond Computopia: Information, Automation, and Democracy in Japan*. London: Routledge.
- Morris-Suzuki, Tessa (1989) *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 Morrison, David (1978)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 Vol. XIX, No. 2, pp. 347–359.
- Mosco, Vincent (1982) *Pushbutton Fantas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Videotex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wood, NJ: Ablex.
- Mosco, Vincent (1989a) *The Pay-per Society: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ronto: Garamond; Norwood, NJ: Ablex.
- Mosco, Vincent (1989b) 'Labour in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 Crit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Paradigm Exempla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213–225.
- Mosco, Vincent (1990a) 'The Myt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 Deregul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0 (Winter), No. 1, pp. 36–49.
- Mosco, Vincent (1990b) 'Toward a Transnational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XV, No. 2, pp. 46–63.
- Mosco, Vincent (1992) 'Une drôle de guerre,' *Media Studies Journal*, Vol. 6 (Spring), No. 2, pp. 47–60.
- Mosco, Vincent (1993a)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War and Peace,' in Roach (ed.) (1993a), pp. 41–70.
- Mosco, Vincent (1993b) 'Transforming Telecommunications,' in Wasko, Mosco, and Pundakur (eds) (1993), pp. 132–151.
- Mosco, Vincent (1995) 'Will Computer Communication End Geography?' Report P-95-4,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 Mosco, Vincent and Herman, Andrew (1981) 'Critical Theory and Electronic Medi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X, pp. 869–896.
-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3)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1: Labor,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edia*. Norwood, NJ: Ablex.

-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4)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2: Changing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Control*. Norwood, NJ: Ablex.
-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5)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3: Popular Culture and Media Events*. Norwood, NJ: Ablex.
-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osco, Vincent and Zureik, Elia (1987)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Telephone Industry*. Ottawa, Government of Canada, Department of Labour.
- Mowlana, Hamid (1990) 'Civil Society,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slamic Society: A Comparative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Bled, Yugoslavia, August 24–25.
- Mowlana, Hamid (1993) 'The New Global Order and Cultural Ecolog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pp. 9–27.
- Mowlana, Hamid, Gerbner, George, and Schiller, Herbert I. (eds) (1992)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Moyal, Ann (1989) 'The Feminine Culture of the Telephone: People, Patterns and Policy,' *Prometheus*, Vol. 7 (June), No. 1, pp. 5–31.
- Mulgan, G.J.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twork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2, No. 2, pp. 109–119.
- Murdock, Graham (1989a) 'Cultural Studies: Missing Link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No. 4, pp. 436–440.
- Murdock, Graham (1989b) 'Critical Inquiry and Audience Activity,'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Paradigm Exempla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226–249.
- Murdock, Graham (1990a) 'Television and Citizenship: In Defense of Public Broadcasting,' in Alan Tomlinson (ed.), *Consumption, Identity and Style*. London: Routledge, pp. 77–101.
- Murdock, Graham (1990b) 'Redrawing the Map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in Marjorie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Beverly Hills: Sage, pp. 1–15.
- Murdock, Graham (1993)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pp. 521–539.
-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pp. 205–234.
-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1979)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urran et al. (eds) (1979), pp. 12–43.
- Nagel, Ernest (1957) *Logic without Metaphysics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Glencoe: Free Press.
- Nasar, Sylvia (1992a) 'Employ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Engine for Boom of 80's, Falter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pp. A1, D4.
- Nasar, Sylvia (1992b) 'Puzzling Poverty of the 80's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p. D2.
- Negrine, Ralph and Papathanassopoulos, Stylianos (199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levis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 Negt, Oskar and Kluge, Alexander (1972) *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ü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Suhrkamp.
- Nesmith, Georgia (1991)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Time for Conceptual Chang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Boston, August.
- Neuman, W. Russell (1991) *The Future of the Mass Aud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New York Times* (1991) 'As Libraries Face Cuts, Supporters Plan a Protest,' July 8, p. A1.
- The New York Times* (1992) 'Fed Gives New Evidence of 80's Gains by Richest,' April 21, p. A1.
- The New York Times* (1994) 'Tokyo's Magic Kingdom is a Winner,' March 7, p. D7.
- Ng'wanakilala, Nkwabi (198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Tanzania*. Dar-es-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 Nielsen, Mike (1990) 'Labor's Stake in the Electronic Cinema Revolution,' *Jump Cut*, No. 35, pp. 78–84.
- Nielsen, Richard P. (1976) 'Mass Media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wls and Nozick,'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Spring), pp. 16–22.
- Nisbet, Robert (1986) *Conserv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oam, Eli. M. (1987) 'The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A Concept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Winter), No. 1, pp. 30–48.
- Nordenstreng, Kaarle (1968)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Gazette*, Vol. 14, pp. 207–216.
- Nordenstreng, Kaarle (ed.) (1974) *Informational Mass Communication*. Helsinki: Tammi.
- Nordenstreng, Kaarle (1984) *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 Norwood, NJ: Ablex.
- Nordenstreng, Kaarle (1993) 'New Information Order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Reflections on a Delicate Relationship,' in Wasko et al. (eds) (1993), pp. 251–273.
-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Schiller, Herbert (eds) (1979)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orwood, NJ: Ablex.
-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Schiller, Herbert (eds) (1993)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orwood, NJ: Ablex.
-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Varis, Tapio (1974) *Television Traffic: A One-Way Street?* Paris: UNESCO.
- Norris, Christopher (1992)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Oakeshott, Michael J. (1962)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expanded edn).
- Oakeshott, Michael J. (1975) *On Human Conduct*. Oxford: Clarendon.
- O'Brien, Mary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O'Brien, Richard (199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End of Geograph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O'Connor, Alan (1991)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Latin Americ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1, pp. 60–73.
- O'Connor, James (1987) *The Meaning of Crisis: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O'Connor, James (1991) 'Socialism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2, No. 3, pp. 1–12.
- Oettinger, Anthony G. (1980) 'Information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Science*, No. 209 (July 4), pp. 191–198.
- Oettinger, Anthony G. (1988a) *The Formula is Everything: Costing and Pricing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 Oettinger, Anthony G. (1988b)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Other Truths in the Information

- World.' Samuel Lazerow Memori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November 10.
-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Offe, Claus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Oliveira, Omar Souki (1991) 'Mass Media, Culture, and Dependency in Brazil: The Heritage of Dependency,'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200–213.
- Oliveira, Omar Souki (1992) 'New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Freedom and Dependenc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92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ão Paulo, Brazil, August.
- Olson, Mancur (1990)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Economics and the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Alt and Shepsle (eds) (1990), pp. 212–231.
- Oppenheim, C. (1990) *Poverty: The Facts*.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 Ortega y Gasset, José (1957)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Norton.
- Outhwaite, William (1987)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Realism,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Houndmills: Macmillan Education.
- Owen, Bruce M. and Wildman, Steven S. (1992) *Video 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wen, Robert (1970)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New York: Kelley (orig. 1842).
- Palgrave, Sir Robert Harry Inglis (1913)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 Palmer, Bryan D.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apathanassopoulos, Stylianos (1990) 'The EC: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but with Media Monopolies?' *Intermedia*, Vol. 18 (June–July), No. 3, pp. 27–30.
- Parker, William (1986)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New York: Blackwell.
- Parsons, Talcott (1966)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Parsons, Talcott and Shils, Edward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squali, Antonio (1967) *El Aparato Singular: Análisis de un Día de TV en Caracas*. Caracas: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 Passell, Peter (1992) 'George Bush's Sins of Omi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p. D2.
- Peiss, Kathy Lee (1986) *Cheap Amusemen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eiss, Kathy Lee (1991) 'Going Public: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3 (Winter), pp. 817–828.
- Peltzman, Sam (1975) *Regulation of Automobile Safe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 Pendakur, Manjunath (1990a) *Canadian Dreams and American Contro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nadian Film Indust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endakur, Manjunath (1990b) 'India,' in Lent (ed.) (1990), pp. 229–252.
- Pendakur, Manjunath (1991)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vision: State, Class and Corporate Confluence in India,' in Sussman and Lent (eds) (1991), pp. 234–262.
- Pendakur, Manjunath (1993)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 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lage,' in Wasko et al. (eds) (1993), pp. 82–108.
- Peters, Edgar E. (1991) *Chaos and Order in the Capital Markets: A New View of Cycles, Prices, and Market Volatility*. New York: Wiley.
- Peters, John Durham (1993) 'Distrust of Representation: Habermas on the Public Sphe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pp. 541–571.
- Phillips, Adam (1993) *On Kissing, Tickling, and Being Bored: Psychoanalytic Essays on the Unexamined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card, Robert (1989) *Media Economics: Concepts and Iss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Piller, Charles and Weiman, Liza (1992) 'America's Computer Ghetto,'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p. A27.
- Piore, Michael and Sabel, Charles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 Pizzigati, Sam and Solowey, Fred J. (eds) (1992) *The New Labor Press: Journalism for a Changing Union Movement*. Ithaca, NY: ILR Press.
- Pogorel, Gerard (1991)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Firms: A European View,'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 12 (March), pp. 91–109.
- Porritt, Jonathon (1984)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New York: Blackwell.
- Posner, Richard A. (1992) *Sex and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ster, Mark (1984)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Pred, Alan (1966)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S. Industrial Growth, 1800–1914: Interpretive and Theoretical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ess, Andrea Lee (1991)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Gender, Class and Generation in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Experi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reston, William, Jr, Herman, Edward S., and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Hope and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5–198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rokop, Dieter (ed.) (1973) *Kritische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Aufsätze aus de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Munich: Hanser.
- Prokop, Dieter (1974) *Massenkultur und Spontaneität: Zur veränderten Warenform der Massenkommunikation in Spätkapitalismus (Aufsätze)*. Frankfurt: Suhrkamp.
- Prokop, Dieter (1983)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Mass Me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5, pp. 101–116.
- Przeworski, Adam (1986)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ette, William J. (1992) *Through Jaundiced Eyes: How the Media View Organized Labor*. Ithaca, NY: ILR Press.
- Rabinach, Anson (1990) *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Raboy, Marc (1990) *Missed Opportunitie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Press.
- Radway, Janice (1988) 'Reception Study: Ethnography and the Problems of Dispersed Audiences and Nomadic Subjects,' *Cultural Studies*, Vol. 2, No. 3, pp. 359–376.
- Rakow, Lana F. (1988) 'Gendered Technology, Gendered Practi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5, No. 1, pp. 57–70.
- Ramirez, Anthony (1991) 'Baby Bells are Accused of Overcharging,'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p. D5.
- Reeves, Geoffrey (1993) *Communic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Reich, Robert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Knopf.
- Reid, Margaret G. (1934) *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New York: Wiley.
- Resnick, Stephen A. and Wolff, Richard D. (1987)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yes Matta, Fernando (1979) 'The Latin American Concept of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9 (Spring), No. 2, pp. 164–171.
- Reyes Matta, Fernando (1983) *Comunicación Alternativa y Búsquedas Democráticas*. Mexico City: ILET.
- Rheingold, Howard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Ricardo, David (1819)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 Rideout, Vanda (1993)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for Whom?: An Analysis of Recent CRTC Decisions,' *Alternate Routes*, Vol. 10, pp. 27–56.
- Ries, Al (1993) 'An Idea Whose Time Never Cam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p. F13.
- Roach, Colleen (ed.) (1993a)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Roach, Colleen (1993b) 'Feminist Peace Researcher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Roach (ed.) (1993a), pp. 175–191.
- Robbins, Bruce (ed.) (1993)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binson, Joan (1962) *Economic Philosophy*. Chicago: Aldine.
-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s, Everett (1976)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 pp. 63–78.
- Rogers, Everett with Shoemaker, F. Floyd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gin, Leo (1956)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Roll, Eric (1942)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Roncagliolo, Rafael (1986)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twood and McAnany (eds) (1986), pp. 79–88.
-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s, Andrew (1993) 'The Fine Art of Regulation,' in Robbins (ed.) (1993), pp. 257–268.
- Ross, Steven J. (1991) 'Struggles for the Screen: Workers, Radicals,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Silent Fil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April), No. 2, pp. 333–367.
- Rucinski, Diane (1991) 'The Centrality of Reciprocity to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 No. 2, pp. 184–194.
- Rusk, James (1991) "'The Greatest Moral Challenge of Our Time'," *The Globe and Mail*, February 19, p. B8.
- Russial, John T. (1989) 'Pagination and the Newsroom: Great Expect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mpleted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August.
- Ryan, Charlotte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Sahlins, Marshall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inath, P. (1992a) *Patent Folly: Behind the Jarg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ombay: Indian School for Social Science.
- Sainath, P. (1992b) 'The New World Odour,' in Mowlana et al. (eds) (1992), pp. 67–74.
- Sale, Kirkpatrick (1995)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 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Salutin, Rick (1993) 'An Industrial Strategy for the Arts,' *The Globe and Mail*, June 4, p. C1.
- Samarajiwa, Rohan (1985) 'Tainted Origins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or* (April–July), pp. 5–9.
- Samarajiwa, Rohan (1993) 'Down Dependency Road? The 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Canada's Copyright Amendments of 1988,' in Wasko et al. (eds) (1993), pp. 152–

-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unders, Anthony (1989)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Banking, and Finance,' in Paula R. Newberg (ed.), *New Directions 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6–289.
- Saxton, Alexander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Verso.
- Schiller, Dan (1981)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chiller, Dan (1982) *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 Norwood, NJ: Ablex.
- Schiller, Dan (1985) 'The Emerging Global Grid: Planning for Wha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pp. 105–125.
- Schiller, Dan (1986) 'Transformations of News in the US Information Market,' in Golding et al. (eds) (1986), pp. 19–36.
- Schiller, Dan (1988)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8), pp. 27–43.
- Schiller, Dan (1994) 'From Culture to Information and Back Again: Commoditization as a Route to Knowledg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1, No. 1, pp. 92–115.
- Schiller, Herbert I. (1969/1992: 2nd updated ed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Boston: Beacon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I.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I. (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orwood, NJ: Ablex.
- Schiller, Herbert I. (1984)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Norwood, NJ: Ablex.
-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Culture, In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I. (1991) 'Public Information Goes Corporate,' *Library Journal*, October 1, pp. 42–45.
- Schiller, Herbert I. (1993)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in Roach (1993a), pp. 97–116.
- Schlesinger, Philip (1991) *Media, State, and N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London: Sage.
- Schor, Juliet B. (1992)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ramm, Wilbur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ichael (1984) *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udson, Michael (1987) 'The New Valid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Sense and Sentimentality in Academi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4, No. 1, pp. 51–68.
- Schumpeter, Joseph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Scott, John (1991)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Newbury Park, CA: Sage.
- Secombe, Wally (1974)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83 (Jan–Feb), pp. 3–24.
- Sennett, Richard (1976)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Vintage.
- Sherman, Howard J. (1987) *Foundation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Y: M.E. Sharpe.
- Shimony, Abner (1993) *Search for a Naturalistic World View. Vol. 1: Scientific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chterman, Barbara (1986) *Femininity: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iegelau, Seth (1979) 'Preface: A Communication on Communication,' in Mattelart and Siegelau (eds) (1979), pp. 11–21.
- Siegelau, Seth (1983) 'Working Notes on Social Relati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Mattelart and Siegelau (eds) (1983), pp. 11–16.
- Silk, Catherine and Silk, John (1990) *Racism and Anti-Racism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Portrayals of African-Americans in Fiction and Fil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Herbert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Wiley.
- Simpson Grinberg, M. (1981) *Comunicación Alternativa y Cambio Social*.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 Sivanandan, A. (1989) 'New Circuits of Imperialism,' *Race and Class*, Vol. 30 (April–June), No. 4, pp. 1–19.
- Sivanandan, A. (1990)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Writings on Black Struggles fo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Slack, Jennifer D. (1984)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 Slater, Don (1987) 'On the Wings of the Sign: Commodity Culture and Social Practic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9, pp. 457–480.
- Slaughter, Sheila A. (1984) *Serving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Expert*. Westport, CT: Greenwood.
- Smith, Adam (193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orig. 1776).
- Smith, Adam (1976)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orig. 1759).
- Smith, Anthony (1989) 'The Public Interest,' *Intermedia*, Vol. 17 (June–July), No. 2, pp. 10–24.
- Smith, Anthony (1991) *The Age of Behemoths*. New York: Priority Press.
- Smythe, Dallas W. (1957) *The Structure and Polic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I, No. 3, pp. 1–27.
- Smythe, Dallas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II, No. 2, pp. 120–127.
- Smythe, Dallas W.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 Smythe, Dallas W. (1991) 'Theory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raft paper originating in work at CIRCIT, Melbourne, Australia, May 1.
- Smythe, Dallas W. and Melody, William H. (1985)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nadian and U.S. Spectrum Management Processes: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Ottawa, Canada, March.
- Soja, Edward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Verso.
- Somavia, Juan (1979) *Democratización de las comunicaciones: Una perspectiva latino-americana*. Mexico City: ILET.
- Somavia, Juan (1981)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s: From Minority Social Monopoly to Major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 *Development Dialogue*, Vol. 2, pp. 13–30.
- Sorkin, Michael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Sparks, Colin (ed.) (1985) 'The Working-Class Pres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No.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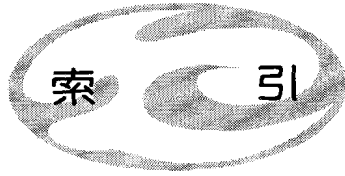
- Sparks, Colin and Dahlgren, Peter (eds)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 Spigel, Lynn (1989)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elevision Viewing in Postwar Americ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6, No. 4, pp. 337–354.
- Squires, James (1993) *Read All About It!: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America's Newspap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taniland, Martin (1985)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aples, Robert and Jones, Terry (1985) 'Culture, Ideology and Black Television Images,' *The Black Scholar*, Vol. 16 (May/June), pp. 10–20.
- Steeves, H. Leslie (1987) 'Feminist Theories and Media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4, No. 2, pp. 95–135.
- Steeves, H. Leslie (1989) 'Gende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in Pamela J. Creedon (ed.), *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83–111.
- Sterngold, James (1992) 'Fed Chief Says Economy is Resisting Remed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p. D2.
- Steuart, James (1967) *An Inquiry i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orig. 1761).
- Stigler, George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pp. 3–21.
- Stigler, George J. (ed.) (1988) *Chicago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one, Alan (1991) *Public Service Liberalism: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Alan and Harpham, Edward J. (eds)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Policy*. Beverly Hills: Sage.
- Stouffer, Samuel Andrew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usan (1988)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Frances Pinter.
- Strover, Sharon (1993) 'Trends in Coproductions: Demise of the Nation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ublin, Ireland, June.
- Sussman, Gerald (1984)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6, pp. 289–300.
- Sussman, Gerald and Lent, John A. (eds) (1991)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s: Wiring the Third World*. Newbury Park, CA: Sage.
- Sutherland, John (1993) 'Where's the Lit. in Lit. Cri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7, p. 23.
- Szecsco, Tamas (1986) 'The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Hungary,' *Masscommunication*, Vol. 14, No. 2–3, pp. 110–116.
- Tabor, Mary (1991) 'Encouraging "Those Who Would Speak Out with Fresh Voice" Through FCC Minority Ownership Policies,' *Iowa Law Review*, Vol. 76 (March), pp. 609–639.
- Tang, Wing Hung and Chan, Joseph Man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 Study of Dependent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 No. 1, pp. 53–80.
- Tetzlaff, David (1991) 'Divide and Conquer: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Control in Late Capitalism,'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pp. 9–33.
- Thomis, Malcolm I. (1972) *The Luddites: Machine-Breaking in Regency Englan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Thompson, John B. (1989)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David Held and John B.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6–76.
- Thompson, John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rift, Nigel (1987) 'The Fixers: The Urban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apital,' in Jeffrey Henderson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pp. 203–233.
- Thrift, Nigel and Leyshon, Andrew (1988) '“The Gambling Propensity”: Banks,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Exposure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Geoforum*, Vol. 19, No. 1, pp. 55–69.
- Thurow, Lester (1992)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 Tierney, John (1993) 'Will They Sit by the Set, or Ride a Data Highwa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 pp. 1, 24.
- Time Warner Annual Report* (1993).
- Tinker, Tony (1985) *Paper Prophets: A Social Critique of Accounting*. New York: Praeger.
-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raber, Michael and Nordenstreng, Kaarle (eds) (1992)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London: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 Tran van Dinh (1987)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Revolution: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Norwood, NJ: Ablex.
-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 Tunstall, Jeremy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unstall, Jeremy (1981) *Journalists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 Tunstall, Jeremy and Palmer, Michael (1991) *Media Moguls*. London: Routledge.
- Turkel, Sherry (1984) *The Second Self*.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Turow, Joseph (1984) *Media Industries: The Production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New York: Longman.
- Uche, Luke Uke (1986) 'The Youth and Music Culture: A Nigerian Case Study,' *Gazette*, Vol. 37, Nos 1–2, pp. 63–78.
- Ugboajah, F.O. (1986) 'Communication as Technology in African Rural Development,' *African Media Review*, Vol. 1, No. 1, pp. 1–19.
- Umesao, Tadao (1963) 'Joho Sangyo Ron (On Information Industries),' *Chuokohron*, March.
- UNESCO (1979)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Final Report*. Paris: UNESCO.
- UNESCO (1983) *History in Black and White: An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Paris: UNESCO.
- UNESCO (1989) *World Communication Report*. Paris: UNESCO.
- UNESCO (1990) *UNESCO Yearbook 1990*. Paris: UNESCO.
-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Worldwide Tele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1985) *The Missing Link*. Geneva: ITU.
-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87) *The Electronic Supervisor: New Technologies/New Tensions*. OTA-CIT-33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0) *Critical Connections: Commun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TA-CIT-40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91) *Rural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Networking for the Future*. OTA-CIT-47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1991) *Motion Picture Anti-Piracy Act of 1991: Join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Patents, 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102nd Cong., fir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Congres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1995) *Humanities Reauthorization: Testimony of Victor R. Swenson*, March 2.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10th edn).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13th edn).
- U.S., FCC (1991) *Monitoring Report*, CC Docket No. 87-339,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Federal-State Joint Board in CC Docket No. 80-28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uary.
-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eun 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van Zoonen, Liesbet (1991)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33-54.
- van Zoonen, Liesbet (1992) 'Feminist Theo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pp. 9-29.
- van Zoonen, Liesbet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 Veblen, Thorstein (1932) *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Scribner's (orig. 1904).
- Veblen, Thorstein (193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orig. 1899).
- Vedel, Thierry and Luven, Ronan (1993) *La Télévision de demain: Cable, satellite et TVHD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Paris: A. Colin.
- Vernon, Raymond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here are They Coming From, Where are They Head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1 (April), No. 2, pp. 7-35.
- Veron, Eliseo (1987) *El Discurso Politico*. Buenos Aires: Hachette.
- Vijayan, Jaikumar (1996) 'India,' *Computerworld*, February 26, p. 101.
- Wall Street Journal* (1993) 'Entertaining Numbers: A Statistical Look at the Glob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March 26, p. R16.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d, Wayne (1977) *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Liberal and Radical Economic Thought*. Santa Monica, CA: Goodyear Publishing.
-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Wasko, Janet (1982) *Movies and Money: Financing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Norwood, NJ: Ablex.
- Wasko, Janet (1983) 'Trade Unions and Broadcasting,' in Mosco and Wasko (eds) (1983), pp. 85-113.
- Wasko, Janet (1984) 'New Methods in Analyzing Media Concentration,' in Vincent Mosco (ed.), *Policy Research in Telecommunications*. Norwood, NJ: Ablex, pp. 213-219.

- Wasko, Janet (1989) 'What's So "New" About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Hollywood? An Example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Brenda Dervin, Lawrence Grossberg, Barbara O'Keefe, and Ellen Wartella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Paradigm Exempla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474–485.
- Wasko, Janet (1994) *Hollywoo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eyond the Silver Scree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sko, Janet and Mosco, Vincent (eds) (1992)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 Toronto: Garamond; and Norwood, NJ: Ablex.
- Wasko, Janet and Philips, Mark (1993) 'Teal's the Deal in Sports Merchandise,' *Oregon Sports News* (Spring), pp. 48–51.
- Wasko, Janet, Mosco, Vincent, and Pendakur, Manjunath (eds)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in Honor of Dallas Smythe*. Norwood, NJ: Ablex.
- Waterman, Peter (1990) 'Communicating Labor Internationalism: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sourc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5, Nos 1/2, pp. 85–103.
- Waterman, Peter (1992)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Information in Peru,' in Wasko and Mosco (eds) (1992), pp. 224–241.
- Weber, Max (1946)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by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Trans. by Ephraim Fischhof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bster, Frank and Robins, Kevin (19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uddite Analysis*. Norwood, NJ: Ablex.
- Webster, Frank and Robins, Kevin (1989) 'Plan and Control: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8, pp. 323–351.
- Wedell, G. (ed.) (1986) *Making Broadcasting Useful: The Afric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einberg, Steven (1993)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 West, Edwin G. (1990) *Adam Smith and Modern Economics: From Market Behaviour to Public Choic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illiams, Raymond (1975)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 Williams, Raymond (1981a) *Culture*.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 Raymond (1981b) 'Marxism, Structuralism, and Literary Analysis,' *New Left Review*, No. 129 (Sept./Oct.), pp. 51–66.
- Williams, Raymond (1983) *Toward 2000*. London: Hogarth Press.
-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Clint C., II and Gutiérrez, Félix (1985)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Diversity and 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Sage.
- Wilson, Edward O. (1992) *The Diversity of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ames Q. (ed.) (1980)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Wilson, Kevin (1992) 'Deregulat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 Monopoly: A Critique of Economics 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pp. 343–368.

- Winseck, Dwayne (1993) 'A Study of Regulatory Change and the Deregulatory Process in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 Un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Winston, Brian (1986) *Misunderstanding Me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 Ellen Meiksins (1981)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27 (May-June), pp. 66-95.
- Wood, Ellen Meiksins (1986)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Wood, Ellen Meiksins (1989)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 *New Left Review*, No. 177, pp. 41-88.
- Wood, Ellen Meiksins (1990) '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 (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90: The Retreat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Merlin Press, pp. 61-84.
- Wright, Karen (1990) 'The Road to the Global Village,'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pp. 83-94.
- Yates, JoAnne (1989) *Control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System in American Manag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Zachary, G. Pascal and Ortega, Bob (1993) 'Age of Angst: Workplace Revolution Boosts Productivity at Cost of Job Secur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pp. A1, A6.
- Zimbalist, Andrew (1979) 'Technology and the Labor Process in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Andrew Zimbalist (ed.), *Case Studies in the Labor Proc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03-126.
- Zuboff, Shoshana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譯按：本索引頁碼代表原文書之頁碼，於內文中出現時，標示在內文左側。

Ayres, Charles 55

Bagdikian, B.H. 90

Baran, P.A. 28, 56

Barrett, M. 61

Baudrillard, Jean 45, 141, 155-6

Becker, G.S. 264

behaviorism ,78-9

Bell, D. 28, 39, 64

Bell Atlantic 193

Beniger, James 26, 94

Bentham, Jeremy 47

Boafo, S.T.K. 127

- capitalism 11, 12–14, 37, 43–5, 104–6;
 class and gender power and 232–3, 234;
 commodification and 140, 141; hegemony
 and 243, 244; nationalism and 208, 209,
 210; and private life 165, 166; social
 totality and 267; state and 92–3;
 transition to 73
- Cardoso, F.H. 15n
- Carlyle, Thomas 46
- Carragee, K.M. 252
- Castells, M. 174
- categorical approach: to class 216–29; to
 gender 230–4; to race 236–7
- causality 6–7, 137
-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97–9, 116–17
- Chaffee, S.H. 130, 131
- Chandler, A.D. 177
- chaos theory 7–8, 26
-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27–38
- Chase-Dunn, C. 210
- Cheesman, R. 132n
- China 12
- Chomsky, N. 89–90
- Christopherson, S. 58, 109
- Citicorp 152
- class 96, 215–30, 233, 251
- class analysis 57, 105, 114
- class formation 229–30
- class power 19–20, 228, 229, 233, 270–2;
 in communications workplace 225–7; and
 corporate boards 189
- class struggle 20
-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17–18, 39–42;
 conservative critique of 46–7; radical
 critique of 42–6
- Clement, W. 29, 90
- codes of knowledge 1
- Cohen, G.A. 58
- commercial networks 219, 221
- commercialization 144, 202
- commodification 140–72
- commodity/ies 44, 77; Marx and 140,
 141–4
- commodity fetishism 143
- Commons, J.R. 55
- communication 67–72; class division in
 218, 225–7;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72–82; market-based systems
 of 12
-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European
 research in 109–11
- communication policy, of social movements
 240
- communication systems: to expand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157–8;
 information and 67, 75, 87, 95, 113
- communism 12
- community 18
- Compaine, B.M. 182, 244
- competition 182–3, 203
- comput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126,
 128, 130
- computer use, connection with income 219
- Comsat 196, 197
- concentration, corporate 175–99
- concepts 2, 10, 23–4
- conglomerates 13, 74, 179–80, 199
- Connell, R. 29
- consent, hegemony and 243–4
- conservative political economy 18, 53–4
-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0, 36
- consumers, as producers 26
- consumption 55, 74, 88
- content: commodification of 146–8, 162;
 diversity of 258
- control, over workplace 226–7
- conversational epistemology 66–7, 71
-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187–9
- corporate structure 58
- corporatism 53–4
- Cosby Show, The* 96–7
- craft traditions, in media industry 73, 106,
 110, 158
- Crawford, M. 154–5
- critical approach to epistemology 5–9
-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12, 15, 130–1
- critical politics 100
- criticism 9
- cross-media concentration 176
- cultural commodities 110
- cultural imperialism 106, 125
- cultural industries 112
- cultural studies 11, 80–1, 87; and political
 economy 247–50, 250–3, 257–9, 266–70
- culture 80, 108, 111, 250–1; and
 dependency theory 125–6
- culture of poverty 244
- Curran, J. 106, 116–19
- cybernetic commodity 150–6
- Danilean, N.R. 73, 92
- data collection 224–5
- decentralization 91

- decommodification 162
 defini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23–7
 de Haven-Smith, L. 255
 democ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113–14
 democratic socialism 12
 dependency theory 14, 120, 124–6
 deregulation 201; *see also* privatization
 determination/overdetermination 5–6, 10, 137–8
 development 95; media growth and 20
 developmentalism 120–2, 130; critiques of 123–4, 130–2
 Dewey, J. 66
 dialectical thinking 33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25
 directors 187–9
 discourse analysis 71
 Disney 194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59
 diversity 258, 259, 261, 268
 division of labor 41, 42; international 20, 95, 160–1, 232, 237
 dualisms 4–5
 Du Bois, W.E.B. 236
 Duboff, R. 90
 Durkheim, E. 33

 East–West Center (Hawaii) 128
 economic growth 51, 52, 128, 129
 economics 47–50; political economy and 63–8; *see also*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sm 259, 264, 265
 Eisenstein, Elizabeth 88
 electronic cottage 94
 elite rule 120, 217–18; *see also* national elites
 Elliott, P. 99
 empirical school 130–1
 empiricism 79
 Enlightenment 39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economy 62–3
 Enzensberger, H.M. 99
 epistemology 3–9, 71, 136–8
 equilibrium 63
 essentialism 33, 70–1, 161, 239
 European research 19–20, 97–119
 Evans, W.A. 252, 260n, 261
 Ewen, Stuart 88, 171
 exchange relationships 155
 exchange value: in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146–8; and use value 141, 143–4, 154, 156
 exploitation 143–4
 extensive commodification 153–6

 facts 2, 66
 family wage 61
 Fanon, F. 120
 fascism 83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241, 255; racism in 236–7; Smythe at 77, 83–4
 feminism 15, 165, 238–9, 268; media and 234n, 241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60–2
 Ferguson, M. 205
 film industry 88–9, 109; Indian 129–30
 film production 25, 26
 finance 73
 Fininvest Group 176
 Fiske, J. 229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58–9, 74–5
 flexibility 13, 198
 Flichy, P. 107, 111
 Fordism 59, 109
 formational approach, to gender analysis 234–5
 Fra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103, 114n
 Frankfurt School 37, 102–3
 free spaces 170–1
 Freire, P. 120
 Friedman, Benjamin 34
 Friedman, Milton 52
 functionalism 135

 Galbraith, John 55–6
 Gallagher, M. 111–12, 233
 Gandy, O.H. 94
 Garnham, Nicholas 19, 78, 80, 101, 113, 118; on culture and capitalism 104, 105–6; on Frankfurt School 103; and media commodification 147, 148
 Gates, H.L. 251n
 gender 96, 111–12, 230–5
 General Magic 193
 General Motors 177
 Gerbner, George 87
 Giddens, A. 151n, 164 165–6, 174, 206; and structuration 212, 213–14
 Gilman, C.P. 60

- Gitlin, T. 97, 240, 256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nges in 11–16
 globalization 205–6, 207
 Golding, Peter 19, 34, 78, 98, 101, 102–3, 104, 114–15, 171, 218, 231; and new revisionism 116, 117, 118
 Gordon, Kenneth 55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40, 41, 46, 53, 77, 201–4; Keynes and 51–2
 Gramsci, A. 37, 38, 242, 243
 Guback, Thomas 77, 84, 88
 Gunder Frank, A. 56

 Habermas, J. 37, 103, 167–8
 Haight, T.R. 97
 Hall, S. 165
 Halloran, James 97–9, 100, 117
 Hamelink, C. 113
 Hannigan, J. 90
 Haraway, D.J. 45, 238–9
 Hardt, H. 38n, 159
 Harris, Philip 98
 Hartmann, Peter 98
 Harvey, D. 13, 33, 174, 198
 Hawkesworth, M.E. 255
 Hegel, G.W.F. 37, 44
 hegemony 154, 216, 242–5
 Heilbroner, R.L. 30
 Heisenberg Principle 7n, 8
 Herman, E.S. 89–90
 Hills, J. 113
 historical analysis 17, 18, 88–9, 106–7
 history 27–9, 133; Marx and 44
 Hobsbawm, E. 213, 242
 Hollywood 109, 180
 horizontal concentration 175–6
 Horkheimer, Max 110
 Hutcheson Francis 24
 hybridization 268

 IBM 91, 189, 193
 identity 98, 165, 166, 256–7
 ideology 242, 243
 inclusiveness 3–5
 income differentials 218–19
 Indian research 129–30
 individualism 253, 256, 268; market and 18
 individuation 215, 242
 Indonesia 14
 inflation 52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67, 75, 87, 95, 113; on users 152–3
 information society 128
 Ingram, J.K. 27–8, 30
 Innis, Harold 173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84, 86
 Institute for Latin America (IPAL) 124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8, 32, 36, 54–6, 58, 72, 159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14–15
 Instituto Latinamericanos de Estudios (ILET) 123–4
 instrumentalism 262–3
 integration 91, 177
 intellectual leaders 12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87–8, 98, 13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27, 203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3–4
 International Users Group (INTUG) 204
 internationalization 203–4
 intrinsic commodification 150–3

 Jameson, F. 266, 268n
 Japan 128
 Jevons, W.S. 47, 48
 Jhally, S. 88, 96–7, 141, 142, 150
 Johnson, Paul 76n
 Johnson, R. 252
 Jones, A.S. 152
 journalism 107
 Jung, D. 94

 Kant, I. 37
 Kellner, D. 93
 Keynes, J.M. 48, 51–2
 Keynesian economics 51–2, 63
 knowledge 1, 3, 38
 Kuhn, T. 2

 labor 18, 36, 37–8, 96; audience as 148, 149, 150; commodification of 157–60; cultural 110; Marx and 43, 45; power of 142, 146; and telecommunication 113
 labor internationalism 161
 Laclau, E. 213
 laissez-faire 40
 Lane, R.E. 64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123, 130–1
 Lee, J-T. 129
 Lent, John 95, 128, 129
 Lerner, Daniel 122

- Levins, R. 34n
 Lewis, J. 96–7
 Lewontin, R.C. 34n
 liberal pluralism 27–8
 liberalization 202–3, 262, 263
 liberation movements 120
 libraries 225
 Livant, William 84
 long waves of innovation 59
 Lorenz, Konrad 7–8
 Lotus Marketplace 152
 Luddism 113n, 114
 Lukács, G. 37, 144
- McAnany, E.G. 122
 MacBride Roundtable 76, 241
 McChesney, R.W. 89, 91
 McCloskey, D.N. 65–6, 67
 Mcintosh, M. 61
 McLaughlin, J.F. 185
 McPhail, T. 95
 Mahon, R. 93
 Mahoney, E. 85, 94
 Malthus, Thomas 35, 39, 41
 Mandel, E. 56
 Manet, Enrique 124
 Manhattan Cable 183
 Mansell, Robin 78
 marginal utility 48
 market/s 50, 63, 64–5, 163, 164;
 individualism and 18; in public choice
 theory 253, 264, 265; specific 74–5
 market competition 182–3
 market socialism 58
 marketing 12, 73
 Marshall, Alfred 48, 49
 Martin, M. 96
 Marx, Karl 26, 33, 35, 105, 173; and
 commodity 140, 141–4; critiqu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43–4; and
 praxis 3, 37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31, 32, 36, 38,
 56–9, 146; and cultural studies 248;
 European media research and 102–4
 mass media 74, 104–5; commodification
 and 147, 148–9, 152; developmentalism
 and 122, 130; Indian research on 129–30
 Massey, D. 174
 Masuda, Y. 128
 Matsushita 181, 195n
- Mattelart, A. 9, 20, 25, 78, 100, 111;
 advertising industry 107–8; and class
 analysis 229–30;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106; and Marxian theory 101–2, 103, 105
 Mattelart, M. 9
 Matthaei, J. 235n
 M'Bow, A.M. 127
 media: access to 171, 219, 228–9, 232, 236;
 American research on power of 89;
 decentring 71, 104–5; elites 217;
 production of 158; *see also* mass media
 Media Charter (South Africa) 127
 media concentration 90, 91, 175–89, 259;
 new approaches to 188–99
 media imperialism 75–6
 media industri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n
 115–19; production in 151, 158–9, 160;
 transformation of 73–4
 media studies 104
 Meehan, E.R. 150
 Melody, William 78, 84
 Menger, Karl 48, 50
 merchandising arrangements 192, 194–5
 mergers 192–4
 metanarrative 80
 Mexico 209
 micro-power 214–15
 Microsoft 193
 Miège, B. 110–11, 115–16, 148n, 160
 military, media and 75, 92
 Mill, J.S. 27, 29–30, 40, 41
 Miller, D. 58
 Miller, M.C. 244
 Mitchell, Wesley 55
 modernization 20, 122–3
 monetarism 52, 63
 monitoring 151, 227
 monopolization 77, 107, 111, 194, 258
 Montgomery, K.C. 89
 moral philosophy 17, 18, 34–7, 49
 Morris-Suzuki, T. 128
 Mosco, Vincent 85
 Mouffe, C. 213
 Mowlana, Hamid 87, 95
 Mulgan, G.J. 113, 114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178–81
 Murdoch, G. 2, 19, 34, 78, 82n, 102–3,
 104, 218, 231, 260; cultural studies 80;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 98, 99, 101; and new revisionism
 114–15, 116, 117, 118

- mutual constitutions 5–7, 138, 142
 mystification 143
 nation-building 121, 200, 208
 national elites 121, 126, 130
 nationalism 42, 120, 121, 201, 207–11
 needs 156; and wants 63–4, 65
 negotiation 268
 neoclassical economics 18, 22–3, 48–52;
 critiques of 53–63
 neo-conservatism 53–4
 neo-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18, 19, 58
New Palgrave, The 24, 25, 39n
 new revisionism 116–19
 new social movement 171n, 239, 240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 76, 95,
 99, 207, 241; Africans and 127
 New York 205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14,
 119, 128, 129
 News Corporation 176, 179, 214
 news systems 126
 newsroom, labor process in 159
 Nielsen, M. 226
 Non-Aligned Movement 76
 non-capitalist production *see* artisan
 production
 non-linearity 6, 7, 8–9
 non-media takeovers 176
 Nordenstreng, Kaarle 77, 86, 87, 99–100
 North American research 19, 82–97
 Northern Telecom 181
 Nove, A. 58
 Oakeshott, M. 23
 objectification 144
 O'Brien, Mary 60
 O'Connor, J. 166, 167
 Offe, C. 162
 Oliveira, O.S. 126–7
 ontology 10, 138
 oppositional communication 111, 170–1
 oppositional hegemonies 243, 244–5
 oppositional politics 207, 208, 210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158–9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115–16
 overdetermination 5–6, 10, 137–8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89–91, 182–9
 Palgrave, R.H. 24
 Palmer, B.D. 270
 Parsons, T. 135
 Pasquali, A. 123n
 patriarchy 234
 pay-per-view television 152
 Peltzman, S. 264
 Pendakur, Manjunath 89, 130, 132n
 physics 6, 7–8
 Physiocrats 40
 Pigou, A.C. 50–1
 Piller, C. 219n
 Piore, M. 32, 58
 pluralism 227–8, 254–5, 257
 Pogorel, G. 192n
 policy studies 11; political economy and
 247, 250, 253–7, 258, 260, 262, 263–6
 political economy: characteristics of 27–38;
 cultural studies and 247–50, 250–3,
 257–9, 262–3, 266–70; definitions of
 23–7;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14–15.; and
 new revisionism 116–19; policy studies
 and 247, 250, 253–7, 258, 260, 262,
 263–6; *see also*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oclassical economics
 polysemy 259, 261, 262, 268
 popular culture 104, 251
 positivism 65–6, 79, 256
 Posner, Richard 53
 post-Fordism 59, 73–4, 74–5, 91, 109
 postmodernism 32, 33, 36, 74
 post-structuralism 32, 36, 126, 131–2,
 209–10
 power 49, 63, 89, 95, 257–8;
 commodification and 154; and control of
 workplace 227; corporate 175, 189, 194;
 cultural studies and 252–3, 258; global
 structure of 94; hegemonic 243;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and 180, 197
 power-geometry 174, 242
 power relations 25
 praxis 9, 17, 18, 37–8, 50
 press 110, 226; American research on
 89–90
 private life, social process in 163–7
 private property 40, 42
 privatization 75, 77; of 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s 153, 203; processes 138, 139;
 control 26; public sphere as 170, 171–2;
 production 73, 74; capitalist 110;
 domestic labor as 231, 232; in media
 industries 151, 158–9, 160

- productivism 259, 260
 products of communication 25
 programming 148, 152; market power and 219–21
 Prokop, Dieter 99
 propaganda 92
 public broadcasting 89, 219, 221
 public choice theory 11, 53, 54, 253–4, 256
 public information 153, 225
 public interest 168
 public life 113; social process in 167–72
 publishing industry 146; restructuring of 226

 race 236–8; communication and 96–7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176, 195–6
 rational expectations *see* public choice theory
 rationality 42
 Rawls, J. 36
 reality 2, 36
 reciprocity 155
 recommodification 162
 reductionism 33
 regulation 59, 75, 201; social costs of 265; *see als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egulation School 32, 201
 Reich, Robert 93n, 180
 relative autonomy 31
 reproducibility 110
 repudiation 135
 researcher, relationship to research subject 79–80
 resistance 95–6, 111, 119–20, 127, 167, 252, 262, 268; to commodification 171; of consumers 146, 261; gender and 233, 234; of labor 146
 resource 214; communication as 92
 restructuring: economic 13, 177–8; in workplace 225–6
 rethinking 135–6
 Ricardo, David 27, 39, 41, 48
 Roach, Colleen 95, 97
 Robbins, B. 169
 Robins, K. 78, 109, 114
 Robinson, Joan 15, 35, 42, 50
 Rogers, E. 131
 Roll, E. 40
 Roncagliolo, R. 123, 124
 Rorty, R. 137
 rural life 94

 Russia 12

 Saatchi & Saatchi 107
 Sabel, C. 32, 58
 Sachs, Jeffrey 34
 Sahlins, M. 141
 Sainath, P. 129
 Samarajiwa, R. 122
 Samuelson, Paul 52
 Saxton, A. 238
 Schiller, D. 85, 88, 89
 Schiller, Herbert 19, 77, 81n, 84, 85–8, 89, 92, 171
 Schlesinger, P. 209
 Schramm, W. 122
 Schumpeter, J. 43, 55n
 self 166
 self-interest 40–1, 253
 Sennett, R. 164
 Shimony, A. 2
 Sholar, S. 85
 shopping mall, commodification in 154
 Siegal, L. 128, 129
 Siegelau, S. 104n, 111, 126n
 sign value 155–6
 Singapore 209
 Slack, J.D. 6
 Slater, D. 270
 Smith, Adam 24, 27, 29, 33, 34–5;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39, 40–1, 140–1
 Smythe, D. 19, 24, 26, 28n, 45, 67, 78n, 79, 92, 147; and audience as commodity 148–9; career of 77, 82–5
 social change 10, 15, 27–9, 49, 138; and structuration 213
 social class *see* class
 social life 3, 30, 38; and structuration 212, 213–16
 social movements 15–16, 18, 97; and structuration 238–41
 social order 48, 253–4
 social relations 25, 64–5, 269; of capitalism 44–5; and commodification 143; communication and 143; cultural studies and 248; social class and 216–17, 228–9
 social reproduction 231, 232–3, 235
 social totality 17, 18, 29–34, 49, 118, 133, 258, 267–70
 social values 34–5

- socialism 12, 120, 121; and nationalism 208, 209–10
- socialist ecology 62–3
- society 32
- Soja, E. 198–9
- Solow, R. 39n
- Somavia, Juan 123
- South Africa 127
- space, as institutional extension 175–99
- spatial agglomeration 199
- spatialization 173–211
- specific markets 74–5
- stagnation 12–13
- state 31, 170; communication business and 91–4, 114; expansion of, as producer of communication 75; policy studies and 250, 263–4, 265; power of 89; role of in commodification 162–3; role of in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196–7;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196–7;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 125
- state monopolies 77, 107, 111
- Steeves, H.L. 233–4
- Steuart, James 24
- Stigler, G.J. 53, 264
- Storper, M. 58, 109
- Strassman, Walter 55
- strategic alliances 189, 192–4, 195–6, 197
-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91, 109
- structuration 212–45
- structures 72, 140, 145, 212; constitution of 29; corporate 198–9; public process and 170
- surplus value 43, 45, 105, 142, 146
- surveillance systems 150n, 151, 152, 153
- survival processes 26
- Sussman, Gerald 95, 128, 129
- Sweezy, P.M. 28, 56
- synergy 192
- Tabor, M. 236
- Taylorism 59, 157
- technology 113–14
- technostructure 56
- telecommunication 89, 107; American research on 90–1, 94; automation in 226–7; European research on 112–13; liberalization of systems of 262, 263; national 74, 75, 77; service providers 90–1
- Tele-Communications Inc 193
-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oundtable 241
- telephony: class power in 223–4; race and 237
- television, in USA 93
- Tetzlaff, D. 267
- texts, production of 260–1
- theory of theory 2–9
- Third World: changes in 14–15;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207, 208
- Third World research 20, 119–32
- Thompson, J.B. 213–14
- Thompson, J. Walter 107
- time-space compression/distanciation 13, 174, 198
- Time Warner 91, 152, 177–8, 181, 189, 192–3, 194
- Tönnies, F. 121
- Traber, Michael 128, 129
- tradition, and hegemony 242
- transformations 27; of businesses 13; historical 27–9; structural 91, 109
- transnational media 13, 94–5, 113, 114, 179–81
- ‘trickle-down’ effect 244
- truth 66–7
- Tunstall, J. 118n
- Uche, L.U. 127
- Ugboajah, F.O. 127
- Umesao, T. 128
- UNESCO 87n, 204
-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2, 57
- United Kingdom, media in 102
- United Nations 76
- 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60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1–2; class power in 219–21;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edia 77;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218–19; and Latin America 127, 207; media use in 93, 222; social movements in 241; telephone penetration rates in 223–4
- universalism 256–7
- use values 141, 142; and exchange values 141, 143–4, 154, 156
- utilitarianism 47–8
- Utopian socialism 42–3
- value, labor theory of 40, 43
- value neutrality 35–6

values 242
Veblen, T. 50, 55, 155, 156
Vernon, R. 196
Veron, E. 123n
vertical concentration 176–7, 179
video industry 91, 109

Wallerstein, I. 9, 32, 57
wants, and needs 63–4, 65
Waring, M. 60
Wasko, Janet 85, 88, 91, 226
wealth 46
Weber, Max 35, 159, 216n
Webster, F. 114
Weimar, L. 219n
Weinstein, L.R. 97
welfare 64, 224, 237

Westinghouse 194
Williams, G. 29
Williams, R. 1, 23–4, 45, 104, 206, 216,
244
Wilson, J.Q. 53
Winseck, D. 89
women, and class power 231, 232–3; in
communication 96;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112
Wood, E.M. 31
work, transformation of 157, 159
working class 44, 230
World Bank 203
world systems theory 32, 57
WPP 107

Xerox 189